

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  
中国国民革命运动  
(1926—1927)

下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译

4

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丛书编者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  
主 编 黄修荣  
副主编 马贵凡 王德京

### 学术指导

李 新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廖盖隆 (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 研究员)  
向 青 (北京大学 教授)  
杨云若 (中国人民大学 教授)  
刘桂生 (北京大学 教授)  
张注洪 (北京大学 教授)  
宋洪训 (中共中央马列著作编译局 研究员)  
A. M. 格里戈里耶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教授)  
K. B. 舍维廖夫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高级研  
究员)

## 丛书前言

联共(布)<sup>①</sup>、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和中外关系史等学科的重要研究课题。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国广大史学工作者解放思想、冲破禁区、开动脑筋、积极探索,在苏联、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从而推动了中共党史等有关学科的研究,促进了这些学科的发展。但由于所能看到的档案资料还比较匮乏等原因,这些研究只是初步的,还有待进一步深入。因此,积极开发利用各种文献档案,是我们面临的一项重要任务。

90年代初,由于俄国政治体制的变革,俄罗斯国家档案管理机构和管理办法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从1993年开始实行《关于俄罗斯联邦档案馆馆藏及档案馆库管理的基本法》。随着这一法规的颁布,大量罕见的档案资料首次开放并陆续出版。其中最使我国学术界感兴趣的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和俄罗斯现代历史文献保管

---

<sup>①</sup> 苏联共产党的名称有一个变化的过程:1898年3月,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正式成立;1918年3月,布尔什维克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1925年12月,党的十四大决定将俄共(布)改称为全联盟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联共(布);1952年10月,党的十九大又决定将联共(布)改为苏联共产党,简称苏共。

与研究中心同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联合编辑的有关联共（布）、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大型系列档案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1920—1949）》。

为了把这批从未公布过的重要档案资料介绍给我国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我们根据与俄方签订的协议，组织有经验的学者独家翻译这套档案文件集，并聘请中外专家进行译审、校阅。与此同时，我们还将历年来在我国各种报刊、杂志、图书上发表的其他重要中文文献资料编成多卷本《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49）》。这套文献资料选辑将与前述档案文件集组成《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陆续在我国出版。

毋庸置疑，《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是一套具有很高学术价值的档案资料。它的问世，不仅可以使我们更全面地把握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形成和变化的历史脉络，而且还可以更深入地了解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在不同历史时期对中国各军事、政治集团和重要人物的态度和策略，更具体地弄清共产国际驻华代表、苏联驻华使节及顾问在华活动情况以及他们之间的共识和分歧，从而进一步深化中共党史、中国革命史、中国近现代史、中苏关系史、国共关系史、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问题以及一些重要历史人物的研究。

这套档案资料丛书在编译、出版过程中得到多方帮助。值此丛书问世之际，谨向关怀、支持过这项工作的有



---

关领导和部门，向为编译、出版这套丛书辛勤工作的专家学者及北京图书馆出版社的有关同志，致以深切的谢意。

黄修荣

1996年10月

于京郊自得园

---

---

## 译者前言

《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6—1927）》（上下册）是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俄罗斯现代史文献保管与研究中心、德国柏林自由大学东亚研究会合作编辑的大型系列文件集《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第二卷（两册）的中译本，根据莫斯科1996年俄文版译出。本卷文件集共收录文件268份，基本上都是首次发表，主要有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讨论中国问题的会议记录；斯大林、托洛茨基、布哈林、季诺维也夫等人谈及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电；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会议记录；布勃诺夫使团关于华南形势和“三二〇事件”的报告；苏联和共产国际驻华代表鲍罗廷、罗易等人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和函电，以及苏联和共产国际领导人同胡汉民、邵力子等国民党人的谈话记录和往来书信等。这些文件记录了联共（布）、共产国际对中国这个时期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如冯玉祥在北方的失败、北伐的开始、“三二〇事件”、蒋介石“四一二政变”、“七一五”国共关系破裂等的态度，反映了它们对华政策的重点、目标及其演变过程，同时也暴露了它们试图使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变成工农革命、使国民党变成工农党，并要在国民党各派保持联

盟情况下开展土地革命等政策的矛盾性和不现实性。这些文件都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为了及时译介给我国史学界，我们于1996年上半年向原书编者购买了中文版翻译出版权，并于1997年初着手组织力量进行翻译。本书（两册）列为我们编译的大型文献档案丛书《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第三、四卷。

本书俄文版由前言、文件正文、图书目录、人名索引四部分组成，中译本全文译出前两部分和第四部分，第三部分从略。另外，根据中国读者的要求，我们还补译第一卷译本略去的人名索引，与本卷译本人名索引合编在一起。为反映文件原貌，本译本仍保持了原文件体例，未作任何删节。在俄文版中注释是文尾注和脚注，为便于读者阅读，中译本一律改为脚注。有些注释对中国读者来说实无必要，翻译时作了删节。译者新加的注释在注后标有“译者”字样。

在翻译过程中遇到的很大难题，是准确还原中国人的本名，文件中有些中国人使用的是化名或广东语拼音姓名，由于年代较久，又缺乏可参考的中文资料，有些人的名字难以查实，只好音译或估译，这种情况在行文或脚注中作了说明。

文件中有些俄国人的名和父名缩写字母，因不知全称，无法译出相应汉字，为统一起见，在中译本中一律删去不译，只译姓，但对于中国读者不熟悉的人物，第一次出现时尽量用脚注注明其姓名全称。

本书在翻译过程中得到许多知名学者的关心和帮

助。著名汉学家、原书俄方编者、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 A. M. 格里戈里耶夫教授和 K. B. 舍维廖夫博士热情地帮助解决语言理解等方面的某些疑难问题；著名历史学家北京大学刘桂生教授、张注洪教授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审读译稿，帮助订正译文中的不准确之处。我们特此向他们表示谢意。

本书翻译工作由马贵凡同志组织。参加翻译的有：（以姓氏笔划为序）马贵凡（中央党史研究室译审）、王昌滨（中央党校译审）、宋洪训（中央编译局研究员）、何宏江（中央编译局译审）、董友忱（中央党校译审）。

全书译稿最后由宋洪训、马贵凡同志校订。

由于时间仓促，水平所限，译文中难免有错漏和不妥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

---

## 目 录

### 第三部分：国民革命运动危机的迫近和莫斯科政治方针的激进化

134.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的信（1926年11月26日）……………（12）
135.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  
（1926年12月1日）……………（17）
1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2号（特字第54号）  
记录（摘录）（1926年12月2日）……………（23）
137.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拉菲斯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6年12月4日）……………（26）
138. 拉菲斯给伏罗希洛夫的信（1926年12月13日）  
……………（27）
139. 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  
报告（1926年12月14日）……………（29）
140. 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工作的  
结论和建议（摘录）（1926年12月14日）……………（49）
14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3号（特字第55号）  
记录（摘录）（1926年12月16日）……………（52）
142.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4号（特字第56号）  
记录（摘录）（1926年12月23日）……………（54）
1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5号（特字第57号）

- 记录 (摘录) (1926 年 12 月 30 日) ..... (56)
144.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7 号 (特字第 58 号)  
记录 (摘录) (1927 年 1 月 6 日) ..... (58)
14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记录 (摘录)  
(1927 年 1 月 6 日) ..... (60)
146. 谭平山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会议上就国民党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派驻代表问题的发言记录  
(1927 年 1 月 7 日) ..... (61)
147. 索洛维约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小  
委员会的信 (1927 年 1 月 10 日) ..... (63)
148.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小委员会会议  
第 6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 月 11 日)  
..... (64)
149.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8 号 (特字第 59 号)  
记录 (摘录) (1927 年 1 月 13 日) ..... (66)
150.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 (1927 年 1 月 14 日) ..... (67)
15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记录 (摘录)  
(1927 年 1 月 18 日) ..... (68)
15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 5 号记录  
(摘录) (1927 年 1 月 19 日) ..... (71)
1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就《关于中国  
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草案问题召开的会议  
的速记记录 (摘录) (1927 年 1 月 19 日) ..... (73)
154.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  
的组织任务》的决议 (摘录)  
(不早于 1927 年 1 月 19 日) ..... (76)
15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给共产国际执行

- 委员会赴中国代表团的指示  
(1927年1月19日) ..... (89)
15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为举行中国共产党  
第五次代表大会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  
的指示(1927年1月19日) ..... (91)
157.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代表团的信(1927年1月21日) ..... (93)
15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1号(特字第61号)  
记录(摘录)(1927年1月27日) ..... (100)
15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第5号  
记录(摘录)(1927年1月29日) ..... (101)
160.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记录(摘录)  
(1927年2月4日) ..... (102)
161.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4号(特字第63号)  
记录(摘录)(1927年2月5日) ..... (103)
162. 纳索诺夫给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年2月5日) ..... (105)
163.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联共(布)  
中央的信(1927年2月9日) ..... (111)
164. 索洛维约夫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  
(1927年2月9日) ..... (112)
16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5号(特字第64号)  
记录(摘录)(1927年2月10日) ..... (113)
1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9号  
记录(摘录)(1927年2月11日) ..... (115)
16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记录(摘录)  
(1927年2月17日) ..... (116)
16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7号(特字第65号)

- 记录（摘录）（1927年2月17日）……………（118）
169.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年2月17日）……………（121）
17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88号（特字第66号）  
记录（摘录）（1927年2月24日）……………（123）
171.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7年2月25日）……………（124）
172.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7年2月25日）……………（130）
173. 1927年2月22日和23日维经斯基和蒋介石  
在九江的谈话记录（1927年2月26日）……………（132）
174.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89号  
（特字第67号）记录（摘录）  
（1927年3月3日）……………（134）
175. 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纳索诺夫、福京关于  
第二次上海起义的书面报告  
（1927年3月4日）……………（138）
176.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7年3月5日）……………（147）
17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0号（特字第68号）  
记录（摘录）（1927年3月10日）……………（149）
178. 皮亚特尼茨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给布哈林和  
斯大林的信（1927年3月21日）……………（152）
179. 国际农业研究所给谭平山的信  
（1927年3月23日）……………（153）
18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2号（特字第70号）  
记录（摘录）（1927年3月24日）……………（155）
181.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 (1927年3月29日) ..... (157)
182.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关于  
中国形势的报告(1927年3月30日) ..... (159)
18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3号  
(特字第71号)记录(摘录)  
(1927年3月31日) ..... (167)
184.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  
会委员和共产国际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  
(1927年4月4日) ..... (170)
18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4号(特字第72号)  
记录(摘录)(1927年4月7日) ..... (172)
18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给国民党代表邵力子  
的信(1927年4月7日) ..... (175)
187. 多里奥、维经斯基和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的电报(1927年4月7日) ..... (176)
188.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  
(1927年4月9日) ..... (178)
189.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  
(1927年4月10日) ..... (181)
190. 罗易给蒋介石的电报(1927年4月12日) ..... (182)
- 第四部分：国民革命运动的危机和共产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破裂**
191.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决议  
(1927年4月18日) ..... (198)
192.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7年4月18日) ..... (200)
193.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记录  
(1927年4月20日) ..... (205)

- 
194. 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27年4月20日) ..... (209)
  1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6号  
(特字第74号)记录(摘录)  
(1927年4月21日) ..... (210)
  196. 蒋介石给罗易的信 (1927年4月22日) ..... (213)
  197. 邵力子给索洛维约夫的信  
(不早于1927年4月23日) ..... (214)
  198. 皮亚特尼茨基给斯大林的信  
(1927年4月26日) ..... (215)
  1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97号  
(特字第75号)记录(摘录)  
(1927年4月27日) ..... (216)
  20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99号(特字第77号)  
记录(摘录)(1927年4月30日) ..... (218)
  201. 鲍罗廷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  
(1927年5月初) ..... (220)
  202. 维经斯基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7年5月3日) ..... (229)
  203. 赫梅廖夫就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给别尔津的  
书面报告(1927年5月6日) ..... (239)
  204. 罗易和多里奥给斯大林的电报  
(1927年5月9日) ..... (242)
  205.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记录  
(1927年5月11日) ..... (244)
  20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1号  
(特字第79号)记录(摘录)  
(1927年5月12日) ..... (245)

- 
207.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  
会议记录（1927年5月12—13日）……………（248）
2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02号  
（特字第80号）记录（摘录）  
（1927年5月13日）……………（252）
20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3号记录（摘录）  
（1927年5月19日）……………（253）
210.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3号  
（特字第81号）记录（摘录）  
（1927年5月19日）……………（257）
21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八次全会给中国共产党的  
电报（1927年5月20日）……………（259）
212. 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关于蒋介石  
政变的书面报告（1927年5月21日）……………（260）
213. 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和曼达良给联共（布）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7年5月21日）……………（270）
214. 罗易给某人的电报（1927年5月25日）……………（272）
215. 罗易给某人的电报（1927年5月25日）……………（273）
21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5号  
（特字第83号）记录（摘录）  
（1927年5月26日）……………（275）
217. 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  
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  
（1927年5月28日）……………（276）
218.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27年5月30日）……………（296）
21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07号

- 
- (特字第 85 号) 记录 (摘录)  
(1927 年 6 月 2 日) ..... (297)
220. 罗易给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2 日) ..... (300)
221.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5 日) ..... (302)
222. 罗易就湖南局势给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  
电报 (1927 年 6 月 5 日) ..... (304)
223.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 108 号  
(特字第 86 号) 记录 (摘录)  
(1927 年 6 月 7 日) ..... (306)
224. 罗易给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8 日) ..... (308)
225.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0 号  
(特字第 88 号) 记录 (摘录)  
(1927 年 6 月 9 日) ..... (311)
226. 罗易给鲍罗廷的信 (1927 年 6 月 15 日) ..... (314)
227. 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111 号  
(特字第 89 号) 记录 (摘录)  
(1927 年 6 月 16 日) ..... (315)
228. 罗易给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16 日) ..... (318)
229.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17 日) ..... (320)
230. 罗易给联共 (布) 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22 日) ..... (323)
231.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  
的报告 (1927 年 6 月 22 日) ..... (324)

- 
232.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 30 号  
记录（摘录）（1927 年 6 月 22 日） ..... (343)
23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2 号  
（特字第 90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6 月 23 日） ..... (345)
234.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24 日） ..... (350)
235.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 年 6 月 24 日） ..... (352)
236. 谢苗诺夫给某人的信（1927 年 6 月 25 日） ..... (353)
237. 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  
（1927 年 6 月 26 日） ..... (357)
23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13 号  
（特字第 91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6 月 27 日） ..... (364)
239.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摘录）  
（1927 年 6 月 27 日） ..... (365)
240. 罗易同汪精卫谈话记录（1927 年 6 月 27 日）  
..... (367)
241.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28 日） ..... (371)
242.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1927 年 6 月 29 日） ..... (374)
243.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 114 号  
（特字第 92 号）记录（摘录）  
（1927 年 6 月 30 日） ..... (375)
244. 布留赫尔发表在《广州》杂志上的文章《北伐时期  
国民革命军中的派系》（1927 年 6 月） ..... (378)

- 
245. 沃兹涅先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  
(1927年7月6日) ..... (392)
246. 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27年7月7日) ..... (396)
247.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第116号  
(特字第94号)记录(摘录)  
(1927年7月8日) ..... (397)
248.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8日) ..... (399)
249.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秘密会议第33号  
记录(摘录)(1927年7月8日) ..... (400)
250.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  
委员会的信(1927年7月9日) ..... (402)
251.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1927年7月9日) ..... (405)
252.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摘录)  
(1927年7月11日) ..... (410)
253.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会议第34号  
记录(1927年7月13日) ..... (411)
254. 拉斯科尔尼科夫关于对中国共产党采取组织  
措施的建议(不早于1927年7月13日) ... (412)
25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第117号  
(特字第95号)记录(摘录)  
(1927年7月14日) ..... (413)
25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118号  
(特字第96号)记录(摘录)  
(1927年7月21日) ..... (415)

- 
257. 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布）驻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7年7月23日） .....（417）
258. 拉宾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  
（1927年7月29日） .....（420）
259. 罗易就第二次北伐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  
（1927年8月29日） .....（421）
260.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信  
（1927年8月30日） .....（434）
261.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罗易事件调查  
委员会的建议（1927年8月30日） .....（435）
262.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1927年9月3日） .....（436）
263.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1927年9月9日） .....（437）
264. 皮亚特尼茨基给莫洛托夫的信  
（1927年9月13日） .....（438）
265.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1927年9月16日） .....（439）
266. 罗易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  
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1927年9月17日） .....（440）
267. 拉宾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和联共（布）  
中央的书面报告（1927年10月10日） .....（459）
268. 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  
《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的报告  
（1927年10月23日） .....（462）
- 人名索引**.....（513）

## 第三部分

国民革命运动危机的迫近和  
莫斯科政治方针的激进化





---

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1926年11月12日—12月16日）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的这一时期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政策的制订和实施及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北伐取得的节节胜利促进了获得解放的各省群众运动的蓬勃发展。但同时这些胜利也大大提高了国民革命军及其司令部的政治作用，特别是增大了蒋介石的影响。蒋介石成了全国的军政领袖。他不仅是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而且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1927年）三月全会前还保留了党内的一些最高职位。群众运动规模的扩大加强了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地位，但同时也促使国民党内一切保守势力集结在蒋介石周围。至于说留在武汉的国民党左派，他们则致力于最充分地实现孙逸仙学说的革命要素，左派领袖中的多数人按其社会联系来说与加入蒋介石军政集团的人没有多大区别，但出于各种原因都反对蒋介石。

1926年底至1927年初，国民党、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尽管在蒋介石四月政变前表面上仍保持着形式上的统一，但实际上已开始分裂。决定国民党内部斗争加剧的，不仅是国民党领袖们对革命问题的态度的差异，而且是各派争夺党和军队的领导权、势力范围和辖区以及收入来源的斗争，发生冲突的将领们和政治家们的现实力量取决于收入的多少。

在持续几个月（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的这场斗争的中心，表面上是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地问题，而实际上是恢复以汪精卫为首的左派的权力和大大削弱蒋介石的地位的问题。以武汉的国民党领袖和共产党人为一方和以蒋介石集团为另一方之间的冲突不断加剧，到1927年4月初已达到临界点。

现已发表的文献、历史著作和回忆录相当详细地反映了1926年11月至1927年3月事态发展的表面情况。这一时期联共

(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问题上的政策的总轮廓也是清楚的<sup>①</sup>。但是表明这一政策的文献很少。本文件集在很大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本部分提供的文件揭示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制订的总的政治方针对如何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所采取的态度。全会讨论中国问题时,对本文件集前一部分所谈到的在国民革命军北伐初期对新政治方针的探索作了总结。

布哈林在全会全体会议上作的政治报告<sup>②</sup>以及斯大林<sup>③</sup>和布哈林在全会中国委员会中的发言(第135号文件)为全会在中国问题上的政治方针确定了基本参数。斯大林还积极参与了对全会于12月16日所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sup>④</sup>的审订。

斯大林和布哈林的发言以及全会的决议公开宣布了此前就不言而喻的、中国走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即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战略方针。向这条道路上过渡的保证应是夺取无产阶级领导权、开展土地革命及建立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根据这一战略方针还确定了近期的策略方针。对基本策略的探索是围绕一个主要问题进行的,这就是如何把国民革命统一战线策略同农民土地革命方

① 《中国现代史(1917—1927)》第251—283页;B.И.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2册第181—254页;A.В.巴库林:《中国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1925至1927年中国革命史片断)》,莫斯科—列宁格勒1930年版;A.В.布拉戈达托夫:《中国革命札记(1925—1927)》,第181—232页;A.И.切列潘诺夫:《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军事顾问札记)》,莫斯科1968年版第204—257页;《中国革命问题》,莫斯科1927年版;汤炳祥:《中国革命的发展道路》,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北伐战争(1926—1927)》;《中共中央文件选集》北京1989年版,第2卷第422—594页,第3卷第1—38、593—594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卷第742—928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卷第530—626页;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台北1963年版,第1—160页;《鲍罗廷在中国的有关资料》,北京1983年版,第114—202页;韦慕庭:《革命使者:苏联顾问和国民党中国(1920—1927)》第356—412、790—835页。

② 《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6日—12月16日)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1卷第48—49、83—91页。

③ 《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8卷第321—334页。

④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89—105页;关于全会中国委员会中的争论和决议起草经过,见:В.И.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2册第229—240页。

针结合起来。

中国革命的现阶段被认为是走向新的更高阶段的“过渡时期”，在这一时期，各个资产阶级集团逐渐脱离革命阵营，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联盟遂将成为革命的基本动力。根据这一认识，给中国共产党提出的策略方针尽管是温和的、“过渡性的”，但明显带有进攻性质：参加国民党的国民政府，目的在于支持国民党的“革命左派”；向各级政府机构“渗透”，是为了推进土地改革的实施，“立即”满足工农的迫切要求；建立作为农村政权机构的“农民委员会”；武装农民基层群众和工人；向军队“渗透”以便逐步占据其中的领导岗位；把国民党变成“真正的人民政党”。

共产国际的领导人当时认为实际执行这一既定策略“是异常困难的”。用布哈林的话说，“难就难在我们不能瓦解”国民政府、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因此要求中国共产党执行“非常谨慎的政策”，以便“小心、巧妙、谨慎地”争取“改组”国民党、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军（第135号文件）。实际上，主要的困难在于，共产国际策划的“改组”，即使共产党人的政策最“巧妙”，也是国民党所不能接受的。国民党不能也不准备放弃孙逸仙的国民革命学说而来支持工农革命，正如共产党人不能放弃阶级斗争思想而来支持阶级和睦一样。他们在这一根本问题上的立场是不相容的。

共产国际认为，中国向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过渡虽然没有保证，但是是十分现实的。同时也不排除资本主义发展道路。这被认为是革命失败了。但是对于可能出现的这种情况并没有提出任何政治建议。共产国际的某些活动家（斐迪、拉斯科尔尼科夫）不排除中国革命走土耳其“凯末尔”式发展道路的可能性，即国民党在撇开共产党人和反对共产党人的情况下继续与帝国主义作斗争。但其他参加中国问题讨论的人认为这一可能性不值得重视。

直到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之前，联共（布）中

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在其关于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决议中，总的来说都是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总的政治方针为出发点的。同时随着国民革命运动中危机现象的迫近，给苏联驻华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下达的指示越来越具有激进的性质。但始终不变的是，试图把两个相互排斥的任务结合起来完成，这两个任务就是：如何能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党内合作形式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保持下去，同时又大力促进工农群众运动的高涨。

还在全会进行期间，莫斯科就得到消息说，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内出现了抑制工人运动、实行城市退却，以求得与农村进攻相平衡的倾向<sup>①</sup>。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这一倾向持断然否定的态度(第136、142号文件)。

过了一个月，1927年1月19日，以布哈林为首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通过了《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任务》的决议，针对中共党内问题、党在国民党、工会、农民、军队中的工作问题等把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具体化了。布哈林的几次讲话和决议都特别重视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重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出的关于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各级组织、政府机关、军队等等中”夺取“重要的战略阵地”、把国民党变成工人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战斗革命联盟”，而工人阶级和农民将在其中“成为国民党的基本骨干”的方针。同时建议中国共产党在提拔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内领导职务时应“格外谨慎”，不要让“国民党内的全部领导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担任”，使国民党保持“国民党性质，即事实上的广泛的民主民族革命性

---

<sup>①</sup> 关于中共在这一时期工农运动中的政策，见：《中国工人运动(1924—1927年革命、工会运动文献和其他资料集)》，莫斯科1966年版，第161—196页；《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北京1957年版；Л. И. 杰柳辛：《中国共产党政策中的土地问题(1921—1928)》，莫斯科1972年版，第211—291页；A. C. 科斯佳耶娃：《中国农会(20世纪20年代)》，莫斯科1978年版。

质”（第 152、153、154 号文件）。为实现这些任务，2 月底派出以米夫为首的“一批宣传工作者”归中共中央执委会使用，期限一年（第 168、169 号文件）。

1927 年 1 月至 2 月初，共产国际执委会领导机构根据邵力子的提议不止一次地讨论了关于国民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派驻代表的问题，以及关于建立国民党委员会的问题，但这两个建议都未被采纳（第 145—148、151、159、160、166 号文件）。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闭幕后不久，就即将举行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问题作出了决定。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这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包括维经斯基、多里奥和罗易，罗易将取代维经斯基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第 148、150、156、161、165 号文件）。根据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决定（第 143 号文件）通过了给代表团的指示（第 151 号文件）。1927 年 1 月 19 日的指示确定了代表大会的议事日程和给代表大会的政治指示。代表大会的“一切政治决定”都应“完全”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而组织决定则以上述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任务》的决议为依据（第 156、159 号文件）。

共产国际的实际工作者对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反应不一。有许多文件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中包括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内、远东局和鲍罗廷之间、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中、罗易和鲍罗廷之间意见分歧的材料，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期间拉菲斯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一组材料（第 137—140 号文件）、远东局委员阿尔布列赫特、曼达良、纳索诺夫和福京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第 162、171、172、175、176、212 号文件）、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会议记录（第 187、188 号文件）等。引起政治局担心的还有鲍罗廷和布留赫尔之间的“误会和摩擦”（第 158 号文件）。

维经斯基 1927 年 1 月 21 日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的信也含有类似的证明。他当然不能反对第七次全会决议的“分析部分”即决议的总政治方针,但对这一决议的“策略和组织部分”的执行却取决于中国共产党的可能性和国民党政府内各派“激烈斗争”的结局。对国民党军政领导层冲突形势的评估基本上重复了维经斯基两个月前提出的关于“新的困难和危险”的警告(第 134 号文件)。根据维经斯基和中共中央执委会总的看法,斯大林关于共产党人参加国民政府的“完全正确的”方针造成了特别的“困难”(第 157 号文件)。

2 月,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在专门的“说明书”中已遵奉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各项决定<sup>①</sup>。但是这一文件并不反映中共领导人的普遍看法,该党领导人中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这反映在瞿秋白和彭述之(实际上是和陈独秀)1927 年 3 月没有先例的公开论战中<sup>②</sup>。

在关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所在地问题的争执中,苏联领导人支持左派把武汉作为新的国民党首都的要求,但同时建议他们无论如何不能使争执发展到与蒋介石彻底决裂的地步。这一立场反映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给鲍罗廷和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的一些电报中(第 149、168 号文件)。

由于蒋介石在 1927 年 1 月初对武汉进行短期访问时和鲍罗廷的私人关系彻底破裂,甚至出现了鲍罗廷离开中国的问题(第 149、163 号文件),于是责成维经斯基再一次尝试平息争执。2 月 22 至 23 日在九江举行的谈判相当充分地暴露了蒋介石的立场。作为国民政府迁都武汉的先决条件,蒋介石以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19—23 页。

<sup>②</sup> 见瞿秋白:《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无出版地,1928 年;Л. П. 杰柳辛:《瞿秋白和彭述之论中国革命问题》,载《中国 1925 至 1927 年革命》,莫斯科 1978 年版,第 74—95 页。

的名义，以最后通牒的方式提出了两项“重要”要求：鲍罗廷离开中国和国民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第二项要求实际上意味着让政府和党，包括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人都服从于蒋介石的全面监控。蒋公开宣称，如不履行这两项要求，“我们准备决裂”，虽然他本人似乎并不反对共产国际和苏联。但对“决裂”后果的全部责任都推给了共产国际（第173号文件）。实际上是向共产国际提出了关于改变它的中国政策的最后通牒式的要求。

1927年3月3日政治局“关于对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修改的问题”的决定是对蒋介石最后通牒的答复（第174号文件）。决定是由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在布哈林参与下“根据业已弄清楚的中国总的形势”（第168号文件）起草的。这个决定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的政策激进化的一个新的步骤。中共政策的改变规定了从实施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指示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7年1月19日的决议时采取的“谨慎策略”向采取“坚决方针”的转变。过去关于工农运动、武装工农的指示及关于军队、国民党和党的工作的指示现在在表述上都使用了绝对的口气，如“无论如何”、“全力”、“一切地方”等。尤其建议在国民党内“实行排挤右派的方针”，“有步骤地自下而上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策略方针激进化的理由是，中国革命“正经历危机时期”，它只有“实行发展群众运动的坚定方针”，才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第174号文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一系列其他文件（第180、183、186号文件）重申了群众运动中的进攻方针。同时决定完全撤换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的成员，用“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他们（第173、174、178号文件）。但是新的远东局成员一直没有开始工作，1927年4月9日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团作出了解散远东局的决定（第188号文件）。

联共（布）和共产国际方针的激进化还表现为批准1927年2、



3月间在上海举行的工人起义。起义安排在蒋介石军队临近上海的时候(第189号文件)。这说明决定起义的意图不是军事上的考虑,而是巩固武汉在与蒋介石的冲突中的地位的这一政治上的考虑。阿尔布列赫特、曼达良、纳索诺夫和福京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第162、171、172、175、176号文件)中含有关于上海起义的意图和进程的一些新的细节<sup>①</sup>。但是起义的结果与其意图截然相反:起义促使蒋介石加快实现了他与共产党人和武汉决裂的这一业已成熟的决定,还促使各大国对国民革命运动左翼和苏联驻中国代表机构采取了极为严厉的立场。上海2月和3月起义后蒋介石的追随者加强了对共产党人领导的工会和对赣州、南昌、南京、九江、杭州、安庆、重庆等城市国民党左派的迫害;英美的军舰炮击南京;张作霖分子袭击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机构,对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实行封锁(第185号文件反映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北京袭击事件的最初反应)<sup>②</sup>。

蒋介石军队进入上海后,这支军队的司令白崇禧立即宣布,军队负责维持上海的秩序,下令停止总罢工和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还向外国当局保证军队不准备以武力收回租界。中共上海组织和总工会作出的回答是,决定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武装斗争、举行总罢工和立即夺取租界。上海共产党人的这些行动受到了莫斯科的坚决谴责。3月27日和2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根据斯大林、布哈林和加拉罕的建议给上海中共中央执委会发了两份电报,断然指示“目前不允许”举行总罢工或要求收回“租界”的起义,还要求“尽量避免”同国民革命军及其司令部发生冲突(第183号文件)。中共中央执委会3月31日致电莫斯科,报告说蒋介石

<sup>①</sup> 详见 A. A. (阿片, A. II., 赫梅廖夫, A. II.):《三次上海起义》第69—86页;《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上海1987年版。

<sup>②</sup> 另见《苏联外交文件》,莫斯科1965年版第10卷第141—143、146—147、149—152、158—161、167—171、182—186、631—632页。

“已开始在上海发动政变”，政治局于同日复电中共中央执委会，指示“目前不进行公开战斗……不上交武器，不得已时可将武器隐藏起来”（第183号文件）。

政治局3月3日指示和此后的电报所规定的激进措施，是与苏联领导人试图尽可能长时间地拖延国民党势在必然的分裂和哪怕是保持其形式上的统一的努力相结合的。这个方针反映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1927年3月10日根据斯大林的建议发给鲍罗廷转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委员（抄送中共中央执委会）的电报中，该电报向同一天开幕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提出了一些建议（第177号文件）。

布哈林在3月30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上作关于中国局势的通报时解释了政治局给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提出建议的原因：“我们要争取时间”，“加强自己的力量，取得喘息时间以进一步准备和组织我们的力量”，巩固在国民党军政机关中的地位。但共产国际的整个方针是旨在使“中国各派有步骤地不断向左转”。当以蒋介石为首的反革命资产阶级“在一定阶段”以军事力量对付共产党人的时候，“我们就转入进攻，也许是军事进攻”来反对蒋介石（第182号文件）。

联共（布）领导和共产国际一直试图推迟同蒋介石的决裂或使这一决裂尽可能带来较少的痛苦，直到4月12日上海发生政变时才停止这种尝试（第180、183、185、190号文件）。

莫斯科在政治上对蒋介石虚与委蛇的同时，继续在物质上支持武汉政府。3月31日政治局对鲍罗廷关于向武汉国民政府提供贷款的要求作了肯定的答复（第183号文件），而4月6日和7日决定“立即拨给”武汉200万卢布的款项，并着手“审议”其对军用物资的订货（第185号文件）。

与此同时，在中国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反对蒋介石。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通过决议，撤销了他的许多关键性的党内领

导职务。3月底4月初武汉政府试图进一步限制他在国民革命军所占领的华东各省的权力，撤销了蒋介石担任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职务。同时在3月下旬曾试图逮捕他，但没有成功(第201号文件)<sup>①</sup>。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带来预期的结果。

## 134

##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6年11月26日于上海

绝密

### 上海格里高里<sup>②</sup>同志来信副本<sup>③</sup>

亲爱的同志们：

最近几周，中国的政治局势发生一些变化，可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

北伐在肃清江西省的孙传芳部队后结束了第一阶段，其意义在于国民革命军和国民党的影响已扩大到长江流域。

但从这时起，解放运动出现了新的困难和危险。一是内部困难，即北伐参加者之间（主要是蒋介石和唐生智之间）争夺势力

<sup>①</sup> 详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卷第742—871页；杨天石：《寻求历史的谜底》第521—536页。

<sup>②</sup> Г. Н. 维经斯基。

<sup>③</sup> 信的副本分送 И. В. 斯大林、Н. И. 布哈林、Д. З. 曼努伊尔斯基、О. В. 库西宁以及 Л. М. 加拉罕、К. Е. 伏罗希洛夫和 Я. К. 别尔津。

范围和权力的斗争、军政领导即国民党机构和将领们之间的斗争。二是外部困难，即孙传芳失败后南方军事力量直接面对着奉系军队。

现在的主要问题是，国民党和南方军队采取什么样的军事政策：根据受国民党势力控制的各省的总的局势和南方军队连续作战几个月后的现状（见加伦<sup>①</sup>11月中旬的电报）<sup>②</sup>，南方需要喘息时间。必须调整国民军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同时组建新的政权，尽可能做到通过国民党实行集中领导来保留对各省自治作出的一些修正。

此外，必须考虑到民众因近年来战事不断已感到疲惫，在打败吴佩孚和孙传芳之后南方以不主动与奉天开战为好。

喘息时间具有很大的意义，这样国民政府奠定社会基础的过程可以以较快的速度进行，南方再过一段时间无疑会为反对奉天的斗争更加作好准备。

但敌人能给这个喘息时间吗？

近日北方联合势力在天津召开的军事会议<sup>③</sup>结束之后可以作出以下两个结论：

(1) 以张作霖为首的奉天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是消灭冯玉祥国民军的西北势力。而且张作霖和张宗昌担心国民军主力向河南挺进，认为消灭国民军刻不容缓。据我们的同志在会议结束后两天从北京传来的消息说，会议认为目前西北比西南更加重要，这也证实了上述想法。因此，想通过与奉天人进行军政外交来取得喘息时间的一切尝试都在冯玉祥问题上遭到了破产。奉天人的主

① B. K. 布留赫尔。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指由张作霖召开的包括张作霖、吴佩孚、张宗昌、阎锡山和孙传芳集团在内的东北、华北、华中和华东主要军阀集团代表会议（1926年11月14日至12月1日举行），会议讨论了在南方抗击国民革命军和在华北抗击冯玉祥国民军的计划。为此决定联合与会各派的军队，成立“安国军”，由张作霖任总司令。张任命张宗昌和孙传芳为其副手。

张很容易理解，是有远见和合乎逻辑的，他们的主张是：自己暂时不直接卷入同南方的战争，不急于肃清河南的吴佩孚，而是先猛攻冯玉祥，同时由山东人经河南对江西和湖北即南方在长江流域的堡垒采取行动。

(2) 看来孙传芳是在英国人的积极协助下被消灭的。英国人欺骗了他，在江西失败后与他断绝了关系。

可以推测，英国人在如何对待北伐的问题上已与日本人达成协议，即：不给南方军队以喘息机会。因为英国人很清楚，现在时间对中国革命有利，每一个月都会相对改善南方人的处境。至于日本人，其实他们从两方面给自己作了保证。即使在天津会议后与奉天结成军事联盟的张宗昌，在进攻江西时遭到失败，那么日本人也会获得好处，因为这是英国人的失败，这不会使他们同南方彻底反目，因为奉天人并未直接反对南方。此外，正如你们大家知道的，日本人派遣代表团去汉口和唐生智对话，同时派大间谍佐久良去广州。要是张宗昌在江西和湖北击败南方人，那么日本人也不会处于不利地位，因为这当然将意味着奉天人的胜利和扩张。

如果事态的进一步结果表明，英日之间确有协议，哪怕是临时协议，那么这将起巨大的作用，因为这意味着南方人必须迅速使自己的战略计划适应北方军阀联合力量的新情况并放弃不久前想使张宗昌脱离张作霖的尝试。

但是，另一方面，山东人和奉天人的军事联盟会加快以田维勤为首的而没有吴佩孚和孙传芳参加的新直隶集团的形成。这个集团将寻求与南方人接近，不然就干脆转到南方人方面。这一转变的初步征兆已经出现：据最近消息称，田维勤已经派代表去汉口。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么河南和皖南就可能成为反对北方的新的战斗力量。

同时山东人的进攻行动会加强江西、浙江和安徽的自治运动。

这一运动客观上对南方有利，主要是在军政外交方面，也就是国民政府有可能促进对它持友好中立态度的缓冲区的形成，也许还能赢得缓冲区的一些军事力量来反对山东人。孙传芳的将领们在得知孙传芳受骗或装作受骗而听命于奉天后，派自己的代表去见广州驻上海的代表<sup>①</sup>，要求达成协议共同反对山东人，然而他们表面上不愿意达成这样的协议，因为这会意味丢掉面子，向不久前的敌人投降。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其实他们准备达成协议，所不同的是要使这个协议在形式上变成他们和冯玉祥之间的协议。

正如大家所看到的，如果不是军队状况恶化和内部发生摩擦的话，新的形势本来对推进北伐是极为有利的。

此信到达你们那里时，形势自然会更加明朗，但今天的形势是，北伐军应采取防御态势——保卫江西和湖北，当然要为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作好准备。

现在再简略地谈谈上海，上海在近几年的中国战争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上海资产阶级有着巨大的经济影响，有时甚至能迫使某一军事集团接受它的意志。上海资产阶级目前所追求的是不让任何军事力量进入上海地区（一个人口达500万的广大地区）。被认为是英国傀儡的孙传芳的失败，在除一小部分之外并不亲英的上海资产阶级看来是建立自治的最好时机。因此上海还在一个月前，即浙江人夏超起来反对孙传芳的时候，确实形成了把自治问题提上日程的形势。资产阶级和广州的代表们一起为起义作了准备，并与工人组织、街道组织和学生组织的代表达成了协议。你们已经知道，夏超的失败<sup>②</sup>使起义无法进行。这里还需要指出，报纸和其他消息来源关于上海曾准备举行大规模起义的说法过于夸

<sup>①</sup> 看来指钮永建将军。

<sup>②</sup> 浙江省省长夏超在与国民革命军领导人接触后，于1926年10月16日起起来反对孙传芳。他的部队被编为国民革命军第18军，开始进攻上海，但10月21至22日在离上海15公里处被另一个浙江军阀周凤岐（当时站在孙传芳一边）的部队击溃。

大，几支军队和一小部分工人准备的发动被及时制止了。目前资产阶级重又准备建立上海的自治机构，但不是通过上海本身的发动来实现，而是通过与孙传芳被击溃后剩下的军事力量结盟的方式来实现。这一运动和以前一样是与奉天敌对的，而不是与南方敌对的。

关于第二个问题，即北伐在蒋介石与唐生智之间关系方面，另一个<sup>①</sup>是在蒋介石与汪精卫之间关系方面的内部困难。汪精卫至今仍未返回广州，尽管国民党中央全会已于10月作出决定<sup>②</sup>。蒋介石反对汪精卫返回的时期看来已经结束。现在的问题是汪精卫以什么身份回来，回来后担任什么职务。

你们知道，3月20日后蒋介石担任了党的主席，当时也是这么宣布的<sup>③</sup>。这里认为，在蒋介石担任党的主席情况下，汪精卫回来几乎是不可能的，因为全党和整个革命舆论界都认为汪精卫是政治领袖。

当国民政府要在汉口成立的时候也出现了同样的问题。现在的政府组成是广州时的组成，当广州的影响几乎席卷半个中国时，人们并不认为这样的组成是很有威信的。要解决这些问题最好的出路是：取消党的主席一职，而政治委员会主席一职则轮流担任。由汪精卫领导政府，军事委员会<sup>④</sup>由蒋介石领导，唐生智和冯玉祥任委员。能否大致就此设想与蒋介石等人谈妥，很难说。而关于政府迁往汉口的自然和这一问题的解决有关。

唐生智和蒋介石之间主要是军事之争和所谓辖地之争。但如果能先就汪精卫和蒋介石的问题谈妥，那么这个问题解决起来就容易些。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共产党的政策会起很大的作用。如北

① 原文如此。看来应为：另一方面。

② 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部分省组织联席会议决议（见上册第495页注②）。

③ 蒋介石担任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主席。

④ 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伐的所有参加者进行合作并都忠实于国民党，那我们对他们都加以支持。

最近，由政府成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组成的国民党政府委员会将从广州来江西或汉口。应当认为，这个委员会会在上述问题上取得某些成果。同时在汉口将举行中共中央及湖北、湖南省委书记会议，讨论我们在这些地区的政策和策略问题。我也将出席这次会议。回来后将写信详告。

签名：格里高里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180，第 89—91 页。

打字稿，副本。

135

##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 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会议上的发言<sup>①</sup>

1926 年 12 月 1 日于莫斯科

布哈林：

我首先想谈一下前景问题。我以为，委员会的全体委员和扩大全会的参加者都持这样的观点，即我们在中国应当采取社会主义发展方针。至于政权结构、国家的社会经济结构，从这个前景的角度来看，我们将建设一个具有反帝内容、工业实行国有化、土

<sup>①</sup> 关于全会的其他材料和中国委员会讨论的过程，见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 2 册第 229—234 页。



地实行国有化、广泛吸收群众参加国家机关、对外贸易实行垄断、废除国债、中苏结盟、中国和西欧无产阶级结盟的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的国家。在这个基础上，国家才能相当长期地维持下去。这个国家和整个形势的独特性在于，第一，正如斯大林同志所说<sup>①</sup>，这个国家反对帝国主义；第二，如我想补充的，这不是纯粹形式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同时，这个具有混合社会性质的国家将把国有工业即经济命脉掌握在自己手里。正是这一点才提供了借助于西欧，特别是借助于苏俄的另一种发展的可能性。这是因为，如果这一小资产阶级民主的、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混合专政不掌握经济命脉，则只能向资本主义方向发展。迄今为止，我们所面对的形势只能是，除了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政治前提外，掌握经济命脉是基本前提。形势的独特性完全在于这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以后当然会是这样的。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形势的特点是，这不是纯粹的无产阶级专政。同时，将对大工业、铁路实行国有化，将对对外贸易实行垄断。前景就是如此。

但最难的问题是**确定中国革命的不同阶段**。因为确定阶段也就是确定我党直接面临的**策略口号和策略任务**。中国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总方针——就是我们的总方针，但这还没有对共产党所面临的**直接任务问题**作出充分的回答。

现在简单谈一下中国革命的阶段。据我对问题的理解，这里应该接受以下观点。

**在革命的初期，在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等队伍中寻找支点的一部分资产阶级，即开明的民族资产阶级、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大学生，是革命的极其重要的动力之一。革命的开始阶段大致具有这样的性质。**

---

<sup>①</sup> 指斯大林 1926 年 11 月 30 日在全会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发言，发表时题目为《中国革命的前途》（《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 8 卷第 321—334 页）。

接着就（相当快地）转入下一个阶段，这时无产阶级成了最重要的政治力量。这是因为中国几乎每一场争取无产阶级直接物质利益的经济大罢工都具有极其重要的政治意义、政治色彩；在这些罢工中部分地提炼了与反对帝国主义势力的斗争相联系的政治口号。无产阶级在这一发展阶段已经成为头等政治因素。在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民族资本主义资产阶级之间产生了联系。这些力量的结合在国民党内和广州政府内的相应实力派别中都有政治上的体现。

依我看，现在我们正处于革命发展过程第三阶段临近的时刻。力量将重新组合。我认为，临近阶段的标志是在排除资本主义大资产阶级的情况下，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之间结成联盟。这一过渡阶段正在到来，但这决不意味着我们应当立即有意识地加速这一过程。恰恰相反。我们应当充分利用一切力量。但是阶级斗争分化进程已如此深入，以至我们已处于新的革命发展阶段的前夜。这一情况的反映是土地问题被尖锐地提出来了。从社会角度看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农民比重的增加，就是说，在资本主义资产阶级内部出现了某些转变，在国民党内和革命政府内出现了相应的力量重新组合。

因此，土地改革问题或土地革命问题决定了向下一个中国革命发展阶段的过渡。说我们无论如何不能留住资产阶级，这样提问题不对，因为问题还有另一面。我们现在的处境是，我们应该在农民这个革命的同盟者和大工业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客观上就是这么一个问题。有些同志在中国委员会昨天的会议上作出这样的议论：资产阶级是革命力量，我们应该把它吸引过来。这是对的，但这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只是在出现或者同农民在一起，或者同资产阶级在一起这一抉择之前是对的。当然，在实际生活中问题并不这样尖锐。这是过渡时期。但在这个过渡时期我们在资本主义商业大资产阶级和农民之间作出选择是有一定倾向性

的。如果我们这样提出问题，认为应不惜任何代价使资产阶级和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就会失去农民。比如，如果我们分析一下农村的状况，那我们就会坚定地说，情况相当**危险**。我们有所谓国民军第二军的经验，它是被农民而不是被反革命力量打败的，正是农民起义者打败了它。应该考虑到广东省的一些征兆，那里的农民非常急躁，这可能导致灾难。这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斯大林同志十分正确地指出，我们的农民很急躁，而当时的情况是，我们的红军保卫着农民的社会利益，我们赶跑了地主，给农民分了田地；农民从我们手里得到了粮食。总之，尽管有这一社会补偿，尽管红军具有革命体现者的性质，尽管有这一切，农民的急躁情绪还是起了一定的作用。迄今为止，我们在中国还没有发现革命军队做了红军在俄国所做的事情，哪怕是类似的事情。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相反。这可以用无论如何要把资产阶级当作同盟者留下来的这一愿望来作解释。但是如果我们在中国失去农民，那么，第一，领导权将掌握在资产阶级手里；在这种情况下，这只能是外国资本的领导权，在这种情况下，绝对谈不上非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的发展，谈不上国民革命的胜利，等等。我们只能与“进步的”资本主义发展打交道。或许，方法有些不同，是外国对中国革命产生影响的方法、外国资本对经济产生巨大影响的方法。中国的发展道路将从资本主义稳定过程中的一个使情况日益复杂的组织因素变成有助于世界资本主义稳定的一个强有力的正面因素。市场将开放，将有大量资本注入，将得到巨额贷款。这一前景不能完全排除。在聪明的外国资产阶级领导下中国将被一分为三，也许分成日、美、英势力占优势的三个不同地区。也许，这次瓜分不采取血腥的残酷的方式，而是采取所谓的“和平渗透”政策。将出现高度的稳定，整个世界政治力量组合将发生变化。不管从什么角度来看问题，从纯中国的角度，从世界革命的角度，从世界政治的角度，还是从中国政治的角度，这里都必须作出选择，

必须作出决定，在这个问题上不能模棱两可。这个问题只有这样才能提得正确，总的说来才能得到正确的解决。但是，另一方面，**实际实施这一过渡是异常困难的**，特别是在中国。这种过渡之所以困难是因我们已经有革命政府、革命军队和革命地区。互相适应的各种力量内部即整个国民党内部的联络工作是十分独特的。革命是真正的有组织的武装革命。广州人在客观上起着这个作用。我们不能瓦解他们。问题难就难在这里。但是我想，另一方面，正确解决问题的前提也在这里。这个前提就是，农民受压迫深重，担负着沉重的负担，因此从假定的意义上说，**我们能在我们主宰的地区通过渐进的改良办法解决这个问题**。这意味着我们逐渐减少税收，废除地租，削减或撤销警察和宪兵，使各地的行政机关民主化，吸收农民参加行政管理，等等。我们有这种可能。但这只有在斗争各方的其他中心城市都同时采取相应措施时才能实现。

我们在革命军队未曾占领的地区提出革命的土地纲领，支持农民组织，等等，这些会立即加快国民党内部各种力量的重新组合。国民党右派会越来越快地朝着帝国主义列强方向发展并站到街垒的另一边。这是绝对不可避免的。国民党右派由于土地改革或土地革命的发展不得不与我们分道扬镳。我们不止一次地谈到过广州土地问题的多面性。那里有承租人的等级制度，承租人依附于信贷机关、银行，因此直接为资本家所控制。如果我们动摇这一基础，如果我们触动这个集中了一切信贷联系的枢纽点，那么我们无疑就会因此使一部分资产阶级离开我们。当然这是一个过程。大资产阶级的这些部分不会一声令下都离开我们。这里会有动摇，会有斗争，会有分化过程。起先逃离的肯定是右派，将出现分裂现象，等等，但整个过程将按这条线发展，即便我们采用我所说的这些微不足道的改良方法来解决我们所主宰的各省的土地问题。这一土地改革方法当然不能排除。我们可以凭经验来证明这一点。去年我们在土耳其斯坦进行了土地改革。这次改革

是采用和平的方法进行的。过去是用强制的方法，用“火与剑”强制推行，这次我们在加强我们的国家机关后通过和平的方法实现了。可见，这是可能的。为什么广州政府不能通过和平的方法来实现土地改革呢，我认为没有理由。这一过程的前提是国民党的重新组合。我们的党应为这次重新组合作准备，它应小心、巧妙、谨慎地进行，但应按一定的指令实施。这将是与一些力量和社会阶层的某种重新组合、同广州政府以及军队的组建联系在一起。但我在这里应该强调指出，这要求我们党采取非常谨慎的政策。我们不能瓦解军队和政府。我们的政策是不断地设法夺取军队、政府及各省和中央国家机关中的阵地。这不是不能办到的，因为你们在哪里有像国民党这样的组织<sup>①</sup>？只要国民党内部政策明智（国民党是能够决定政府结构的筹备机构和现实力量），我们能在这一方面向政府和军队施加影响。因此我完全赞成斯大林同志关于军队的讲话。不能认为斯大林只看到了军队，此外他一无所见。我认为农民组织将起巨大的作用。它们现在就（这是事实）部分是军国主义的<sup>②</sup>组织，部分是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经济政治组织，等等。必须把这些农民组织联合起来，组织起来。由于我们对它们有影响，我们在军队中也就会有据点。由于有这些据点，我们就在作战需要时把农民组织起来。可能会出现无政府主义、半无政府主义、游击主义性质的现象，但这可以说是阵痛，是历史上必然出现的现象。这是因为我们不可能有一支像成品一样完整的军队。我们一度发展也很混乱，害怕这一点是没有道理的。正是在真正意义上的军队与各种农民组织，即从下面发展起来的力量之间存在的一种良好的正确的关系，正是这一点是军队起革命作用的保证。这是取得最后胜利和完成在革命基础上联合各种力量这一任务的保证之一。

① 原文如此。根据上下文此处应为“句号”——译者。

②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为：军事化。

综上所述，现在对我们来说前景是相当明朗的。最重要的是革命阶段问题。我认为，我们现在正处在从革命第二阶段向第三阶段过渡的前夕，因此土地问题具有紧迫的意义。我们不得不在农民和资产阶级之间作出选择。我们无疑选择农民。这不应该从粗陋的、庸俗的意义上理解。我们现在经历的是过渡时期。我们应该理解这一过渡时期的全部特点并根据这些特点来构建我们的策略，但要按十分明确的方针，按发展的和正确解决土地问题的方针来进行。这要有政府、军队和国民党中的一些政策作配合。至于军队，我们当然应逐步地巧妙地把它组织起来，使它像一支真正的革命力量那样对内对外都起作用。在这一过程中各种农民组织和小资产阶级组织都会起很大作用。

这就是我对中国问题的看法。

全宗 495，目录 165，卷宗 269，第 47—54 页。

打字稿，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无签字。

136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72 号  
（特字第 54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2 月 2 日于莫斯科

听取：16.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1] 关于中国问

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6.——[1]批准以下指示:

(1)鉴于一方面奉鲁集团和直隶集团上层领导正打算实行联合,另一方面孙传芳和吴佩孚将领中的分歧越来越大,认为广州的任务之一是加深这种内部斗争。同时作为临时措施应全力支持江苏、浙江和安徽三省开展的争取自治和与南方人结盟的运动。我们建议千方百计利用孙传芳和吴佩孚部分将领中的动摇,推动他们与奉鲁集团作斗争。

(2)认为国民军目前的力量配置是符合现在的形势的,强调国民军继续控制阿山(Ашань)<sup>①</sup>—包头地区具有特殊的政治上和战略上的重要意义。

南方集团今后方向的选择——是向信阳(湖北<sup>②</sup>)还是向南阳(河南)——应在当地根据同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的协议来确定,同时要考虑到已出现的形势和冯<sup>③</sup>的军队作为牵制张作霖的反广州人运动的力量作用。

(3)作为对外交人民委员部所采取的措施的补充,通过共产国际执委会、国际革命战士救援组织和报刊广泛开展争取释放在天津被捕的14名国民党员的运动<sup>④</sup>。

(4)认为有必要向国民党和广州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为了防止国民党人继续被捕和被处决,以及为了争取被捕者获释,能否从北方集团所关心的将领和其他人士当中抓一些人质?

(5)我们认为,对梁士诒提出的就在北京组建政权一事进行谈判的问题应作如下答复:①在军事行动没有停止的情况下不可能组织任何全国性政府;②必须把北方人不再进攻南方人和冯玉

① 可能指贺兰山——译者。

② 原文如此,应为河南——译者。

③ 冯玉祥。

④ 指1926年11月23日天津法租界和英租界警方逮捕的14名国民党员(据另一材料为17名),他们随后被引渡给中国当局。1926年12月底其中7人被处决。

祥军队作为就组建政权问题开始进行谈判的先决条件。

(6) 给上海的尼古拉、谢廖金<sup>①</sup>发如下电报，并抄送鲍罗廷、北京：

“汉口正在开展的罢工运动需要我们对整个这一运动加以领导，以便①利用已出现的有利形势通过罢工千方百计改善工人们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②不容许出现可能挑起外国军队采取武装行动的过火行为。③利用罢工运动来加强工会组织和党组织及其对群众的领导。④应以广州政府的名义公开宣布，凡在广州政府解放的省份内，工人一律享有充分的罢工权、结社权和集会权，广州政府将全力保护这些权利”。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3）；列别申斯基同志——（3）；瓦西里耶夫斯基同志——（3）。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26—2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sup>①</sup> 分别指中共中央执委会和 Г. Н. 维经斯基。



137

##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拉菲斯 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6年12月4日于莫斯科

致中国委员会主席伏罗希洛夫同志

抄送加拉罕同志

我们受中国委员会的委托根据拉菲斯同志在最近一次会议上的报告<sup>①</sup>提出以下具体建议：

1. 鉴于远东局新领导人抵达中国的时间不会早于再过两个月，而在中国目前维经斯基同志是唯一能在这里的领导下统一党的系统的工作的人，必须稍许提高维经斯基同志在在华工作的其他俄国同志心目中的威信。

2. 远东局不能再以其目前的人员组成领导工作，而其形式上的存在，特别是由于其内部已出现摩擦，只会限制维经斯基同志的主动性。因此必须立即从那里召回福京同志，而拉菲斯同志至少在目前不能返回。

3. 提请政治局注意，随着政府迁至武昌和鲍罗廷同志离开广州，必须有一名负责的俄国同志呆在广州，把过渡时期的工作统管起来。中共中央应在过渡时期派一名领导同志去那里。

---

<sup>①</sup>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于1926年11月26日听取了M. F. 拉菲斯的报告。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彼得罗夫  
拉菲斯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1，第 17 页。  
打字稿，副本。

138

## 拉菲斯给伏罗希洛夫的信

1926 年 12 月 13 日于莫斯科

致联共（布）中央中国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同志

（抄送彼得罗夫同志）<sup>①</sup>

敬爱的同志：

我在与彼得罗夫同志的长时间交谈中向他详细地弄清楚了<sup>②</sup>远东局大多数成员对组织对中国党的工作的领导问题的看法，这个看法引起了与维经斯基同志的摩擦。

由我和彼得罗夫同志共同向中国委员会提交的并由我修改的

---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说明了。

临时措施草案<sup>①</sup>，是根据政治局已作出的关于把领导工作交给我党中央一位领导同志来承担的决定起草的。

目前根本不可能回到去年即任命远东局以前的状况，也就是重新任命维经斯基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而且这样做对事业是有害的。

早在8月，我和福京同志就对维经斯基同志说，在政治局势复杂化和党及其中央壮大后，他决不能继续领导党的工作，远东局应由别的人来领导，这个人能提出党的方针，而不是不断回避提出总的问题。10月，维经斯基同志同意了我们的意见，认为应由一位中央委员来领导远东局，而维经斯基同志只应是他的副手。决定说的就是这个意思<sup>②</sup>。

10月30日维经斯基同志给这里发来的电报<sup>③</sup>，远东局并不知道，也没有经过商量，电报反映了维经斯基同志的新看法，而这个看法他没有向远东局提出过，也没有答辩过。

我将在由我起草的关于远东局工作的报告<sup>④</sup>中详细说明这个问题。

请将本声明报告政治局。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书记

拉菲斯

核对无误：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71，第 20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见第 137 号文件。  
② 见第 115 号文件。  
③ 电报没有找到。  
④ 见第 139 号文件。

139

## 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工作的报告

1926年12月14日于莫斯科

绝密

### 拉菲斯同志关于远东局工作的报告<sup>①</sup>

#### 一、远东局工作失败的原因及其功绩和缺点

现在，当远东局继续存在的问题受到怀疑时，我认为有必要弄清这个机关失败的基本原因和说明它的内部生活情况，以便防止今后犯一系列的错误，同时避免对远东局每个委员个人对该局的失败所负责任的大小持错误的看法。

我首先指出造成远东局失败的最主要原因：

(1) 远东局的领导机构及其形成方法（与共产国际有联系的各种组织的代表机构）。

(2) 远东局严重脱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这表现为得不到指导性的指示，甚至得不到对许多书面报告和电报的答复，唯一一个一般性指示是对远东局10月

---

<sup>①</sup> 报告的副本于1926年12月15日分送И. В. 斯大林、Н. И. 布哈林、К. Е. 伏罗希洛夫、Л. М. 加拉罕、И. А. 皮亚特尼茨基和А. С. 布勃诺夫。

17日的电报报告<sup>①</sup>的电报答复<sup>②</sup>，还表现为没有收到加拉罕同志的报告和给加拉罕同志的指示以及他给鲍罗廷同志的指示的副本，表现为远东局与加拉罕和鲍罗廷同志之间缺乏工作上的联系。

(3) **政治形势极其复杂**，要求我们认真了解中国情况，重新确定整个政策，要有一个明确的深思熟虑的政治方针，而目前的领导做不到这一点。

(4) **远东局对中共中央实行的落后的领导方法与党和中央本身业已提高的政治觉悟不相适应**。5月30日以来的这一年中，党成长为一支重大的政治力量。中央和各区党委都学会了给自己提出重大的策略问题，而远东局却依然奉行临时应付的领导体制。

(5) **远东局和中共中央之间联络技术很差，很不完善**。举例来说，警方甚至使格里高里<sup>③</sup>同志不能参加7月的扩大中央全会会议，而这正是造成全会在农民决议方面的错误的原因之一。由于缺少翻译干部，不能关注整个中国报刊和共产主义出版物以及党内生活。

(6) **对于朝鲜和日本远东局基本上不能完成自己的任务**，因为该局全神贯注于中国的事态发展，不得不经常到处奔波。例如，日本的逮捕行动，朝鲜共产党的被摧毁都起了一定的作用。我们在这个报告中将不再提及朝鲜和日本的问题，因为朝鲜和日本在远东局的工作中占很小的位置。

\* \* \*

尽管远东局遭到几乎不分青红皂白的谴责，但我还是想首先指出远东局工作取得的一些大的功绩和成就：

(1) **对广州的形势作了全面的政治考察**，第一次向我们党和共产国际的领导机关揭示了国民党的内部生活并对“三二〇事

---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见第117号文件。  
③ Г. H. 维经斯基。

件”作了阶级分析。

(2) 远东局（正是远东局，而不是它的主席）没有就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作出错误的决定（这一点下面还要谈到）。

(3) 10月17日的电报向政治局明确指出了资产阶级倾向在中国得逞的危险。这一警告打击了许多同志对广州中央的盲目乐观的评价，提出了关于同资产阶级的临时联盟发生破裂的时刻即将到来，必须公开依靠同农民的联盟的问题，总之，提出了关于革命进入新阶段的问题。

(4) 向政治局和共产国际执委会提供了大量关于中国国内政治生活和党的生活的材料。这决不能说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这是远东局而不是远东局主席的功绩。只有这样做才能结束对中国的“祭祀”，因为当时只有极少数同志了解该国情况。只有这样做远东局才能在新的复杂化的条件下协助我们党的领导中心指导对华政策。远东局的部分同志一直坚持向莫斯科提供情报，他们正是这样理解自己的任务的。

(5) 纠正广州同志和鲍罗廷同志的方针，他们对国民党明显持取消主义的态度。除了这些政治上的考虑外，我们还提出由别人取代鲍罗廷同志的问题，这是因为他极端张皇失措，这一点加拉罕同志也清楚，还因为担心鲍罗廷同志在政治生活出现新的转折时不能应付裕如。这些担心至今仍然存在。

关于远东局工作中的重大错误和缺点，我想指出以下两点：

(1) 在6至8月间没有正确对待北伐，对中共中央最初在这个问题上所持的积极立场重视不够。远东局本应比其他人更早发现对北伐持消极立场是错误的和危险的，并向政治局提出这一问题。但相反远东局本身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提出了一些新的更深刻的一般政治性理由，使问题更加复杂化了，而这些理由在政

治局的决议<sup>①</sup>中并没有提到,这些理由更加加强了对北伐的否定态度,无疑也妨碍了中国党更好地武装自己,加强自己的影响。

(2) 缺乏对革命的这一阶段的**深思熟虑的策略方针**,这种方针应能把支持目前的民族运动中心的任务同为民族运动下一阶段奠定最好的力量组合的任务结合起来。

\* \* \*

为了更好地弄清远东局内部政治摩擦和组织摩擦的性质和起因,应把该局的工作分为两个时期:(1) 6至7月(访问广州前)和(2) 8至10月。

## 二、第一个时期的政治分歧

不能说在远东局内从工作一开始就形成了两条明确的和完全对立的政治方针。但是在整个工作时期都存在着政治性质的分歧,而且是带有一定倾向的分歧。

格列尔同志因病从一开始就很少参加远东局的工作。远东局内部的情况是这样的:我们有经常得到格列尔同志支持的以格里高里同志为代表的**领导**和以我和福京同志为代表的**反对派**。

这个“反对派”从相对立的两个侧面批评“领导”。从福京同志方面来说,是自始至终对党的,在他看来是过分的“民族方针”进行批评,并竭力促使共产党强调划清阶级界限。我的立场在工作的第一个时期就被大家说成是“右倾”,远东局的三位委员因此一致拒绝接受我的意见和修正意见。我的“右倾”表现在哪里,下面就可以看清楚。

在这第一个时期,远东局内部的争论是围绕着以下几个基本问题进行的:(1) 对政治形势的总的评估。(2) 在国民党内对蒋介石的策略的性质。(3) 对北伐的态度。(4) 对国民党的态度。虽

<sup>①</sup> 见第36、49号文件。

然没有完全形成对立的立场，但存在着两个表现鲜明的“倾向”，现在来回顾这个时期，这两个倾向的作用就很清楚了。

(1) **对形势的评估。**远东局在这第一个时期总的说来对总的政治形势的评估是“消极的”。对这个问题给以特别的注意和对整个形势尝试作出全面的评估都没有得到格里高里同志的支持。我在这第一个时期讨论每个问题时都反复指出，北方的反动派即将彻底破产，我们正处在军阀阵营分崩离析的前夜，因而也处在民族革命战争高涨的前夜，所以我们必须抛弃“革命防御”的方针，逐步开始为革命力量进攻反动派作好准备。远东局的多数人不接受这些意见，而提出把防御策略作为目前的基本口号。

早在7月28日，我们动身去广州前夕（那里正要举行国共两党会议），远东局制定了中央在这次会议上的宣言草案，这个草案完全是以反动派的进攻<sup>①</sup>为根据起草的，而当时广州已向反动派发起进攻，这真是“大灭革命志气”。

(2) **对蒋介石的策略。**我们或多或少都同样对“三二〇事件”的阶级危险作出了评价，都同样认识到在广东“三二〇事件”为反动派打开了闸门。因此我们都同意提出同反动派作斗争的任务。我们都同意，决不能使国民党左派和中派之间的鸿沟进一步加深；我们都同意必须巧妙地应付蒋介石，由此可见，在远东局提出的实际建议中有许多共同点。

我们还都同意共产党人必须巩固自己在群众中的独立阵地。但与远东局提出的对国民党的政策方面的基本口号（见远东局6月30日电报）<sup>②</sup>，即共产党人必须为争取自己在广东的政治独立而斗争的口号相对立，我提出了另一个口号：“目前不应使共产党人摆脱国民党，而应使国民党摆脱蒋介石，摆脱军事专政危险”。正是这个口号为猛烈攻击我提供了口实。我阐明的随机应变计划

①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应为：以反动派正在进攻的结论为根据。

② 见第64号文件。



是：在蒋介石面前大步退却，暂时放弃公开同他在政治上划清界限，同时通过组织工作巩固自己的阵地，然后大约再过3个月，当我们已经得到群众的支持时再唱另一个调子。当时我还不清楚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在广东的关系形式，我面对整个远东局的一致反对很难捍卫我的这些建议。现在我可以断然地说，广州同志在“三二〇事件”后所犯的错误的正是在于他们根本不提“拯救国民党”的任务，而把国民党看作一具“只应加以埋葬的死尸”，从而加剧了“三二〇事件”后国民党左派当中出现的意志消沉情绪。

(3) **北伐**。围绕对北伐的态度的争论是由于对整个政治形势的评估不同和着眼于全中国的政治关系而对蒋介石本人以及整个中派统治集团的评估不同引起的。在6至8月这个时期，远东局总的来说仍然坚决反对进行北伐。这是由于：①极度夸大了中国反对派的力量，尤其是夸大了与沿海地带资产阶级勾结在一起的孙传芳“联邦”的力量；②夸大了广东内部反对派的危险；③远东局不愿支持孙逸仙关于通过北伐拯救中国的思想；④远东局在提出共产党人的独立政治方针口号后不愿表示拥护蒋介石；最后，⑤不懂得在反动派阵营已经分崩离析的情况下广州军队的北伐应具有的巨大革命意义。

与远东局这种观点相反，我提出：①由于相信民族资产阶级会转到广州一边，对整个政治形势应作出乐观的评价；②要看到北伐和蒋介石本人对整个中国的革命意义，中国还没有经历过广东所特有的那种在农民运动基础上的尖锐的阶级矛盾；③共产党人必须支持和参加具体表现出来的那些形式的民族革命，从内部加强自己的影响，至少在目前阶段不能采取把自己与运动对立起来的方法。

远东局的提法大大加强了对北伐的否定态度。7月底，在经过与中央的长期摩擦和中央被迫放弃自己的立场后，终于提出了对北伐的共同看法：我们不指望于并非人民革命的北伐本身，而指

望于在南方军队占领区所形成的革命力量的发展和组织。这一方针如果贯彻始终，当然会排除对北伐的直接支持。它还会排除广州的同志政治上对北伐的支持，但是就是在那里这一方针也没有贯彻始终。实际上党组织是根据中央的老方针行事，不过由于接到新的指示而失去了连贯性。中央和远东局在新的立场形成后不得不作出决定，把铁路上的一批党员同志——铁路员工交广州部队司令部调遣，以便组织前线的破坏活动。在广东，罢工委员会和共青团在政治上和组织上都支持北伐。但是不言而喻，党如果能对北伐采取积极的态度，那么它就可以在军队中及军队周围大大加强自己的影响。

我们在广州遇到了对北伐的特殊态度——利用蒋介石的失败进行投机，指望（完全错误地指望）在这种情况下左派和汪精卫取得胜利。这一方针遭到了我们的坚决反对。

（4）**反对退出国民党**。远东局委员中没有人公开主张退出国民党。但是我们遇到党的一个老决议案问题，这个决议案是由格里高里同志在去年党的十月全会上提出的，现在受到陈独秀同志在向七月全会所作的报告中的支持，而在我们远东局则受到格里高里同志的支持。我指的是关于必须把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关系从组织内部联盟改造成外部联盟的决定。当时（以及现在）共产党人与国民党的关系是：中派和蒋介石在5月15日决议<sup>①</sup>后竭力试图不让共产党人从内部影响国民党，党的北方委员会提议退出国民党，而广州则把这个国民党称作“死尸”，在这种具体情况下，重申去年关于国民党的，实际上是错误的决议，就只能意味着党迎合关于彻底退出国民党的决议。这不是反对右派掌握国民党的斗争，而是迎合中派的一个步骤，因为中派已经提出召开国共两党会议的想法，他们把这次会议当作把共产党人完全开除出国民

<sup>①</sup> 指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会的决议。

党的桥梁。

只是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对格里高里同志作了坚决而顽强的抵制，他才放弃自己的建议，我们因此才没有作出极其有害的决议，根据广州的情绪这样的决议以后很难加以纠正。这里有对国民党的两种看法发生了冲突：格里高里同志的看法是，显然，由于国民党不可避免地要变成资产阶级政党，我们退出国民党也是不可避免的；我的看法是，必须把国民党变成由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民主力量的联盟组织。

(5) **中央委员会的宣言**。为了充分说明内部分歧情况，我还要指出围绕中央为七月全会<sup>①</sup>起草的中央委员会宣言草案进行的争论。福京同志和我声明我们对宣言的“人民”性质十分不满，在这个宣言中共产党中央不是面向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而是面向小资产阶级，我们指出宣言缺乏阶级路线。格里高里同志和格列尔反驳我们，认为宣言的“通俗的民众”风格是它的一大功劳。当时决定，保留宣言的总的性质，但要补充一些新的条文，以揭示党的阶级立场，然后要对宣言内容作一系列的调整，以便使宣言面向劳动群众。中央采纳了我们的修改意见，但把这些意见加到了宣言的全文中，结果这些修改意见不仅没有改变宣言的性质，反而部分地更加突出了宣言的非阶级性质。

我们工作的第一个时期（即我们去广州以前）的政治分歧基本上就是这些。当时没有统一的坚定不移的方针。只有一个左的方针和一些很大的右的倾向（关于中央委员会宣言和国民党的问题）。我的反对态度捍卫了在努力（在国民运动内外）培养自己的力量而不生硬划清界限的情况下与国民革命保持一定联系的方针。

---

<sup>①</sup> 指中共四届三中全会。

### 三、组织摩擦

在阐述远东局内部的组织摩擦之前，必须十分坚决地强调指出，尽管从远东局抵达中国的第一天起就有内部斗争和摩擦，但**这些内部分歧和摩擦完全没有在远东局与中央的工作中反映出来**，远东局在中央面前一贯意见一致，只有一次是例外（关于结束香港罢工的问题），这个问题下面再谈。其次，必须指出，在远东局的工作中从未有过一个决议是在主席反对的情况下由远东局其他委员赞成通过并贯彻执行的。所有这些争论和摩擦都围绕着远东局的某些委员力图“推动”整个远东局及其主席接受某个观点或某项实际建议而发生的。因此可以十分明确地说，远东局主席无论形式上还是实质上都要对远东局的一切决议和文件负责。

不仅如此，**远东局的大多数正式文件都是由其主席亲自起草的**，当然是在经过长时间的集体讨论之后，**包括政治局对其持有异议的远东局 10 月 17 日的电报<sup>①</sup>也是如此**。而那些由我起草的文件，如广州报告<sup>②</sup>、组织报告、十月革命九周年提纲<sup>③</sup>，不仅是长时间集体讨论的成果，而且由主席亲自进行了修改和补充，他对其中任何一个词都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我之所以提到这一切，是为了避免产生任何曲解，似乎贬低了格里高里同志的作用，似乎把远东局主席所反对的某些观点强加于远东局，总之，是为了确定远东局每一个委员应负的实际责任。远东局糟就糟在很难推动远东局主席提出总的政治方针。

在每一个特定时刻的政治分歧并没有严重到远东局委员们无法共事的地步。但是这些分歧中有两点留下了较深的印记，具体说就是：（1）我指责格里高里同志没有看到军阀阵营中越来越严

① 见第 118 号议论。

② 见第 94、95 号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

重的危机，没有看到必然到来的国民革命运动浪潮，(2) 我指责格里高里同志，由于提出关于改组国共关系的建议，他在靠近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的想法。围绕香港罢工的尖锐冲突其实并不是很严重的冲突，尽管这一冲突的形成不仅有组织上的缘由（格里高里同志不经远东局事先决定就提出建议），而且有原则上的缘由（广州政府的“威信”问题）。

远东局内部组织上的摩擦都是围绕一个基本问题——领导问题产生的。

从我们抵达上海的头几天起，我们就确信政治形势极其复杂，远东局的部分委员当时就得出结论，认为远东局以它现在的人员组成，特别是以它现在的领导，是不能胜任其任务的。对于这部分远东局委员（我和福京同志）来说很清楚，只有在**共同制订出总的政治方针**的基础上我们远东局才能提高领导水平。因此我们一再要求共同讨论整个政治形势和策略方针。但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而是天天讨论个别的局部性的、尽管也是十分重要的政治策略问题。格里高里同志总是说，策略有了，没有需要共同讨论的问题了。对此我回答说，目前的基本问题是如何把我们对由反共的中派所领导的国民革命的支持与我们在革命中所要完成的阶级路线任务协调起来，在目前的这个基本策略问题上，我们没有任何指导性意见。因此我要求远东局分析中国革命的动力，并在这一马克思主义分析的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策略。

这就是第一个严重的组织上的分歧。

对于中央委员会，远东局委员中的一些“老”同志总是持老的看法，把他们看成自己不久前的政治上还不够成熟的门徒。格里高里同志认为，对中央可以继续采取老的领导方式，即：直接与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同志就个别问题达成协议。但这种看法完全不符合党及其中央委员会业已提高的政治觉悟，不符合党业已提高的政治作用。

从我们到达后的头几天起，我们就发现中央委员会的同志有很大的独立性，后来又发现中央委员会内部一些同志之间存在着各种摩擦。格里高里同志把产生这些要求<sup>①</sup>的原因说成是各派争夺对中央领导人陈独秀同志的影响力的斗争。那么这场斗争从何缘起的呢？起先以为这场斗争是前东大学生中的左派反对老中央委员的斗争。后来，随着各地参加全会代表的到来，才了解到产生内部摩擦的原因之一是各政治派别围绕“三二〇事件”的成因、广州同志的责任和他们加快这一冲突到来的策略等问题进行的斗争。再后来，其他同志的这些摩擦被说成是各种组织领导方法的斗争，即发号施令多少的问题、把下面成长起来的人提拔到领导岗位上来的要求多少的问题。事实是中央委员会内部的宗法制关系已经消失，因此再也不能继续采取老的领导方法了。很明显，今后我们对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和中央委员会内部团结的恢复，都要求作为首要条件要在日益发展的国民革命运动的基本问题上制定出正确的政治方针。格里高里同志不同意这个看法，指责我们夸大了分歧和摩擦。而中央委员张国焘在10月说，他不能容忍把他排斥在领导工作之外。而瞿秋白，由于他不同意右倾方针，在中央委员会内处于孤立状态。

格里高里同志明显是不对的。这一点很快就弄清楚了。7月底陈独秀同志在远东局全会上作了中央扩大全会总结报告，这时我们大家都确信，在我们与中央委员会的一个半月共同工作期间，实际上我们不仅没有对它起领导作用，而且也未能得到关于中央委员会内部生活的全面完整的通报。这个报告有三点使我们感到惊讶：（1）陈独秀同志把“与左倾军阀勾结在一起的民族资产阶级争夺国民运动领导权的斗争”当作时局的基本特点。这意味着中央委员会在寻求概括性的提法，不再满足于对个别问题的回答，而

<sup>①</sup> 原文如此，似应为“这些摩擦”——译者注。

要从普遍性的提法中得出相应的策略方针；(2) 中央委员会在全会上认真地确定了农民运动的策略方针，同时提出了我们绝对无法接受的反对开展农民运动的斗争策略；(3) 我们向扩大全会提出了一个内容广泛的决议案，含有对广州形势和策略的评价，由于全会对这个问题产生了严重的意见分歧而没有被采纳。所有这一切十分明确地提醒我们，如果远东局今后仍然死抱住过去的领导方法不放，那我们就会完全失去领导中央委员会工作的可能性。而从两个月来的经验中自然得出的、现在又为上述事实所证实的第二个结论是，在目前形势下，格里高里同志再不能独自一人承担领导中央委员会的任务了。

这个结论自然更加剧了远东局内部在远东局工作中实行集体领导的问题上的斗争。我认为有必要在这里十分强调地指出，这种争取实行集体领导的斗争决不是出于某些一般的民主原则。远东局第一次会议根据我的建议一致决定，格里高里同志应担任远东局驻中央局<sup>①</sup>的代表<sup>②</sup>。而现在必须做到，在与中央委员会的同志会见时，不能只有格里高里同志一个人代表远东局出席，还得有远东局的另一个代表参加。其实在格列尔同志生病之前，原先就是这样做的。

在这里，我们与格里高里同志作为“唯一代表”在华工作5年期间所养成的老习惯发生了冲突。这一冲突最鲜明地反映在长达两个星期的关于谁去广州的争论中。除了格里高里，远东局的所有委员都主张整个远东局除格列尔同志外都去广州，格列尔同志有病，应该返回欧洲。对这个建议不需要举出特别的理由来加以论证。被任命为远东局的委员，同时又被排除在就地了解和决定广州生活中的一切复杂问题的的工作之外，其实这就意味着走上了取消远东局的道路，回到以前由格里高里同志一人领导整个中国

①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局。

② 见第59号文件。

党的工作的状态。但是我们通过两个月的工作已经确信，这样决定问题对于目前形势来说是完全不能接受的。对于我们共同提出的建议，格里高里同志其实提不出任何重大的理由来加以反对，只能提出这样的理由，如三位同志的到来会给国民党、蒋介石和鲍罗廷同志造成不良印象。但是这个理由只是强调说明，这里所谈的还是远东局作为一个机关该不该存在的问题，或者远东局的委员该不该处于“穷亲戚”地位的问题。格里高里同志最终不得不同意共同提出的建议。

我们在广州不得不在整个一个月内向地方同志和中央委员提出一系列非常复杂的问题，这段时间的工作再一次使我们确信，格里高里同志仍然顽固地坚持那种回避提出总的政治策略方针的办法，同时当中国同志提出一些大的问题时他又退却。我们在广州得出结论：中国的局势十分复杂，远东局以其现有的人员组成胜任不了它所肩负的任务，因此有必要请求我党中央委员会指派一名确实能领导整个工作的中央委员来担任远东局的领导，而格里高里同志应作为他的亲密助手。我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得出这样的结论后都告诉了格里高里同志，得到的回答却是，如果我们否认他有担任远东局领导人的能力，那当然就无法共事。因此，早在8月中旬远东局就认为，以其目前的人员组成该局无法继续进行工作。只好说服格里高里同志，使他相信，这个结论确实是对的，我们必须通过组织程序让政治局知道我们的这个结论。不言而喻，从此远东局内部的摩擦就越来越多了。

#### 四、在广州

在广州逗留的一个月是远东局工作收获最多的一个时期。我们在这里确信，莫斯科对广州内部生活知之甚少。在同地方上的一些同志和两位中央委员举行的几次持续时间很长的会议上全面讨论了革命的前途问题。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党内在对中派和蒋介石



石本人(中央认为他们是民族资产阶级试图争夺国民革命领导权的体现者)的评价问题上,在对这一派别的策略问题上,以及在对广州同志过去和现以所犯的错误的~~评价~~问题上已经完全形成的内部分歧。在这里国民党发展的前景问题已充分展现在我们面前。

### (1) 国民党的前景

广州的同志们,特别是鲍罗廷同志,认为国民党只有在成为工农联盟组织的情况下才是一个积极因素。这从发展前景来看是对的,但在目前来看是错的。广州同志有着明显的布朗基主义倾向,完全忽视资产阶级。我们纠正了这个方针。鲍罗廷同志后来所做的一切都是我们提意见的结果。

关于前景问题,我提请大家注意分送给大家的关于国民党左派的会议记录<sup>①</sup>。我在这次会议上完全支持国民党向(实质上的)工农政党发展的前景,但我要求注意目前的政治需求,目前城市小资产阶级起着巨大作用,我们必须使它留在与无产阶级的联盟中,而不是把它推出去让资产阶级领导。我不知道,我的总的构想是否与格里高里同志的看法相一致。我们在会前就这些问题作了长时间的交谈,而在会议上格里高里同志认为最好不谈实质性问题,只在形式上起主席的作用。这种做法对我们来说并不新鲜。

### (2) 实际政治方针

在广州,已经很清楚,内部反革命的威胁要求广州政府同反动派作最坚决的斗争。但这一威胁至少还没有大到威胁广州革命中心的存在和南方军队必须停止向北方推进的地步。社会上反对“三二〇事件”的情绪已经开始发生转变。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广州就清楚地看到了围绕北伐集结的社会力量的五花八门,也看到了正当北伐接近胜利时将要出现的危险。

从远东局内部关系角度看,这个“广州”时期可以看成是逐

<sup>①</sup> 见第 80、84—87、89 号文件。

渐消除在政治问题上的内部分歧的开端。在撰写考察广州的综合报告及根据这一报告得出的结论时，勾画出了在革命前景方面的分歧（我们从报告中取消了这些问题），但是在对考察对象的评价上几乎没有分歧。在对蒋介石和中派的评价上可以指出某些细微的差别，格里高里同志与我不同，倾向于更强调这一派别的军阀性质，而我虽然承认这一军阀性质，但更强调这一派别的社会本质。在对唐生智的策略上也有分歧。在关于国民党的任务问题上，我批驳了广州同志的方针，建议目前不要根据农民纲领，而要根据民主纲领来建设国民党左派。我提出的关于在国民党内部组织“工农派别”的想法被推迟到同莫斯科讨论后再作决定。

关于为**过渡时期**在武昌成立第一届政府的问题，大家一致指出，左派应占多数，并有中派参加，为了防止帝国主义者进攻和分化孙传芳和奉天人，起初必须吸收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参加政府。我们对**共产党人参加政府没有原则性的反对意见**，至于参加的时间和条件，当然则应在我们参加下由中央来决定（估计共产党人不应参加武昌的第一届政府）。

### （3）结束香港罢工

在结束香港罢工这个局部问题上，完全出乎我们的意料，在广州发生了严重冲突。冲突如此严重出乎意料，因为我们大家都同意无论如何要结束旷日持久的抵制罢工，都认为在人数众多的罢工工人生活没有保障和必然产生失望情绪的情况下，这一抵制罢工一拖再拖也会给广州政府造成巨大困难。当我们快离开广州时，英国总领事提出了要求“罢工委员会武装纠察队”停止纠察的最后通牒，我们大家还是都同意必须立即退却，把武装纠察队撤至广州；我们都同意必须彻底作出应停止抵制罢工的决定。我们之间的争论起先并不是在这些问题上，而是在**结束抵制罢工的方法问题**上，什么样的方法对罢工工人和广州政府最合适，也就是说即是革命的，又不会瓦解革命建设事业，因为抵制罢工已经

持续了14个月。格里高里同志的建议是向广州资产阶级筹集一笔钱分给罢工工人，我坚决反对这一建议，我指出，这样就无法巩固革命的成果。当时没有其他的建议。鲍罗廷同志起先很消极，因为他实际上仍主张继续进行抵制罢工。

英国领事的最后通牒使我们清醒起来。在远东局、中央委员会和地方区委代表的联席会议上，远东局委员之间事先未协商就把问题提出来了<sup>①</sup>。格里高里同志建议：作出罢工应结束的决定，但结束的时间要推迟到来自福建省方面的进攻军队的威胁消除之后。这个建议我能接受，我只作出一点补充：说明结束抵制罢工的时间不仅应根据来自福建方面的威胁的消除来确定，而且要“考虑到国内总的政治形势”。与会各方都支持这一修正案，指出军队已逼近武昌，有可能把对英国的社会抵制扩大到全中国。格里高里同志的固执已见令人不解，因为这一修正只要求在来自福建方面的威胁消除后再根据对政治形势总的评估来权衡结束的时间和办法。结束罢工的决定已经意味着开始刹车，这时不能有更多的要求。

但是格里高里同志坚决不接受这一修正案，认为这只不过是保持抵制罢工的一种方法。会议带有了根本不该有的格里高里同志公开施加压力的性质，对于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这种做法大家早已司空见惯了。

这次冲突及其表面形式可能使人有理由谈论远东局发号施令了。鲍罗廷同志在评价格里高里同志的建议时说不能允许这样的取消主义和失败主义。但经各方相互让步，最后找到了妥协的提法，一致通过了决定。

在这里我还应该指出，尽管我和鲍罗廷同志有许多分歧，在这种场合我还是支持他维护广州政府“威信”的努力。我认为，广

<sup>①</sup> 文件没有找到。

州出色地摆脱了困境，把取消罢工变成了同帝国主义者进行新的斗争的源泉（补充关税问题）。

### 五、防止资产阶级倾向得逞的斗争方针

从广州返回后的时期，远东局生活中的主要问题是防止资产阶级赢得胜利的问题。我们（大家）已经很清楚，国民革命在胜利地走向第一阶段的结束：中国很快就将建立国民党的全国政权。绝对没有任何分歧的一点是：党应当竭尽全力支持取得胜利的国民党和广州，促使必然要与之发生冲突的奉系瓦解。从地方组织的报告中可以看出，共产党已经渗入国民运动的各个孔隙，并在做大量工作，支持国民革命，推动它走向胜利。在这方面在尽一切努力（还可以加强）；还作出了相应的指示。例如，军事部同志指出，党对瓦解孙传芳部队的工作帮助很少，于是我们要求立即由陈独秀同志主持召开军事委员会会议，会上重新制定一系列措施。为了瓦解孙传芳部队，党准备同其他各派一起在上海发动起义。党应该为同奉系作斗争多做工作。

在这方面，方针是正确的。但我们大家一致认为，党同时为**巩固革命民主阵地，也就是为革命的第二个时期准备力量很少做工作**，在这个时期无产阶级在与农民结成联盟基础上的领导权口号将具有现实意义。国民党正在走向胜利，但在国民党的旗帜下谁将取得胜利呢？如果党通过公开动员无产阶级和农民的力量来支持全国的运动，那么为第一个时期和第二个时期所做的工作之间就不会发生任何矛盾了。但是党并没有设法引导无产阶级投入战斗。中央七月全会的决议不想开展农民运动。党通过共产党员参加各地国民党上层机构工作和促使反革命势力瓦解来支持国民运动。诚然，党同时也在工农群众中扎根，但这样做主要是以经济为基础，与革命的总任务一点没有挂钩。在全国的国民运动中资产阶级倾向在增长，而党几乎没有为革命民主倾向的胜利做任

何工作。

这方面也有一些分歧。我曾强烈地表示对中央政治工作方法的不满。格里高里同志不反对向中央提出一些问题，但通常他不捍卫这些问题，这就注定了这些问题的失败。

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关于颁布中央的独立政治宣言的问题。在这一宣言中共产党不要同国民党划清界限，而要**面对国民党和广州政府，代表无产阶级和农民群众提出他们对广州的阶级需要和阶级要求**。这个宣言应持对国民党友好的口气，其目的是引导工农群众摆脱政治消极状态，在他们的思想中建立起他们的阶级需要和国民革命之间的联系。中央委员会拒绝了这一建议，指出在国民党代表会议<sup>①</sup>召开前发表这样的宣言会被说成是试图对国民党施加压力，而如果随后国民党也接受这一宣言，那就会为右派提供口实说国民党是共产党人的代理机关<sup>②</sup>。

我们向中央提出了另一项建议，主张允许工会和农会的代表团（作为国民党成员）参加国民党代表会议，这些代表团代表**国民革命中的工农群众**向国民党领导集团提出自己的阶级要求。这些建议是旨在**不要同国民党划清界限，而要在客观上为它提供支持，同时为运动动员工农群众**。后一项建议为中央所接受，但没有实施。

中央委员会对我有一个固定的看法，认为我是左派，是鲍罗廷同志的支持者。确实，当两种倾向，即广州倾向和半孟什维克倾向发生冲突时，我得出的结论是，广州的思想只要加以纠正则要比上海的一些倾向更容易纳入布尔什维主义的轨道。

然而，汉口的格里高里同志，长沙的查理同志<sup>③</sup>以及留在上

---

<sup>①</sup> 指1926年10月15至22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一些地方组织代表的联席会议。

<sup>②</sup> 原文如此。

<sup>③</sup> H. M. 纳索诺夫。

海的我们在当地都确信,如果党的整个政治方针不作坚决的改变,则在资产阶级倾向赢得革命胜利的危险日益增大的情况下,党不仅会对反对这种危险的斗争毫无准备,而且会脱离群众。广州在湖南和湖北的“追随者”远不是革命的。但那里暴露了七月全会在我们不知情情况下所通过的中央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的有害影响:如果党向农民提出阻碍农民运动的口号,那它就可能破坏自己与农民群众的联系,这就是格里高里和查理两位同志的结论。而我们在上海则确信一批领导同志对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问题持有相当明确的半孟什维克观点(见分发的材料:关于上海发动结局的会议记录<sup>①</sup>,关于湖北农民工作的报告<sup>②</sup>等等。)

我们10月7日关于存在资产阶级倾向赢得胜利的危险和必须毫不畏惧地开展农民运动及在城市中组织无产阶级独立政治发动的电报十分准确地表述了整个远东局一致的意见。如果这份电报的决议部分为指责远东局有左倾幻想,要动员群众反对国民党,力图在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之间制造不和,力图马上组织起义从而破坏国民党的战斗力等等提供了口实,那么显然电报的这个部分的措词是不妥当的。远东局没有这样的意图。把这份电报分送汉口、北京和广州也是错误的,其实这份电报完全是发给莫斯科的,为的是得到指示。

近来在讨论土地问题时又发生了相当严重的分歧,大部分分歧是围绕纲领问题产生的。至于党为第五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土地纲领草案<sup>③</sup>,则是远东局全体委员和中央委员会现有委员一致通过的,其基础是格里高里同志起草的草案,而格里高里同志还根据我的并得到陈独秀支持的建议放弃了他原来的在农村建立“农民政权”的提法,同意采取“由革命农民建立人民政权”的提法,

① 见第118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③ 见上册第616页注①。

这个提法没有超出国民党提法的范围。只有一位同志——年轻人<sup>①</sup>主张给农村保留“农会政权”。还可以指出，格里高里同志起先坚持要补充一条关于没收一切反革命分子土地的要求，但是后来经指出这一要求与“扣押反革命分子财产”这一总要求相似，不能列入土地纲领后，他放弃了这个意见。

## 六、关于更换领导人的问题

关于领导体制，格里高里同志早在从汉口返回后的头几天就建议致电共产国际执委会，请求不要在全会<sup>②</sup>上通盘提出这个问题。不言而喻，我们拒绝了这一建议。只有讨论整个中国问题才能提出坚定的领导方针。

还在广州提出的任命远东局新主席的问题得到了正式的解决。10月15日在远东局（确切些说是俄国代表团）的正式会议上作出决定：请求我党中央派一名中央委员来中国领导远东局的工作，让格里高里同志在远东局新的人员组成中任副主席。同时决定，鉴于1月即将举行党代表大会，格里高里、陈独秀同志和我应赴莫斯科，以便共同磋商政治性质问题和与远东局今后的存在有关的一些问题<sup>③</sup>。

后来，在我去莫斯科前夕，彼得罗夫<sup>④</sup>同志提出质询后才讨论了远东局是否继续存在的问题。远东局承认，它5个月来的工作成果很难令人满意，尤其在朝鲜和日本问题上更是如此，这部分是由于客观情况造成的。尽管如此，远东局承认必须继续积累工作经验，更多地注意朝鲜和日本。

陈独秀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意见可以表述如下：1. 远东局今

① H. A. 福京。

② 指即将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③ 见第115号文件。

④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文件没有找到。

后能为领导和统一中国、日本、朝鲜和印度尼西亚的革命斗争做很多工作，这些国家的斗争将在中国革命的直接影响下得到发展；因此必须保留远东局；2. 如果光是为了中国的工作，远东局的存在是多余的，中国有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就足够了，而为了加强各地的工作可以向中国派遣一批负责工作人员。

\* \* \*

我把我关于工作安排的具体建议另行附上<sup>①</sup>。

拉菲斯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8，第 24—50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40

## 拉菲斯关于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远东局工作的结论和建议 (摘 录)

1926 年 12 月 14 日于莫斯科

### 拉菲斯同志报告中的结论和具体建议

1. 远东局以其目前的人员组成不能继续运作。但是回到过去

---

<sup>①</sup> 见第 140 号文件。



的状态，以为可以由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在莫斯科领导远东的工作也是十分错误的。远东局尽管缺点很多，但其经验证明这样的机关有必要存在，尤其是因为远东的运动正在发展壮大。

2. 远东局必须改组。其工作应由联共(布)中央委员中一位有丰富经验的杰出的党的工作人员来领导。远东局委员的人数应增至5人。格里高里<sup>①</sup>同志应留在远东局内。必须吸收一位在组织建设问题上有丰富工作经验的同志参加。各个组织派代表参加远东局的原则应予废除。青年共产国际执委会、农民国际、国际妇女联合会、工会国际等独立组织的全权代表应参加远东局的工作。

3. 远东局仍应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统一领导远东各国工作的机构运作。我认为，对印度尼西亚远东局可以比莫斯科方面做更多的工作。

4. **对于中国必须这样：**远东局主席同时应担任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而格里高里同志任他的副手。总的来说，远东局应像对待其他各国的政治问题一样来讨论和决定中国的一般政治问题。应派一批得力的同志去中国各地区委员会工作。这些同志应交由中共中央派遣，但他们应与远东局保持经常性联系。要建议中国的各个组织与党中央和远东局协商其与党的工作有关的活动。必须杜绝至今仍在发生的情况：不经党中央的事先决定就派俄国同志到党的地方组织那里工作。

5. 党的政治方针，如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中国委员会决议中所表述的，对中国党来说是全新的内容<sup>②</sup>。必须做十分认真的准备工作，才能使中央委员会掌握这个方针，并相应地改变党在各个方面的工作的整个性质。尽管业已确定的党的政治方

<sup>①</sup> Г. Н. 维经斯基。

<sup>②</sup> 指《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草案。见该文件的1926年12月16日最后文本，载《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俄文版第89—105页。

针基本上更接近广州地区委员会的立场，但没有任何理由认为中央领导同志不能贯彻这一方针。因此，为了防止党内产生严重的组织上的摩擦，共产国际执委会必须面向中央委员会，同时提出扩大中央委员会人员组成的问题。

6. 必须在全会工作结束时立即组成一个由中国同志和东方书记处参加的小型委员会（或委托东方书记处）来根据远东局送来的中央报告检查党在各个方面的工作。最后应拟定对主要工作部门（宣传鼓动、组织工作、工会工作、农民工作等）的指示信。

7. 中国党的代表大会拟于明年初召开，在此之前共产国际执委会应给中国共产党发去一封“秘密信”，这封信和全会决议一起应成为代表大会的纲领。应派一位负责的领导同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出席代表大会 [……]①

拉菲斯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68，第 51～5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

① 以下删去关于日本和朝鲜工作的部分。

141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73号(特字第55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12月16日于莫斯科

听取：3.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3] ——**扬松同志委员会的报告**(政治局1926年12月2日会议第72号记录，决定16—[2])，(报告人：扬松、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3] —— (1) 批准扬松同志委员会的以下建议<sup>①</sup>，鉴于政治局已就这些问题作出决定，从草案中删去第4条和第5条。

1. 确认1925年4月1日至1926年2月1日期间有308737美元或60万卢布未提交报销单据，这笔款项拨给：加拉罕同志40万卢布，科西奇10万卢布，通过加拉罕同志转给库伦运输公司10万卢布。

1926年2月1日至今这段时间在中国的支出没有提供任何报销单据。在中国委员会存在期间广州方面也没有报过账。

2. 鉴于北京对拨给它的款项没有报销，没有任何单据材料可以说明开支的项目、开支的数额以及1925年4月1日至今超出拨给款项的开支取自何处，认为无法确定开支是否合理、超支数额以及弥补超支的来源。

---

<sup>①</sup> 指根据1926年6月7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建立中国军政工作拨款使用情况审查委员会(见第56号文件)。委员会的建议没有找到。

3. 鉴于第 1、2 条确认的情况，责成加拉罕同志于 1927 年 1 月 1 日前向财政人民委员部库兹涅佐夫同志提交 1926 年 10 月 1 日前这段时间的全部报销单据。

4. 建议中国委员会：

(1) 采取措施及时编制从 1927 年 4 月 1 日起的上半年开支预算，并不晚于 1927 年 3 月 1 日提交政治局批准，以便在预算中列出开支的固定项目。

(2) 与财政人民委员部库兹涅佐夫同志一起明确派遣指导员费用及其置装费、安家费、差旅费、家属生活费等问题。

(3) 压缩并尽可能完全停止个别工作人员的预支费用。

(4) 鉴于向莫斯科中央报销情况不能令人满意，应注意今后每季度结束后都应提交报销单据，最迟不得晚于每季度结束后两个月。

(5) 采取措施追缴个别工作人员的欠款。

5. 确定通过专门的检查委员会来审查中国委员会活动的开支账目，每年不得少于两次。

(2) 加拉罕同志在担任驻中国全权代表期间财务工作特别是报销工作做得不好，为此向他提出警告。

(3) 请求中央监察委员会成立审查中国开支账目的检查委员会。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抄送：

扬松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库兹涅佐夫同志——(1)；

加拉罕同志——(1)，(2)。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4, 第 28—30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142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74 号(特字第 56 号)记录 (摘 录)

1926 年 12 月 23 日于莫斯科

听取: 5. ——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 [2]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 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 5. —— [2] —— (1) 把关于远东局今后工作的问题交由联共(布)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核心小组解决, 责成代表团核心小组成员以政治局就此问题交换的意见作为指导原则。

(2) 认为有必要在广州、汉口和上海开设塔斯社分社。

(3) 接受伏罗希洛夫同志关于授予布留赫尔和鲍罗廷同志红旗勋章的建议。

(4) 责成伏罗希洛夫同志: ① 加快取得对最近发出的关于工人政策问题的电报<sup>①</sup>的答复; ② 询问鲍罗廷同志, 为什么他的报告和军事计划中没有提到同盟者冯<sup>②</sup>, 以及广州军队和冯的相互关系如何。

---

① 见第 136 号文件。

② 冯玉祥。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1）；

多列茨基同志——（2）；

戈尔布诺夫同志——（2）；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 1926年12月1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19.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9.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在城市里实行退却和收缩工人争取改善自己生活状况的斗争的这一总政策是错误的。在农村中应该开展斗争，但同时还需要利用有利时机来改善工人的物质状况和法律地位，千方百计设法使工人的斗争具有组织性，避免过火行为和冒进行动。特别应该设法使城市斗争的矛头指向大资产阶级，首先是指向帝国主义者，以便使中国的中小资产阶级尽可能留在统一战线内反对共同的敌人。我们认为实行调解庭、仲裁法庭等制度是合适的，这样才能通过这些机构保证执行正确的工人政策。同时我们认为有必要提请注意，绝对不容许颁布反对罢工自由、工人集会自由等的法令。鉴于这一问题十分重要，请经常报告情况。”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32—3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名为真迹复制。

143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75号（特字第57号）记录 （摘 录）

1926年12月30日于莫斯科

听取：6——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3]——索洛维约夫同志的声明（政治局1926年12月23日会议第74号记录，决定：5—[3]（1）），（报告人：加拉罕、索洛维约夫同志）。

决定：[3]——（1）同意索洛维约夫同志关于撤销今年12月23日政治局关于任命索洛维约夫同志为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政府代表的决定（政治局会议第74号记录，决定：5——[3]（1））。

（2）任命阿拉洛夫同志为苏联政府驻中国国民政府（汉口）的代表。

（3）派拉祖莫夫去中国，责成中国委员会确定其工作地点并报政治局批准。

（4）责成中央书记处向下次政治局会议再提出一名派往中国工作的工作人员人选。

（5）所有派往中国的同志均归鲍罗廷同志领导。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科肖尔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格伊同志——（1）（2）（3）（4）；  
索洛维约夫同志——（1）；  
阿尔洛夫同志——（2）；  
鲍罗廷同志——（5）。

听取：[6] —— **中国委员会提交的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彼得罗夫<sup>①</sup>、加拉罕同志）。

决定：[6] ——（1）认为应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内为500名中国工农青年和国民革命军及国民军青年士兵开设一年期的训练班。开设训练班的费用以100万卢布为限。如莫斯科房舍不足，可在列宁格勒开设。

（2）①认为中山大学不能单独派遣驻中国的代表。②将来只有经有关领导机关允许才能派遣代表和同中国建立联系。③认为中山大学必须完全服从中央鼓动宣传部的领导。

（3）责成彼得罗夫同志将就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五次代表大会给维经斯基同志的指示稿先提交政治局批准，然后提请共产国际执委会通过。

（4）同意中国委员会关于派遣由英国、法国和美国共产党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去中国的决定。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拉狄克同志——（2）（①②③）；  
彼得罗夫同志——（3）；

---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克诺林同志——(1)、(2)、(③)；

布留汉诺夫同志——(1)；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4)、(3)；

舒米亚茨基同志——(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35—3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144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77 号（特字第 58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1 月 6 日于莫斯科

听取：4——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交的问题：[2]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6 年 12 月 30 日会议第 75 号记录，决定：6—[3]），（报告人：加拉罕、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4—[2] (2)<sup>①</sup>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作为对他“第 6—10 号急电”<sup>②</sup> 的答复：

“如果您提出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单独谈判的问题也是国民党情绪的反应的话，那么最高领导机构就不反对国民政府就在南满

① 关于给 M. M. 鲍罗廷发电报的决定的第 (2) 项被用一条横线勾去了。

② 电报没有找到。

和山东作出某些让步问题与日本单独进行谈判，条件是日本在中国其他地方要作出实际让步，日本在广州与安国军<sup>①</sup>集团作战时要保持有利于广州的中立，日本要放弃把中国一分为二的政策并保证中国的统一和完整。当然，谈判只能在日本代表拥有进行单独谈判的切实全权时才可进行。如您将单独谈判的纲领寄来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准备迅速加以研究。”

(3) 给乔尔内赫同志发去指示，要他把日本准备就满洲问题与苏联进行谈判的建议报告给国民政府，并告诉他们，苏联政府将不撇开广州与日本谈判，它不反对在广州和日本达成协议的情况下进行谈判。

(4) 就国民军任务问题指示隆格瓦和乌斯曼诺夫同志，政治局11月18日指示提请注意，削弱阿山至包头地区军事力量<sup>②</sup>是不恰当的。12月2日的指示指出，国民军的部署符合目前的局势<sup>③</sup>。这些指示至今仍然有效。

在目前情况下国民军部队不能向北撤退。关于国民军进攻河南的问题应与国民革命军司令部（蒋介石）商定。

(5) 对国民党关于建立与奉天联盟相敌对的新军阀集团的建议表示赞同。

抄送：

加拉罕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

<sup>①</sup> 安国军是1926年11日在天津举行的反动军阀会议上成立的，目的是联合起来与南方的革命军队作斗争。张作霖被选为总司令。1928年春安国军被国民党军队击溃，1928年6月4日张作霖死后正式结束其存在。

<sup>②</sup> 见第129号文件。“阿山”可能是“贺兰山”——译者。

<sup>③</sup> 见第130号文件。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40—4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45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记录 (摘 录)

1927 年 1 月 6 日于莫斯科

听取：5. 关于国民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派驻代表的问题。

决定：5. 原则上接受关于派驻代表的建议。由小委员会讨论和解决手续方面的问题。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36，第 2 页。  
打字稿，副本，没有签字。

146

## 谭平山和拉斯科尔尼科夫在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就国民党向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派驻代表 问题的发言记录

1927年1月7日于莫斯科

### 关于国民党向主席团派驻代表一事

谭平山同志（由彼得拉舍夫斯基<sup>①</sup>同志翻译）：

他原则上赞成国民党作为同情党向主席团派驻代表。就这一建议他要作三点说明：

1. 这一建议只是几个国民党员提出的，除他们之外谁也不知道此事。根本谈不上大多数国民党员赞成这样做。

2.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都没有接受这一建议。

3. 众所周知，胡汉民不代表国民党，而代表上海，与此同时……<sup>②</sup>一方面他试图提高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威信，另一方面试图削弱共产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谭平山同志赞成由政治书记处再次研究这一建议。

<sup>①</sup> 吴兆高（音）。

<sup>②</sup> 删节号是原有的。

**彼得罗夫**<sup>①</sup>：国民党来这里的第一位正式代表、政治局委员<sup>②</sup>建议把国民党算作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我们当然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共产国际在每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支部，在目前情况下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支部。

现在国民党的第二位正式代表<sup>③</sup>建议，国民党在共产国际设代表，而共产国际在中国国民党中央设代表。我们认为，原则上应该接受谭平山<sup>④</sup>同志的这个建议。必须在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之间建立直接的关系。但我认为，首先应该核实国民党的这一建议是否确实是正式建议，这项工作可责成小委员会来进行。

我简要地说明一下自己的观点：原则上接受国民党代表在这里提出的建议，并责成小委员会审查这一建议是否是国民党正式提出的。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70，第 51—52 页。

德文打字稿（谭平山的发言）和法文打字稿（拉斯科尔尼科夫的发言），原件，无签字。

---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胡汉民。

③ 邵力子。

④ 原文如此，应为邵力子——译者。

147

## 索洛维约夫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小委员会的信

1927年1月10日于莫斯科

秘密

致小委员会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在今年1月7日的会议上原则上通过了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国民党互派代表的决定<sup>①</sup>。

现在必须：

1. 决定将国民党代表列为有发言权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成员。

2. 致电鲍罗廷同志，确认邵力子的委托书或另派代表前来。附上电报草稿<sup>②</sup>。

赖特<sup>③</sup>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7，第 3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

① 见第 145 号文件。  
② 见第 148 号文件。  
③ B. И. 索洛维约夫。

148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小委员会会议第6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1月11日于莫斯科

### 书记处小委员会会议 第6号记录(摘录)

出席：皮亚特尼茨基、什麦拉里、彼得罗夫<sup>①</sup>、格什克、海默。  
临时列席：瓦西里耶夫、赖特<sup>②</sup>、谭平山、丘古诺夫<sup>③</sup>、蔡<sup>④</sup>。

听取：10——谭平山同志关于成立研究中国政治问题小组的建议。

决定：10——该建议应移交小委员会下次会议审议，然后列入政治书记处下次会议的日程。

听取：11. ——谭平山同志关于派遣罗易同志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去中国的建议。

决定：11. ——任命罗易同志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国共产

---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В. И. 索洛维约夫。  
③ 周达文。  
④ 蔡和森。

党代表大会代表团的第三位成员。

听取：12. ——谭平山同志关于吸收彼得拉舍夫斯基<sup>①</sup>同志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作为情报部工作人员），同时还吸收谭平山同志<sup>②</sup>，而丘古诺夫同志担任东方书记处的翻译的建议。

决定：12. ——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完成关于吸收两位同志到共产国际中工作的谈判。

听取：13. ——东方书记处关于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问题的建议。

决定：13. ——致电鲍、维<sup>③</sup>两同志，电报内容如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原则上同意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派代表。国民党中央的代表可以参加主席团，享有发言权。国民党是否已讨论过这一问题，邵力子同志是否已被委以全权，担任国民党驻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国民党员对此问题持何态度？鲍和维两同志以及中共中央对此问题有何意见？”

小委员会在收到复电后将再次审议这一问题。

听取：14. ——蔡同志因病提出的到夏天再派他回中国的请求。

决定：14. ——建议蔡和谭平山两同志致电中共中央，询问中央是否坚持其要求，因为蔡同志经医生诊断实际上不能工作。

听取：16. ——东方书记处关于将〔国际〕妇女书记处的代表列入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国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代表团的建议。

决定：16. ——不接受。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① 吴兆高（音）。

② 原文如此。

③ 分别为 M. M. 鲍罗廷和 Г. H. 维经斯基。



全宗 495, 目录 6, 卷宗 4, 第 13—14 页。

德文,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49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78 号(特字第 59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1 月 13 日于莫斯科

### 1927 年 1 月 9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 27.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 加拉罕同志)。

决定: 27.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致鲍罗廷。答复您第 6—8 号电)<sup>①</sup>。近期不能等待汪精卫。何况您的建议是有益的, 即赴南昌说服蒋介石, 要他相信他的建议不恰当。您应该同能够影响蒋介石的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成员一起去。在您到达南昌前先告诉蒋, 说汪精卫不去, 这可以减轻他对武汉的担心。作为妥协, 可以同意总司令<sup>②</sup>本人和司令部因前线关系驻在南昌, 但国民政府和中央则驻在武汉。主要可提出如下理由: 撤离武汉会导致帝国主义和北方军的进攻, 因为他们会把撤离武汉看作是广州软弱的表现。我们理解形势的复杂性和您

<sup>①</sup> 电报没有找到。

<sup>②</sup> 蒋介石。

所面临的困难。但是我们认为，您有哪怕是暂时退出领导岗位的情绪也是危险的。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您的领导。我们将通过邵力子直接向蒋介石转达我们的意见，即武汉应成为首都。”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44、4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50

##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

1927 年 1 月 14 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关于共产国际派驻中国代表的问题已由共产国际执委会 [政治] 书记处正式作出决定<sup>①</sup>。我建议成立专门委员会来制定给中国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代表的指示。最好您参加这个委员会的工作。我们已经为联共政治局起草了指示。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执委会专门委员会的工作就容易多了。

---

<sup>①</sup> 见第 148 号文件。

我和谭平山同志作过几次长时间的交谈。他也认为他参加党代表大会是政治上的迫切需要，但他想先了解您对某些党内事务的意见，然后再最终决定是否与我同行。关于维经斯基和鲍罗廷在远东局中的冲突等等，他有许多情况可谈。他认为，党内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冲突的反映。他建议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我的意见是，这些问题需要加以认真研究，您应该尽快亲自和谭平山谈一谈。

从我这方面来说，除在中国工作以外，我想同您讨论一下东方（印度尼西亚、印度等）的工作计划。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7，第 42 页。

打字稿（英文），副本，无签字。

15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会议记录 (摘 录)

1927 年 1 月 18 日于莫斯科

出席：彼得罗夫<sup>①</sup>、赖特<sup>②</sup>、谭平山、片山潜、谢马温、卡斯帕罗娃、艾杜斯、阿布戈夫、阿马加耶夫、舒米亚茨基、太洪、莱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В. И. 索洛维约夫。

茵施坦、米夫、丘古诺夫<sup>①</sup>、阿尔布列赫特。

听取：1. ——关于建立农民委员会问题（谭平山的建议）<sup>②</sup>。

决定：1. 认为在农民国际下建立一个研究中国土地问题和农民问题的委员会是必要的，由中共中央（谭平山同志）、农民国际、国际农业研究所、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国际妇女联合会和中山大学的代表组成。

由农民国际的代表担任委员会的负责人。

基本上批准谭平山同志提出的工作计划。

听取：2. 关于翻译委员会问题（谭平山的建议）。

决定：2. 组织一个委员会负责校订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学生翻译的社会政治书籍和小册子的中译稿以及从中国得到的中文材料的俄译稿。

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山大学、中国代表团、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和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各派一名代表参加这一委员会。任命谭平山同志为委员会主席。

责成该委员会在最近一次会议上研究以下问题：

[1] 保证对译成中文的所有材料作负责的校订。

[2] 了解出版活动的程序和条件。

听取：3. 关于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准备工作。

决定：3. 责成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主持党代表大会。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草拟指示信，为此选举彼得罗夫同志（可由赖特同志取代）、谭平山和瓦西里耶夫组成委员会。

接受谭平山同志关于将国际妇女联合会的代表列入赴中国代表团的建议。

听取：4. 关于国民党向共产国际执委会派驻代表的问题。

---

<sup>①</sup> 周达文。

<sup>②</sup> 谭平山1927年1月18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的信中谈到了他的这一建议及下面的其他建议（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287，第3—5页）。

决定：4. 征询国民党中央的意见，确认派代表的建议和国民党中央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具体人选。

尽快成立国民党工作委员会，请邵力子同志作关于国民党形势的报告。

听取：5. 关于为中共党的机关提供工作人员的问题。

决定：5. 通过向中国派遣俄国教师在各地组织训练班的办法来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请联共中央宣传鼓动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推荐相应的教师，争取尽快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必须事先对这些同志进行专门培训。

接受谭平山同志关于从中山大学中国学生当中抽调一批人专门作为教师来进行培训的建议。

责成中山大学详细研究这一问题。

听取：6. 关于中国政治小组问题（谭平山的建议）。

决定：6. 原则上同意谭平山同志的建议，将这一问题的解决交政治书记处批准。

听取：7. 关于派一位同志去招收“500”名学员问题<sup>①</sup>。

决定：7. 认为派库丘莫夫同志去中国是合适的。授予他调查中共党校的开设情况及其现状的全权。

听取：8. 关于远东书记处书记问题。

决定：8. 批准瓦格纳同志为远东书记处书记。

主席（签字：彼得罗夫）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87，第 1—2 页。

打字稿，副本。

<sup>①</sup> 指招收 500 名大学生参加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下设的短训班。

152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会议第5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1月19日于莫斯科

### 政治书记处会议第5号记录

出席：布哈林、库西宁、安贝尔-德罗、格什克、谭平山、洛佐夫斯基、皮亚特尼茨基、罗易、什麦拉里、艾尔科里、瓦西里耶夫、梅尔菲、邓肯、赖特<sup>①</sup>、安加列季斯、沙茨金、哈肯、蔡特林、卡汉、彼得拉舍夫斯基<sup>②</sup>、海默、缪勒尔。

听取：2——“关于中国共产党组织任务”的决议草案。

决定：2. ——由罗易、谭平山、瓦西里耶夫和赖特同志组成的委员会应根据政治决议<sup>③</sup>确定这一决议的最后稿。

同时委员会应作出以下指示：

[1] 中共应进行斗争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图谋，反对把右派过早排挤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但另一方面，党应设法保证左派在国民党内拥有较大的影响。

---

① B. H. 索洛维约夫。

② 吴兆高（音）。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2月16日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

[2] 关于党的领导人员组成问题可采取如下提法：

中共应力求使党的领导中有尽可能多的工人。

听取：4. ——开展中国运动<sup>①</sup>。

决定：4. —— [1] 指定由邓肯、梅尔菲、安贝尔-德罗、罗易、谭平山、赖特和科多维利亚同志组成一个委员会，该委员会应为主席团下次会议起草一个在研究各党有关活动等的基础上组织广泛的中国运动并吸收具有反帝倾向的组织参加的建议。

此外，委员会还应起草关于在各国议会中可以作发言的建议。

委员会还应起草关于中国问题的呼吁书<sup>②</sup>。

[2] 责成宣传鼓动部尽可能向苏联和各国共产党报刊提供它所收到的有关各国共产党和其他组织针对中国、苏门答腊、尼加拉瓜等地的事件开展的具体运动的材料。

听取：5——给驻中国代表机构的指示。

决定：5. ——责成小委员会批准东方书记处起草的指示草案。指示应在代表团出发前告知代表团成员。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第 1—3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sup>①</sup> 指开展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武装干涉中国的运动。

<sup>②</sup>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致各国工人的呼吁书》，载 1927 年 1 月 27 日《真理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105—107 页。

153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就《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 草案问题召开的会议的速记记录 (摘 录)

1927年1月19日于莫斯科

议程第二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草案。

布哈林同志：

1. 对国民党和那里的纪律的态度。应该指出，国民党不是俱乐部。关于七月决议<sup>①</sup>，同志们说，并不想说国民党是俱乐部，但对于我们的纪律问题也许还应说得温和些。有两个指示：1. 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应有一定的纪律，另一方面，我们需要一定的机动自由。也许可以这么提：批评自由，而不提国民党是一个有严格纪律的党，等等。

2. 关于强加决议。这里应把我们的策略和政治行为区分开来。不说强加是政治行为，而应强调另一个策略方针。这要用另一种方式来提，否则可能使人以为根本就不需要执行我们的方针。

3. 关于国民党左派党团。这里提出，党应当反对建立国民党

---

<sup>①</sup> 见上册第361页注<sup>④</sup>。



左派党团，仅此而已。我认为，这样提过于严格。在全会决议<sup>①</sup>中有一句话：“我们应力求形成国民党内的左派”。这并不是说应该形成左派来反对右派。这是说，应当在各个方面进行斗争争取把左派组织起来。应该这样提：党只要有可能就应谨慎地设法同左派进行合作，也不能排除把他们组织起来的可能性。

4. 关于集体加入或个别加入的问题。不要把二者对立起来。我们吸收党员。让这些党员也加入国民党。随着我们党吸收新的力量，国民党也会得到加强，我们在那里的影响也会得到加强。

5. 关于“领导人中多数应来自工人”的提法。这里说，在目前形势下多数应属于工人。我建议这样提：“党应努力使党的领导机关中有较多的工人”，不说多数的问题。

6. 至于党的机关，应该这样提：它不应是一个单独的机关，但应与群众保持联系，等等。关于议程第二项：《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决议草案。

布哈林同志：中国同志当中有一种不正确的倾向。另一方面是共产国际全会<sup>②</sup>的决议。决议给全党提出了一个新的方针。这个方针是：应在改组力量方面改变方针，我们应利用这一点。这一前景是否与国民党内客观上排挤右派的问题有关呢？是有关的。我们提出了夺取国民党各级组织、政府机关、军队等等中的重要战略地位的口号。这能否在内部力量发展壮大过程中不经斗争就实现呢？不能。但谁能取得胜利呢？谁组织得好谁就能取得胜利。是否因此就排除了建立和组织力量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呢？不是的。因此我们不能自断后路，要么接受我们确实能完成的决议，要么不接受。我们写的决议不是只管一两个星期，而是管一个长

<sup>①</sup>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看来，布哈林是凭记忆引用决议的。他所引的这段话在决议原文中没有，但决议中有给中共的意思类似的指示：“支持”国民党的“革命左翼”，朝“形成左翼和与其建立紧密合作”的方向行动。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99页。

<sup>②</sup>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

的时期，假如这个前景十分现实，我们就不能自断后路，不要在国民党内联合左派力量。我愿意这样来提问题：我们党应为反对任何分裂国民党的企图、反对各种过早将右派排挤出国民党的仓促步骤而斗争，但是另一方面，党应该努力保证左派在国民党内的巨大影响。不能说禁止组织左派力量。现在没有这个必要，但也许过3个月后就有这个必要，这也许在整个组织问题上将是最有必要的了。在我们这里的提法是禁止这样做。因此我们在不断变化的情势中被束缚住了手脚，这不好。

**瓦西里耶夫：**我同意，但如果现在建立左派党团，那就意味着分裂。

**布哈林：**这里谈的是，我们是否应该自断后路。这是关键的一点。其余的都是提法问题。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第 226—229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 154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决议 (摘 录)

不早于 1927 年 1 月 19 日于莫斯科<sup>①</sup>

秘密

### 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决定：

“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认为，几乎各国共产党共同的<sup>②</sup>一大缺点是不太善于利用**组织**方面活动的积极成果。这在许多情况下造成了共产党员数量增长不大，有时出现停滞状态，这与各国共产党**政治影响**的明显提高很不相称。加强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积极性、提高各党组织发展工作的力度，为共产党的群众性而进行更有力的斗争〔……〕这些都是共产国际的最主要任务。”<sup>③</sup>

这个决定也适用于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七月全会在组织问题决议中确认了党在组织工作方面的弱点<sup>④</sup>。然而，党不得不在革命向前发展的形势下开展工作。中央七月全会在关于组织问题的

<sup>①</sup> 决议最后定稿的确切日期不能确定。这一日期是根据第 152 号文件标注的。

<sup>②</sup> 原文如此。

<sup>③</sup> 《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 年 11 月 22 日—12 月 16 日)速记记录》第 2 卷第 400 页。删节号表示所引用的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决议中省略一段话。

<sup>④</sup>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179—187 页。

决议中完全正确地作出决定，党的整个组织工作应当是根据实际任务把党员和非党群众团结在党的政治口号周围。党的极其重要的任务之一是吸引每个党员投入到贯彻执行行动纲领的工作中，而且这项工作基本上应通过支部进行。共产国际执委会认为，中国共产党必须自上而下重新考虑自己的工作方法。为此应把组织问题纳入即将举行的党代表大会<sup>①</sup>的议程。由于组织问题十分重要，代表大会应突出这个问题，或者单独作一个报告，或者作为对中央政治报告的补充的副报告，如果采取后一种方式，则组织问题应在包括有重要地方组织的代表和党的重要工作部门的领导人参加的广泛的专门委员会中加以讨论。中国共产党刚刚着手做组织建设工作，因此对于这项工作特别重要的是从一开始就要采取正确的方针。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以下一些极其重要的具体任务：（1）增加党员数量，（2）巩固支部，（3）培养骨干，（4）巩固和改进党的机关，（5）国民党工作，（6）工会工作，（7）农民工作，（8）军队工作，（9）工农青年工作，（10）国际联络。

1. **增加党员数量。**中国共产党在过去一年里党员数量增加了两倍。党现有党员 15000 人，其中 75% 是工人。党员数量如此飞速增加表明做了大量工作，表明党正确地为发展工作规定了面向工人阶级的方针。但是 15000 名党员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对于有 4.5 亿人口的国家来说，对于历史为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任务来说则太少了。需要鼓足干劲，利用每个机会来继续进行最强有力的、不停顿的发展工作。发展新党员的工作首先应在工人群众中开展，争夺大的企业和工会。应把最大的注意力放在对那些对于瓦解敌人和把基本无产阶级群众团结在党的周围具有特殊意义的地点的渗透和组织巩固上。所有大企业，特别是兵工厂、铁路、港口、电报局、电厂、军队和军工部门等都属于这样的地点。

<sup>①</sup> 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党由于现有骨干力量薄弱，自然应集中全力于重要地点，但党不应放弃任何一个机会来同新的工人区进行联系。在这方面铁路系统和水运（河运和海运）系统的工作格外重要。

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应与提高党员政治水平和普遍加强党的队伍的工作同时进行。对于每一个党员来说，从他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应帮助他学习党的目标、任务和工作方法，向他提供有关的通俗读物，组织小组、短训班、座谈会，等等。但最主要的是，对所有党员来说，从他们入党的第一天起就应吸收他们参加党的日常实际工作。当然，只有在党的组织，首先是党的基本组织即支部有活跃的、主动开展的政治生活的情况下，才能吸收他们参加党的工作，这样，每一个党员都有可能直接参加争取解放的革命斗争，这种斗争乃是共产党的本质。工人以及农民和知识分子中的革命分子加入共产党首先是为了实际参加同阶级敌人的直接斗争。如果新党员参加的组织不符合这些要求，那么他们就会因此变得对党冷淡，因为党口头上号召他们参加斗争，而实际上却不向他们提供参加斗争的机会。不仅新党员是这样，而且老党员也是这样，老党员如果入党后不参加实际工作，不感到自己是争取解放斗争的直接参与者，也会与共产党疏远。

2. 因此发展新党员的工作应与巩固支部、改进支部的工作同时进行。中央七月全会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指出，“现在我们党的基础仍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党的活动工作者也是各地方，而不是各支部”<sup>①</sup>。我们不清楚，中国共产党在克服这些缺点方面取得了哪些成绩。对于中央七月全会决议，我们认为有必要补充强调指出，支部，具体说是工厂支部是党的基本组织，这一特征是正确的结构和布尔什维克化不可或缺的条件。因此，七月全会指出的组织缺点属于中国共产党工作中十分重大的缺点。中国共产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2卷第182页。

党不重新考虑党的组织工作方法，就不能改变支部的现状。中国共产党（同中国的其他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一样）尽管与群众保持联系，至今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上层组织。党面临的基本政治任务和党内任务通常只由中央委员会来研究，连地区委员会都不经常研究。在党的这些领导机关内部，在多数情况下，又只吸收极少数同志参与解决问题。秘密工作的条件和在个别情况下必须立即作出十分重大决定的要求，都不利于现行党内民主制度在中国共产党内的发展。但是我们认为，中央通常由两三个同志来决定十分重大的问题，地区委员会的情况也差不多，这是十分错误的。党必须十分认真地考虑一些实际措施来保证党的各级组织的集体领导。作为具体指示应提出以下建议：

应该抓紧建立结构合理的党的机关网络并使其中每一个机关都正常运行工作。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十分薄弱。中央和地区委员会没有集体领导，没有领导各委员会日常工作的强有力的常设机构，没有定期举行的全体会议。基层党的机构情况更差。省、县和市委委员会通常没有建立或不会开展工作，实际上由地区委员会或中央任命的组织者取代了这些委员会。党的代表会议和党员大会也不起正常工作的党的基层组织机构的作用。上海完全错误地撤销了区委。这些都应彻底加以改变。通常应该在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中建立集体领导。应该着手普遍建立省委、县委和市委的工作，而在大城市还应（为各城区）建立区委。省委、县委和城市的区委应在相应的党代表会议或党员大会上按照一般规定经选举产生并对党代表大会或党员大会定期报告工作。凡是警察条件允许的地方，都应定期召开党员大会讨论党的生活中的一切最重要的问题。经过党员大会的讨论，各支部的工作经验，它们的决定等能得到最充分地利用，它们的错误能得到纠正。党员大会是集体讨论和决定问题的最简单的形式，是发挥党员主动精神、培养党的领导工作能力的最简单的形式。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也应

召开，但必须注意使这些会议不致变成决策机构，因为这些会议的任务是讨论如何贯彻党的领导机关的指示，就个别问题专门进行通报，等等。党的积极分子大会只应具有咨询性质。必须明确党的机构的职责，尤其是必须使各支部和农村组织直接隶属于相应的县委、市委和区委。支部直接隶属于中央是十分错误的。地区委员会在尚未建立起相应的县委、市委等等之前可以直接领导党的基层组织的工作。在选举党委时应规定党委核心组成员能经常参加定期举行的党委会议。核心组在党委全体会议上应作工作报告并提出批准在全会闭会期间作出的决定的问题。此外，很有必要让各级党委，尤其是城市和地区基层党委经常在支部会议上和地区的即市和区的党员大会和党代表会议上报告工作。同样也很有必要由基层党组织，党委和党员大会、党代表会议先对非常重要的总的政治形势问题和党的状况问题进行讨论，只要这些问题不是保密的，也不需要立即作出决定。党的报刊应更多地，尽可能广泛地向全体党员提供有关党的生活和工作中的基本问题的必要材料。另一方面，党的报刊应保证基层党组织和每一个党员有可能提出党的工作问题来进行讨论。党内一旦出现分歧，应通过对所争论问题的全面讨论来加以消除。对争论的问题，如同对其他一切问题一样，由讨论这些问题的组织（党委、党代表会议、党员大会、支部大会等）的参加者多数票来作决定。通过这样的方式作出的决定，对于直接参与解决问题的所有人，以及对于以其名义作出决定的组织的全体成员都是必须执行的。例如，市组织党员大会的决定对于市组织全体党员，包括未出席会议的党员都是必须执行的，对于市委，即使多数市委委员反对这一决定，也是必须执行的。县委的决定对县组织全体党员是必须执行的，如此等等。只有上级党组织才能撤销决定：对县委来说是县党代表会议和地区委员会，对于地区委员会来说是地区党代表会议和中央委员会，对于中央委员会来说是党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每个

党员有权就任何党的决定向有关上级党组织，直至共产国际代表大会提出申诉。但在这一决定撤销以前，他必须认真加以贯彻执行。正如共产国际代表大会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的决定所说的，每个党员应先执行，然后再提出申诉。

因此，在共产党内党的纪律不应是像宗教社团中的那种生硬纪律，不应是建立在党员对党委和个别杰出工作人员盲目服从基础上的纪律。共产党的纪律是经过党员对党的工作问题集体讨论后产生的，是建立在少数服从多数的基础上的。

深入广大农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内正确开展组织工作，党员掌握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发挥主动精神，培养骨干等等之所以困难很大，是因为绝大多数党员和工农群众都是文盲。要克服这一困难，需要进行长期的坚持不懈的工作。为了减少这一障碍的一些影响，党应该提出建立为工农组织服务的专门干部队伍问题。凡有可能的地方，都应建立工人俱乐部、阅览室，即使十分简陋的也行：有一个固定的地点，由党组织指定的人读报讲报，宣读和讲解党的号召书、小册子等等。为此，应最广泛地利用大学生中的党员和同情分子。应尽可能吸收这样的党员参加各个支部。但同时应注意，凡未经党组织培养的读报人不得因其智力较发达而在政治上起领导作用。

在拟定党的领导机构包括中央委员会的人选时，应努力使工人在其中占多数。在提拔参加党委的人员时，首先要看该同志的积极性、组织能力、对革命和党的事业是否忠诚、与工农群众的联系、一般政治素养和发展潜力。各国共产党的经验表明，只有吸收忠于党的事业、能力强的工人参加党的领导机构才能保证有一个好的党的领导。

党内工作的这一转折应考虑到使支部首先是工厂支部真正成为党的基础。这就是说，支部，首先是工厂支部，应被吸收参加对党的一切重大任务的讨论，整个党的机关的建设应考虑到与支



部保持良好联系的需要，考虑到全面为支部提供服务的任务，即向支部通报情况，吸收支部直接参加对党的重大问题的讨论和解决。工厂支部所关心的问题应在党的机关工作中得到反映，因为党的机关最重要的任务是帮助工厂支部和在企业工作的一些同志正确提出和解决吸收和组织广大工人群众参加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斗争的问题。党的基层组织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决不意味着削弱中央的作用。列宁教导说：“无条件的集中和极其严格的纪律是战胜资产阶级的基本条件之一”<sup>①</sup>。

3. 正确解决党的基层组织工作的积极性和政治化问题，有助于解决党的干部队伍的加强和发展问题。中国共产党现有干部力量薄弱，不足以完成党所面临的任务。党应该竭尽全力扩大和提高干部的业务能力。为此必须进行大量思想工作，出版书刊，开办党校等等，但最重要的基本的一点是应该在党的领导工作中吸收集体的思想，而要具体做到这一点，就要提拔在（会议上和党代表会议上的）集体讨论过程中表现最突出的基层工作人员，首先是工人出身的人。党的积极分子只有基本上由工人组成，才能是一支优秀的队伍。对被提拔的同志应保证给予尽可能多的帮助。其中最能干的人应全部调去从事党的工作。例如，应用这样的办法在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中建立指导员干部队伍。

在提拔担任党的领导工作的人员时不应该因此削弱工会和农会。相反，党应该像加强党组织的干部力量那样坚持不懈地争取加强这些组织中的党的领导核心。

4: **党的机关**。我们在这里很难判断中国共产党的机关现在需要有多大规模。对我们来说有一点是没有疑问的，那就是这个机关应尽可能小而灵活。党目前还没有条件建立一个机关。党应该拥有一个能迅速收缩、转移的机关，总之，拥有一个能战斗、能

<sup>①</sup> 在列宁的著作和讲话中多次反复提出这一论点。

征战的机关。因此，党应当在其机关中设有巡视员和指导员，他们要与地方组织保持和建立联系，并帮助它们正确开展工作：组织工作、鼓动工作、工会工作，等等。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内应设立以下常设的基本部门：组织部、工会工作部、宣传鼓动部、农民工作部、妇女工作部。但这些部门与党委的整个机关一样，应这样来安排工作：在认真研究地方组织的材料的同时，把工作重心放在通过巡视和指导工作同地方组织建立积极的联系上，并向地方组织提供帮助。中央不应代替地方组织的工作，而应促使地方组织发挥其首创精神，不断以全党性指示的精神来指导它们。区委和市委的部门在近期内可能不完善，但区委和市委应有一个由三至五名同志组成的不大的常设办事机构，按照上述四个最重要的方面设立常设工作委员会，吸收在党的这些工作部门中的优秀工作人员参加这些工作委员会。至于支部的机关，我们反对七月全会决议提出的每个支部都要采取全党的那些工作形式（如，工会运动、农民运动、促进协会、慈善协会、妇女运动、青年运动、发行书报、推荐同志、时事报告、联络等）。这是十分庞大的计划，即使实力强的支部也难以胜任。支部必须有一个人数不多的工作能力强的办事机构（3至5人），其次，根据支部人数多少、秘密工作条件等支部可下设一些重要的工作委员会——组织委员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等，以及应在各个支部成员之间作组织上的具体分工（见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决议）<sup>①</sup>。

最后，中国共产党应把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如何有步骤地收集和研究有关国内经济政治生活中的一些重大问题（工业、财

---

<sup>①</sup> 共产国际各支部第二次组织工作会议于1926年2月10至17日举行（中国共产党代表未参加这次会议）。会议讨论了工厂基层支部、区党委、市党委、工会和其他群众组织中的共产党党团的工作和组织问题。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扩大全会批准了这次工作会议的决议（见《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1926年2月17日—3月15日）速记记录》莫斯科-列宁格勒1927年版，第468—481、649—653页）。第一次类似的工作会议于1925年3月16至21日，即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五次全会（1925年3月21日—4月6日）前夕举行。

政、土地问题、工人问题等)的材料作为一个特殊的和非常重要的问题来加以讨论。中国共产党作为科学共产主义的政党,应对时局作出有根有据的科学研究,在此基础上构建自己的纲领和策略。目前中国共产党拥有的关于国内经济状况和政治状况的科学材料还非常少。在土地问题上尤其如此。蓬勃发展的革命运动对党在这方面提出了越来越多的要求,党应该认真考虑如何切实完成这一任务。

**5. 国民党工作。**中国共产党现在面临的十分艰巨而重要的组织任务之一是同国民党建立正确的组织关系。正如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指出,国民党是中国革命力量的联盟,只有中国共产党在这个联盟中,也就是在国民党内实行正确的政治方针和组织方针,才能使中国革命超出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强烈谴责中共内主张退出国民党的某些同志。同样应该谴责中共中央1925年十月全会的决议,因为这次全会主张放弃在整个国民党组织内与国民党合作的策略,转而采取与国民党结盟的策略<sup>①</sup>。显然,这种观点只不过是退出国民党的建议的另一种形式,是建议坚持退出方针。中国共产党仍要留在国民党内,应采取这样的方针:通过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工作来保证加入国民党的各社会阶级和集团的联盟和行动统一。中国共产党为了加强自己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应设法使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与相应的党委保持密切的联系,而相应党委则应保证对其有权威的积极领导。应特别注意保证党中央对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的正确而坚定的领导。迄今为止,在这个问题上情况很不正常。中共中央在上海,而国民党中央在广州。因此,实际上是由广州地区党委(尽管广州地区党委和党中央的政治分歧很大)来领导共产党在国民党内的的工作。中央应直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的

<sup>①</sup>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卷第487—491页。

工作。因此，党中央要设在国民党中央的所在地，这在组织上才是正确的。如果由于某些特殊原因办不到，党中央应派出十分权威的专门代表团来领导共产党员在国民党中央的工作。因此，应重新考虑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的问题。中央委员会应设在关键性的战区，而广州政府的南方战线现在就是这样的战区。（这当然不是说其他地区的工作应削弱）。

在国民党内的共产党员应围绕中国共产党的行动纲领来从内部组织国民党的舆论。共产党员决不应把自己的建议强加给国民党机构，更不应取代国民党机构。中国共产党在把共产党工作人员提拔到国民党的领导岗位上时，应格外谨慎。党应设法使党员担负国民党内的领导职务。但决不能容许把共产党的人选强加于人，把国民党内的全部领导职务都由共产党人来担任的做法也是错误的。共产党员在加入国民党时应保持国民党的国民党性质即事实上的广泛的民主民族革命性质。

中国共产党应反对在国民党内组织所谓国民党左派的各种图谋，因为在国民党内组织这样的派别实际上意味着从组织上准备分裂国民党。在最近一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不仅应反对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的各种倾向，而且还应反对国民党分裂。

在国民党的内部组织工作方面，近期中国共产党的基本任务是：

（1）坚决反对国民党是上层组织的这一现状，实际上只存在联合一小批多少有点经验的政治活动家的国民党委员会，而大批党员甚至在决定党的生活中的基本问题时都不起任何作用。中国共产党应设法在国民党内实行党内民主原则，通过党员大会、党员代表会议等吸收大批普通党员参与解决国民党的主要工作问题，在这些会议上要提出这些问题，并要由国民党委员会定期作工作报告。

（2）中国共产党应采取一切措施使国民党与广大工农群众建

立最密切的联系,首先要依靠这些群众的代表来帮助巩固国民党。七月全会的决议认为,国民党左派(包括整个国民党)应通过组织城市小资产阶级来充实自己,这个看法是完全错误的。为什么只组织城市小资产阶级呢?农民呢?工人阶级呢?根据这一提法得出的印象是,中共中央七月全会正是主张工农不应加入国民党。这当然是完全错误的。国民党只有在工人阶级和农民成为其基本骨干时,才能起到它作为工人阶级、农民、城市革命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战斗革命联盟的历史作用。

(3) 中共中央七月全会关于对国民党的态度的另一个决定也必须予以批评。七月全会决定:“应理解并使国民党左派明了,国民党的组织不能是一个阶级式的集权的政党、有太严格的纪律和章程。现在必须引进许多小资产阶级革命化的群众于国民党,所以党的组织形式,可以通融而扩大些,例如国民党下级党部至少要有政治俱乐部的性质,而不是一个阶级政党的支部”<sup>①</sup>。国民党当然不能具有共产党的内部纪律。但这个决议还是错误的。为什么呢?国民党现在是执政党。国民党领导的广州政府正在为自己的生存同最危险的敌人进行殊死的斗争。要是实际上领导并应该领导这一斗争的国民党没有严格的内部纪律,要是广州政府的国民党员部长认为自己是俱乐部成员,对于他们来说国民党中央的决议是必须执行的,因为国民党不能成为执政党,不能领导广州政府<sup>②</sup>。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党员应该懂得并向国民党员和工农群众解释清楚这一点。

6. 工会工作。党应该根据七月全会的决议,即“共产党不在

---

<sup>①</sup> 《中共中央文件选集》中文版,第2第177—178页。引文与原决议稍有出入——译者。

<sup>②</sup> 原文如此。似应为……决议可以不执行,那么国民党就不能成为执政党,就不能……——译者。

工会中开展十分有力的工作，现在就不能取得扎实的成绩”<sup>①</sup>，千方百计加强在工会中的工作。首先应该加强发展非常工人参加工会的工作，集中力量于大企业和政治上、军事上意义重大的工业部门。其次必须十分重视基层机构的正常工作和组建工会工作。现在工会像国民党一样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上层组织。这是整个工会工作的一个很大的缺点，因为工会与其他无产阶级组织相比更应建立在民主集中制原则之上。

党应该重视没有成立工会的工业部门。党应该主动在那里组建工会，争取从一开始就保证党的领导作用。

最后，关于工会中党团的问题。现在这些党团还处于萌芽状态。必须根据第二次国际组织工作会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千方百计加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工会中的党团的工作。像对待国民党一样，也要提出对全国总工会党团的领导问题，全国总工会至今同党中央同设在一个城市，可是党团同中央的联系至今仍很薄弱。还必须在中央委员会和地区委员会之下成立强有力的工会工作部，在其他各级党委之下成立工会工作委员会。

7. **农村工作。**党第一次认真地对待这项工作。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强调指出，这项工作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来说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这方面有以下一些十分重要的具体的组织任务：（1）组织农会并在其中加强党的影响的工作，（2）在农民组织中建立并加强共产党党团，相应的党委应有步骤地领导这些党团的工作，（3）利用工会会员同未加入工会的同情党的工人的联系来加强党同农村的联系，在农村中传播党的书刊和口号，促进革命农民组织的建立，等等。在这方面尤其要重视利用从罢工企业和倒闭企业返乡的工人。

8. **军事工作。**在目前形势下，中国共产党的军事工作具有重

<sup>①</sup> 《世界革命的道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扩大全会（1926年11月22日—12月16日）速记记录》第2卷第400页。

大意义。但党至今对这项工作未给予应有的重视。在中国共产党的条件下军事工作对于开展农村工作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广州政府军队中的政治工作人员有很多机会接触广大农民群众。党应该十分重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要派遣优秀分子去做这项工作。这项工作形式上应该以国民党的名义去进行，但党应该争取使这项工作实际上完全由党员和最接近党的国民党左派掌握。共产党除了在广州军队中开展政治工作外，应十分重视瓦解敌军的工作和组织工农纠察队的工作。党还应争取在组织广州政府同反革命作斗争的工作中由党员来掌握指挥岗位，中央应格外认真地领导从事这方面工作的同志的活动。

9. **工农青年工作**应引起中国党的高度重视。中共中央和地方组织应给予中国共青团组织及其工作以最大的帮助，通过互派代表以及其他可能的方式来与共青团建立十分密切的联系。

在中国目前的形势下，工农青年是充实革命战士骨干，以及充实中国共产党队伍的最好材料。党对共青团的帮助至今仍很不够，党本可以给予更大的帮助。在这方面必须争取有迅速而彻底的变化。十分需要在共青团各级委员会设相应党委的负责代表，有步骤地有机地参加共青团的工作。

10. **国际联络**。中国共产党中央应全力加强和扩大现有的国际联系，尤其是与东方各民族——菲律宾、印度尼西亚、印度和印度支那等等的联系。这方面的主要具体任务是：(1) 传达中国革命的经验；(2) 尽可能帮助这些国家的革命组织；(3) 在工作中，特别是在瓦解敌人的工作中，利用这些国家的组织的帮助；(4) 利用这些国家的革命组织的帮助在侨居这些国家的中国劳动者中开展工作。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第 16—33 页。

打字稿，副本。

155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赴中国代表团的指示

1927年1月19日于莫斯科

秘密

###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赴中国代表团的指示

1. 代表团去中国的目的是要完成两项任务：

(1) 表示西欧工人对中国劳动群众的同情，宣传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和全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结成联盟的思想。

在中国开展广泛的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的运动；

(2) 从中国返回后，在欧美有关国家掀起支持中国革命、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实行的掠夺政策的广泛运动。

2. 责成代表团不得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发表讲话。代表团每个成员都作为本国工人阶级的代表发表讲话，把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本国政府的压迫政策上，并把这一点与世界帝国主义对其他东方国家的政策和对正面临<sup>①</sup>新的武装干涉威胁的苏联的政策联系起来。

---

<sup>①</sup> 原文如此。



3. 建议代表团在了解中国共产党的工作时不要直接对中国共产党的党组织或党员进行指导和作指示。

4. 代表如未持有本党或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专门委托书, 最好以客人身份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5. 代表团要与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代表<sup>①</sup>和鲍罗廷同志协商它在中国的工作计划和发言性质。

6. 认为代表团首先应访问国民革命政府管辖的以下工人中心: 汉口、汉阳、武昌和广州, 如有可能, 还可以访问孙传芳统治下的上海。

7. 代表团应对帝国主义者设下的各种圈套保持高度的警惕, 不去访问有危险的场所。

8. 代表团选定的路线应避免哈尔滨, 也就是赤塔、伯力、海参崴。应从海参崴乘苏联轮船直接去汉口。

9. 代表团完成使命后无须请示即行返回。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47, 第 1—2 页。

打字稿, 副本, 无签字。

---

<sup>①</sup> Г. Н. 维经斯基。

156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们的指示

1927年1月19日于莫斯科

### 为举行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给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们的指示

(维、罗、多三同志)<sup>①</sup>

1. 建议代表大会日程如下：
  - (1)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的报告(报告人：P. 同志)。
  - (2) 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
  - (3) 组织问题。
  - (4) 关于农民工作。
  - (5) 关于军队工作。
  - (6) 对国民革命政府的态度。
  - (7)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
  - (8) 关于工会工作。

---

<sup>①</sup> Г. Н. 维经斯基、М. Н. 罗易和 Ж. 多里奥。

(9) 关于青年工作。

(10) 关于妇女工作。

2. 一切政治决议都完全应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为依据。

3. 在组织问题上建议遵循同时寄去的《**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组织任务**》的专门信件中所下达的指示。

4. 代表大会上要特别认真讨论具体贯彻执行扩大全会拟定的农民问题纲领的方法问题以及共产党员参加国民革命军的方法问题。

5. 代表大会上要全面讨论共产党员如何能真正加入国民革命政府的问题；要特别有分寸地讨论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和目前不宜加速建立国民党左派的问题，因为这可能导致国民党的实际分裂。

6. 关于青年工作问题，应提出加强在大学生当中的共产主义工作问题。

7. 认为在代表大会上第一次提出妇女工作问题是十分重要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7，第 10 页。

打字稿，副本。

157

## 维经斯基给联共（布）驻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7年1月21日于上海

绝密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俄国代表团<sup>①</sup>

抄送彼得罗夫<sup>②</sup>同志

### 关于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

亲爱的同志们：

在斯大林同志的报告<sup>③</sup>中和全会决议<sup>④</sup>中提出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的问题是完全正确的。但是，我认为有必要陈述我们对实际执行这一决定时所遇到的困难的看法。目前国民政府由三部分组成：（1）一批非军人政治活动家——徐谦、孙科、宋<sup>⑤</sup>、陈友仁，谭延闿将军也在加入他们的行列。（2）蒋介石及其亲密追随者和副手张静江。（3）唐生智。政府中斗争很激烈。蒋介石想控

<sup>①</sup> 1927年3月16日文件副本分送И. В. 斯大林、Н. И. 布哈林、Д. З. 曼努伊尔斯基、Л. М. 加拉罕、К. Е. 伏罗希洛夫和В. М. 莫洛托夫。

<sup>②</sup>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sup>③</sup> 指И. В. 斯大林1926年11月30日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中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

<sup>④</sup> 见本书第71页注<sup>③</sup>。

<sup>⑤</sup> 宋子文。

制整个政府，明显企图改变政府的方针，使之右倾。1月3日于南昌举行的军事会议<sup>①</sup>（我们军事委员会<sup>②</sup>的报告另附）表明，他极其认真地将完全控制国民政府作为自己的近期任务。在实现自己目标的道路上他发现有两个敌人，即共产党和唐生智。他未能将政府迁到他的大本营南昌，这决不意味着他已经明白了自己要的花招的危险性。今天所有英文报纸都刊登了一条轰动一时的消息：蒋介石坚持要政府迁往南昌。报纸从两方面对这条新闻作了评论：蒋介石和其他政府成员正在争斗，国民政府认为它在汉口站不住脚，因此不得不迁往江西。这两种说法都是在为反革命大造声势。由于徐谦、陈友仁和宋的抵制，蒋介石在南昌会议后也未能实现另一个计划：把政府迁往南昌，而外交部、交通部和财政部留在武汉。关于政府迁移问题再次推迟到蒋介石召开专门会议时作决定。据中国《申报》领导机构准确的说法，国民政府虽然尚未迁往南昌，但已处于运动状态。

另一方面，唐生智在同蒋介石争夺军事影响的同时，支持国民政府的其他成员，并在接近共产党人，但他在革命事业中并不是比蒋介石更可靠的因素。政府中非军人成员和谭延闿并不是全国性人物。在政府目前这种状况下，我们确实不认为共产党员有参加政府的可能性。只有在两种情况下我们可以参加：如果我们采取推翻蒋介石的方针，那我们不仅可以不管他对共产党员参加国民政府持何态度，而且相反还要促使他尽快决定自己的立场，并第一个开始同国民政府进行公开的斗争。

但目前应该排除这种情况。蒋介石同国民政府在共产党员参加政府的问题上发生分裂，会使事态严重恶化，因为蒋介石现在是全国性人物，国内反革命势力和帝国主义者都会充分利用这一决裂，革命因而会面临极其严重的威胁。我们能参加政府的另一

①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会议。

② 指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

种情况是：用一个跟我们站在一起的全国性人物与蒋介石相抗衡，这个人物就是汪精卫。因此，在弄清汪精卫返回的可能性之前，这第二种情况我们也不能加以利用。一旦汪精卫回来，蒋介石很可能不去与国民政府作斗争，而是退却，那样就能在我们的积极参与下大大加强政府，以致再过一段时间蒋介石已不能冒彻底毁灭的危险而去同国民政府决裂。何况可能出现这样的结局：蒋介石不得不去夺取浙江，然后也许还要去夺取江苏，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得把他同汪精卫的斗争推迟到这些战役结束后进行。

因此，我们在同中央讨论了问题后得出结论：我们能否参加国民政府这取决于领导权掌握在国民党左派手中还是蒋介石手中，在前一种情况下我们必须参加，在后一种情况下，参加有危险，可能带来相反的结果。至于谁能代表我们参加政府，我们认为谭平山是合适的人选。

我们在收到决议前就决定，我们应争取参加各省政府。但目前只有湖南省有这样的可能性。广州掌权的是李济深和蒋介石。那里不会让我们参加政府。江西也是如此，蒋介石正在那里。我们在湖南取得经验后立即争取在湖北参加政府。县级政府我们一律参加，全力争取有这个可能性。更下一级，在村自治机构里我们当然力争掌权，村政权应该在农会领导下建立起来。顺便提一下，唐生智表示同意成立村自治机构、县自治机构并在湖南召开全省会议。我们已致电鲍罗廷，表示完全同意这一计划，并特别强调指出在农会领导下建立村自治机构的重大意义。

### 关于我们对军队的影响

关于我们对军队的影响问题理所当然地在决议中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党在这个问题上的基本任务是，第一，掌握中下级指挥职务。目前我们在各部队中有近 500 名同志担任下级指挥员和几十名同志担任中级指挥员。不增加我们在部队中的指挥员数量，我

们就不能利用近两年来我们在军队中进行的大量政治工作的成果，也就不能使军队接近工农。第二，我们应当更明确地提出我们在军队中的党的工作。迄今为止我们在军队中没有建立共产党支部。只有由党中央特派员或地方组织领导的单独共产党员在进行工作。近来在湖北我们在军队中建立了军事组织，这些组织继续进行秘密工作并接受军事委员会分配的任务。现在我们决定转为通过军队中的共产党支部来开展工作，采取吸收下级军官和士兵入党的方针。这项工作在各部队中当然应该秘密进行。第三，我们着手利用各种机会通过工会招募工人入伍，通过农会招募农民入伍。中央军事委员会在近期将详细研究这些问题，我们将积极地实施这些任务。为了使军队和工农接近，我们将开始采取友好交往的办法，具体是邀请士兵和军官代表参加工农大会，在城乡居民中组织支援军队的活动。

### 关于武装工人

关于武装城市工人的问题情况很不好，因为没有武器，也无从获得武器。汉口的纠察队（名称不确切，更应称之为近卫军）几乎没有武装，其次，纠察队不是由工人，而是由小业主和手工业工人组成。我们应力争从最革命的产业工人当中组织真正的工人纠察队。至于汉口现在的纠察队，可以把它们当作革命的小资产阶级同它们合作，但不能认为它们可以取代真正的工人纠察队。在即将举行的劳工联合会全会上我们将通过决议，在此决议中工人们将请求政府给以武装以保卫革命和国民政府。几乎没有希望从政府手中得到武器，但这一决议的意义在于我们使“武装工人”的口号合法化并再一次使之家喻户晓。同时还规定各级党组织应通过各种方法获取武器，建立起真正的工人纠察队，纠察队员要根据党和工会机构的推荐来进行征召。

## 关于党代表大会

中央委员会拟于3月15日在汉口或长沙举行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100多人为有表决权的正式代表，近50人为列席代表。代表大会将半公开举行。目前党员人数已达25000人。因此，每300名党员选出一名代表。代表大会的日程如下：（1）中央政治报告，报告中包括国民党问题和党对革命政权的态度问题。（2）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的报告。（3）中央关于组织问题的报告。（4）工人运动。（5）农民运动。（6）关于党纲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将作为大会选出的党纲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方针，以便在6个月内向共产国际提出中国共产党纲领草案）。（7）共青团中央的报告。代表大会将设立以下委员会：（1）政治委员会，以起草关于中央报告的决议，（2）土地委员会，（3）工会工作委员会，（4）军事委员会，其工作将由新一届中央委员会批准。此外，还将成立妇女委员会，该委员会将向代表大会作报告。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也将作情况通报。

## 广州形势

广州形势现在相当严重。李济深在国民政府成员离开后，一人独掌大权，采取了明显右倾的方针。这主要表现为，他公开对抗农民运动，从民团中招募省属部队，其次，他实际上禁止罢工运动。由于我们的同志在对待国民党左派态度上犯了某些错误，李济深才便于与工农运动作斗争。另一方面，由于英帝国主义者与广州省政府调情，更助长了李济深反对工农的政策。你们可能有广州来电<sup>①</sup>的副本并了解国民党省代表会议的详细情况和省委的

<sup>①</sup> 电报没有找到。



选举结果<sup>①</sup>。我们同中央详细讨论了广州问题，给广州地区委员会下达了指示，现在执行以下策略：(1) 在支持汉口的旗帜下开展规模巨大的反英运动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与国民党左派接近，把广大群众吸引到这一运动中来。(2) 千方百计反对对工人的进攻。在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在城市里尽量向国民党左派作出让步，目的是接近他们并共同反对右派。(3) 在农村中不仅要自卫，而且要转入进攻，因为由民团建立的省属部队将是一大危险。(4) 积极进行意识形态斗争，反对国民党左派的阶级斗争有害等理论。

### 关于领导

我在前几封信中两次提出加强对我们在中国的工作的领导问题。我没有收到对此的答复，以为全会<sup>②</sup>之后这个问题终将获得具体的解决。遗憾的是，迄今为止没有收到关于这个问题的任何消息。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请注意加强在中国的领导工作的必要性。如果不能派来一位可统管我们在中国的一切工作并是我党政治局有威望的代表这样的杰出人物，那么至少必须加强现在在中国工作的人员组成。我听说，斯藤同志在帮助东方部工作。我以为他来这里会带来很大好处。需要把斯藤同志和具有同样地位、对土地问题方面的工作和中央农民委员会的实际领导工作有理论素养的另一位同志派到这里来。必须让几位负责工作人员就地实际了解中国的情况并在这里与中共中央一起工作。为一批领导同志找到相应的形式并非难事。可以组成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的三人组或者派出一位代表和两位助手，这是次要问题。如果这里有几位负责工作人员，那么除了发去材料和电报外，还可以通过个人报告每月二至三次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情况。我这里

<sup>①</sup> 详见《广东政治形势（12月—2月通讯）》。全宗514，目录1，卷宗244，第319—323页。

<sup>②</sup>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说的不仅是我的意见，也是中共中央书记<sup>①</sup>的意见。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我们日前才收到。现在正在译成中文。过几天中央委员会要讨论。我们力争使决议的分析部分真正成为党员骨干的财富。但首先要使中央委员会正确理解这一决议，完全接受决议的观点。至于决议的策略部分和组织部分，其贯彻执行将取决于党所拥有的可能性。不应忘记，我们党的骨干还非常年轻。党在一年半到两年以前才开始有广泛的政治生活。这期间党大约壮大了10倍。没有足够的力量用来改造最近几个月涌入党内的群众。但全党工作积极，节奏紧张而迅速。可以认为，我们不仅会成长壮大，而且会取得广泛的发展并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所制定的基本原则开展我们的工作。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维经斯基

全宗508，目录2，卷宗11，第49—53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

<sup>①</sup> 陈独秀。

158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1号(特字第61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1月27日于莫斯科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4] ——给鲍罗廷和加伦<sup>①</sup>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我们获悉加伦与您之间产生了误解和摩擦。中央认为你们绝对有必要共同工作，希望你们考虑身负的责任，达成谅解并合作共事。请你们二位立即报告你们认为什么样的相互关系规范能保证正常的合作共事。一旦出现分歧，请准确报告分歧的实质和你们各自认为必须有的提法。”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53 页。

<sup>①</sup> B. K. 布留赫尔。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59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 会议第5号记录<sup>①</sup> (摘 录)

1927年1月29日于莫斯科

出席：彼得罗夫、赖特<sup>②</sup>、瓦西里耶夫、奥尔洛夫、片山潜、谢马温、卡斯帕罗娃、富明泰、舒米亚茨基、拉菲斯、米夫同志。

听取：1. 关于内蒙的报告（报告人：富明泰同志）。

决定：1. 选举赖特、鲍里索夫和舒米亚茨基同志组成委员会起草决议。由赖特同志负责。

听取：2. 关于对农民国际中国农民分部的领导问题（报告人：奥尔洛夫同志）。

决定：2. 不反对吸收邵力子同志在共产党员同志的监督和领导下参加农民国际的工作。

责成农民国际再次讨论使用邵力子的具体形式问题，应注意到远东书记处中交换的意见 [……]<sup>③</sup>

听取：5. 关于中山大学的工作（报告人：米夫同志）。

决定：5. 报告和建议交远东书记处下次会议讨论。

①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

② 分别为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 В. И. 索洛维约夫。

③ 以下删去关于印度和朝鲜大学生问题的第三和第四项。

主席 彼得罗夫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87, 第 35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160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 会议记录 (摘 录)

不晚于 1927 年 2 月 4 日<sup>①</sup> 于莫斯科

秘密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 会议摘要

听取: 4. [3] 关于邵力子和国民党委员会问题。

决定: 4. [3] 请政治局书记处批准由库西宁、彼得罗夫<sup>②</sup>、奥尔洛夫、赖特<sup>③</sup>、梅尔菲、蔡和森和邵力子组成的国民党问题常设会议。

核对无误:

---

<sup>①</sup> 日期是根据一位未查明身份的人写给 M. A. 海默的便条确定的, 便条说: “海默同志。请将此摘要交政治局书记处今天的会议批准。1927 年 2 月 4 日。” 签字辨认不清。

<sup>②</sup>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sup>③</sup> В. И. 索洛维约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87，第 38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161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4 号（特字第 63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2 月 5 日于莫斯科

听取：10. ——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10. —— [1] 认为有必要替换已在蒙古任职期满（两年）的工作人员和不适合在该国工作的人员。考虑到今年调换 43 名工作人员要一次支出 5 万多卢布，这对蒙古政府来说是力不胜任的，责成中国委员会提出精确预算，拨给此项工作所需资金。

[2] 认为国民革命军代表团赴莫斯科采购军用物资最好推迟一个月。

[3] 认为有必要再招收 10 名黄埔军校毕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入军事学院学习。如招收不到黄埔军校毕业生，可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或中山大学中招收。

[4] 认为最好派米夫同志和中山大学的 2 至 3 名中国人去中国组织和指导政治学校的工作。此问题由彼得罗夫<sup>①</sup> 同志与中共

---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中央商定。

[5] 在收到鲍罗廷同志答复之前，让由国民革命军政治部主任<sup>①</sup>派往德国的两位代表<sup>②</sup>暂留莫斯科。询问鲍罗廷同志，这两位代表是否确实由国民革命军派遣，他是否支持他们出差。

[6]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鉴于英国人尖锐地提出了俄国同志在华工作问题，请您采取措施防止中国人过多渲染您在广州的活动。”

[7] 请注意，加拉罕同志从未与我驻华工作人员和代表进行过任何（公开的和秘密的）署名通信。

[8] 认为有必要从法律上确定我们在华工作人员的地位，以防止有人利用他们的在华逗留和活动来反对苏联。责成李维诺夫、加拉罕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向下次政治局会议提出有关的决议草案。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彼得罗夫同志—— [4]；

莫斯克文同志—— [4]；

李维诺夫同志—— [8]。

## 1927年2月4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4. ——彼得罗夫同志的建议。

决定：24. ——为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拨款 9000 卢

① 邓演达。

② 指何人，不详。

布<sup>①</sup>。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布留赫尔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56—57、5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62

## 纳索诺夫给青年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 年 2 月 5 日于上海

伙伴们，你们好！

我先得为这封信写得简短表示歉意，因为我刚才重打了关于上海事件的信<sup>②</sup>，我想你们会弄清楚这一事件的。我先想提一下那份打听“查理<sup>③</sup>在哪里”的电报，由于不知道是谁规定的，而且出于习惯至今奉若神明的制度，我在两三天前才偶然得知有这份电报。瞧，我们的情报工作是与有无情绪和你在某些人眼里级别

---

①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

② 信没有找到。

③ H. M. 纳索诺夫。



的大小有关系的，因此我不知道有电报，也不知道是否发过告知我抵达的电报。如果你们为我担心过，那我十分感谢，但是如果你们以为我决定留在海参崴一段时间，那你们应为料想自己的代表会干出这种事来而感到羞耻。简单地说：我1日18日到达上海，本应17日到达，但由于遇到暴风雨而迟到了一昼夜。我在海参崴呆了六天七夜。

关于共青团我暂时没有多少东西可谈。青年共产国际的决议，至少是这一决议的草案<sup>①</sup>，同志们都同意（我指的是在上海的同志）。我们的中央委员会和上海委员会<sup>②</sup>与党不同，坚决赞成共产国际的决议<sup>③</sup>，江苏省和浙江省的共青团代表会议也是如此。我们的中央委员会首先发言。我以为可以在共产国际和青年共产国际决议的基础上来组织整个共青团，而且要比党快得多。如果根据我们在上海的积极分子的情绪来判断，那么可以说，得到的印象是很好的（他们确实希望改变方针）。中央迁往汉口的实际问题尚未解决，这使中国的领导人感到为难。现在共青团的报刊正在讨论青年共产国际提出的问题。

我想向你们谈三个新问题，我希望你们能认真加以讨论并认真对待我的建议，因为一年前有许多问题（这是我提出的一般政治问题，而不是共青团的问题）你们没有充分加以讨论，也未给予支持，但我坚信，我还是对的。

**关于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党已成长为一支巨大的力量，就其作用而言它已不再是小组，虽然仍保持着小组的关系。因此，党执行正确的政策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而现在一批有明显机会主义倾向的同志在党的领导机构中影响十分强大。彼得罗夫<sup>④</sup>同志

---

① 指《关于共青团在国民党中的任务和它与青年部的关系的决议草案》（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226，第17—20页）。

② 指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上海委员会。

③ 见本书第71页注③。

④ 彭述之。

表现出的这种倾向格外明显。这种倾向暂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思想体系，也没有固定在某个具体人身上，但这种倾向的表现可以在许多组织的活动中看出。在执行错误政策的情况下，这种倾向就会稳定下来，因为它的基本生活环境是广大的革命小资产阶级群众。这一倾向的主要过错是：1. 认为党在过去的政策完全正确，只是有些小错误（即在农民问题、工人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对军队和政权的态度问题上没有错误，而你们是知道这些错误的实质的）。不愿承认这些错误并不是出于自尊心，而是由于不懂得在这些问题上必须采取一种真正新的方针。

2. 彼得罗夫说：“没有民族资产阶级，只有民族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我们在争夺领导权斗争中的主要竞争者是买办阶级。买办阶级决不能领导农民”（也就是说工人阶级实际上已经在领导农民）。而在实践中：向民族资产阶级看齐（其原因我在下面讲），害怕大胆支持手工业工人的斗争，因为据说这一斗争会导致城市出卖的物品价格上涨并引起农民的不满。意思是说，城市，这就是同农民结盟并领导农民的工人阶级。这样说很可笑。工人阶级还不是领导者，还不是城市的主人，还没有领导农民，还没有掌握国家机器。光是这个问题就向你们说明了许多东西。接下来的是一连串其他问题，如：“人民不想要政权”，“应当避免武装工人”，“应当避免农民斗争”，“应当等待小资产阶级”，等等。请看一下我们的材料。依我看，这个机会主义的根子在于：现在我们大家都承认城市小资产阶级（不是手工业工人，而是小资产阶级，小店主和小作坊主）的某种领导权。国民政府、国民党和（令人奇怪的是）甚至我们党的政策都是以他们的要求纲领为基础制定的。然而现在是该改变这些条件的时候了。实行最适合于城市小资产阶级的纲领，是因为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相互作出了让步（当然不是自觉作出的，而是由于已有的历史条件促成的），大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都把城市小业主的纲领当作中间的纲领。关于这个

话题我可以举出很多事实。机会主义倾向正是靠这个阶层生存的。小业主认为根本没有大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尽管他们在行动上竭力奉承富裕殷实的业主,他们认为将要进行无产阶级革命的工人阶级还不够强大,而当代工人阶级也是一样。由于小资产阶级实际上是国民运动的领导者,因此小业主以为,全体人民都跟着他们走,他们符合农民和工人的需要。不需要为他们提出新的要求。

这就是我们党内一部分人的机会主义实质。我请大家再不要把中国党和共青团看成是没有意见和倾向斗争的党。这样的斗争是有的,其中最危险的倾向是机会主义倾向,实际上就是左派(尽管他们过去有时以左的面目出现,然而站在宗派主义的、小组组织的立场上)。在制定你们的和共产国际的指示时,务请注意这一点。

**关于小资产阶级。**我不是无缘无故地对你们说,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是以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为基础制定的。这一切都是不成文的历史性妥协的结果,结果是大家都重视这个小业主,要是有什么使他们感到不安,那么这就会使大家都不安起来,国民党也好,国民政府也好,共产党也好,都是如此。小业主成了中国革命的中心人物。可是现在形势完全不同了,他们已经不可能是也将不再是这样的人物了。大家都明白,中心人物是工人、农民、手工业者,我们应该把城市小业主和这个联盟连起来。但他们不应是领导者,也就是说我们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不应服从于他们的利益。换句话说,现在应该做的不是证明要不要农民斗争、工人斗争的问题,而是要对小资产阶级作出评价。大家都会同意应该发展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但如果仍坚持原来的依靠小资产阶级的方针,那么这种同意不会带来多少好处。**我以为,对小资产阶级的明确政策是解决一切问题的关键。**大家都明白这个意思。我们理所当然地应该把小资产阶级也纳入国民运动,

但应该改变形式。

目前，一切革命组织大都通过小商贩行会和类似的组织与小资产阶级取得组织上的联系。小商贩行会及其他组织联合的是小店主和小作坊主，而不是手工业工人。手工业工人在革命运动中由他们的业主作代表。业主则从殷实的、富裕的资产阶级那里，也就是往往从大资产阶级那里（尽管人们认为没有大资产阶级）选出自己的领袖。当然，这样的领袖可以代表作为私有者的小资产阶级的利益，但不能代表手工业者以至一切从属于这个业主的劳动者。一般来说，小资产阶级的领袖都摇摆不定或听命于大资产阶级，而汪精卫是这样类型的领袖，他想执行“独立于”大资产阶级的“政策”，但又不同共产党人保持密切联系（共产党人执行的也是错误的政策）。汪精卫的软弱和怯懦大家是知道的，但他是一个象征，只要国民党左派认为让汪精卫回来是自己的主要口号，那就意味着国民党左派是徒劳地尝试建设一个独立的党和寻求自己独立的领袖。而他们的领袖只能来自工人阶级，或者大资产阶级。

这就会出现许多策略问题，比如如何同占城市人口绝大多数的手工业者保持联系，当小资产阶级动摇时对它采取怎样的策略，是等待他们还是拉他们一把。但大家要记住，正确提出关于小资产阶级的的问题，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不是因为小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比重，而是因为小资产阶级是大家都合意的某种中心，现在应该把这个中心从这个业主身上移开。

**关于苏维埃。**苏维埃组织对此作了回答。我在一年前给你们的信中写道，必须有一个能够成为政权机构的组织，我当时还没有像1927年2月那样的足够勇气提出建立苏维埃制度的思想，尽管去年我也引用了几句列宁论苏维埃的话。我以为，苏维埃是从组织上巩固无产阶级领导权及无产阶级与手工业者和一切城市劳动者以及小资产阶级的联盟的一种形式。苏维埃应该建立在较广

泛的基础上，但这个制度应该从我们的苏维埃那里搬来。苏维埃能带来十分巨大的好处，组织苏维埃就能把所有这些成分都联系在一个国家联盟里，并能控制军队。关于这一点，我不想多说（请看一下列宁的《布尔什维克能保持国家政权吗？》<sup>①</sup>、他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和根据他的报告通过的提纲<sup>②</sup>）。

这就是我想提请大家讨论的所有问题。敬礼。苏维埃一定能建立起来。

#### 查 理

附言：格里高里·维<sup>③</sup>不会反对这一倾向，因为他本人就是“机会主义者”（没有观点的人），要在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中教育全党，首先就得把他撤了。

全宗 533，目录 4，卷宗 120，第 47—51 页。

打字稿，原件，附言和签字都是亲笔。

① 见《列宁全集》中文第 2 版第 32 卷第 282—331 页。

② 不清楚作者指列宁的哪个讲话和提纲。列宁在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上的几个讲话以及代表大会的几个决议都涉及苏维埃问题。

③ Г. Н. 维经斯基。

163

##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和联共（布）中央的信

1927年2月9日于莫斯科

###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联共中央<sup>①</sup>

亲爱的同志们：

**鲍罗廷**同志自担任中国国民党及国民政府高等顾问以来，对于中国革命事业，殷勤指导，党与政府各重要同志，无不表示钦佩铭感之意，而近来中国革命势力之积极发展，尤咸认为得鲍同志赞助之力，实非浅鲜。

兹闻鲍同志在中国服务多时，例得休假若干日，将回苏俄暂资休养。查鲍同志勤劳备至，在情理上，不应阻止其休假；惟此时为中国革命重要关头，帝国主义者正挟全力以挑衅，北方军阀亦尚有最顽强者未能打倒；而党与政府领导群众之工作，尤无一不关重要。一切对外对内政策之决定，皆亟待有深悉中国情形，富有革命之理论与经验如鲍同志者，详细指导。为中国革命前途计，只有请鲍同志暂忍劳苦，所有回俄休养之举，俟革命有相当之成功，再行计议。

---

<sup>①</sup> 信上有彼得罗夫（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的批示：“抄送鲍罗廷和格 [维经斯基]。彼得罗夫，1927年2月25日。”还有一个批注：“已送格里高里。1927年3月1日。”

为此函请各同志对于鲍同志，尽力慰勉，留其继续在华工作，中国幸甚，革命幸甚。敬致

革命的敬礼

邵力子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12，第 8 页及其背面。

中文手写稿，亲笔签字。

164

## 索洛维约夫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sup>①</sup>

1927 年 2 月 9 日于莫斯科

### 致彼得罗夫同志<sup>②</sup>

今天邵力子同志在同我谈话时说，昨天蒙古驻莫斯科全权代表<sup>③</sup>去见他，代表蒙古政府提出以下建议：

1. 国民政府<sup>④</sup>和蒙古政府相互正式承认。
2. 发表国民党和蒙古人民革命党关于民族运动的任务、相互支援以及互换常驻代表的共同宣言。
3. 签署关于一旦遭到第三方进攻时互相保卫和支援的政治军事条约。

① 文件上有批语：“已送加拉罕、伏罗希洛夫”。

②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③ Б. 博扬丘尔甘。

④ 指武汉国民政府。

邵力子同志答应就这些问题征询国民党中央的意见，他认为关于互换代表的问题显然不会有异议。

赖 特<sup>①</sup>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7，第 7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165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5 号（特字第 64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2 月 10 日于莫斯科

### 1927 年 2 月 8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7. ——关于加拉罕同志的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7. ——向加拉罕同志提出警告，因为他无视中央政治局的禁令<sup>②</sup>，继续在发往中国的电报上签署自己的名字。

抄送：

加拉罕同志。

---

① B. H. 索洛维约夫。

② 见第 161 号文件。



## 1927年2月9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16. ——彼得罗夫<sup>①</sup>同志的建议。

决定：16. ——采纳彼得罗夫同志的建议：

责成苏联商船队派“因季吉尔卡”号去广州，费用以根据今年2月4日政治局决定拨出的9000卢布为限<sup>②</sup>。

抄送：

彼得罗夫同志，

伊万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61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指派遣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去广州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一事。

166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会议第9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2月11日于莫斯科

听取：9. 东方书记处<sup>①</sup>关于成立国民党工作常设委员会的建议。

决定：9. 不采纳这个建议。问题应由东方书记处研究。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495，目录3，卷宗9，第1—2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

<sup>①</sup>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书记处（见第160号文件）。

167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7 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2月17日于莫斯科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加里宁、莫洛托夫、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德烈耶夫、米高扬、彼得罗夫斯基、乌格拉诺夫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阿尔秋欣娜、多加多夫、泽连斯基、卡巴科夫、科马罗夫、科肖尔、库比雅克、列普谢、奥拉赫拉什维里、拉科夫斯基、鲁希莫维奇、斯米尔诺夫、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苏利莫夫、托洛孔采夫、托洛茨基、瞿鲁巴、丘多夫、施瓦茨、什维尔尼克、施密特同志。

候补中央委员：格伊、戈洛谢金、日丹诺夫、伊万诺夫、伊克拉莫夫、加明斯基、基谢廖夫、克里尼茨基、卢卡申、梅利尼昌斯基、穆萨别科夫、斯克雷普尼克、瑟尔佐夫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古谢夫、古比雪夫、奥尔忠尼启译、索尔茨、丘茨卡耶夫、什基里亚托夫、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13. ——关于新疆问题（报告人：泽连斯基、加拉罕同

志)。

决定：13. —— [1] 未与联共（布）中央中亚局具体商定人选，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不得派出维吾尔族工作人员。

[2] 建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采取措施取缔武器交易并防止维吾尔族武装人员穿越我国国界进入新疆。

[3] 建议中亚局和哈萨克边区党委重新审查维吾尔族分部的组织人员构成，不允许参与新疆维吾尔运动的人员从事这项工作。

[4] 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吸收中亚团体参与制定活跃和加强苏联与新疆的经济联系的措施。

[5] 认为促使新疆或该省的一部分脱离中国的任何活动或鼓动都是极为有害的和不能容许的。

听取：17. ——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7. —— 决定——列入特别文件。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20，第 1、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68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87号(特字第65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2月17日于莫斯科

听取：17.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7. —— [1] 根据鲍罗廷同志近来关于他同蒋介石发生分歧的报告(2月8日第19号专电，2月7日第10号专电，2月10日第24—25号专电)<sup>①</sup>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对蒋介石的方针是正确的。要采取措施，第一，不要突出鲍罗廷，“免得人们认为这场冲突是鲍罗廷和蒋介石之间为争夺影响而进行的斗争；第二，不要把事态发展到与蒋介石决裂的地步，以蒋介石完全服从国民政府为限。”

[2] 责成中国委员会和布哈林同志根据已经了解到的中国总的形势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改变的问题向政治局提出实际建议草案。

[3] 给加伦<sup>②</sup> 发去如下电报：

“鲍罗廷同志近来关于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在国民政府所在地问题上的冲突的报告没有谈到您的观点。请告您对冲突的态

<sup>①</sup> 电报没有找到。

<sup>②</sup> B. K. 布留赫尔。

度。”

[4] 鉴于收到关于南方人作战计划（主力进攻上海和沿海地区）的报告（2月11日隆格瓦第58—61号专电）和鲍罗廷认为主攻方向是河南的电报（2月13日第23—24号专电）<sup>①</sup>，给加伦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据隆格瓦报告称，蒋介石的作战计划规定南方人的主力进攻浙江和上海。鲍罗廷认为这样做是错误的，他建议重视河南方向，据他说，河南将决定北方战局的成败。速告您的观点。”

[5] 给达夫谦同志发去如下电报：

“最高领导机构坚决要求采取一切措施敦促汪精卫尽快来莫斯科，以便共同讨论有关中国事务的问题。速告汪精卫动身时间。”

[6] 叶夫根尼·陈<sup>②</sup> 询问（见鲍罗廷2月13日第26号专电）<sup>③</sup>，如果英国继续以同苏联决裂相威胁，他能为外交人民委员部提供什么帮助，对此可向鲍罗廷同志发去如下电报作复：

“答复您第26号电（2月13日专电），最好转告叶夫根尼·陈：以公开驳斥英国报刊谣言为宜，英国报刊称国民政府和英国的冲突似乎是苏联施压造成的，可以在报刊上声明，中国是独立国家，执行自己独立的政策，任何谣言都不能削弱中苏友谊，英国推行的干涉和恐吓政策必将遭到彻底失败。”

[7] 鉴于收到关于国民军物质状况极其困难的报告，考虑到国民军在完成未来作战任务时的作用，建议鲍罗廷同志和加伦同志提请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注意向冯<sup>④</sup> 提供巨大物质支援的必要性。

[8] 认为可以接收165名中国军官入苏联军事学校（其中10名中国指挥员入工农红军军事学院），条件是由国民政府支付他们

①③ 电报没有找到。

② 陈友仁。

④ 冯玉祥。

学习和生活的全部费用。

(2) 中国委员会保证军事学院大部分空缺提供给中共党员<sup>①</sup>。

(3) 责成中国委员会采取措施加大共产党员在接收的 165 名中国军官中的比例。

[9] 认为有必要从人民委员会的后备金中拨出 43785 卢布用于调换驻蒙教官的费用。

[10] 批准中国委员会关于派遣中山大学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 11 名同志(包括米夫同志,其中有 4 个中国人)去中国组织并指导政治学校的工作,费用由上述两个学校负担。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布哈林同志—— [2];

戈尔布诺夫同志—— [9];

莫斯克文同志—— [10]。

## 1927 年 2 月 17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 46. —— **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6—1927 年度预算** (报告人: 科肖尔、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决定: 46. —— **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 1926—1927 年度预算** 为 1305755 卢布。

抄送:

布留汉诺夫。

<sup>①</sup> 原文如此,缺 (1) 项。

皮亚特尼茨基、伊万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63—6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69

##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中共中央 执行委员会的信

1927 年 2 月 17 日于莫斯科

绝密

### 致中共中央<sup>①</sup>

谭平山同志多次提出关于派遣一批有党的教育工作和党的组织工作经验的工作人员赴中国的问题。

现由米夫同志带领一批宣传工作者前来，归中央委员会调遣。

这批同志是：米夫、彼得罗相、贝尔曼、普拉格尔、戈卢别夫<sup>②</sup>、萨戈莫尼扬、克柳切夫斯基<sup>③</sup>、多格马罗夫、热尔托夫<sup>④</sup>、福

---

① 信末有批注：“2月17日政治局会议批准。已阅并执行。”（以下为信中提到的一批宣传工作者的亲笔签名）。

② 陈绍禹（王明）。

③ 潘家宸。

④ 叶俊中（Е ЦЗОН ЧЖУН）。



格尔<sup>①</sup>、维经斯基<sup>②</sup>。

这些同志去中国工作为期约一年。

这些同志的任务是开办和管理党校及临时训练班，在有关大学开设社会学课程，对党员积极分子进行教育，加强国民革命军、工会中的政治教育工作，等等。

此外，如你们能利用前来的同志详细研究党的机关的各个环节、党与国民党的相互关系、共产党员在军队中的工作、党组织领导共青团组织的方法等，那将是极为有益的。

这些同志决不会直接领导党组织的工作，他们提出的建议、意见和看法都供中共中央决定。同时，他们收集和整理的材料以及有关结论都应定期呈送中共中央、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机构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审议。

这批同志的组成不要作变动，尤其是中国同志应专门为执行领导人交给的任务而工作，在工作期满后应与全体同志一起返回莫斯科。

彼得罗夫<sup>③</sup>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7，第 94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刘国璋。

② 维经斯基的名字是手写的。

③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170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88 号（特字第 66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2 月 24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2 月 17 日会议第 87 号记录，决定：17），（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1. —— [1] 鉴于伏罗希洛夫同志患病，关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再议。

[2] 拨给在上海的同志 10 万卢布，指示他们非到万不得已不得使用这笔款项。

[3] 考虑到国民军在河南积极作战时的影响，指示加伦<sup>①</sup>同志必须采取措施从汉口与国民军取得联系。

询问坎格拉里同志，通过贺兰山—宁夏建立的联系是否可靠。应告知桑古尔斯基同志，必须在宁夏或其他地点建立电台，以便通过内蒙进行联系。

[4] 询问鲍罗廷和格里高里<sup>②</sup>同志：与在河南同奉军作战的“红枪会”是否有联系，为保证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对河南爆发的农民战争的领导权采取了哪些措施。

---

① В. И. 布留赫尔。

② Г. Н. 维经斯基。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67、6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71

##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7 年 2 月 25 日于上海

### 致米哈伊尔<sup>①</sup> 同志

我写此信时上海可能正在成为全世界瞩目的地方。因此不必奇怪我在信中赋予它极大的意义。

事态发展如下：2 月 17 至 18 日得知，孙传芳遭到失败，他的部分军队转到南方人方面，南方人攻占了杭州、嘉兴和宁波。所有报纸无一例外都说孙传芳危在旦夕，离上海 20 到 30 俄里的广州部队很快就会到来。

还有一个情况：英国人派了约 4000 名士兵进入上海，增援已

---

① Н. А. 皮亚特尼茨基。

在城中的部队。这一消息一经传出，工人当中明显出现骚动。起先打算宣布抗议帝国主义的一小时罢工。但2月19日城里的邮局、电车、大商店突然罢工罢市。据我们获得的消息称是工会积极分子下达了罢工令。前一天（即根本不知道会发生罢工的时候）我、切尔尼亚克和查理<sup>①</sup> 还就运动问题与地方同志谈过，并讨论了鉴于事态的发展是否有必要提出关于建立由工厂工人、企业职员、大学生、小商人及其他居民阶层直接选举产生的人民革命政权的问题。这一建议的目的是：（1）通过对这次选举的广泛鼓动可以调动最广大劳动群众的积极性；（2）通过这个办法可以在中国最大工业城市中把中国的革命运动引上新的道路，即不是几个领袖和上层阶层同将军们搞阴谋勾当，而是实际提出关于工人、农民、手工业者和小资产阶级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下实行民主专政并实现工人阶级的领导权的问题。国民政府内部的形势对此十分有利。

现在国民政府正在同蒋介石进行十分顽强的斗争，蒋介石要求把政府从汉口迁至南昌（总司令大本营）。蒋介石现在正在失去影响。他的活动令人难以捉摸。一方面，他似乎在与国民政府接近，而另一方面，他竭力与国民党右派和买办结成联盟，甚至还公开同日本司令部进行谈判（他的代表戴季陶在日本），而且还通过日本人同张作霖谈判划分势力范围问题。这里人们坚持说，这样的协议已经达成，拟以长江为界。长江以北归张作霖，长江以南归蒋介石。

蒋介石实行反对工农的反动政策，而他的走卒李济深，广东的实际主人，已经在镇压工农。

国民党最近一次全会<sup>②</sup> 通过了非常左的决议，要求向工农作

<sup>①</sup> 分别为：T. Г. 曼达良和 H. M. 纳索诺夫。

<sup>②</sup> 指10月15至22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地方组织代表联席会议。

出实际的让步，取消军事管制，加强国民党政权，取缔地方政权（国民党右派、豪绅们的政权）。但这一政策执行得很不坚决。由于国民政府和蒋介石的对抗，国民政府在寻求支持，乐意承认上海的地方政权即人民代表会议（这是这一政权拟议中的名称）。

共产党中央同意这个想法。但根据上海工会理事会的决定突然爆发了罢工。罢工从第一天起就具有总罢工的形式。第一天邮局、电车、公共汽车就停止工作，港口的所有轮船（中国的轮船和外国人的轮船）都罢工了，港口的搬运工和工厂也罢工了，但在总罢工爆发的同时，当地督军李宝璋开始实行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恢复了中国古代的司法方式，即由一个法官组成的“军事法庭”沿街巡行，前面走着一个拿着写满法律条文牌子的人。法官后面跟着两个手执利斧的人，这个流动法庭可以逮捕任何一个人，只要怀疑这个人或从他身上找到传单等，那就就地砍下他的脑袋，为了吓唬其他人还把他的脑袋放在笼子中挂起来示众。

第一天用这种办法就处死了近30人，各个广场都挂出了被砍下的脑袋。对这种恐怖活动人们作出反应，纷纷叫喊要举行武装起义。我们大家都明白，在目前形势下总罢工（纯政治性罢工）不能不转变为武装起义。上海有7艘属于广西舰队的炮艇。一位共产党员是其中一艘炮艇的〔艇长〕或艇长助理。中央通过其军事组织与舰队保持联系，星期二下午6时炮艇向兵工厂和城市发射了近30发炮弹。城里一片恐慌。但遗憾的是，工人群众中的热情与其组织程度一点不相称。兵工厂发出了投降的信号，但没有人去占领它。一度曾以为一切全完了，但看来革命不仅有失败，而且也有幸运。中央下达了停止罢工令。根据中央确切的指示罢工停止了。舰队未被解除武装，停泊在港湾里，谁也没有去动它。中央号召群众准备新的发动。你们在远方也许以为这一切很荒唐，难以令人置信，但就是这样。我一点也没有夸张。

如果说群众表现得确实很革命，那么关于领导人就不能这样

说了。领导人没有方针。起先他们怎么也不明白，在类似的形势下总罢工就是武装起义，他们动摇不定，不由得使人想起我们孟什维克派。

他们的主要错误是不顾一切试图跟随小资产阶级屁股后面转，更确切地说是跟随大资产阶级屁股后面转。

他们从一开始就等待小商人关闭他们的店铺，而小商人则困惑不解地问道：“你们什么时候开始行动？”当事态发展迫使他们建立革命军事委员会时，他们不是按同我们谈判时所同意的办法去做，即不是去吸引群众，而光是去和虞和德、钮将军<sup>①</sup>等人去谈判，完全无视群众。他们不是通过人民群众施加压力去拖着这些资产者跑，而相反自己受他们的影响，自己没完没了地开会，让群众等着。

我在这里不得不请您注意这样一个情况：这里甚至还没有开始考虑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决议<sup>②</sup>的意义。他们一直东拉西扯，说这些问题将由中央全会和代表大会来解决。

但最可悲的是，格里高里<sup>③</sup>实际上完全在护着他们。顺便谈谈格里高里。他在事件发生前夕离开这里去汉口了。他临行前亲口对我说，事件已不可避免，我说他最好留下，他却说他该走，也许还会回来。同时他还建议大家都离开这里。我认为，他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失误。简单谈一下他的工作。我非常不乐意提到这一点，但我认为有义务指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这样重大的关键时刻没有派出与这种时刻相适应的人，令人感到惭愧。他的全部工作是玩弄手腕、抹平棱角和调和妥协。不是给党提出明确的指示，而是以卑劣的外交手腕把他们搞得糊里糊涂。据党中央委员们说，俄国同志的威信大大下降。这是因为，第一，共产国际执委会的

---

① 虞洽卿、钮永建。  
② 见本书第71页注③。  
③ Г. Н. 维经斯基。

代表在耍阴谋，这在中国是最糟糕不过的了；第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没有方针，他应对中央至今的工作和决议不明确负全部责任；第三，他凭印象办事，把党中央的工作搞得混乱不堪。

我的意见是，如果没有更强有力的代表，那么最好在这里根本不设代表。

我们在这里的工作收效甚微，因为中央尽可能避而不见我们。我和留在此间的同志，即切尔尼亚克和查理，竭力为党做些有益的事，但这非常困难，因为格里高里走以前他执行的方针和工作方法已使我们声誉扫地。我再说一遍，我不乐意写这些东西，但这是我的责任，米哈伊尔同志知道我不是阴谋家。

我再来谈谈事态发展。现在的形势是这样的：工人们平静不下来，声称他们无论如何要打倒孙传芳。在中国的城市里还在罢工，还没有复工，每天工人和军警都发生冲突。舰队不仅没有投降，而且还更坚定地站到了起义者一边。

前线的形势也非常好。28日又将举行罢工、示威游行，这场罢工也许是起义的信号。工人们又组织起战斗队，冲突持续不断。恐怖活动略有收敛，因为恐怖引起了各个居民阶层无一例外的愤慨。斗争在继续。

我们将全力尝试再次提出关于动员群众、成立和召开人民代表会议（这个会议应成为政府）的问题。我们建议号召广州、长沙和其他地区也成立同样的会议。当城市拿下后，国民政府应该依靠人民群众这支力量，这支力量将与革命军队和舰队一起完成革命事业。如果您支持这一事业，那就很好。这是因为您的声音在群众中有很重大分量。但问题应立刻得到解决，而这封信要过3个星期才能送到您的手里。前景非常好。群情振奋。现在的愿望和决心前所未有，但也有不利的方面。

(1) 没有钱。急需钱。有5万元就可以买到武器、手榴弹等，可是没有钱。

(2) 几乎没有武器。这更糟。

(3) 没有坚强的领导，这是最糟糕的。

还有一个非常不利的一面，这是外国军队。外国军队将做什么呢？他们是否只限于保护外国居住区？是否会与广州军队作战？这个问题完全不清楚。但必须毫不留情地进行斗争。如果他们干预，那么就让全体无产阶级采取斗争措施。

我想，总的说来我写了该写的东西。再谈一下总的工作。中央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sup>①</sup>的直接参与下尚未开始纠正自己的方针。认为前景是参加政府，把赌注押在汪精卫身上，认为他一回来一切都会好起来。我们跟在国民党屁股后面转，而不是把他拉上一个更高的台阶。如果不能马上采取另一种方针，如果中央不工人化，如果没有坚强优秀的领导，那么形势将非常糟糕，蒋介石 1926 年 3 月干过的事又会重演，这对中国革命来说将是致命的。必须尽快提供人力和物力援助。

阿尔诺<sup>②</sup>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69—82 页及背面。

手稿。

<sup>①</sup> Г. Н. 维经斯基。

<sup>②</sup> А. Е. 阿尔布列赫特。



172

##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7年2月25日于上海

致米哈伊尔<sup>①</sup>同志 亲启

米哈伊尔同志：我写了一封长信。我是在事态印象尚深时写的。我知道这封信要过三四个星期您才能收到。这一切都将是明日黄花，许多事情都将由革命军队和上海工人在战斗中解决。但我本人向您这位老同志，老布尔什维克提出请求，务请严肃提出关于对中国革命这样伟大事业的领导的问题。米哈伊尔同志，如果您在这里，如果您看到无产阶级一个月30至31天工作只得到6、7美元，每天要干14、15、16小时的活，挨打挨骂，忍饥挨饿，他们尽管争取解放的决心很大，却除了死去确实别无出路，那么您也会像我一样愤慨，为什么对这样伟大的事业关心得这样少，为什么要让格里高里<sup>②</sup>和鲍罗廷这样不合适的人来领导这一事业。前者什么信念也没有，把这一事业中生气勃勃的一切都毁了，他像松鼠蹬轮子似的来回瞎折腾，吹牛搞阴谋。后者则更糟糕。他纵容最坏的机会主义，散布不信任，只是为蒋介石的胜利张目。我

① И. А. 皮亚特尼茨基。

② Г. Н. 维经斯基。

们在全会上通过了一个好的决议<sup>①</sup>。我们（我现在才发现，我们正确地体会到了中国革命的整个精神）给整个运动提供了它缺少的东西即灵魂。一切都在进入我们手中。但没有人来掌管。万分需要有一个久经考验、经验丰富的老革命家而不是官吏来领导一切。难道伟大的十月革命不能提供这样的人吗？我不相信。我以为可以找到这样的人并立即把他派到这里来。请您好好想一想。连全会的决议至今还没有向各地传达。上海地区代表会议<sup>②</sup>（党的头脑）没有讨论这个决议，尽管这次会议就是在中央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所在的同一个城市里举行的。彼得罗夫<sup>③</sup>代表中央在会上作了报告，他公开指出，他不同意决议。无条件接受决议的瞿秋白实际上被排除在工作之外，而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sup>④</sup>只给上海代表会议写了一封祝贺信就算了事。外国军队来了，群众来了。上海工人群众（若是你们了解这些群众该有多好啊）冲上街头，想提出抗议，可是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制止了他们。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代表没有方针。简直糟透了。要让大家都知道这一点，我即使由于说了这些话而将受到审判，我也认为有义务从这里向您大声疾呼，必须把他调走或者派个强有力的同志来，或者把所有的人都召回。

米哈伊尔同志，请您提出要求，给您本人或俄国代表团寄中央委员会的通讯<sup>⑤</sup>，不知为什么他们不想给您寄这些通讯，尤其是第11、12、13和14期，看了通讯您就会明白情况糟透了。

这一点我当然不能对中央讲。我也没有机会对格里高里本人讲，因为我只是在他离开后才了解到他的活动的。但这个问题关

① 见本书第71页注③。

② 指中共上海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会议于1927年2月16日在上海举行。

③ 彭述之。

④ Г. Н. 维经斯基。

⑤ 指1926年8月至1927年1月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出版的《中央政治通讯》。

系到中国共产党，最终是不能阻止住我的。附上一些材料，即这些通讯的摘录<sup>①</sup>，您可以看到其中有些什么样的胡说八道。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讨论简直是一场闹剧。中央没有作出任何决定。上海地区代表会议上没有讨论决议。一切都留给了代表大会。

而格里高里对此不置一词。

您收到我建议您立即索要的材料后即可亲自了解这一切。

致以最热烈的同志般的敬礼，务请回信。

阿尔诺<sup>②</sup>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66—68 页。  
手稿。

## 173

# 1927 年 2 月 22 日和 23 日维经斯基和 蒋介石在九江的谈话记录

1927 年 2 月 26 日于九江

## 格里高里<sup>③</sup> 同志与蒋介石的谈话

(摘自 1927 年 2 月 26 日日记)

[2 月 22 日]

蒋介石：“南昌和武汉之间没有任何冲突。冲突的根子在武昌。”

① 信的附件没有找到。  
②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③ Г. H. 维经斯基。

我对冲突的态度是明确的，报上发表的我的讲话作了表述。对这一冲突的大部分责任要由鲍<sup>①</sup>来负。鲍为我们的国民革命做了不少事。他为建立我们革命和党的巩固基地付出了辛劳。但是近来鲍开始执行分裂国民革命运动的政策。这样的政策对于中国革命今后的命运非常危险。我个人对鲍没有任何恶感。我迄今为止一直把他当作老师看待。但我现在反对他，因为他在坚持会造成两个政府的危险方针。

我认为这不是共产国际的方针，因为这种政策会在中国人民的思想中造成对共产国际的不信任。这不仅在我们国家，而且在东方各被压迫国家都会有反应。

帝国主义者对鲍的离去作何解释，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解决根本问题——国民党的内部问题。

我很久没有和共产党领导人谈话了。由于我们很少见面，出现了与共产党的某种决裂局面。需要同他们建立经常的联系。我想见见陈独秀。”

2月23日晨

“昨天我们收到汉口来电，说已决定国民政府在武昌正式开展活动。然而，中央政治委员会和政府都在这里。那里只有几个部长。迄今为止他们是作为个别部门的领导人活动的，例如，只有陈友仁作为外交部长同英国人进行了谈判。他作为部长签署的协议还不是整个政府的行为。

政府在这里。汉口那边现在想成立第二个政府。

我想问您，共产国际持什么方针？共产国际是否主张国民革命运动分裂？如果不是，那么作为共产国际代表的鲍为什么实行这样的政策呢？我认为他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持客观的态度。他在这个问题上非常主观。这会破坏共产国际在中国人民和一切东方

<sup>①</sup> M. M. 鲍罗廷。

弱小民族心目中的威信。即使我现在反对鲍，也不等于我反对共产国际。我想您是相信我的。

政府任何时候都可以迁往武汉。但有两点很重要：(1) 迁政府同鲍离开有关系，(2) 必须在党内确立严格的纪律。

我对您的到来已等待很久。您现在来得正是时候。我们，政治委员会和中央委员会，认为目前形势非常严重。我们准备决裂。现在您负有很大责任。我等待您去汉口后的建议——怎么办，政府是否迁往汉口。我等待您的通知。

共产党人在攻击我。您是否听到了他们散布的谣言，说我成了军阀，是独裁者，想同苏联断绝关系，要同日本人妥协？”<sup>①</sup>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0，第 12—13 页。

打字稿，副本。

## 174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 89 号（特字第 67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3 月 3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关于《真理报》和《消息报》（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

<sup>①</sup> 指 1927 年 2 月 16 日中国共产党上海委员会第一次代表会议决议（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 37、123 页）。

决定：1. —— [1] 禁止《真理报》和《消息报》刊登宣扬俄国同志在中国和其他附属国活动的报道或文章。

[2] 禁止《真理报》和《消息报》未经联共（布）中央特别批准刊登由俄国人署名的发自印度和英国其他殖民地的报道。

抄送：

乌里扬诺娃同志；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同志。

听取：9. ——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2 月 24 日会议第 88 号记录，决定：1），（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布哈林、加拉罕同志）。

决定：9. ——（1）采纳中国委员会就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工作制度作必要改变的问题所提出的如下建议：

[1] 认为有必要坚决执行发展工农运动、吸收工人群众加入共产党，吸收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的政策。

[2] 认为有必要坚决大力为国民党左派建立农民、小资产阶级和工人的基础。

[3] 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大力促使国民党变为有内部纪律的经选举产生的组织；必须在这一基础上实行排挤国民党右派的方针，从政治上使他们声誉扫地并有步骤地自下而上地撤销他们担任的领导职务。

[4] 必须坚决加强提拔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员担任军队、军校、重要军事技术等部门干部职务的工作。

[5] 必须坚持把军队从个别军阀的雇佣军变为革命政府的、联系群众的常备军的方针；实行掌握军队中重要职位的政策，在可能的地方着手建立特别忠于革命的部队。

[6] 必须加强军队中国国民党支部和共产党支部的工作，凡是

没有支部、能够建立支部的地方都应建立支部；凡是不能建立共产党支部的地方必须通过秘密共产党员开展强有力的工作。

[7] 必须实行武装工农、把各地农民委员会变成拥有自卫武装等的实际政权机构的方针。

[8] 必须使共产党在各地公开进行活动；不容许实行自愿的半公开政策；共产党不能成为群众运动的障碍；共产党不应掩盖国民党右派的反动叛卖政策；必须动员群众团结在国民党和共产党周围揭露国民党右派。

[9] 必须提请一切忠于革命的工作人员注意，目前中国革命由于阶级力量的重新组合和帝国主义军队的集结正经历一个危机时期，只有坚定不移地实行开展群众运动的方针才能使革命取得进一步的胜利。否则革命就会受到巨大威胁。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有必要贯彻执行指示。

(2)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发往汉口的有政治指示性质的电报一律由电报局发往海参崴，然后由信使送达。

(3) 责成中国委员会就国民党内部的党内派别问题以及国民政府的重大措施问题为政治局委员编写每月综合通报。

(4) 认为有必要在报刊上说明中国国民政府的行动纲领。

(5) 责成中国委员会讨论改进我国报刊对中国政治生活的报道的措施。

(6) 责成中央书记处在一周内研究关于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

(7) 撤销政治局今年2月24日关于拨给在上海的同志10万卢布的决定<sup>①</sup>（第88号记录，决定1. [2]）。

(8) 责成伏罗希洛夫和鲁祖塔克同志确定中国委员会预算的最终数额。

<sup>①</sup> 见第170号文件。

(9) 认为有必要从西欧各国共产党中派出一定数量的指导员和顾问去中国。

(10) 认为可以派谢苗诺夫同志去中国参加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2)；

库比雅克同志——(6)；

鲁祖塔克同志——(8)；

布哈林同志——(1)；

古谢夫同志——(4) / (5)。

听取：13. ——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温施利赫特同志）。

决定：13. —— (1) 禁止今后通过国家机关向中国运送武器。

(2) 责成中国委员会为此目的组织私营公司。

(3) 向在中国接收武器的人极为秘密地通报本决定。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70—7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75

## 曼达良、阿尔布列赫特、纳索诺夫、福京 关于第二次上海起义的书面报告

1927年3月4日于上海

### 关于上海的发动

2月17日收到关于孙传芳大败、国民革命军迅速向上海方向挺进的消息。广州军队经几次攻击后占领了浙江省，它的迅速挺进说明孙的军队在迅速瓦解，说明广州人有可能占领上海。我们建议<sup>①</sup>，在广州军队保持进攻速度的情况下，广州人很快就会占领上海。

2月18日，我们向中央提出了关于在上海建立政权的问题。国民革命军在这一地区的部队由最忠于蒋介石的何应钦将军指挥，他完全赞同其顶头上司的信念和政策。在国民革命军的这些部队到来之前有可能利用孙传芳的垮台建立一个能抵制广州军队指挥人员的右倾和深入开展革命运动的政权。党面临着两条道路：一条道路是等待何应钦的到来，并由他建立政权，然后设法参加这一政权（如果允许的话）；另一条道路是在何应钦到来之前同国民党一起建立政权，然后让何应钦也参加这一政权。

我们认为，上海无产阶级在相应的政权形式下能够对整个国

<sup>①</sup> 原文如此。按意思应为：推测。

民政府的进一步革命化产生极大的影响。正是上海的无产阶级有条件通过国家政权来真正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权，而这一政权形式很快就能为中国各大城市所接受。我们认为完全有可能和有必要按照苏维埃制度建立起称之为“人民代表会议”的政权。这个会议基本上采取苏维埃制度，应包括所有的反帝阶层。这个会议的选举和召开应安排在孙传芳政权垮台的时候。

18日晚和19日晨，我们与中央代表就这一题目进行了会谈，并建议他们就此问题以共产党、国民党和工会名义发表一个共同宣言。但是2月19日从总罢工开始时起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宣布罢工的决定是2月18日深夜由工会积极分子会议作出的，未经中共中央和区委批准，只是取得了参加这次会议的区委代表的同意。宣布罢工时没有提出明确的政治口号，罢工的似乎是为了支援国民革命军。据我们同志提供的消息称，罢工第一天约有10万人参加，第二天约有20万人参加，到第三天竟达30万人。

我们只是从报纸上了解到关于罢工的详情。2月19日我们同周恩来、瞿秋白和萧<sup>①</sup>同志谈了话（与周恩来是早晨谈的，与后两人是晚上谈的），他们也不能提供关于罢工的任何消息因为他们自己也是一无所知。我们向这几位同志说明了我们关于建立政权和采用什么政权形式的计划，当时还没有考虑到总罢工。直到2月20日根据报纸的报道和查理<sup>②</sup>通过萧和徐<sup>③</sup>得到的消息，午饭后又从彼得罗夫<sup>④</sup>处听到一些情况，才较详细地了解到罢工的规模和上海的局势。我们这次同彼得罗夫谈话时不仅提出了准备建立政权的问题，而且还提出了变总罢工为起义的问题。我们这时已

---

① 萧子暉（萧三）。  
② H. M. 纳索诺夫。  
③ 徐玮。  
④ 彭述之。

得到一些军事政治情报：上海警备司令李宝璋将军受广州人所取得的决定性胜利的影响发生了动摇。他和钮惕生<sup>①</sup>取得联系。我们得到的一些消息说，国民党右派打算建立右派政权，例如胡春飞（音）劝李宝璋坚决反对工人运动，因为这都是共产党一手挑起的，他答应李宝璋一俟广州部队抵达后即任命他为国民政府军一个部队的指挥官。还建议杀害共产党人和单独组织没有共产党人参加的政权，张继（从前以无政府主义者自居）也曾向虞和德和一个老国民党员杨<sup>②</sup>提出过这样的建议，但这两个人拒绝了，后来还向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报告了这一情况。

在国民政府军临近时举行的总罢工造成了极大的政权危机。政权问题从总罢工开始时起就成了紧迫的问题，实质上总罢工已演变成反对现行当局的起义。李宝璋的命令、野蛮的镇压和与工人的冲突都说明了这一点。当局张皇失措，竭尽全力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威信。我们认为党面临的选择是：或者党努力建立左派政权，或者（在政权危机继续的情况下）由右派来建立政权。我们想通过建议承认变总罢工为起义的这一事实来把工人阶级的斗争提到更高的水平。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请看给中央的信<sup>③</sup>。但是我们和党中央代表彼得罗夫一起查明，中央起先同意举行起义并把发动的时间定在2月21日，现在又取消了起义（我们还不清楚，是谁取消了发动时间，21日早晨我们收到指挥部的消息说6时将开始发动，瞿秋白和萧都一点不知道取消的命令，实际上指挥部和起义领导人在3个小时前才知道取消的命令）。彼得罗夫认为取消发动的理由是：

1. 工人阶级尚未作好准备，还没有武器，还需要向工人做解释工作。

① 钮永建。

② 可能是杨杏佛。

③ 信没有找到。

2. 小资产阶级还没有积极行动起来，没有宣布罢工。应对他们进行鼓动，等待他们积极行动起来。

3. 胜利后怎么办……<sup>①</sup> 这个最难的问题尚未解决。

4. 没有取得胜利的充分保证。

5. 应该等一等，在这几天里务必对群众做广泛的教育工作，然后再开始发动。

6. 人民代表会议应在胜利后再召开。

彼得罗夫在中央的一次会议上认为有四条出路：（1）起义取得胜利，（2）起义没有取得胜利，（3）通过工会下令全面退却，（4）总罢工自行结束，转入一般的骚动。

尽管当时接受了其中的第一个结局——设法以胜利的起义来结束罢工，但党组织还没有非常坚决地提出要执行。这四条出路本身已经说明，党的领导机构中有人认为可以让罢工自生自灭，党不必积极参与。

领导机构的动摇引起了外围的更大动摇，因此行动不坚决。大家彼此等待观望。发动前夕成立了由九人组成的临时革命政府，有两名共产党员进入政府（一名代表工会，一名代表共产党），这个政府中的主要一派是由虞和德和钮惕生将军组成（与1926年10月23日拟议发动时的人员组成相同）<sup>②</sup>。小资产阶级有一个代表，但其影响不大。尽管彼得罗夫认为必须推迟起义的原因是小资产阶级还没有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但是实际上几乎没有做任何工作来吸引小资产阶级。注意力都集中在如何与虞和德之类大资产阶级更密切配合上。党的鼓动工作也很薄弱，总罢工期间没有以党的名义发表任何东西，甚至也没有散发传单；由中央通过各级

<sup>①</sup> 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sup>②</sup> 参加临时革命委员会的有：汪寿华（何今亮——上海总工会代表）、罗亦农（中共代表）、钮惕生（钮永建）、杨杏佛、虞洽卿（虞和德）、王晓籁、章郁庵、王承伟、刘荣简、周孝公、张曙时（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中文版第43页）。

党组织口头传达给群众的口号传达得很晚，而且走了样。宣传员没有中心思想。党的上层的注意力都集中在谈判上和对各种“上层人物”如虞和德、海军上将钮惕生等人的劝说上。给群众的只是一道空洞的命令。

起义以舰队炮击兵工厂（极为重要的战略据点，其中还有武器）的行动开始。经过几次射击后兵工厂表示投降，但是无人去占领该厂。用于占领该厂的队伍没有组织起来。在城里的不同地方发生了一些冲突，甚至延续到了第二天。发动开始时未经“政府”批准，而“政府”是听到炮击后才知道发动开始了。在“政府”会议上钮惕生、虞和德提出抗议，反对共产党人擅自行动。但此后共产党人成功地说服他们签署了给部队和警察的“忠告”，让它们转到政府一边（我们不谈各个冲突的过程和对起义的技术领导——这些问题另行报告）。“政府”没有足够勇气公开诉诸人民，号召他们起来作斗争，并向部队和警察下命令，看来，政府的大多数成员认为自己的任务是在广州军到来之前给筹建政权的指挥部提供帮助，另一方面，虞和德显然对是否吸收他参加政权没有完全的把握，因此他预先试图通过施展种种诡计来争取参加这个政权。

我们曾预料，在国民革命军抵达上海后，在这里必然会形成实际上两个政权的局面。因此我们认为，对我们来说，除了人民代表会议，不提供，至少形式上不提供建立第二政权的机会要有利得多，因此我们建议临时权力委员会纳入那些持反帝斗争立场的有影响的集团或与它们取得联系，并采取一切措施使中央国民政府的代表承认人民代表会议。由这样的组织可以建立一个合法的政权，其结构也能保证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掌握领导权。一切试图染指政权的反动分子或应在人民代表会议内部进行斗争或建立第二个不合法的权力中心（实际上这是同时进行的）。这样的局面会使党有时间把人民代表会议变成真正的人民政权，那时人民

和军队中的一切革命势力就会团结在这个政权的周围。

但是党在建立临时权力委员会的问题上没有采纳我们的建议，结果虞和德和钮惕生派的人在委员会中占了多数。这个权力委员会即“临时革命政府”从事谈判和辩论活动，我们参加组建这个政府的同志自然不得不至少在某种程度上尊重这个政府。实际上群众的力量在共产党人一边，而在“政府”的九个人中只有两名共产党人（国民党左派在政府中实际上没有代表，小资产阶级也是如此，也就是说大资产阶级的影响在政府中占上风），在大资产阶级在政府中占多数的情况下，共产党人实际上不得不唯大资产阶级之命是从。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从组织上通过这个政府为虞和德和钮惕生所控制。虞和德的革命性无非是搞阴谋，在政府解散后过了两天虞和德在报刊上声明，他只是一个商人，不过问政治，他和一些军人有关系，是因为他向军队供应物资。政府在得知第一次发动失败后即自行解散。党对建立临时政府的态度表明，党没有从10月23日“起义”失败中吸取教训，依然夸大资产阶级的作用，因此事实上遏制了工人阶级的斗争，拒绝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勇敢地参加群众的发动，不关心手工业工人和小业主的利益。这一点在政府中反映得很明显，舰队开始起义后，共产党人还在那里劝说虞和德和钮惕生采取行动，而这时上海无产阶级已经发动三天了。

我们关于夺取军队的建议实际上也未被采纳。党除了和钮惕生及一些高级指挥官进行对话外，没有做任何工作去吸引地方部队支持起义或去瓦解这些部队。可是有消息说，兵工厂的机枪连已经动摇，想转到国民党一边，关于驻扎在北市的部队也有这样的消息。驻上海部队在引起人们惊慌的谣言的影响下以及在罢工的直接影响下士气十分低落。但没有向部队官兵们散发过一张传单。武装工人的工作也做得不好。党自然不能获得枪炮，但党可以号召工人们自我武装起来，哪怕用各种各样的冷兵器武装起来

也好。党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实际上阻碍了这种武装工人的工作，认为这样做有危险。2月20日上午查理和徐的谈话很说明问题。徐在答复查理提出的号召武装工人的建议时说：“党的方针是暂时武装工人不要超过一定的数量（3000或5000），因为工人非常好斗，如果对他们说，武装起来吧，那么就可能过早发生冲突。”党本可以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号召全体居民武装起来，组织自卫队，反对撤退的纪律涣散的士兵进行抢劫和施暴，党本可以公开告诉工人他们有哪些阶级任务，而不是直到起义开始前一直由各级党委秘而不宣。但实际上却这样做了。没有一个人号召起义，号召武装起来。而起义却已经决定。只有少数党内积极分子知道要举行起义（我们说的不是起义的行动日期和计划，而是起义这种斗争形式），好像群众对准备起义也一无所知。有些领导人在引导群众时甚至采取挑拨手段，如有一个区的某些党员说，广州人的军队占领了北站，我们应该去迎接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想挑起没有组织起来的、毫无戒备的工人群众同部队发生冲突（这时城市已实行戒严）。总之，根本不公开直接地向工人说明举行起义的必要性。在这次罢工期间党避而不提反帝口号。

总罢工勇敢而及时地转变为起义，本可以以胜利告终，而不只是以“冲天”告终，如果说起义不仅没有取得胜利，而且也没有组织好，那么根子应该到党的政策和现状中去找。党从来就没有认真提出过群众性武装发动的问题。上海党组织没有以战斗的阶级精神教育上海无产阶级，没有给他们指出中国革命的前景和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上海组织和上海无产阶级没有充分吸取过去斗争的教训。上海党组织过去和现在都不懂得现在需要的不是通过实行支持国民革命运动的抵制行动和总罢工来进行消极对抗，而是积极进行争取参加政权的发动和斗争。上海党组织以及中央的一部分领导同志实际上不懂得新形势、新任务，继续按1925年的办法行事，但在1927年光有这些办法是不够的。中

央的意见，正如彼得罗夫所说，是要等待小资产阶级，顾及大资产阶级。这种意见已被反映小资产阶级情绪的一系列事实所粉碎，小资产阶级等待行动的信号，等待小商贩联合会<sup>①</sup>领导人的指示，但他们当然不打算自己去充当带头人。瞿秋白同志向我们讲了几个事实，说明小资产阶级在等待行动的信号，例如，他去一家商店，在15分钟里有好几个邻近的商人跑到这家商店老板这里问：“会发生什么事吗？我们该怎么迎接广州人？”很说明问题的是，小资产阶级上层即小资产阶级领袖最动摇，而我们党实际上看重的不是小资产阶级群众的要求，而是与大资产阶级联系相当密切的小资产阶级领导人的要求。布哈罗夫<sup>②</sup>同志在和我们谈话时蹦出一句：“2月19至23日是共产党人的日子，小资产阶级，以至大资产阶级都和我们在一起。”党的领导机关错误地估计了阶级力量，这不是偶然的失误，而是同过去的立场有关，是党过去的整个方针造成的。这一切都说明必须坚决改变中央的政治方针，改变其部分人员组成，撤换那些动摇得最厉害，在对阶级力量的估计上错误最严重的人。

我们在政权问题上的立场仍然和总罢工以前一样，即我们建议党采取措施在国民军抵达之前组织“人民代表会议”形式的政权。我们不能把总罢工的结局看作是失败，总罢工给了我们很多教训，而总罢工不成功的结局，据我们所得到的情报来看，并没有在工人阶级群众当中造成失败主义和取消主义情绪。

我们希望，尽管党组织发生了动摇，在上海将建立起新形式的政权，这个政权会对中国革命今后的前途产生很大的影响。

中央已经同意，第一，必须组织人民政权；第二，总罢工应是起义的开始阶段；第三，有一半人同意“人民代表会议”这种

---

<sup>①</sup> 上海小商贩联合会于1919年成立，1927年4日在蒋介石政变后为国民党当局解散。

<sup>②</sup> 罗亦农。



拟议中的政权形式的实质。

前线的军事形势很好，有人推测近期可能发生新的发动，从明天起工人们可能再次积极行动起来：铁路将举行罢工，以阻止部队调动。

(切尔尼亚克、阿尔诺、查理、丹科)<sup>①</sup>

附上我们的两封信<sup>②</sup>和瞿秋白给中央的信<sup>③</sup>，我们基本上同意瞿秋白这封信提出的建议，还寄上一些其他材料。

对文中姓名的说明：

萧——共青团中央书记。

徐——共青团上海委员会书记。

布哈罗夫——党的上海委员会书记。

彼得罗夫——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政治局委员。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44—53 页。

有修改手迹的打字稿，原件。

① 分别为 H. F. 曼达良，A. E. 阿尔布列赫特、H. M. 纳索诺夫和 H. A. 福京。

② 指给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的两封信。这两封信没有找到。

③ 指 1927 年 2 月 24 日由瞿秋白起草的《关于 2 月 22 日上海起义后的政策和工作的建议》(见《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北京 1980 年版第 727—731 页)。

176

## 阿尔布列赫特给皮亚特尼茨基的信

1927年3月5日于上海

绝密

### 致米哈伊尔同志<sup>①</sup>

今天我们给俄国代表团寄去一封信<sup>②</sup>和一些材料，即（1）瞿秋白的提纲<sup>③</sup>，（2）周恩来的报告<sup>④</sup>和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的说明信，这封信近日刚通过，尚未散发<sup>⑤</sup>。还有我们给中央的两封信<sup>⑥</sup>和中央在罢工期间的号召书<sup>⑦</sup>。所有这些只是我们为了说明形势寄去的部分材料。遗憾的是，现在时局很紧张。不得不做很多工作，很少时间用于通报情况。下次邮班您可以收到详细得多的报告和关于党的工作和策略的较准确材料。

事态又变得很危急。有各种传闻，如说南方人的军队显然又打败了北方人，上海问题再次紧迫起来。山东人紧急撤离上海，开赴前线。南方人切断了津浦路，截断了山东人的退路，分两路进军南京和上海。安徽迄今独立的将军们转到了南方人方面。因此

① H. A. 皮亚特尼茨基。

② 见第175号文件。

③ 见本书第146页注③。

④ 指周恩来1927年3月3日在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会议上的报告《关于上海的武装起义》（见《党的文献》，北京，1994年第1期第75—80页）。

⑤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9—23页。

⑥ 信没有找到。

⑦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24—26页。

在前线上显然南方人的形势很好。在上海，前督军李宝璋一周前杀害工人，无视孙传芳关于把指挥权交毕庶澄并开赴前线的命令，拒不执行命令，今天报载，毕庶澄让他留在上海，自己离开上海上前线了。据说警方和许多指挥官在寻求同工会的联系。这一切我写得有点混乱。但事态也很混乱。中央似乎终于明白了，必须通过工人同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一起举行武装起义来提出政权问题即人民代表会议问题。老头子<sup>①</sup>要求我们准确地勾画出人民代表会议的蓝图以便完全弄清这一问题。事态可能会一天比一天紧张。现在正在更精心地准备武装起义，如果不再发生动摇，那么我们想，胜利必将属于我们。下次邮班将更详细更系统地作出报告。

代表年轻人、查理、切尔尼亚克和我<sup>②</sup>

阿尔诺<sup>③</sup>

我们共同请求您亲自过问这件事并尽快解决我们信中提及的问题。

阿尔诺

### 米哈伊尔同志

寄上的材料足以使您看出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倾向，而且相当严重，格里高里<sup>④</sup>应对此负责，我们认为应当撤换他，因为他不可能进行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斗争。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83 页及其背面。

手稿。

① 陈独秀。

② 分别为 H. A. 福京、H. M. 纳索诺夫和 T. Γ. 曼达良。

③ A. E. 阿尔布列赫特。

④ Г. H. 维经斯基。

177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90号（特字第68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3月10日于莫斯科

听取：12.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加拉罕同志）。

决定：12. —— [1]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由布哈林同志根据共产国际委托签署的如下电报，并转国民党中央成员，抄送中国共产党中央：

“（1）我们认为在中国南方建立两个中心、两个国民党、两个政府和因此建立两支军队的做法是危险的和不能容许的。（2）我们认为绝对有必要在武昌召开统一的国民党中央全会，蒋介石务必参加，国民党全体中央委员必须无条件服从国民党中央的一切决议<sup>①</sup>。（3）我们认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绝对需要密切合作，因为我们坚信，如果没有这种合作，中国就不可能摆脱帝国主义的压迫，联合成一个统一的国民革命的中国。（4）我们认为不久前蒋介石显然为讨好国民党右派所作的答记者问，是对国民党和中

---

<sup>①</sup> 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于1927年3月10日至17日在汉口举行。蒋介石拒不参加这次全会（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卷第768—871页）。

国革命的一个不能容许的分裂主义的打击<sup>①</sup>。(5)我们认为国民党中央在武昌提出的同蒋介石合作的条件<sup>②</sup>是正确的并能保证国民党的统一。受共产国际委托 布哈林。”

[2] 秘密征询鲍罗廷同志和在武昌的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的意见，是否应由共产国际向蒋介石提出警告性的质询，是否需要在俄国报刊上公开反对蒋介石。

[3] 责成鲁祖塔克和加拉罕两同志草拟政治局关于中东铁路问题的决定草案并提交中央通过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作出决定。

[4] 认为阿拉洛夫同志去广州不是担任大使，而是担任苏联政府的代表，以便同广州政府建立接触。认为阿拉洛夫同志必须乘第一班轮船去广州。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鲁祖塔克同志—— [3]；

阿拉洛夫同志—— [4]。

听取：13. ——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3 月 3 日会议第 89 号记录，决定：9），（报告人：库比雅克、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彼得罗夫<sup>③</sup> 同志）。

决定：13. —— [1] 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对于东方各国应是统一的，其活动范围应包括中国在内。

<sup>①</sup> 指蒋介石哪一次答记者问，不详。

<sup>②</sup> 指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927 年 2 月 21 日给蒋介石的信，其中谈到必须集中党的领导和恢复党的权力，恢复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集中国民革命军在国民党领导下的政治教育工作，统一外交政策和财政政策，联合一切革命力量 and 同党建立密切的联系。

<sup>③</sup>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2] 批准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由下列人员组成：

委员——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共产党、朝鲜共产党及日本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

[3] 拟由列普谢同志任远东局书记，责成库比雅克和莫洛托夫同志在列普谢来莫斯科后同他谈一下。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莫洛托夫同志—— [3]；

库比雅克同志—— [3]。

听取：14. —— **关于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综合通报问题**（报告人：缅任斯基同志）。

决定：14. —— [1] 责成书记处收回所有已发出的《中国委员会综合通报》第一期，并予以销毁。

[2] 建议中国委员会今后在综合通报中系统地介绍一个月的事态，其中不应引用秘密文件和密电。

抄送：

伏罗希洛夫、托夫斯图哈同志。

## 1927年3月10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2. —— **关于中国委员会下半年预算**（政治局1927年3月3日会议第89号记录，决定：9—8），（报告人：鲁祖塔克、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32. —— 批准中国委员会1926至1927年度下半年预算

总额为 94547 卢布 70 戈比和 183819 美元。

抄送：

伏罗希洛夫、鲁祖塔克、布留汉诺夫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76—78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78

## 皮亚特尼茨基和拉斯科尔尼科夫 给布哈林和斯大林的信

1927 年 3 月 21 日于莫斯科

绝密

### 致布哈林同志

抄送斯大林同志

维<sup>①</sup>同志在最近的一封来信<sup>②</sup>中再次提出关于在中共代表大会后即大约在 4 月初允许他返回莫斯科报告中国情况的问题。

由于维同志未被吸收参加共产国际执委会远东局<sup>③</sup>，所以宣

① Г. Н. 维经斯基。

② 指 1927 年 1 月 21 日维经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见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1 页)。

③ 见第 177 号文件。

布这个没有维经斯基的名单可能会对他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中共代表大会的一名代表的威信有影响。

因此，请求在通知远东局组成人员名单的电报中指出，维没有参加远东局是因为他不止一次请求把他召回莫斯科。

维同志同时建议让陈独秀同志在党代表大会结束后来莫斯科。请讨论一下他前来是否合适的问题。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皮亚特尼茨基，彼得罗夫<sup>①</sup>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26，第 51 页。

打字稿，副本。

179

## 国际农业研究所<sup>②</sup> 给谭平山的信

1927 年 3 月 23 日于莫斯科

秘密

### 给谭平山同志的信

亲爱的同志：

目前中国共产党有您这位农民部长就可以对农民运动的方向和中国土地问题的解决施加巨大的影响。

现阶段中国土地问题的任务对于中国革命的命运具有非常重

<sup>①</sup>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sup>②</sup> 国际农业研究所是农民国际下属的一个科研机构，建立于 1925 年 1 月。



要的意义，但同时又有极其巨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可以通过立即直接依靠中国农民群众的革命主动性和同他们建立组织联系得到克服。

在这方面您当然要利用其他国家的经验，首先是苏联在这方面的革命经验。

您当然明白您的最初步骤和措施会引起我们的极大兴趣，我们想得到有关以下问题的报告，哪怕是最简单的也好：

第一，您向农民发出了哪些呼吁？

第二，您在立法方面拟定了哪些草案？

第三，您是否准备（也许您已经这样做了）建立农民部全权特派员制度，这些特派员由您掌握并由您派往各地贯彻执行您制定的措施。我们在十月革命后建立了这样的特派员制度。他们被称为特使，并被派往外省各地。

第四，您是否打算立即召开农民代表会议？

第五，您就组织各地贫苦农民问题准备采取哪些措施？

我们最感兴趣的就是这些问题。我们当然认为，中国共产党将全力帮助您的工作，何况我们有可能不仅从宣传鼓动方面而且从组织方面开展这一工作。

急切等待您的答复。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1，第 10—11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80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92号（特字第70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3月24日于莫斯科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3月17日会议第91号记录，决定：5），（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4. —— [1] 同意切尔内赫同志关于派西纳尼同志去阎锡山处工作的建议，责成他弄清情况、工作的可能性并建立必要的联系。如形势有利，则要留下来工作，以太原师范学院教师的名义作掩护（阎锡山的建议）。

[2]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对谭平山同志的任命使中国共产党有可能在实际工作中与广大农民群众取得联系并制定解决中国革命中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即土地问题的具体途径。

必须考虑到，国民党右派和资产阶级地主分子的斗争矛头将会指向国民革命政府的土地措施和谭平山这位共产党员。

因此应立即着手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决议采取一系列实际的土地措施，这些措施要向农民表明，国民革命政府中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是真正捍卫广大农民群众的利益的。这样会保证农民给予国民党左派和中国共产党以必要的支持。”

[3] 征询鲍罗廷同志的意见，要他在与中共中央商量后作出报告，他们是否认为由我们派一位有理论素养和土地问题实际工作经历的同志担任谭平山同志的顾问是合适的。也请鲍罗廷同志报告一下谭平山关于土地问题的的工作规划。

[4] 授予以下同志以红旗勋章：(1) 戈列夫（尼基京）——第四军顾问；(2) 波洛<sup>①</sup>——第四军第12师顾问；(3) 捷尔（捷鲁尼）——华南组组长助理；(4) 切列潘诺夫——第一军顾问；(5) 谢尔盖耶夫——飞行组组长；(6) 克拉夫佐夫——飞行员；(7) 塔尔贝格——飞行观察员；(8) 贝泽瑞<sup>②</sup>——飞行观察员；(9) 科夫里日尼科夫——机械师；(10) 基赫坚科——机械师。

[5] 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和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抄送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

“据我们获悉的迟到情报，蒋介石曾向共产国际执委会表示愿意会见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鉴于我们未能及时收到蒋介石的这份电报，现表明我们的意见：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有必要会见蒋介石。如果你们认为这一会见合适，请以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名义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转达它的这一指示。”

[6] 关于隆格瓦的问题仅限于加拉罕同志发的电报<sup>③</sup>

抄送：

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 1927年3月24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41.——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① 原文如此。应为：帕洛。  
② 原文如此。应为：巴泽瑞。  
③ 电报没有找到。

决定：41.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并转国民政府：  
“建议颁布关于根据工会的倡议在工业中心城市建立为数极少的工人纠察队的法令。首先在上海建立。”

抄送：

伏罗希洛夫、加拉罕、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83—8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181

## 邵力子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的信

1927年3月29日于莫斯科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国民革命军占领上海以后，我们看见苏联群众与国际革命者对于中国无限的同情的欢欣；

英美炮舰轰击南京<sup>①</sup>以后，我们又看见苏联群众与国际革命者对于中国无限的同情的悲愤；

---

<sup>①</sup> 1927年3月24日英美军舰以制止军阀军队撤离时在城内发生的“事件”为借口炮击南京。

这实在是足以增加我们的勇气，慰藉我们的哀痛。中国革命得世界革命者的拥护，中国革命方能真正成功；世界革命得中国革命者为先驱，世界革命亦可迅速发展。我们要在世界革命战线上共同努力，打倒共同的敌人——国际帝国主义。

尤其使我们深深铭感的，是这几天苏联工人群众，以一致的热烈的同情，捐款救助我们的在南京死伤于帝国主义者炮火之下的同胞。

对于革命的责任，不是言词的感谢所能了事的，我们必须与帝国主义者奋斗到底，方对得住援助我们的世界革命先进者。但我实在不能不先表示我深刻的感谢，同时我敢断言中国革命必彻底打倒国际帝国主义，任何威嚇利诱，都不能挫阻我们的前进。

苏联人民与国际革命群众万岁！

全世界被压迫民族被压迫阶级联合奋斗万岁！

第三国际指导之下的世界革命成功万岁！

中国国民党代表

邵力子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992，第 1—3 页。

中文手稿。

182

## 布哈林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主席团会议上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

1927年3月30日于莫斯科

绝密

### 第一项

#### 关于中国形势的通报

布哈林同志：

我没有准备就这个问题作报告，因此我想通报几件事。

我们在这里必须涉及哪些问题呢？我想是关于革命的性质这样的问题。关于重大策略问题我不必谈，这些问题都已经讨论过了。最近出现一些策略上的分歧，如拉狄克同志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引起的分歧。我没有听过这个报告，只看过速记记录<sup>①</sup>。拉狄克同志在报告中断言，目前各种问题的重心不在关于上海的这类问题上，而在革命统一战线内部正在发展的阶级斗争上。问题的提法是这样：反帝斗争等等已经退居次要地位，而内部斗争的发展，即中国人民统一战线内部和国民革命军内部斗争的发展才是最重要的。拉狄克同志在报告中没有谈及应不应该立即开展反对蒋介石的公开斗争，或者说必须进行推翻目前这样组成的政府

---

<sup>①</sup> 1927年3月13日 K. B. 拉狄克在共产主义学院的报告速记记录没有找到。

的机械<sup>①</sup>斗争，但他的思路完全是朝着这个方向的。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因为在我们这里阶级矛盾在日趋尖锐化。不可否认，在一些省份，特别是在广州和广州市郊，最近一个时期在国民党内较右的方针占了上风。不久前在广州如果说不是发生了政变，至少也是进行了改组，军队领导人<sup>②</sup>解散了国民党委员会，成立了自己的委员会，等等。还发生了几次客观上反对工农的行动。在国民革命军占领的地区也有类似事件。前不久，在国民革命军的军事和政治领导人当中也出现了危机局面。实际上政府和军队都已经有两个中心。中国国民革命政府的多数成员以及多数略微左倾的分子都在汉口，而在明显右倾的军队总司令蒋介石的官邸有另一个中心。这一危急局面正是蒋介石派与国民党左派及共产党之间的冲突的萌芽。蒋介石发表了一个客观上敌视工农运动的宣言<sup>③</sup>。他是公然声称国民革命运动必须由资产阶级领导的那一派的代表人物。

总而言之，如果综观全局，那么就可以看到这样的局面，目前出现的这种局面过去多少出现过，不过目前表现得很尖锐，这就是国民党右派，特别是那些既不在政府里也不在国民革命军占领区的右派，例如在北京的右派，完全公开地表示反对俄国顾问拥有过多的权力，反对苏联的影响，主张纯粹的中国的爱国主义，也就是主张摆脱帝国主义；但反对苏联的影响，因为他们认为苏联实行的是与其他国家一样的帝国主义政策。总之，我们真正的中国爱国主义者反对那些接受俄国人影响的广州人，而主张自由主义的改革，主张反帝斗争，但斗争要采取温和的形式，不要立即撕毁各种条约，不要实行造成不能做生意的愚蠢政策。就是说

---

① 原文如此。

② 李济深。

③ 不清楚这里指的是蒋介石的哪一个宣言。

他们趋向于接受张作霖……<sup>①</sup>原先的观点，张作霖面临复杂的局势时试图寻求妥协，他实行的政策与这一立场十分接近，也就是主张摆脱帝国主义，但反对布尔什维克，反对赤祸。他在每次讲话中或在与大帝国主义者<sup>②</sup>的国家当局的谈判中都特别注意这样一点：寻求与国民党右派和帝国主义列强的妥协，把斗争矛头指向工农运动，指向苏联等等。蒋介石代表右的倾向，但他接受了许多其他影响，并且他处于这样一种客观形势：他不得不同帝国主义军队打仗。

当然最重要的是，不仅在广州，而且在国民革命军部队占领的所有省份，工农运动都有了巨大的发展。其次必须指出的是，我们党的同志和部分国民党左派在工农当中以及在军队中的工作已有很大的加强。他们采取各种方法，公开地和隐蔽地，通过共产党支部或通过人们不知道的所谓的“共产党的秘密党员”进行工作，现在这项工作开展得比以往更积极得多。

现在谈一谈最近发生的大事件：攻占上海<sup>③</sup>和炮击南京<sup>④</sup>。你们大家都知道过去上海曾尝试举行公开起义<sup>⑤</sup>。但是我必须向你们通报一些我前些日子因生病未能说明的情况。在进行这种尝试之后，我们劝同志们不要过早地举行起义，因为如果没有记错的话，这已经是第三次这样起义的尝试了。我们的人已经两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sup>⑥</sup>。现在我们对我们的代表作出了如下指示：只有在广州部队逼近城下时才能举行起义，因为当时的局势是，我们的人如果过早地举行起义就会被上海军队击溃。所以他们只是在

① 这里和下面的删节号是文件原有的。

② 原文如此。

③ 1927年3月23日国民革命军部队进入上海。

④ 见本书第157页注①。

⑤ 指1926年10月24日实际上没有实现的起义和1927年2月22至23日失败的起义。

⑥ 上海十月起义未成后进行了大逮捕，工人被解雇，而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指示停止二月起义后约有100人被处决。



军队直逼上海城下时才举行起义<sup>①</sup>。目前的局势很紧张。正在酝酿一次对城内中国地区的进攻,不排除帝国主义列强的军队参战。无疑这将导致各种冲突。美国已将其亚洲全部驻军调往上海并正在派遣航空分队。这表明大规模的武装干涉已经开始。至于南京,应该弄清楚,为什么会发生这次炮击。我认为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我认为发生这一行动的主要原因是英国人、美国人以及其他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不需要统一的中国。由于局势很紧张,建立统一的中国已指日可待,因为军队已攻占了南京和上海,而对于帝国主义者来说,危险在于不久将出现一个统一的中国,这对他们来说,特别是对英帝国主义来说是很不愉快的事情。由于这方面的局势很紧张,所以就发生了武装干涉。这是发生这一行动的总的原因。此外,炮击还有纯军事上的目的。从地图上可以发现,乍一看看不出在长江对岸的另一个国家已被突破<sup>②</sup>。这具有军事意义,因为敌对的中国军队和俄国白卫分子部队等,也就是说中国白卫分子的全部军队已被包围,可以将他们俘虏或全歼,而有帝国主义军队的炮击作掩护这些军队便可以撤退。也就是说炮击作为对敌人有生力量撤退的掩护具有军事战略意义。

至于对外政策,这是很清楚的事情。只有一点还不完全清楚,即至今我们还没有收到西欧各国党的答复。这的确很糟糕。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拖这些人的腿,让他们采取一点行动,尽管任何一个有理智的共产党人都一定会想到,他必须大声疾呼反对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行径。因此至今还不清楚,为什么我们至今没有收到反帝联盟<sup>③</sup>的答复。这个联盟本来早该发出警报了。我想这个联盟29日将会召开会议,但我们至今没有得到有关它活动

① 1927年3月21至22日在上海举行了一次新的成功的起义。

② 原文如此。

③ 反帝联盟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压迫、争取民族独立的联盟”的缩写。该联盟于1927年2月在布鲁塞尔召开的反对殖民主义压迫和帝国主义的国际代表大会上建立。1935年停止活动。

的任何消息。也许应再一次向联盟和所有的党发出呼吁，我们要求一定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因为事实上已经在进行一场大战。

因此请允许我说，关于中国问题在我们这儿并不存在与1914年世界大战的相似之处，当时发了照会并确定了动员日期。这不一定需要。我们这里的战争是一场牵动整个国际局势的战争。死亡的人数已成千上万，等等。但没有任何正式的照会，没有作任何动员，根本没有。我们应当完全清楚，这里的局势有些不一样。或许由此可以立即作出实际结论并向各国党再发一份电报。我认为，许多尖锐的问题，如德国的反法西斯问题，面对这一问题都应退居第二位，因为这是整个世界历史上的转折点。

谈谈对内政策。毫无疑问，我们的整个方针应该是：我们需要中国的各个集团都有步骤地不间断地向左转<sup>①</sup>。不过我认为，如果我们立即提出一个如同我们俄国革命在克伦斯基统治时期提出的口号，那是不对的。机械地照搬这种口号是不对的。在一些很缺乏耐心的同志当中存在着某种倾向，机械地搬用1917年2月的口号，例如说蒋介石是克伦斯基，我们是布尔什维克，而国民党则是社会革命党人，等等，我认为，这种类比是绝对错误的。首先，在中国国内正在进行反封建主义残余的国民斗争，不看到这一点是错误的。中国的斗争是同封建主义的这些残余作斗争。拉狄克同志说工农联盟将更加巩固，因为工农反对一个阶级，这种说法是不对的，要知道在中国还存在封建主阶级的残余。而且问题还在于（这里有最重要的区别），克伦斯基同帝国主义者一道率领俄国军队反对其他帝国主义者，就是说他进行的是帝国主义战争，而蒋介石，尽管他有反对革命倾向，尽管他是变得越来越反对革命的资产阶级的代表，但客观上他还是在进行解放战争。在俄国，在战争期间我们消极防御，而在这里我们支持进攻。也就

<sup>①</sup> 原文如此。

是说我认为，事实粉碎了拉狄克同志的理论。在占领上海的前几天，拉狄克同志说：“上海不起作用，重心不在这里”，但过了两天上海就成了世界事件的中心。这说明拉狄克同志的整个分析都是错误的。请原谅我在这里同拉狄克同志论战，但我们在这里并没有分歧，我只想说明这个看法。

将决定也应该决定（这也很重要）我们的策略的第二点区别是：目前我们对军队、战争、国家机关负有部分责任，因为政府里有我们的代表，我们党加入了国民党，于是就出现一个问题：我们应不应该利用这些特点？我们看到，蒋介石属于具有反革命倾向的派别。这是对的。但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一点，那么这个论断就是肤浅的。我们还看到，他领导反帝斗争，起的是进步作用。国民党是一个特殊的团体，它包括各个不同阶级的联盟，因此在国民党内我们有可能利用这个特殊情况从下面来加强国民党内的左派并通过这个机制来加强我们在军队中和政府中的主要战略性阵地。当然，资产阶级在发展的一定阶段上，在工人群众的压力下会变得越来越反对革命，它会动用军事力量对此作出反应。那时我们就要转入攻势，也许转入军事进攻，但我们应该利用这些机制和中间环节。如果我们处于另一种情况下，我们也许要退出国民党和政府。同国民党一刀两断，不参加政府，不利用国民党机关，不利用政府机关，不利用军事机关——这是理智的政策，这也是可以理解的。但不能像拉狄克同志那样来谈论这个问题，他说，我们参加政府是对的，但同时又主张我们应该自动地反对蒋介石。不排斥他的这一主张，但在目前办不到。这里有一个我们策略上的例子。当出现两个中心的威胁变得很严重时，我们在这里决定：在继蒋介石发表忠于共产国际的声明<sup>①</sup>之后给他发一份电报，说明我们认为他的声明是对中国民族解放运动、对革命统

<sup>①</sup> 不清楚这里指的是蒋介石的哪一个声明。

一战线等等的沉重打击，并让他服从国民党全会的决议。蒋介石不得不作出决定表示服从，同意任命军事委员会，服从国民党领导作出的一切决议，等等。因此，这两个中心并不是作为权力中心存在的，而且我们的人通过这些决议巩固了自己在军事机关和国家机关中的阵地。这重要不重要呢？这很重要。从而我们可以赢得时间，巩固自己的阵地，采用部分公开手段完成自己的工作，当然这是我们应该做的。现在我们获悉蒋介石的声望下降了。但是，如果我们三周前采取反对他的行动，那他就会把我们击败，这就会破坏反帝力量的团结。这是愚蠢的策略。我们现在巩固了自己的力量，赢得了进一步准备和组织我们的力量的喘息时间，并揭露了蒋介石。目前的结果对我们的方针是有利的。我认为，把事情说成这样：最主要的不是反帝斗争而是国内阶级斗争，这是极其轻率的。两者都重要。不能把它们彼此对立起来。从历史角度来说反帝斗争是摆在我们面前的最重要任务之一。我们认为，针对目前的局势，正确的做法是利用机关的一切条件，不是为了退出国民党，而是为了通过国民党内部各个集团、整个国家机关系统、各省当局、各地方当局的向左转来争取国民党。工农自治——这是个十分明确的方针，这个方针是根据我们在中国所面临的整个局势提出来的。

**库恩：**那么农民问题呢？

在国民党内<sup>①</sup>，农民运动以及农民运动武装在日益发展。发生过几次这样的情况：国民革命军指挥部召开几次代表会议，但从另一方面说，这是很大的投机行为。我记得三周前召开过两次规模很大的农民代表会议，蒋介石亲自出席其中一次会议，还发表了演说<sup>②</sup>。他千方百计要引农民上钩，把他们吸引到自己方面，等等。不能认为对工人和农民已经展开了全面的攻势。不能这么说，

<sup>①</sup> 原文如此。意思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内。

<sup>②</sup> 演说没有找到。

因为广州政府在这种局势下试图进行应变。也发生过枪杀工人的事件，例如在香港事件<sup>①</sup>中有三名工人被枪杀，但这种事件在我们这里也发生过。在中国，这是同资产阶级向正在出现的革命运动施加压力和大力加强自身组织紧密联系着的。在香港等地，资产阶级、封建主等都在武装自己。这些<sup>②</sup>……是地主的宪兵队，在许多村子里都是它们掌权。但农民自己也在组织起来，并且很积极，在军事方面他们建立了所谓的“红枪会”。存在着各种匪帮。但不是所有的人都是盗匪，参加匪帮的有一贫如洗的破产农民，他们拿起了武器。这些人组成的队伍几乎有一个军。在那里总的说来是一片混乱，要把这些乱七八糟的队伍整顿得像个样子还需要一段时间。关于策略方针我已经谈过了。

我想再次强调指出：再次给各国党发电报，要求他们一定把中国问题提到首位，并发表声明抗议帝国主义者在中国的行径，抗议业已进行的反对中国人民的大战，这也许是有意义的<sup>③</sup>。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72，第 5—11 页。

德文打字稿，副本。

① 香港事件的详细情况不详。

② 原文如此。意思是：民团。

③ 卷宗内还有 Н. И. 布哈林的报告简述和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如下决定：“电示 [共产国际] 各支部，要求它们把中国事件更明确地提到自己政治活动的首位”（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22，第 21 页）。

183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93号（特字第71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3月31日于莫斯科

听取：5.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5. —— [1] 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并抄送林德同志：

“收到发自上海的中共中央署名报告，说蒋介石已在上海发动政变，命令上海人民政府自行解散并打算在这方面进一步采取行动。您是否知道这个情况，这是否属实？您打算采取哪些措施？您是否认为这样做是恰当的：对蒋介石作出某些让步以保持统一和不让他完全倒向帝国主义者一边？”

[2] 给上海中共中央发去对今年3月31日来电<sup>①</sup>的如下答复：

“（1）在群众中开展反对政变的运动；（2）暂不进行公开作战；（3）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将武器藏起来；（4）揭露右派的政策，团结群众；（5）在军队中进行拥护国民政府和上海政府、反对个人独裁和与帝国主义者结盟的宣传；（6）请每日通报情况。”

[3] 同意外交人民委员部关于在逮捕我国外交信使和鲍罗廷

---

<sup>①</sup> 电报没有找到。

娜<sup>①</sup>同志的问题上不求助日本的意见。

[4] 就贷款问题答复鲍罗廷同志，我们原则上同意向国民政府提供贷款，但要说明鉴于各种困难希望分两期付款，并请告知，可否一部分贷款用商品支付和用哪些商品支付。我们认为，形式上应以我国经济机构的名义来组织贷款。建议有关贷款问题暂时保密。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2]。

### 1927年3月2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9——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9. 采纳斯大林、布哈林和加拉罕同志关于发去如下电报的建议：

“上海，致中央委员会。我们认为，长时间地举行总罢工要求归还租界，在现阶段是有害的，因为这可能使上海工人处于孤立状态并便于当局对工人采取新的暴力。最好是组织示威性的罢工，抗议在南京的暴行，而租界问题要同国民政府商量。”

抄送：

加拉罕、伏罗希洛夫、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

<sup>①</sup> 张宗昌部队在南京市近郊进行袭击时逮捕了Ф.И. 鲍罗廷娜和3名苏联外交信使，以及“纪念列宁”号轮船的全体船员并把他们押送济南监狱（山东省）。

## 1927年3月28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0.——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0.——给上海党中央发去如下电报：

“请你们务必严格遵循我们关于不准在现在举行要求归还租界的总罢工或起义的指示。请你们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福京立即返回莫斯科。请经常通报情况。”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同志。

## 1927年3月31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2——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同志）。

决定：32——以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名义从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的款项中给上海工会理事会汇去10万卢布，以便上海工会理事会将这笔款项用于救济南京炮击的受害者。

抄送：

别列尼基同志——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

沙因曼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17，目录162，卷宗4，第90—93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184

##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 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 代表团联席会议记录<sup>①</sup>

1927年4月4日于汉口

### 1. 联席会议的召开

在汉口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共]湖北[省]委员会委员和[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的联席会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完全迁至汉口前应由共产国际代表团召集。

联席会议的工作由瞿秋白、张国焘、谭平山三人组成的委员会领导。

### 2. 反帝运动

张太雷的报告。

### 3. 全国代表大会议程<sup>②</sup>

1. 共产国际代表关于国际形势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sup>③</sup>对中国的总结的报告。

① 标题是原来有的。

② 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③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扩大全会。

2. 中央执委会的政治报告。
3. 中央执委会的组织报告。
4. 关于中共土地纲领的报告。
5. 中共的工人政策。
6. 关于青年的报告。

必须选出委员会来起草下列决议：

1. 总的政治决议。
2. 关于我们与国民党的关系的决议。
3. 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
4. 农民问题。
5. 工会问题。
6. 党内学习。
7. 妇女。

#### 4. [中共中央执委会] 全会 和 [党] 代表大会的日期

全会应于 4 月 20 日召开，代表大会应于 4 月 25 日召开。

Л. III. ①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98，第 1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

① 何人不详。

185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94号(特字第72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4月7日于莫斯科

听取：2.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2. —— [1]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就搜查我国驻北京大使馆工作人员住所事件<sup>①</sup>以塔斯社名义起草一份新闻公报。

[2] 成立由李可夫、斯大林、布哈林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最后审定新闻公报稿，决定该公报的发表问题，以及就这一问题拟定给外交人民委员部的指示。

[3] 指示切尔内赫同志仅对逮捕和搜查享有豁免权者的住所正式提出抗议，未经莫斯科批准不要采取任何其他步骤。

[4] 建议委员会在政治局交换意见的基础上起草给蒋介石的代表邵力子的来信的复信<sup>②</sup>。

[5] 征询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意见，拟派格里高里<sup>③</sup>同志去上海与蒋介石进行联系并防止他采取极端行动，这样做是否合适。

---

<sup>①</sup> 指1927年4月6日张作霖军队的士兵和警察闯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区，搜查和抢劫武官住所和大使馆工作人员住宅、逮捕苏联公民的事件。

<sup>②</sup> 见第181、186号文件。

<sup>③</sup> Г. И. 维经斯基。

[6] 认为有必要把切尔尼亚克<sup>①</sup>同志从上海调到另一个责任较小的地方。责成加拉罕和布哈林同志派另一位同志去上海工作。

[7] 绝对禁止利用中东铁路的地带和组织在北满组织游击运动或搞破坏活动。不准在苏联境内建立游击队。

[8] 认为有必要研究国民政府的军用器材订货并开始与代表团就交货事宜和支付条件进行谈判。

[9] 建议加伦<sup>②</sup>和鲍罗廷同志派一名更称职的同志去代替李济深的顾问叶夫列莫夫同志。

[10] 征询国民党中央意见，中山大学的一批国民党右派学生是否必须返回中国。

[11] 认为有必要推迟阿拉洛夫同志去广州的日期。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李可夫同志—— [2]；

布哈林同志—— [2]、[6]；

温施利赫特同志—— [3]、[5]、[6]、[7]、[8]、[9]、[10]、[11]。

## 1927年4月6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1.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1. ——立即通过远东银行上海分行拨给汉口中央银行200万卢布。

抄送：

① T. Г. 曼达良。

② B. K. 布留赫尔。

加拉罕、沙因曼、弗鲁姆京同志。

听取：32. ——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驻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团关于重新研究政治局就派遣青年共产国际代表出席中国共青团代表大会的决定的请求。

决定：32. ——改变政治局今年4月5日的决定，批准希塔罗夫同志出席中国共青团代表大会<sup>①</sup>。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97—98、10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sup>①</sup> 指 1927 年 5 月 10—16 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四次代表大会。

186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 给国民党代表邵力子的信

1927年4月7日于莫斯科

秘密

### 致国民党代表邵力子同志

尊敬的同志：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感谢您3月30日的来信<sup>①</sup>。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坚信国民党将保持团结一致，外国帝国主义者、军阀以及中国劳动人民的其他敌人都无法分裂高举民族解放旗帜的伟大的党。共产国际满腔热忱地注视着中国的解放斗争并动员全世界无产者的力量来直接支持革命的中国。共产国际认为，只有在共同的反帝斗争战线中保证工人阶级及其武装部队有相应的地位，中国的斗争才能取得最终的胜利。俄国同帝国主义干涉的伟大斗争的经验表明，工人阶级及其武装部队是反对帝国主义干涉以及国内帝国主义阴谋活动的最可靠的保证。

共产国际认为，实行任何反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策略都是对中国人民的民族革命的犯罪。

共产国际希望，通过革命的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将取得对帝国主义暴行的胜利。

---

<sup>①</sup> 见第181号文件。

中国革命万岁！  
国民党万岁！  
致革命的敬礼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73，第 189 页。  
打字稿，副本。

187

## 多里奥、维经斯基和罗易给共产 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27 年 4 月 7 日于汉口

### 电 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我们认为，鉴于目前局势严重和共产党人担任政府职务后在领导革命工作中所肩负的重大责任，完全有必要让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兼任共产国际驻国民党的代表并参加国民党的一切领导机关。

我们在对时局作了认真研究之后，并不认为直接派代表必须取决于是否立即正式接纳为成员<sup>①</sup>，接纳问题可以推迟到政治情

---

<sup>①</sup> 指接纳国民党加入共产国际一事。

况好转后再来解决。

另一方面，国民党曾决定建立跨党委员会来协调两党的活动，并且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该委员会工作<sup>①</sup>。我们认为，建立这个委员会在目前时期是有好处的。这也需要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设有自己的代表。

代表团通过了增补鲍罗廷的决定<sup>②</sup>，因为与国民党的领导机关不建立直接联系，就难以具体指导共产党和代表大会<sup>③</sup>的活动。

多里奥  
维经斯基  
罗易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0，第 1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

<sup>①</sup> 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第三次全会 1927 年 3 月 13 日通过的《关于革命力量的团结一致》的决议（见《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 2 卷第 774 页）。

<sup>②</sup> 指增补 M. M. 鲍罗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参加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成员。

<sup>③</sup> 指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



188

## 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会议记录

1927年4月9日于汉口

### 共产国际代表团会议记录

出席：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

#### 1. 国民党和鲍罗廷

**罗易：**我同鲍罗廷谈过。我认为在国民党同共产国际代表之间建立直接联系有某些困难。也许有必要就这个问题请示莫斯科。但政治形势是这样：共产国际代表团不与领导取得联系是不行的，甚至党代表大会也与目前形势相关。甚至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团也不能脱离总的政治形势。因此为了立即解决困难，鲍罗廷以顾问身份成了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这不应大事宣扬。但这样一来他就得对代表团的一切行动负责。如果代表团由于没有得到情报和没有与国民党取得联系而采取了错误行动，那么鲍罗廷就要对此负责。

多里奥同意上述意见。

**维经斯基：**这是不是说鲍罗廷要参加对党内问题的所有讨论？

**罗易：**不一定。但我个人的意见是他应该参加。

**维经斯基：**我们可以暂时通过这一点。但我们应正式向莫斯

科作出报告。

**罗易：**鲍罗廷的意见是，在这紧要关头不应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团参加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工作。

**维经斯基：**他说共产国际代表团不能在政治委员会中工作，我不同意这个意见。但我们不能制造冲突。因此最好采取另一种途径。

**罗易：**为了避免产生误会，曾向他提过另一条建议，即共产国际在国民党内设正式代表。他同意了，但提出一些条件。他提出了很严厉的条件，不可避免地要出现我本人干不了的局面。因此我建议共产国际另派一个人来。客观上共产国际应有自己的代表机构。我的推荐是，鲍罗廷应担任代表。斯大林表示反对，因为鲍罗廷与政府的联系过于密切。但鲍罗廷反对派两名代表。

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提出问题。国民运动处境危急。他们在遵循一定的方针，而这个方针会导致在国民运动中出现很危险的冲突。他要对此承担一切责任。如果这一政策失败，他就不得不对此承担责任。在这个时刻我们不应做任何破坏他的威信的事。不要束缚他的手脚。如果共产国际的代表现在就参加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会议，那就可能发生分歧。要么共产国际的代表不得不公开表态并声明鲍罗廷提出的政策是错误的，要么他应保持沉默，而这样做就更糟糕了。

**维经斯基：**我认为，我们应该给莫斯科发去两份电报，说明我们目前对时局的看法，指出我们不能进行干预。为了防止出现两种方针，他应当成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组织问题应出自于这种考虑。

**罗易：**我们可以简单地这样处理：形势要求他成为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成员。我们简单地作个报告，说明为什么需要这种合作。

**多里奥：**我想商量一下罗易参加政治委员会的问题。不知这是否可行。国民党与共产国际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妥善处理。

**罗易：**鲍罗廷同意共产国际的代表应该参加。他将做我们希望做的事情。但我不想在这种危急形势下当共产国际的代表，因为一旦我不同意鲍罗廷的方针我是不能发表意见的。结果是：我应保持沉默或者做出什么可能成为政策失败的原因的事情。

**多里奥：**问题十分严重。应该把问题向莫斯科提出。如果我处在罗易的位置，我会参加政治委员会。

**维经斯基：**我们应向莫斯科解释他向我们报告的情况。他可以不同意我们的政策，但他应当加以执行。

**罗易：**冲突不涉及政治方针。我们常常在“如果发生分歧怎么办？”的前提下讨论问题。在方法上和策略上存在着重大分歧。

我们在非党组织中不能有两种意见。这很清楚。参加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任何一个代表都会与鲍罗廷发生冲突。把这种情况告诉莫斯科，让莫斯科作决定。

决定：如上面所建议的。

## 2. 远东局

解散。

## 3. 俄国同志

**维经斯基：**青年共产国际和工会国际的代表可以参加中央执委会<sup>①</sup>会议。其他同志在研究涉及他们工作的问题时可被特邀参加。应向他们提供与中国共产党党员同样的条件。他们享有的权利不应多也不应少。

**罗易：**这是组织问题。但他们谈到了危机。

**维经斯基：**他们要谈领导中的某种危机。中国的同志们请求他们不要围绕这个问题大作文章。

---

<sup>①</sup> 指中共中央执委会。

**多里奥：**这些俄国同志把形势弄得更加复杂了。我们应向莫斯科作出报告。

未作出明确的决定。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7，第 39—40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 189

#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sup>①</sup>

1927 年 4 月 10 日于汉口

主席：瞿秋白。

出席：张国焘、谭平山、彼得罗夫<sup>②</sup>、李立三、苏兆征、蔡和森、毛泽东、罗章龙、萧子暉<sup>③</sup>、贺昌、沃罗夫斯基<sup>④</sup>、陈延年、罗易、多里奥、维经斯基、阿尔布列赫特、福京、鲍里斯<sup>⑤</sup>。

听取：1. ——关于上海问题的讨论。

决定：1. —— [1] 通过罗易同志的决议案<sup>⑥</sup>。

---

① 标题是文件原有的。

② 彭述之。

③ 文件上是：沙启沙 (Sha Chi-sha)

④ 黄平。

⑤ B. C. 弗赖耶尔。

⑥ 《关于上海工作的决议》于 1927 年 4 月 11 日通过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35—38 页)。

- [2] 立即召回布哈罗夫<sup>①</sup> 同志。  
 [3] 将档案转移到汉口。  
 [4] 任命陈延年为上海委员会代理书记。

Л. III. ②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98, 第 2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190

## 罗易给蒋介石的电报

1927 年 4 月 12 日于汉口

南京, 蒋介石元帅:

我们获悉, 您请求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指示其驻中国代表与您见面, 以便讨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武汉会议<sup>③</sup>后出现的问题。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一直想拜访您, 但没有来得及这样做, 因为我们先后访问了中国的一些边远地区。一星期前我们在武汉集中, 打算去上海对您作一次您所希望的拜访。在我们出发前夕获悉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领事馆遭到袭击<sup>④</sup>, 这说明帝国主义列强正在采取极富挑衅性的手段。后来我们收到消息说您已离开上

① 罗亦农。

② 何人不详。

③ 指 1927 年 3 月 10 至 17 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④ 1927 年 4 月 6 日苏联驻北京大使馆遭到袭击, 第二天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被包围。

海。因此我们取消了原定去上海的访问。

现在有消息说您决定召集中央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在南京开会。这一行动显然违背了您与汪精卫同志关于党内一切有争议的问题都应提交中央全会解决的协议<sup>①</sup>，而全会应在武汉召开并且您将参加。您在这个紧要关头召集中央委员会的几位委员开会的做法自然会被革命的敌人说成是国民党队伍内部的分裂。在国际帝国主义联合起来对中国国民革命采取厚颜无耻的进攻行动的时候，革命力量亟需团结一致。实际上民族主义者队伍内部的不和正助长了帝国主义采取像提出五国共同照会<sup>②</sup>那样的傲慢态度。鉴于形势危急，我们建议您放弃计划在南京召开的、实际上是分裂党的会议。不然，在此紧急关头分裂国民阵线的重大责任将由您来承担。我们建议您遵守协议，把党内一切有争议的问题提交中央委员会全会来解决并服从全会的决定。如果您接受这一忠告，我们将愿意访问南京，以便和您本人讨论一切重大问题。共产国际将尽可能帮助建立一切革命力量的反帝统一战线。

代表共产国际代表团 罗易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49，第 4—5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sup>①</sup> 这是 1927 年 4 月初汪精卫和蒋介石在上海谈判时达成的协议。

<sup>②</sup> 1927 年 4 月 11 日英、美、法、日、意五国通过上海警备司令白崇禧将军向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发出最后通牒，把发生南京事件的罪责加到国民党当局身上并要求道歉，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再发生反对外国人的行动。



## 第四部分

国民革命运动的危机和共产  
国际与国民党关系的破裂





从1927年4月中旬蒋介石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武装并对其实行镇压，以及他的军队和支持者在所控制的地区公开捕杀共产党人，到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决定断绝同中共的关系，这一短暂的时期发生了许多重大事件，中国的军事政治形势、国民党各个派别和中国共产党的境况和政策、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中国政策都有很大变化。这一时期的结局，包括莫斯科在7月初为摆脱危急局面所采取的方针，给后来的中国政治历史进程、给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中国和对其他东方国家的政策打上了很深的烙印。

4月18日，蒋介石集团在南京成立了自己的政府，这表明它已同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决裂，这一行动大大地改变了国内的军事政治形势。现在与中国东北和北方军阀集团相对抗的，是已经分裂的国民革命阵营的两个相互敌视的中心，即南京中心（这个中心对东南和南方省份的首领以及一些西南省份的首领有吸引力）和在湘鄂赣三省地界的武汉中心（这个中心在6月中以前得到了北方的冯玉祥和阎锡山集团的承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只是在武汉政府控制的地区保留了进行公开活动的可能性。莫斯科实行其对华政策的种种打算都是与武汉和冯玉祥的行动、与继续同武汉国民党进行合作的中国共产党联系在一起的。

在莫斯科，对华政策是在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的激烈斗争中制定的。反对派领导人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等人把华东和华南四月事件结局的责任问题，以及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整个对华政策问题，作为他们所开展的反对斯大林—布哈林多数派的新一轮斗争的中心问题。

自1927年春开始，苏联和资本主义大国之间的关系日趋紧张，这也与莫斯科的中国政策、与国民革命军进入中国东部沿海地区大城市和列强势力范围有关。5月底英国政府作出了同苏联断交的决定。

南京中心成立后，武汉受到了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武汉政府各派势力的代表，虽然动机不同，但一致认为，为维护和发展政府，必须摆脱孤立状态。军方根据军事上和经济上的考虑主张打破封锁。莫斯科的代表、中共领导人和一部分意识到武汉的实权掌握在军人手中的武汉国民党政治领导人，把扩大政府控制区看作是减少政治领导对军人的依赖的一种手段，因此有可能重演“上海方案”。

4月中旬，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内部，在鲍罗廷与新的共产国际代表、共产国际执委会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成员罗易之间，以及在中共领导内部就行动计划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此后决定取道河南进行北伐，同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以便占领北京，然后再讨伐蒋介石。5月，蒋介石也开始讨伐北方军阀。与此同时，他还企图分化武汉军队，把冯玉祥拉到自己一边。

6月初，武汉军队以巨大的伤亡代价进入河南，同冯玉祥的部队会师。在冯玉祥与武汉领导人举行的会议上，决定把河南、陕西和甘肃三省交由冯玉祥控制。预计冯玉祥和阎锡山会进攻北京。武汉部队则返回原地，以便在补充兵员后征讨南京。

这时，南京明显比武汉具有军事上和经济上的优势，武汉政府辖区内的经济形势和军事政治形势进一步恶化。因为军事开支增加和经济封锁而造成的困难和社会紧张局面，又由于出现部分自发的和部分由激进的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所指导的左倾行动而加重了。在城市里，过高的经济要求导致了企业的破产和关闭，失业人数增加。在农村中，减租的呼吁和企图给中小地主即主要纳税人带来了破产的威胁。工农运动的高涨伴随有种种过火的行为，如工人纠察队和工会擅自行动、抢占土地和财产（其中包括国民革命军官兵的财产）、对农村上层代表施加私刑等，这些在军队中引起了不满。5月中，武汉政府管辖的地区出现了一个军队哗变的时期：逮捕共产党员并要求把他们驱逐出去，解散并镇压工

会和农会。长沙市内军人的这类行动规模最大。6月初，江西政府首脑朱培德将军把在该省工作的共产党员驱逐出境。6月下旬，冯玉祥公开主张同蒋介石合作，并建议武汉出面斡旋同南京和解，条件是同中共决裂，而莫斯科曾在实施进攻北京、反对南京的计划方面对冯玉祥寄予厚望。

武汉局势变得十分危急。武汉军事领导人实际上支持对长沙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农民运动采取行动。无论在军队中还是在武汉政府内，要求同共产党人决裂、严格限制工会和农会活动并使之完全屈从于当局的呼声日益强烈。

6月底7月初已经看得很清楚，宁汉在某种条件下，首先是在武汉国民党同中共决裂的条件下实行和解和联合，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这意味着莫斯科的与武汉政府有关的计划和打算遭到了失败。为了寻找出路、摆脱7月上半月所形成的局面，先是莫斯科全面修订了自己对武汉政府的政策，宣布它为反革命政府。随后，7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作出了同中国共产党断绝关系的决定。这个决定和随后的行动结束了莫斯科、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的合作。

这个时期的事件在各种学派作者撰写的许多总结性和专题研究性著作中都有论述<sup>①</sup>。参与这些事件的各种力量，即军事政治集团、党派和国际组织的立场，在有关它们的活动的文献出版物中、在它们的领导人的文集和一些著述中，以及在大量的回忆录性质的著作中都有所反映。

---

<sup>①</sup> 《中国现代史（1917—1927）》第294—308页；B. И. 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2册第241—331页；蒋永敬：《鲍罗廷与武汉政权》第185—415页；李云汉：《从容共到清党》第2卷第626—744页；刘继增、毛磊、袁继成：《武汉国民政府史》，武汉1968年版；黄修荣：《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史》上册，北京1989年版第326—382页；郭恒钰：《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第一次国共合作）》，台北1991年版第325—422页；《中国共产党历史》，北京1991年版第1卷第182—201页；《北伐战争（1926—1927）》第666—808页；韦慕庭：《中国民族主义革命（1923—1928）》第108—146页。

本文件集这一部分发表的文件大大充实了关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这一时期的政策,即关于这一政策的内容及其演变的原因、关于莫斯科驻中国代表的观点和活动及其同中共和武汉国民党领导人的关系以及对他们的立场的影响的材料,说明了这一时期的许多至今还引起研究人员的兴趣和争论的主要事件的起因和过程。

在这一部分文件中,首先应当指出编者接触到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领导机构在这个时期作出的所有决议、发给莫斯科驻华政治、军事代表以及国共两党领导人的指示和信件。除了以前不知道的决议和指示外,这一部分还发表了一些决议和指示的全文,这些决议和指示在斯大林的讲话中提到过,在一些回忆录中谈到了它们的内容,但以前只了解它们的要点。编入这一部分的还有不久前才发现的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这些信涉及对华的政策问题。这些文件与共产国际的一些文件、斯大林和布哈林的讲话以及当时苏联报刊上和共产国际出版物上发表的材料合在一起,提供了全面说明莫斯科的方针的可能性。

这里公布的文件证明,在中国发生四月事件之后,莫斯科还坚持要求立即贯彻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七次全会及会后通过的基本方针,而这些方针在通过时预定要用于一个较长的时期。不仅如此,在大大恶化了的局势下,行动方针变得更加激进了,这表现在对中国革命阶段的新的评价上,给中共和武汉政府提出的任务上和不断“缩短”这些任务的完成期限上。

新的“左”倾是由总的理论观点,对中国革命内容和前景的认识,以及以前的无可选择的方针的惯性决定的。此外,这个时期反对派从更“左”的立场出发反对斯大林和布哈林左的方针,同他们的斗争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制定对中国的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这个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斯大林—布哈林领导的所有基本文件,不仅反映了对在中国的以后的行动方针

的探索，而且还表明试图消除反对派的批评对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内部状况的影响，“保证”自己万一失败时不再受到执行“孟什维克政策”的指控。结果，尽管反对派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的立场同其论敌的立场还是越来越接近。7月，除了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外，双方的基本策略方针实际上已没有差别<sup>①</sup>。当时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拉斯科尔尼科夫在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中指出了这种情况（第250号文件）。

4月12日以后，经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批准，并于4月21日发表的斯大林的《中国革命问题》提纲，首次对中国局势作出了新的评价。提纲断言，蒋介石的政变，第一，“标志着民族资产阶级脱离革命”，第二，意味着中国由全民族统一战线革命开始转入土地革命。这种不符合实际的评价和对武汉政府的十分不现实的期望，即“武汉革命的国民党……将真正变成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革命民主专政机构”<sup>②</sup>，以及后来斯大林和布哈林的演说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sup>③</sup>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对这种评价和期望的重申和发展，确定了莫斯科1927年4至6月对中国的基本方针。这些方针包括：开展土地革命和城市群众运动，在此基础上建立“由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可靠的武装力量”，促使武汉国民党变成劳动者的组织，变成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联盟，在这个联盟中后者实际上会起主导作用。这些方针构成了这一时期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给中国的基本政治指示的内容（第200、219、223、233、243号文件）。

开展土地革命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的打算，明

<sup>①</sup> 关于这一点的详情参见 A. 格里戈里耶夫：《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斗争（1926—1927）》，载《远东问题》杂志1993年第3期第112—128页。

<sup>②</sup> 《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25—226页。

<sup>③</sup>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18—132页。

显地反映了把俄国革命的经验 and 国内战争时期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搬到中国来的意图。无论是当时还是很久以后，共产国际领导人和思想家都没有认识到，中国农村社会结构的特点和土地占有与使用的特点，都使得这里不可能按照俄国的模式来进行土地革命。根据布尔什维克的经验提出的关于可以在短期内建立由“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组成的武装力量的设想，没有考虑到在中国组建这种部队的特殊困难（居民对服兵役的传统持消极态度，他们没有掌握使用哪怕是最简单的火器的技能，按照俄国模式即通过使士兵与军官相对立的做法来分化雇佣的军阀部队不现实）。为了建立自己的可靠的能够与职业雇佣军相对抗的大部队，需要有指挥骨干、资金、武器和时间，而这些却是中国共产党在被军人封锁和控制的武汉所没有的。

几乎到6月底，莫斯科还指望“从下面”和“从上面”来实现他们的打算。“从下面”来实现，也就是通过开展土地革命，开展群众运动和共产党人及国民党左派在当地国民党组织、工会和农会中的活动来实现；“从上面”来实现则希望武汉政府领导人支持这些措施，哪怕是部分领导人支持也好。这里显然指望能使武汉领导人相信，除了“革命的雅各宾派”的道路以外，他们没有拯救被敌人包围的武汉的其他办法（第219号文件）。这里表明莫斯科对许多武汉领导人，特别是对汪精卫抱有幻想，他们对苏联物质援助的依赖程度估计过高。应当指出，所公布的文件第一次提供了苏联答应给武汉政府的贷款的数额（第233、235、238号文件）。这些数据资料和对汪精卫的坚定希望，可以认为也说明了汪精卫在回国途中在莫斯科逗留期间双方谈判和保证的内容。

实行“深化”武汉主要控制区的革命的方针是与支持武汉军队北上同冯玉祥会师<sup>①</sup>的做法相结合的。武汉军队同冯玉祥的部

<sup>①</sup> 见斯大林：《同中山大学学生的谈话（1927年5月13日）》，载《斯大林全集》第9卷第254—255页。

队会师后，莫斯科认为，形成了沿着几个方向发起攻势的有利条件，可以进攻北京和山东，“以便切断蒋介石的去路，进而使自己在山东和北京站住脚”，同时还可以进攻南京或广州（第 223 号文件）。进攻北京同时也进攻南京被认为是最有利的（第 233 号文件）。为了讨伐南京，武汉要求莫斯科再提供 1500 万卢布（第 233、235 号文件）。

但是在证实了关于冯蒋合作的消息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的所有决定都与寻找退路，力图避免反对派提出新的指控和缓和党内对自己方针的失败作出的反应有关。6 月的最新指示建议中共寻找退路，同时重申了以前的方针（土地革命等）（第 243 号文件），这些指示和给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的电报（第 238 号文件）为莫斯科后来指责武汉政府和中共领导准备了条件。斯大林这个时期的信件（第 239 号文件）证明了这一点。他在信中对中共领导进行了严厉的（和不公正的）批评（第 251 号文件），这表明他是主张把莫斯科方针遭到失败的罪责推到中共身上的首倡者之一，而这种主张不久就在联共（布）中央和共产国际的七月指示和决议中实现了。

本部分的很大一组文件反映了莫斯科驻中国代表鲍罗廷、罗易和维经斯基的立场。其中大部分是罗易的电报、信件和其他文件，这反映了编者所遇到的情况：暂时还没有找到这一时期属于鲍罗廷和布留赫尔的文件以及他们给莫斯科的电报或报告。鲍罗廷的立场体现在他的许多发言记录和罗易文件的评价中，而维经斯基的立场则体现在他亲自起草的两份文件中。有两个文件在时间上超出了所探讨的时期的范围，但在内容上与这一时期有联系，也应当归入这一组，这就是罗易和鲍罗廷在返回莫斯科之后于 1927 年 9 月和 10 月，也就是在新的形势下所作的报告（第 266、268 号文件），这给它们对事态发展的叙述和评价都打上了烙印。



这里公布的罗易的文件大大充实和纠正了他的书<sup>①</sup>中提到的关于他的活动的报道,其中包含一些新的资料或者证实了有关鲍罗廷、中共领导人和武汉国民党领导人的立场的某些报道。

总的来说,这些文件表明,随着事态的发展,莫斯科的代表对莫斯科方针的现实性和贯彻执行的可能性产生了某种程度的怀疑。这在鲍罗廷的立场上体现得最为明显。还在5月初他就认为可以执行关于“从下面”开展农民夺取土地的斗争的指示(第201、208号文件),并认为武汉当局不会阻止这样做。但是军人对这种策略的反应,特别是长沙事件及武汉领导人对这些事件的态度,看来使他有了这样一种信念:莫斯科从5月底到6月底发出的指示所一再重申的基本方针(土地革命、建立自己的武装、改组国民党)不可能在武汉地区得到执行。鲍罗廷的这种看法在罗易给莫斯科的电报和信件(第221、224、229号文件)中已经指出来了,并且在这里公布的他在6月底的讲话记录中得到了证实。他在讲话中坦言,他不同意很长时间收到的指示,他夹在这些指示和现实之间左右为难,因此建议在改变莫斯科方针方面,哪怕是部分改变,寻求“同莫斯科的一致”(第237号文件)。

维经斯基在中共五大结束后不久就离开了中国,他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作了一个报告(第231号文件),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莫斯科某些方针的可行性的怀疑<sup>②</sup>。虽然整个报告坚持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方针的精神,指出了中共在军队中的地位薄弱,建立农村武装的困难,但报告还强调了开展土地革命的主要困难是没有自己的军队。报告相当清楚地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不可能“通过协议”迫使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接受“我们的土地纲领”。对

<sup>①</sup> 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莫斯科—列宁格勒1929年版。

<sup>②</sup> 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成员在中共五大上发表了讲话(第202号文件)。代表大会决议见《中共中央文献选集》第3卷第47—111页。

于是否可以把国民党变为群众性政党的问题，维经斯基回答说，他不知道能否很快做到这一点。

罗易直至（因给汪精卫看了5月30日指示<sup>①</sup>）被从中国召回之前，一直在很卖力气地捍卫土地革命的方针，5月底他就对武汉中心提出了与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不同的评价。他在给莫斯科的电报中写道，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其多数领导人的“左”倾是“做给人看的”，南京与武汉实际上没有区别，它们之间日趋妥协；罗易主张共产党员退出政府（第215、217号文件）。6月上旬，他提出了意味着中共实际上同武汉国民党断绝关系的措施（武汉总罢工和湖南农民暴动）<sup>②</sup>。

几乎莫斯科的所有代表（和许多中共领导人）都意识到，在农村中实现最激进的要求的尝试（不管其结果如何）都是与中共留在国民党内的方针不相容的。

这里公布的文件证明，4月以来的整个这个时期，在莫斯科代表之间，首先是在鲍罗廷与罗易之间一直在不断地就基本政策问题进行争论，加剧了中共领导的困惑和分歧；文件还含有表明争论激烈程度的补充材料：罗易在给莫斯科的许多电报中都提出了撤换鲍罗廷和把陈独秀召到莫斯科的问题，他称陈独秀是“国民党在中共的代理人”（第221号文件）。

在6月底的危急局势中，罗易曾建议武汉以汪精卫和邓演达为首的最可靠的部队向南推进，以便在苏联的直接支持下重建广东根据地（第234号文件），并试图说服汪精卫同意这样做（第240号文件）。鲍罗廷和陈独秀认为，接受武汉政府关于限制工农运动的一系列要求，是阻止国民党与中共关系即将破裂（这是军人所

---

<sup>①</sup> 有关召回罗易、信件往来和共产国际执委会后来就这个问题所作的决定情况，见第193、194、197、198、224号文件。

<sup>②</sup> 见В.И. 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2册第316页。

要求的)的最后机会,他们指望武汉部队预定对南京的讨伐能减轻对中共的压力(第237号文件)。同时,中共领导在寻找摆脱这种局势的出路时是希望通过挑起与上海外国租界当局及其军队的直接冲突和组织华东其他一些城市的工人反帝行动(第241号文件)来掀起反帝斗争的新高潮。莫斯科在6月30日指示中表示反对这个计划,但未提出具体建议,它一方面提出了“自己解决退路的问题”,另一方面又重申了以前的激进方针(第243号文件)。在这种情况下,7月初,中共中央全会通过了与鲍罗廷协商好的“退却策略”<sup>①</sup>。

但不久(1927年7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作出的决议,含有对中国局势的新的评价和给中共的新的指示(第247号文件),这些评价和指示在7月13日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目前中国革命形势的决议》<sup>②</sup>(第253号文件)中作了全面阐述。这些决议终止了与武汉政府和实际上与武汉国民党有关的一切策略方案,同时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也结束了共产国际以苏联、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和其他中国国民革命运动势力进行合作的形式实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整个时期。

这些文件中说,武汉在逐渐变成反革命势力,国民党上层“在掩盖反革命”。建议中共退出武汉政府,但要留在国民党内,现在只能争取“从下面”来改组国民党(第247号文件)。最后的这个措施显然是与联共(布)领导力求哪怕是暂时保持自己的方针与反对派的立场的区别有关:斯大林当时已意识到,这是一个临时措施,脱离国民党“在近期内可能是不可避免的”(第248号文件)。

<sup>①</sup> 见B·H·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期间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2册第321—326页。

<sup>②</sup> 发表在1927年7月14日《真理报》上,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36—142页。

对武汉的新的评价和对中共的要求(要求中共在土地革命、工农运动完全自由的口号下成为“真正的工农革命运动中心”)(第247号文件),意味着转向共产党同与它对立的各种势力公开对抗的方针。

《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中所包含的关于“近期中国革命遇到一些特殊困难和一系列局部失败”<sup>①</sup>的论点,只不过是羞羞答答地承认中国革命在共产国际所说的方面遭到了失败。这清楚地反映了斯大林在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中提出的见解,即认为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可能出现俄罗斯在1905和1917年那样的“间断”,中共将经历一个严重的考验时期(第251号文件)。但新的方针对中国共产党来说具有两面性。新的方针建议党成立秘密机构,拟定了退却策略。同时还建议党“教育工人群众做好采取决定性行动的准备”,“开展土地革命”,总之“要继续进行斗争,争取通过平民途径,也就是通过无产阶级领导下的工农和城市贫民联盟的革命攻势来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要有步骤地武装工农<sup>②</sup>。这些方针对中共领导的指责(认为中共领导犯了机会主义,拒绝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sup>③</sup>),促使党实行了进攻政策。随着政策的改变,根据莫斯科的要求,7月中旬,中共领导人作了变动。共产国际代表也进行了更换。鲍罗廷被有进攻性策略精神(并本着这种精神进行活动)的罗米纳兹所取代。总之,七月决议开辟了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对华政策的新时期,其特征是进一步向“左”转。

①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136页。

② 同上书,第141页。

③ 同上书,第140页。

## 191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团的决议**

1927年4月18日于汉口

**决 议<sup>①</sup>**

第一，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于作出关系到革命发展的重大决定的方法表示强烈的抗议。

两周前，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决定占领南京。几天后，又改变了这个决定，而主张立即沿京汉铁路北进，去占领北京。共产国际代表团反对拟议中的这次北进。结果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中央委员会<sup>②</sup>没有接受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观点。现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又突然作出新的决定，取消立即北进的计划，而主张去占领南京。

每次作出这样重大的决定都不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虽然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容忍了这种情况，但共产国际代表团认为，这是不能容忍的，对于共产党的发展来说是不正常的。这不是在国民革命中的合作，这是共产党完全屈从于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的决定。共产党参加国民革命，以劳动群众〔利益〕的有觉悟和有组织的代表身份加入了国民党，它必须保证在确定国民革命政策时对工农的利益和情绪给以应有的重视。共产

① 决议上有英文标记“转 B”（可能是转 M. M. 鲍罗廷）。

②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党中央委员会若没有权利和可能通过自己在国民党领导机构的代表对每个问题发表自己深思熟虑的意见,就不可能履行这种职责。这就是说,一切重大问题都应当在国民党作出决定之前在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内进行全面的讨论。

第二,共产国际代表团对于取消立即北进的计划表示满意。“经南京北上”的新口号更符合政治局势。但我们认为,“讨伐南京,消灭反动派的基地”的口号更适用于动员革命群众。因为消灭国民党所控制省份的反动势力是以后顺利北上的前提。

第三,共产国际代表团不能同意对广东局势的轻率态度。反动势力正在向这个前革命基地发起攻势。如不赶紧向那里调遣救援部队,革命群众组织就会被消灭。

第四,我们认为,现在预定进行的军事行动不足以镇压长江以南地区的反动派。因此代表团重申,应当采取一些发动革命民主群众的强有力措施,这些措施是代表团为巩固革命根据地在上次中央委员会<sup>①</sup>会议上提出来的。这是革命成功的唯一保证。

共产国际代表团 多里奥  
罗 易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47, 第 40—41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sup>①</sup>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

## 192

##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电报

1927年4月18日于汉口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抄送斯大林

国民党已分裂。蒋介石召集中央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开会<sup>①</sup>，宣布武汉联席会议<sup>②</sup>非法，而汉口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则是篡权者。4月14日，政治委员会作出决定，撤销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将他开除出党，并下令逮捕他<sup>③</sup>。这种明显的分裂行为是在下面这种政治形势下发生的。

除了湖南、湖北和江西部分地区外，国民党占据的其他所有省份都处在蒋介石的统治之下。湖南也只是名义上处于汉口的控制之下。那里是一年前加入国民党的唐生智主宰一切。他拥有实际上独立于国民政府的军队和国家机关。广东省政府和大部分军

<sup>①</sup> 指4月17日在南京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政治会议”，转到蒋介石一边的部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上作出决定，于4月18日正式宣布成立“国民政府”，首都设在南京而不是武汉。

<sup>②</sup> 显然是指1926年12月13日在武汉召开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会上成立了作为唯一权力机关的临时联合委员会。当时蒋介石承认联合委员会的全权。

<sup>③</sup> 关于把蒋介石开除出党、撤销他的一切职务并“依法惩处”的决定，是1927年4月15日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扩大会议上作出的（见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中国1925至1927年革命史略）》第115、240—246页；《中国国民党第一、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2卷第930页）。

队都处于蒋介石的控制之下。蒋派遣自己的代理人到四川，拉拢该省参与反对武汉的斗争。蒋介石的军队多于武汉的军队。通过立即采取军事行动来推翻蒋介石的计划被取消。我认为，分裂暂时使蒋介石在各个方面都变得比武汉更强大了。

蒋介石与武汉冲突加剧时，我正在广州，无法在国民党中央举行联席全会<sup>①</sup>前赶到汉口，这次会议采取了公开反对蒋介石的政策。4月2日我到汉口后，发现事态在走向分裂。很明显，同蒋介石的斗争不可避免，他已转为反对革命，应当推翻他。但还是有可能同他周旋一段时间，分化他的力量，使不可避免的分裂能把他孤立起来。在多里奥和维经斯基的支持下，我曾建议共产国际代表团去拜访蒋介石，以便在下列原则基础上同他商谈革命力量的统一问题：（1）服从党中央委员会；（2）所有武装部队服从军事委员会；（3）集中财政和外交。如果蒋介石同意我们的建议，我们就邀请他到武汉参加共同的和解会议。若是他拒绝，共产国际代表团就发表声明，证明他反对党的政权，号召群众团结在武汉周围。鲍罗廷认为，采取这种政策已为时太晚。我想向政治委员会提出这个计划，至少告诉它，共产国际代表团建议在这种危机局势下如何行动。鲍罗廷说，国民党人不会理解我们的动机，而会以为共产国际想同蒋介石和解。共产国际代表团甚至没有机会向国民党说明自己的立场，因为鲍罗廷一再证明，任何这样的企图都将意味着使他威信扫地，他认为，在这种危急关头这样做是绝对不能容许的。鲍罗廷建议把我们的行动推迟到汪精卫到来的时候。

这时，政治委员会犹豫不决，没有任何明确的政策。汪精卫已经来到，但我连同他会面的机会都没有。鲍罗廷告诉我，汪精卫认为蒋介石不可靠。这时冲突加剧了。武汉决定派军队攻打南

<sup>①</sup> 指1927年3月10—17日在武汉举行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会。



京。蒋介石立即增加了驻守南京的部队，并命令忠于武汉的第2军和第6军从南京撤到浦口。攻占南京的计划遂被取消。第2第6军奉命放弃浦口，浦口又重新被北方军占领。4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一些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开会。共产国际代表团给他发去电报，劝他不要这样做，并表示想去拜访他，以便讨论弥合分歧的可能性<sup>①</sup>。但事态已发展得太远。他未作答复。

4月8日(?)<sup>②</sup>，政治委员会决定立即北上，以便占领北京和天津。当鲍罗廷把这个决定告诉我时，我表示不赞成，因为没有基地的保证，继续进攻会是很危险的。由于同国民党没有联系，我无法让它知道我的观点。但在共产党人当中进行了激烈的争论。从这次争论中看得很清楚，大多数共产党领导人不仅不了解共产国际新的提纲<sup>③</sup>，而且还反对这个提纲，虽然他们表面上也表示接受。我的建议是巩固长江以南的革命民主政权。派遣军队北上会使蒋介石得以加强他在南方的影响，也就是说反动派会从后方来进攻革命。我的具体建议是：在北方采取防御措施，帮助冯玉祥向东推进，加强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的政权，改组并集结革命军队，然后再向北推进。巩固左派政权需要有革命的土地政策。我指出，采取立即北上的政策是小资产阶级左翼<sup>④</sup>想回避进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鲍罗廷和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的多数人都支持北方政策<sup>⑤</sup>，理由是：不扩大地盘革命就无法深入。鲍罗廷认为，民主政权只有通过无产阶级专政和残酷的恐怖手段才能建立起来。陈独秀一再证明，共产国际的提纲原则上是正确的，但实际运用却很难，需要时间。维经斯基在上海，他没有参与这场争论。多里奥和我反对北上。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最终接受了我们

① 见 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摘自《中国革命史 1925—1927》）第 113 页及第 190 号文件。

② 原文如此，应为 4 月 18 日。

③ 见本书第 71 页注③。

④⑤ 原文如此。

的观点。但鲍罗廷声称，如果共产党反对立即北上，他就辞职。结果共产党人又一次改变了自己的意见，主张北上。

我们建议推迟两周北上，把这个问题交莫斯科处理，但这一建议遭到拒绝。我们认为，立即北上会切断革命同根据地的联系。革命会脱离那些拥有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的省份，进入不熟悉的地区。革命会受到各种不同的军事联盟（即同唐生智、冯玉祥、山西的阎锡山以及原吴佩孚的一些将领的联盟）的左右。一旦军事上取得成功（这令人怀疑），左派在北京的政治优势就不能得到保证。相反，当[军队]到达北京时，甚至在到达之前，有充分理由可以预料会出现北伐第一阶段曾出现过的那种冲突。左派政权将会失去社会基础。它不得不同许许多多的蒋介石打交道，而且它没有退路，因为它北上时，反革命会在南方站住脚。左派政权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同时解决两个任务。广东已经丧失，那里的所有共产党员都被逮捕。唐生智对湖南农民运动的进一步发展持敌视态度。因此，反动派的社会基础在那里未受触动，它们联合起来对革命发动一致的进攻<sup>①</sup>。资产阶级已转为反对革命。而陈独秀还是认为，不能为了削弱反动派的基础来加剧农村的阶级斗争。

我不能把自己的观点告诉国民党，因为这意味着公开反对鲍罗廷，这是不容许的。莫斯科应当出面干预。

共产国际应当向国民党派驻代表。在目前形势下，同国民党没有更密切的联系就不能领导共产党。涉及革命未来的决定是由国民党作出的。共产党不可能成为反对党，特别是当共产党参政的时候。因此，共产党必须接受国民党的一切决定。这就使共产党成了国民党的附庸，有碍于它的发展。另一方面，国民党对共产国际不向它派出代表也不满意。同时，形势也要求共产国际驻共产党的代表兼任驻国民党的代表，以确保政策的统一。鲍罗廷

<sup>①</sup> 原文如此。

认为，共产国际应当向国民党派驻代表，但反对双重代表资格。在他看来，共产国际有驻国民党的代表时，他就应当被召回。

在这种情况下要卓有成效地工作是很困难的，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让我像现在这样呆在国民党之外，那么要迫使共产党理解和真正根据共产国际的提纲行事，那就意味着建立反对派。另一方面，无论如何也不能损害鲍罗廷在国民党内的地位。因此我建议：(1) 任命鲍罗廷为共产国际驻国民党代表，条件是他将根据新的提纲行事或者改变提纲；(2) 解除我在中国的工作。

北上本应于4月18日开始。那天早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突然取消了这个计划，而主张向东推进，去消灭蒋介石的力量。陈独秀在一天前还说，不向北扩展革命就不能发展，他未同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就同意突然改变计划。中央委员会也毫无抵制地同意了。这种情况证明，共产党已经丧失了政治独立性。它完全是国民党的附庸。

我们同意了新的政策，条件是：向东南推进，消灭反动派，夺回广东、福建和广西的政权。

多里奥完全同意这个报告并将送来材料。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0，第 2—4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193

## 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局会议记录<sup>①</sup>

1927年4月20日于汉口

主席：陈独秀。

出席：瞿秋白、张国焘、蔡和森、彼得罗夫<sup>②</sup>、邓（广州）<sup>③</sup>、苏（劳工部长）<sup>④</sup>、福建〔代表〕、沃罗夫斯基<sup>⑤</sup>、张太雷、六位工人领袖、罗易，鲍罗廷部分出席。

陈独秀：我同汪精卫和谭延闿谈过话。我提出了9个问题。谈话开始前，他们告诉我：宋子文致电他们说，外国军队将在20日向汉口进发，这意味着进行武装干涉。但根据叶夫根尼·陈<sup>⑥</sup>的情报，预料不会发生外国干涉行动。他拜访了英国领事<sup>⑦</sup>，并问他，英国是否打算收回这里的租界<sup>⑧</sup>。这位领事作了否定的回答。英国政府真诚希望同国民政府保持良好关系。但这看来不太可信，因为国民政府和苏俄之间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工农运动在日益发展。寺院被没收，食糖和面粉被没收。好像禁止进行贸易。

---

① 文件名称如此。

② 彭述之。

③ 邓中夏。

④ 苏兆征。

⑤ 黄平。

⑥ 陈友仁。

⑦ G. 戈菲。

⑧ 1927年1月3日，中国游行示威者占领了汉口英租界。

前天日本领事<sup>①</sup>拜访了汪精卫。汪精卫对他说，外交问题应找叶夫根尼·陈商谈。但这位日本人说，要谈的不是一般问题，而是重大问题。一些国家对国民党政府同苏俄和共产党人之间的密切关系很担心。因此，它们打算采取某些行动。因此，我来找您这位负责人。日本不想参与某些国家的这种行动。但日本很弱小，不能对抗别的大国，它可能被迫跟着它们走。汪精卫说，1925年5月30日以后，他就决定不惜任何代价同帝国主义作斗争。

谭延闿说，如果它们准备采取这类行动，那我们就斗争到底。汪精卫说，鲍罗廷不同意采取这种做法，因为他认为革命应当有自己的策略和自己的阶段。有时必须退却，以保存力量。他不赞成让事情发展到进行最后决战的这种策略。鲍罗廷说，同苏俄的关系体现在顾问身上。顾问们可以同军队一起北上。而鲍罗廷则可以去西北工作。

这种武装干涉是西南方面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妥协的反映。国民革命军占领了几乎半个中国。当时帝国主义者退却了。现在他们突然又聚集了力量。他们改变了自己的立场，因为在国民[革命]军队中发生了分裂。倘若帝国主义者的政策的确是执意要进行武装干涉，那么很清楚，我们不可能呆在武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或者北上，或者南下。这是个重大问题。或许，面对帝国主义我们应当设法采用某种退却手段。同时，国民政府最好采取积极军事行动。如果他们看到，一方面我们取得了胜利，而另一方面我们又在退却，那他们就可能改变政策。否则，就不得不解决往哪里退的问题。“但是”，汪精卫说，“不管我们做多少让步，他们都永远不会满足。除非我们变成狭隘民族主义者”。汪精卫没有就顾问和共产党的问题发表意见。他说，帝国主义者想让我们放弃孙逸仙博士的三民主义。但是，如果我们离开三民主义，

<sup>①</sup> 高雄长男。

那就意味着完全放弃革命。也许，把“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声压低一些是合适的。但我（陈）说，使他们感到不安的不是口号，而是实际利益。蒋介石经常高喊“打倒帝国主义！”，但帝国主义者对此从未加以重视。汪精卫说，帝国主义者最怕的是工农运动。这是主要原因。因此，工农运动也许不应当那么激进。我回答他们说，这也是完全错误的。使他们感到不安的是实际问题。工人运动目前还是争取较好待遇的改良主义运动。它还没有发展到没收财产的地步。农民运动在同豪绅作斗争。当然，资本是个大问题。但并不是每个帝国主义者都这样看。

谭延闿说，也许需要让更多的人，如徐谦和另一些人了解外交形势。至于帝国主义者的照会<sup>①</sup>，政府可以给国民革命军下一道命令，让它无论到什么地方，都不要给外国人造成任何生命财产损失。工农运动不应太激进，特别是在湖南和山西，因为唐生智的军官们在询问此事。唐生智在同徐谦交谈时说，他支持工农运动，但他的军官们不同意。他们反对分给士兵土地。如果情况不改变，将很难管住军队。唐摇摆不定。这里左派很少，情况复杂。宋子文很消极，他借口蒋介石要逮捕他而没有返回。尽管他始终支持工农运动，但工人确实想杀死他。

谭延闿和汪精卫抱怨说，工农运动不属于国民党，而属于共产党和红色工会国际。只有加入了共产党或红色工会国际的人才能控制运动。我对他们说，不是这样。共产党和国民党在合作，它们有统一的政策。共产党不占他人的位置。共产党不攻击政府，而是帮助政府。共产党和国民党可以就任何问题作出一致的决定。在工会问题上出现斗争没有什么可怕的。当然，有发生冲突的可能，但是，有正确的政策，两党就可以领导工会。湖北省工会联合会历史较短，不同于上海。上海工会联合会确实可以领导运动，工

<sup>①</sup> 见本书第183页注<sup>②</sup>。

人们确实相信它。只有短暂历史的湖北工会联合会对工人没有这么大的影响。但它基本上可以控制工人运动。

然后，我简要提到共产党问题。共产党和国民党也许彼此还不够了解。汪精卫回答说，联席会议<sup>①</sup>之后，情况有所改善。不久前他收到一封由50人签名的信，信中对共产党表示怀疑，希望我们（汪精卫和其他人）继续同共产党谈判。共产党不能当反对党。任何问题都要同国民党讨论，应当在政策上达成完全一致。谭延闿说，问题不在共产党身上，而在于国民党左派比共产党更激进。这些人不会听国民党的。当我们同他们谈话时，他们回答说：“你们太老了，我们只听共产党的。”我们请共产党同这些左派谈一谈。我对他说，可能不完全是这样。他们不应怀疑自己的左派。但谭延闿回答说，如果共产党通过决议，左派党员就会服从。他们没有纪律。

接下来讨论了关于“煤油事件”的实际问题。我认为，管这个问题的不应当是人民，而是政府。政府可以同帝国主义者达成协议，以便利用这些工厂<sup>②</sup>。至于工人抢走食糖和面粉的事，我不了解情况。如果确实是农民或农会所为，我们将弄清楚。不过，如果我们发现，这些没收行动是反革命分子同骗子一起干的，那我们就应该惩处他们。

随后〔谈到〕对工人运动的控制问题。我说，问题不是共产党和国民党不能控制工人运动，危险来自第三方面。这里有蒋介石的秘密社团。两党利用在工会中的影响就可以控制它们。

最后讨论了给纠察队发放武器的问题。谭延闿认为，应该给纠察队发武器。工会开口就要1000条枪，但未必能给这么多。我

<sup>①</sup> 指国民党和共产党领导人的小范围联席会议。例如，在1927年4月18日的会议上共同作出决定，继续北伐，同冯玉祥和阎锡山的部队会师，以便把张作霖的军队赶出北京和天津地区，然后计划展开对蒋介石的军事行动。

<sup>②</sup> 指武汉的炼油厂。

们已经给了他们100条枪。将逐步多发一些。我要求他们要很小心，只发给可靠的工人。因为存在着很大的危险，挑拨离间者可能得到枪支，他们会向帝国主义者开枪，可能也会向汪精卫开枪。

全宗514，目录1，卷宗298，第26—28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194

## 罗易和多里奥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27年4月20日于汉口

莫斯科，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共产党代表大会将于25日<sup>①</sup>开幕。党的领导状况不佳。在陈独秀来到这里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主张立即召开代表大会，以便建立集体领导，并定在25日召开。陈独秀到来后，借口省里的工作需要，要求将代表大会无限期推迟。尽管中共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sup>②</sup>，但中央委员会的多数委员，特别是陈独秀不同意这个提纲，并想避开讨论。除上海以外，各代表团都已在这里。我们代表团进行了干预，要求代表大会按原定日期——25日开始。中央委员会同共产国际代表团进行了斗争，但最后还是勉强同意了。为了使这些同志能迅速回到省里工作，我们同意将

① 中共五大于1927年4月27日开幕。

② 见本书第71页注③。



代表大会议程缩减为中央委员会政治报告、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及其提纲的报告、土地问题分组讨论和工会问题。我们认为，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将是选举新的中央委员会。应当改变和加强党的领导。我们建议这个拥有 5 万多名党员的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设 30 名委员。应在代表大会后立即将陈独秀作为党的代表召到莫斯科。

罗易 多里奥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0，第 5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多里奥亲笔签字。

195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秘密会议第 96 号（特字第 74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4 月 21 日于莫斯科

听取：2.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2. ——（1）将所有不能在现在工作的地区继续公开工作的军政工作人员调到别的地区；将不太重要的工作人员召回。

(2) 鉴于武官<sup>①</sup>离开中国，暂时委托乌拉尔斯基同志<sup>②</sup>全面领导军事工作人员。

(3) 征询银行家<sup>③</sup>和加伦<sup>④</sup>两同志对给冯玉祥委派政治顾问是否合适和相应人选的意见。

(4) 指示拉舍维奇同志取消中东铁路的秘密专递。

(5) 询问北满委员会是否采取了销毁中东铁路俄国党组织文件的措施。

(6) 为答复北满委员会的询问，发去以下内容的电报：

“要避免出现任何可能给中东铁路上的惊慌或我们在那里等待出乱子的做法提供任何借口的行为，因此，要解散罢工委员会，坚决同中东铁路上的任何撤离情绪作斗争。”

(7) 以必须完成学业为由，拒绝国民党右派学生离开中山大学回国。

(8) 征询国民政府的意见，今后如何对待由李济深派来的并由国民政府授予全权的代表团<sup>⑤</sup>，如何处理经该代表团转来的资金。

(9) 给希塔罗夫发去电报，如邵力子犹豫不决，不想回中国，我方仍要热情款待，他如果愿意可以留在我国境内；不要采取任何可能给人怀疑我们搞强制提供借口的行动；建议我方组织要非常客气地对待他。

(10) 要求多夫加列夫斯基极其秘密地探听日本政府对苏联、满洲和华南的行动计划，并将结果报告莫斯科。

(11) 征询拉舍维奇的意见，他如何评价业已形成的局面，关于张作霖的计划，他有什么消息。

① P. B. 隆格瓦。

② B. K. 布留赫尔。

③ M. M. 鲍罗廷。

④ B. K. 布留赫尔。

⑤ 指以陈济棠将军为首的军事代表团。

(12)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今天就起草答复中国代办照会的照会；责成吸收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sup>①</sup>参加的三人<sup>②</sup>委员会最后审定照会。

(13) 给鲍罗廷、汪精卫和加伦发去以下内容的电报：

“我们认为召回我们派到蒋介石军队里的顾问是适宜的。因为他们属于派给你们使用的人员，如果你们同意我们的意见，你们就将他们召回并通知我们，你们将以怎样的方式召回。”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9）；

李维诺夫同志——（12）；

莫洛托夫同志——（1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03—104、107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sup>①</sup> 见《苏联外交政策文件》第 10 卷第 169—171 页。

<sup>②</sup> 可能是指李可夫、斯大林和布哈林（见第 185 号文件）。

196

## 蒋介石给罗易的信

1927年4月22日于南京

### 致第三国际代表罗易

获悉您因别的通知<sup>①</sup>不能来上海同我们会晤，深表遗憾。

我党内部问题不能与一般问题相比。它们关系到国民党的生死存亡。最近的事态表明，国民党革命联盟破裂的责任应由谁来负。在武汉垄断我党权力的那些人不能不对此承担责任。更令人遗憾的是，您听信一面之词，不了解真实情况。

至于在南京召开代表大会<sup>②</sup>，这个问题还是在孙中山以前的住处同汪精卫一起商定的<sup>③</sup>。

所有中央委员都是根据这一决定到会的。邀请他们的不是我，我也无权取消这种邀请。

蒋介石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9，第 192 页。

法文手稿，原件。

---

① 原文如此。

② 指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

③ 见本书第 183 页注①。

197

## 邵力子给索洛维约夫的信

不早于 1927 年 4 月 23 日于海参崴<sup>①</sup>

南安特(赖特)同志<sup>②</sup>

收到了您通过李<sup>③</sup>同志转来的信<sup>④</sup>；行李也收到了。我对上海事件感到很遗憾。我还是下决心回国。至于今后的斗争道路，我已在电报中请您给予指示<sup>⑤</sup>，但至今没有得到答复。

我决定明天离开这里去上海。到上海后，我再视情况决定自己今后的行动。如果汉口与上海之间还有交通，我要去武汉。达成妥协的希望已经破灭，我很担心帝国主义者可能进行干涉，希望共产国际和各国同志号召全世界革命者阻止这种干涉。

斯大林同志曾笑着对我说，如果蒋介石真的解除了工人自卫队的武装，我却把自己的照片送给他，工人们会怎样看我。我明白他的意思，很遗憾地归还了他的照片和李可夫、伏罗希洛夫的照片。

致革命的敬礼

邵力子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312，第 30 页。

- 
- ① 日期是根据第 189 号文件确定的。  
② B. H. 索洛维约夫。  
③ 何人不详。  
④ 信没有找到。  
⑤ 见第 198 号文件。

打字稿，副本。

198

## 皮亚特尼茨基给斯大林的信

1927年4月26日于莫斯科

绝密  
亲启  
急件

### 致斯大林同志

以下是邵力子同志发自海参崴的电报副本：

“致彼得罗夫<sup>①</sup>：上海使我很担忧，我不能充当反革命的武器，我请教如何作斗争。现寄回斯大林的照片。候复。邵力子。4月23日。”

请告知是否需要给他答复，给他作怎样的答复。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26，第 66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

<sup>①</sup> Ф.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199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秘密会议第 97 号（特字第 75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4 月 27 日于莫斯科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斯大林、伏罗希洛夫、加拉罕、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4. —— [1] 给林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回复 33 号电，转发最高领导机构决定：（1）我们认为您的政策和建议是完全错误的，是违背我们的指示和汉口的计划的。（2）认为您建议汉口与蒋介石达成协议在政治上是有害的。（3）顾问是临时派到汉口国民政府工作的，应让他们去那里请求指示。您的干预是不必要的。”

[2] 给洛佐夫斯基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顾问是临时派到汉口国民政府工作的，应立即让他们去那里请求指示，请您不要干预。”

[3] 认为有必要向湖南提供石油制品和电工器材。责成贸易人民委员部紧急执行本决定，并且每周以书面形式向政治局报告所采取的措施。

[4] 给远东边区委员会发去以下电报：

“回复您 71 号电。已给哈尔滨发出指示，现将同样指示通知你们：（1）不要成立任何罢工委员会，如有这样的委员会，应予

解散。(2) 不要组织任何游击行动，如有这类企图，应该打消。  
(3) 今后等待我们指示。”

[5] 认为有必要根据国民政府的请求，从以借款形式拨给国民政府的款额中调拨 60 万卢布交冯<sup>①</sup>支配，并将此事通知汉口。

[6] 责成中国委员会对来自中国的军事情报严格保密，禁止用电报通报详细作战计划。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米高扬同志—— [3]；

斯蓬德同志—— [5]；

远东边区委员会—— [4]。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08—10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sup>①</sup> 冯玉祥。



## 200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99 号（特字第 77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4 月 30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温施利赫特同志提交的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4 月 28 日会议第 98 号记录，决定：（8）），（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1. ——（1）武器交易业务交东西欧换货贸易公司租赁协会。

（2）责成温施利赫特和米高扬同志在一周内协调好该协会与贸易人民委员部和军事工业部门的关系，商定补偿它因按低于成本价出售武器所受到的损失的办法。

（3）在政治局作出特别决定之前，禁止向中国任何人提供武器。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4. ——（1）给鲍罗廷同志发去以下电报：

“据我们得到的一些值得重视的侦察材料，海军将军们<sup>①</sup>决定，一旦叶夫根尼·陈<sup>②</sup>对调解南京事件<sup>③</sup>的照会作出的答复不能令人满意，他们就摧毁汉阳和广州的兵工厂。不排除这种决定将被取消，因为还在犹豫；但也不排除他们试图使用这种制裁。请您在同外国人特别是同英国人谈判时，注意并利用这一点，以防万一。”

(2) 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以特殊理由允许美国海军上将布里斯托尔的妻子经苏联领土前往中国。将此事通报我国报刊新闻部和驻外新闻记者。

抄送：

加拉罕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1)。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4，第 111—11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① 指集结在中国水域的外国海军将官。

② 陈友仁。

③ 见本书第 183 页注②。

## 201

**鲍罗廷关于中国政治局势的报告**

1927年5月初于汉口

**鲍罗廷同志关于政治局势的报告**

出席：舍列赫斯、米夫、马卡尔-利马诺夫、韦杰尔尼科夫。  
会议于1927年5月上旬在汉口杨森将军的住所举行。

**1. 蒋介石和阻碍同他进行坚决斗争的三个因素。**

如你们所知，蒋介石的问题在我们中间引起了一系列分歧。有三个因素对这个问题产生了影响。共产国际代表、军事部门（俄国军事顾问）和许多国民党左派人士认为，目前同蒋介石决裂还不是时候，为了革命还可以保留他。

这种犹豫和分歧使蒋介石得以登上上海舞台，同上海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并同帝国主义者勾结起来。蒋介石获得了稳住自己阵脚的机会。

由于这种犹豫，第6军军长程潜未能及时执行逮捕蒋的命令<sup>①</sup>，因为没有中央政府<sup>②</sup>的坚定而明确的指示，他自己不知道怎么办。送逮捕令的交通员晚到南京一周时间。

在同蒋介石斗争方法上的分歧和犹豫造成了对蒋介石的一系

① 见第192号文件。

② 指武汉国民政府。

列错误做法。

我是坚决主张同蒋介石作坚决彻底斗争的。上述因素影响了这种彻底性，延缓了对蒋介石的坚决打击，造成了消极后果。

国民党左派长时间不理解，为什么要同蒋介石断绝关系。许多国民党人是从区域角度，即国民政府中心应设在哪里——南京还是武汉——来看待同蒋介石的分歧的，因而不理解在这个问题后面隐藏着有关革命进一步发展的两种社会性方针。

现在所有国民党人都明白了这一点。

**2. 由于蒋介石叛变和存在帝国主义者可能对武汉进行武装干涉的传闻，武汉国民政府的政治和财政状况正在恶化。**

我们经历了国民政府生存中的紧张时期。目前这场危机似乎正在过去。

由于传说帝国主义军队可能对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进行武装干涉，我们这里不仅在大资产阶级中间，而且在小资产阶级中间，都有一种恐慌情绪，这种情绪在武汉国民党人中也有反映。

武汉的小资产阶级把国民政府同蒋介石的斗争理解为国民政府试图引进共产主义，认为蒋介石是在同这种共产主义作斗争。小资产阶级根据帝国主义报刊和反动报刊的描绘来想象共产主义：说什么“将拉着裸体女人满街跑”（妇女社会化），立即实行社会主义，消灭私有制等等。

这种情绪因失业和流氓无产阶级（苦力和人力车夫）队伍中缺乏劳动纪律而变得更加严重。

引起小资产阶级和国民党人惶恐不安的另一个因素是长江流域，主要是上海与武汉之间金融贸易联系的中断。

同蒋介石的斗争、有关武装干涉的传闻、有关国民政府引进共产主义的传闻、失业、银元投机、将银元运往上海、长江沿岸港口之间经济联系的中断——这一切给武汉国民政府造成了严重

的局面。可以认为，经过国民政府采取一系列措施，这种危机即将结束。

### 3. 国际形势——中国问题和武汉政府对可能发生的武装干涉所采取的措施。

我在上面已经指出，武装干涉问题在国民政府中引起了很大的恐慌，因为这有可能把国民革命军分成两部分，妨碍我们对河南张作霖的作战行动，切断这个军队与给养基地的联系，还可能通过占领长江使武昌脱离汉口。

其次，日本人可能悄悄占领毗连汉口日本租界的铁路，从而帮助张作霖同国民革命军作斗争。

我们曾就武装干涉一事询问过莫斯科的看法，这是通过在汉口集结军舰显示军事力量吓唬人，还是帝国主义大规模武装干涉中国的开始。莫斯科深谙世界政治领域的各种事件，但对这个问题迄今仍保持沉默。

我的看法是这样：对有关国际形势的材料作一定了解之后，就会认为帝国主义者在中国问题上没有取得一致意见，也不会有一致意见。从以下观点看，进行武装干涉是不可能的：

**美国：**美国在准备改选总统，柯立芝的地位已经动摇，中国问题在竞选运动中将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在总统选举前，美国不会卷入对中国的冒险行动，尽管美军驻华司令部在挑衅，并且美国在华侨民也要求参与武装干涉。

**日本：**日本在经历严重的金融危机。内阁更迭是这一危机的结果。由于这次危机，田中义一当上了首相。日本政府禁止把黄金运出日本。宪政会和政友本会<sup>①</sup>希望在最近的国会会议上弹劾田中。

<sup>①</sup> 宪政会和政友本会是代表资产阶级和地主利益的保守政党。宪政会成立于1916年，曾多次组阁。政友本会是1924年由于政友会分裂而成立的。1927年两党是田中内阁的反对党。

鉴于日本国内局势，可以预测，日本不会参与拟议中的联合武装干涉。日本政府在田中内阁诞生前一天就通过日本驻汉口领事<sup>①</sup>作出保证，日本将真诚地对待国民政府。

其次，为了同英国的政策相抗衡，日本竭力通过和平途径（在侵占中国的方法上同美国竞争）加强自己在中国的影响。日本企图通过蒋介石和其他集团掌握中国的命脉。与此相对抗，国民政府则坚持同日本签订庄重条约的方针：作出不违背日本和满洲经济利益等的保证。

我想，如果我们把张作霖赶出山海关，日本就会抛弃他。

因此，在某种情况下，日本可能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具体说在汉口我们就为消除日本租界冲突<sup>②</sup>的后果同日本人达成了协议。日本工厂已开工，商业活动在恢复。为了对英美施加压力，我们应当同日本人达成协议。遗憾的是，目前我们还非得有一些帝国主义分子不可。

**英国：**没有日本和美国，英国不会同意单独提出对国民政府的大规模武装干涉计划。

英国现在遇到了严重危机。大批纺织企业和其他企业因销售危机而关闭。

由于英国同中国发生冲突，保守党的反对派在发展壮大。议会中各党团之间在中国问题上发生的一系列冲突表明，中国问题已成为反对派同保守党政府作斗争的论据。

由此可见，国际局势表明，帝国主义不可能发起联合进攻，对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地区进行武装干涉。

虽然不可能发生大规模的武装干涉，但我们还是应当准备对

<sup>①</sup> 高雄长男。

<sup>②</sup> 指1927年4月3日日本水兵同一群中国人在日本租界发生的冲突，在这次冲突中中国人有伤亡。冲突于4月25日经国民政府与日本驻汉口领事高雄长男达成非正式协议得以解决。

付帝国主义者的一切阴谋诡计。

**我们应当扩大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通过国民革命军向西北挺进摆脱外国巡洋舰对我们形成的包围圈。因此，我们应当通过实行一定的内外政策，争取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有一个稳定的局面。**

#### **4. 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及加强财政的措施。**

我在上面已经指出，由于外国人即蒋介石的代理人企图通过将银元运往上海以及各种货币投机活动来破坏国民政府的财政基础，我们面临着财政破产的问题。

我们采取了以下措施：宣布暂时禁止银元和一系列纸币在市场上流通。私人银行的所有银元都被国民政府代表查封。为监控存放在金库里的这些银元，派出一些自己的人。向银行发放了等值的中央银行纸币，代替被查封的银元，以便进行日常业务。

我们没有从银行提走银元，而是留在金库里，以避免资产阶级发生恐慌和国民政府敌人进行挑拨离间，说国民政府实行共产主义。

“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从中央银行得到了纸币。这些银行又把储存的纸币转给了政府的中央银行。这些银行若遭到破产，对我们是不利的，因为它们的大量纸币在居民手中。

根据需要，将允许“交通银行”和中国银行的纸币盖上中央银行的印章流通。这些银行的发行权转到了政府的中央银行手中。

禁止银元在市场上流通引起外国银行和出口公司在资助汉口与上海之间的进出口方面的抵制。这可能彻底窒息武汉的经济生活，其运行速度由于近来发生的一些事件而放慢了。

武汉主要是商业贸易中心。为了防止发生上述危险，我们成立了一个由中国商人代表、国民政府代表和外国银行代表组成的委员会。该委员会的宗旨是建立正常的进出口流程，其任务是监督和调节进出口、资助硬通货、实行使银元和硬通货较少流出汉

口的政策。

不过，由于上海与汉口之间的贸易逆差不可避免，支付上海银行总额 200—300 万银元的余额不会构成大的风险，在最近两三个月内将会出现另一种局面。

我们的财政状况就是这样，我们应当坚持 3、4 个月，应当有能力供养军队，保持纸币的稳定。占领北京之后，就可以建立新的财政体系。

#### **5. 土地问题与国民政府的政策。**

**许多同志认为，国民政府即国民党左派反对彻底解决土地问题。这种论断是没有任何根据的，是完全错误的。**

目前国民政府反对以政府名义用法令规定有关土地问题的激进措施。这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方面目前国民政府同蒋介石处于对立状态，而另一方面军队在向北京方向推进。军队的指挥人员多数是土地所有者。

**指挥人员担心，他们在前线同敌人作战，而后方却在抢占土地，甚至不会给他们（即军官们）留下一小块“葬身”之地。**

国民政府反对在土地问题上立即采取激进措施，并不是从实质上反对，而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需要保持指挥人员和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应当在实施这些措施时不触及国民革命军指挥人员的利益。

#### **国民政府不会反对农民争取土地的运动。**

我想，在省里的会议上是可以关于土地问题的最激进的决议的。我认为，农民实质上也就是实际上是要夺取土地的，但考虑到政治形势，目前不应以政府和国民党的名义发表宣言和在土地问题上采取激进措施，以避免指挥人员和军队发生分化。

因此，关于土地问题的方案和决议中不能无视军队。要列出专门一条，规定军队将在战争结束后获得土地。

与土地改革相联系，还有一个建立地方政权的问题。国民政



府实际上在地方没有新的政权机构。

幸运的是，在中国总的说来没有必要打碎旧的机构和建立新的机构；这是因为，谢天谢地，还没有机构。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多数县，原县长都留任了。委任这些县长时，税收方面的考虑起了很大作用。

在一些地方，农会是新政权的萌芽，但这些组织有时起着反动作用，因为它们带有地方主义色彩。例如，它们从地主豪绅那里夺取储备的粮食和大米，不许把这些储备粮运出本村、本地区和本县，有时妨碍有计划地向军队供应粮食和把大米运往需要的地区。但是，如有合适的领导，农会基本上可以在地方上起到新政权的作用。

筹建机构和具体研究即将进行的土地改革工作，本应由农民、内政部进行。

我们考虑了这个问题，并有几个月时间在物色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来担任农民、内政部部长职务。曾提议谭平山同志做这项工作，但他至今积极性不高，还没有开始工作，而该部具有很大意义，本应早就开始工作。

## 6. 应把国民革命的主要打击矛头指向何方。西北论与东南论。

大家知道，方针问题，近期主要打击方向问题，引起了我们的争论，出现了西北论和东南论。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国民军向东南挺进，也就是去占领上海是个错误的步骤，因为目前本着革命的精神去占领上海有很大的困难，因为上海是帝国主义的主要据点，帝国主义在那里集结了大量武装力量，其明确目标是无论如何要保住上海不受革命的攻击。

眼下帝国主义在中国还没有被打败，而这在世界无产阶级取

得胜利后是可能的，上海的帝国主义不会投降<sup>①</sup>。我们的军队无法对付上海帝国主义的高级军事技术和大量的军队。就拿太平军为例来说，他们在到达上海之前取得了节节胜利，因为在他们面前的是清朝陈腐的封建军阀制度，他们没有同帝国主义及其武装力量接触。他们在上海城下同帝国主义军队一交手就遭到了失败。

可见，太平军遭到部分失败的原因是他们占领了南京，给集中了帝国主义力量的上海造成了威胁。

**革命不能占领上海和治理上海，因为它还没有足够的武装力量，虽然上海本身有革命的社会基础——上海无产阶级。**

革命、国民政府和军队可以掌管南京和控制上海（即有物质资源来源），但不能在上海建立政权。

我们还不能到上海去治理这个城市，因为上海资产阶级已经成长为自为的阶级。它被革命吓破了胆，它将为自己的领导权而斗争。中国其他地区的资产阶级还是自在的阶级；要成长壮大并认识自己还需要一定的时间。**在国民政府势力范围内的地区，我们现在还可以领导这个资产阶级。**

我们应当去西北地区，国民政府的势力范围应当向西北扩展，否则我们将始终处于主要集中在东南地区的帝国主义势力的打击之下。

革命势力扩展到西北地区以后，我们应当沿津浦铁路向南京挺进，以便占领南京，最终消灭蒋介石的势力。

**甚至蒋介石也了解并同意这种看法：向东南推进孕育着危险，有可能断送革命。**

到达南昌之前，蒋介石还听我们的。我曾对他说，占领上海有可能脱离革命，他同意这个看法。

占领上海之后，蒋介石彻底脱离了革命，在外国帝国主义的

---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影响下转入资产阶级反革命阵营。

有人说应当去南方，去广东，在那里建立革命的主要基地。我认为，这种计划经不起批评，因为如果我们现在就去南方，那就会给北方军阀和蒋介石提供机会，使他们在帝国主义者的帮助下长时期稳定下来。他们会用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联合在一起在广东实行共产主义来吓唬小资产阶级。他们会用共产主义的幽灵来吓唬小资产阶级，使它脱离革命。

广东的革命骚动是不可避免的。我了解南方人，他们不会长期忍受李济深专政，广东的社会矛盾必定会转化为极大的愤怒。在广东应当放一把火。不久前我对去广东的同志说，倘若一天没有大火，那就是革命消沉的日子，那里的建筑物是用竹子建造的。

现在谈一谈理论问题，有一种理论说，应当使革命向深度发展，而不是向广度发展（中国革命的粗放和集约发展论）。

这些同志说，在国民政府占领的地区，应当实行激进的社会改革，不要继续向前推进。我认为，这样提出问题是根本不对的。

总的政治形势足以说明，我们不能光靠自己的力量，由于受到帝国主义者的四面包围，我们应当给自己打开通往外部世界的出口。其次，可以在国民政府占领的地区内实行部分根本改革，而国民革命军则应继续向前推进，这两者并不矛盾。革命应当集约和粗放式地发展，否则，在狭小的根据地，受到敌人包围的革命会被窒息，因为我们会由于帝国主义的局部封锁而脱离整个世界。

如果我们打败张作霖，我们就会比较容易消灭蒋介石，那时我们就能挫败日本想通过两张<sup>①</sup>控制中国的图谋。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就会乐意同国民政府达成协议，以保持它在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地位。

我认为，我们已经摆脱了危急局面，若再坚持三四个月，我

---

<sup>①</sup> 指张作霖和张宗昌。

们就必将取得胜利。

马卡尔—利马诺夫记录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64，第 175—185 页。  
打字稿，副本。

## 202

# 维经斯基在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927 年 5 月 3 日于汉口

陈独秀和罗易同志讲了所有的问题。我只想讲两个问题：

- (1) 中国革命的前途；
- (2) 我们党的政治独立。

### 中国革命的前途

我们应从几个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要考虑到]帝国主义的威胁、军阀的威胁和今后同蒋介石的斗争。资产阶级现在正在建立新的中心，该中心拥有一定的武装力量。但是，我们不仅应从军事角度，而且还应从政治角度来看待这个中心。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中心为反对国民革命可能做些什么呢？

当然，在 [1927 年] 4 月 12 日以后，我们党面前出现一个问题：革命运动是否还会发展壮大或者这个资产阶级集团将给革命以打击，并因此可能出现 [革命] 低落的发展趋势？

首先谈谈客观条件。革命运动已达到农民和无产阶级群众投

身于革命斗争来争取自己经济和政治利益的阶段。现在革命运动的主要特点，正如同志们都赞同的，是解决土地问题。不解决这个问题，就不能巩固国家政权。同蒋介石的斗争是政治斗争，虽然也可能有武装冲突，但这种斗争意味着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无产阶级争夺领导权的斗争会变得更加尖锐。资产阶级也会像我们一样争夺领导权。让资产阶级中心来解决农民问题，这在客观上是不可能的。原因是：中国农村的封建制度使农民的经济状况遭到如此严重的破坏，造成了农村人口如此过剩和贫困，引起了如此严重的分化，以至现在资产阶级不可能做到俄国资产阶级在1907年做到的事情<sup>①</sup>。中国资产阶级很弱，它甚至没有财力来维持自己的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太软弱，它不能实行这样的土地改革：借助这种改革它可以依靠一定的农民阶层来加强自己的地位。

现在中国未必能像俄罗斯在1905年那样<sup>②</sup>得到外国的借款。

新的资产阶级中心不能制定出一项成功的政策，借以把农民争取到自己一边。

新的资产阶级中心之所以不能使小资产阶级成为自己的盟友，有两个原因。这就是反帝斗争和某种形式的民主政府。小资产阶级惊慌失措，态度消极，它还没有强大到可以给新的资产阶级中心以支持的程度。这个中心的政策今后会使小资产阶级感到失望。新的中心不会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它将同帝国主义寻求妥协。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中心也不会让〔小资产阶级〕成立一个资产阶级民主政府。这个集团内部将会发生冲突。客观上新的资产阶级集团已经同意与北方军阀势力结盟。近来广州和北京的血

<sup>①</sup> 指 П. А. 斯托雷平的资产阶级土地改革。

<sup>②</sup> 看来是指1906年4月沙皇政府同法国、英国、奥地利和荷兰签订的关于拨款17.5亿法郎用于偿付俄罗斯1906年5%国债的协议。

腥镇压<sup>①</sup>就是客观上同北方军阀结盟的例证。在群众的眼里，这个新的资产阶级中心必定会越来越威信扫地。

另一方面，存在着武装斗争。资产阶级中心内部和军阀之间的军事冲突不会停止，他们会相互争斗。

支持武汉的力量是相当多的，它们越来越集中，如果我们有大大的政策，那就不会出现革命低落的问题。

与这个问题相联系，还有一个革命根据地问题。革命根据地问题与军事讨伐思想有关。去年7月开始北伐时，资产阶级和表达了资产阶级主观目的的广州政府，通过同北方军阀进行的争取国家统一的斗争说明了这一点。存在着两种国家统一论。根据自己的阶级利益，资产阶级希望统一国家，以扩大自己的联系，取得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机会并同帝国主义实行妥协。无产阶级不希望有这种为了建立资本主义的统一。无产阶级希望通过革命途径统一国家，以满足农民和工人阶级的利益要求。

我们是从这个总的基本的角度来看军事讨伐问题的。除了同志们正确指出的必须进行北伐的原因以外，我还想补充一点：去年的北伐客观上做了富有成效的革命工作，但是现在说的是第三次北伐<sup>②</sup>，不能还是讲这些原因。那时进行的北伐是为了同长江以北的军阀<sup>③</sup>作斗争，以便把广大群众争取到革命一边。现在，如果我们只打北方的军阀，群众就不会满意。群众希望看到第二次北伐的结果，他们想知道，他们得到了什么。因此，[我们的]任务是使我们所在地区的革命深入下去，把土地分给农民，并且满足工人的要求。我并不想说，如果政府的政策是这样的，它就会真的开始解决土地问题，它就会实行使工人和小资产阶级满意的

<sup>①</sup> 指李济深政变过程中于1927年4月15日在广州处决共产党人和同年4月28日处决4月6日袭击苏联驻京大使馆时逮捕的李大钊和其他共产党人。

<sup>②</sup> Г. Н. 维经斯基认为，第一次北伐是在1922年5、6月进行的；第二次北伐是从1926年7月至1927年4月进行的。

<sup>③</sup> 原文如此。

政策，那就没有必要把革命扩展到别的地区。我决不会试图反对这样做。我们应该为我们的成果而斗争，以便把这些成果带给其他群众<sup>①</sup>。不过，我们应该知道，各种形式的征讨都应是我们在所在的地区实行政策的结果。但是，我们不应仅仅根据军事行动提出我们的政策。

关于土地问题，我提出如下意见：[共产国际]代表团讲没收土地是指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不是小地主的土地。同农村所有其他阶级进行阶级斗争的问题可能对革命联盟是有害的。因此这是个界限，因此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

### 我们党的政治独立

前面发言的同志都同意，现在无产阶级的领导权不再是理论问题，而将成为事实。无产阶级将在小资产阶级、农民和无产阶级联盟中起主导作用，现在它是这个联盟中的革命[动]力。中国共产党——中国无产阶级的先锋队——应当享有政治独立，应当在这个联盟中拥有政治领导权。

我们是怎样理解政治独立的呢？首先，我们党应当有一条路线，有关于国内一切政治问题的政治路线。我们党不应受到与它[一起]行动的盟友的左右，而应率领它们前进。

我必须谈谈过去，谈谈我负有责任的某些错误，以使我们能够看到，将来党的政治独立应该是什么样的。

我们党所犯的重大错误之一是关于资产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的问题。党对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所经历的各个阶段的作用没有很明确的概念。我们将长期同国民党一起行动。由于我们对资产阶级在各个革命阶段的作用没有很明确的概念，自然我们要在国民党内犯错误。不过，在这里我想对你们说，半殖民地国家总的

<sup>①</sup> 原文如此。

来说不同于欧洲资本主义国家，欧洲资本主义国家对资产阶级的作用研究了数十年，那里革命的无产阶级有丰富的经验，而资产阶级在半殖民地国家革命中的作用问题，资产阶级在像中国这样的东方半殖民地国家中的作用问题要复杂得多。这个问题还没有得到完全马克思主义的评价，对于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集团在具体的阶段上是一般地脱离革命还是特殊地脱离革命还不十分清楚。当然，这不能成为替共产党作辩护的理由。我们不应以为，资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作用已经清楚。我们可以继续前进。我们应当更多地学习，在这方面，中国革命会给马克思主义作出很大贡献。因此，瞿秋白同志在代表大会上讲话，要求彼得罗夫<sup>①</sup>同志为所犯的全部错误承担责任，还这样说：“您承认这一点还是大家抨击您，您都不再是布尔什维克”，这是不完全正确的。这样说为时过早，彼得罗夫本人可以证明。他在代表大会上讲话，不像彼得罗夫分子，而像孔夫子信徒，他说：“如果是这样，那你们就判处我政治死刑，或者五年政治监禁。”

党面临着进一步研究这个问题的任务。我认为，争论证明同志们将继续研究资产阶级的作用和性质问题。无疑，借助于无产阶级在代表大会上所表现出来的本能，党将找到对资产阶级的正确态度。但是，让我们来回顾一下过去，回顾一下错误，对它们加以批判，以便能吸取过去的教训继续前进。从我们加入国民党时起，我们的整个策略是由革命统一战线决定的。这就是说，我们的策略是由我们的合作，我们同国民党的联盟决定的。当共产国际决定共产党应加入国民党时，它深知小资产阶级对我们年幼的党产生影响的危险。共产国际同意共产党加入国民党，有以下两个最重要的条件：（1）组织上独立，（2）批评权<sup>②</sup>。从一开始，我们就为我们在组织上的独立而进行斗争。这是对的。我认为，我

<sup>①</sup> 彭述之。

<sup>②</sup>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25—26、37—38页。



们取得了全面的成功。在同国民党合作四年之后，我们的代表大会证明，我们享有组织上的独立。批评权意味着政治上的独立。这是比较难解决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仍然悬而未决。有一些客观条件，使得我们很难在任何时候都能保持政治上的独立。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尽了全力来克服这些使我们无法保持政治上独立的客观条件。没有，我们没有尽全力。我们犯了错误。对于一个应在斗争中拥有领导权的党来说，没有政治上的独立是最危险的事情。我不谈遥远的过去。我只举两个例子。

问题是〔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前的情况怎么样。许多同志说，〔1926年〕3月20日〔事件〕的起因是我们在1925年同三位国民党员……<sup>①</sup>的谈话，这些人当时被认为是右派，是我们说服他们去广州的<sup>②</sup>。这里可以看出，我们作为共产党在政治上是何等地独立。

当时是政治消沉时期，其表现是资产阶级同军阀和帝国主义一起进攻广州。我认为，这与〔中共〕中央执委会有关，不该让广州孤立，不该说可能有另外的中心。

可以从政治和策略两个方面来看这个问题。

**政治方面。**孙科现在是左派，可以把他看作是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1925年不存在民族资产阶级脱离国民联盟的问题。如果广州的同志从政治角度来看这一点，他们就不会那么激动。孙科代表民族资产阶级。我们没有排挤资产阶级的意图，我们同中派周旋，同右派作斗争，跟左派一起行动。

**策略方面。**现在并不总是政治上正确，策略上也正确。策略问题在于，用我们广州同志的话说，当时共产党同国民党一起准备继续前进。正是在这个时候，从上海来了一个国民党右派，引起了国民党左派的怀疑。他们说：“共产党人想同我们一起战斗，

<sup>①</sup> 删节号是原来有的。

<sup>②</sup> 指戴季陶、叶楚傖和孙科。

但他们同时又同右派建立联系。”我在上海，不知道可能形成这样的局面。如果我们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工作，那我们就应当使他们明白，我们是无产阶级的政党。这些人怎么能设想，我们想同右派搞妥协呢？或者是他们不了解我们是些什么人；或者是我们同他们共事得不正常。

在这种情况下，同志们提出了一个更为重要的问题。我们党在政治上并不是独立的，它不具有足够的影响来消除这种疑虑。如果我们有更大的影响，那我们在这个问题上和外交往来上就不会感到缺乏威信了。另一个问题是，很难取得这种影响。但是我们应该坦率地说，原因就在这里。

如果当时孙科到了广州，布尔什维克会怎么办呢？他们会揭露他，会迫使他承认，他同北京会议<sup>①</sup>有联系。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我夸大了共产党人能够发挥他们所应发挥的作用的可能性。当你们因此批评我时，我完全承认自己的过错。但是，实际上问题在于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影响很微弱，而不在于应变能力差，等等。

与北伐和蒋介石有关的错误，在性质上是相同的。这是我们的政治独立问题、我们的领导权问题，而不是同国民党一起简单的机械的转移问题。

至于北伐问题，我认为罗易给北伐下了一个较好的定义<sup>②</sup>。他区分了客观可能和资产阶级的主观目的。需要作这样的分析。我曾反对北伐。但我从未否定北伐。我来到这里时看到了北伐，我看到广东在全力为军事行动提供帮助，工人和农民不得不承担全部负担。我并不是说同志们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工农赞成北伐，但是他们不该遭受苦难。他们热情地为北伐而进行斗争，但他们不

<sup>①</sup> 指1925年11月23日至1926年1月4日部分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监委在北京西山举行的会谈。

<sup>②</sup> Г. H. 维经斯基可能是指 M. H. 罗易在1927年4月13至15日举行的中共中央执委会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 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第23—36页。

能做很多事情。若是我们做好了准备，若是我们有政治路线，我们就能够动员群众，就能够把负担从群众肩上移到大地主和大资本家的肩上，就不会成为国民党的简单的追随者。当我问我们的宣传委员会，为什么他们不能就压迫群众的问题进行宣传时，他们回答说，这样做将是反对北伐。显然，他们不能这样做。我记得，陈独秀同志的文章<sup>①</sup>发表时，并不是我们所有同志都满意，因为他们认为这篇文章不合时宜。但是连黄埔军校的学员都感到满意的是，[文章中]谈到对群众的压迫和他们肩负的重担问题。我们在政治上并不是独立的。

谈谈同蒋介石的分裂问题。

这里有些同志说，似乎我反对同蒋介石分裂。这就把事情搞乱了。我跟你们大家一样，反对蒋介石这个资产阶级的代表，不过我还反对同他作斗争的策略。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小资产阶级只想同他作斗争，不做政治准备。小资产阶级说：“要么我们借助武装力量打败他，要么我们不得不向他投降。没有别的路可走。”当我谈到小资产阶级政策时，我并不想说，这是共产党的政策。这是共产党以某种方式遵循的国民党的政策。这是国民党的政策。要么准备同蒋介石作斗争，要么给他这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以很大的信任。这是小资产阶级的政策。为了同他作斗争我们做了些什么呢？我们没有进行反对他的政治宣传。我们主要考虑要借助武装力量同他作斗争。但不是任何政治斗争。没有向群众说明，他是什么人物。倘若我们这样做了，那他就不可能带走那么多的部队。我反对这种小资产阶级的政策。我斗争得不够有力。我之所以未能更有力地为自己的路线而斗争，也有许多其他问题，有其他原因。但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我反对国民党的小资产阶级政策。

---

<sup>①</sup> 指陈独秀的文章《论国民政府北伐》，载《向导》周报1926年7月7日第161期第1584—1585页。

我想弄清楚。有可能出现这样的意见：让我们离开国民党，取得政治上的独立吧。不是这么回事。我们应当带领小资产阶级。我们不能这样提出问题：“要么我们呆在国民党内，那样我们就应当赞同国民党的政策；要么我们离开 [国民党]。”不，我们应当使他们处于我们的影响之下。由于认识上的这种模糊，出现了一系列困难。[1926年] 3月20日之后，广州的同志说，退出国民党的行动是一种计谋。但广州的整个政策表明，有退出国民党的意图。何以证明呢？不只是这种“计谋”。在谈论政党时，这种计谋是不管用的。

这表明，实际上有过退出国民党的倾向。党克服了这种倾向。

这不只是广东的问题。它涉及到全党。这个问题与另一个问题有关：1925年陈独秀同志在北京党的代表会议<sup>①</sup>上说，我反对退出国民党，因此我们起草了关于我们准备在组织上和政治上保持独立的决议案。我认为，这是对的。始终有两种倾向。我们应当在国民党内为这种 [独立] 而斗争。

有过退出国民党的倾向。不过我们在国民党内，应该享有组织上和政治上的独立。我们在国民党内，应该为这种独立而进行斗争。

在谈到我们的关系和我们在国民党内的地位问题之后，我还想就这个问题谈谈我们党的过去。

即使现在，国民党已经是执政党，我们也参加政府工作，我们也应设法通过我们自己的机构在国民党内做工作。如果我们不想单纯地跟着国民党的各种决定走，那我们就应当拥有强有力的党团，通过这种党团在国民党内和政府内开展工作。

有人认为，如果我们共产党在土地问题上将对左翼军阀实行坚定的政策，那我们就需要同国民党分道扬镳，这种看法是不对

<sup>①</sup> 指1925年9月28日至10月2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四届二中全会。

的。如果我们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都有坚定的政策，我们就能带领小资产阶级前进。我们不应担心农民加入国民党，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支持让国民党成为农民党的意见。因此，我们要通过国民党带领农民前进。说“我们是工人党，而国民党是农民党”<sup>①</sup>是不对的。这是很危险的。

在〔代表大会开展〕辩论期间，指出了我们在政治宣传工作和组织工作中的各种错误。我们党的成就谈得很少。我希望陈独秀同志在闭幕词中谈谈成就。我们指出了各种错误，但没有讲我们在四、五大之间取得了哪些成就。为了表明我们做了什么工作，我们如何聚集力量，如何打算继续前进，以增加党员人数和争取在工人阶级和农民当中作出巨大的成绩，谈谈成就是绝对需要的。

最后我想说，在代表大会以前，党就有一种不只是由政治原因引起的病症。由于客观原因和其他原因，不是存在一个中心，而是两个中心<sup>②</sup>。

不久这些原因就会消除，党就能够继续前进，带领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农民与无产阶级的革命联盟去建立民主专政。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91，第 60—68、74—75 页。

英文打字稿，经过校对的速记记录，无签字。

① 指徐谦在中共五大上的讲话。

② 指上海和武汉。

203

## 赫梅廖夫就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 给别尔津的书面报告

1927年5月6日于莫斯科

绝密

### 关于中共中央军事部的工作、工作 缺点和未来前景的书面报告<sup>①</sup>

党的军事工作的基础是由中共中央于1925年召开的十月全会奠定的。但实际上，这项工作始于1926年1月。

在此期间，军事部做了以下工作：

1. 在中国最重要的地点建立了地方军事委员会，或者视地点或地区的重要性设立了军事部特派员。

2. 工作是按组织和情报两个主要方面进行的。我们理解组织工作是组建战斗队、农民游击队和反动军阀军队及国民政府军队中做日常工作。

3. 由于在整个报告所总结的时期北伐军队与反动军阀军队之间的战事几乎接连不断，军事部的主要注意力放在援助北伐上。为援助北伐做了以下几件事：

(1) 向反动军阀和反动舰队的士兵散发了大量传单和呼吁书。

(2) 通过口头宣传和通过与党有联系的指挥人员做分化反动

<sup>①</sup> 文件于1927年5月7日送给Я.К. 别尔津和Ф.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军阀士兵的工作。

(3) 通过炸毁桥梁、破坏铁路、炸沉运送弹药的轮船等行动不断扰乱敌人后方。

(4) 向北伐军司令部提供军事部所获得的有关敌情的情报资料。

4. 在全国范围内,凡是根据党组织存在的条件或政治制度条件有可能的地方,都组建了工人纠察队,像在上海这样的大据点,其人数已达 2000 人。而在全国则有上万名纠察队员。

5. 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进行了用火器而主要是冷兵器武装纠察队的工作。

6. 凡是有可能的地方,都已开始组建农民游击队:广东有隶属于农会的农民游击队,河南有长(沙)株(洲)游击队(它在很大程度上协助占领了长沙)、河南有“红枪队”。

7. 在武装组织“红枪队”中认真地开展了工作,而且举行了豫西“红枪队”第一次代表大会,并筹备召开五省(河南、直隶、山东、江苏和安徽)“红枪队”代表大会,后因河南军事委员会主席<sup>①</sup>被捕而没能举行。

8. 同北满的许多政治组织建立了联系。这里还同朝鲜军事组织建立了联系。这两方面工作的开展,取决于国民政府军队的北进。

9. 采取了加强党在国民军中的影响的方针,为此目的,从 1926 年 12 月起,着手在国民革命军部队中组建党支部。这方面的成绩尚未作检验。

10. 做了召开中华全国军事工作人员代表会议的筹备工作。

11. 令人十分满意地提出了情报工作。

工作中的缺点:

---

<sup>①</sup> 何人不详。

1. 无论是中共中央还是我们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都对党的军事工作重视不够。

2. 缺少训练有素的和高水平的中国军事工作人员。

3. 中央和党的地方机关常常试图把军事工作人员调去从事一般党的工作。

4. 中央军事部的人员组成薄弱，经常只有一名成员，而且是缺乏经验的同志。

5. 纠察队和农民游击队的武器问题难以解决，而且农民游击队在多数情况下有武器而没有子弹。

6. 完全缺少积极开展工作的经费，例如弄到了黄色炸药，但没有机器。所做的一切都是一小批中国同志用最原始的方法，冒着很大的生命危险发明创造出来的。

7. 由于打入军队的指示<sup>①</sup>很晚才由中央下达给军事部，所以向国民军的渗透工作做得很不够。

8. 缺少开展军事工作的经费。

今后必须做以下几项工作：

1. 最高领导机构再次重申中共中央军事工作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2. 造就中国军事工作干部，在莫斯科对他们进行认真培训，并借助于他们深入开展业已开始的工作。

3. 提出从共产党员中为国民军培训指挥人员的问题，办法是在我们苏联的学校对他们进行培训，指望这些同志在遥远的将来能从事实际工作。

4. 协助武装工农军事组织，拨给军事部十分必需的爆破材料。

5. 尽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召开中国军事工作人员代表会议，以

---

<sup>①</sup> 可能是指 1926 年 7 月中共四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军事运动决议案》（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2 卷第 227—229 页）。



便交换一年半来的工作经验，指导来自地方的工作人员。

6. 更广泛地开展情报工作。

7. 十分认真地注意军队的工作，广泛地提出让共产党员和接近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入军队的问题。

8. 坚决要求中共中央指派中共军事部的常任成员，同时派出不少于两名俄国同志到军事部工作，而且一名应当是与我们的教官组有联系的、威信很高的军人同志，另一名应当领导情报工作。最好有能专门领导日常工作的第三名同志。

9. 增加对党的军事工作的拨款。

赫梅廖夫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271—273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 204

### 罗易和多里奥给斯大林的电报

1927 年 5 月 9 日于汉口

莫斯科，致斯大林

局势是危险的。没有发出真实消息的渠道。在革命的根本问题（即土地问题、工人运动问题、军事行动方向问题、西北方针问题、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上

同鲍<sup>①</sup>有分歧。

同蒋介石的分裂不可避免，但没有做好准备，所以蒋的力量要强于武汉。武汉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占领北京。现在在河南只能采取防御措施，帮助冯<sup>②</sup>进行反对奉天人的军事行动。同时武汉的主要力量应集中在夺回东南省份和巩固那里的政权上。立即北上的计划是不能实现的；它只不过是一种把南方留给蒋介石，到西北寻找新基地的倾向。反动派会在南方渐渐站稳脚跟。把可靠的军队派到太远的北方甚至会造成丧失武汉的危险。由于不相信群众，失败主义情绪在使国民党萎靡不振，人心涣散。甚至借口帝国主义有进行武装干涉的危险和进行北伐，试图抑制革命的群众运动的发展。把可靠的军队派往北方后，唐生智遂成了湖南、湖北的主宰。对不能实现的北伐的宣传成了避免进行土地改革和把经济负担转嫁到群众头上的口实。总的口号是占领北京，解决土地问题。广东被轻易地丧失了，因为没有深入开展农民运动。在湖南和湖北，农民在没收土地。国民党则反对把土地和政权交给农民。但〔农民〕运动和共产党在加快事态的发展进程。在土地问题上，在共产党人当中有走得太远的倾向，在代表大会上经我们的努力给制止了<sup>③</sup>。革命的进一步发展要求通过进行土地改革来加强社会基础，而南方的客观条件有利于巩固必要的团结。蒋介石带走了大批部队，因为革命没有同时得到深入开展。国民党现时的政策是重复同一错误。武汉的军队在河南遭到了失败。预料会归附于我们的部队却转而反对我们。逃往西北、放弃华南和华中的倾向在加强。多里奥今天将带着作详细报告用的材料启程。

① M. M. 鲍罗廷。

② 冯玉祥。

③ 指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中有关不再没收小地主和国民革命军军官土地的条款（见 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第 111 页；《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70 页。

罗易 多里奥

全宗 514, 目录, 卷宗 251, 第 1—2 页。  
英文打字稿, 副本。

205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记录

1927 年 5 月 11 日于莫斯科

秘密

特别文件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成员飞行表决第×号<sup>①</sup>记录

出席：皮亚特尼茨基、布哈林、彼得罗夫<sup>②</sup>、曼努伊尔斯基、库西宁、梅尔菲、什麦拉里、安贝尔—德罗、艾尔科里。

听取：1. —— 罗易和维经斯基同志关于邀请他们去莫斯科的电报（1927 年 5 月 8 日）。

（维<sup>③</sup>报告说，因为罗<sup>④</sup>在前往莫<sup>⑤</sup>时有危险，可能被英国人逮捕，所以他不能前往。罗写道，若邀请他去莫斯科意味着解

① 编号未标明。

②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③ Г. Н. 维经斯基。

④ М. Н. 罗易。

⑤ 莫斯科。

除他在中国的工作，他打算永远离开政治生活，既然他现在不能去莫，那就打算留在中国。)

决定：1. 通知罗易同志，政治书记处邀请共产国际执委会两位代表是为了获得客观信息，更好地了解中国的情况。若他的行程有困难，政治书记处并不坚持要他一定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23，第 28 页。

德文打字稿有校对手迹，原件。

206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1 号（特字第 79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5 月 12 日于莫斯科

听取：6.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6. ——（1）采纳中国委员会的建议，提前按任命派遣中国指挥官。

（2）允许现有股份公司同来自中国的代表团<sup>①</sup> 达成关于向国

---

<sup>①</sup> 指武汉政府代表团。

民政府出售军事器材的口头协议。如果代表团认为必须返回中国，要在这方面给予协助。

(3) 把向汉口提供无线电台的问题按苏联程序交由伏罗希洛夫同志和李可夫同志协商解决。

(4) 责成由科肖尔、亚戈达、李维诺夫和别尔津同志组成的委员会修订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执委会、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关于保管档案、发送和保管发往国外的密电和其他机密材料的程序问题的各种细则，以便最大限度地保守秘密。委员会工作期限为两周。由科肖尔同志负责召集。

(5) 责成李维诺夫同志和加拉罕同志在两天内向政治局提出关于在北京被捕的苏联工作人员<sup>①</sup>的诉讼程序的决议案。

(6) 推迟审议科兹洛夫斯基同志就任上海领事的问题。向林德同志下达断然指令，让他不要干预政治，只起传递者作用。

(7) 认为有必要派遣专人去中国，以保证销毁所有多少有损名誉的文件，并防止其他人可能的暴露。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为此目的选派负责工作人员，同外交人民委员部和中央书记处协商其人选。

(8) 责成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和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治局的这项决定，让上述前往中国的工作人员带去发给全体在华工作同志的专门指示。

(9) 责成加拉罕同志起草给在华工作必要的政治指示信，并呈交中央书记处。

(10) 在国家政治保安总局系统内发出关于采取紧急措施、保守工作机密和销毁有损名誉的文件的密电。

---

<sup>①</sup> 1927年4月6日搜查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时，中国当局逮捕了15名苏联代表处工作人员，指控他们从事非法活动。被捕人员于1927年5月3日宣布绝食，5天后，北京当局宣布将此案移交有辩护人到场的法庭审理，绝食停止。案件不止一次决定公开审讯并推迟。1928年初，苏联工作人员获释回国。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科肖尔同志——（4）；

亚戈达同志——（4）、（7）、（8）、（10）

听取：18. ——关于北京问题（报告人：加拉罕、李维诺夫同志）。

决定：18. ——（1）认为向北京政府发出照会是不适当的。

（2）建议外交人民委员部向报界说明在北京被捕的苏联工作人员的情况。

抄送：

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2、4、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07

## 中共中央政治局和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记录

1927年5月12—13日于汉口

### 中共政治局会议

关于与国民党左派在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的关系的基础上建立相互关系的问题。

**陈独秀**通报同汪精卫谈话的情况，汪提出以下四点：

(1) 1927年1月3日占领日本租界的行动，不是根据国民党的指示采取的，而是在共产党人宣传鼓动的影响下进行的。

(2) 何时提出“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国民党对此一无所知。这是共产党人未向国民党通报的情况下提出的。

(3) 存在两个党组织是不合适的。如果领导权属于国民党左派，共产党人跟随他们，那就不需要共产党。如果是另一种情况，领导权在共产党人手里，那就不需要国民党。

(4) 苏联在唆使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并在这一斗争中作残酷的自我牺牲，但苏联自己却不积极参与这种斗争。

鉴于这最后一点，参加谈话的徐谦要求苏联与国民政府结成反帝军事同盟。为了证实上述第四点，他援引了张作霖公布的一

些文件，这些文件似乎表明，苏联喜欢呆在幕后<sup>①</sup>。汪精卫也说，他收到了江西几位将军的会议发来的电报，他们在电报中表示反对蒋介石，同时也反对共产党人。汪精卫以国民政府名义给他们发了复电，表示支持他们进行反对蒋介石的斗争。同时汪精卫只字未提国民党左派对电报后一部分内容的态度。

汪精卫总结说：现在的主要问题是，谁领导群众？群众跟谁走？跟国民党走还是跟共产党人走？国际关系和军队状况的恶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共产党人的过错。如果国民革命因此遭到失败，那对人民群众来说会更糟糕。

为了改善同国民党左派的关系，鲍<sup>②</sup>提出三点意见：（1）两党密切合作，共同解决所有问题；（2）制定对小资产阶级的总的政策，没有这种政策，灾难就不可避免；（3）制定对农民的总的政策。若这三点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决，那么国际形势就会变得毫无希望。

张国焘拒绝鲍提出的所谓共产党对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政策的指责。他要求派遣工人和农民到军队中去，并把他们武装起来。

维<sup>③</sup>说：这里讨论的问题并不是新问题。国民党左派会在一定的方面摇摆不定，因为现在坐而论道的时候已经过去，需要解决的问题非解决不可了。对于农民，问题可以通过局部没收土地的办法来解决，国民党左派也赞成这样做，但湖南的农民运动使他们感到害怕。对所提出的问题共产党可以作两种回答：

（1）要求国民政府对土地运动有明确的态度，协调而不是反对这一运动，或者（2）完全支持土地运动（？）<sup>④</sup>。

---

<sup>①</sup> 指1927年4月19日在北京报刊上发表的《给驻华武官的指示》，似乎该指示是在1927年4月6日搜查苏联驻北京全权代表处时所截获的文件中发现的，实际上这个文件是伪造的。详情见《历史研究》杂志，北京1985年第2期第181—196页。

<sup>②</sup> M. M. 鲍罗廷。

<sup>③</sup> Г. H. 维经斯基。

<sup>④</sup> 原文如此。



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态度是明确的：国民政府应当帮助小资产阶级反对大资产阶级，它自己也要同大资产阶级作斗争，并且支持这种斗争。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帮助小资产阶级劳动群众为改善他们的生存条件而斗争，但这种斗争应当通过工会加以协调。国民党内的派别问题也很重要。

**陈独秀**：比如在土地问题上我们有没有共同的方针呢？原则上说，我们同国民党左派对这个问题的态度似乎是一致的。但是今天有人告诉我，国民党关于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决定由于河南的形势而不会公布。

**鲍罗廷**认为，小资产阶级处境不妙有两个主要原因。一个原因是看不见的，这就是帝国主义者的金融封锁和其他封锁，另一个原因是看得见的，也是小资产阶级明显感觉到的，这就是在手工业部门做工的工人争取自身经济需要的斗争。小资产阶级的注意力自然集中在第二个原因上。试图向小资产阶级说明真实情况，但只指出第一个原因，并用它来偷换第二个原因，这是没有用的。唯一的出路是向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但主要问题是，共产党能否控制工人群众和自己的省级组织。在游行示威中和在其他重大事情上，共产党没有充分显示出自己领导群众运动的能力。共产党能控制武汉无产阶级和湖南农民吗？可以商定一定的方针，但条件是共产党能够执行这个方针。我本人对此表示怀疑。如果共产党自己不能做到这一点，也许它同国民党一起能够做到。这就是我为什么讲共同解决的原因。国民党相信，你们能领导群众，但实际上却不能。出路只有一条：或者同国民党决裂，或者一起作出决定，一起执行。

老头子<sup>①</sup>提出6条意见供讨论：

(1) 小地主和革命军官的土地不没收。

---

<sup>①</sup> 陈独秀。

- (2) 成立解决小资产阶级与工人之间纠纷的仲裁委员会。
- (3) 商人有权参加各种自治机构，反革命分子除外。
- (4) 不禁止、不妨碍帝国主义的贸易。
- (5) 邀请国民党积极参加工农组织。
- (6) 支持国民党政府增加和征收捐税，条件是不剥夺贫困居民阶层。

### 5月13日会议继续

**蔡和森**不同意所谓工人和农民应对小资产阶级的苦难负责的意见。我们已多次向小资产阶级作出让步。能否保住工人阶级和农民所取得的成绩现在还没有保证。如果我们增加对小资产阶级的让步，工人和农民的利益就会丧失更多。让步还是必要的，但不能只从我们方面，国民政府在国家政策上，例如在减轻小资产阶级和小地主的税负方面也应作出让步。

**罗**<sup>①</sup>提出了自己的决议案，他原则上同意**蔡和森**的意见，但认为在策略上不宜提捐税一条<sup>②</sup>。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98，第 31—34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sup>①</sup> M. H. 罗易。

<sup>②</sup> 根据讨论结果，中共中央政治局于 1925 年 5 月 13 日通过《关于共产党与国民党在小资产阶级问题上的关系的决议》（参见 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第 196—198 页）。

208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秘密会议第102号(特字第80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5月13日于莫斯科

1927年5月13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 ——给汉口发去以下电报<sup>①</sup>。“致鲍罗廷、罗易和陈独秀。你们关于土地运动的报告收悉<sup>②</sup>。我们的建议是：

(1) 现在在国民党的国内政策中最主要的一点是：在各省，特别是在广东省有步骤地开展土地革命，口号是‘一切权力归农会和村委会’。这是革命和国民党成功的基础。这是在中国建立反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广泛而强大的政治军事大军的基础。实际上，没收土地的口号对于被强大的土地运动席卷的省份，如湖南、广东等省是非常及时的。舍此便不可能开展土地革命。过一个月或更晚些时候，国民党可能批准没收土地。现在重要的是，在共产党的积极参与下由农民实际没收土地。关于保护指挥人员财产和分给士兵土地的法令是必要的。

(2) 现在就应开始组建8个或10个由革命的农民和工人组成的、拥有绝对可靠的指挥人员的师团。这些师团将是武汉在前线

<sup>①</sup> 文件的缩写稿见《斯大林全集》，莫斯科1949年版第10卷第32页。

<sup>②</sup> 文件没有找到。

和后方用来解除不可靠部队武装的近卫军。此事不得拖延。

(3) 应当加强在蒋介石后方的工作和对蒋介石部队的瓦解工作,并给广东农民起义者以帮助,那里的地主政权特别不能容忍。”

抄送:

加拉罕同志<sup>①</sup>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5, 第 8—9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209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 103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5 月 19 日于莫斯科

出席：联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加里宁、李可夫、斯大林、托姆斯基同志。

政治局候补委员：安德烈耶夫、基洛夫、米高扬、丘巴尔同志。

联共中央委员：阿尔秋希娜、克维林、科马罗夫、大科肖尔、洛博夫、鲁希莫维奇、斯米尔诺夫、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苏利莫夫、瞿鲁巴同志。

---

<sup>①</sup> 下面还有手写的字样：“送温施利赫特，5 月 26 日”。

中央候补委员：卡明斯基、基谢廖夫、克里尼茨基、柳比莫夫、谢列布罗夫斯基、温施利赫特同志。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奥尔忠尼启泽、索尔茨、扬松、雅罗斯拉夫斯基同志。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5 月 12 日会议第 102 号记录，决定：1），（报告人：李维诺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4. ——决定——特别文件。

听取：17. ——政治局给共产国际执委会的信的草稿。

决定：17. ——批准（见附件 2）。

中央书记 斯大林

政治局会议第 103 号记录

决定：17，附录 2

##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抄送联共（布）中央 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成员

最近一个月来，即在联共中央四月全会以后的时期里，联共中央委员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向各地散发了关于中国问题和关于英苏统一委员会等机构的文章、书信、声明和提纲<sup>①</sup>。这些文件中的有些文件只是近日才为联共中央所了解，因为它们没有发给联共中央，看来预先规定是在联共组织中传播的。所有这些文件都带有很明显的派性，收到这些文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可以证明这一点。这些文件直接攻击联共中央的路线和决定，间接攻击共产国际的路线和决定。

<sup>①</sup> 见《托洛茨基档案。苏联共产主义反对派，1923—1927》，Ю. 费尔什京斯基编著，莫斯科 1990 年。

没有必要答复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因为这些文件是他们关于英苏委员会和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的重复，而且已被联共中央 1927 年 4 月（4 月 13 日—16 日）全会所否决，联共中央认为有必要向共产国际执委会通报如下：

1. 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派别活动、他们对中央政治局及其个别成员（布哈林、斯大林）的不能容忍的攻击、他们对联共中央的指责（说它在使中国革命遭到“灭亡”）——所有这些事实不值得专门加以评论，因为可以自然而然地得出对它们的正确评价，无需加以证明。在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文件中谈到中国革命的“灭亡”，实际上是说一个小派别的真正灭亡，即在大家眼中业已破产的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派别的真正灭亡。濒于灭亡的派别是会把自已的灭亡描绘成革命灭亡的征兆的，联共中央明白这样做的心理动机。

2. 实际上，联共中央在中国问题以及英苏委员会问题上的立场，是对共产国际执委会扩大全会所通过的共产国际主要指示和决定的具体体现和贯彻。特别是联共中央在中国问题上的立场，在下列文件中都有反映：共产国际关于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的中国事件的有名呼吁书（联共中央直接参与了呼吁书的起草工作）<sup>①</sup>、以共产国际的这个呼吁书为基础制定的《供宣传工作者使用的斯大林提纲》（这个提纲经联共中央政治局批准并在《真理报》上发表）<sup>②</sup>、政治局今年 5 月 7 日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的“答复”<sup>③</sup>（这两个文件都发给了执委会委员）、经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的布哈林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sup>④</sup>（联共中央直接

<sup>①</sup> 1927 年 4 月 15 日《真理报》；《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第 110—113 页。

<sup>②</sup> 1927 年 4 月 21 日《真理报》；《斯大林全集》第 9 卷，第 221—230 页。

<sup>③</sup> 见全宗 17，目录 3，卷宗 634，第 16—32 页。该文件未收入本卷，因为它是重复斯大林《中国革命问题》提纲的基本论点。

<sup>④</sup>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中国革命问题决议案》。

参与了该提纲的起草工作),最后是联共中央机关报——《真理报》的有关社论。联共中央认为,这些文件实际上是对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所有“原则性”攻击的有力回击。

联共中央确信,反对派关于立即同总委员会决裂的要求,实际上是利用一些困难进行极左投机,它只会削弱国际共产主义的阵地,导致苏联无产阶级的国际处境进一步复杂化,而反对派要求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实质上把国民党的领导权交给国民党右派的方针,则是拱手让出中国革命阵地,迎合取消派,不再让中国无产阶级成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领袖。

3. 形式上就两个问题,即英苏委员会问题和中国问题,联共中央全会已有机会发表意见和作出决议,谴责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这些决议说:1)“赞同全苏中央工会理事会代表团在英苏委员会中的工作”,2)“赞同政治局在中国问题上采取的方针,拒绝季诺维也夫同志的决议案”(见联共中央1927年4月13日—16日全会决议)。

由此可见,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现在的表演是对他们所发表的关于服从联共中央决议的声明的粗暴违反,同时也是企图在联共中央全会已经解决的问题上挑起全苏范围的争论,并把这种争论强加给党,而这种争论无论从事情的根本实质上考虑(党已不止一次地证明季诺维也夫同志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立场是明显站不住脚的),还是从苏联目前的困难以及国际形势的角度考虑,都不能认为是合适的;其次从全苏范围的争论必然要给中国共产党造成困难的角度考虑,也不能认为是合适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核对无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

全宗 17, 目录 3, 卷宗 635, 第 1、5、15—17 页。

记录为铅印稿,签字为真迹复制,附录是经过核对的副本。

210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3 号（特字第 81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5 月 19 日于莫斯科

听取：4.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5 月 12 日会议第 101 号记录，决定：6），（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4. ——（1）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根据政治局以前作出的关于利用我们从国外报刊和我国报刊中获得的秘密消息的决定，在报刊上就北京逮捕苏联信使和其他工作人员一事并针对对他们的态度和被处决的危险等掀起一场运动。

（2）责成中央书记处重新审议中山大学的教师组成人员，以配备思想上更为坚定的教师，特别是要立即解除拉狄克、普里戈任和达林同志的中山大学教师的职务。

（3）建议鲍和加<sup>①</sup>就派遣学生到我国普通高校和军事院校学习一事，同莫斯科协调，使派遣工作在核准的分配名额限度内进行。

（4）中国委员会关于在华政治领导问题的建议<sup>②</sup>推迟审议。

---

<sup>①</sup> 分别指 M. M. 鲍罗廷和加伦（B. K. 布留赫尔）。

<sup>②</sup> 建议没有找到。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1927 年 5 月 3 日给布哈林的信中提出了任命 Д. З. 曼努伊尔斯基为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上海远东局主席的问题（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8，第 3 页）。



(5) 建议汉口选派从广州召回的部分顾问到于右任部队工作。

派遣 10 名从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毕业的中共党员到于右任部队工作。

(6) 责成彼得罗夫<sup>①</sup> 同志就把于右任的一定数量人选纳入派往我国高校学习的中国青年总分配名额的问题同汉口进行交涉。

(7) 满足冯玉祥关于给他派去 5 名医生、1 名工会运动顾问、1 名土地问题顾问和 1 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教官的请求。

(8) 派遣格<sup>②</sup> 同志到冯玉祥那里任政治顾问。

(9) 同意鲍罗廷同志关于派遣拉祖莫夫同志去四川的建议。

(10) 责成组织局挑选工作能力较强的“不许干涉中国!”协会的组成人员。

(11) 给加伦同志派去一名译电员, 并责成中国委员会从其预算中为加伦同志的电报开支拨出所需的经费。

(12) 允许外交人民委员部签署关于赤塔——哈尔滨——哈巴罗夫斯克(伯力)——海参崴电话联络的电话协议。

(13) 将米夫同志从中国召回<sup>③</sup>, 任命他为中山大学校长。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和加拉罕同志——除(2)以外的其他各项。

科肖尔——(2)、(10)、(13)。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5, 第 10—11 页。

打字稿, 原件, 签字为真迹复制。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可能是格林施泰因, 见第 219 号文件。

③ 根据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1927 年 5 月 16 日给 В. Г. 克诺林的信(抄送斯大林和布哈林)判断, 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书记处建议任命 Г. Н. 维经斯基为中山大学校长, 而 П. А. 米夫为副校长(全宗 495, 目录 154, 卷宗 298, 第 26 页)。

21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第八次全会给中国共产党的电报

1927年5月20日于莫斯科

共产国际执委会全会向英雄的中国共产党致以兄弟般的问候！张作霖匪帮勾结各国帝国主义者在北京使北方地区党组织失去了领导核心。在被张作霖杀害的、为无产阶级革命事业而战的英勇战士中，有被惨无人道绞死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杰出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共产国际五大代表、人们永远怀念的李大钊同志。他的英勇就义和其他在北京被杀害的共产党员的壮烈牺牲是在国际无产阶级的记忆中永远不可磨灭的。

中国共产党在失去为最终目标——社会主义的胜利而战斗的杰出战士后，在不可阻挡地发展壮大，并在广大劳动群众中赢得越来越高的威望。你们党所面临的宏伟任务还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关系重大。

中国工农运动的巨大发展使以叛徒蒋介石为首的一些资产阶级阶层脱离了革命，这意味着中国革命进入了最高阶段。反对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只能在同已经成为反革命阶级的中国资产阶级的斗争中来完成。把一批又一批工农阶层引上革命斗争轨道，加强工农联盟，确立无产阶级在民族解放革命中的领导权，千方百计开展土地革命——这就是摆在光荣的、经过战斗考验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伟大任务。世界帝国主义、封建

反动势力和资产阶级反革命已联合起来反对你们这个无产阶级先锋队。尽管双手沾满鲜血的刽子手杀害了你们队伍中的同志，尽管你们遭到一些暂时的失败，但是中国革命还是会在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的领导下大踏步地从胜利走向胜利。

中国无产阶级的领袖——中国共产党万岁！

革命的国民党万岁！

不可战胜的中国革命万岁！

世界社会主义公社万岁！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8，第 37—38 页。

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 212

### 曼达良、纳索诺夫和阿尔布列赫特 关于蒋介石政变的书面报告

1927 年 5 月 21 日于莫斯科

#### 关于蒋介石政变

在 2 月初就已经很清楚，支持蒋介石的右派集团延缓了同武汉的公开决裂，因为他们感觉到时机还不够有利。蒋介石和右派有周密制定的战略计划，在实施这一计划之前，他们耍了个花招，似乎他们含糊其词地承认了武汉政府。这个战略计划大体上有以下几点：

(1) 由右派部队占领上海和南京，然后依靠帝国主义的暗中支持强迫武汉接受自己的条件。

(2) 同李济深（蒋介石原先的对手）结盟，并建立一条经西南沿海各省（李济深、何应钦、白崇禧和蒋介石将军集团）的严密的交通线。

(3) 同外国人做交易（戴季陶去日本）。

(4) 同孙传芳余部结盟（在上海二月总罢工期间就做过这样的尝试）。

(5) 消灭江西、福建和浙江等省的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

这个计划在2月份就看得很清楚了，但我们（无论是武汉还是原来的中共中央）却没有自己的计划。诚然，在共产党的报刊上，国民党右派的行动受到过批评，但这种批评怯懦无力、羞羞答答。

3月3日的指示<sup>①</sup>3月22日才收到，晚了19天。中央委员会表面上赞同这个指示，但陈独秀声称，有一点他不能同意，这就是必须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然而，正是通过让产业工人加入国民党，才有可能根据这个指示采取其他一些措施。这是隐蔽地打算把共产党同国民党分割开，自愿地把国民党交给右派，因为上海共产党80%是由产业工人组成的。

武汉和鲍罗廷以提出让汪精卫回国、建立军事委员会等口号与蒋介石的战略计划相对抗，不敢使同右派的斗争具有明显的社会政治性质。武汉通过我们的同志向军事顾问下达（秘密）指令：准备失败。北伐在上海郊外的失败被认为是蒋介石的失败，因此在浙江前线只有右派的部队，因此左派军团呆在离这一战线较远的地方。这就便于蒋介石后来发动政变。

3月3日的指示证实我们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决议<sup>②</sup>提出的

<sup>①</sup> 见第174号文件。

<sup>②</sup> 见本书第71页注<sup>③</sup>。

看法是正确的。我们认为，应当采用以下做法与蒋介石和右派的战略计划相对抗：不阻止蒋介石占领上海，而在上海市内创造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平衡——武装工人，把左派部队集结到上海附近，以便使蒋介石失去活动能力、建立代表武汉和国民党的民主政权、开展农民斗争、加强反帝宣传、加强军队工作等。

国民代表大会是根据国民党十月全会关于政权民主化的决定<sup>①</sup>建立的机构。国民党右派也参加了该机构的组建工作，它得到了国民党政治委员会江苏右派分会的批准。在该机构内保证了包括商会和资产阶级在内的各居民阶层的代表权。后来的情况表明，国民代表大会在小资产阶级群众当中享有很高的声望，它是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建立统一战线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个机构将会成为武汉政府驻上海的直接代表，建立这样一个机构还因为有以下情况而显得尤为必要：第一，委任的政权不能在如此短暂的期限内把广大城市居民群众动员起来；第二，这个政权就其结构和形式而言是明显反帝的，并造成了对于租界市政委员会的独特的双重政权形式，因为租界全体居民在国民代表大会中和政府中都有代表。

彼得罗夫<sup>②</sup>在2月建议我们成立工人代表苏维埃，以取代国民代表大会，理由是小资产阶级对国民代表大会准备不够。这个观点被否决了，因为它导致放弃同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使工人孤立起来。这里顺便说说中国苏维埃的传闻。任何时候、任何地方都没有建立过工人代表苏维埃或任何其他代表苏维埃（除2月举行过工人代表大会并对奸细作出处置以外，当然，这次大会不能与真正的工人代表苏维埃相提并论）。在《真理报》上有时出现的

<sup>①</sup> 指1926年10月15—28日在广州举行的国民党代表会议关于召开省、区、市和乡村国民会议，成立省、区、市政府以及关于省政府与国民政府之间关系的决议案（见《国民党代表大会和代表会议（翻译材料）》，第436—439页）。

<sup>②</sup> 彭述之。

这类消息都引自英国资产阶级报纸，这些报纸一年来已不止一次地把普通工会称作工人苏维埃。

起先，我们没有把建立民主政权同总罢工和起义联系起来。我们把上海的起义看成是很危险的游戏（见曼达良同志1926年12月17日的信<sup>①</sup>），并且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同中国同志进行争论，中国同志从1926年9月起就坚持不懈地准备起义（后来的事态表明，并没有做真正的准备，只是同各资产阶级集团商谈了支援问题）。但2月19日自发地举行了总罢工，并在第二天自发地转变为武装起义。关于二月发动和我们的立场，我们已经写得够多的了<sup>②</sup>。我们只指出，三月起义证明，如果党表现出足够的坚定性，如果6个月来所说的准备工作确实做了，那么，在2月起义就会以胜利告终。不过，二月起义还是给党上了一堂非常重要的直观课。

三月起义是在胜利有十分之九把握的情况下发生的，这次起义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右派一时完全丧失了活动能力。他们的计划出乎意料地遭到了2000名很好武装起来的工人和经武汉政府认可并同群众有密切联系的国民代表政府的阻止。但是，需要采取进一步的措施来巩固我们的阵地。22日，城市被占领，23日，我们就向中央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建议，后来根据中国同志的提议，在3月24日的信<sup>③</sup>中对这些建议作了说明，这些建议可归结如下：蒋介石将其第1师和第2师调入城内。第1师师长和部分指挥人员是左派，他们表示完全准备跟我们一起行动。第2师是右派。薛岳的第1师拥有约4000名士兵和5000多支枪。我们建议立即在党内、共青团内和工会积极分子中间宣布动员令，首先让2000—3000工人加入薛岳师，师长本人也主张这样做。这样，

① 信没有找到。

② 见第175号文件。

③ 文件没有找到。

我们在上海就会有 8000—10000 名士兵站在武汉政府一边，与已被瓦解的第 2 师的 3000 人相对抗。其次，我们还建议让第 21 师(左派)向上海方向集结，第 2 军和第 6 军向南京和苏州方向集结。这样就从根本上改变了军事力量对比，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右派武装，使他们很难同武汉决裂。同时我们还建议开展反帝的鼓动宣传，唤起江苏农民，让工人成批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活跃起来，开展反对右派的运动，除反面的口号外，还要提出正面的口号(我们的同志在宣传中只提“打倒蒋介石!”“打倒右派!”等反面口号，而未提出正面纲领和群众明白易懂的政治口号)。我们认为，政府应当在上海提出政治纲领并表明它打算向工人、小资产阶级、农民和其他劳动者群体提供些什么。

时间已经流逝，但党的领导没有为巩固左派的三月胜利做任何事情。很说明问题的是，我们能把第 2 师瓦解到这种地步，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它调走，却未能把第 1 师争取过来并让工人加入该师。这是由于党的领导的基本方针造成的。说什么广州军队是一般的军阀军队，只能瓦解它。在党内没有宣布动员令，没有派一名工人参军，而且还用各种借口为这一切作辩护。另一方面，上海政府仍然无所作为；尽管它得到上海全体居民的全面支持，但它不敢发表任何政治宣言，因为我们的同志怕吓坏右派。起先，布哈罗夫<sup>①</sup>以武汉没有批准为由来说明政府为什么无所作为。但在批准之后，他却说右派已退出政府，在暗中破坏政府的工作，而共产党人不能单独行动。失望的工人，甚至小店主都问：我们为什么要建立这个政府？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政府的组成人员中国民党左派很少。它在人员结构上本应首先表现为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却成了共产党人与资产阶级很不牢固的联盟。

我们向中央委员会提出建议时，根本没有预先解决同右派和

---

<sup>①</sup> 罗亦农。

蒋介石的冲突是否会演变成军事斗争的问题。我们认为，有正确的政策，是可以避免这种军事斗争的，因为在不利的军事政治条件下进行战斗，对右派是不利的，尽管可能有帝国主义者的支持。我们认为，无论如何，左派在上海地区只有在军事政治上得到加强，才能使右派丧失活动能力。

党的领导采纳了我们的建议，但没有实施，因为这些建议与原先的方针相抵触。党的领导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在南京遭炮轰<sup>①</sup>后，它在总罢工问题上立即转到了极左立场上。彼得罗夫和陈独秀在3月26日对我们说，他们决定在28日星期一宣布总罢工，即在收回租界和抗议南京枪杀事件的口号下进行的消耗战。我们问他们是否认为罢工会演变成起义，他们作了肯定的回答。于是我们对他们说，我们认为这种罢工在当时是不适宜的，并建议把罢工局限在上海的英国企业和家庭女佣范围内，以表示对南京枪杀事件的抗议，至于收回租界的问题，应同武汉和莫斯科商量。第二天，在得到莫斯科的答复之前，中央委员会自行取消了这一决定。的确，局势非常严重，帝国主义者进行挑衅，战争一触即发，惊慌失措是不难理解的。不过，四月暴动表明，右倾领导人这种极左行径的失败并不是偶然的。

但是我们认为，如果蒋介石不搞政变，也就是说如果左派在上海和江苏省在政治上占据上风，那么同帝国主义军队的冲突就可能是不可避免的。我们认为，不能在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进行战斗，应当把左派部队集结到离上海较近的地方，在政治上要控制住蒋介石，以便一旦帝国主义者把斗争强加于我们，我们就可以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并巧妙地应付各帝国主义集团。

汪精卫于4月1日或2日抵达<sup>②</sup>。对他的到来人们寄予很大

<sup>①</sup> 见本书第157页注①。

<sup>②</sup> 汪精卫于1927年4月1日抵达上海。



期望。但情况是：汪精卫的到来被蒋介石巧妙地利用了。首先，蒋介石发表声明，声称他服从汪精卫<sup>①</sup>，这样，他在一定程度上使我们的一部分同志丧失了警惕。随后，他利用汪精卫的名字宣扬自己的反动措施，如他宣称，汪精卫与武汉意见相左，汪精卫支持他关于在南京召开中央全会的建议，等等。遗憾的是，汪精卫没有揭露蒋介石的这些谎言。其次，中央和上海委员会的领导同志是如此钟情于汪精卫，以至认为他一回来就可以避免发生许多灾难，因此他们没有做任何其他事情。蒋介石悄悄地将第1师和第2师调离上海，而把不久前从孙传芳那里倒戈过来的浙江部队调入上海。第1师师长一直请求指示，他该做些什么事，但始终没有接到指示。

这样一来，由于我党领导的错误以及武汉的部分错误和优柔寡断（武汉总是笨拙而粗暴地向蒋介石炫耀武力，但没有为同他进行斗争做任何认真的准备），在4月份力量对比发生了根本变化。政变的道路已被扫清。

我们接到莫斯科的指示：目前不得进行公开战斗，不要交出武器，万不得已时要把武器藏起来<sup>②</sup>。我们把这个指示交给了中央委员会，并建议加以执行，因为事情很清楚，在业已形成的力量对比中，根本谈不上对蒋介石的任何军事反击。但这时由汉口发来了维<sup>③</sup>签署的指示，其中谈到：汉口认为，如果蒋介石企图以武力解散上海政府，那么也应武力对他进行反击。

我们认为，上海工人失去武装和因采取毫无意义的暴乱行动而变得一蹶不振的责任应归咎于这第二个指示以及上海委员会（更确切地说是布哈罗夫）的政策。

4月12日，我们听说工人被解除了武装，并宣布举行总罢工。

① 指蒋介石1927年4月3日给国民革命军指挥人员的电报。

② 见第183号文件。

③ Г. Н. 维经斯基。

我们建议立即停止总罢工，实行退却并隐藏好剩下的武器。我们的建议被提到区委会议上，但遭到否决。不仅如此，在工人被解除武装之后还决定举行起义。但过一天后，由于我们和共青团区委的坚决要求，这个决定还是取消了。4月12至14日发动时使用的口号很能说明问题：中央的一位负责人（王若飞）说，需要作出牺牲来“证明蒋介石堕落到何等地步”。工会理事会的呼吁书中说：死于广州士兵手下比死于北方人手下更光荣……<sup>①</sup>

4月15日，我们见到了布哈罗夫。他说，群众被镇压下去了，为了唤起他们的情绪，需要开展大规模的红色恐怖，并准备新的起义。我们反对这样做并提出一些建议，这些建议在我们4月15日的电报<sup>②</sup>中作了阐述。

中国共产党还在蒋介石政变前就考虑到了上海的错误，中央委员会多数人还在蒋介石政变前就聚集到汉口，批评了彼得罗夫和布哈罗夫的方针。根据中央委员会的决定，布哈罗夫被解除工作<sup>③</sup>。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总的来说是健全的，能够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帮助下在很短时期内消除机会主义倾向。

曼达良

纳索诺夫

阿尔布列赫特

注：阿尔布列赫特同志和福京同志从3月17日起不在上海。

〔阿尔布列赫特补充〕

我认为有必要提供以下情况作为对上述情况的补充：

1. 关于同蒋介石决裂。我过去认为现在仍坚持这样的看法，

<sup>①</sup> 实际上，上海总工会1927年4月13日的呼吁书中说：“本会所领导的80余万工友，誓死奋斗，宁愿死于以国民革命为旗帜者之手，虽死亦有荣。”（见《上海工人三次武装起义研究》第332页）。

<sup>②</sup> 电报没有找到。

<sup>③</sup> 见第189号文件。

武汉政府与蒋介石决裂的直接原因是我们党和武汉政府在如何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采取的政策不坚定，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sup>①</sup>和鲍罗廷没有方针可循。

这一点在解除武装<sup>②</sup>前党中央就已经指出来了，解除武装以后，上海省委书记<sup>③</sup>布哈罗夫也对此作了声明。事态是这样发展的：党的头头们没有研究蒋介石的问题。双方一开始就试图使整个争论具有个人性质。问题似乎是关于鲍罗廷。但有一次我曾亲口问格里高里<sup>④</sup>，为什么不批评蒋介石的行动（这是紧接着蒋介石发表第一次反共讲话<sup>⑤</sup>），格里高里反驳我说，在中国不能点名，因为这样做会被认为是挑衅，我一到汉口，就听到各方面（加伦、西纳尼和布罗夫<sup>⑥</sup>等）对蒋政策的责难。所有同志都认为是犯了一些重大错误：

(1) 不能无情地滥用计谋和游行示威来反对蒋介石，而不提出同他作斗争的任何具体措施。

(2) 突出了唐生智。

(3) 专门成立的本应取代总司令的军事委员会<sup>⑦</sup>的政策不果断。

(4) 忠于武汉政府的部队没有参加北伐和实行挫败蒋介石的方针。

(5) 最后，我们究竟是准备决裂还是长期周旋，这个问题不明确。

每天都有新情况，每天行动方针都在变，往往一天变几次。我在汉口时，这种摇摆不定感觉得特别明显。例如，从罗易（4月6

①④ Г. H. 维经斯基。

② 指解除上海工人纠察队的武装。

③ 原文如此，似应为江浙区委书记——译者。

⑤ 讲话没有找到。

⑥ 分别为：B. K. 布留赫尔、Г. B. 斯卡洛夫和 A. B. 巴库林。

⑦ 指在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二届三中全会上成立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

日)到达汉口那天起,方针就开始发生很大的摇摆。罗易在第一次会议上宣布,接到了莫斯科发来的关于整个代表团去上海会见蒋介石的电报<sup>①</sup>。他甚至建议把代表大会<sup>②</sup>改到5月15日举行(这无论在时间上还是在实质上都意味着代表大会开不成),以便执行这项指示。但在当天晚上,由于获悉汪精卫已动身去汉口,上海之行被推迟。从那时起,每天都在决定和重新决定去同蒋介石谈判的问题。没有采取措施把革命部队(第1师、第2师、第2军和第6军)留在上海和南京。这就给蒋介石提供了让所有不合他心意的指挥官复员和调动部队的机会,除此之外,还将第6军军长程潜召到汉口,让他在那里呆了三个多星期。我们的军事顾问一致表示,在3月23日到4月3日期间,完全可以轻而易举地解除蒋介石的武装。加伦不止一次地主张采取坚决的行动或一定的方针。

综上所述,我得出以下结论:

(1) 在上海、广州等地解除工人武装,是武汉对蒋介石采取很不坚决的、同时又具有挑衅性的态度的结果。例如,总司令部顾问罗兰<sup>③</sup>同志报告说,谭延闿等人在解除武装前曾致电总司令,说他们准备解除他的武装。

(2) 如果采取更为坚定的策略,那么消灭蒋介石取得成功的机会是很大的。而如果对自己的力量没有足够的信心,那就必须从威胁转向随机应变的策略(派遣军队上前线,履行对总司令的职责即支持北伐,进行谈判等)。有了这种随机应变的策略,就可以拖延决裂的时间,并加强自己的力量。

(3) 汪精卫是否像我们的反对派试图证明的那样支持蒋介石呢?我认为,他不支持。我们都反对给汪精卫的到来赋予那种特

① 电报没有找到。

② 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③ A. B. 布拉戈达托夫。

殊的意义(摆脱一切灾难的法宝)。但还必须指出,他在群众中的威信很高;他没有与蒋介石进行任何交易,而在我们(4月23日)离开中国之前,没有发现任何一个文件能证实英国和国民党右派的造谣诽谤,说什么汪精卫已同蒋介石串通一气(这在中国基本上已被排除)。汪精卫曾幻想他能使武汉与蒋介石和解;这也许主要是因为他本来就是个温和的人物。但他在4月13日武汉群众集会上表示反对蒋介石的事实,无疑在团结革命力量方面具有重大意义。

阿尔布列赫特

全宗 508, 目录 2, 卷宗 11, 第 56—67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附注为 A. E. 阿尔布列赫特亲笔签字。

213

## 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和曼达良给联共 (布)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7年5月21日于莫斯科

###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sup>①</sup>

我们认为, 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提出了一条很正

---

<sup>①</sup> 文件上有一个身份不详的人的批示: “应送斯大林、李可夫、伏罗希洛夫和加拉罕同志。”

确的路线，而联共（布）中央则通过3月3日的决定<sup>①</sup>非常及时地对其作了深入的阐述。机会主义的和极左的错误根本不是来源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决议，而是来源于俄国反对派在中国的思想追随者——右倾的彼得罗夫和布哈罗夫<sup>②</sup>、机会主义者陈独秀以及庇护他们这些人的维<sup>③</sup>对决议的否定和抵制。中国的彼得罗夫主义<sup>④</sup>在其基本理论原理和策略结论上与反对派的路线是完全一致的，瞿秋白同志在《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中对此作了全面的论证<sup>⑤</sup>（遗憾的是，可以看出来，了解这个小册子的人很少，其实，这本小册子，尽管有一些缺点，但除了给彼得罗夫主义以毁灭性批判之外，它还对中国的阶级力量作了很有价值的分析，提供了很多实际材料）。

彼得罗夫和陈独秀的中央“经过战斗”理解了决议，但把它压了一个多月时间（到3月初）。中国党内的右派抵制了这个决议，正是在俄国反对派不能接受的那几点上“持保留意见”（拒绝参加政府和国民党机构；不同意让工人大批加入国民党，也就是隐蔽地退出国民党；不同意使国民党变成群众性的党；无视左派和小资产阶级；借口广州军队是军阀军队，不同意争取军队；认为工人代表苏维埃的思想是与国民党所赞成的上海国民代表大会相对立的，等等）。结果在机会主义和极左盲动主义之间来回摇摆。

我们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在中国执行了唯一正确的路线，但反对派的中国信徒们破坏这条路线，他们常常在左的词句掩盖下实行机会主义政策。如果今天反对派“表示同意”我们的信<sup>⑥</sup>，那么它就埋葬了已被老的中共领导班子中的机会主义者引到绝路上

① 见第174号文件。

② 分别是彭述之和罗亦农。

③ Г. Н. 维经斯基。

④ 彼得罗夫（彭述之）的思想体系。

⑤ 见《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670—736页。

⑥ 指Г. Г. 曼达良、Н. М. 纳索诺夫、Н. А. 福京和А. Е. 阿尔布列赫特1927年3月4日给共产国际执委会联共（布）代表团的信。

的“路线”。

纳索诺夫、阿尔布列赫特、曼达良

全宗 508, 目录 2, 卷宗 11, 第 54—55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214

## 罗易给某人的电报<sup>①</sup>

1927 年 5 月 25 日于汉口

共产党人占据部长职位<sup>②</sup>会造成危险局面。国民党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军队对工农运动持敌对态度。

不久前在长沙, 军队解除了工人纠察队的武装并将其逮捕。工人纠察队的抗议示威遭到整夜扫射。随后又彻底解除其武装并再次进行逮捕。国民党想消灭湖南的农民运动, 派出以谭平山为首的专门委员会, 要借助于宣传和武力整顿湖南秩序。谭的委员会里将有军队的代表, 并由军队护卫。后果将是不良的。农民将看到一个共产党人部长带部队去镇压他们。湖南农民运动的某些特点应当加以控制, 以避免同小地主和国民军军官发生摩擦。但是, 共产党人部长不应率领讨伐队去讨伐农民运动。我反对谭去湖南。由于鲍罗廷坚持, 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同意了谭的引起麻烦的使命。所有了解农民运动并在其中工作的俄国同志都很怀疑这种策略。

<sup>①</sup> 估计是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见第 219 号文件)。

<sup>②</sup> 谭平山在武汉政府中任农民部长, 而苏兆征任劳工部长。

今天国民政府颁布一项法令<sup>①</sup>，宣布农会反对地主阶级的行动为非法。采取这种行动的组织将被解散，而对这种行动负责的人将被逮捕法办。农民相信，谭的这个委员会是派来加强这项法令的。莫斯科并不完全了解这里的情况。请征询各方消息并给予指示。

罗 易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5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

215

## 罗易给某人的电报<sup>②</sup>

1927 年 5 月 25 日于汉口

这里的局势非常严重。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完全处于反动军阀的控制之下。除汪精卫和邓演达外，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右倾的，代表着资产阶级和封建主的利益。除工人和农民外，加入国民党的基本上是小资产阶级。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反对进行土地改革。攻击工农运动的倾向越来越明显。事态的发展会导致同蒋介石的和解，并把领导权让给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国民党在正式宣言中实际上要求取缔群众运动和共产党。以谭平山为首的惩治委员会正赴湖南，以借助于宣传和武力整顿秩序。在长沙，工人纠察队遭

<sup>①</sup> 在 1927 年 6 月 3 日《汉口民国日报》上，法令标明的日期为 1927 年 5 月 24 日。《汉口民国日报》是 1926 年 11 月 25 日到 1927 年 9 月 30 日在汉口发行的日报。

<sup>②</sup> 估计是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见第 219 号文件）。



到军队的扫射，被解除武装并被逮捕。唐生智和整个军事委员会保持着电报联系，他们赞赏夏斗寅的反农民的叛乱。鲍罗廷完全赞成这种趋向，并要求共产党支持国民党的退让政策，他认为共产党人的良好行为是改变局势的唯一手段。他为达到此目的提出的计划将意味着实际取消共产党。他要求共产党抑制工农运动，并把工农运动的共产党领导人〔看成〕是反革命分子。他想逮捕我们在湖南的领导同志，把他们投入监狱。他说，工人纠察队应当被解除武装。简言之，鲍罗廷实行的是葬送革命的彻头彻尾的社会民主主义的政策。他处事独断专行，不同许多负责人商量，无视他们的意见。他向共产党发号施令。他的权力不是建立在政治影响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对同莫斯科的关系的垄断的基础上。说明整个情况、但不符合他的政策的报告不能发出。他拒绝发我的电报。这里的多数俄国同志都反对他的政策，不满意他的工作方法。莫斯科应赶紧进行干预。他发出的是片面的消息。不能根据这些消息作决定。他说，莫斯科不了解情况，不能给半殖民地下达指示。在当地应该实行铁的专政，而他就在实行这种专政。我将尽可能地提出更详细的报告。现在我只发出预告。

罗 易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4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216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5 号（特字第 83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5 月 26 日于莫斯科

听取：7.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7. ——（1）未经中央书记处允许不得向武汉和上海发出密电和指示性电报。

（2）调拨给乌拉尔斯基<sup>①</sup>同志飞机备用零件的问题和发送给冯<sup>②</sup>的 6 架飞机的问题推迟到下星期四讨论。

（3）允许中国委员会从其经费中每月拨给安德烈<sup>③</sup>同志 1000 美元用于军事组织工作。

（4）为了给特种部队（炮兵、空军、通信兵、装甲兵等）培训共产党干部，从中山大学今年毕业生中挑选 100 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委托军事部门保证对他们进行培训。中国委员会要向下次会议提出必需的经费预算。

（5）派遣 64 名中山大学毕业生供国民政府使用；首先是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其次是国民党员。在确保途经南方港口的路线安全之前，仅通过库伦派遣。

① В. К. 布留赫尔。

② 冯玉祥。

③ Г. И. 谢苗诺夫。

(6) 鉴于从斯皮尔瓦涅克同志的电报中可以看出，在北京被捕的苏联工作人员已经提供了个人口供，将斯皮尔瓦涅克同志的这个消息备案待查，并建议将这些口供限制在最小范围内。

(7) 认为有必要将米夫同志回来的行期推迟两个月。

(8) 不调科兹洛夫斯基同志去上海。

抄送：

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斯大林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16—19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17

## 罗易就中国形势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的书面报告

1927 年 5 月 28 日于汉口

### 致政治书记处和斯大林同志报告

#### 一、政治形势

实际上，在两个民族主义中心（武汉和南京）之间没有多大差别。武汉的右倾带有表面性，因为在那里居统治地位的是军阀

分子，就其社会出身而言，这些军阀与蒋介石及其一伙没有什么区别。武汉军阀分子的权力在不断增大，与蒋介石和解的倾向表现得十分明显。汪精卫之类的左派领导人（顺便说一句，汪是中央委员会内唯一的左派）将很难归顺蒋介石。但是，为了使民族主义运动回到封建资产阶级的领导之下，如果有必要的话，甚至像蒋介石这样的人物也可能被排挤到次要地位。重要的是这是走向蒋介石主义的一种倾向。

两个中心之间的力量配置如下：

在地域上，南京控制着江苏、浙江、安徽（部分）、江西（部分）、福建、广东、广西等省。它很快就会把自己的势力范围扩展到四川。

蒋介石集团拥有约 15 万人的军队，此外，川军约有 10 万人（据报道，四川省的封建地主武装——民团约有 40 万人）。

在财政方面，对上海和广州的控制使南京集团处于有利地位。上海的一些中国银行向蒋介石提供了 2000 万元的贷款。

英国和日本之间在角逐，它们都想成为南京“民族主义”政府的庇护者。英国人与蒋介石的和解对双方来说都不舒服，尽管张伯伦在最近的一次讲话中暗示将对南京持友好态度<sup>①</sup>。蒋介石从自己方面来说不牺牲自己的民族主义要求（而这种要求是他的重要政治资本），也不能公开同英国达成协议。

因此在不久的将来，在实际政策范围内，南京与日本之间只能是接近。日本的重要官方人士正在访问南京，而蒋介石的代表正在访问日本。

他也在力求得到美国的友谊。戴季陶已前往美国。为了掩盖自己同北方军阀的谈判，蒋介石仍在北方制造作战行动的假象。

除了内部原因外，同日本接近也必然意味着同张宗昌和张作

<sup>①</sup> 指张伯伦 1927 年 5 月 9 日在下院的讲话。

霖接近。即便蒋介石将在北方作战，他仍然要扮演反革命角色。吴佩孚为了确立自己的最高权力同张作霖进行了厮杀，但也没有成为革命者。实际上可以预料，国际帝国主义将支持蒋介石，将其作为取代旧军阀的新工具。

至于工农运动，蒋介石不会实行镇压政策，而会实行收买政策。他在上海成立了法西斯工会。这些工会通过了包含中华全国总工会全部经济要求的纲领。蒋介石支持处在他的控制之下的农民协会。可以预料，蒋介石作为大资产阶级的代表，将在土地问题上坚持比武汉更为激进的立场。

蒋介石不是单一的军事政治集团的首领。在这个集团中有许多内部矛盾，这些矛盾随时都有可能激化。他的政治追随者（基本上都是老国民党员）代表大买办资产阶级，而他的军队将领却是封建主义的卫士。其次，在资产阶级影响下归附于他的相当数量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已经感受到捐税的重负。上海银行筹集的2000万元基本上都是从中小商人那里得到的。此外，在蒋介石政权下，小资产阶级的民主愿望也得不到满足。

在地域上，武汉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部分）和不久前占领的河南南部。武汉政府的武装部队总数约10万人，其中5万人集中在湖南和湖北两省，名义上隶属于国民政府，这是唐生智的一个军。其余部队对政府的忠诚也是很有限的。武装部队实际上是独立因素，当国民政府符合它们的利益时，它们就支持它，但它们随时都会不知羞耻地起来造政府的反。证据将在报告的另一部分提出。武汉的财政状况不佳。想驳斥红色倾向指控的愿望妨碍武汉政府向大资产阶级征税。外国和中国的银行〔对武汉〕实行了经济封锁。解决财政问题的唯一长久的办法只能从土地改革中找到。国有化的土地可能成为获得大笔贷款的基础。但武汉政府在“自己”军队的压力下放弃了土地改革计划。

武汉的国际处境并不像通常所描述的那样毫无希望，没有理

由惊慌失措。实际上，这种恐慌往往是官方引起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非常明确地声称，工人阶级的“过分”要求会造成财政困难和国际处境恶化。这就是说，为了改善国民政府的国际处境，似乎应取缔群众运动。为此才经常提出直接武装干涉的威胁问题。帝国主义者对武汉的政策是恐怖主义。为了占领和摧毁武汉，派出了比实际需要多10倍的军舰。武装干涉只会恶化经济形势，损害最大的将是贸易。因此，帝国主义者想恐吓武汉政府，以便使它言听计从。可能出现的最坏情况是重新占领英租界。但这不是损失，因为“协议”<sup>①</sup>没有带来任何好处。中国警察保护着英租界。甚至经济封锁也不可能持续很久。它会给双方带来损失，外国商人受到的损失甚至比中国人的损失还大。日本人希望解除封锁。德国人要把贸易抓到自己手里。武装干涉或长期经济封锁会把英国贸易排挤出长江上游地区。因此，武汉的国际处境不可能像人们想象的那样危险。

武汉政府的力量源泉是群众的支持。但是由于玩冒险游戏，丧失这种非常宝贵的资本的危險在日益增大。有一种看法，似乎未来的保证不是发展群众运动，而是卓有成效地限制这种运动。武汉的内部矛盾看来比南京的更尖锐。目前的危机就是这些矛盾的结果。军事力量和社会力量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影响的不平衡则是〔目前〕局势中最复杂的问题。所谓的国民革命军（大部分）是反动的。然而它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影响却在日益增大。

## 二、国民党

人们通常认为，蒋介石的脱离改变了国民党的性质。但事情并非如此。至于脱离本身，多里奥已经作过报告<sup>②</sup>。脱离是不可避

<sup>①</sup> 指1927年2月19日武汉政府外交部长陈友仁和英国驻北京公使馆参赞O. 奥马利签署的关于将武汉英租界归还中国的协议。

<sup>②</sup> 文件没有找到。

免的，但我们方面做得很笨拙。没有做好准备，没有分寸。脱离是在对我们非常不利的时刻发生的。因此蒋介石在各方面都显得比武汉强。

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离开了国民党，但它的代理人还留在武汉中央委员会和国民政府中。这些资产阶级代理人同封建军阀分子一起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产生决定性的影响。武汉中央执委会不是左派，它不代表小资产阶级，它的多数委员是由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构成的，小资产阶级左派处于少数。汪精卫和邓演达是小资产阶级的唯一代表，可以认为是真正的左派。谭延闿和徐谦代表封建主义。孙科是危险的机会主义分子。他穿着左派的外衣，但实际上代表买办阶级。原先的左派思想家顾孟余成了不折不扣的反革命分子。他主张实行矛头明显指向工人阶级和共产党人的政策。唐生智是封建军阀，他加入国民党是为了满足自己的个人野心。今天，他在国民党内起着过去蒋介石所起的作用，他很快就会成为革命的敌人，其危险程度不亚于蒋介石。这就是武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人。

国民党反对进行土地改革。军界人士公开敌视土地改革。这是在夏斗寅叛变时表现出来的。唐生智的全部军队同情夏的行动，若是唐本人对采取这种激进措施做好了准备，那么他的军队就会同夏联合起来推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反对对夏的叛乱采取任何坚决行动。正在北方战线的唐生智一直同夏斗寅保持着电报联系，把夏吹捧为革命者，说他为人民的利益奋战了8个春秋。若是没有共产党人叶挺指挥的独立师和黄埔军校学员，武昌就会被叛军占领，在这种情况下，叛军就会受到其军阀同类的欢迎。夏斗寅叛乱只是湖南叛乱的前奏。近几周来，限制群众运动的要求变得更为强烈。要求工会必须自律。自律意味着工人应当准备作出牺牲。在共产党人领导下的工会赞成“自律”。工会联合会成立了“革命法庭”，谴责组建纠察队，要求增加工资，要求

外国人定期支付人力车夫和苦力的工资。受到谴责的工人被投入监狱。宣言中说，为了巩固北伐的后方，需要把同资本主义的斗争推迟到将来<sup>①</sup>。对工人自卫队和少先队（工人子弟组织）活动的否定态度变得更加强烈。300名武装纠察队员被逐出城市。共产党同意必须向小商人作某些让步，指示工会放弃由纠察队逮捕虐待职员的事商人的做法。

5月19日，国民党发表反工农运动宣言，认为工农运动损害了民族统一战线。间接地把民族主义者队伍分裂的责任加到了工农运动头上。宣言中客气地谈到，为了获得商人和工厂主对国民政府的支持，需要工人和农民作出牺牲。宣言中还列举了关于禁止罢工、实行义务仲裁，关于没有外交部的批准禁止在属于外国人的企业中罢工<sup>②</sup>的规定。两天后发表了另一个宣言，谴责同绅士进行的斗争“糟得很”，号召农民在国民政府还没有在公正对待各阶级的基础上解决全部问题之前保持平静。这是两个历史性的文献。塔斯社转发了这两个宣言的详细内容。

湖南农民运动是对所谓的武汉左派的真正考验。农民运动的要求和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纲领没有超出国民党决议和宣言的范围。实际上，中共五大通过的纲领是在两党土地委员会联席会议上事先商定的<sup>③</sup>。军阀们对这些土改措施持敌视态度。国民党心甘情愿地作出让步，放弃在同蒋介石斗争时为显示自己左的政策而通过的决议。掀起一阵关于“过火行为”的喧哗。不久还发明一种理论，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在湖南的刻不容缓的任务是从“反革命坏蛋和不良共产党员”手中夺取农民运动领导权。自然，在湖南农民运动中无地农民和贫农占了多数，他们被称为反革命坏蛋和无赖。湖南的所有共产党员都不好，因为他们说：“农民起来反

① 见 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166—168 页。

② 同上书，第 166 页。

③ 原文如此。



对封建地主和豪绅，而我们不能不领导他们。”在一场新出现的而规模巨大的群众运动中，难免出现某些古怪行为和乱子。国民党打着纠正这些“过火行为”的幌子，策划消灭湖南农民运动。鲍罗廷支持国民党的这种政策。共产党不敢反对鲍罗廷的政策，因为他的政策被认为是莫斯科的政策，只好不情愿地采取违心的行动。

存在利用共产党人农民部长作为实行国民党反农民政策的工具的计划。两周前，谭平山向党的政治局提出了组建自己的农民部的纲领草案和计划。在这个文件中只字未提解决土地问题。当有人主张农民部的职能之一应当是根据国民党的决议实行土地改革时，谭平山声称，在这种条件下他无法在国民党内工作，他将辞去一切重要职务。过了几天，未经共产党政治局认可的一个方案作为正式法令发表了，宣布成立农民部。谭平山在该部成立仪式上讲话时说，在北方（军阀占领区），农民运动的任务是同封建主义作斗争，而在民族主义者控制的地区则是组织农民协会<sup>①</sup>。汪精卫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讲话时说，农民部的任务是在各阶级和平相处的基础上对农村进行改造。

国民党对军阀不断提出的并得到夏斗寅叛乱支持的要求作出回应，决定向湖南派遣一个政府的特别委员会去解决土地问题。这种“解决”是要向农民说明，他们的要求不可能实现。农民应当满足于减少一些地租。政府的这个特别委员会应由谭平山率领，反对农民的军队的一些代表是委员会成员。委员会的首要任务是用“宣传和武力”（这是鲍罗廷在讨论中经常重复使用的词语）纠正农民运动的各种“过火行为”。谭平山的使命应有大量军队给以配合。

继指派谭平山之后，又发布一道政府令，宣布农民协会为非

<sup>①</sup> 见 A. B. 巴库林：《中国大革命武汉时期见闻录》第 143 页。

法，并宣布侵犯地主阶级，特别是侵犯军官及其亲属的行为，应受到惩处。法令中还说，搞这类违法活动的任何组织都将被立即解散，其负责人将被逮捕法办。这是对湖南省农民协会的死刑判决。很自然，农民相信，以共产党人农民部长为首的特别委员会是被派来执行这个死刑判决的。

是否同意谭平山担任这个危险的官方职务的问题，甚至没有提交政治局研究。决定是在有陈独秀、谭平山和鲍罗廷出席的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会议上作出的，并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在谭平山出发前一天，政治局才得到关于此事的正式通知。我没有机会陈述自己的意见，只是表示不同意谭平山作为政府委员会领导去湖南镇压农民运动。所有了解情况和从事农民运动工作的俄国同志都认为谭平山去湖南是危险的。谭平山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得到了全部指示，共产党无话可说。

第二天得到了长沙发生政变的消息。纠察队被解除武装并被逮捕，工农组织被解散。鲍罗廷得知这一消息后大发雷霆。他对我说，湖南的局势已变得无法容忍，他本人将前往那里，逮捕李维汉（共产党省委领导人、政治局委员），把共产党人通通逐出该省，解除所有纠察队的武装。次日（5月26日）早晨，鲍罗廷同谭平山委员会一起前往长沙。对鲍罗廷动身去长沙一事，共产党里谁也不知道，我也一无所知。鲍罗廷和谭平山委员会出发后，收到了来自长沙的一些新消息。

### 三、湖南政变

夏斗寅未遂叛乱是湖南反革命叛乱的前奏。唐生智的所有部队都与湖南政变有联系。这是反动军阀旨在镇压革命运动的行动。这种行动似乎是针对工农运动的“过火行为”，而实际上是反对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反革命行动。长沙5月19日的叛乱具有与去年3月20日政变相同的性质。长沙5月19日事件的反革命性质

并不亚于蒋介石4月13日<sup>①</sup>在上海采取的行动。5月19日，在长沙工人纠察队与军队发生了冲突。根据官方的报告，是武装纠察队进攻军队，并试图解除它们的武装。这种说法无需费多少口舌就可驳倒。事件的发生完全不是这样。是军队进攻纠察队，并解除了它们的武装。第二天举行了群众性的抗议集会，要求归还武器。士兵赶到会场，驱散了集会，一些工人被捕。一天后举行了更大规模的游行示威，参加者打着一些“打倒35军！”的标语口号（唐生智军驻扎在长沙的几个团解除了纠察队的武装）。游行队伍遭到袭击，士兵们开了火。工人和农民纠察队在城市的另一个地点集结，向35军教导师发起了攻势。战斗持续了一整夜。据悉，共有10名工人被打死<sup>②</sup>，30名革命领导人被捕，工人和农民有500件火器被收缴，所有共产党人被宣布为非法，而工农组织被军队查禁。由5名叛军军官组成的委员会取代了省政府。后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接到报告，说一些县城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件，一些工人和农民被杀害，而被收缴的武器数量更多。军事委员会接到这些报告后无动于衷。一周前，当获悉一名军官的双亲因他们的孩子被农民抓走而自杀时，军事委员会却大发雷霆，以致汪精卫叫嚷：“如果今后还这样，我们应考虑解散工会和农民协会。”

唐生智从前线发来电报，向军事委员会和国民政府报告说，他已命令长沙的军官委员会采取以下行动：“支持党〔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的三大政治纲领（即：联苏、联共、扶助农工），同反革命分子蒋介石和张作霖作斗争，支持第二次北伐。在叛乱期间，士兵们高呼：“蒋介石万岁！”墙壁上也悬挂着写有这类口号的标语。

国民政府仍然没有表示积极态度。唐生智的电报很清楚，他还没有准备推翻武汉政府，也没有准备公开同共产党作斗争。但

<sup>①</sup> 原文如此，应为4月12日——译者。

<sup>②</sup> 晚些时候报道说有30人被打死（M. H. 罗易注）。

是，他支持反革命军官委员会作为事实上的湖南政府，并期待国民政府也这样做。国民政府明白这种暗示，保持着平静。它把解决冲突的责任交给了谭平山委员会一起前往，顺便说一句，在最后一刻决定不派军队随同谭平山委员会。原因是新的湖南省政府可能把谭平山委员会同军队的一起到来理解为敌对行动。不一定是考虑到农民的类似心情。

鲍罗廷和谭平山委员会于5月26日早晨动身。后来获悉，国民党领导人反对鲍罗廷前往。他们甚至下令在车站阻拦他，然而他已经启程，他们的列车在半路被拦截。军官们有礼貌地接待了他们，说他们应先致电长沙，问清楚委员会和鲍罗廷继续前往是否安全。同时军官们还说，若是他们希望返回武汉，那当然可以。这显然是命令他们不要前往而要返回，让军队自己来解决湖南事件。鲍罗廷和谭平山以及他们的所有随行人员一起返回了武汉。只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商人工作部部长、〔党的〕右派代表陈公博被允许继续前往长沙。

到写这个报告的时候，事态没有进一步发展。汉口笼罩着一片恐慌情绪。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驻地、汪<sup>①</sup>的官邸和其他一些建筑物布置了警卫。除了叶挺的独立师和位于武昌的黄埔学校<sup>②</sup>外，整个武汉都掌握在与湖南的反革命势力有着密切联系的唐生智军队手中。

〔5月〕27日夜间，中共政治局召开会议，决定应采取什么策略的问题。〔政治局〕委员张国焘主张采取进攻行动。会议最后根据我的建议通过一项决议，为了准备进攻实行策略性退却。决议得到赞同，而张的建议作为决议附件<sup>③</sup>列入。

① 汪精卫。

② 指中央军政学校。

③ 文件没有找到。

### 三<sup>①</sup>、来自军阀方面的危险

国民党和国民政府依赖所谓左派军阀的支持，而这些军阀就其本质而言，同一般的中国军阀基本上没有多少区别。在左派军阀与蒋介石之间没有任何区别。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客观上也许比这些封建和半封建匪徒<sup>②</sup>要革命一些。我们对华政策的主要错误始终是过高地估计了这个特殊因素。目前的局面是这种长期错误的结果。谁也不能忽视军事因素。军阀之间的矛盾可以并且也应当被利用来发展革命。这些都是对的。但归根到底，革命应当找到社会基础，否则就不是革命，而只是军事冒险。

没有从同蒋介石的决裂中吸取教训。从〔1926年〕3月20日起，同蒋介石的〔交往〕经验表明，国民革命必须摆脱冒险主义军阀的控制。北伐给我们提供了〔这样的〕机会。由于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没有摆脱将领们的控制，同蒋介石的决裂没有好处，甚至是个大错误。决裂的直接结果是唐生智作为局势的军事独裁者<sup>③</sup>取代了蒋介石。后来越来越清楚，实际上武汉与南京差别不大。两地都是反动的封建军阀居统治地位。留在武汉的小资产阶级向军阀分子彻底投降了，并同他们一起向同南京和解的方向行进。如果这种政策得到赞同，那就应当承认，同蒋介石决裂是个最大的错误。

我们的政策的根本原则是，没有武装力量，革命就无法发展。但是问题在于，是否需要我们始终依靠卖身投靠的军阀？这不一定。去年一年形势都是很有利的。由于进行北伐，开展了大规模的群众运动，它可以成为革命的坚实的社会基础。当时可以把工农群众武装起来。可以通过将广大工农群众编入现有军队的办法彻底改变军队的性质。但没有这样做。若是这样做了，那么同蒋

①②③ 原文如此。

介石的决裂便意味着彻底孤立资产阶级。但是没有采取巩固左翼联盟的社会基础和旨在建立革命武装力量的预备性措施，而是加快了同蒋介石的决裂。资产阶级很幸运，帝国主义也很高兴。

不过为时还不晚。决裂前没有做的准备，可以在决裂后进行。为了证明自己同蒋介石的斗争是正确的，武汉集团本应在左的、近乎红色的旗帜下逐步采取行动。当时它的主要力量是群众运动，还可以武装工农、改组军队来削弱军阀的权力。

过去的根本错误是，从来没有尝试过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两年来，80万人的广东农民协会没有采取任何革命行动。运动没有深入，没有把农民武装起来。这种政策的结果是灾难性的，反革命占领了广东。如果农民武装起来了，那么李济深的政变就不可能得逞。即使现在，农民也还在抵抗反动派。但国民政府却让广东落入反革命的魔掌。

我们的政策看来是与客观条件的要求背道而驰的。它是考虑到反动军阀分子的优势在日益增大，继续进行北伐不可能没有任何其他后果。有关我对北伐的看法的材料已让多里奥带去<sup>①</sup>。这里只能指出：由北伐造成的危险局面（对此我曾提醒过）已经来临。在国民军占领半个河南省之前，河南实际上已经丧失，革命根据地处于严重危险之中。可以称之为国民政府军的只有两个军（第4军和第11军），总共1.3万人。它们被率先派去北伐。在它们与武汉之间部署了由唐生智指挥的两万人。因此，一旦需要，第4军和第11军不可能回来保卫武汉。

我反对部队立即向北推进时，正是指出了这样一种危险。河南的军事胜利不能补偿以湖南事件和武汉可能出现的反革命为标志的政治灾难。相反，河南的每一个胜利都会加强军阀分子的地位，并相应地使革命的发展受到打击。

---

<sup>①</sup> 文件没有找到。

#### 四、鲍罗廷的论点

鲍罗廷在这里领导各方面的工作，可以根据他的某些论点来正确评价这里的政策和中國革命面临的危险。

(1) 中国革命 10 年内不可能取得成功。应当有一个军事混乱时期。如果我们北上，南方就会丧失。如果我们返回收复南方，北方就会丧失。这种来来往往的军事行动会给某些能够统一中国、使革命获得成功的力量出现创造条件。

(2) 中国和其他东方国家的工人阶级（印度可能除外）都没有力量，它不可能成为革命的基础。这些国家没有真正共产党的立足之地，中国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党，它是国民党的无产阶级左翼。共产党不可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因素并留在国民党内。

(3) 谈论中国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这是幻想。鲍罗廷不相信群众的力量，他甚至不相信欧洲无产阶级能够完成革命。

(4) 不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和实行无情的恐怖，就不能巩固革命的社会基础。

(5) 中国革命只有在西北建立军事基地、组建革命军队的情况下才能取得成功。

(6) 国民党在占优势的武装力量面前就会退却。共产党人应当支持国民党的这个政策。〔他们〕应向群众说明这种退却（即进攻工农活动、禁止阶级斗争、宽恕湖南反革命的罪行、趋向于同蒋介石和解、实际停止反帝斗争等）的必要性。

(7) 工农运动应当借助于宣传和武力来加以控制。

(8) 应当解除工农纠察队的武装，以满足我们的小资产阶级和“左派”军阀盟友的〔要求〕。

(9) 共产国际的提纲<sup>①</sup>指出了长远前景。我们应当同现在的国民党一起行动,并期待在几年内出现真正的小资产阶级领导。那时便可以提出民主专政问题。

(10) 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形势。革命提纲容易写,鼓动演讲容易做(援引布哈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上的讲话和斯大林为中央委员会起草的提纲<sup>②</sup>)。实际政策的决定则要在这里作出。

(11) 完全有必要在当地实行坚强的领导。

争论没有好处。像在联共(布)不要争论一样,在中国也不能容许争论。需要有一个能作出最后决定的人,而大家都服从他的决定。

## 五、共产党

近两年来,党有了巨大发展。党员人数从950人增加到5万人。无产阶级分子在党的队伍中占多数。共产党人(不是党)在工农运动中确立了垄断地位。

但是,领导未能同党的成长壮大齐头并进,它是软弱的和机会主义的。一些老的领导人(陈独秀、谭平山)与其说是共产党人,不如说是国民党人。集体领导实际上从来没有过。五大以前实际上没有中央委员会。在上海领导党的是陈独秀、在广州是鲍罗廷。五大选出了由31名委员和1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委员会,成立了由7名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的政治局,还组成了中央委员会的几个部。计划组建党的机关,但在实践中做得很少。对政治局各个委员的评价和对一般工作方法的评论将在多里奥的

<sup>①</sup>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

<sup>②</sup> 指布哈林在联共(布)莫斯科州委第三次全会上的讲话和斯大林为宣传工作者撰写的得到联共(布)赞同的提纲《中国革命问题》。



报告中作出<sup>①</sup>。

党的活动没有集中统一，没有加以组织，各地的共产党员都是按自己的方式工作。但各地的主要工作方法，不是进行群众性的宣传鼓动，而是从事幕后活动——同国民党领导人，特别是同将领们进行秘密谈判。党的所有领导人无一例外地把很多时间花在先串通这个将领反对另一个将领上，然后又串通另一个将领反对这个将领上，而不是在群众工作上。例如，陈独秀、谭平山等人同群众没有联系。他们很少参加群众集会或出席全党会议。

党患了“军事病”。实际上，它认为同将领们耍手腕比发展和组织群众的战斗力具有更大的意义。群众运动始终是自发的，而不是由党有步骤地发展起来的。

党在过去犯了一些重大政治错误。居主导地位的观点是，共产党不能成为独立的政治因素。这种看法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一些老的领导人(陈、谭)与其说是在国民党内工作的共产党员，倒不如说是在共产党内工作的国民党员。

五大试图改变党的政治面貌和内部生活。多里奥和维经斯基将提出关于五大的详细报告<sup>②</sup>。

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基本上好的，如果共产党领导人给予普通国民党员而不是上层以很大的注意力，这种关系还可以改善。同蒋介石决裂后，国民党发生了危机，这是领导的危机。现在的封建-资产阶级中央委员基本上不代表小资产阶级党员，即便是较低级别的国民党机构也往往掌握在那些与共产党人发生冲突的反动分子手里。共产党没有设法去改善同普通国民党员的关系。共产党领导人在同国民党的关系上的唯一工作方针是同国民党领导人谈判和妥协。共产党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为吸引广大工农群众加入国民党做多少工作，而做这方面的工作则可以改善我们同国

<sup>①</sup> 文件没有找到。

<sup>②</sup> 文件没有找到。

民党的有机<sup>①</sup>关系，并加强我们对它的影响。

同国民党关系破裂的直接危险并不存在。国民党不希望这样，因为没有共产党人的帮助它就不能拥有群众。反动军阀分子（名义上的国民党员，而不是真正的国民党员或国民党的拥护者）企图加速关系破裂。小资产阶级、真正的国民党人感觉到了〔关系破裂的〕危险，但他们不知道怎样避免。共产党能够通过群众施加压力来帮助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左派抵抗军阀分子日益增强的统治。但是，现在执行的是向左派领导人让步的政策和同他们一起向军阀让步的政策。

最近成立了两党委员会。实际上两党所有领导人每天都在委员会开会。如果共产党人以党的代表身分发挥作用，该委员会就可以成为一个有益的机构。但是事情并非如此。该委员会给国民党提供了使共产党人服从国民党的政策的机会。共产党人常常在毫无准备、没有党的指示的情况下出席这样或那样的联席会议，他们每个人都是各行其事，他们的行动败坏了党的声誉。党始终处在既成事实面前，它可以同意或不同意，在后一种情况下意味着公开反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政策，在目前形势下，这是不可能的。因此，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作出的任何决定。这样，就把对一些关系到革命前途的重大政治问题的决定（同蒋介石决裂、北伐）强加给了共产党。除了共产党领导软弱之外，鲍罗廷要为这种令人难以忍受的局面承担很大的责任。他认为，不可能让共产党就每个问题向国民党提出明确的意见，因为这会使合作无法进行。然而，真正的原因是他不想让共产党以前作出的决定束缚自己的手脚。

最近采取了一些改变局面的措施，共产党就一些政治问题作出决定，并推荐给国民党。这引起了鲍罗廷与共产国际代表之间

---

① 原文如此。

没完没了的冲突。最后，决定成了一纸空文。为了避免今后发生冲突，鲍罗廷收到了出席共产党政治局〔会议〕的邀请。通常他是不出席这种会议的，往往消极抵制在他到场情况下作出的决定。决定作出之后，他就分别同共产党领导人谈话，迫使他们不执行这些决定。他对共产党影响最大，因为他是莫斯科的代表，对同莫斯科的联系手段拥有垄断权。共产党人经常在正式会议上驳斥他的观点，但最终他总是能把他们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不管他们对局势评价如何。

## 六、共产国际代表机构

关于这个问题的报告和建议也将由多里奥和维经斯基提出。可以补充几点意见。今后革命的发展将取决于共产党，没有另一种政治力量能够给革命以必要的领导。因此，以现有广大群众为基础来建设真正的共产党是最重要的任务。困难在于领导，需要一些时间来培训领导干部。党太年轻，没有传统和经验。同时，〔共产〕国际应当保证给以领导。为此需要有一个强有力的、权威的共产国际驻华代表机构，在实践中领导党。现有的人员都聚集在新的中央委员会里，但实际领导权仍掌握在原来的半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会手里，因为新的政治局基本上是由原来的中央委员会委员组成的。不可能不这样。形势不允许进行更彻底的变动。

目前党经常违背自己的意志，受鲍罗廷的左右，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国际的代表未必能做需要他做的事情。实际上他的威信受到损害。党不能认真接待他，因为拥有权力的不是共产国际代表，而是鲍罗廷。这种情况有害于共产党的成长，因此也危害整个革命。如果鲍罗廷有时间管共产党的事，并在实际上把它向右引导，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就应该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最合适人选。不是政治方面的人选，而是组织方面的人选。

共产国际代表的另一个困难是，他与总的政治形势隔绝，不

允许他同国民党发生任何关系。两党的活动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以致不同国民党的政策紧密地联系起来就无法对共产党实行正确而有效的领导。现在迫切需要得到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以及它同国民党和鲍罗廷关系问题的明确答复。鲍罗廷想使共产国际代表成为他的下属，并根据他的指示去领导共产党。在还没有明确确定政治方针之前，这种组织形式是不可能实现的。

## 七、结 论

存在着两种前途：

(1) 军阀们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控制日益增强；同蒋介石和解；把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权归还给封建资产阶级分子；向帝国主义妥协；随后是镇压革命。

(2) 为取得短暂的喘息时间实行战略退却；准备为消除军阀对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统治而斗争；武装工农群众；建立革命军队；改组国民党领导；通过无产阶级同小资产阶级和农民一起夺取政权来建立民主专政。

目前的政策会导致第一种前途，同时也存在着第二种前途的客观条件。拥护目前政策的人当然在有意地不使事情发展到取消革命的地步。他们不相信群众；竭力想证明自己过去的政策是正确的，这种强烈愿望使他们在客观条件面前成了瞎子；就其观点而言，他们是宿命论者；他们认为，在中国，除了将领们以外，就没有任何人能主宰局势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如此重视军事因素，士兵还是被完全遗忘了。同形形色色的将领们进行无休止的谈判，同他们结盟。把某个将领争取到自己一边成了政治活动的主要方面，但并不试图把这些将领的士兵争取到自己一边。将领们归附革命，士兵就跟他们走。现在将领们反对革命，士兵也跟他们走。但是所有士兵都是无地农民或贫农；他们是最革命的因素，他们要比将领更关心革命。若是把花在争取将领上的一小

部分精力和费用花在争取士兵的工作上，那么现在我们就是一支革命军队。然而，这并不是疏忽大意。这是有意识的、旨在不触动士兵的政策。例如，关于在第8军、第35军和第36军士兵中（这几个军的军官在“土地与和平”的口号下在湖南杀害农民）开展宣传鼓动工作的建议被否决，借口是这种宣传工作会削弱北伐的后方。我们现在是无计可施。将来还把赌注下在将领们身上，我们就不能为削弱威胁革命的反动势力做任何事情。

又及 1

载着鲍罗廷和谭平山使团的列车受到阻拦，没有被允许前往长沙。总共只有一个团的兵力。如果像最初为控制农民运动的“过火行动”所决定的那样，谭平山委员会由军队护送，那么使团就能很容易继续前往长沙。然而，现在实行的是恐吓农民、安抚反革命军官的政策。长沙驻军总共才三个团。人们怀疑唐生智（35军的一个团与第2军（谭延闿）串通一气。在长沙叛变的几个团属35军。因此，唐生智可能并不完全赞同湖南的叛乱，因为这次叛乱镇压农民运动，不会使他的权力得到加强，而会加强他的老对手谭延闿的权力。政变后为“清党”而成立的新的国民党委员会的委员都是谭延闿的人。

共产党政治局5月26日通过的决议<sup>①</sup>没有得到执行。共产党领导人在反革命气焰嚣张时表现得非常消极。他们主要是同汪精卫一起开会，考虑这个或那个将领下一步要干什么。没有做任何群众工作。昨天（5月28日）晚上，谭平山向政治局报告了自己使命的失败。共产党没有建议采取任何行动。陈独秀发表意见说，共产党没有得到足够的消息，所以不能采取〔相应的〕行动。我提出了建议（这里附上）<sup>②</sup>，但没有被采纳。共产党领导人不懂得宣传“武装工农，保卫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口号的政治意义。他

<sup>①</sup>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138—141页。

<sup>②</sup> 文件没有找到。

们勉强同意根据我的建议<sup>①</sup>发表一个声明，但根据这个声明能做什么还需要看一看。这里的共产党人常常坚持这样一种做法：同意做某件事，然后又各行其事。

又及 2

我反对立即向北方而不是向河南南部发动军事进攻，理由如下：（1）这会加强军阀的影响和力量。（2）这将成为同工农运动作斗争的借口。（3）这样会把根据地（广东、湖南和湖北）向反动派的进攻敞开。有人对我说，莫斯科不同意任何反对立即向北方发动军事进攻的立场。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了向北进攻的危险：

（1）在河南取得某些初步胜利之后，湖南湖北的军阀变得野心勃勃。今天他们参加了公开的反革命叛乱。

（2）提出了镇压工农运动的口号，因为工农运动对北伐造成威胁。这是夏斗寅和长沙叛乱者所发表的声明的主旨。国民党同情军阀，至少在这个问题上是如此。

（3）北伐开始后不久，反动派就占领了广东。所有可靠的军队都北上了。国民政府没有采取拯救广东的措施。现在湖南失陷，湖北也可能在某一天步其后尘。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6—18 页。

英文打字稿，有校对手迹，副本，无签字。

<sup>①</sup> 见 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第 147—151 页。

218

## 罗易给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27年5月30日于汉口

湖南的反革命在庆祝胜利。鲍罗廷和谭平山委员会受到叛乱部队阻拦，没有被允许去长沙。长沙叛乱政府约有2000名士兵。在农民的支持下，借助武汉的几个团是可以轻而易举地用武力摧毁这个政府的。但国民党决定不采取任何行动，就像在广东<sup>①</sup>时所做的那样。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则非常消极，它否决了我提出的关于组织群众运动，要求采取措施镇压湖南反革命的建议。它反对武装工人来保卫国民政府和镇压反革命的要求。长沙的叛乱分子得以腾出手来巩固自己的政权和反革命在全省取得的全面胜利。〔防止出现这种情况的〕唯一保障是武装农民，有组织地反击〔反革命分子〕。我在等待指示。我同国民党没有任何官方关系，不能要求国民党采取某种行动。莫斯科发来要求采取行动的电报会产生效果。共产国际应电告共产党，说明在国际代表领导下采取行动的必要性。否则就会完全失去对局势的控制。

全宗514，目录1，卷宗251，第19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sup>①</sup> 指李济深1927年4月14日在广州的政变。

219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07 号（特字第 85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6 月 2 日于莫斯科

听取：7.——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决定：7.——（1）根据领事和签发密电者的责任，严禁以官方人士和机构的名义发出由本人签字的专电。本人签字及地址和负责人姓名应用化名取代。

（2）鉴于内蒙古民族革命党组织受到强大的武装进攻，根据蒙古革命党中央的请求，拨给步枪 1000 枝、重机枪 5 挺、手榴弹 500 枚、步枪子弹 100 万发、机枪子弹 5 万发。上述武器分小批拨出。责成温施利赫特同志负责确保执行这一决定的秘密。温施利赫特同志关于不需要为这些武器拨出任何经费的声明备案待查。

（3）再次严格禁止不同莫斯科协商就派出中国学员。即将到达的 18 名同志安排在军事学校，使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限额。

（4）电告银行家和乌拉尔斯基同志<sup>①</sup>：在组建第 3 军和第 9 军时，务必考虑到 5 月 30 日的指示<sup>②</sup>，并把尽可能多的共产党员、共

<sup>①</sup> 分别是 M. M. 鲍罗廷、B. K. 布留赫尔。

<sup>②</sup> 见下面的决定第 19 项。



青团员、革命的工人和农民编入这两个军。

(5) 根据政治局今年5月26日的决定<sup>①</sup>，从中国高校100名毕业生中派40名到炮校学习、20名到航校学习、15名到通信学校学习，25名去学习装甲和机枪技术。允许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利用自己的预算余额作为这些同志的生活费。规定学习期限为9至18个月。学年开始前，将这些学员安排到相应的营地，以利用夏季时光从事野外训练。

(6) 为执行政治局今年5月19日会议第103号记录，决定：4<sup>②</sup>，责成中央组织局在6月6日以前为冯<sup>③</sup>物色三名（国家政治保安总局方面、土地问题和工会方面的）顾问人选。

(7) 派格林施泰因和赫韦辛同志到国民军从事军事政治工作的问题交由中央书记处在三天内审定。

(8) 关于给国民军提供飞机的问题推迟到下次会议讨论。

抄送：

温施利赫特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科肖尔同志——(6)、(7)。

## 1927年5月30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19.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9. ——给鲍罗廷、罗易和柳克斯<sup>④</sup>发去以下电报<sup>⑤</sup>：

“1. 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不进行土地革命，

① 见第216号文件。

② 见第210号文件。

③ 冯玉祥。

④ O. Ю. 普利切。

⑤ 文件缩简稿，见《斯大林全集》中文版第10卷第31—32页。

国民党中央就会变成不可靠将领手中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同过火行为作斗争，但不能动用军队，而要通过农会。我们坚决主张从下面实际占领土地，罗易对谭平山之行的担心是有一定道理的<sup>①</sup>。不应脱离工农运动，而应千方百计对其加以促进，否则就会葬送事业。

2. 对手工业者、商人和小地主作出让步是必要的，同这些阶层联合是必要的。只应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不要触及军官和士兵的土地。如果形势需要，暂时可以不没收中地主的土地。

3. 国民党中央的一些老领导人害怕发生事件，他们会动摇和妥协。应从下面多吸收一些新的工农领导人加入国民党中央。他们的大胆意见会使老头们变得坚决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无用之人。应该改变国民党目前的构成。务必要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而地方机关应当依靠工农组织中的数百万人加以扩大。不这样做国民党恐怕会有脱离生活和丧失一切威信的危险。

4. 应当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要动员两万共产党员，再加上来自湖南、湖北的五万革命工农，组建几个新军。要利用军校学员做指挥人员，要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现在还不晚。不这样做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是很困难的事情，但没有别的路可走。我们既然已经下达了这样的指示<sup>②</sup>，你们做了什么工作，为什么不报告？

5. 要成立以著名国民党人和非共产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迫害人民、迫害工农的军官。不能只是说服教育，到采取行动的时候了。要惩治坏蛋。如果国民党人不学会做革命的雅各宾派，他们就要为人民、为革命去捐躯。

<sup>①</sup> 见第 214、215 号文件。

<sup>②</sup> 见第 208 号文件。

6. 请不要扣压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你们都必须用化名签署电报。务必报告你们是否收到了电报和采取了什么措施。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

温施利赫特、加拉罕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27—30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220

###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2 日于汉口

莫<sup>①</sup>，最高领导机构：

收到你们的电报<sup>②</sup>后，我还没有看，鲍<sup>③</sup>就立即让陈<sup>④</sup>发电报，也未同政治局和我商量。长沙的叛乱分子有 2000 名士兵，在长沙与武昌之间的半路上表示同情他们的警备部队还有 2000 名

① 莫斯科。

② 见第 219 号文件。

③ M. M. 鲍罗廷。

④ 陈独秀。

士兵。加伦<sup>①</sup>认为，在农民支持下，一个团就可以解决长沙事件。军队中的高级官员一般都同情反农民的政变，但唐生智本人不想在现阶段支持政变。目前他正扮演着左派角色并在一段时间内还将扮演这个角色。若是国民党有坚定的政策，就可以迫使他镇压湖南的反革命。如果有坚强的领导，农民准备战斗。国民党想借口军队的反对立场避免进行土地改革。在群众的适当压力下，左派会摆脱右派的影响。今天在讨论湖南问题时，汪精卫宣称，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他援引一些通常的借口反对实行土地政策。他强烈反对过火行为。我提出一个尖锐问题：国民党究竟是支持革命还是支持反革命，并且明确地指出平息长沙叛乱的可能性。最后他同意了，并宣称决心在一周内结束这起事件。如果进行强有力的宣传，无地的士兵和贫农就会准备进行土地革命。在这方面由于害怕削弱军队而没有做任何事情。国民党采取了取缔农民运动的措施。共产党没有借助群众运动给以抵制。形势对执行你们电报中的指示有利。在占领郑州之后，必须采取以下军事行动：（1）冯<sup>②</sup>守住陇海铁路并进攻北京，（2）其余部队进军西南，解放广东。立即进攻南京和上海是危险的。这意味着同帝国主义的直接军事冲突，然后上海的任何一个卖身投靠的将领都会站出来反对革命。上海应由我们自己的军队去占领。直接的任务是镇压湖南和江西的反动派，通过进军广东和广西同蒋介石进行间接的武装斗争，将他孤立在上海。这个计划给我们在湖北、湖南、广东、江西进行土地改革和在这一地区建立革命军队提供了时间。占领广东将大大缓解财政困难。甚至现在就可以借助于大宗财产的捐税缓解这些困难。强有力的领导是非常重要的。中国共产党现阶段的领导很软弱，共产国际实行直接领导是完全必要的。共产

① B. K. 布留赫尔。

② 冯玉祥。

党实际上是由鲍<sup>①</sup>领导的，没有认真对待共产国际代表。我本着你们电报中的指示精神提出的建议常常遭到拒绝或抵制。这种不正常的状况应当改变。当党自己在目前的危急局势下没有能力进行领导时，它就应当接受关于承认共产国际全权的指示，并应遵循这些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应同国民党有官方关系，否则就不能对共产党实行真正的领导。

琼 森<sup>②</sup>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20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

## 221

###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5 日于汉口

琼致斯和布<sup>③</sup>

谭平山的自由主义不仅具有个人性质，而且还反映了整个党的领导的观点。我建议农民部的纲领应包括解决土地问题，谭<sup>④</sup>不要率领考察团去湖南，这些建议被政治局否决。陈<sup>⑤</sup>比谭更坏。他

① M. M. 鲍罗廷。

② M. H. 罗易。

③ 琼森 (M. H. 罗易) 致斯大林和布哈林。

④ 谭平山。

⑤ 陈独秀。

的领导无疑有害于党。不按我建议的那样把他召到莫斯科去是错误的。他是个典型的激进知识分子，是国民党在共产党内的代理人。他不顾共产国际提纲、〔中共〕五大决议、莫斯科指示和政治局决定，反对共产党党团在国民党内工作，支持国民党内摇摆不定的和反革命的倾向。他完全支持国民党镇压湖南“过火行为”的政策，这实际上是向农民运动进攻。他认为湖南的同志对发生反革命叛乱有严重过失。在目前革命处于危机的情况下，这样的领导对党是极其有害的。共产党领导的令人可悲的状况是近四年来实行错误政策的结果。党在革命斗争中成长壮大，但不是它的领导成长壮大了。要顺利实行形势和你们的指示所要求的坚定革命政策，有赖于某些组织措施。陈应立即召到莫斯科去，而鲍<sup>①</sup>的情况应认真加以研究。非常有必要在国民党内设共产国际的代表机构。

昨天，汪精卫抱怨没有把莫斯科的意见通报给国民党。他问，为什么他给斯大林的电报<sup>②</sup>没有回音。你们应当同他保持经常联系。每天都有人把他往右推。近来他不太清楚究竟谁代表莫斯科的观点：是鲍还是我。共产国际代表应当同国民党有官方关系，并参加它的领导机构。汪证实，国民党的最近一次全会<sup>③</sup>通过了希望共产国际和国民党互设代表机构的决议。由拥有同样全权的鲍、加<sup>④</sup>和共产国际代表组成的三驾马车应对整个工作负责。尽管有莫斯科的正确指示和极大的帮助，但当地的领导如果没有这样一些明确的组织措施，就会丧失一切。关于湖南的局势将在另一份电报<sup>⑤</sup>中通报。青年共产国际的什<sup>⑥</sup>完全支持琼森的评价和建议。

① M. M. 鲍罗廷。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 1927 年 3 月 10—17 日在汉口举行的二届三中全会。

④ 加伦 (B. K. 布留赫尔)。

⑤ 见第 222 号文件。

⑥ 何人不详。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51, 第 21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无签字。

## 222

# 罗易就湖南局势 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年6月5日于汉口

### 莫<sup>①</sup>, 琼森<sup>②</sup> 致最高领导机构

湖南农民起义还在继续。据来自各种来源的消息称, 有 2 万到 2.5 万用火枪和长矛等武器武装起来的农民集结在长沙以南 30 英里的地区。约有 5000 人的先遣队驻扎在离长沙几英里的地方。有报道说, 农民们想占领长沙, 然后开赴武汉, 因为他们得到消息说, 那里发生了反革命政变。驻在远处的军队拒绝与农民作战。暗中担心局势恶化的国民党决定在长沙实行一些表面的变革。唐生智军队的一名军官<sup>③</sup> 被派往长沙去担任军队指挥, 不仅要清除国民党军队中和委员会中的叛乱分子, 而且还要改组国民党的原左派省党部以及隶属于它的省农民协会。目的是使反革命合法化。我们应当利用喘息时机恢复工农运动的合法性, 把隶属于国民党省党部的省农民协会保留在我们手里。喘息机会给我

---

① 莫斯科。  
② M. H. 罗易。  
③ 张翼鹏。

们提供组织和领导农民起义的时间。湖南和湖北现有的军队不足以镇压准备充分、组织良好、领导有方的起义。我建议采取以下措施：（1）立即派 200 名有军事工作经验的共产党员去领导农民起义。（2）保证武装农民。武器可以向民团购买，甚至可以收买一些军队。（3）立即扩充在我们控制下的部队的人数。（4）谭平山委员会应去湖南组织农民自治，组建农民警卫队，加强土地改革的若干具体措施，而不是调查“过火行为”。〔中共〕五大决议已经说明，不没收中小地主以及国民革命军军官的土地<sup>①</sup>，防止发生侵犯中产阶级和军官家属的行为。在目前机会主义的半国民党的共产党领导下，要采取迅速而坚决的行动是很困难的。据刚刚获得的消息说，6月1日，接近长沙的农民，起先打败了反革命军队，但从长沙派出的两个团的增援部队后来又把他们击退了，有 200 多名农民被打死。如果有足够的财政援助，就可以由湖南农民起义参加者组成新的革命军。一旦湖南军队北上，然后进攻南京，就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对抗湖南、湖北和晚些时候江西的土地革命了。应当在短期内收复广东，以便使它成为华南和华中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22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sup>①</sup> 中共五大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说的是小地主和革命军官（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3 卷第 70 页）。



## 223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第108号(特字第86号)记录 (摘录)

1927年6月7日于汉口

### 1927年6月3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 ——采纳斯大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同志的建议，给汉口鲍罗廷、罗易和中共中央发去以下电报：

“1. 我们认为谭平山在成立农民部<sup>①</sup>时的讲话是完全错误的。他本应明确宣布，农民部的基本口号应当是土地革命和没收土地。而谭平山却胡说是些改善农民状况的自由主义空话。如果他和中央委员会不立即纠正这个错误，我们就在报刊上公开进行批判。鲍罗廷对谭平山长沙之行的解释不能成立<sup>②</sup>。我们认为，任何阻止土地革命的行为都是犯罪。应当立即切实领导土地革命，而不得利用考察加以阻止。

2. 关于军事计划我们建议：让唐生智和冯<sup>③</sup>向北京和济南府

---

① 指谭平山在1927年5月27日就任农民部长的隆重仪式上的讲话。见《汉口成立农民部》一文，载1927年6月1日《真理报》。

② 电报没有找到。

③ 冯玉祥。

推进，切断蒋介石的去路，进而在山东和北京站稳脚跟。要以伤亡减员为借口将张发奎的部分部队，如若可能，则将其所有部队作为比较可靠的部队调作武汉的后备队，赶紧补充工人和农民，或把它们作为主要支柱留在武汉，或令其向南京蒋介石的后方推进，或利用它们去解放广州，然后从南面向福建推进。

3. 应当立即消灭长沙的反革命。招募农民，鼓动他们去进攻军官团，彻底将其摧毁，以儆效尤。若是你们在这些事情上表现出软弱或迟缓，你们那里就会到处出现反革命策源地。

4. 我们没有得到关于收到最近的电报的确认。这是不能容忍的。我们要求报告为贯彻执行指示所采取的措施。请立即报告是否收到了本电报和采取了哪些措施。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

加拉罕、伏罗希洛夫、布哈林同志。

### 1927年6月6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 ——给汉口鲍罗廷和陈独秀发去以下电报：

“为答复陈独秀的电报<sup>①</sup>，再次重申阻止进行土地革命是犯罪行为，并会导致革命的毁灭。关于军事事务，我们重申我们的上一份电报。你们应当在电报的范围内自行选择，你们看得更清楚。我们坚决要求你们在军事问题上务必要报告加伦<sup>②</sup>签署的意见。我们将从已经拨出的基金中汇出经费，关于另一笔借款的问题还在商讨阶段。最高领导机构。”

<sup>①</sup> 电报没有找到。

<sup>②</sup> B. K. 布留赫尔。

抄送：

加拉罕、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33—35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24

##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8 日于汉口

莫<sup>①</sup>，最高领导机构：

昨天共产党〔中央〕政治局讨论了你们的电报指示<sup>②</sup>。下面是重要发言摘要：

陈<sup>③</sup>：电报表明，莫斯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自成立〔农民〕部<sup>④</sup>以来，局势非常严重。多数国民党领导人摇摆不定，他们不想听有关土地革命的任何意见。最好是非常巧妙地、小心谨慎地谈及这个问题。谭平山不应对他们谈土地革命问题。在去湖南的问题上我与罗易有分歧。去是必要的。农民运动引起的过火行为〔破坏了〕同地主、绅士和军官的统一战线，过火行为妨碍

① 莫斯科。

② 见第 223 号文件。

③ 陈独秀。

④ 农民部于 1927 年 5 月 20 日正式成立。

了土地问题的解决。我们主张派谭平山去纠正过火行为。应当先纠正过火行为，然后采取解决土地问题的进攻性措施。本应让谭平山委员会立即出发，但为时已晚。长沙的政变不只是反对土地革命，而且也是由过火行为引起的。共产国际可能不知道，没有过火行为，反动派的统一战线不会这么容易形成。在这种情况下，我们不能谈及土地问题。

共产国际建议由工农领导人来加强国民党的领导。国民党的领导是在党的代表大会上选举产生的。现在我们怎么能改变它呢？对提议改变国民党领导的想法还有一种反对意见。如果像莫斯科希望的那样撤换老领导人，那么国民党就会变成工农党。由工农组成新的军队当然很好，但存在一些困难。现在我们应当进行谈判，同军阀进行接触。我们不能同这些将领断绝往来，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可能建立自己的〔武装〕力量。

组建革命法庭实际上是不可行的。我们衷心赞同指示，但问题是我们党未必能够贯彻执行。

谭平山：我在出任〔农民部长〕时的讲话是这样开始的：“本部没有自己的政策，它服从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共产国际的批评是可以预料的，因为我在讲话中没有涉及土地革命问题。共产国际担心我们有改良主义倾向。它不必担心。我举一些证明我愿意接受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的事实。在去武汉的途中，我建议国民党湖南省党部和湖南省政府接受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我在国共联合土地委员会中主张解决土地问题<sup>①</sup>。如果我们在局势恶化的情况下还主张解决土地问题，那就更糟糕了。

我们不应过高估计莫斯科的电报。它们是想让我们振作精神。

<sup>①</sup> 委员会于1927年4月2日至5月6日召开会议，详细工作情况见E. 约尔克和O. 塔尔哈诺夫：《国民党的土地问题》、《关于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的工作（1927年4月）》，载《中国问题资料》，莫斯科1927年第7期第109—123页。刘继增、毛磊、袁继成合著的《武汉国民政府史》，武汉1986年版第458—469页。

如果我们像共产国际建议的那样有力量，那我就会更加理直气壮地发表意见了。

解决土地问题，这是一项重大任务，完成这一任务需要做充分准备，仅有响亮的口号是不行的。去湖南是危险的，会把我痛斥为反革命分子。党命令我去纠正过火行为。若是委员会和一个团早些前往并能纠正过火行为，那么长沙政变就不会发生。委员会也就能组织起地方自治机关了。

当我们出发时，委员会的任务有些不一样了：国民党认为，湖南事件是由共产党人的行动引起的。国民党人坚持认为共产党人应该解决这个问题。我的拒绝会被认为是共产党人不负责任地制造了混乱。

第二个委员会是令人不快的和危险的。第一个是必要的，也可能是很有益处的。建议向国民党输送新的领导人是对的。现在的国民党中央执委会没有进行革命的胆量。改组国民党是必要的。

建立武装力量非常重要。湖南有30万起义农民，困难在于如何获得武器。

收复广东很有必要。那里有30万支步枪，有同国外联系的港口，有财政资源。革命不应局限在武汉进行，必须在广东、江西、湖南、湖北采取行动。

在决定如何答复莫斯科的问题时，我提议公布农民部的纲领和〔中共〕中央关于共产党人参加政府工作的原因的声明。

陈认为谭的发言和去湖南考察是正确的，并建议在收到莫斯科对中共电报的答复前不采取任何措施。

请将共产党领导人的态度同以邓演达为首的军队政治部的以下宣言作个比较：“在革命斗争中，工农采取行动有点过早和不够谨慎，这是可以原谅的，因为工农群众在参加革命斗争以前不可能受到训练。”

你们的指示有点晚了。因为社会民主主义的领导几乎已经把

革命断送。支持和反对我们的可能性各占一半。若彻底揭露旧的政策，实行坚强的领导，则还可以挽回局面。有必要采取果断的组织措施。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23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225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0 号（特字第 88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6 月 9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6 月 2 日会议第 107 号记录，决定：7），（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1. ——（1）关于同张作霖和日本谈判的问题，回复鲍罗廷同志：半年前同张作霖开始进行的谈判将继续下去；电话协议问题将告结束。政治试探表明，在中国存在三个政府（北京、南京、武汉）的情况下，日本不愿对武汉作出具体担保来束缚自己。同日本人的认真对话只有在占领北京之后总的局势明朗时才能开始。

（2）征询乌斯曼诺夫同志的意见，关于冯玉祥与蒋介石直接联系和冯向蒋发贺电的消息是否属实？若确有此事，那么冯对中国革命叛徒的这种态度可能是由什么原因引起的，对这个叛徒应

该进行无情的斗争。

(3) 建议鲍罗廷、罗易同志和中共中央无条件地坚持执行我们关于立即平息长沙反革命叛乱和取缔反革命政府的指示。指出武汉政府的犹豫不决导致了长沙农民起义的失败，这种犹豫对于武汉政府本身是极为有害的，因为它破坏了政府的必要基础——土地运动。要求立即采取措施，并报告为执行最高领导机构的指示做了什么工作。

(4) 认为俄联邦红十字会向武汉革命军受伤战士提供援助是必要的。还认为最好由工会通过俄联邦红十字会和中国红十字会向伤员提供援助。汇款的数额和方法，由中国委员会同俄联邦红十字会商定。让鲍罗廷同志了解商谈结果。

(5) 认为有必要让沃林同志以塔斯社代表身分留在广州。

(6) 为了尽快执行政治局关于在武汉出版中共中央机关日报的决定，从共产国际经费中为中共中央拨出 2.2 万卢布，用于头 3 个月的报纸出版工作。

(7) 认为有必要组建中央党校，为此拨出必要的经费。要求汉口赶紧提出预算意见和组建计划（学员人数、学习期限、主要的开支项目）。

(8) 给米夫同志下达指示，让他在自己的整个活动中都要注意到：他的全部组织工作都应在中共党内进行，在这方面要完全服从中共的中央机构。

(9) 电告中共中央，关于上海工会运动情况的通报令人很担心，特别是 7 万名工人转向黄色工会的事实。征询中共中央的意见，为同这类现象作斗争将采取什么措施？因为存在帝国主义者助长黄色工会发展的实际危险，这是否也是组建秘密工会工作遭受挫折的结果？

(10) 从中国委员会的经费中每月为中共中央拨出 1200 墨西哥元，用于在驻华外国军队中开展革命宣传工作。

(11) 基本上采纳布哈林同志关于组建共产国际中国局的建议<sup>①</sup>。责成布哈林、伏罗希洛夫和莫洛托夫同志与所有被指定进中国局的同志商议一下，确定该局最后的组成人员。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除（11）以外的其余各条；

布哈林同志——（11）；

莫洛托夫同志——（11）；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6）、（7）、（8）、（9）；

多列茨基同志——（5）；

梅利尼昌斯基同志——（4）。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36—38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sup>①</sup> 建议没有找到。



226

## 罗易给鲍罗廷的信

1927年6月15日于汉口

### 致鲍罗廷同志

抄送陈独秀同志

亲爱的同志：

我知道，正在进行谈判，以共同纲领为基础调整共产党与国民党之间的关系。

送上我应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请求起草的纲领文本<sup>①</sup>。

我认为，在这个纲领正式交给国民党之前，我们（即鲍罗廷、陈独秀和我）应就我们准备对国民党采取的方针达成一致意见。我还认为，应当邀请共产国际代表参加讨论这个问题的所有私下谈话或正式会议。

我建议我们三人今天晚上8点在您那里进行预备性交谈。

请将此建议通知陈独秀同志。

全宗514，目录1，卷宗240，第34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

<sup>①</sup> 见 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第201—203页。

227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 111 号（特字第 89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6 月 16 日于莫斯科

听取：2.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2. —— [1] 准许从库伦的专用储备中拨给冯玉祥：

- (1) 步枪 3000 枝，
- (2) 步枪子弹 50 万发，
- (3) 3 英寸炮弹 5000 发，
- (4) 炮 4 门。

[2] 责成中国委员会在发送武器时遵守特别防护和保密措施。

[3] 满足加伦<sup>①</sup> 同志的申请（3 台发电机和“利贝尔蒂”发电机箱）。

[4] 将中山大学一年级 32 名国民党右派随同毕业班 36 名国民党右派一起遣送回国。

这些学生经海参崴——上海遣送。

将遣返国民党右派一事通知鲍罗廷同志和汪精卫。

[5] 建议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接受 79 名毕业于中山大学

---

<sup>①</sup> B. K. 布留赫尔。

的学生到夏令营和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的学生一样进行军事训练。

[6] 责成由布哈林、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同志组成的委员会根据最近来自中国的密电于今年6月17日前向政治局提出指示草案,政治领导问题推迟到该委员会制订出总的指示之后讨论。

[7] 采纳伏罗希洛夫同志的建议,根据以前作出的决定,从确定的款额中分不同批次逐渐给武汉政府汇去100万卢布,并检查这些钱是否按指定用途使用。

[8] 警告加拉罕同志没有执行政治局今年5月5日关于利用有关中国的密电为每日报纸提供消息的决定(政治局会议第100号记录,决定:15—(3))。

责成中国委员会今后监督此事。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舒米亚茨基同志——[4]、[5];

布留汉诺夫同志——[7];

斯蓬德同志——[7];

布哈林同志——[6];

莫洛托夫同志——[6];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4]、[6]。

## 1927年6月14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2.——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2.——(1)批准由罗易、鲍罗廷和加伦同志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将这个问题再提交共产国际批准。

(2) 责成布哈林和莫洛托夫同志以斯大林同志的名义答复汪精卫<sup>①</sup>。

(3) 认为有必要召陈独秀到莫斯科来商议。

(4) 办理科兹洛夫斯基同志在上海的任职手续。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1)、(2)、(3)；

布哈林同志——(2)；

莫洛托夫同志——(2)。

### 1927年6月15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9.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9. ——作为对政治局1927年6月14日关于召陈独秀到莫斯科来的决定的补充，如果可以避开警察监视，建议陈独秀动身。

抄送：

加拉罕、伏罗希洛夫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17，目录162，卷宗5，第39、41、42、51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sup>①</sup> 文件没有找到。

228

##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年6月16日于汉口

琼森<sup>①</sup>致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共产党答复你们的电报指示的几点意见<sup>②</sup>。

尽管有陈和谭<sup>③</sup>的发言（我已电告<sup>④</sup>），在第二天的会议上，政治局还是采纳了我关于执行你们指示的建议。答复与上次决议相矛盾，表明只是表面上接受<sup>⑤</sup>。共产党答复中的一些说法是不对的。

第一，国民党土地委员会只是原则上作出了没收〔土地〕的决定，但把没收的具体实施时间作了无限期的推迟。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从来没有批准没收，并把解决整个问题的时间作了无限期的推迟。

第二，湖南的将领们多数不是中小地主，而是大地主。

第三，关于过火行为的说法基本上是虚假的，是为宣传目的伪造出来的。

第四，国民党在夏斗寅政变前就反对土地改革。

① M. H. 罗易。

② 见第227号文件。

③ 分别是陈独秀和谭平山。

④ 见第224号文件。

⑤ 指陈独秀在1927年6月15日给共产国际的电报（见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第198—199页）。

第五，湖南多数农民协会不是由流氓组成，而是由佃农和贫农组成的。当然，无地农民更为革命。

第六，平分土地的要求不具有普遍性，而只是一些例外。

昨天，在共产党政治局会议上，鲍<sup>①</sup>和另一些人不同意没收大地主〔土地〕的要求。

国民党提出下列要求作为〔同中共〕合作的基础：

1. 共产党放弃扮演劳动群众政治领导者的角色。
2. 共产党帮助确立对革命群众运动的监督。
3. 不进行土地改革。
4. 同大资产阶级妥协。

鲍认为，若是共产党不对这些要求作出让步，同国民党的决裂就不可避免。

尽管有你们不止一次的指示和我努力根据你们的方针领导党，党还是在奉行这种取消主义方针。

共产党人部长的政策不受党的控制，谭平山的错误仍未得到纠正，照旧在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27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

<sup>①</sup> M. M. 鲍罗廷。

229

## 罗易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

1927年6月17日于汉口

### 琼森<sup>①</sup>致莫斯科斯和布<sup>②</sup>

这个月我通过鲍<sup>③</sup>的机构发出五份有关政治形势和党内状况的电报<sup>④</sup>，6月5日我通过该渠道发出关于组织问题的建议的电报<sup>⑤</sup>。这些电报都没有得到答复。

局势在恶化。鲍不同意你们的指示，并且公然对抗这些指示。他的态度和行为使我无法根据正确的方针领导党。

党在走向投降而不是在进行革命斗争。它拒绝组织任何反对湖南反革命的群众行动。关于举行一日总抗议罢工的决议显然迫于鲍的压力作了改变。决议通过后，柳克斯<sup>⑥</sup>就公开鼓动人反对。

结果取代罢工举行了欢迎凯旋将领们的游行<sup>⑦</sup>。

政治局暗中破坏扩大湖南农民起义范围以消灭反革命的尝试。5月31日，11支约2.5万人的农民起义队伍从四面八方长长沙进发，但共产党省委根据中央委员会的指示下令停止前进。两

---

① M. H. 罗易。  
② 斯大林和布哈林。  
③ M. M. 鲍罗廷。  
④ 见第220、221、222、224、228号文件。  
⑤ 见第221号文件。  
⑥ O. Ю. 普利切。  
⑦ 1927年6月16日举行的游行。

支 5000 人的队伍没有接到命令，它们袭击了长沙附近的军队。随后就发生了 6 月 1 日事件<sup>①</sup>。

整个这一政策是由于害怕引起国民党领导人的强烈不满决定的。[中共]的政策过去和现在都是旨在帮助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和平调解湖南的局势。共产党领导人同意改组农民协会左派省委和国民党左派省党部，以中止农民的进攻性行动来换取干掉长沙政变的主谋。

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sup>②</sup>内有一伙人积极参与反革命活动。汪精卫在这伙人的影响下进行的斗争更多的是反对共产党人，而不是反对反革命分子。

鲍认为，汪在我给他看了莫斯科劝国民党人充当革命雅各宾党人的电报之后叛变了。在这份电报中没有什么不可以向国民党左派说的话，如果我们需要给他们指出来自右面的危险和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的话。电报没有造成任何损害。多数国民党领导人在汪看到电报以前早就决定采取反革命行动了。先前的夏斗寅叛乱和长沙政变都得到了国民党和国民政府的暗中支持。

然而鲍却从电报<sup>③</sup>中捞取了巨大的政治资本，以便在共产党面前败坏我的名誉。

现在还在违背你们的指示进行两党共同纲领的谈判。我根据政治局的请求起草了国民革命纲领草案<sup>④</sup>。鲍在共产党政治局中表示反对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昨天政治局一致反对共青团代表<sup>⑤</sup>，拒绝我关于没收土地的建议，并表示赞成联合委员会关于根据国民党没收土地的决议解决问题的建议。

① 指朱培德在南昌发动的政变。

② 见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

③ 原文如此。

④ 见 M. 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第 201—203 页。

⑤ 任弼时。



由于鲍的反对，我没有参加讨论并决定重大政治问题的两党联席会议。昨天，我向政治局提出我参加会议的问题，陈<sup>①</sup>说，他认为这是必要的，但鲍表示反对，因此政治局未能作出决定，需要征询莫斯科的意见。

我处于十分困难的境地：

1. 我不相信我的电报已经发出。
2. 莫斯科的电报，除了我坚决要求给我一些摘录外，都没有给我看。
3. 我没有钱，甚至党的预算也在上海，我控制不了。
4. 鲍罗廷借助他所控制的机关使我脱离了总的政治形势。

所有俄国的负责同志都认为局势危险，并反对鲍的政策。情况不正常。一个人无视最高领导机构的指示，而所有其他负责同志都不能监督他。

邓演达是唯一的左派。在他的周围可以组成一个具有改组军队、改变国民党领导纲领的反对派。但是如果允许鲍无视莫斯科的指示，就无法组成这样的反对派。昨天我同邓演达谈过话，他同意在今天的联席会议上维护我们的行动纲领。会前，鲍劝他，没有同他商量就不要〔在会上〕发表意见。

若是情况不改变，灾难就不可避免。退却意味着彻底失败。只有采取坚决行动，消灭湖南、湖北的反革命，收复广东，才能挽救局面，那时大部分军队可向南京进发。今后两三个月将是决定性的时期。这个时期我们应当建立起自己的武装力量，改组国民党的领导，改变共产党的方针。

但在目前形势下，我什么也不能做。现在的危机是鲍罗廷过去实行的政策造成的。挽救中国革命的责任现在落在莫斯科的肩上。鲍应当服从党的命令。应当把陈独秀清除出共产党领导机构。

---

① 陈独秀。

这里必须创造条件使你们的指示得到有力贯彻。共产党领导应当服从〔共产〕国际。

如果不立即采取这些措施，那我希望解除我在这里的工作。请通过这个渠道立即给我答复。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28—30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230

##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22 日于汉口

### 琼森<sup>①</sup> 致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

柳克斯<sup>②</sup> 蓄意夸大<sup>③</sup>。他知道，我只不过是给汪<sup>④</sup> 看了仅仅一份编号电报<sup>⑤</sup>。其中没有什么要向左派领导人保密的，我们应当赢得他们的信任，并应明确地给他们指出革命的道路。〔我们〕讨论了改组国民党和军队的问题。汪抱怨莫斯科无视〔他的〕意见。不能借助过去和现在的外交手腕把左派领导人推上革命道路，必须明确地给他们提出革命任务，应当坦诚地鼓励和支持他们。否

① M. H. 罗易。

② O. Ю. 普利切。

③ 电报没有找到。

④ 汪精卫。

⑤ 指第 219 号文件。第 161、162、163 号电报见第 233 号文件。

则，他们就会受到反动派的影响。究竟谁真正代表莫斯科的意见，过去不清楚，现在仍然不清楚。应当消除这种不清楚的状态。这就是我的论据。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1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 231

#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执行 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

1927 年 6 月 22 日于莫斯科

## 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 主席团会议上的报告<sup>①</sup>

同志们：近来在这里谈论中国问题可能已经够多的了。中国总的形势和政治形势是清楚的，因此我先简要地说明一下目前的政治形势，然后再谈中国的土地运动、工人运动以及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我认为，我的一个小时的报告只能谈这四个问题。

现在中国革命是在很独特的条件下发展的，这种条件的最主要的特征之一是，这个国家至少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心，各自拥有独立的军队和不同的国家制度。我们这里所熟悉的一个中心

---

<sup>①</sup> 文件上标有“校阅，1927 年 7 月 2 日，维经斯基”的字样。

——武汉政府现在只管辖两个省。现在处在武汉政府影响之下的省份还有河南和陕西，但只是处于影响之下，而不是这个政府的直接辖区。如果武汉中心可以认为是正在走上工农和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专政道路的国民党政权中心，那么现在蒋介石直接占领的地区，即拥有最主要的工业和工人中心——上海的江苏和浙江两省，以及江西省的一部分地区，则应认为是武装起来的中国资产阶级的国家政权。而黄河以北的地区和南起山东省的东北地区仍然由军阀势力占领，这些势力代表封建主和地主政权，是军阀手中的直接工具。

因此我们看到，在中国辽阔广袤的疆域内，革命中心武汉只占据一个较小的地区。但是，除了中国有三个独立的国家中心之外，中国革命条件的特殊性还因为每个中心内部都存在并且仍在进行的派别斗争而更加突出了。到处都在进行阶级斗争。

原广州政府地区现在由李济深将军控制，此人同蒋介石结成了政治联盟，但同时又在同他进行派别斗争。李济深同蒋介石结成了反对武汉中心、反对工农运动的政治联盟，同时又在同蒋介石进行派别斗争。

在武汉中心内部还有倾向蒋介石的一些军事集团，在国民政府内部也有一些倾向国民党右派的分子。

无需谈论北方军阀。不言而喻，这个中心是敌视工农运动的，是中国反动派和反革命的主要中心。

中国革命在这些不同的地区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当然，不能从地理上限定革命运动地区，但必须强调指出，从国家中心角度，从由上面促进革命运动或同它们进行公开斗争的角度来看，需要做这种限定。

在武汉政府和原广州政府<sup>①</sup>地区内，革命运动最突出的特点

<sup>①</sup> 原文如此。

是，这里的运动已转变为土地革命。但在中国北方即黄河另一侧的地区，还不能这样说。如果我们把中国革命，把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主要基本特征说成是现在正在转变为土地革命的革命，那就应该注意到，这种评价现在可能只适用于华中和华南地区，还不适用于北方和东南地区。

北方工农群众的斗争只是在奉天人被打败后才广泛开展起来。而在蒋介石的拥有中心城市上海的江苏、浙江两省地区，工人运动则很高涨。这里是中国工人运动的主要中心，这里的工人运动直接处在国家政权即武装的中国资产阶级的统治之下，这个阶级在同国民党右派决裂之后组建了自己的国家行政中心。

这些省份的农民运动还不很发展，不仅远未达到工人运动的水平，而且也赶不上其他地区的农民运动。除了其他原因之外，这是因为在蒋介石到来之前和到来时，这些省的农民运动还处在中国最残暴的军阀——张作霖、张宗昌和孙传芳的直接统治之下。

从去年上海著名的5月30日事件到这一年秋天，这里由一伙军阀取代了另一伙军阀。农民运动不能像北伐时期和北伐之后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农民运动那样展开。

我先来谈一谈武汉政府管辖地区的农民运动。在武汉政府地区，现在革命正经历着最困难的阶段。当农民运动转为土地革命时，这个运动还没有由实行革命民主专政的政府来领导，还没有自己的革命军队。这正是农民运动转为土地革命阶段最主要的特征和最主要的困难。武汉地区的土地运动近七八个月得到了蓬勃发展。一些统计数据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农民运动的规模。如果说去年秋天政府从广州迁至武汉之前湖南省有组织的农民达200万，那么现在已经有600到700万。这是近六七个月的事。我认为，这些数字足以说明近六七个月来农民运动发展的速度和规模。

现在谈谈农民运动的内容。六七个月前农民协会的基本要求是：减租减息，丈量土地，使佃农和小土地所有者准确知道土地

归属。基本要求之一是改变租赁合同，也就是简化合同，使农民相信，他们能在他们租种并支付50%到70%总收入的土地上留下来，任何时候地主绅士都不会把他们从这块土地上赶走。如果说取消向地主行小恩小惠，取消礼物和劳役（即农村中受压迫农民的典型封建关系），同过重的税捐作斗争、驱逐绅士等也是要求之一，那么最近，即最近几个月来，我们可以看到另一种景象，看到农民协会的另一一些要求。近几个月来，农民运动最流行的口号是没收地主土地；大约从3、4月起，中国共产党开始说，在农村农民确实提出了没收地主土地的问题（沙茨金从座位上插话：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是没收所有地主的土地。其次是建立村农民政权。农民们不是说以消极的方式，即以同豪绅和地主作斗争并把他们赶出农村的方式建立国家政权。农民们说，需要建立农民政权。农民协会提出了解除绅士队伍武装的要求。农民们开始用自己的农民语言谈论为建立政权而斗争的策略。他们说，应该解除豪绅和地主队伍的武装，把武器交给农民协会和农民自治机构。此外，农民协会开始要求不只是建立村政权，而且要让农民参加县里的行政管理工作、参与监督财政、确定捐税等。

其实，这就是近来农民协会提出的基本要求。最近，即在5月份，在湖南湖北两省的一些地区，农民协会开始提出重新分配土地的要求。这是完全新的要求。问题已经不是让佃农得到从地主那里没收的土地的长期使用权，而且农村最低阶层——贫农（他们不是佃农，而是少地或无地的农民）开始说：“剥夺地主土地——很好，没收土地——好得很。但过去好吃懒做的那些人还在，我们这些少地无地的人能得到什么好处呢？让我们没收土地，然后让农民委员会根据孙中山所说的耕者有其田的原则进行分配。”农民们的这种要求不是普遍现象，但也不是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出现的一种倾向。

在农村，随着这种要求的增强，斗争自然也在不断深入并变

得越来越激烈。湖北省农民协会的一位领导人<sup>①</sup>5月21日在同我交谈时，根据他所了解的材料介绍了湖北发生的情况。我记录了他的话，有些话已通过塔斯社向这里作了报道。现在我给你们读一读这位同志说的话：

“农村反对土豪劣绅的斗争具有越来越明显的政治性质。常常发生私自审判、处决豪绅的事件。在阳新县处死了45名绅士，部分是农民自己处死的，部分是交给县当局，在农民的压力下由县当局处死的。最近省农民协会处理了165名因从事各种反农民的活动而被农民逮捕的绅士。在该省中部和东部的一些县，村政权实际上掌握在农民协会手里。”

这是一些地方的情况。当然，不能把它当作全省的普遍现象。

“此外，许多县（阳新、黄冈、黄梅等县）[顺便应当对你们说说，农业省都有很多县；湖北省除城市居民外还有2900万农民，有60到70个县（确切数字我不知道），而且没有明确的界线]<sup>②</sup>，县政权处在县农民协会的实际控制之下，而县农协形式上是通过县内社会团体联合委员会进行控制的”，也就是通过城镇广大民主阶层与农民一起进行控制的，城镇民主阶层与农民向县政权施加压力（县政权不是选举产生的，受军事领导人的左右），在群众的压力下，也由于农民运动与城市运动联合在一起，军事当局不得不按农民的要求行事。

“过去由县司法机关审理的所有诉讼案件现在几乎都在农村就地解决，县司法当局抱怨无事可做。”这就是说，农民协会、地方政权不相信县政权，县政权虽然处于国民党领导之下，但同时又从属于军队司令部，而军队司令部并不总是去帮助农民，有时还妨碍、阻止和镇压农民。

“农村的剥削阶级——地主和豪绅大批迁居城市。他们当中最

<sup>①</sup> 陆沉。  
<sup>②</sup> 原文如此。

反动者的财产（包括土地）被农民没收。仅阳新县就没收这种财产达 100 万元。湖北全省所没收的财产（包括土地）的价值，据省农民协会计算达 2000 万元。

“近来农民代表会议常常提出没收大地主土地的口号。例如在罗田和黄冈两县可以看到这样的情况：地主自己自愿去农民协会，建议农会收走他们的土地。这一方面是因为地主害怕农民，一旦用暴力没收，农民可能不仅夺走土地，而且拿走所有财产。另一方面，地主们希望，如果他们自己去农民协会，以后分配没收的土地时，也会分给他们一定的份额。”

当然，对于湖北省农民协会这位领导人所说的这些情况，我们共产党员同志应当批判地对待，因为他从当地农民工作人员、从我们的同志那里获得的消息并不总是经过核实的，并不总是真正反映实际情况的，但毫无疑问，这些情况反映了湖北省，即国民革命政府中心地区农民运动发展的性质、速度和规模。

同志们，当我们谈论近几个月来湖北湖南两省农民运动的规模时，当然不能认为，只是这几个月运动才取得了这样的进展。这多半是说，中国共产党和我们在那里的领导以前对农民运动中发生的事情了解不够，可能对农民运动的性质和发展速度估计不够。在中共五大前，我们就从许多县得到过这类消息，我们将这类要求加以归纳，写进了决议。中共五大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的决议正是站在这一运动的水平上，提出了没收大、中地主土地，而不没收小地主土地的要求，因为关于小地主的问题现在乃是同武汉政府中心、同国民党左派的相互关系问题，应当认为，这种策略——暂时建议没收大、中地主土地——只是共产党在同国民党上层保持非常复杂关系情况下的一种策略手段，随着农民运动的深入发展，国民党上层的摇摆将会越来越大，只有在群众的压力下它才能够批准，我要强调指出，只是批准群众在我们的领导下（有时并没有我们的领导）最终所要做的事情。毫无疑问，无论现



在还是将来运动当然都不会停留在只没收大、中地主土地的水平上。已经向国民政府说得够多的了：没收是可以的，政府不要采取措施反对这种做法，当然，要使这种做法以坚决没收所有土地的形式表现出来，并且要发展到在农村重新分配土地的地步。

在这里我想指出中国共产党在领导和开展乡村农民斗争方面所犯的一些错误。这些错误产生于两个原因：一个原因，我已顺便提到了，是来源于中共，更确切地说是中共中央同国民党中央和现政府的国民党上层的相互关系。在中共中央同国民党的相互关系中，最主要的问题是，不能完全掌握国民党中央，让它接受我们的土地纲领，无论如何都不能通过谈判，通过同他们确定某种框架、某种纲领来强迫国民党中央站到这种立场上来。但是，既然存在武汉国民政府，存在仍然是国家中心的国民党左派，这种情况就要求共产党在自己的策略中考虑到，这种策略是否会导致我们不得不同这个国民政府、同这个国民党左派中央断绝关系，或者有可能调过头来，迫使这个中央批准一些行动，而这些行动对农民运动来说有时是中立性的，有时是个推动，但是不提出跟我们走还是不跟我们走这种在它（国民党中央）听起来像是共产党的最后通牒式的极端要求。大家都清楚，国家中心并没有阻止农民运动，有时它还通过发表左的宣言促进左派运动的发展，它在农民革命时期起过非常重要的作用，更何况，正如我在开始时所说的，农民运动有了蓬勃的发展，它很年轻，没有自己的军队，而这个国家中心却在某种程度上拥有军队，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共产党在策略的运用上往往在某个地方做得过火。共产党五大谈了这个问题，明确地强调指出了在哪里和为何不能这样做。

第二个原因是运动开展的速度毕竟太快。不应忘记，六七个月以前，共产党同国民党一起组成了反对北方军阀的国民革命联盟，同北方军阀进行了斗争，当时农村非常有力地帮助了南方军

队向北的推进。但这意味着农村帮助南方军队向北推进吗？这意味着农村组成了统一战线。在农村，是谁拥有可以用来反对北方军阀的武装力量？是地主拥有，是豪绅拥有。他们由于同别的省的派别斗争，由于同本省的传统联系而站到了南方军队一边。这极有助于战胜北方人。在农村形成了统一战线。在这个统一战线时期，农村内部的斗争必然要缓和下来，以便使这种斗争的火焰在来日燃烧得更猛烈，范围更大。共产党毕竟是唯一能够领导农民运动的党（如果说领导的话），只有共产党人呆在农民协会中并在领导农民协会。在这种非常复杂的形势下，共产党往往来不及随机应变，他们把统一战线时间拖得比需要的更长，没有跟上不断发展的运动。确实，我们有这种典型情况。

就拿共产党湖南省委来说吧。有一份文件表明，几个月以前，湖南省委就曾对自己的地方工作人员说过，不要给农民协会提出过激的口号，不要过分加剧斗争，因为这对统一战线可能是危险的，对今后的斗争也可能是危险的<sup>①</sup>。但在今年4月，我们看到湖南省委给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的报告中有下面这段话：

“现在土地问题是主要问题。解决这个问题是革命的唯一出路，可以保证彻底战胜反动派、保证民主革命取得成功。若不解决土地问题，农民问题就无法解决。武装农民对于解决土地问题有着重要作用。必须通过解除民团武装，或者要求政府发放武器，把成千上万农民武装起来。目前，党应当把自己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支持国民党左派上，以期解决土地问题。党的一切力量都应为此目的而动员起来。应当从完成这一任务的角度来制订我们的计划。”

接着，湖南省委在谈到计划时再次说：

“必须在乡村建立农民政权，让农民参加县政府。必须在解除

---

<sup>①</sup> 可能是指中共湖南省委1927年1月16日的通告。详见李维汉：《回忆与研究》，北京1986年版，上册第98—99页。

地主和绅士武装的同时把农民武装起来。必须开展一场使工农参加国民革命军的运动，加强士兵中的政治工作并吸引他们入党。”对于政府，湖南省委建议：“鼓励地方政府机构同卖身投靠的官吏进行积极的斗争，而且应当赋予群众监督财政和同敲诈勒索行为作斗争的权利。各个地区的群众应当督促国民党和政府执行国民党中央三月全会<sup>①</sup>的决议。如果政府拖延执行这些决议，那么群众自己将执行。”对于国民党，湖南省委声称：“工人和农民应当加入国民党，以便使国民党真正成为群众性的政党。”

（沙茨金从座位上插话：关于没收土地有没有说什么？）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们谈到重新分配土地等等。这在代表大会上已经规定好了。

“共产党人应当认真投身于国民党的工作，而在国民党工作犯了错误的地方，则应从根本上纠正这些错误，应当确立左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对整个国民党的共同领导，应当加强我们对国民党左派的领导，以便执行所通过的关于农民问题的决议，以便这种领导能引导国民党左派彻底实行土地改革。”你们可以看出，这是4月初的报告，是共产党湖南省委送给中共五大的报告。我想说，整个中共特别是在开展土地革命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出自两个基本原因。

主要原因是，中央委员会由于自己同国民党左派上层的关系（这种关系曾促进了土地革命的开展），又由于同这个上层的周旋，对地方省委起了阻碍作用，而地方省委自己也由于同北方军阀作斗争需要保持统一战线而没有跟上发展速度，依然执行原来的方针。

中共五大讨论了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地提出了必须纠正原先的错误的问题。中央通过了决议，其要点如下：没收大、中地主

<sup>①</sup> 指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土地，武装农民，建立农民政权，即在农民协会领导下的农民自治政权。在实践中，这就会演变成，农会委员会将是地方政权。决议还规定，剥夺地主和绅士的政治权利，他们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sup>①</sup>。

中共五大决议第一条关于没收土地问题讲了以下内容：

“没收一切所谓公有的田地以及祠堂、学校、寺庙、外国教堂的土地”（这直接遇到农村帝国主义者的阻挠），“以及农业公司的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此等没收的土地之管理，应付诸土地委员会”（这里没有讲土地委员会的组成，但它是由农民协会代表、自治政权代表和农民部或其地方机构的代表组成，而且正如大家所知道的，农民、内务部处于共产党人领导下），“此等土地的管理形式，是否采用公有制度或分配于耕种者的农民，皆由土地委员会决定之”<sup>②</sup>。

第二条：“无代价的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经土地委员会，将此等土地交诸耕种的农民。属于小地主的土地不没收。革命军人现时已有的土地可不没收。革命军兵士中没有土地者，于革命战役完终后，可领得土地耕种。”<sup>③</sup>

其他一些较小的条款整个说来都是主张通过分配土地和实行土地国有化来完成土地革命。

请允许我谈一谈国民党左派对土地运动的态度，以及由于土地运动而对苏联、对共产党人和对工人运动的态度是如何摇摆不定的。

今年3月举行的国民党三中全会是在同蒋介石作斗争、内部出现分裂、右派脱离国民党的情况下进行的。由于工农运动的发展、反帝斗争的加强，这次全会是国民党以往最左的全会之一。这个时期发生了有名的汉口事件，汉口群众闯入外国租界，使国民

<sup>①</sup>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60—71页。

<sup>②③</sup> 见《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3卷第70页。

党面对以武力而不是通过谈判从英国人手中夺回租界<sup>①</sup>的事实。由于这些实际情况，由于农民和工人的斗争以及日益加强的反帝斗争，由于这种分化和国民党右派逐步建立了自己的中心，右派最终离开了国民党，蒋介石领导了他们。3月的国民党中央全会是在相当左的口号下进行的。但这里需要注意到，国民党左派在这个时候发表左的宣言，这决不意味着他们准备实行这些左的宣言，例如，他们在三月全会上接受了我們提出的决议，他们接受了关于需要建立乡村农民政权，需要使所有驻扎在农村、但不属常备军的武装力量听从农民协会指挥（即实际上解除地主和绅士武装<sup>②</sup>）的决议。他们作出并接受了这个决议，但这决不是说，他们打算派军队去解除地主和绅士的武装。下面的情况是很能说明问题的：这个时期关于没收土地的问题他们可以接受，但他们什么也没有接受，而当人们谈到应让农民拥有武装力量时，当然是指农民拿起武器时，没收问题才是现实的。

当时国民党宣布建立乡村农民政权，尽管不是直接的，但也促进了农村斗争的开展，因为这个决定在我们和国民党左派的帮助下立即传到了各县农村，这自然有助于斗争的开展。但斗争越展开，国民党左派对他们所通过的决议就越糊涂。从3月到5月，即大约两个月时间，是湖南湖北两省农民斗争大发展的时期。

由于这种斗争的发展，与农村有联系或与农村多少有些氏族联系的国民军指挥人员（若不是自己有土地，也是农村出身）就越来越多地谈论起国民政府的过激政策。在5月份，当作战行动在北方进行，留在原地的部队很少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夏斗寅将军反对武汉的武装叛乱。我们遇到的叛乱是湖南省农民斗争发展、深入的结果。国民党整个时期最大的动摇恰恰是在夏斗寅叛乱的时候。为了说明我们与之周旋、与之共事的国民党上层的特点，应

① 指1927年1月3日和6日分别占领汉口和九江的英国租界。

② 参见《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议史料》第788—792页。

当引用一下他们当时所说的话。那时他们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应当更紧密地合作，也就是说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人应当一起领导工农运动，即在运动如此高度展开、如此深入的时候一起进行领导。用他们的话说，这意味着让共产党人帮助我们遏止运动，尽可能地收缩运动。他们讲了这样一些话，例如：是你们共产党人希望领导工农运动。而现在，当政府处境这样艰难，当我们在前线，反革命将领反对我们的时候，他们说，请证明自己对国民党和政府的忠诚，控制运动吧。他们从来没有说，请收缩或遏止吧，他们说，请控制这种运动吧。另一方面，这时他们那里不是整个国民党，不是整个中央委员会，而是某些中央委员对苏联开始产生很大的动摇。例如，一位曾是左派的领导人，由于过于惊慌，在某个时期发生了向右的摇摆。他是这样说的：“在苏联和中国革命之间应当不仅仅是政治联盟……<sup>①</sup>（他读道）：现在，当帝国主义者反对中国的时候，苏联应当显示力量，应当在北方向日本显示自己的力量，以使人得出：不只是中国在反对帝国主义者，而且我们的盟友苏联直接同我们一起参加这场斗争。”

在这方面的动摇意味着，在中国国内直接反对帝国主义者的斗争遇到困难的时刻，由于农民运动的发展，内部的某些军事力量开始叛变，这时国民党左派就在如何对待共产党人和如何对待苏联的方面发生了摇摆。

在这最困难的时刻共产党人做了些什么呢？这里应当说，在党的五大以后，在夏斗寅叛乱期间，在这困难的时刻，共产党还是无愧于自己的地位的。这表现在什么地方？有什么事实说明这一点呢？下面的情况可以说明这一点。夏斗寅刚一叛变，尽管从军事角度看局势是危险的，可靠的部队在前线，在汉口有两个师控制着兵工厂，由于它们支持那个反对工农政府的将领，因而是

<sup>①</sup> 这以下原文是虚点。

不可靠的，这时市里只有共产党员<sup>①</sup>领导的一个团可靠，该团已扩编成师。高级军政学校<sup>②</sup>有几千名学生，四分之三的学生处于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影响之下。中央不顾力量对比不利的情况，坚持让国民党中央不要采取任何灵活策略，不要同这位将领进行谈判，而政府却倾向于这样做，因为这位将领采取行动不是打着推翻武汉政府的旗号，而是打着反对共产党人和走得太远的工农组织的旗号。武汉政府认为，可以设法同这位将领达成谅解。这是毫无疑问的。若是武汉政府坚持这种观点，这毫无疑问会加强和激起武汉政府内其他反革命分子的希望，首先会反对我们，其次是反对武汉政府，他们会推翻国民党政府。我党中央坚持要求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宣布夏斗寅是叛乱者，应把他送上法庭。军事委员会向夏斗寅的士兵发出通知，说夏斗寅是叛乱者和变节者，他同北方军阀串通一气；蒋介石从政治上明确地提出问题，说这是反革命行为，必须与之作斗争。这是第一。第二，共产党由于通过军事委员会施加影响，以及我们内部说，由于俄国军事顾问在那里施加的影响，坚持了原来的意见，并动员了军事学院的部分学生，把他们送上了前线，不怕力量对比可能造成失败的局面。当时没有别的出路，必须迅速而坚决地采取行动。结果夏斗寅的叛乱被镇压了下去，共产党的一个团从前线撤下来，显得更加充实了，因为它夺得了近900枝步枪。共产党在夏斗寅叛乱期间对反革命采取了坚决的行动。这对国民党的头头脑脑、对国民党左派也有影响，他们不得不更多地研究同反革命作进一步斗争的问题。

另一个问题是，对问题的提法本身他们一直动摇不定，他们犹豫不决，但他们终归不得不站在更坚定的立场上来对待这次反革命叛乱。

<sup>①</sup> 叶挺。

<sup>②</sup> 指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我的报告是很扼要的，我不能详细叙述国民党自身的内部矛盾，但由于我们的行动，国民党中央不得不站在更坚定的立场上，由于实行这样的政策，国家中心不仅保留下来了，而且它在某种程度上不得不按照我们的要求，按照日益深入发展的工农运动的要求去做。

在土地问题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不仅作出了一些决定，而且还试图具体解决一些问题，即进行某些改革。但在这方面应当说，从改革角度看，国民党政府几乎什么事也没有做。只是由于运动本身，面对事实它不得不批准。中央也没有为进行某些能够引导运动去反对大地主并有助于加强国民党左派的改革做些什么事。

对于国民党的动摇很说明问题的是，它如何理解为什么需要解决土地革命问题，为什么现在不能解决。国民党委员会开了三周的会<sup>①</sup>，对“解决土地纲领问题的意义”作了如下表述：以此保证：（1）使农民摆脱地主绅士的压迫，加强国民政府的财政，“因为现在总收入大部分归地主绅士，只有少部分归国民政府。如果国民政府收入增加，它的财政状况就会得到改善。（2）推翻封建基础。（3）农民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4）提高国民革命军的战斗力，因为士兵关心土地问题的解决。（5）农业和工业的发展。（6）中国文化的发展”。

这就是他们如何为自己作出了表述，说明为什么实际上需要解决土地问题。然而，当他们根据自己的情况着手制定需要做什么的方针时，当事情发展到需要做什么的时候，他们往往有一些疑虑。他们开始以为，这会影影响指挥人员，农村会发生无法控制的械斗，农民会自相残杀，更不要说地主了，因为将开始重新分配土地。最后，国民政府没有足够的力量把已经开始的事业进行

<sup>①</sup> 委员会从1927年4月2日到5月6日举行了会议。



到底。一句话，当他们看到真正日益高涨的土地革命时，会有一种闻所未闻的恐惧心理。这当然没有什么奇怪的，但是为了说明问题，应当指出这一点。

现在农民运动不只是在湖南湖北两省，而且在其他省份也在日益发展。我想在这里举浙江和江苏两省（这里是蒋介石的地盘）的几个数字。那里有组织的农民有 23 万。这是一个很小的数字，但是如果注意到军事化的制度，而农民协会不得不在经常遭受直接军事毁灭威胁的情况下生存，那么这还是说明是有所依靠的。到武汉政府能够采用军事手段打击蒋介石的时候，无疑，我们会看到那里有强大的农民运动。在广东和广西有 120 万有组织的农民。那里的农民游击队正在反对李济深的军队。河南省有组织的农民达 100 万。在北方没有农民组织，几乎也没有农民协会。如果说有农会，那也是很少的。在这个新的地区，只有在从军事上战胜奉天人，唤起农民，提供同他们进行联系的机会以后，才可能出现农民协会。

夏斗寅叛乱之后，长沙又发生一次指挥人员叛乱，这些指挥人员没有脱离武汉政府，他们不反对武汉政府，但他们说，他们不赞成武汉政府的过激政策，因此他们希望减少湖南省的运动，稍许收缩这种运动。例如，长沙的这次叛乱是反革命的，但它不具有蒋介石和夏斗寅那样的性质。他们未能向纵深推进和摧毁那里的一切。发生这种情况有两个原因。一是指挥人员的这次政变是一些部队所为，这些部队认为，它们还是不能同武汉中心决裂，但他们希望武汉中心能够稍微准许他们打击工农运动。二是搞政变的头目看来没有料到，会直接遭到工农组织的反击。在湖南，有一些工人队伍同他们进行了搏斗，而农民游击队至今还在战斗。在长沙，现在新的政府是服从武汉政府的地方省政府。它表面上不同武汉政府决裂，但还是不希望让出自己的地盘，不希望再从上面给工农组织提供在那里开展斗争的机会。今后武汉政府的军事

胜利毫无疑问会导致长沙中心被它们（工农组织）和农民队伍摧毁。但现在应当说，这是武汉政府最困难、最复杂的时期，因为国民党上层还在大幅度的摇摆。但不应低估这个中心对革命进一步发展的意义。我们不得不考虑到这一点。

武汉政府辖区内的工人运动是有组织的工人运动，非常年轻的工人运动。在广州国民政府到来之前即去年秋天，武汉还没有合法的工人组织，连不合法的也很少。在武汉政府存在的时期内，湖南湖北的工人运动开展起来了。我们现在拥有有组织的工人 20 到 40 万。在湖南湖北有工会理事会，在武汉政府辖区内有中华全国总工会。现在正在召开中华全国工人代表大会<sup>①</sup>，360 名代表代表了全国 280 万有组织的工人。广东的工会组织处于地下状态，工人运动是半合法的，但是我们的领导还是保留下来了。

广东省的工人运动处境非常困难。近来，工人运动不顾规章制度仍在发展。有一段时间，广东的铁路员工跟农民队伍一起袭击了李济深的常规部队。在蒋介石统治区，现在工人处境很艰难。问题在于，在这个地区，即在浙江和江苏两省，而主要是在上海，工人运动比其他地方组织得更好。近八九个月来，工人经历了三次起义<sup>②</sup>。到最近一次起义时，上海处在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有组织工人达 60 万。目前连同产业工人和手工业者，在上海共有 15 万工人在我们领导之下，手工业工人大致也是这个数字。蒋介石不顾他在那里有自己的机构，企图通过国民党，通过收买的所谓工人活动家组成〔自己的工会〕，但他还是未能使那里的工人运动屈从于自己。诚然，他在这段时间内把 5 万工人拉到了自己一边。其中产业工人只有 8000，而其余的多数是与蒋介石出身的那个省<sup>③</sup>有同乡关系的行业组织和同业工会。在其他方面，工人群众都处

① 指 1927 年 6 月 19 日至 23 日在汉口召开的全国劳动大会。

② 指 1926 年 10 月 23 日、1927 年 2 月 22 日和 3 月 21 至 22 日的上海工人运动。

③ 浙江省。

在我们的影响之下。那里的工人运动在继续发展。蒋介石不可能站住脚。现在那里不只是工人，而且激进组织和一部分国民党也反对蒋介石。就在这个蒋介石的统治区江苏省，也开始出现反英反日的抵制运动。不言而喻，如果蒋介石能够引导工人运动跟自己走，如果他能建立起祖巴托夫式的工会<sup>①</sup>并能挫败工人，那就不可能出现这些情况。

再谈谈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的态度。我们曾担心，随着蒋介石上台执政，他可能把小资产阶级拉到自己一边。看来这是悲观主义的估计。他未能把小资产阶级拉到自己一边，有两个基本原因：第一，小资产阶级对他不再反对军阀，不再说需要继续进行斗争不满意，并怀疑他在进行谈判，搞幕后交易；第二，他未能在所在省份建立民主政权，而城市小资产阶级早就希望建立某种形式的民主政权，因为它一直处在军阀统治之下。当蒋介石作为民族英雄，作为国民党中央委员来到时，城市小资产阶级当然希望在这里建立民主政权，后来却发现，还是跟以往一样的军人政权，由于这个原因，城市小资产阶级对蒋介石不满。

## 问题与回答

**曼努伊尔斯基：**武装工农的情况怎样？中国8小时工作日的情况怎样？

（下面的问题用德文提出）

**维经斯基：**曼努伊尔斯基同志的第一个问题，关于武汉政府辖区内武装工农的问题。我们有以下工农武装力量：第一是我已谈到的共产党的一个团，第二是有这样一个铁师，它不是我们的，不完全是我们的，但却是最接近我们的，可以依靠，可以确定一

---

<sup>①</sup> 20世纪初沙皇暗探头子祖巴托夫为破坏工人运动而建立的伪工会组织——译者。

定数量的工人和农民参加，以便把它扩充为一个军。有这样的方针。其次，我们有工人纠察队。工人纠察队没有完全武装起来，在许多地方是使用棍棒，但在湖南、汉口有用步枪武装起来的纠察队近 400 人。夏斗寅叛乱和后来的事态发展迫使我们要求国民党武装工人，以保卫首府不受其他军队进犯。例如，很说明问题的是，在我们的领导下开展了争取武装的运动，最后，汉阳兵工厂工人在 5 月份针对政府要求提高兵工厂生产率作出决定：我们提高劳动生产率，但一定比率的产品即枪支应当交给工人。这是 5 月份的事，我不知道是否实行了。但不管怎样，兵工厂工人完全正式地作出了决定，并带着决定去找政府说，他们将争取得到这些武器。

在农村，很难说究竟有什么样的武装力量。老实说我不知道，但可以根据下面的情况作出判断：这就是农民游击队时而在这里，时而在那里袭击常规军，解除士兵武装，解除绅士武装，现在就在通过这种途径武装农民。农民从逃兵那里获得武器，还可以购买到北伐时军阀们遗弃在农村的武器或其他什么东西。不管怎么说，在武装农民问题上的方针是这样的：农民应当靠民团、靠绅士和地主的武装力量来武装自己；其次，必须帮助农民从中央获得资金和其他经费，以便他们能在自己的农村或经城市购进武器。

关于组建自己的工农军队的问题。我们还在 3 月份就在湖北通过湖北省委执行了关于动员 2000 名共产党员和好像 1000 名或 800 名共青团员的决定。在其他地方也进行了同样的动员。但这当然只是对于武汉政府所辖省份。蒋介石统治的地区根本谈不上。

**曼努伊尔斯基：**或许您可以顺便谈谈，在军队中占据了少指挥职位。

**维经斯基：**在军队中我们占据的指挥职位非常少。有政治委员即政治部门负责人。需要注意的是，这跟我们军队中的情况完全不同。政治工作人员的影响不能与我们这里的影响相比。过去

他们唯一能够做到的，首先是根据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某种思想切实培养军队的纪律性，在最好的情况下是使军队对工农运动保持中立，而要使军队直接接近工农运动——他们还没有做到这一步，也许在未以工农为基础对军队进行改编之前是做不到的。然而政工人员的影响不能低估，无论在过去一些阶段的影响，还是现在在某种程度上的影响都不能低估。在过去一些阶段，当事情发展到要战胜军阀，给工农组织提供存在的可能性，使它们不致遭到进攻时，政工人员的作用是很大的，而现在随着革命的深入，政工人员的作用虽跟以前一样，但已缩小到最低限度，只靠宣传、只靠在军队的政治影响，我们不可能把军队拉到自己一边。

**沙茨金：**现在在军队中建立支部了吗？

**维经斯基：**建立了，但很少，很弱。

关于8小时工作日。据我所知，在中国实际上没有8小时工作日。国民党政府没有宣布8小时工作日，这个问题同农民运动问题一样当然要提上日程，工人的斗争本身会把它提上日程。现在中国工会代表大会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了这个问题，让政府宣布8小时工作日。很可能这对以后实行（即仅从便于进行争取8小时工作日的直接斗争的角度来说）也是有用的。

我们要根据第八次全会的决议使国民党成为群众性的党，有哪些条件呢。我认为，这不外乎第八次全会指出的问题，即在革命运动发展过程中还会经常出现某些分道扬镳现象，某些集团的离去会给革命力量以打击，但革命将会日益高涨。现在很难说，哪怕在国民党中央内，谁有可能离去，谁有可能分道扬镳，现在还很难说。

**沙茨金：**从对群众的影响角度说，可以使国民党变成群众性的党吗？

**维经斯基：**在这方面，可能性是存在的。五大以前中央就有这样的方针，现在我们可以把当地的工农组织联合起来。例如在

湖南省，就是在该省发生那次不是……的政变以前，我们也可以这样做，因为它们不反对武汉政府，无疑，现在我们在当地同国民党左派一起可以建立反对派，造就反对那个政府的干部，并且在这个斗争的基础上，在湖南省无疑将会扩大国民党的组织。湖北省也一样。来自下面的对国民党中央的压力比以前更大了。在这一过程中，不言而喻，我们能够执行已下达的指示，我不知道，我们能否迅速做到，但我们将执行已下达的指示，我们能够做到这一点。

全宗 495，目录 2，卷宗 78，第 94—121，123—124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速记记录，原件。

232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秘密会议第 30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6 月 22 日于莫斯科

绝密，特别文件

出席：布哈林、库西宁、什麦拉里、皮亚特尼茨基、安贝尔-德罗、列梅勒、马吉、彼得罗夫<sup>①</sup>、梅尔菲、沙茨金、许勒、科拉罗夫、埃韦特、牛曼、敦坎、舒宾、维经斯基、海默。

听取：1. ——布哈林同志关于中国问题和共产国际执委会驻

---

<sup>①</sup> Ф.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中国代表机构问题的通报。

决定：1. —— (1) 批准给鲍<sup>①</sup>同志的指示并要求他准确执行这些指示<sup>②</sup>。

(2) 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柳<sup>③</sup>三同志而无论如何不能给其他人看的电报<sup>④</sup>。任命牛<sup>⑤</sup>同志接替他。

(3) 致电汪精卫，指出中国革命正处于危急关头。责成布哈林、库西宁、布劳恩和皮亚特尼茨基同志起草电报<sup>⑥</sup>。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25，第 1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M. M. 鲍罗廷。

② 见第 233 号文件。

③ 分别为 M. M. 鲍罗廷、M. H. 罗易和柳克斯 (O. Ю. 普利切)。

④ 见第 219 号文件。

⑤ G. 牛曼。

⑥ 见第 233 号文件。

233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2 号（特字第 90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6 月 23 日于莫斯科

听取：5.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5. ——（1）再给武汉政府拨款 200 万卢布。

（2）关于数额为 1500 万元新贷款的请求，通知对方现在我们无法满足，但不拒绝以后重新讨论这个问题。请在近期内指望逐步兑现第一笔必须办理的贷款。我们特将追加汇款同组建可靠的军队联系在一起。要求通报为此做了什么工作。

（3）责成中国委员会根据这些指示起草给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答复，并交政治局批准。

（4）责成中国委员会准确统计给武汉政府的贷款已兑现了多少，并同财政人民委员部和贸易人民委员部协商制订进一步兑现的初步计划。

（5）批准布哈林同志关于以共产国际执委会名义发出以下电报的建议：

“致鲍罗廷、加伦<sup>①</sup>、罗易：

---

<sup>①</sup> B. K. 布留赫尔。



我们建议罗易返回莫斯科。将派另一名同志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去接替他。我们召回罗易是因为他违反了纪律。我们认为鲍罗廷有责任执行指示，而不要阻碍执行。我们充分肯定原先的指示，并坚决要求执行这些指示。

致汪精卫：

鉴于近来的事态发展，我们认为自己有革命义务向您通报如下：我们认为，国民党必须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以为反对农民或置身于农民运动之外可以推动革命，那是目光短浅的。恳请您运用您的全部威望对国民党的其他中央委员施加影响。国民党的整个命运和在很大程度上中国革命的命运，都取决于国民党的立场。我们认为，通过国民党民主化、更多地联系群众、停止领导层内的动摇是可以挽救事业的。国民党左派与共产党人的合作有坚实的客观基础。我们希望，借助于您的威望，国民党中央内的动摇是会减少的。我们建议从下面农民运动首领中找人来帮助工作。”

(6) 责成鲍罗廷同志和加伦同志就所有政治问题进行协商，发给莫斯科的所有电报需共同签署。

(7) 关于派遣别索<sup>①</sup>同志去中国的决定，暂缓通知中国。

(8) 责成中国委员会为驻华三人小组的工作制定指示草案。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5)、(7)；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斯蓬德同志——(1)、(4)。

---

<sup>①</sup> B. B. 罗米纳兹。

## 1927年6月17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9.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6月2日会议第107号记录，决定：7（6）和政治局1927年6月16日会议第123号记录，决定：2（4））。

决定：29. ——派拉齐斯、安德烈奇克和克利诺夫斯基同志任冯<sup>①</sup>的顾问。

抄送：

组织局，

莫斯克文同志，

伏罗希洛夫同志，

加拉罕同志。

## 1927年6月18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0.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6月16日会议第111号记录，决定：2（6））。

决定：30. ——采纳莫洛托夫、布哈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关于给汉口发去以下电报的建议：

“致鲍罗廷、加伦、罗易、陈独秀：

谨通知：（1）我们认为洛佐夫斯基关于退出国民政府的建议是冒险。因洛佐夫斯基不请示莫斯科就提出重要口号，我们对他提出警告。

（2）工会代表大会<sup>②</sup>不应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而应表

---

<sup>①</sup> 冯玉祥。

<sup>②</sup> 指中国全国第四次劳动大会。

示坚决支持土地革命和农民委员会的政权，赞成武装工农，赞成集体加入国民党和改组国民党。代表大会应当指出武汉政府在这些问题上的动摇，并答应在切实进行土地革命方面给它以全面支持。代表大会应制定措施，调整同城市小资产阶级的关系，保持同它的革命联盟。

致罗易、鲍罗廷、柳克斯<sup>①</sup>：

银行家<sup>②</sup>和柳克斯报告说，琼森<sup>③</sup>给国民党人看了最高领导机构的161、162、163号重要专电。我们对这种行为感到吃惊。要求琼森立即作出说明。”

致鲍罗廷、柳克斯：

(1) 同意柳克斯关于使用塔尔哈诺夫和马季亚尔的290号专电。不允许把情报综述工作委托给马季亚尔，立即转交给柳克斯。要写得更明确一些，减少密电中的废话。

(2) 第13号情报综述<sup>④</sup>说的是什么罢工？

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加拉罕同志。

## 1927年6月20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3.——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1927年6月16日会议第111号记录，决定：2（6））。

① O. Ю. 普利切。  
② M. M. 鲍罗廷。  
③ M. H. 罗易。  
④ 文件没有找到。

决定：33.—— [1] 采纳莫洛托夫、布哈林和伏罗希洛夫同志关于给汉口发去以下电报的建议：

(1) “致鲍罗廷、加伦、罗易、陈独秀：

谨通知：①我们没有任何新方针，而你们那里实际上是不执行共产国际的决定，首先是关于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建立可靠的武装部队和使国民党结构民主化的决定。

②答复陈独秀的电报①，重申我们的指示，即推迟土地革命是极为有害的。他们借口军队的人员组成只是讲有必要对作战的革命军士兵和指挥人员的土地采取特别措施。

③我们认为，寄去的经费对于和陈独秀一起组建可靠的革命军部队是特别需要的。必须了解实际上为此在做什么工作。随着这项工作的开展，我们将按确定的贷款数额寄出经费。

④同时征讨北京和南京是有利的，因为这会打乱冯与蒋介石的联系，把冯与武汉绑在一起，推动武汉军队向左转，有助于在各地（无论在武汉地区还是在南京地区）进行土地革命。但这只有在保证武汉拥有最忠诚的革命部队的情况下才能实行。”

(2) “致罗易、鲍罗廷：

建议罗易立即动身返回莫斯科。”

[2] 立即派罗米纳兹同志去武汉。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1] — (2)、[2]；

罗米纳兹同志—— [2]；

斯大林同志——全部。

① 见本书第 318 页注⑤。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 目录 162, 卷宗 5, 第 46—47、49—51 页。  
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234

## 罗易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的电报

1927年6月24日于汉口

### 琼森<sup>①</sup>致莫斯科最高领导机构

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决议的电报<sup>②</sup>收悉。取道上海不可能。必须取道蒙古, 我将于7月底抵达莫斯科。这里的局势很严重, 我们面临着全面失败。我不止一次及时地发出过警告。召回我, 这并不是为挽救局势可以做的全部工作。徐州会议<sup>③</sup>作出决定: (1) 承认武汉的错误。(2) 将共产党人开除出国民党。(3) 解除鲍罗廷的职务。(4) 联合进攻北京。

多数武汉领导人(汪精卫可能除外)准备接受这种立场。共产党人已被用中国方式开除出政府。谭平山未经党的许可就停止了部长工作。共产党人被开除出省政府。湖北农民组织和国民党

① M. H. 罗易。

② 见第233号文件。

③ 徐州会议于1927年6月20日召开, 蒋介石、冯玉祥、胡汉民等人出席了会议。

地方党部被解散。

在徐州会议后进攻南京是不可能的。除唐生智外，将领们都反对同南京作战。第4军和第11军是唯一适合于实现这一目的的部队。只靠这两个军是不可能打败南京的。武汉与南京可能和解，在北京组成统一的反共、也许还反苏的民族主义政府。应该寻求挽救我们的力量（包括国民党左派）的途径。我建议立即借助第4军和第11军收复广东。〔必须〕在那里建立左派同汪<sup>①</sup>和邓演达的军事政治基地。可以从这个基地出发在相邻省份顺利实施土地革命纲领、组建革命军队、武装群众和使国民党民主化。这一计划并不排除采取尽可能保留我们在北方的阵地的策略。邓演达想出国。汪也要出国。需要给他们以希望，否则，不仅国民党左派，而且整个国民党都将被消灭。汪本人认为，将共产党人开除出党将意味着国民党的政治死亡，但他不能阻止这样做，直至我们给他指出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出路并帮助他走这条路。对于所提到的广东基地，应不通过国民政府给以直接援助。请尽快作出答复。如果赞成这个计划，我便去广州，那时就不要坚持让我返回莫斯科。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2—33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

① 汪精卫。

235

##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摘 录)

1927年6月24日于索契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

刚从信使那里收到你最近的一封信<sup>①</sup>。关于中国问题，我想现在就可从1000万项目下汇出300—400万，但1500万的问题暂缓。他们还要求我们提供1500万，看来，如果我们不提供这1500万，就拒绝立即反对蒋介石。

敬礼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第103页。

---

<sup>①</sup> 信没有找到。

236

## 谢苗诺夫给某人的信<sup>①</sup>

1927年6月25日于上海

副本

我打算7月15日去汉口。需要弄清那里的情况，把工作做个比较，执行一些决定。

据我判断，那里的人们争吵得很厉害，都在从事个人政治，搞宫廷政变，等等。而主要问题，即组建一支依靠工人、士兵和农民的群众性组织的可靠军队的问题却得不到重视。

我在动身时曾提出必须紧急派两三名高级负责同志到这里来的问题。现在这个问题非常尖锐地摆着。应当有一个坚定的政治方针，有一个领导。我觉得，那时情况就会不一样。其实，您看得更清楚，但我还是再次提出这个问题<sup>②</sup>。

在这里，我把工作做了一些调整。总的来说，军队的状况远不是令人满意的。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我只是进行了一些操练，调整了技术设备。

1. **五人工作小组的组建**进展得相当缓慢。只有4名地区军事工作人员在工作。他们当中只有一人在岗位上。现在在上海，这方面的合适工作人员很少，一些人躲藏起来了，另一些人在坐牢。组建五人小组成功与否主要取决于区领导人的主动性和本领。眼下实际上在四个地区的不同工厂里组建了30个五人小组。令我十

<sup>①</sup> 信多半是给 Я. К. 别尔津的。

<sup>②</sup> Г. И. 谢苗诺夫上次的请求书没有找到。



分高兴的是基层工人对组建五人小组的态度。如果在莫斯科您那里有好的工作人员，当然是中国人，那就给我派来 8 个人。这会大大加强我的工作。我正在一些地区安排情报和联络工作（住所、会面地点）以及技术设备。已经有了实验室。

至今没有收到您答应给的材料。

需要购买少量武器。5000 美元就够了。请给予专项拨款，因为通过地方组织弄不到这笔钱。需要给五人小组领导人和某些特别小组配备武器。

2. **军队中的工作极差。**在现在的条件下，要在蒋介石的军队中建立军事组织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试图做些事，但不寄很大希望。我在搞“宫廷政变”。我们在同 26 军军长<sup>①</sup> 谈判，让他转到汉口方面来。关于这个问题我已通过格里沙<sup>②</sup> 发去电报<sup>③</sup>。至今尚未得到答复。请立即对这些问题作出答复。

在唐生智军发动进攻的情况下，第 26 军转过来是很现实的事情。这种现实性的本质在于：（1）第 2 师是作战师，共有 4000 名战士，是该军中最强大的部队。师长<sup>④</sup> 是具有左的倾向的年轻人。他的兄弟是我们的同志<sup>⑤</sup>。所有有左的倾向的团长都同师长紧密地抱在一起。亚诺夫斯基<sup>⑥</sup> 同志很了解这个师。他主要是随该师一起征战。他的评价与这种评价完全吻合。（2）军长同蒋介石打过架：蒋不允许把军队扩编成军，不想把全省交他管辖。一句话，是个典型的中国故事。需要考虑的是这位军长是个冒险主义者、爱金钱、吸鸦片，等等。尽管有后面这些情况，利用 26 军还是完全现实的和可能的。问题只在于他们是否会进攻蒋介石。考虑到有某种转变，我请求就此事给我明确指示。

① 周凤岐。

② Г. Н. 维经斯基。

③ 电报没有找到。

④⑤ 何人不详。

⑥ 袁庆云。

3. **情报工作**处于瘫痪状态。只是提出了城市情报工作，而且情况很糟糕。同蒋介石的军队没有情报联系。我在着手安排。每次同军事委员会委员会见时，我都向他们灌输必须安排好情报机构的思想。很清楚，军事部应当了解敌人营垒内的一切活动。我想很快就会开始定期提供情报。

4. **策反工作**目前开展得相当好。近三周来我们印发了一些传单，即（1）关于5月30日事件的（英文和法文）传单；（2）关于英苏断交的（英文）传单；（3）以盟军士兵委员会名义发出了提出一系列经济要求的（法文和英文）呼吁书。这些传单的经常出现造成了强烈的印象：在当地英文报刊上出现了一系列文章，整个警察局都行动起来了。因此不得不非常谨慎地进行这项工作。不久前我又吸收两名英国人——杰宁和阿列克斯<sup>①</sup>参加了这项工作。他俩都在工会部门工作。现在不得不把他们派到莫斯科去。阿列克斯根本不适合做这种工作，他犯了许多非常严重的错误。我个人认为，不能再派阿列克斯去从事秘密工作。过一段时间他必然会暴露，主要是他还有可能断送别人。他太粗心大意，没有任何克制能力，虽然他本人是个好青年，但这只是小小的安慰。为什么把注意力放到英国人身上，眼下我还弄不清楚，既然这是事实，那就只好赶紧把他送回莫斯科。他本人是个适合做工作的青年，特别是在海员中。我很不情愿让他回莫斯科。再不要让他到这里来了，因为有人会迅速把他断送。他冒的风险太大。在上一封信<sup>②</sup>中，我曾指出，为了加强组织联系，有必要派两名女士——**阿列克谢耶娃·叶尼娅**和**希夫**（在共产国际德国部工作）到这里来。可能是她们拒绝或者不可能派她们来，但无论如何需要派另外的人来，大体上也是这种类型的人。必须是懂法文和英文的。还请立即把**比特尔**一家派到我这里来，在这里他们对我组织酒吧和

① 何人不详。

② 信没有找到。

搞技术工作都有用。随本报告附上一法国同志关于法国军队生活状况和条件的报告<sup>①</sup>。

我将随下次邮班寄去关于我们工作情况和英国军队状况的详细报告。

5. **财政问题**我在这里已相当顺利地做了调整。我希望能在汉口逗留期间最终顺利地解决这个问题。

6. 恳请给我派一名懂俄文的翻译来。这对我来说是绝对需要的，这个年轻人应受到充分信任。

7. 鉴于需要经常离开上海，我认为有必要派一名有秘密军事工作经验、能在我外出时在这里代替我的工作的人员来。何况这里的工作也够两个人干的。

8. 为了在外国军队中开展宣传工作，绝对需要有英文和法文的主要刊物。请通过最近的邮班寄来这类刊物。

9. 第三次提醒派**赛博特**同志到**冯**<sup>②</sup>的部队任全权顾问的重要性。我认为，他在那里会是很有好处的。

安德烈<sup>③</sup>

核对无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227—230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① 文件没有找到。

② 冯玉祥。

③ Г. И. 谢苗诺夫。

237

## 希塔罗夫关于中共中央政治局与共产国际 执行委员会代表联席会议的报告

1927年6月26日于汉口

### 中国共产党政治局 [会议]

(根据希塔罗夫同志的报告)

会议日程有两项：1. 政治形势；  
2. 我们的任务。

**陈独秀**：我们面前有两条路：右的道路与左的道路。右的道路意味着放弃一切，左的道路意味着采取激进行动。在这两条道路上等待我们的都是灭亡。

此外还有一条中间道路，即继续目前的局面，这也是不可能的。

怎么办？也许应该寻找第四条道路？在我们这次会议上需要讨论这个问题。

**鲍罗廷**：先应同莫斯科取得一致。我们在6周内已经收到一些本着一定的精神起草的电报。我们不同意这些电报的方针，因此给莫斯科发了电报。莫斯科非常明确地回答说，它坚持自己的指示。任务是寻求新的、与莫斯科一致的行动纲领。

(然后宣读了莫斯科给汪精卫的电报) 内容大致如下：

“在目前的危险局势中，我们认为自己的革命职责是向您作出

如下声明：挽救办法只能是同农民联合，而不是同农民对抗。国民党应该明白，必须进行土地革命，应当停止动摇，以便国民党同共产党更紧密地联合起来，同它一起创建革命政权。此外，必须改组国民党，从工人阶级和农民中吸收新的领袖。我们应当为党建立牢固的基础，建立牢固的革命政权。”<sup>①</sup>

莫斯科给汪精卫的这份电报的内容与给我们的电报一样。我们应当就这个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莫斯科希望什么呢？莫斯科希望：

- (1) 进行土地革命，
- (2) 使国民党民主化（无产阶级化，吸收农民参加），
- (3) 建立革命军，
- (4) 不退出政府和国民党（这被看作是冒险）。

如果我们根据这四点去做，党的独立自主问题就自行解决了，就不再是问题了。

（希塔罗夫叫道：那时共产党将进行领导）。

是的，那时共产党将成为领袖。

莫斯科是怎样理解这四项任务的？我是怎样理解的？

#### [1] 土地革命

莫斯科提出进行土地革命的要求，而不是没收土地，这不是偶然的。这里可以找到接触点。没收土地，这不是土地革命的开端，而是它的终结。应当从其他步骤开始。我们应当对莫斯科说，我们所理解的土地革命是什么。我们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对此是有同样的理解，还是要求立即没收土地。我认为，先应该采取另外五个步骤：（1）自治问题。这是一个重大步骤，是个杠杆，借助它可以开展阶级斗争。国民党希望排除农民的领导，但这无关紧要。我同湖北农民委员会谈过这个问题，他们很好地领会了这

<sup>①</sup> 见第 233 号文件的准确电报文稿。

一点。(2) 孙逸仙曾实行过的国民党的传统政策：减租。(3) 我们对无地农民的事管得太少。我们只是在湖南省有无地农民的专政。

**陈独秀**：这根本不是农民，只不过是“平民百姓”。

**鲍罗廷**：我们应当通过各种途径，如农民协会、城市失业者和军队同这些无地农民进行更密切的接触。我们如何接近这些农民的问题我还要专门谈。我们应当找到打入盗匪盛行地区的机会，以便把无地农民组织起来。

(4) 武装农民。这是最重要的步骤之一。如何把农民武装起来呢？通过自治，通过盗匪盛行地区，也还有其他的可能性。如果我们现在讨伐南京和广东，那就不能重犯过去的错误，应当把农民武装起来。这不是原则问题，而是技术问题。不利用一切机会来武装农民，这是犯罪行为。经费可以找到，莫斯科会提供经费。陈独秀在一份电报中支持向国民党提供贷款<sup>①</sup>。莫斯科明白，他本人需要用钱来实现革命的目的，便同意了。

(5) 培训我们的同志做农村工作。这是很重要的一点。我们应该在很大程度上使共产党做好做农村工作的准备。如果尽可能做好准备工作，这也是土地革命。我们应当开办学校，等等。

我们能否实现这五个步骤呢？

前两个我们可以同国民党一起实施。其余三个我们可以自己来实施。

我们可以把我们的这种立场通报给共产国际。若是共产国际正是这样理解土地革命的，那就找到了共同的立场。

这是第一个问题，土地革命。

## [2] 国民党民主化

这里有两种办法。第一种办法是吸收工人和农民，在各省举

---

<sup>①</sup> 电报没有找到。

行代表会议。提出自下而上更新国民党的要求。

第二种办法是劝国民党从群众中选新的领袖参加领导。

我们应当明确地告诉共产国际，第一种办法是可行的，第二种是不可行的。第二种办法必然导致同国民党的决裂。在下次国民党代表大会上，我们应当为争取多数而斗争。将重新组建中央委员会。

### [3] 武装工农

我们当然衷心欢迎这样做。但局势是这样，我们不能在武汉再呆上两个月。我们该怎么办呢？或者我们去南京，但那时冯<sup>①</sup>有可能进攻我们。于是我们可能不得不去广东。无论如何我们得交出武汉。或者我们不得不同国民党左派一起转入地下。由于这个原因，现在武装工农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汉阳兵工厂每天生产200支枪，都被军阀拿走了。如果我们提出武装工农的问题，军阀会感到担心，会猜出我们的计划。因此，讨伐南京或广东就不可能了。因此，现在武装工农的口号没有实际意义，它实际上是不可能的。我们只能在广东或南京解决这个问题。

### [4] 退出政府

莫斯科称这是冒险。但我们，即这里的一些同志，甚至比莫斯科更激进，希望退出。不过我认为，这里可以取得一致，没有多大困难。退出的时间还没有到来。我们应该留在政府内。这并不是说，每个部长都必须机械地坐在办公室里工作。他可以让副手、秘书呆在那里，而自己去国外住上6个月，如果他希望的话。这是个技术问题。但作为政治行为，我们应该留在政府内，可以说是象征性的。

借此机会我想提请同志们注意一点。我们的所有谈判和对国民党的让步一般说来都是对军事因素的让步。另一些人士、政治

<sup>①</sup> 冯玉祥。

家只不过是军阀手下的秘书。为什么我们不直接去长官那里，而去秘书那里呢？因为秘书是民主人士，如果他拥有权力，则会反对军阀。因此我们不应直接去找军阀。我们不能再搞迎接将领们的游行<sup>①</sup>。要知道，如果我们这样做，民主人士也会转向军阀，他们会认为军阀专政要比“流氓无赖”专政好。我们应当吸引民主人士，加强他们的力量并同他们一起进行斗争。我们应当帮助这些民主人士组织对南京的讨伐。这里应当利用一切。对这一点，我很想更详细地谈一谈。因此，我现在不再多谈，稍后再回过头来谈这个问题。

当我们同莫斯科没有共同立场时，我们连一步也不能前进。因此我提出了自己的行动纲领。

**陈独秀：**莫斯科的指示我弄不明白，我不能同意。莫斯科根本不了解这里发生的事情。鲍罗廷所说的土地革命（不没收土地），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因为我们确切地知道，莫斯科的所谓土地革命指的是什么。莫斯科要求没收土地，我们不能这样做。

因此，鲍罗廷的整个纲领是无稽之谈。

**谭平山：**我不同意陈独秀的意见。我认为，应当接受鲍罗廷的这五点。应当从这个意义上再次致电莫斯科。不应退出政府。首先我们中国人应该找到自己的立场，然后再通报莫斯科。

**张国焘：**我也认为，莫斯科的指示是不能接受的。应当加以拒绝并通知莫斯科。如果莫斯科还坚持自己的意见，那就应当再次回电反对莫斯科。

**瞿秋白**回避明确提出问题，他只谈了自治的可能性。

**周恩来：**在上海我们收到了莫斯科关于建立民主政府的指示。后来当我们这样做了时，他们却对我们说，这是不对的。莫斯科经常这样做。应当弄清楚，莫斯科到底想怎么办。

---

<sup>①</sup> 指1927年6月16日在汉口举行的隆重欢迎从河南前线归来的国民革命军部队的活动。



**张太雷**：从罗易到来时起，从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到这里之后，我们这里就经常出现分歧。一切都始于北伐。这种情况不能容忍，还是应该取得一致。

我们同共产国际代表<sup>①</sup>进行过争论。当我们问，他想提出什么建议时，他希望在星期日举行游行，在星期三举行罢工。我们不能这样做。这是无法执行的建议。

**布林斯基**<sup>②</sup>（青年）：我完全不同意鲍罗廷的意见。为什么鲍罗廷要把我们引上歧途，说什么如果我们进入南京，国民党就会向左转，就会在那里武装工农？恰恰相反，在南京，资产阶级和反革命军队会一齐向我们扑来。那就别想武装工农了。

怎么能反对没收土地呢？应当完全彻底地接受莫斯科的指示。

**陈独秀**：这只是一个人的意见。关于这个问题再没有什么可说了。布林斯基的意见不值得考虑。我们同意鲍罗廷的意见。我现在完全同意鲍罗廷的五点纲领，但这并不是莫斯科所希望的。

现在我们还要讨论两个问题：

- (1) 控制群众运动；
- (2) 政权。

**希塔罗夫**后来（在会议期间）同鲍罗廷进行了私下交谈。他给鲍援引了一段列宁语录，列宁说：那些认为在内战已经开始的革命时期，只需要从事宣传鼓动而无需采取行动的人，那些拒绝采取行动的人，要么是死人，要么是革命的叛徒。

**鲍罗廷**说，这一般说来是正确的。现在不能同意这种说法。

**希塔罗夫**给鲍罗廷指出，在土地问题上他不是从莫斯科的立场出发的。

**鲍罗廷**：您自己去试试为此作宣传吧！您现在怎么去没收呢？

**希塔罗夫**：不能排除没收土地。只有在这个口号下农民组织

① M. H. 罗易。

② 任弼时。

才能真正做点什么事情。

**鲍罗廷**：可以把这作为党在群众中的口号。我想问布林斯基，在哪里和怎样才能没收土地。

**布林斯基**：在湖北、湖南、江西，借助于农民队伍。  
这以后鲍罗廷转向会议主持人。

**鲍罗廷**：我想再次发言。在土地问题上这里出现了误解。

**陈独秀**：我们先应讨论另外两点。罗易、维经斯基和青年代表都主张党的政治独立。他们认为，党在政治上应当是独立的。但我们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我们在国民党内供职。我们应当服从。群众运动也应当服从国民党。

**鲍罗廷**长时间地谈论如何解决这个问题。国民党想控制群众运动。这表现在哪里呢？如果我们认为有必要采取什么行动，那我们就向国民党递交请愿书，100次、1000次。国民党看到这些请愿书，无法拒绝采取行动，因为群众这样坚决要求。于是国民党不得不采取行动。

因此，国民党对群众运动的监督没有实际意义。

**希塔罗夫**：也许至少对革命党来说应该认为游行或罢工的形式比请愿这种和平形式要好？

就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时间的辩论。

**布林斯基**问：若国民党不顾请愿仍拒绝采取行动呢？

**鲍罗廷**：那我们就聚集在这里并决定该怎么办。

**希塔罗夫**：那时是否会发生我们自己采取行动，就是说我们率领群众的情况呢？

**鲍罗廷**：有可能，但不能事先预言。

**陈独秀**：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如果我们想取得政治独立，那我们就应退出国民党。

**鲍罗廷**：我们应交给几位同志起草给莫斯科电报的任务。

**决定**：由瞿秋白和张国焘起草。

全宗 514, 目录 1, 卷宗 298, 第 69—72 页。

德文打字稿, 原件, 无签字。

## 238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3 号(特字第 91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6 月 27 日于莫斯科

## 1927 年 6 月 25 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 8.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6 月 23 日会议第 112 号记录, 决定: 5 (2))。

决定: 8. ——采纳中国委员会提出的电报稿:

“汉口, 致苏联领事<sup>①</sup>:

致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我们完全同意你们的意见, 中国国民革命现在正处于困难时期。但我们坚信,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领导将保证取得进一步的政治成就和军事胜利。我们已下令再给武汉国民政府汇款 200 万卢布。至于你们的新贷款请求, 目前我们还不能给予满足, 但不拒绝今后讨论你们这一请求。请你们在近期内指望兑现我们的第一笔贷款。我们认为特别有必要利用

<sup>①</sup> O. Ю. 普利切。

所拨出的经费来组建若干由工农组成的并拥有革命军官的可靠的忠于革命的部队。请通报你们在这方面所做的工作。为了组建忠实的军队，应该准备作出各种牺牲。我们方面准备给予一切可能的进一步的物质支援。我们确信，有支持土地革命的坚定方针，在同共产党合作的情况下，你们一定能够建立起这样一支坚强的军队和克服各种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困难。人民共和国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

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52、54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39

##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摘 录)

1927 年 6 月 27 日于索契

亲爱的维亚切斯拉夫和尼古拉：

(2) 我在密电<sup>①</sup>中已谈到冯<sup>②</sup>的问题。看来，关于冯的报道是符合实际的<sup>③</sup>。我担心，武汉会胆怯，屈从于南京。由于鲍罗廷问题（如果武汉想解除他的职务）而同武汉进行争论当然是不值得的。但需要千方百计坚持不让武汉屈从于南京，只要还有这种可能的话。因为丧失武汉这个独立的中心就是丧失某个革命运动的中心，丧失工人自由集会的可能，丧失共产党公开存在的可能，丧失公开出版革命刊物的可能，一句话，丧失公开组织无产阶级和革命的可能。请相信，因此给武汉追加 300 万到 500 万是值得的，只要有所依靠，武汉就不会向南京无条件投降，钱就不会白花。

(3) 近日我收到汪精卫的一份电报，并作出了很长的答复<sup>④</sup>。请读读这份电报，并简要地谈谈你们的看法。

(4) 关于洛佐夫斯基，我没有异议<sup>⑤</sup>。

(5) 关于“规定”同蒋介石的关系的做法是否合适，我表示怀疑。与张作霖相提并论不合适。三年前我们承认了张作霖。如果问题发生在现在，我们就不会正式承认他。现在承认蒋介石，就是打击武汉（武汉还存在）和向张作霖挑战（请回忆一下中东路事件）。同蒋介石的关系问题最好等一等，要维持现状。

紧握你们的手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第 70—71 页。

① 密电没有找到。

② 冯玉祥。

③ 指冯玉祥转到蒋介石一边。

④ 文件没有找到。

⑤ 见第 233 号文件。

240

## 罗易同汪精卫的谈话记录

1927年6月27日于汉口

### 同汪精卫的讨论

**汪精卫：**局势很严重。蒋介石与冯玉祥已达成全面协议。我刚刚收到冯玉祥一份电报。他最近一份电报是经南京发来的。有理由认为，这是伪造的。今天的电报是直接来自开封发来的（他念电报）。电报中说：

“共产党应对湖南湖北的一切不幸负责。共产党阴谋消灭国民党。因此，同共产党合作违背国民革命的利益。武汉国民政府应该摆脱共产党的影响。应当把国民革命的一切敌人赶出国民党，如有必要，应予惩罚。立即联合进攻北京是国民革命最重要的任务。”

**罗易：**这份电报讨论了吗？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怎么看？

**汪精卫：**暂时中央委员会还没有正式讨论。但已有许多领导同志看过了。

我们面前有两条路：

(1) 为了同右派和一切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共产党与国民党密切合作。这可能激起反动派的立即武装叛乱。

(2)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民党左派将维护出版、言论自由和共产党合法存在的自由。如果采取这样的步骤，那么，反动派就没有组织武装叛乱的直接借口。我已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交谈

过。他们赞成第二条道路，但他们说，共产国际反对。我个人认为，我们应赞成第一条道路。但在这种情况下我必须同第4军和第11军紧急经湖南去广东。

陈独秀和谭平山主张退出国民党，为左派创造有利条件。

**罗易：**进攻南京的前景如何？难道我们不担心，一旦进攻南京，冯玉祥就会进攻武汉吗？

**汪精卫：**对南京的这次讨伐取决于唐生智如何调解湖南的局势。若是我们能集中所有武装部队进攻南京，那么第二条道路会是理想的。当然在这种情况下这意味着要作出某种退让。

**罗易：**您个人的意见如何？

**汪精卫：**我主张去广东。我们在武汉这个地方犹如在一个被敌人包围的小岛上。我们在这里什么事情也不能干。我无法根据我去郑州之前同您讨论过的方针做工作，谁都不支持我。我想通过南京对冯玉祥的电报作出非常明确的答复（他念电报），但谁都不赞成这份电报，只有孙科在经过一番说服之后同意了。

**罗易：**您同第4军和第11军一起去广东，那不意味着国民党的实际分裂吗？意味着公开向右派中的反动分子挑战吗？

**汪精卫：**是的。

**罗易：**还有谁同您一起去？

**汪精卫：**邓演达，也许还有孙科。我同这两个人谈过。当然，孙科没有像邓演达表现的那样热情。但同他都说好了。

**罗易：**是需要同李济深进行一场军事行动还是可以同他达成某种协议？

**汪精卫：**我们应当进行战斗并推翻李济深。

**罗易：**如果相信不会重犯同样的错误，谈论过去的事情就没有用了。在您回到中国以前，我就不止一次地指出，共产党与国民党若不建立巩固的联盟，以便同反动派进行坚决的革命斗争，我们在武汉的处境很快就会变得很危险。从那时起，我一直坚持认

为有必要建立作战基地。在武汉，不可能把实施组建我们自己武装力量的计划的工作和使国民党实行民主化的工作进行到底。我们应当寻找一块我们有行动自由的地方。为此，我们绝对有必要收复广东。

**汪精卫：**我同其他同志也有分歧。但我必须服从多数。我坚持以下意见：南京是最坏的敌人，首先需要同它作斗争并收复广东。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同我们自己辖区内的反革命作斗争。现在，如果我们想[收复]广东，那就应当改变我们工作的整个性质。国民党应当进行彻底改组。否则，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我不能承担任何责任。

**罗易：**情况很清楚。只有两条路。要么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开始进行坚决的斗争，要么向反革命投降。

但是，没有理由赞成第二条道路。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应当空前地团结起来，应当充分地相互信任，应当赞同共同的革命纲领，并为消灭反动势力而斗争。我给您看了莫斯科的电报<sup>①</sup>，是要表明我们真诚地希望在革命斗争中同国民党左派合作。但我认为，对电报没有作出正确的理解。

**汪精卫：**如果我给您造成了尴尬的处境，请您原谅。我没有向任何人谈过电报的事。但我认为有必要把共产国际对目前中国形势的看法告诉一些同志。邓演达同志完全赞同指示。孙科也认为指示是完全正确的。另外一两个同志说，电报是给共产党人的推翻国民党的指示。但是不能对电报作这样的解释。它很明确地指示共产党人去帮助和加强国民党，以及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

**罗易：**您近来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吗？（我是指昨天收到的并在共产党政治局作了讨论的共产国际给汪精卫的电报）。

**汪精卫：**没有。我没有收到莫斯科的任何电报。（他痛苦地补

<sup>①</sup> 见第 219 号文件。



充说)我处境很困难。我什么事情也不能做。甚至也不能发电报。

然后**罗易**同他讨论了两党关系问题和革命的迫切任务问题。罗易对他说,已就这两个问题起草了具体建议。

[**罗易**]:您见到了这两个文件?

**汪精卫**:没有(这就是说,共产党政治局通过的国民革命纲领从来没有提到[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的]联席会议上,没有同左派领导人召开会议来讨论政治局所通过的目前的具体任务)。

**罗易**:共产国际给共产党人的关于不退出国民党的指示是非常正确的。如果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那么两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都会被反动派消灭。右派企图同反动军阀一起分裂革命联盟。如果他们能迫使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那么他们就会首先消灭共产党人,然后消灭左派。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需要密切合作和采取共同的革命行动。共产党人不应退出国民党,他们应留在国民党内,挫败右派的反革命图谋。目前退出国民党不是帮助左派,而是消灭左派。讨伐广东不应看作是退却,而是寻找作战基地的一个战略手段,联合起来的革命力量将从这个基地给反动派以决定性的打击。

**汪精卫**:看来,同蒋介石的斗争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不能去广东,那我怎么办?去莫斯科?

**罗易**:不。同蒋介石的顺利斗争不只是取决于我们。我们应当同不在我们控制之下的武装力量进行合作。但是我们可以并且应该去广东,因为这是摆脱业已形成的局面的唯一出路。您不应考虑出国问题。现在一切革命民主力量都应当动员起来同反动派作坚决的斗争。这只有在您的领导下才能做到。您应该去广东,把广东变成聚集所有这些力量的地方。在这项工作中,您可以相信会得到共产国际最全面的支持。

**汪精卫**:是的,我想这是摆脱局面的唯一出路。我们应当行动起来。您在动身之前应同邓演达谈一谈。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9，第 207—209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241

##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的电报

1927 年 6 月 28 日于汉口

以违反纪律为由把我召回使我感到惊讶。这里必然造成这样一种印象：虽然我严格按照共产国际决议和你们的指示行事，共产国际却否定我的看法。不是我，而是另一些人违反了纪律，无视和否定共产国际的决议。我将在莫斯科证明，对我的指控是荒唐的。共产国际不应轻率地对非常困难的条件下试图忠实地执行其决议的人提出个人指控。

共产党政治局正在逐步走取消主义的道路。它决定放弃国内斗争，而进行反帝斗争，特别是同日本的斗争。它决定为上海无产阶级着手没收外国财产和占领外国租界开展宣传鼓动工作。这会挑起帝国主义对上海、南京、广州等城市的占领。共产党领导人认为，阶级斗争会导致光荣失败。他们认为有必要把注意力引向外部敌人，引向共同的反帝斗争。尽管有共产国际的明确意见，退出国民党的政策却正在成为事实。谭平山未经政治局批准就辞去了部长职务。鲍罗廷赞同谭平山未正式宣布辞职就到国外休假。驱逐共产党人的要求具有普遍性。因此有可能，那些打算不惜任

何代价维持同将领们的良好关系的人，主张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并认为这是一种策略上的需要。6月26日，共产党政治局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指示<sup>①</sup>。陈<sup>②</sup>声称，莫斯科不了解情况，发出了不可能执行的指示。我不再出席政治机关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同志将提出详细报告。你们将看到，我对共产党领导的评价是正确的，应当像我建议的那样及时采取组织措施。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之间存在公开的分歧。在这种危机情况下，共产国际却要召回自己捍卫了正确政策的代表。

根据汪精卫同我私下谈话<sup>③</sup>时阐述的意见，有两条道路：

1. 为了公开同反动派作斗争，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更紧密地联合起来。

2. 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国民党]左派维护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汪说，陈独秀和谭平山赞成第二条道路。他们认为，这样会改善左派领导人的处境。在这次谈话中我发现，汪甚至都不知道共产国际发给他的电报，这份电报是一天前收到的，并在共产党政治局内作了传阅。

汪认为，冯的公开敌视态度未必会有助于同蒋介石的斗争取得胜利：一切都取决于唐生智如何调解湖南的局势，也就是他能否使自己的将领感到满意。汪相信，在目前的条件下，他唯一的出路是同第4军和第11军一起去广东。他承认，这意味着同右派决裂，不过他说，这是使国民党民主化的唯一办法。他认为武汉是个危险的地方，那里除了妥协退让，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他觉得自己无能为力，情绪悲观，如果我们给他指出通向政权的道路，真正帮助他，并根据共产国际决议加强左派，他就会跟我们走。这

① 见第237号文件。

② 陈独秀。

③ 见第240号文件。

里的政策规定，要对国民党右派和左派都开展外交工作，帮助国民党退却，不加剧分化，以便沿着革命的方向推动左派领导人。这种错误政策几乎把汪引入反革命营垒。冯的态度和汪自身的无能为力，又使汪变得容易接受我们的影响。应当支持他同反动派决裂，支持他去广东。应当在那里给他以全面的援助，以加强现实的政权。否则，共产党人将同意退出国民党，而左派领导人将受到反动派的影响。应拒绝左派分子为了同反动将领保持良好的外交关系而实行的背叛政策，并应真正为着革命的利益同国民党进行合作。如果我们不能给汪和邓演达指明前途，他们就会出国。在这种危机情况下，他们不在国内会导致左派的毁灭和整个国民党转向反革命一边。应当支持收复广东的计划。同时需要借助战略手腕保住我们在武汉的地盘。

考虑到对我提出的违反纪律的指控，我收回自己为执行收复广东的计划而继续在中国工作的建议<sup>①</sup>。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4—35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

<sup>①</sup> 见第 234 号文件。

242

##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

1927年6月29日于汉口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我非常惊奇地接到了以违反纪律为由召我回去的通知<sup>①</sup>。由于我不能取道上海返回，所以我不能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很快回到莫斯科。我想报告许多事情。在所附的报告<sup>②</sup>中引用了一些重要消息，您可以根据这些消息行事。是的，这里有严重违反纪律的行为，但罪犯不是我。应当向这样一些人提出指控：他们一个月来恬不知耻地无视莫斯科的详细而不止一次的指示，一直实行几乎毁灭共产党、断送革命形势的政策。尽管有对我的荒唐指责，我还是对于我执行了正确的革命政策而感到满意，这在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整个活动时期可能是第一次。我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我忠实地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行事。莫斯科最近的指示只是证明，从我到这里时起，我始终执行了正确的政策。共产国际在借助荒唐的指控损害我的名誉的同时，承认我的所有建议都是正确的，并根据这些建议采取了行动，这个事实令人振奋。我希望从政治和组织角度彻底改变这里的领导。不能把进行有千百万群众参加的革命的任务委托给社会民主主义的和半国民党的领导人。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① 见第232、233号文件。

② 文件没有找到。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6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243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 114 号（特字第 92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6 月 30 日于莫斯科

听取：3. ——关于中国问题（政治局 1927 年 6 月 23 日会议第 112 号记录，决定：5），（报告人：伏罗希洛夫、加拉罕同志）。

决定：3. ——（1）给上海发去指示：最高领导机构主张加强瓦解军队的工作，即在蒋介石、冯<sup>①</sup>和其他军阀的军队中开展群众性的革命工作，主张士兵同工人和农民进行联欢，让他们携带武器单独地和成群结队地转到起义的工人和农民方面，揭露和消灭反革命军官，动员群众，但表示坚决反对立即起义和挑动帝国主义者占领城市的方针。在目前条件下，这种方针是不能容许的，是极为有害的。

（2）给武汉发去指示：你们应自己决定退却方向的问题。我们认为有必要再次强调指出，可以通过开展群众运动和土地革命、武装工农和使国民党民主化来挽救革命。6 月 29 日已寄出 100 万

---

① 冯玉祥。

美元，日内我们还将寄出 50 万美元。

(3) 重申政治局原先让罗易返回的决定<sup>①</sup>，建议他准备经最安全的路线立即动身。

(4) 根据斯大林的要求以他的名义发出汇款电报。

(5) 建议共产国际成立在紧急时刻有权以共产国际名义发出必要指示的委员会。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契切林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5)。

## 1927年6月28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29.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29. ——给汉口发去以下电报：

“致鲍罗廷、加伦<sup>②</sup>、陈独秀：

冯与蒋介石的联盟实际上是反对真正的人民革命的联盟。将领们企图扼杀工农运动，通过同帝国主义者的妥协来解决问题，把中国置于帝国主义的经济保护之下，并在新的基础上确保大资本家和大地主的政权，同封建主和军阀达成妥协。冯背着国民党同叛徒蒋介石结成联盟是对革命的打击，因此，必须让武汉政府公开揭露冯的策略，并要求国民政府的一切支持者无条件地同背叛革命的冯划清界限，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1) 向冯声明，鉴于他采取了反对工农革命运动的立场并同蒋介石签订协议，共产国际中止同他的关系；(2) 建议武汉从冯的军队中召回顾问；(3) 不

<sup>①</sup> 见第 233 号文件。

<sup>②</sup> B. K. 布留赫尔。

再给冯进一步的援助。

尽管出现背叛行径，武汉不应退却或者在道路选择上发生动摇。武汉应当成为为中国另一种发展道路而斗争的中心，即真正的人民革命的中心，这种革命所表达的不是那些耍手腕、渴望获取战利品的将领们的意志，而是争取在工农民主专政下获得解放的广大下层民众的意志。只有在这条道路上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必须在国民党内采取使国民党民主化并让它领导群众性革命运动的大胆方针。在国民党面前有两条路：或者它将逐步地清除自己的取消派，不怕决裂，面向群众运动和土地革命；或者让半背叛者和蒋介石的秘密追随者来领导自己。必须为争取国民党的第一条发展道路而斗争。中国共产党应当开展强大的宣传运动和在不相信将领、只相信自己力量的口号下组织下层群众的工作。别放慢速度，主要是要在土地革命和使国民党民主化的基础上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在这一点上拖延和怠工无疑会使反动派取得胜利。如若依靠群众，尽管有背叛行为和暂时的、甚至是惨重的失败，最终都必然取得胜利。 最高领导机构”

抄送：

伏罗希洛夫、契切林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55—58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244

## 布留赫尔发表在《广州》杂志<sup>①</sup>上的文章 《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中的派系》

1927年6月<sup>②</sup>于武汉

### 北伐时期国民革命军中的派系<sup>③</sup>

#### 一、从广州到武汉

3月20日事件是北伐前夕广东政治形势的反映，当时蒋介石将军利用左派的软弱性和犹豫不决，发动了国家和党内的政变以及反共示威。

这是这样一个时期（自3月20日至北伐）：

1. 整个右的政策得到加强，在国家机关和军事机关中尤其如此。
2. 蒋介石在国家机关和国民党中的权力得到加强并宣布实行独裁。
3. 作为蒋介石推行右的政策的结果，他试图通过抵制国民党1926年5月15日决定<sup>④</sup>和提出共产党人退出国民党，而首先是

---

① 《广州》杂志系苏联驻华军事和政治顾问的机关刊物，1925至1926年间名为《广州布尔什维克》（第1—5期），从第6期起改名为《广州》，最后一期，即第11期于1927年6月在武汉出版，印数为25份。

② 日期是根据《广州》杂志出版的日期确定的。

③ 1926年8—9月日记摘录——布留赫尔注。

④ 指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通过的《整理党务案》。

退出他的军队（第1军和黄埔军校）的问题来彻底清除共产党人。

4. 他（蒋介石）的基础转移到军队中的孙文主义分子<sup>①</sup>身上。

具体地说，在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去和部分“左派”退出后，蒋介石让右派孙文主义分子占据军队和国家机关中的所有空缺职位。他为孙文主义分子创造有利局面，不仅是为了使孙文主义学会从（3月20日前的）非法组织变成合法组织，而且是帮助他们向共产党人和左派发动一些进攻。蒋介石在自己周围几乎聚集了清一色的“右派”和“孙文主义分子”（王茂如、缪斌等人），一开始就加强了在黄埔军和第1军中的地位，并企图把自己的势力扩展到国民革命军其他部队中去：他用撤掉海军原有指挥人员和行政人员，任命忠于自己的人员（虽然他们都不是海洋事务专家）的办法来控制海军。他对空军也做了同样的手术，只不过范围小一些。他任命国民党右派分子朱和中（胡汉民的秘书）为军械局局长，目的是把他拉到自己一边。蒋介石依靠师长中的右派分子，开始控制国民革命军的其他部队，如第6军第18师，这个时期以第18师师长——蒋介石以前的参谋长<sup>②</sup>为首的孙文主义分子在这里做了大量工作。另一方面，蒋介石全权掌握武器的分配，因此控制了所有指挥员，并只向那些他寄予希望和支持他的人发放武器。

所有这一切不可能不在其他派别和一些将领即军长们的情绪中反映出来。与蒋介石将军的活动相对抗的当时有两派：“有左倾思想的”（第2军、第3军和第6军）军长<sup>③</sup>和“广州派”即第4军军长李济深将军、第17师师长吴铁城等人。但是这两派由于下列原因都未能站出来反对蒋介石：

（1）他们当中的每一个人单独说来在军事上都比蒋介石弱。

① 指孙文主义学会成员。

② 何人不详。

③ 分别为：谭延闿、朱培德和程潜。

(2) 由于历史上的矛盾和个人利益他们不可能最终联合起来。

(3) 他们当中缺少一个公认的领袖。

(4) 对他们来说显而易见的是，他们采取局部行动都不会收到理想的结果，更何况有准备进行北伐的实际情况，而在国民政府地盘扩大的情况下国民革命军的每一位将领都把北伐看作是解决一切重大政治问题和个人问题的手段。

(5) 反对蒋介石的所有将军都认为，蒋介石在北伐中会下台。

总之，这个时期（3月20日至北伐）的特点是：

1. 右的方针业已形成，蒋介石独裁政权得到加强；
2. 国民革命军中具有左倾思想的分子试图联合起来反对蒋介石；
3. 客观上广州人和具有左倾思想的人有可能在“反蒋”纲领基础上联合起来。

北伐就是在军事政治派别的这种相互关系中开始的。孙逸仙博士就想过进行北伐，他打算先在华南，具体说在广东省站稳脚跟，然后北上，但问题是何时需要开始进行这次讨伐。

在这个问题上有不少分歧，首先，在我们队伍中间就有分歧。几乎所有人都承认，有必要进行北伐，但担心的是，国民革命的根据地广东，特别是国民革命军是否已强大到可以消灭北方军阀的程度。在这个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尽管原则上赞成进行北伐，但认为，目前尚不具备消灭北方军阀的条件，而这场战争是为保卫革命根据地（广东）而进行的一次规模不大的战争，是反对吴佩孚独裁的一次军事行动。中国共产党曾经多次指出一般劳动者特别是农民的极其艰难的处境，并建议不由他们而由有产阶级来承担军费开支。中国共产党的担心在于，第一，广州的军队不够强大；第二，国民政府的政治地位还不巩固，特别是3月20日事件后更是如此；第三，广州国民政府的实际政策未使群众感到满意。

另一方面，社会各阶层对北伐问题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商人

们议论说：不论战争结局如何，参加北伐的大部分军队反正要开往其他省去，并会解除商人交纳用于供养军队的税负，因此商人们都拥护北伐。

劳动人民，即工人和农民，由于生活十分贫困，希望通过北伐来改善自己的处境，因此也都支持进行北伐的主张。

“广州派”对进行北伐感到高兴，因为他们想摆脱外省人，想拥有一个广州人的广州。

各级将领，即便不是像上面所说的所有将领，在蒋介石独裁统治的“压迫”下，也会把北伐看作是改善自己地位的一种手段。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中国共产党和我们许多人的担心无疑是有根据的，这个问题还是没有在社会各界和中国将领中引起很大的争论，更何况，广东在经济上已经无法承受用于供养国民政府所有军队的如此巨大的开支。

除了这一切之外，还应补充这样一个情况，即一方面，湖南加入国民政府的事实，另一方面，吴佩孚向国民政府的湖南同盟者唐生智将军发动的进攻，使得人们甚至没有可能长时间思考：北伐是保卫国民政府的领土，还是为了消灭一些军阀及吴佩孚，以便为国民政府占据一些新的省份而发动的进攻。

如果我们说，在北伐开始时，其参加者和国民政府都不清楚这次讨伐的目的，或许更为正确。

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很快决定：从广东国民政府的部队中抽出12个师和从广西省调来9个团用于反击吴佩孚的进攻部队。这种做法没有遭到我们的反对，因为如果我们表示反对，我们不仅不能制止他们的进攻，而且还会在某种程度上损害我们在国民政府和中国将领中的威信。

从北伐一开始就有两种观点发生了冲突：一方是国民政府（蒋介石），另一方是唐生智将军。国民政府想把自己的所有广东部队调入湖南，然后再向吴佩孚发动全线总攻，而唐生智虽然拥

有援军较少(广西部队和第4军的两个广州师,唐生智与这些部队有联系并认为它们是自己的盟友),但具有很大的政治资本——他是国民政府和国民革命的拥护者,他想用自己的部队在没有竞争者情况下占领湖南,然后再向武昌、汉阳、汉口挺进。唐生智将军只实现了这个计划的第一部分。虽然国民政府拖延了时间,但是唐生智还来得及转入进攻,并且占领了长沙(湖南省的中心)和常德,因此,他不仅捞到了政治资本,而且还赢得了为自己部队向这些城市征税的机会。如果说在攻克长沙、常德之前,唐生智将军对自己的行动还感到信心不足的话,那么在首战告捷之后他就有了十足的信心,并开始显示他在北伐中的重要作用。最初的成功促使唐生智去思考如何进一步实施他的庞大计划,这个计划在当时不只是一是要占领湖南和湖北,而且还要把湖南、湖北、广西,可能还有四川、贵州等省统一到自己的领导之下。唐生智这样想是有一些理由的,因为他在上述省份中已经拥有部分同盟者和军事力量,以后还想扩大这些力量。

唐生智打算如何和使用什么力量来实现自己的计划呢?讲一点有关唐生智将军的情况。他是一个新型的但又很有抱负的人物。不久前他还担任下级指挥职务,在谭延闿将军(当时是湖南的督办)和赵恒惕将军在湖南争斗期间,唐生智是湖南西北部常德地区的一个旅长。那时他与吴佩孚有联系,曾利用吴佩孚来获取武器和加强自己的实力。在吴佩孚与赵恒惕争斗期间,唐生智面临这样一种选择:或者与吴佩孚达成协议,或者与国民政府联合。他选择了后者,认为吴佩孚的地位不巩固。唐生智向广州声明:他准备服从国民政府。同时他在湖南一些社会团体中开始实行某些“左的”政策,竭力依靠这些组织的支持。他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谈判,指望通过他们同苏联建立联系,而且不是作为国民政府的代表或其一部分,而是作为一个独立的单位。当时,以至现在,我们都难以确定他的真正政治面目,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唐生智将

军是个有实力的人物，一方面，他将毕业于保定军校的上述省份的指挥人员团结在自己周围，另一方面，利用国民政府的政治资本，甚至讨好一些社会团体和党派组织（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力图实现自己的计划，可能还试图“与中国的元帅们并驾齐驱”。早在国民革命军部队向吴佩孚发动实际进攻之前，即我们还在长沙的时候就得出了这个结论。当时我们只希望在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攻克武昌时局势发生有利的变化，因此我们曾认为，唐生智的胃口会变得小一些。为了十分认真地对待唐生智这个人物和他在其他军事单位中的军事力量，我们把他当时的军事基础同北伐部队集结时驻扎在湖南地区的其他国民革命军部队作一比较。

广东和国民政府同盟者的主要部队是：第1军（2个师），第2军（3个师），第3军（3个师），第4军（2个师），第6军（2个师），总共12个师；第7军（9个团）和第8军（5个师和一些独立团，总共28个团）。

乍看起来可能会觉得，国民革命军的老部队不仅“更革命”，而且在数量上也比稍后投靠国民政府的部队（第8军再加上第7军）多。实际上，真实情况并非如此。

按政治倾向和派别，当时这些部队可以分为3个集团：

1. 以蒋介石将军为总司令的第1军各部；
2. 第2军、第3军和第6军；
3. 第8军、第7军和以唐生智将军为首的第4军第10师。

第1个集团是什么情况呢？这是蒋介石将军第1军的2个师（第1师和第2师），他在制造3月20日事件时靠的就是这两个师。在广东他首先装备了这两个师：运去了大量的步枪和机枪，（在这2个师中有50多挺俄式机枪），他竭力不让共产党人进入这两个师，然而却给予王懋功、缪斌等右派孙文主义分子的领袖以充分的活动自由（王懋功曾是师长，在北伐时任拥有2个师的第1军军长，而缪斌曾是第2师的政治部主任，北伐时被任命为第1

军的政治委员)。

由于蒋介石以及第1军的直接领导者王懋功、缪斌等人所实行的政策，第1军在部队集中时遇到了全面危机，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在军事上都崩溃了。我们在该军看到的士兵大量逃跑现象，在国民革命军的任何一个部队中都未发生过。只要指出该军逃跑士兵的数量已达35%，就足以看出该军当时的状况了。在部队从广东开往河南之后不久，抵达郑州之前，尚未到达部队集结地点，这两个师就只剩下约4000人了，而且士兵逃跑现象还未停止。

这种现象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他感到他最后的靠山正在瓦解，于是神经质地采取了一切可行的措施：立即撤换了（第2团、第5团和第6团）三个团的团长<sup>①</sup>，其中两人是孙文主义分子，要求该集团长官迅速从广州召回他以前拒绝接收的第2师顾问<sup>②</sup>，建议政治部主任<sup>③</sup>派出一大批政治宣传干部，而当这位主任说宣传干部中大约30%是共产党人时，蒋介石不仅表示同意，而且还声称：“这更好，能不能再增加他们的数量？”针对自己部队的这种状况，蒋介石在许多俄国同志在场的情况下对该集团的长官们说：“不能允许黄埔第1军在尚未到达前线时就崩溃和毁灭。”

若是客观上不需要我们支持蒋介石整顿他的部队秩序，那么他采取的所有这些神经质般的措施也不会带来积极结果。这一点不仅对我们来说是显而易见的，而且对蒋介石本人来说也是显而易见的。另一方面，蒋介石知道，大家对他的这两个师都有敌对情绪：第2军、第3军和第6军之所以有这种情绪，是因为他的部队不仅吞噬了更多的钱财，而且还吞噬了在北伐开始前从苏联获得的武器装备，因而损害了其他部队；而以唐生智将军为首的

① 何人不详。

② H. A. 舍瓦尔金。

③ 邓演达。

第8军和第7军之所以有这种情绪，则是因为第1军是蒋介石“总司令”的基础，他们只是在表面上暂时承认蒋介石这位“总司令”。

由此可见，由于第1军各部队状况的恶化，蒋介石将军开始惊惶失措起来，一会儿向右摇摆，一会儿向左摇摆，这位“冒牌独裁者”以前那种广东腔也降到了最低点。另一方面，第1军和他本人地位的恶化客观上迫使蒋介石承认自己在3月20日所犯的错误，并促使他向左转，去纠正自己的错误，尽管为时已晚。他完全正确地意识到，他的部队瓦解的原因是他3月20日后所推行政策的结果，这个政策就是他不让共产党人呆在他自己的部队里（3月20日后他毫无例外地赶走了所有共产党人），而依靠右派分子。

这就是为什么他要改变他在广东的做法：请共产党人到他的部队中工作，同我们接近，最后开始听取我们的建议，更确切地说，是执行我们的所有建议。

国民革命军部队的第2个集团是第2军、第3军和第6军。虽然表面上它们彼此没有联系，但蒋介石（在3月20日后）所实行的政策客观上已把他们置于这样的境地：他们彼此间必须力求达成协议。如果不是北伐延缓了这种联合，那么这种联合在广东就可能实现了。至少，这个集团，一方面因为怀有在广东时的旧恩怨，不完全想支持蒋介石将军，另一方面，这个集团也不可能承认唐生智将军这个新人物，特别是第2军和第6军，因为这两个军的军长都是湖南人<sup>①</sup>，也像唐生智一样，觊觎湖南的“宝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集团在客观上必然要采取某种独立立场，彼此之间能达成部分或全面的协议。

战役开始时，我们就发现程潜将军（第6军军长）与谭延闿

---

<sup>①</sup> 分别为：谭延闿和程潜。



将军(第2军军长)以及与朱培德(第3军军长)接近的一些征兆。

实际上,是共同的反蒋情绪把他们联系在一起了,但表面上他们都声称必须让蒋介石撵走的汪精卫回来。

直至战役开始前,我们应对这个集团采取各种措施,使它们团结在左的纲领基础上,这是考虑到,第一,这些部队无疑是国民政府忠诚而可靠的部队,第二,应该让国民政府的广州部队联合起来,以便不给“令人讨厌的”人物唐生智将军及其最强大的军事集团提供制造某种突然事件的机会,更具体地说,不让他实行军事独裁,更何况他也不会有竞争对手。

最后,第三个军事集团。这个集团的基础是以唐生智将军为军长的第8军各部队,其同盟者是第7军和第4军第10师。后面这两个军之间的友好关系和往来已不是什么新鲜事,这些部队早在到达湖南之前彼此之间就有密切联系。此外,代表国民政府同唐生智将军进行的谈判,不是通过别的什么人,而恰恰是通过广西人(X军<sup>①</sup>)白崇禧将军和陈铭枢将军(第10师师长)。

这个集团当时的行动纲领(可能还没有相应的政治纲领),就是联合所有毕业于保定军校的将军们。这种联合毫无疑问实现了,并且在军事力量方面拥有十分坚实的基础。这个集团的力量格局是:唐生智的第8军居第一位,这个军不论在数量上还是在质量上都高于其他所有部队。唐生智的这个军不是杂牌军,而是青一色,其骨干——全体军官团结一致;他们不仅是同一所学校(保定府)的毕业生,而且还是与唐生智一起成长和升迁的人。唐生智的升迁就是这些军官们的升迁;后者也懂得这一点。唐生智军队的成长类似于冯玉祥军队的成长。它的领袖毫无疑问过去是,将来(至少在最近时期内)还是唐生智将军。

<sup>①</sup> 编号分辨不清,应为第7军——译者。

当时这个军有士兵不少于 15000 人，而且还有一个庞大的扩军计划；为了在即将到来的战斗中，依靠敌人的那些动摇的部队组建一些新的单位（以前唐生智与这些部队有联系），已经成立了几个师级和团级的司令部。这个军总共有 28 个团，其中有些团只设立了司令部，以便将来补充人员。唐生智实现了这个扩军计划，并且在最初几次战斗中，就将自己的军扩充到 2 万到 2.5 万人。

第 7 军现有的军官绝大多数都是来自保定府，该军是第 8 军的忠实盟友。诚然，第 7 军军长李宗仁不是保定人，甚至还反对过保定人和第 8 军，例如在北上问题上他就不指望广州部队和其他部队，但是如果注意到，他同时也反对黄埔派（对此当时李宗仁并不隐讳），那么他对第 8 军还是有某种倾向性的，何况第 8 军军长曾资助过他（第 7 军从唐生智那里得到将近 30 万墨西哥元）。这种联系由于存在以下情况而更加加强了，这就是李宗仁将军身边的人，如军参谋长胡宗铎、旅长夏威等人，都是保定军校毕业生，是整个第 8 军和特别是其军长唐生智的明显支持者。胡宗铎将军是第 7 军保定毕业生中最突出的人物，他的一切行动都遵循唐生智的指示，恰恰反映了唐生智隐蔽的意见和愿望。还有一个重要人物，即保定毕业生——广西人白崇禧将军（北伐时期总司令部参谋长）应算作第 7 军的人。由于第 7 军军长李宗仁将军的意志不特别坚定，所以白崇禧这个人物在第 7 军中就具有头等重要的作用。在该军的指挥人员中，他曾享有，或许现在还享有很高的威望。另一方面，白崇禧将军当时仇视蒋介石总司令，暗中打着各种旗号竭力贯彻“自己的”意图，他的意图是符合第 7 军利益的，最主要的是征得了唐生智将军的同意，也可能是听取了他的指示。

这就是为什么在考虑到当时存在的各政治军事集团的倾向情况下，我们应把参加北伐的有 7500 人的第 7 军算作第 8 军和唐生智将军的支持者。第 7 军驻扎在湖南时其部队的态度就是这样；

这种态度应有变化，并决定于武昌未来的事态发展，以及广东的政治形势，因为广西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更依附于广东而不是湖南。

第8军的另一个支持者是第4军，当然只是它的一部分。这个军是以一个师为代表的，即以陈铭枢将军为首的第10师为代表，这个军不仅与第8军和唐生智将军有联系，而且对唐生智个人也有政治影响。陈铭枢将军是保定毕业生，与第8军的联系首先是通过唐生智，他与唐生智保持着同学时期的旧友情。如果说唐生智将军是保定派中公认的军事实力派，即领袖，那么唐生智则把自己的亲密朋友陈铭枢将军看作是自己在理论和政治问题上的一个好的顾问，更何况唐生智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较薄弱。应该说句公道话，陈铭枢将军不论在军事理论上还是在政治理论上不仅都比唐生智强，而且他还是中国为数不多的一个对理论问题感兴趣的将领。他对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各种新东西都很了解。一个有趣的情况可以证实这种说法：陈铭枢将军曾建议第4军的俄国顾问<sup>①</sup>作一个关于新经济政策的报告；作这个报告的时候，陈铭枢根据列宁关于这个问题的所有文章作了一个很长的副报告。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在唐生智将军那里也有陈铭枢对新经济政策感“兴趣”的反应，在那个时期唐生智就这个题目同自己的俄国顾问<sup>②</sup>和中国共产党人进行过长时间的交谈。对新经济政策的这种同时感“兴趣”说明这样一点，陈铭枢向唐生智指出了根据新经济政策所采取的一些措施的好处。唐生智开始把陈铭枢的这些指教作为自己的经济纲领提出来了。而且没收大工业、大土地及其他财产的问题引起了他们的兴趣，不过有一点“小的”差别，即实行这种没收政策只是为了以唐生智为首脑和以陈铭枢为其主要政治顾问的政府。

还没有发现整个第4军（即正在进行北伐的各师）与第8军

<sup>①</sup> B. E. 戈列夫。

<sup>②</sup> Ф. И. 奥利舍夫斯基。

有特殊关系。副军长陈可钰、第12师师长张发奎对于这个集团没有好感。这种联系只是通过第10师这条线进行的，更确切地说，是通过它的师长陈铭枢将军个人进行的。由此可见，第4军第10师不仅有保定府系统的第8军的一个一般同盟者作首领，而且还有一个强有力的政治人物陈铭枢将军<sup>①</sup>，此人是唐生智的朋友，也是他未来施展各种政治和军事诡计的主要政治顾问。

除该集团的上述同盟者即保定军校毕业生外，还应该指出几个将军、北伐中的同路人，唐生智逐步把他们拉到了自己方面。

对北伐军事力量的统计结果表明，我们拥有唐生智将军的这个最强大的集团，这个集团由第8军、第7军、（第4军）第10师及北伐的同路人组成。这个集团有3万多人。此外，该集团还拥有像唐生智、陈铭枢、白崇禧等将军这样一些并不笨拙的领袖人物。这个集团的领导者们当时是团结一致的，他们感觉到自己有实力，并开始适当的情况下显示出来。我们越接近武昌，就越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那种有组织的压力。这就是为什么在估计实力以及在北伐和国民革命的事态发展中寻找合力的时候不能不重视这个集团。

向武昌—汉口的进攻就是在这种军事和政治力量对比情况下展开的。

我们曾考虑到，武昌和汉口不仅是地理上的要地，而且当时在中国人的观念中还是一切政治、军事、党派、财政和其他许多重要人事问题的象征的地方。在占领武昌之前，我们只是看到了未来严重分歧的端倪，因此我们应该做好到武昌去的准备，并在占领武昌前应对所有这些集团有我们自己的看法。我们在长沙面临这样一个问题：我们应对湖南及其以外的现有政治和军事集团，特别是对蒋介石将军这位北伐军总司令和唐生智将军这位必将在

<sup>①</sup> 原文如此。

武昌起很大作用的新的军事政治因素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在长沙出现的分歧实际上并没有解决，因为所有集团的代表都希望并要求尽快在武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和党的全国代表会议。可以说明这一点的是：所有对广东事件抱怨的人，不论国民党的左派和右派，还是党外团体，都想在这次中央全会上提出自己“当前极为重要的”问题。更具体地说，这些集团和派别为了夺取党、政府和国民运动的领导权都想组建自己的帮派。

我们预见到，在武昌将会比以往任何时候和任何别的地方都更强烈地感受到财政危机、政府危机和政党危机。即将在武昌开展的讨论不仅应该是本省范围内的，而且应该是全国性的，所以早在长沙就提出了召开国民会议的口号。

在长沙，各军事集团，具体地说，以唐生智将军为首的保定派和总司令一派，即使不能发挥第一位的作用，也应发挥不小的作用。唐生智和总司令都力图拉第一把小提琴。

如果说，唐生智及其集团在占领武昌前表面上只是希望得到湖南省并首先进入武昌，那么在占领武昌之后，唐生智就可能提出湖北问题，以及在这两个省和在军事指挥中的优势地位问题。随着唐生智的部队进攻武昌，他的部队人数增加了，武器装备也增加了，同时他的胃口也增大了。从唐生智想独立自主的角度来看，长沙—武昌因素对于他来说是很有意义的。他面临一个问题：他是同国民政府和蒋介石总司令在一起呢，还是像我们在前面所提到的那样，沿着几省“元帅”独立自主的路线走下去？我们当时就倾向于认为，如果唐生智将军试图跟国民政府一起走，而不能保证自己在国民政府中占据首要地位，那么他就会选择第二条道路——去当元帅并与更强大的力量建立联系并依靠这些力量。我们认为，他可能也像冯玉祥一样与国民政府建立联盟。也不排除一旦与国民政府决裂他与孙传芳联合的可能性。

蒋介石集团在进入武昌之前并没有发挥而且也没有打算发挥

特殊的作用。首先是因为在军事上他的集团（一个军）比北伐中的任何一个军都弱，其次蒋介石由于在广东推行自己的政策又引起了所有将军的反对。

鉴于这种情况，我们在到达武昌前的首要任务，是坚持寻找平衡哪怕是大体平衡的方针，为此我们曾尽力做到：

（1）不加速蒋介石的垮台，因为蒋的垮台意味着唐生智将军的上升，我们不了解此人，甚至我们感觉到，他可能会在北伐过程中为国民革命制造很大的麻烦；

（2）采取一切措施使第2军、第3军、第6军和第4军的一些部队在左的行动纲领基础上互相接近，尤其是要使其中的每一个军都不反对这样做；

（3）试图从唐生智那里拉过来一些部队，首先是把第7军和第10师拉过来，在这些部队中我们可以做这方面的工作。

不论我们还是中国同志，在长沙都面临着这样一个基本问题：是支持蒋介石还是支持唐生智，湖南的共产党人认为，唐生智比蒋介石左，他们举出许多证据，不过都是些没有多大意义的证据，同时他们强烈反对蒋介石，提到3月20日事件、他的“独裁”等等，等等。我们觉得，中国的同志一方面没有考虑到各种军事集团的实力，另一方面对蒋介石怀有历史上的恶感和仇恨，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有偏见，不能客观地对待问题。我们还认为，无论唐生智还是蒋介石都不是左派，所以不存在用这一个替换另一个的问题，何况蒋介石在这个时期已感到自己虚弱，绝对听我们的话，并且向我们提供在部队中自由工作的机会，而唐生智并没有表现出同我们接近的特别迹象。我们认为真正的左派只有汪精卫一人。

（待续<sup>①</sup>）

---

<sup>①</sup> 文章的后部分没有找到。

《广州》，武汉，1927年6月，第11期，（未标注页码）。

245

## 沃兹涅先斯基给拉斯科尔尼科夫的信

1927年7月6日于莫斯科

亲启 秘密

亲爱的费多尔·费多罗维奇：

由于没有时间，我未能在冯玉祥与蒋介石达成协议之后就苏联如何对待冯玉祥的问题答复您1927年5月5日在莫斯科市委咨询会议上就中国问题向我提出的咨询。因此，我现在用书面形式答复您，并抄送莫斯科市委党务工作办公室。我认为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因为我所阐述的想法，不仅仅是我个人的想法，而且也是许多中国同志和其他东方国家同志的想法，这些同志对中国和远东多少有所了解，他们决不是到东方进行例行巡回演出，追求暴利的演员。

首先，我认为，您的观点，即拉斯科尔尼科夫同志的观点，是十分错误和危险的，根据这种观点，必然要把张作霖、冯玉祥、蒋介石及其一伙混为一谈，把他们看作是“白匪分子”、“坏蛋”、外国资本的“走狗”等等，因而在苏联的报刊上对他们不加区别。

许多同志觉得，对共产国际执委会和苏联的策略方针，应该明确地加以区分。

许多同志觉得，到了该提出由张作霖或领导他的那些势力的另一个代表人物夺取中东铁路的问题的时候了，或者该提出所谓

该铁路国际化，即由帝国主义财团控制（当然是在预先没收该铁路并完全排除苏联参与对它的管理工作之后）的问题的时候了。我们苏联，不仅在与冯玉祥的关系上，而且在与蒋介石的关系上，都应从这个前景出发。

苏联政府与党的功勋宣传员不同，不能也不应该在中国革命危机的日子里只凭感情用事，就好像您希望的那样（就像联共反对派利用绝望甚至惊慌失措来进行投机一样）。我们应该考虑那些在客观上仍然为我们因而也为革命工作的力量。现在蒋介石、冯玉祥及所有与他们有联系的大大小的派别和集团都在同张作霖和帝国主义者进行斗争，虽然他们根据需要时而与这个时而又与那个帝国主义政府达成暂时的和解，但是几乎总是为了同另一个帝国主义政府进行斗争——迄今为止他们都在帮我们的忙。他们是对我们有利的力量。而这种力量，很遗憾，目前要比“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的世界上最优秀的一个中国共产党的58000多名昙花一现的党员”更加现实，要比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作出决议后揭竿而起的“1000万农户”以及目前已遍布全中国的红樱枪和饥饿者的运动更加现实（因为正如明朝人和太平天国<sup>①</sup>的历史经验教导我们的那样，为了发展中国农民运动需要数年，甚至数十年时间，付出的代价不是牺牲数千人，数万人，而是数千万人），要比真正英勇的工会组织更加现实，虽然它们“完全处于共产党人的影响之下”。唉，情况就是这样。另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面对着这样一种局面……<sup>②</sup>我们这些有罪的人在想，最近两年，中国的条件非常有利，但农民运动却很少发展，这种情况多少是由于我们的错误造成的，因为许多同志，其中也包括您在内，都认为，促使共产党到国民政府和冯玉祥政府地区开展运动是不合时宜的，因为当时需要冯玉祥光彩夺目的业绩，而我们过高地

<sup>①</sup> 原文如此。

<sup>②</sup> 此处及以下删节号是原有的。



估计了他的力量，现在却又对蒋介石和冯玉祥的力量估计不足（只要读一读伊文从上海发回的报道《蒋介石的领地——孙传芳的世袭领地》，就会明白这一点）<sup>①</sup>。

事实终归是事实。准备处死任何一个散发着共产主义气味的阿富汗人的阿富汗埃米尔<sup>②</sup>并没有被您推翻，也没有被苏联机关宣布为“坏蛋”、“反革命分子”等等<sup>③</sup>，而孙逸仙为了与吴佩孚作斗争曾经和张作霖达成协议——此举大概我们不会不知道或不同意吧<sup>④</sup>。那么，现在的这种歇斯底里又从何而来的呢？

因此我觉得，目前用彻底烧毁通向蒋介石和冯玉祥之桥的精神去教育苏联的社会舆论，是不明智的幼稚的儿戏。

再过一个月，也许是两三周，当我们不得不为维护我们在中东铁路上的地位而去寻找蒋介石和冯玉祥这样的客观同盟者以反对张作霖时，您又该说什么呢？昨天在您这里的宣传标语上，冯玉祥几乎同陈独秀和谭平山一起被说成是人民英雄，而今天却被说成是“坏蛋”、“叛徒”等等，明天当“58000”名共产党员和“1000万”起义农民只剩下数百名或许数十名英勇的战士时，当然还有我们远东局的正式的乐观报告和伊文的报道，您又该怎么说呢？

莫非您认为，可以这样轻易地戏弄苏联的社会舆论，戏弄普通党员？他们分析中国的事态早就不比您差了，不过现在他们保持着沉默，因为他们怕帮反对派的忙……或者因为他们怕说出自己的想法。

遗憾的是，我们并非没有受到党内反对派的某种影响而夸大

---

<sup>①</sup> 见 A. 伊文：《在蒋介石的营垒里》，载 1927 年 5 月 7 日《真理报》；又见他的《帝国主义者在中国已不再欢呼雀跃》，载 1927 年 6 月 1 日《真理报》。

<sup>②</sup> 阿曼努拉汗。

<sup>③</sup> 1921—1923 年，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为苏联驻阿富汗的全权代表。

<sup>④</sup> 关于苏联对待孙逸仙与张作霖联盟的态度的详细情况，参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第 1 卷。

了中国革命取得的成就。国民革命运动刚刚开始时，我们把它看作是革命运动的高潮；反帝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刚刚开始时，我们把它看作是革命已转入“社会主义轨道”。我们错了。

为什么还要犯第二次或许是更加无法挽回的错误呢？为什么还要往饮用的水井里吐痰呢？请您想一想吧。

至于您说：只有您了解中国问题和我们的政策，而“我一点也不明白我们的政策”，那就让听过您的“咨询”的听众去作出判断吧。我只是担心，您的自信是从《女独唱家陛下》的武库中借用来的。顺便说一句，请您看一下这部影片吧。那是很有教益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沃兹涅先斯基

核对无误：

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96，第 30—31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246

## 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和托洛茨基 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的信

1927年7月7日于莫斯科

### 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sup>①</sup>

来自中国的最新消息表明，指望武汉政府成为“有组织的革命中心”的政策遭到了彻底失败。在武汉政府的地区，反革命势力自由地组织起来了，而工人运动和农民运动却遭到了镇压。无论对于中国革命来说，也无论对于苏联来说，局势是极其严重的，因为中国革命的失败大大增加了军事危险。

有鉴于此，我们认为，很有必要立即召开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会议，与在莫斯科的执委会委员和候补委员一起来讨论形势并纠正共产国际在中国所执行的而且经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sup>②</sup>同意的错误方针。

武约维奇  
季诺维也夫  
托洛茨基

<sup>①</sup> 文件上有布哈林的标注：“请阅，H. 布哈林”，以及K. E. 伏罗希洛夫的签字和读过该文件的4个人的辨认不清的签字。

<sup>②</sup> 指1927年5月18至30日在莫斯科举行的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

核对无误：武约维奇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25，第 69 页。

打字稿，经过核对的副本。

247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紧急会议 第 116 号（特字第 94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7 月 8 日于莫斯科

听取：1.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1. 通过给中国共产党的以下指示，并送共产国际批准<sup>①</sup>。

（1）尽管我们一再提出忠告，但是国民政府实际上不仅不支持土地革命，而且还放开了敌人的手脚。解除工人武装、讨伐农民、进攻武汉工人组织，唐生智在长沙枪杀革命者，这些行动都是反革命的公开表演。武汉以唐生智为首的主要武装力量事实上已成为同蒋介石半结盟的，也可能是直接结盟的反革命分子的工具。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上层却在掩盖这一切，这样它们就转到工农的敌人的营垒里去了。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人不能留在政府里。我们认为，谭平山宣布休假的声明是错误的，是怯懦的：形

<sup>①</sup> 该文件的节录收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俄文版第 135—136 页。

式上仍留在政府里，不解脱党的责任，这样一来，谭不仅不能揭露正在进攻的反革命势力，而且还掩护了它们。共产党人必须示威性地退出国民政府，并要发表声明，说明国民政府对待土地革命和工人运动的上述态度是采取这一步骤的原因，同时要为共产党人参加武汉政府提出切合实际的要求，如工农运动绝对自由、严厉惩办镇压工农组织的一切罪犯、支持土地革命、满足工农群众的迫切要求、武装工农，等等。退出国民政府并不意味着退出国民党。共产党人必须留在国民党内，并在国民党的一切组织中和在拥护它的群众中，为改变国民党的政策和改组其领导机关人员进行坚决的斗争。声明中必须指出中国共产党参加国民政府时给自己提出的任务，必须要求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举行真正的民主选举，讨论国民政府的政策，等等。同时在会上要直截了当地提出支持土地革命和支持工人要求的问题，以及在此基础上改组国民党领导的问题。现在就必须着手在国民党的所有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中做相应的准备工作，必须在这些组织中作出决议，抗议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行径，提出进行土地革命的要求和工人的要求，以及根据这些要求召开国民党代表大会的口号。

(2) 中国共产党应该召开(最好是秘密召开)紧急代表会议，以便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纠正党的领导所犯的根本性错误。必须采取各种措施保存党。为此，在武汉地区还需要组织党的地下机关，并将受威胁最大的工作人员转入地下。你们要考虑到以下新情况：1. 在武汉，优势在反革命势力一边。2. 国民党上层和武汉政府受制于将军们，掩护反革命势力。3. 共产党应在实际上和通过它的领导机关成为工农群众革命运动的中心。否则，它作为一种革命力量就会毁灭自己，它不仅会被消灭，而且会失去自己在群众中的威信。

仅致银行家和乌拉尔斯基<sup>①</sup>：

为了不被驱逐，我们建议银行家离开那里。银行家的离开应该提出最合适的方式和理由。

抄送：

皮亚特尼茨基、伏罗希洛夫、契切林同志

中央委员会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65—66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48

##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摘 录)

1927 年 7 月 8 日于索契

亲爱的维雅切斯拉夫：

(1) 在拍发我关于中国的长篇密码电报<sup>②</sup>时，我既不知道唐生智的阴谋诡计，也不知道与此有关的武汉政府的行为（我手头也没有关于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武装的材料）。显然，如果有这些

---

<sup>①</sup> 分别为 M. M. 鲍罗廷和 B. K. 布留赫尔。

<sup>②</sup> 文件没有找到。

材料，您就有根据作出新的指示<sup>①</sup>。只要能利用武汉的上层人士时，我们就利用他们，现在应该抛弃他们。应该尝试去掌握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并使之与今天的国民党上层相对立。国民党的地方机关受到军队中飞黄腾达的人的迫害，这说明完成这项任务是有基础的。因此如果有可能，就应该做到：暂时不把退出国民政府（现在这样做是必要的）与退出国民党（最近的将来这样做可能是必要的）联系起来。

敬礼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俄文版第73页。

249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秘密会议第33号记录 (摘 录)

1927年7月8日于莫斯科

绝密

特别文件

出席：布哈林、库西宁、列梅勒、布朗、什麦拉里、皮亚特尼茨基、曼努伊尔斯基、彼得罗夫斯基、彼得罗夫<sup>②</sup>、马吉、蔡特林和海默同志。

<sup>①</sup> 见第247号文件。

<sup>②</sup>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听取：13. 中国问题。

决定：13. 布哈林同志提出的致中国共产党的电报稿<sup>①</sup>，在讨论过程中经修改和补充<sup>②</sup>后，被一致通过。批准常务<sup>③</sup>委员会提出的常设中国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委员——布哈林、彼得罗夫和布朗同志，候补委员——马吉同志。

鉴于中国最近发生的事件，为共产国际执委会起草一份公开声明，批评中共中央的错误。责成常设中国委员会起草这个文件。期限3天。通过征询主席团委员们意见的方式批准该文件<sup>④</sup>。

听取：14. 武约维奇、季诺维也夫、托洛茨基同志1927年7月7日的信<sup>⑤</sup>。

决定：14. 此信备案待查。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459，目录3，卷宗25，第117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① 见第249号文件。

② 电文在皮亚特尼茨基同志处（文件原注）。

③ 原文如此。

④ 见《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当前形势的决议》，载1927年7月14日《真理报》；《共产国际和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俄文版第136—142页。

⑤ 见第246号文件。



250

## 拉斯科尔尼科夫给联共（布）中央 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的信

1927年7月9日于莫斯科

绝密

### 致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

亲爱的同志们：

民族资产阶级多数阶层脱离中国革命，这对小资产阶级来说不能不留下痕迹。在小资产阶级队伍里开始出现很大的摇摆。小资产阶级的这种政治不稳定性来自于它的社会本性，来自于它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所占有的中间地位。如果中国小资产阶级在革命危急时刻超越一般历史规律，并表现出坚决性和坚定性，那倒是奇怪的了。在冯玉祥和唐生智转向反革命一边之后，小资产阶级的怯懦软弱行为表现得尤为明显。国民党上层人士几天来都在讨论开除共产党人的问题。迄今为止，冯玉祥和唐生智都没有被宣布为变节分子。在国民党中央内部和国民政府内部，革命路线的拥护者和投降分子正在进行激烈的斗争，投降分子主张把共产党人驱逐出国民党，实际上是建议让武汉革命中心自行消亡，使它变成反革命资产阶级的武器。在这种时刻，我们的任务是，最大限度地支持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内的革命派，同时毫不留情地批评和揭露主张投降的人。现在威胁中国革命的最大危险，是与小资产阶级联盟的破裂，这将导致工人阶级的孤立和在现阶段

对土地革命运动的镇压。

因此，目前宣布武汉政府为反革命政府或在转向工农的敌人一边<sup>①</sup>，这除了不符合实际外，也是极其有害的。同样，目前在中国开展反对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运动，也是很不合时宜的。这样做只会促使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决裂，导致中国共产党的完全孤立。不能把国民党的状况同英国工党的状况相提并论。英国共产党人在英国工党中一直处于不承担责任的反对派地位，而中国共产党人不仅一直进入国民党中央，而且还进入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并对国民党的政策承担一部分责任。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在向群众进行宣传鼓动时一直支持武汉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当然也批评和揭露它的错误和摇摆不定。

急剧地改变方针，特别是过早地不分青红皂白地把武汉政府列入反革命营垒，不会被国民党的群众所理解，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将不会跟我们走而会跟国民党中央走，他们已习惯于相信国民党，把它看作是孙逸仙遗嘱的捍卫者，是国民革命思想的体现者。

不能匆忙地一下子废除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sup>②</sup>的决议。为了贯彻这些决议，必须尽可能保持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努力带领他们前进，无论如何不能加速与武汉政府的决裂，同时要放弃反对它的运动。

从总结中国最近的事态发展中得出的第二个结论，就是作为土地革命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遭到了破产。像谭平山的挑衅性声明，即他不能领导要求采取军事行动的农民运动，或者是按照中共中央的建议卑鄙地解除工人纠察队武装的做法（这样中共中央就起到了李贝尔和巴格丹诺夫的作用），这样的事实不用解释本身就说明了问题。这些事实表明，在群众运动面前患恐惧症的小资产阶级正在对中国共产党施加强大的压力，而该党在运动的现阶

① 见第247号文件。

② 指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

段已表明自己完全没有能力领导土地革命。所以认为通过拼命推动中国共产党加速进行土地革命就可以改变事态的想法是幼稚的。必须严肃地批判和谴责中国共产党人的机会主义错误，但同时也应该注意到业已形成的障碍，在土地战线上暂时实行有组织地退却，停止继续加速进行土地革命。这并不意味着需要重新审查路线。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放弃没收土地的口号。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应该背离土地运动，相反，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和第八次扩大全会的总路线是绝对正确的。没收土地的口号应该贯彻执行。哪里可行，就必须在那里没收地主的土地。但同时要考虑到主观因素（作为中国革命的组织中心的中国共产党已遭到破产）和客观条件（中国革命的发展目前不是处在上升阶段，而是处在下降阶段，武汉政府拒绝协助实行土地革命等等），必须放慢进一步开展土地革命的速度，采取适合当地条件的灵活机动的策略，用这种方式来指导农民的自发运动，使之不致遭到明显的毁灭。我们希望把武汉政府变成实行土地革命的组织中心，这种愿望未能实现。中国共产党同样也表明自己无力成为这样的中心。没有组织中心，土地革命必然会四分五裂并将被各个击破。为了防止发生这种情况，共产党人必须深入到农民运动中去，建立并掌握农民委员会，必须深入到游击队中去，对其进行改组，提高他们的阶级觉悟和作战能力。

当然，在农民运动开展起来的地方，共产党人不应成为绊脚石，相反，必须掌握运动，以自己的政治经验使其更有成效并指导它走上更革命的道路。但是现在应当特别注意对土地革命主要地点的组织巩固工作，注意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实际上真正掌握土地革命的领导权。为了重新部署力量，同时也为了准备新的进攻，在土地战线上暂时实行退却，现在这样做也会为同小资产阶级的妥协创造现实的基础，并会扼制它向唐生智投降，防止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共产党遭到那种对于中国革命极为有害的孤立。

只有采取灵活机动的策略，我们才能保持与中国小资产阶级的国民革命统一战线。重新审查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一次全会对武汉和国民党的方针，过于直率和特别快速地实行土地革命，我们就必然会滑到对中国革命最有害和最危险的反对派行动纲领上去。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彼得罗夫<sup>①</sup>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4，第 266—269 页。

有修改手迹的打字稿，原件。

## 251

###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和布哈林的信

1927 年 7 月 9 日于索契

#### 致莫洛托夫和布哈林<sup>②</sup>

你们两个人真见鬼：你们征询对（关于中国的）新指示的意见，又不提供具体的新材料，真使我感到有点儿难堪。在新指示草案中提到唐生智和解除工人武装（“真正解除”，唐生智“实际

<sup>①</sup>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sup>②</sup> 在信上有标注：“已阅。布哈林。已阅。李可夫、A. 安德烈耶夫、M. 托姆斯基、伏罗希洛夫、米高扬。”

上成了反革命分子的工具”，等等)<sup>①</sup>，可是，第一，那里没有指明任何**具体的事实**，第二，任何报刊、(当时我手头有的)任何密电都没有谈到存在**这样的事实**。不仅你们使我感到有点难堪，而且可能我的冗长而相当严厉的回电也使你们感到难堪。

我收到你们的新指示草案后就断定：**那就是说**，反对派用大量新的“提纲”搅得布哈林和莫洛托夫不得安宁，他们终于向讹诈让步了，那就是说，克利姆<sup>②</sup>现在会很高兴，他可以**不向武汉支付款项**，因而对新指示满意地投了赞成票。如此等等。现在我看到，这一切并非如此。昨天我看了一整天信使带回来的新材料。现在我所担心的不是这些新指示是否已经寄出，而是寄出得晚了。我不认为，退出国民政府和国民党就可以改善共产党的处境和“使他们站稳脚跟”。相反，退出只会便于屠杀共产党人，造成新的分歧，可能还会造成某种分裂，但是，没有别的路可走，反正最终我们还得走上这条道路。这个时期需要经过，而且必须经过。

但是现在主要问题不在于此。主要问题在于，**目前的中国共产党能否体面地摆脱**这个新的时期(地下工作、逮捕、屠杀、枪决、自己队伍中的变节、挑拨离间等等)，成为坚强的、经受过锻炼的党，而没有分化瓦解，变成一个或几个小宗派。决不能认为已经不存在这种危险，也不能认为这次资产阶级革命和**未来资产阶级革命**之间不可能存在间隔，这与我们这里1905年和1917年(2月)之间有过的那种间隔相类似。此外，我认为，**这种危险**(我指的是中国共产党被分化瓦解的危险)比现在充斥中国的某些虚假的现实性更现实。为什么呢？因为，很遗憾，我们在中国没有真正的共产党，或者说，没有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如果抛开那些能够充当很好的战斗材料但完全不懂政治的普通共产党员，那么现在的中共中央能提供什么呢？除了“一整套”从各处

<sup>①</sup> 见第247号文件。

<sup>②</sup> 即K. E. 伏罗希洛夫。

收集来的、与任何路线和任何指导思想毫无联系的一般词句外，不能提供任何东西。我不想苛求中共中央。我知道，不能对中共中央要求过高。但是，有一个简单的要求，那就是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中共中央是否执行了这些指示呢？没有，没有，因为它不理解这些指示，或者是不想执行这些指示并欺骗共产国际执委会，或者是不善于执行这些指示。这是事实。罗易为此怪罪鲍罗廷，这是愚蠢的。鲍罗廷不可能在中共那里或者在中共中央那里享有比共产国际更高的威望。罗易自己曾说，鲍罗廷没有出席中共的代表大会，因为他不得不躲藏起来……<sup>①</sup>有的人（有的人！）对此解释说，这里的过错是同国民党合作，这种合作束缚了中共的手脚，使它不能独立自主。这也是不正确的。尽管任何合作总会多少束缚合作成员的手脚，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应该反对一切合作。就拿蒋介石的沿海五省（从广东到上海）来说，那里没有与国民党进行任何合作<sup>②</sup>。蒋介石的代理人在瓦解共产党人“军队”方面取得的成功要比共产党人在瓦解蒋介石后方方面取得的成功要多，这如何解释呢？许多工会脱离了中共，而蒋介石继续稳坐宝座，这难道不是事实吗？中共的“独立性”又是怎么样呢？……在我看来，原因不在于这些因素，虽然这些因素也有作用，而在于现在的中央（它的上层领导人）是在国民革命时期锻炼出来的，正是在这个时期受到了洗礼，但它完全不适应新的土地革命阶段。中共中央**不理解**新革命阶段的涵义。中央没有一个能理解所发生的事件的内情（社会内情）的马克思主义头脑。中共中央**不善于利用**这个与国民党合作的宝贵时期，去大力开展工作：公开地组织革命、组织无产阶级、组织农民和革命军队，实现军队革命化，促使士兵与将军**相对立**。整整一年，中共中央靠国民党养活，享受着工作的自由和组织的自由，但它没有做任何

<sup>①</sup>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sup>②</sup> 看来指的是广东省、江西省、福建省、安徽省和江苏省。

工作，以便促使被错误地称之为政党的（的确，有相当战斗力的）各种人物的大杂烩变成为一个真正的政党……当然，在基层是做了工作。而这方面的工作应归功于普通的共产党员。但是很有意思的是，不是中央走向工农，而是工农走向中央，而且工农越是接近中央，可以不客气地说，中央离开他们就越远。中共中央喜欢在与国民党领导人和将领的幕后交谈中消磨时光。中共中央有时也奢谈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但是，在这种奢谈中最令人不能容忍的是这样一个情况，即它对领导权一窍不通（真正意义上的一窍不通），扼杀工人群众的积极性，瓦解农民群众的“自发”行动，并把中国的阶级斗争归结为高谈阔论“封建资产阶级”（现在彻底弄清了，这一术语的创造者原来是罗易）。

这就是共产国际的指示未能被执行的原因所在。

这就是为什么我怕过早地让**这样的**党到“汪洋大海”中去自由游泳（它还来不及巩固就会被碰得粉碎……）。

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认为党的问题是中国革命的主要问题。

怎样医治在我们这里被错误地称之为中国共产党的这个大杂烩？召来陈独秀或谭平山也无济于事，当然，我并不反对把他们召来，教给他们一点东西。需要采取另一些措施。需要用汉语撰写一批比较好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书籍，这种书籍应该是有分量的，而不是由一些“传单”拼凑而成的，为此，现在就应该毫不犹豫地立即提供所需要的款项（克利姆可能说，这可要比供养它100个长痔疮的反革命官员半年的费用少得多）。其次，我们对中国军队建立顾问制度的操心太多（而这些顾问在政治上并不称职，因为他们从来不善于及时地向我们预告自己“上司”的过急行为）。现在到了着手在中共中央、中央各部、**每个省**的地区组织、地区组织各部、共青团、中央农民部、中央军事部、中央机关、中国总工会认真建立**党务顾问**制度的时候了。应该把鲍罗廷、罗易，以及在中国妨碍工作的所有反对派分子清除出中国。通常派到中

国去的不应该是我们不需要的人员，而应该是优秀的工作人员。应该这样来安排此事：让所有党务顾问在工作中形成一个整体，受**中央总顾问**（他也是共产国际的代表）的指导。鉴于现时的中央软弱、混乱，政治上不定形和业务不精通，这些“保姆”在现阶段还是需要的。中央将向党务顾问们学习。党务顾问将弥补中共中央及其地方上层人物的重大缺陷。他们（暂时）还是把现在的这个大杂烩固定成政党的钉子。

如此等等。

随着革命和党的发展，对“保姆”的需要将会消失。

算了，就此搁笔。

握你们的手

斯大林

又及：**收到此信后请告之。还请把你们的意见告我。**如果你们认为有必要，可以让其他政治局委员阅读。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俄文版第74—77页。



252

##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

(摘 录)

1927年7月11日于索契

亲爱的维雅切斯拉夫：

(2) 我看了政治局关于退出中国国民政府的指示<sup>①</sup>。我想，很快就得提出退出国民党的问题。为什么——等回来后再讲。据说，有人对我们的中国政策怀有忏悔的心情。如果这是真的，那是可悲的。回来后，我将努力证明，我们的政策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唯一正确的政策。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信我们对中国和对中国土地革命的政策的正确性。

斯大林

《斯大林给莫洛托夫的信（1925—1936）》，俄文版第77—78页。

---

<sup>①</sup> 见第247号文件。

253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会议第 34 号记录

1927 年 7 月 13 日于莫斯科

出席：布哈林、曼努伊尔斯基、什麦拉里、彼得罗夫<sup>①</sup>、布劳恩、皮亚特尼茨基、戈劳包夫、蔡特林、海默。

听取：1. 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中国革命时局的决议草案。

决定：1. 一致通过由皮亚特尼茨基和布劳恩同志作过一些补充的决议草案。

该决议应立即予以发表<sup>②</sup>。

为了在目前给予中国党以实际帮助，责成皮亚特尼茨基、彼得罗夫和布劳恩同志，根据皮亚特尼茨基同志的建议和业已通过的决议，起草给中国党的实际的组织方面的指示。

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125，第 128 页。

德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见本书第 401 页注④。

254

## 拉斯科尔尼科夫<sup>①</sup> 关于对中国共产党 采取组织措施的建议

不早于 1927 年 7 月 13 日<sup>②</sup>

绝密

### 对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方面建议

1. 向中国，包括向汉口和上海，派遣一批能够阐明我们的观点并能与中共领导人的机会主义作斗争的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中山大学的学生。
2. 必须召集上述两所大学中的中国共产党党员并向他们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方针（报告人：布哈林、彼得罗夫<sup>③</sup>、什麦拉里）。
3. 建议中共中央政治局立即召开中共中央全会，讨论共产国际执委会的指示。
4. 建议全会选出能保证无条件执行共产国际方针的新一届政治局（见第 6 条）。
5. 在中共所有地方组织中广泛开展一场揭露前领导机会主义错误和说明共产国际执委会方针正确性的运动。

① 本文作者是根据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主任公文用纸（全宗 495，目录 7，卷宗 3，第 43—46 页）上的亲笔签字确定的。

② 根据第 253 号文件确定的日期。

③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6. 建议中央全会讨论关于吸收布林斯基、邵和邓<sup>①</sup>同志参加党的领导工作的问题。

7. 根据这些指示责成中央全会立即着手筹备党的代表会议。

8. 认为有必要立即向中国派遣一名有影响的俄国工作人员，取代被召回的“银行家”<sup>②</sup>。（只打印两份）

全宗 495，目录 7，卷宗 3，第 47 页。

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255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 第 117 号（特字第 95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7 月 14 日于莫斯科

听取：2. 关于中国和中东铁路问题（报告人：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决定：2. [1] 责成外交人民委员部通过科兹洛夫斯基同志答复南京政府，暂时只以口头方式答复（因为没有收到准确的文本），苏联政府不同意南京政府对中共的政策和它对中共的评价，但是苏联政府和南京政府之间的关系问题处在两个国家正式外交

① 分别为：任弼时、可能是周恩来、以及邓中夏。

② M. M. 鲍罗廷。

关系的另一个层面上，因此苏联政府认为完全可以正常地调整它们之间的关系，何况苏联政府注意到南京政府发表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声明<sup>①</sup>，而帝国主义也是苏联的敌人。

[2] 从哈尔滨召回列格兰同志，让博戈莫洛夫同志取代他担任总领事职务。

[3] 警告外交人民委员部和多夫加列夫斯基同志，他们没有执行政治局今年6月9日关于在报纸上发表消息，说明多夫加列夫斯基同志对向中国派遣日本军队的意见的决议(第110号记录，决定：2)。建议中央书记处采取措施在最短的期限内履行这一决议。

[4] 作为对政治局今年5月26日决定(政治局会议第105号记录，决定：7—[1])的补充，允许外交人民委员部就其日常工作问题按正常程序同科兹洛夫斯基同志联系。

抄送：

契切林同志——全部；

伏罗希洛夫同志——[1]；

库比雅克同志——[3]。

听取：43.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43. 批准让鲍罗廷同志立即动身回莫斯科。

抄送：

契切林、伏罗希洛夫同志。

中央书记 莫洛托夫

---

<sup>①</sup> 在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其他领导人的讲话中都谈到了关于既同“白色帝国主义”(西方列强)又同“赤色帝国主义”(苏联)进行斗争的问题。例如，见《中国现代史资料选集》，北京1988年版第2册(1924—1927)第416—417页。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67、71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256

## 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 第 118 号（特字第 96 号）记录 （摘 录）

1927 年 7 月 21 日于莫斯科

听取：5. 关于中国问题（报告人：加拉罕同志）。

决定：5. （1）建议加伦<sup>①</sup>同志烧毁自己的档案。

（2）请共产国际主席团在国外广泛组织抗议在中国枪杀共产党员的运动。

（3）拨出 5000 元供安德烈同志<sup>②</sup>使用。

（4）满足阿马加耶夫同志的要求<sup>③</sup>。

（5）认为有必要由米哈伊洛夫<sup>④</sup>同志答复汪精卫的电报<sup>⑤</sup>。责成米哈伊洛夫同志将电报草稿分发给政治局全体委员。

（6）给加伦同志发去以下电报：“我们认为在目前形势下，我们的顾问继续在武汉军队中工作是不适宜的。请报告您对此的意

---

① B. K. 布留赫尔。  
② Г. И. 谢苗诺夫。  
③ 要求的内容不详。  
④ Л. М. 加拉罕。  
⑤ 电报没有找到。

见，以及召回的办法和方式，同时请告，您认为您继续留在武汉并在那里继续工作是否适宜。”

(7) 推迟讨论彼得罗夫<sup>①</sup> 同志的建议<sup>②</sup>。

抄送：

伏罗希洛夫同志——全部；

加拉罕同志——全部；

皮亚特尼茨基同志—— (2)。

### 1927年7月18日征询政治局委员意见

听取：32. 关于中国问题。

决定：32. 向武汉发去以下电报：

“致加伦、银行家<sup>③</sup>、柳克斯<sup>④</sup>。

根据党的纪律建议银行家立即动身回莫斯科。不经最高领导机构允许银行家不能任命自己的副手。从现在起乌拉尔斯基<sup>⑤</sup> 应按这里以前发去的指示管理资金。最高领导机构。”

7月18日发。

通过外交人民委员部加密。

中央委员会书记 莫洛托夫

全宗 17，目录 162，卷宗 5，第 72—73 页。

打字稿，原件，签字为真迹复制。

---

①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  
 ② 见第 254 号文件。  
 ③ М. М. 鲍罗廷。  
 ④ О. Ю. 普利切。  
 ⑤ В. К. 布留赫尔。

257

## 福京、纳索诺夫和曼达良给联共（布） 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团的信

1927年7月23日于莫斯科

### 致联共驻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团<sup>①</sup>

敬爱的同志们：

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批准了东方书记处和英美书记处新的组成人员，其中有像维经斯基这样极不受欢迎的人物。

把这样的人纳入东方书记处和英美书记处领导人之列，是与共产国际执委会最近关于中国问题的一些决议，与这些决议对中共中央机会主义领导的批评及其作出的组织结论完全背道而驰的。对中共中央的投降主义和机会主义策略应承担责任的不仅是中国的工作人员，而且是作为原共产国际代表的维经斯基。维经斯基几年来一直是共产国际执委会驻中国的代表，而且在中国同志们的印象中他还是联共（布）的代表，他不仅不传授我们党、我国三次革命和共产国际的经验，不仅不培养布尔什维克式的干部，不仅不促使他们成材，而相反，脱离革命夸夸其谈，腐蚀瓦解这批领导人，鼓吹和支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善施计谋的事务主义路线，

---

<sup>①</sup> 文件上有皮亚特尼茨基写给布哈林的一段话：“尼古拉：请阅此文件并请批示，应该如何处理此事。皮亚特尼茨基。1927年7月27日。”



公开支持最糟糕的机会主义分子，这些机会主义分子不接受或是表面上接受共产国际的指示，维经斯基则依靠他们搞对抗，并同那些逐渐成为接近我党布尔什维克精神的人士作斗争。维经斯基提出一些论点，说民族资产阶级能按革命方式解决土地问题，国民党内的斗争只是派别之争，等等，这样在中国领导人的头脑中制造了莫大的混乱和糊涂。维经斯基掩盖、抹杀和取消讨论那些批评党内错误和机会主义倾向的其他俄国同志提出来的问题。如果说有谁在领导与执行脱离问题上对不起共产国际的话，那首先就是维经斯基。不执行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的决议，在不小的程度上是维经斯基的立场所致，他站在全会决议和陈独秀及彭述之对决议所持的反对态度之间。维经斯基还掩饰上海区委的机会主义策略，这种策略迫使上海无产阶级服从于大资产阶级。维经斯基还是第一个抵制共产国际执委会关于武装工农和争取军队的决议的人。真正站在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决议立场上的最近一次党代会<sup>①</sup>的大部分代表，认定维经斯基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出席代表大会的所有同志都可以证明这一点。维经斯基在中国共产党面前遭到了彻底的破产，他袒护陈独秀和彭述之以及他们的错误，并企图把中央领导的机会主义错误归咎于全党。他是这样解释为什么犯这些错误的：“我们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了解得不够，所以现在研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宝库作出巨大贡献。”<sup>②</sup>很少能听到比这位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为自己的丢脸行为所作的这种辩解更为卑鄙的论调，我们不准备谈论维经斯基对待莫斯科一些机关的情报的罪恶态度，因为现在大家对这一点都很清楚。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提醒共产国际执委会俄国代表团，任命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中担任领导工作将会在中共队伍中引起极

<sup>①</sup> 指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

<sup>②</sup> 见第 202 号文件。

大的误解，也会给人们提供理由，认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不始终如一，把它的决定看作是向反对派的让步，而这种绝对不实的解释只会使中国中央内的机会主义分子的立场得到加强。

因此，我们认为有必要向俄国代表团提出撤销维经斯基在共产国际中所担任的一切职务问题，因为他没有执行共产国际的决议并损害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的威望。

至于谈到东方书记处的其他成员，我们认为有必要谈一谈彼得罗夫同志和赖特同志<sup>①</sup>。作为东方书记处实际领导人的这两位同志，除了他们自己弄不清中国问题外（见彼得罗夫向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交的提纲），也未能胜任他们所承担的主要任务：及时估计到中国革命中和中共队伍中所发生的变化，及时预报这些变化，仔细地加以研究并向俄国代表团和共产国际提出因形势变化而出现的新问题。东方书记处作为我们党和共产国际承上启下的附属机关，是与其地位远远不相称的。如果这两位同志能承认自己的错误并保证有能力使东方书记处处在应有的水平上，那么对这两位过去曾经有过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式功绩的同志的上述指责就可以勾销。我们深感不安的是东方书记处的命运问题，东方书记处不论在加强共产国际对东方各支部的领导和真正全面充分地研究东方各国共产党所面临的问题方面，还是在传授我国革命和我们党的经验以及促进真正布尔什维克党的建立方面，都应该发挥远非最后的作用。然而，东方书记处长期以来由上述人领导，不仅没有完成它所面临的任務，而且还损害了自己的威望，这一点有这样的事实可以证明：许多东方支部都越过东方书记处的领导向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请示汇报工作。我们认为，东方革命运动的发展前途很值得我们付出更多的精力，并要求我们党派出合适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请俄国代表团重新审

<sup>①</sup> 分别是 Ф. Ф. 拉斯科尔尼科夫和 В. И. 索洛维约夫。

议东方书记处的组成人员，并通过从我们党内调入新的工作人员来予以加强。

福京  
纳索诺夫  
曼达良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0，第 36—39 页。  
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58

## 拉宾给斯大林和布哈林的电报

1927 年 7 月 29 日于甘肃省宁夏

莫斯科，致斯大林、布哈林

1. 7 月 4 日我离开汉口来到宁夏。今天我动身去库伦，看来，我到达莫斯科不会早于一个月<sup>①</sup>。

2. 路上我会见了邓演达，他在我动身前一周就秘密地离开了汉口。他打算经莫斯科去柏林。

3. 在洛阳我与冯<sup>②</sup>进行过交谈。他的情绪对我们不利。在他控制的地区一直在逮捕共产党人。国民党的组织和报纸被查封。冯与蒋介石已缔结反对整个革命运动的联盟，一旦真正实行武汉的左倾政策他将会反对国民政府。

<sup>①</sup> 原文如此。看来，是不会早于再过一个月。

<sup>②</sup> 冯玉祥。

4. 冯的顾问对他的将领们没有任何影响，而由于形势的缘故都无所作为。冯没有公开反对苏联，希望得到尽可能多的物质支援。在业已形成的局势下，我认为不能再向他提供援助。相反，必须公开地反对他，就像莫斯科曾经建议的那样。在我离开汉口前，似乎直到现在为止都没有这种表示，我认为这无疑是错误的。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1，第 37—39 页。  
亲笔签字。

259

## 罗易就第二次北伐 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

1927 年 8 月 29 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在仔细研究了有关第二次北伐的所有材料之后，我想向您报告一下有关我对这个问题的态度的一些材料。

主张“深化”革命的人们和提出“扩大”理论的人们之间的争论不是论战的焦点。我既不主张“深化”也不反对“扩大”。下面是我提出的反对进行北伐（即在缺少必要的准备和缺少反对反革命联盟、反对武汉向它投降的保证情况下建议进行的北伐）的

论据的摘录<sup>①</sup>。

“我的建议的实质是：我们在发起下一步进攻前应拥有巩固的根据地……<sup>②</sup> 我的意见是：在目前危机的条件下，革命的任务是：

- (1) 发展工农运动。
- (2) 集中和加强国家机关。
- (3) 改革和集中军队。”

(中央局会议记录，1927年4月13日于汉口)

“我们(多里奥和罗易)不反对进行北伐，但是我们反对立即发起进攻。我们反对国民党的决定，即10天后军队应该开始进攻北京……我们赞成进行北伐，但是需要做一些准备……

立即发起进攻就意味着，我们要离开我们拥有强大的国民党组织、共产党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地区而进入一个陌生的国度，在那里除了冯和阎<sup>③</sup>的军队外，我们没有有组织的力量。我们没有这样的保障，即这些军队总会友好地对待我们。相反，我们有足够的理由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会出现危机，这些力量将会反对我们，而我们又不会有很巩固的根据地同他们作斗争。

反对立即北上的主要理由是：它会加强武装力量，给革命的基本力量即工人和农民带来损害。革命基础将不是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威力，而是武装力量。鲍罗廷同志说，这将是形形色色分子的组合，当然只能是这样，而且反动分子将起主导作用……

立即北上不仅不符合实现必要的阶级分化的思想，而且还意味着这种自由合作的继续。如果说历史在告诫我们什么东西的话，

---

<sup>①</sup> 下面引用的罗易的讲话和他起草的文件的摘录，有一部分作删节和编辑处理后发表在M. H. 罗易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一书，俄文版第28—35、48、49、54、56、57、59、98、99页。

<sup>②</sup> 此处和以下的删节号是原有的。

<sup>③</sup> 冯玉祥和阎锡山。

那就是在北京将会出现新的南昌<sup>①</sup>……为什么在我们这里发生了南昌危机？因为民主革命力量还不够团结。当与资产阶级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未能将其镇压下去。在继续前进之前，需要有反对新南昌人的保证。我们应当发动革命民主力量。在继续前进之前，我们需要巩固根据地。

……我们应该建立民主专政。为此，我们需要发展民主力量。革命面临着三项任务。这三项任务的解决，不是靠立即北上，而是靠巩固我们所拥有的政权。

这三项任务是：

(1) 通过实行土地革命和先进的劳工政策发动民主力量。

(2) 依靠民主力量夺取农村政权。

(3) 改编和集中革命军队，换句话说，建立革命军队……如果我们能适当而有力地利用在政府两个部中赋予我们的权力，那么经过几个月后，左派的权力不仅会得到巩固，而且还会成为几乎是不可战胜的。到那时我们就准备发动进攻——扩大革命的地盘。”

(中央局会议记录，1927年4月14日于汉口)

在上述摘录所选自的那篇讲话的结束部分中，我就加强我们力量的计划提出了以下建议：

“ (1) 必须保卫武汉。在湖北的北部边界集结兵力。冯和阎的军队可能向京汉铁路线推进，在北方军队进攻武汉时，给其侧翼造成威胁。

(2) 在湖北和湖南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两省土地改革的结果将影响北方各省，通向那里的道路将会打开。

(3) 采取必要的军事行动来加强对江西和广东的政治渗透。湖

---

<sup>①</sup> 1927年初在国民党领导层中发生了分裂并形成了两个中心：在武汉有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和国民政府，在南昌有蒋介石的大本营。

南湖北土地改革的结果会立即对相邻省份产生影响。

(4) 促使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服从武汉。在西南各省扩大我们的影响。

(5) 在上海和整个浙江省大力开展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

(6) 尽最大可能利用劳工和农民两个部的权力，武装工农。

(7) 改善同冯玉祥和阎锡山的关系。这会保证我们有通往苏联和供应品来源地的直接通路。

(中央局会议记录，1927年4月14日于汉口)

我对北伐问题的态度在下面引文中表述得非常清楚：

“我不反对进行北伐。不能把我的建议同曾反对进行第一次北伐的同志们的观点混为一谈。但是我还认为，北伐应该经过某些阶段。在开始阶段以广东为根据地。现在我们处在第二阶段。在转入第三阶段之前，必须更广泛地发动革命力量。”

(中央局会议记录，1927年4月14日于汉口)

对于为准备采取进一步军事进攻行动而要制定的加强民主力量的计划的建议，后来写进了4月16日中央通过的决议（该决议案是我起草的）。我把这个决议的全文附后<sup>①</sup>。第二天，在鲍罗廷的压力下（他威胁说，如果中央不支持他的政策，他就辞职），该决议被撤销。

下面是我就北伐问题写给中央的报告的摘录，这个报告在中央局讨论了好几天。

“我坚持这样的意见：北伐应该继续进行，因为不把反动势力和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国民革命就不可能完成。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这个问题仍需进行讨论，是需要立即进攻，还是我们到了

<sup>①</sup> 见 M. H. 罗易的《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俄文版第 195—196 页。

可以停下来，号召加强我们的力量的时刻……

我反对立即北上的主要理由是，这种行动将意味着向缺乏有组织的革命力量的陌生地区推进，意味着忽视国内的这样一些地区，在那里革命已经部分地完成并存在有组织的革命力量，即国民党机关、共产党机关、工会、农民组织等等……

十分明显，目前帝国主义的政策是促进建立打着民族主义旗帜进行虚假斗争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联盟，促进建立反赤色战线。最大的危险就在于此。这种危险不是来自某一个具体的方面。它可能出现在国内的任何地方。

这种危险从各个方面威胁着我们的根据地。我所说的根据地不是只指武汉，而是指受国民党控制的一切地区、部分地完成了革命的一切地区。这些革命地区正在受到威胁。进攻我们的根据地，这不是未来的问题，进攻已经在进行，它是在浙江、福建和江西开始的，这些地区处在民族主义政府的控制范围之外。广东已经公开反对武汉，蒋介石向四川派遣了自己的代理人，进攻已从四面八方开始，反动派正在包围我们。正当反动势力这样进攻我们家园并威胁我们根据地的时候，我们竟不去保卫我们的根据地，却要北上寻求新的革命根据地！

我们到北方寻求什么呢？寻求冯和阎给予革命更多的军事支援。这种同盟者的可靠性并不很大。任何人都清楚这一点。我们应该作出选择。一方面，我们拥有作为社会基础的工农群众，而另一方面，我们拥有随时都可能倒转枪口来反对革命的几千支步枪。”

随后发生的事件证实了这个讲话对局势分析的正确。

“陈独秀同志说，革命不会在武汉死亡。谁也不会要求革命自杀。当我们说，应该保卫根据地的时候，我们指的不仅仅是武汉和湖北。我们指的是所有东南各省。如果在最近6个月或一年内我们能巩固自己在这些省份的阵地，建立真正的左派政权，发动



民主力量，组建国家机关和革命军队，那么革命就不会死亡，革命将会非常坚强地活下来，将会处于更好的境地。

……如果我们立即向北京挺进，民主力量就会变得更加虚弱并会比南昌危机时期更缺少组织性。在北京，政权不会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它会被冯和阎篡夺。我们将会失去任何支持；如果我们在北方陷入这种危机，那么就决不会有任何保证，使南方革命根据地仍然处在我们控制之下。以为我们既能在向北方挺进，同时又能巩固我们南方的力量，这纯系幻想。巩固根据地，就意味着要同那些在革命的后方组织起来的反动势力作斗争。如果我们把我们的所有武装力量调往北方，就不可能做到这一点。为了保卫和加强根据地，我们需要有武装力量。立即北上会使我们脱离我们的根据地和遇到新的敌人……。

……陈独秀同志说，近期的任务不是深化革命，而是扩大革命。[我们观点的]真正区别就在于此：深化革命还是扩大革命。现在提出这样一个理论：在革命已部分地完成了的省份，如果不扩大革命，那么巩固左派政权是不可能的，我们也不可能存在下去。

资产阶级已掉转过来反对我们。小资产阶级正在摇摆和寻找避开随着革命的发展而提出的一些基本问题的途径。我们应该发展工农力量，只有这样我们才能保证革命的未来。立即北上，这是逃避这种必要性。小资产阶级政府在立即北上的借口下逃避土地革命。鲍罗廷、陈独秀及其他同志支持这种政策，赞成小资产阶级回避实行革命的政策的行为。这不是发展革命。这不仅仅是机会主义的行径，还可以把这种行为说成是对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反叛……。

在广东、湖南和湖北，农民运动已经经过了第一阶段即扩大阶段，准备进入第二阶段即深化阶段。不能机械地把它限制在第一阶段上。农民运动要么应该发展，要么开始腐朽和瓦解。客观

形势有利于农民转入对反动派的进攻，以便消灭反动派。如果农民不转入进攻，那么它自己就会遭到进攻，正如在广东所发生的情况那样，并且这种情况还会在湖南发生，如果唐生智在那里成为完全控制局势的主宰者，而革命的武装力量被调去攻占北方的地区的话。

若是我们在直隶和山东举起农民起义的旗帜，那么我们就失去在南方各省所夺取的阵地。

……鲍罗廷同志指出，为了巩固南方的革命根据地，必须支持农民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的要求；（由此得出，）共产党人应该反对国民政府，而这必然会导致十分危险的武装起义。请反过来看一看鲍罗廷的这个认为武装起义是危险的的论据。反对国民政府就会导致危险的武装起义，而共产党人必须反对政府，因为他们不能放弃农民运动。结论是什么呢？结论就是共产党人不应支持农民以革命方式来解决土地问题的要求。这就是鲍罗廷同志和陈独秀同志提出的建议。中央委员会应该作出决定：是赞成还是拒绝这个建议……由于回避深化革命的必要性，所以同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斗争不可能更广泛地开展起来。如果能面对这种必要性，在打击外部敌人之前就转入进攻国内反动派的根基，那么这种斗争就能广泛开展起来。当我们的根据地还不安全并且对敌人的进攻不设防（实际上进攻已经开始）的时候，就走得太远，那是愚蠢的。

我们反对立即北上，是鉴于以下原因：

（1）在军事上这种讨伐既可能以胜利而告终，也可能以失败而告终。没有取得胜利的任何保证。

（2）即便在军事上会取得胜利，那么其结果必将是出现一系列的问题。有一切理由认为，这种军事胜利将意味着武装力量的加强和民主群众力量的削弱。

（3）北上需要集中国民政府现有一切武装力量，这样就会敞

开南方革命根据地任凭反动派进犯。反动势力会联合起来，镇压在那里只拥有部分政权的民主力量。

(4) 在资产阶级明显地转过来反对革命的时刻，唯一的保障是发动民主力量，也就是发动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但在向北方进行认真<sup>①</sup>讨伐的同时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立即进攻将是抑制民主力量发展的口实，所以它会使革命受到损害。

我们的具体建议是：

(1) 为了保证第二条革命战线——长江流域的防御，应该在北方、东方和西方这样来配置武装力量……把军队调往河南前线，与冯玉祥配合行动，使他能向陇海铁路挺进；第2军和第6军经安徽西部向东北方向进军。

(2) 恢复国民政府在江西、广东和广西的影响。

(3) 不要进行南征来恢复在广东的影响。依靠当地力量的行动就可以达到此目的。依靠同情国民政府的武装力量的起义，并与无产阶级和农民一起行动就可以达到此目的。”

(中央委员会会议记录，1927年4月15日于汉口)

在中央委员会里进行辩论之后，我本想把业已形成的局势电告莫斯科，但鲍罗廷拒绝发电报。我在这份电报中对北伐表示了以下意见：

“国民党政治委员会作出了立即向北方发起旨在占领北京和奉天的军事进攻决定。当鲍罗廷向我通报这个决定时，我表示不同意，理由是：在不能保障根据地安全的情况下继续进攻将是危险的……在共产党人当中发生了很大的争论。在争论过程中可以清楚看到，许多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不仅不理解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的新提纲，而且还反对这个提纲，虽然他们表面上

<sup>①</sup> 原文如此。

表示接受。我的建议是：加强长江以南的革命民主政权。把军队调往北方，蒋介石就可以加强自己在南方的势力，也就是说，反动派将会进攻革命的后方。具体地说，我建议在北方采取防御措施，支援冯玉祥向东挺进，巩固湖北、湖南、江西、福建、广东和广西的政权，改编和集中革命军队，然后再北上。巩固左派政权要求实行革命的土地政策。我指出，立即北上的政策是由于小资产阶级左派想回避实行土地革命的必要性才提出的。鲍罗廷和多数共产党中央委员支持北上的政策，并断定，似乎不扩大革命地盘，就不可能深化革命……陈独秀则认为，共产国际的提纲原则上是正确的，但是实际运用这个提纲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并且需要时间……”

（鲍罗廷未发的 1927 年 4 月 18 日电报）

在鲍罗廷未发的另一份电报中，我也谈到北伐问题：

“没有足够的力量去占领北京。目前只能在河南采取防御措施，并支援冯玉祥同奉天人作战。而武汉的主要力量应集中到收复东南诸省和巩固政权上。立即北上的计划反映了把南方让给蒋介石，到西北寻找新根据地的倾向。反动派将会得到南方的根据地。把可靠的武装力量调往遥远的北方，甚至会造成丧失武汉的威胁。”

（鲍罗廷未发的由罗易和多里奥  
签署的 1927 年 5 月 9 日电报）

在同一份电报中有下面一句话：

“蒋介石带走了大量兵力，因为革命既没有深化，也没有扩大。”

这证明，我没有维护不扩大革命就不能深化革命的理论。下面是我在党代会上有关北伐问题的讲话摘录：

“我们是需要深化革命,还是扩大革命——这样提出问题是不正确的。

问题的正确提法就是:我们应该铲除反动派在农村的根基。这是唯一的道路。这就是现阶段的客观需要。如果我们能通过深化革命消灭反革命,那我们就应该深化革命。如果我们能通过扩大革命达到此目的,那我们就应扩大革命。如果既需要这样做又需要那样做,那我们就应该都做。在这个革命危机时期,小资产阶级被吓破了胆。它不想实行土地改革——在世界历史上小资产阶级从来都没有领导过土地革命。如果中国无产阶级,如果共产党想在征得小资产阶级批准和赞同的情况下去领导土地革命,那么土地革命就永远不会进行,除非农民自己起来进行土地革命,就像他们已经开始进行的那样。”

(在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对中央  
报告的讨论,1927年4月30日)

“……民族主义革命不能受这些无原则的和不可靠的‘左派’军阀的左右,从东方迁到北方,从北方迁到西方。国民革命应该有社会基础、社会根基,它应该寻找社会基础最发达的地区。”

我的这个观点在随后莫斯科发来的关于土地革命的重大意义和使革命力量摆脱反动将领影响的必要性的指示中得到了赞许。

“向西北某处撤退的计划,更远地离开革命有可能遭到帝国主义进攻的地方,把运动建立在各种武装力量联合的基础上的计划,这都是那些不相信群众的人的发明。不能让这种计划在共产党内占有市场……”

鲍罗廷赞成北伐,提出一个在蒙古建立军事基地的空想理论,因此应该在代表大会上向这一理论开战。

“与根据地问题相联系,必须讨论北伐问题。决不能这样提出问题:我们去北方、东方还是西方。这次讨伐的主要意义是什么

呢？是为了发展革命运动。主要问题是，我们能够在哪里找到革命根据地。应该从这个角度来探讨一切问题。如果讨伐将有助于巩固革命，我们就拥护讨伐。如果讨伐的目的是将革命根据地转移到蒙古的某个地方，那我们就反对这种讨伐……我们已经丢掉了广东。因为我们无条件地支持了第一次北伐。为了维持同资产阶级的统一战线，为了支持左派军阀，共产党没有开展阶级斗争。扩大革命并没有与深化革命同时进行。反动派的根基没有被铲除。革命力量离开广东之后，传统的革命根据地向着反动势力敞开了大门。应该警惕，不要再犯类似的错误。问题不在于北方或南方，而在于巩固根据地。只有从这个角度考虑问题，我们才能支持北伐、东伐或南伐……。

第二次北伐只有在国民革命军溶入冯玉祥和阎锡山军队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革命主要是依靠所谓的左派军阀的情况下，才有可能以攻占北京而告结束。我在前面已经说明，这是危险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反对这个计划。帮助冯玉祥和阎锡山进攻北京和消灭奉天的力量，在策略上这是很适宜的。但是，我们不应认为，这是扩大革命。我们可以采取这样的策略，但同时我们不应忽视最重要的任务——在华南和华中诸省建立和巩固革命根据地……

……国民党领导人把北伐问题提到首位，是因为他们希望避开土地改革，是因为他们反对发展革命。他们想与左派军阀搞投机交易。他们断定，我们正经历着革命战争的时期，不可能在农村进行任何土地改革。我们必须等着占领北京。那时我们再开始进行土地改革。在目前条件下北京不会被占领。如果土地改革取决于对北京的占领，那么它就永远不可能进行。问题不在于军事讨伐，而在于革命的社会基础。共产党将在促进革命发展的一切方面支持国民党和民族主义政府。我们将反对阻碍革命发展的政策。现在我们的任务是深化革命的基础，以保证革命的未来，保证它向全国的发展……”

( [中共] 五大, 1927年4月30日)

“革命的发展增大了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这会造成失败主义情绪, 特别是在小资产阶级中间, 还会产生一种将革命根据地转移到远离帝国主义据点的倾向。第五次代表大会警告党要防止产生这种不能容忍的失败主义情绪。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危险是存在的。共产党正动员工农大众为捍卫革命和反对帝国主义进攻而进行坚决的斗争。主要任务是要保卫和加强华南和华中的根据地——不排除向四周扩张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但是, 共产党应该同以扩张为借口企图离开或削弱现有根据地的倾向作斗争。

富饶的经济发达的东南部和中部地区, 不应该完全让给资产阶级。第五次代表大会把深化和扩大革命的任务放到共产党的肩上。如果把进行彻底的土地改革和在农村建立革命民主政权的工作推迟到北伐完全结束之时, 那么资产阶级就会用虚伪的民族主义旗帜作掩护, 巩固自己在这些地区的政权。这样就会加强帝国主义的阵地, 因为中国资产阶级太软弱, 不能独立生存。中国将进入由帝国主义金融资本控制的经济发展时期, 这对于稳定以资本主义为基础的世界经济将是一个很大的支持。中国将会处在帝国主义的统治之下, 这种统治可能多少会改变自己的形式。这就意味着取消革命。

为了巩固革命的胜利, 共产党应该发动劳动人民群众反对封建资产阶级反动派。应该在那些有经过斗争考验的无产阶级、有群众性的农民组织和高度发达的国民党及共产党组织的省份巩固革命的根据地。共产党不能设想有比上海无产阶级、广州工人阶级和广东、江西、湖南、湖北的革命农民更巨大的潜力和更可靠的革命根据地。第五次代表大会在没有低估进一步扩大革命地区和消灭张作霖的必要性的同时, 向共产党提出了不久将来的一项主要任务, 这就是在那些已部分地完成了革命的省份, 即在广东、

福建、浙江、江西、湖南、湖北和广西同反动派进行无情的斗争。要完成这些任务则意味着在业已为此做好社会和经济方面准备的广大地区建立革命民主政权。这将使封建资产阶级分子消灭革命的一切努力化为泡影。所有客观条件（国内的和国际的条件），都会有利于中国革命的发展和向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小资产阶级民主专政阶段的过渡。

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谴责任何偏离共产国际提纲中指出的和从事态发展进程中得出的这种前景的行为，即认为这是试图把革命领导权交给资产阶级的倾向，这意味着取消革命。”

（中共五大于 1927 年 5 月 9 日通过的  
关于政治局势和中共任务的提纲）

这就是我反对进行北伐的理由。事态发展证明，我的这些理由基本上都是正确的。如果认为我的看法有什么错误的话，那就应该根据我所阐述的意见来进行批评。我不认为，我对北伐的看法可以作为在发展革命进程之外的一种深化革命的理论来进行批评。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57，第 40—46 页。

英文打字稿，副本，无签字。



260

## 罗易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政治书记处的信

1927年8月30日<sup>①</sup>于莫斯科

致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

向汪精卫讲述莫斯科来电的（部分）内容，从我这方面来说是错误的。但是我仍然相信，这并未提供把我从中国召回的理由<sup>②</sup>。把我召回的结果是，中共领导人的投降主义政策得到了加强。在中国（以及在其他国家）担任负责工作的其他同志曾犯过更严重的错误，并且不止一次，但并没有这样严厉地对待过他们。给我指出错误并作出处分也就够了。

罗 易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9，第 94 页。

用英文亲笔签字。

<sup>①</sup> 日期是根据该文件的德文稿确定的（全宗 495，目录 6，卷宗 44，第 54 页）。

<sup>②</sup> 见第 219 号文件。

261

##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 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的建议<sup>①</sup>

1927年8月30日于莫斯科

在听取了罗易同志的解释和了解了案卷之后，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指定的罗易事件调查委员会<sup>②</sup>得出结论：罗易同志把1927年5月31日发给他（罗易）、鲍和柳<sup>③</sup>的电报<sup>④</sup>内容告诉汪精卫是犯了错误，因此政治书记处决定把罗易同志召回是正确的。

调查委员会向书记处提出以下建议：

1. 重申政治书记处6月22日决定。
2. 向中共中央通报以下内容：

“罗易同志被召回不是因为他犯有什么政治错误，相反，在关于土地革命和镇压湖南反革命分子的基本问题上，罗易同志的方针是完全正确的。罗易同志被召回只是因为他犯了一个组织性错误，这个错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7年6月22日决定中作了如下表述：

---

① 文件上有斯大林的亲笔批注：“同意。И. 斯大林”。该文件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7年9月2日会议上批准的。

② 成立该委员会的决定是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1927年8月19日会议上作出的，委员会成员不详。

③ 分别指鲍罗廷和柳克斯（O. Ю. 普利切）。

④ 见第219号文件。

‘立即把罗易同志从他所担任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因为他给国民党一些中央委员看了只发给鲍、罗<sup>①</sup>、柳三同志而绝对不能给任何其他人看的电报。’<sup>②</sup>

由于我们6月23日发的电文<sup>③</sup>是别的内容，现提请你们注意，这里所援引的共产国际执委会政治书记处决定的内容才是正确的。”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35，第 115 页。

带有修改手迹的打字稿，原件，无签字。

## 262

###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

1927年9月3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委员会审查把我从中国召回问题的报告是在政治书记处的公开会议上作出的<sup>④</sup>。有关共产国际执委会驻国外代表的任命和召回问题，如果不涉及重要政治问题，都不在公开会议上听取。看来，是存在用某种方式败坏我的名誉的企图。事实上，我从中国回来后，并没有委托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

① 指 M. H. 罗易。

② 见第 232 号文件。

③ 电报没有找到。

④ 见第 261 号文件。

内做任何负责工作。

附上我给政治书记处的声明<sup>①</sup>，并请在今后的将来解除我在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内的工作。

罗 易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9，第 96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63

##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

1927 年 9 月 9 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作为您建议我撰写的关于中国的一本书的补充，我想发表另一本暂定名为《中国革命濒临死亡边缘》<sup>②</sup>的小册子。其中将收录一些讲话、决议、声明和其他文件。当然，所有材料都要经过认真审校，以便删掉一切秘密的内容。我相信，这本小册子会很清楚地说明中国的局势和我对所有重要问题的看法。请告诉我您对出版这本小册子的意见。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罗 易

<sup>①</sup> 见第 260 号文件。

<sup>②</sup> 该书于 1929 年在莫斯科出版，书名为《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

全宗 495，目录 3，卷宗 49，第 99 页。

英文打字稿，原件，亲笔签字。

264

## 皮亚特尼茨基给莫洛托夫的信

1927 年 9 月 13 日于莫斯科

致莫洛托夫同志

亲启

我们已经让维经斯基同志返回听候联共（布）中央调用。我请求把他留在莫斯科工作，以便我们能够利用他对东方问题（不仅是中国问题）的了解。他从 1921 年起就在共产国际执委会工作，他既了解一大批共产党员同志，又了解近东和远东接近我们的资产阶级组织、自由主义组织和民族革命组织。在东方书记处的日常工作中，这方面的信息是有益的，一旦需要，东方书记处就可以利用维经斯基同志所了解的情况。

皮亚特尼茨基

全宗 495，目录 19，卷宗 226，第 91 页。

打字稿，副本。

265

## 罗易给斯大林的信

1927年9月16日于莫斯科

亲爱的斯大林同志：

呈上小册子的目录，我曾就出版这本小册子征求过您的意见<sup>①</sup>。收入这本小册子的有：我驻中国期间就所有的革命基本问题发表的一系列讲话和我起草的一系列文件。这些讲话和文件可以说明一定时期的中国局势。

这本小册子将不同于我要写的关于中国革命的一本书。在那本书中将比较详细地探讨中国革命的历史、发展、性质、问题和经验，并且还要专门引证印度的一些例子<sup>②</sup>。

为准备写这本书，我需要花两个月时间。同时我认为，出版这本小册子是有益的，其目录附后。

我想尽快地和您谈一谈印度问题。在我不在的时候，这个问题被忽视了，并在一定程度上被误解了。印度的形势相当有利，但是必须作出努力来改进组织方面的工作。我有些具体的建议，很想听一听您对这些建议的看法。

请告，我何时可以同您见面。

致共产主义的敬礼

---

<sup>①</sup> 见第263号文件。小册子的目录没有找到。见本书第437页注<sup>②</sup>。

<sup>②</sup> 见M. И. 罗易的《中国的革命与反革命》，柏林1930年英文版；加尔各答1946年英文版。

罗 易

全宗 495, 目录 3, 卷宗 49, 第 100 页。

英文打字稿, 原件, 亲笔签字。

266

## 罗易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sup>①</sup>

1927 年 9 月 17 日于莫斯科

### 东方委员会<sup>②</sup> 罗易同志的报告

罗易同志：我的报告应涵盖将近 9 个月的时期。这个时期发生的事件，在座的同志或多或少是了解的，所以我不必详细叙谈这个时期发生的所有事件。此外，我只打算作一个简单的情况通报，把那些比较重要的政治问题放在一边。整个共产国际应对这

<sup>①</sup> 罗易的报告是根据东方书记处 1927 年 8 月 20 日的决定而作的。这个决定说：“鉴于罗易同志已经抵达，请他在东方书记处会议上作一次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请米夫同志参加对该报告的讨论。”（全宗 495，目录 154，卷宗 283，第 17 页）对罗易报告的转述发表在《五大以前中国共产党的内部状况》一文中（载《共产国际》杂志，莫斯科 1927 年第 41 期第 46—47 页）。在档案中保存有罗易报告的几种不同文本。最全的文本是未经校对的英文速记记录。但是在这份记录中空缺一些中国地名、人名和姓氏。根据 B. И. 索洛维约夫于 1927 年 10 月 1 日呈送 И. В. 斯大林、Н. И. 布哈林、B. M. 莫洛托夫、瓦西里耶夫（大概指 Г. В. 契切林）、米哈伊洛夫（Л. М. 加拉罕）和雅沃尔斯基（И. С. 温施利赫特）的速记记录俄译本部分地恢复了上述地名、人名和姓氏。

<sup>②</sup> 原文如此。

些问题进行仔细的研究，以便从我们中国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为了弄清中国目前的形势并了解今后的发展前景，必须对近几个月来事态发展的一些最显著的特点作一个简短的评述。我不专门讲国民党的问题。我要比较集中地讲一讲共产党的问题。只有在探讨共产党的问题需要的时候，我才涉及国民党的问题。

可以说，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揭开了中国共产党历史的新篇章，而这个新的篇章是与整个中国革命的转折点相吻合的。因此，向你们介绍一下共产党如何对待共产国际的提纲是有益的。为此，我想简略地向你们讲一讲中国共产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我认为，共产国际已经收到了有关此事件的各种报告，并且在座的同志们或多或少是了解这个事件的。然而，共产党在五大以后的危急时期却犯了错误，而犯这些错误的征兆在五大召开期间就可以看出，共产国际出席五大的代表团和共产国际的代表（此人在五大后仍在那里）竭尽全力帮助中国共产党弄清共产国际提纲的意义，以避免后来所犯的那些错误。共产国际的提纲，大约是在五大召开前三个月收到的，当时在中央委员会里就进行了讨论。

应该记住，在党的五大前，中央委员会是由三位同志组成的。其中一人经常生病，所以实际上是两位同志领导党的整个政治生活。因此中央委员会讨论共产国际提纲时，只有三位同志参加。在讨论过程中，参加讨论的三位同志发表了三种不同看法。陈独秀同志持这样一种看法：提纲为中国共产党展现了新的前景，提出了新的问题和崭新的政治方针。他不完全相信提纲的正确性，但是他还是准备看一下，如何在实践中贯彻执行。彼得罗夫<sup>①</sup>同志持第二种看法。他认为，在共产国际的提纲中没有任何新的东西。

---

<sup>①</sup> 彭述之。



瞿秋白同志持第三种看法。他完全同意提纲。

在这次讨论之后，没有把提纲传达到全党。不仅在普通党员中没有讨论提纲，甚至在一些最重要的省委中也没有讨论。结果直到五大召开时整个党内实际都不了解共产国际的提纲。毫不夸大地说，大多数党员甚至都不知道有这样一个文件。

当代表团抵达汉口时，中央委员会还驻在两个地方。曾作出过关于中央委员会由上海迁往汉口的一个形式上的决定。多数中央委员已在汉口，但是书记处和部分中央委员仍在上海。因此，存在着组织上的混乱现象。我们最初的努力是旨在使中央委员会驻在一个地方。最后，中央集中到汉口，在那里召开了各种会议。在这些会议上都没有讨论过提纲，但是在讨论各种其他问题过程中，当提出革命的一切基本问题时，可以看得很清楚，在中央委员中和参加讨论的领导同志中，没有一个人真正理解共产国际的提纲。公然反对提纲的人倒也没有。表面上大家都同意提纲。每个人都认为，共产国际提出了正确的方针，但是，正如我已经说过的，谁也没有真正理解提纲。一些同志曾经持反对态度，这种态度越来越受到谴责，因此它就不再公开表示了。曾经有过这样一种倾向：是的，是有共产国际的提纲，我们也同意这个提纲，至于这个提纲如何运用于中国的问题，如果说这个提纲大体上可以运用的话，那就应该看一看，应该看一看再说。这种倾向后来采取了很危险的形式并逐步导致党中央在革命处于最危急的时刻拒绝执行共产国际非常特殊<sup>①</sup>的指示。共产国际代表团立即明白了，应该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应该公开讨论提纲，应该挑起争论，以便让那些对提纲持怀疑或反对态度的同志公开发表意见。只有通过这种办法才能使党理解提纲，使提纲给党带来实在的好处。

我们抵达汉口的时候，对党以前的领导，即五大召开以前的

<sup>①</sup> 原文如此。

中央委员会有很大的不满情绪。批评带有各种不同的性质，但是除了瞿秋白同志所写的东西<sup>①</sup>以外，这种批评没有采取具体的形式。这是对以前的中央委员会的政策表示不满和批评的唯一一次有组织的形式。我们认为这是很有希望的征兆。我们曾考虑，新的成员能走到前列，我们依靠他们，就能同老中央委员会的错误和机会主义倾向作斗争，迫使党明白这一点，并把党引上共产国际所指出的正确道路。

然而，当陈独秀同志从上海来到汉口的时候，当在讨论各种问题（如土地问题、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与军阀的关系问题）的过程中，他们的领导同志都发表了意见的时候，可以清楚地看出，在革命的基本问题上，他们的观点没有任何分歧和不同。对老中央委员会，特别是对瞿秋白同志表示不满的同志、尖锐地批评老中央委员会政策的同志，实际上对革命的所有问题都表达了与陈独秀同志和其他中央委员相同的意见。最后，曾主张公开批评老中央委员会的同志，都反对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就党的任务问题进行任何争论。他们说，在党代表大会开幕之前我们应该防止发生任何争论，在代表大会召开之前，我们应该防止在党内同志当中发生任何辩论。

当共产国际代表团，为了使党能认清共产国际提纲的意义，坚持讨论党以前的错误，要求在党代表大会上进行辩论的时候，整个中央委员会试图抵制代表大会。在共产国际代表团来到之前，已决定在4月底召开代表大会。而当我们到达那里的时候，有一些同志对中央委员会持反对态度，要求尽快召开代表大会，他们对当时的领导表示不满，以为党的代表大会将会推选出他们认为是革命所需要的党的新领导，因此竭力争取尽快举行代表大会。然而，随着代表大会开幕日期的临近（代表大会本应再过一周或10

<sup>①</sup> 指瞿秋白写的小册子《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武汉1927年版）。见《六大以前党的历史材料》，第670—736页。

天举行),一切都变了。他们不同被专门派来参加党代表大会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商量,甚至背着该代表团,决定无限期地推迟代表大会的召开,尽管一些遥远省份的代表已经到达。当共产国际代表团得知这一情况后,十分尖锐地批评了中央委员会对它的这种态度,并要求立即召开代表大会。最后代表大会还是召开了。但是,在代表大会召开前曾试图避免对党的前领导进行任何公开批评。陈独秀同志或负责党的领导工作的其他同志的这种愿望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一切批评都会是针对他们的。但是难于理解一些中央委员同志以前曾坚决反对中央委员会的这种行为。为什么?因为在〔共产国际〕代表团到达之前,中央委员会的反对派都具有如同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反对派的那种性质。反对派是反对领导方法,而不是反对领导的政策。一切都清楚了。反对派中的同志自己看到,在代表大会上的辩论和对〔中央〕委员会的批评将具有政治性质,反对派中的同志也会像他们所反对的那些同志一样受到批评。因此就形成了统一战线。双方都坚决反对对从前的领导进行任何批评。代表团也认为,在党需要动员起来进行当前工作的时候,没有必要对〔共产国际〕的提纲进行广泛的讨论,也不需要讨论所有基本问题,但是绝对需要在代表大会上批评所犯的错误,以便从中汲取教训。

我们举行了一些会议,在这些会议上党中央委员会和共产国际代表团讨论了在代表大会上进行讨论的程序。最终,我们同意了中央委员会要向代表大会作的政治报告的总方针。在这个报告中应该明确需要集中讨论的基本问题。主要的几点是:资产阶级的作用,无产阶级的作用,土地问题,革命的前途,军人的作用,革命的性质,武装革命力量问题,同国民党的关系。还有一些其他问题,我只列举了最重要的问题,我不想在这里谈论细节。实际上在所有这些问题上〔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观点与中央委员会的观点都是不同的,就像在如何对待共产国际提纲的问题上双方

观点不同一样。但是讨论过程中我们达成了协议：中央委员会将在自己的报告中，对做过的工作作出评述，进行自我批评，并将共产国际的新提纲作为未来的方针。

然而，当陈独秀同志在代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他违背了所有这些协议。他就上述问题阐述了自己的观点<sup>①</sup>。他对所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自然，在他的报告中没有作任何批评。这是一个只谈成绩和成就的报告，他阐述了自己对所有这些问题的看法。

还发生了另一件有趣的事情。当他作报告的时候，我们当然希望有活跃的辩论。要知道，对整个政策都曾有反对意见。可是他作完报告，大会主席团（整个中央委员会即原中央委员会都参加了主席团）却一致决定：对他的报告不进行任何辩论，而请共产国际代表团在不进行辩论的情况下作报告。

当共产国际代表团坚持就中央委员会的报告进行辩论的时候，主席团的一些同志却建议共产国际代表团先开始辩论发言。共产国际代表团不完全同意这个建议，但是既然需要在不辩论和辩论之间作选择，代表团就选择了后者。它先作了一个类似副报告的辩论发言<sup>②</sup>，根据以前作出的决定这个报告本应由中央委员会来作，现在却由共产国际代表团作了。代表团批判了党以前所犯的 error，阐述了共产国际的提纲，并指明了在（事前选作党代表大会工作的最重要内容的）所有问题上的正确方针。在这之后坚冰才解冻，辩论才开始，一场很好的辩论展开了。来自各省的许多同志都发了言。很明显，全党都不赞成中央委员会的政策。然而，中国同志，甚至那些被认为是对中央委员会持反对态度的非

<sup>①</sup> 陈独秀的报告全文没有找到。该报告的概要刊登在1927年5月15日《真理报》上，以及《国际新闻通讯》上和共产国际一些支部的铅印机关刊物上。陈独秀报告的简要记录（俄译稿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288，第1—31页）发表在《中共党史资料》上，北京1982年版第3期第26—59页。

<sup>②</sup> 见M.H. 罗易：《中国革命与共产国际（论文资料集）》，第44—62页。

中央委员都参加了辩论，这个事实本身表明，尽管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但这种不满情绪在政治上没有具体化，也就是说，虽然存在着对老领导的不满情绪，但还没有形成可以替代老领导的新领导。摆在共产国际代表团面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陈独秀同志在自己的总结发言中仍然我行我素<sup>①</sup>。他又阐述了自己在报告中所提出的观点。接连4天的辩论对他来说没有任何意义。他又完全按照中国的方式既不参与论战，也不公开反对共产国际的提纲，相当策略地与一两个同志进行论争。但是，他的总结发言基本上是在捍卫自己的观点。

正如我在开始时已经讲过的，我不准备就所有问题作详细报告，因此也不打算详细讲述代表大会上的情况，而只想举几个例子来说明代表大会的性质。总的说来，代表大会开得是好的。看来，在党的历史上这是第一次公开举行代表大会<sup>②</sup>。会上讨论了所有最重要的问题。出席代表大会的每位代表实际上都相当清楚地阐述了自己对某一个问题的看法。因此，这次代表大会给代表团留下的印象不是很坏，而是很好。对代表大会工作的政治总结，可以说是党自上一次代表大会以来大大发展壮大。在召开四大的时候，共有900名党员，而在五大时党员人数已超过5万人。党在数量上的这种迅速发展并没有伴随有党在政治上的同样迅速的发展。当然，党已经具有巨大的政治影响，因为共产党已走在那个时期各种斗争的前列。共产党既领导了工人运动，又领导了农民运动。在农民运动方面没有别的领导者。然而这种数量上的巨大发展和这种巨大的政治影响还没有推举出相应的有经验和有能力的领导。问题就在这里。自然，这次代表大会表明，尽管对老中央委员会存在着普遍的不满情绪，但是谁都没有表示出要推翻它的丝毫愿望。第一，党没有要求推翻老领导，第二，（共产国

① 见全宗514，目录1，卷宗288，第32—41页。该文件尚未发表。

② 第一次公开举行的不是中共五大，而是三大（1923年6月12—20日于广州）。

际)代表团看到,如果推翻老领导,没有谁能替代它。因此,当时能做的最好工作,是加强老领导,从一些省里吸取新的成员参加中央委员会,让一些在各地工农运动中起过领导作用的同志进入中央委员会。

当我们建议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数从9人增加到40人时,同志们当然表现出某种惊奇,但是他们没有反对这个建议。当时我们抱有一定的幻想。我们以为,老中央委员会的7名委员中有2名或3名没有公开反对老领导,因为他们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力量。我们以为,如果我们能给他们打好基础,他们就会形成对抗老领导的实实在在的反对派,这样我们就能在中央委员会中把老领导孤立起来。新的中央委员会选出来了,由30名委员和11名候补委员组成。在中央委员会中有17名工人,其中多数人都积极参加过工会运动。中央委员会的许多同志都是各省农民运动的活跃领导者,因此,中央委员会表面上体现了党在那种条件下可以拥有的最佳领导。

这次代表大会是在整个国民革命运动危机迫近的时期举行的。当时存在着帝国主义进行武装干涉的严重危险。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利用这种形势来限制工农革命运动,要弄清这次代表大会将对我们党产生怎样的影响,还需要时间,但是代表大会对国民党的影响却立即表现出来了。国民党立刻对这次代表大会作出了反应。我认为,大家对代表大会通过的决议都是了解的。代表大会把主要注意力用在土地问题、没收土地问题、无产阶级领导权问题和民主专政问题上了。后来的事态发展表明,在我们的同志们还不理解代表大会决议的全部意义的时候,国民党却理解了。国民党明白,共产党与它的某些领导人相反,确实是在成为一个强大的政治因素。可以说,共产党的影响超过了自己为数不多的党员的影响。共产党从满足于当国民党某种附庸的状态中走了出来。共产党已成为一种独立的政治因素,并且在一定的形势下可能成为

革命的领袖。这就促使国民党内的反动分子坚持提出对工农运动实行监督的问题，甚至提出同共产党决裂的问题。我们的党不知道对国民党的这种进攻作何反应。代表大会闭幕后只过了将近两周，这个问题就在湖南的反革命叛乱过程中达到了危急的地步。湖南的反革命叛乱，即夏斗寅和许克祥的叛乱，不是孤立的事件。这是国民党向共产党和整个革命发动的第一次进攻。国民政府对这些反革命叛乱没有表示任何反对意见。实际上，国民政府的某些成员和国民党的某些领导人与这些反革命暴乱的领导人保持着秘密联系。同时这些反革命叛乱已经成为南京和武汉之间的联系环节，因为夏斗寅和许克祥与南京保持着联系，另一方面与武汉最露骨的反动分子也有联系。这些反革命叛乱表明，事态在向什么方向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必须采取进攻行动。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一定程度上已预见到事态的这种发展，如果说代表大会的决议具有某种意义的话，那么这种意义就是必须采取措施来反对这种反革命叛乱。可是，我们党从一开始就未能对这种叛乱作出反应。它的整个理论是退却。这个理论是：武汉集团内部的反动军阀分子采取进攻行动是为了保持自己的地位。国民党左派在做一些让步，应该退却，我们应该帮助国民党左派这样做。这就是整个这个理论。这就是中央委员会的政策和态度。代表大会后过了两周就清楚了：代表大会没有教会党的领导人任何东西，尽管〔在代表大会上〕对所有问题进行了辩论和以前对五大的提纲进行过辩论，但〔党的〕领导人既没有理解也没有接受共产国际的提纲。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还收到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八次全会的决议。但是，在这里我应该说明一个情况。八次全会的决议只是到7月底中国才收到<sup>①</sup>。我们得到的只是间接的材料。最初我们是在日本的资产阶级报纸上看到这个决议的，是决议的一些摘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录。不管怎样说，最终党知道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持什么态度。这个态度甚至比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提纲中的态度还要具体。最终，在最危急的时刻，从这里得到了关于土地革命、关于同武汉反革命作斗争的问题、关于同国民党的关系问题、关于建立革命军队和武装工农的问题的明确指示<sup>①</sup>。然而，这些指示对党的中央委员会没有产生影响。最后，共产国际的所有这些指示都遭到了中央委员会的拒绝，中央委员会声明说，莫斯科的人们不了解这里的实际情况，发来一些无法执行的指示。（**维经斯基**：这是在什么时候？）这是在6月。这样，这个事实只能加强我在代表大会期间作出的结论，即所谓的反对派在危急时刻坚持了党的老中央委员会所执行的那种政策。进入中央委员会的新成员实际上未能对党的方针施加什么影响。多数新中央委员都来自各省，他们回到各省去了，而中央政治局由7人组成，他们都是老中央委员会的成员，因此党的方针依然如故。

当共产党转入退却时，国民党开始表现出更多的侵略性和更明显的反革命性。实际上他们要求取消共产党和解散工农运动。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在7月初召开了党的中央全会。我在全会开幕的前一天就动身了，未能出席全会。在这次中央全会上通过了所谓有名的退却行动纲领<sup>②</sup>：我们没有足够的力量；反革命分子到处都很强大；如果现在我们就提出没收土地和武装工农等要求，那就会导致与国民党决裂，因此，为了将来的行动，现在我们应该退却，保存力量，发展自己的组织。这样一来，这次全会实际上取消了五大的一切决议。当我们党害怕与国民党决裂的时候，它就放弃了一切，实际上同意了取消共产党和工农运动。国民党已经决定同共产党决裂，而且自党的五大以来这个情况对我

<sup>①</sup> 见第219、223、225号文件。

<sup>②</sup> 详见B. И. 格卢宁：《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1921—1927）》，第2卷第324—326页。



们党来说是很清楚的，国民党决定同我们决裂。然而，党在任何时候都不能理解这种情况，而我们又不能强迫它理解这一点。在这个危急时刻，党的全部政策都集中在如何保持我们同国民党的关系，如何避免同国民党决裂和如何避免必然要发生的事情上，所以，当不可避免的决裂到来的时候，未能使革命过渡到更高的阶段，而只是表明革命遭到了暂时的失败。

国民党会分裂，蒋介石会离开——这种错误观念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共产党的这种错误政策。代表资产阶级和封建阶级利益的右翼分子已经追随蒋介石。然而武汉集团不仅仅代表小资产阶级。资产阶级作为一个社会阶级，其大部分已跟随蒋介石，但在武汉集团中还有其影响，武汉集团的领导者作为个人在更大程度上代表大小地主阶级的利益，而不代表小资产阶级。因此，在国民党分裂后，我们对它的策略应该建立在使这次分裂达到合乎逻辑的结局上。同蒋介石的决裂意味着封建主阶级同武汉的决裂，但是这既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当时犯了一个错误。我们党把这种决裂看作是开始和结束。因此，我们的任务就是孤立仍留在国民党内的封建资产阶级的代表，但是这项任务没有完成。党不知道，我们的合作本应是加强真正的左派，加强小资产阶级，而不是去依靠一两个领导人。为了把小资产阶级分子吸引到自己方面并争取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应该孤立那些封建资产阶级的代表。留在国民党内，不是作为左派的代表，而是作为党的代表、中央的代表。但没有这样做。我们把他们看作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认为所有人都是左派。因此，当需要提出一些会引起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不满的要求时，共产党的领导人就有可能在提出这些要求后使国民党左派脱离国民党。但是，共产党不懂得如何孤立武汉的右派，如何加强自己对小资产阶级左翼的影响，如何让他们接近群众运动并把他们推上革命的道路。在群众运动的压迫下，国民党右派采取了正确的策略。他们把留在国民党左派内的小资产

阶级吸引到自己方面，汪精卫就是这个小资产阶级的典型代表。右派把他争取到了自己方面来。开始时，在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内，对于同共产党人决裂的问题，并没有一致的意见，但是它的成员在这个问题上逐渐达成了一致意见，由此可见，由于我们未能使小资产阶级脱离封建军阀，他们就建立了反对工农运动的统一战线。诚然，达到这种统一还有更严重的原因。这原因是什么呢？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分别单独存在的唯一理由是发展革命。民族资产阶级的代表蒋介石则背叛革命，反对革命。武汉国民政府能够存在一些时候，只是因为它进行反面宣传<sup>①</sup>，批评蒋介石和南京，但是，如果一直坚持这种纲领，他们就不能存在下去。他们必须去做蒋介石没有做过的事情，他们必须进一步发展革命，并且很清楚，土地革命是进一步发展革命的唯一手段。但是，由于武汉国民政府的领导人也处在地主阶级和封建军阀的影响和控制之下，他们反对进行土地革命。因此，国共两党今后的关系不能继续建立在国共两党合作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两党分化基础上的时期已经来到。若是国民党能变成小资产阶级的代表，并且能摆脱封建军阀阶级的影响，那么合作就能继续下去。但是这是做不到的，部分原因是我们党犯了策略性错误，部分原因是出现了新的形势。

武汉时期是革命的发展时期，也就是一个从首先与蒋介石决裂到最后〔国民党〕与共产党人决裂的阶级分化过程。这个过程本应有助于从国民党中清除还留在那里的封建资产阶级分子。我们同国民党继续合作的目的，以及随后对这种合作（即参加国民政府）性质的批评，就在于以下方面：大家很清楚，小资产阶级如果不受到无产阶级更多的革命影响，它就会跟资产阶级一起走。因此，武汉时期的任务就是加强我们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把国

<sup>①</sup> 原文如此。

民党变成真正的革命民主政党，换句话说，把它变成民主专政的机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把国民党内的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代表清除出国民党。如果能通过直接的和不断的发展革命的办法来达到此目的，那是比较理想的。然而，后来的事态表明了另一种情况，表明了同样一种过程，即分化过程：这些封建资产阶级分子曾作为国民党左派留在武汉一段时间，并且与工人和农民合作过一段时间，现在他们公开反对革命，站到资产阶级一边去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似乎整个国民党都成了反革命。这只是意味着，阶级分化的过程在继续。

正如共产国际在自己的提纲和给共产党的指示中所指出的，革命的下一阶段将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自觉地发展革命，无产阶级是最坚定的革命力量，它能够吸引小资产阶级被压迫群众参加反对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的斗争。我们党曾错误地认为，在小资产阶级领导下可以建立民主专政。这是不正确的。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下，民主专政才能建立起来，并且才可能成为真正的民主专政。

这就是下一个革命阶段的前景。随着无产阶级领导下的群众性革命民主运动的发展，民主专政将是这种运动的第一个政治表现形式。因此，不能认为中国革命的暂时失败就是这个阶段的结束。可以认为它是破坏革命直线发展的一个事件。对发展过程的这种破坏是由两个因素决定的：(1) 客观因素——阶级力量的对比；(2) 主观因素——共产党的错误。

.....

### [提问]

沃林同志：您为什么不谈谈由夏斗寅和许克祥<sup>①</sup>开辟的那个

---

<sup>①</sup> 原文如此。根据罗易的回答判断，这里指的应是贺龙和叶挺。

中国革命阶段？我认为，不谈这一点，关于形势的概念是不全面的，请您谈谈这个问题。

**格列尔同志：**罗易同志只是在论述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时谈到了小资产阶级的作用，它对革命运动的背叛，它转到右的大资产阶级一边，等等。在我看来，这是不够的，为了获得整个形势的全貌，需要了解资产阶级之所以采取这种行动的更客观、更深刻的原因。根据我的理解，罗易同志对这个问题讲得还不够详细，我觉得，如果存在这样一些原因，罗易同志就应该更详细地讲一讲。

**法因贝格同志：**您说，在党内没有反对派的时候，在长沙和湖南曾存在过一种运动，可以使人明确断定，基层对领导持坚决反对的态度。但这种反对态度没有什么表现，并且中央对它没有作出反应——这可能吗？

**维经斯基同志：**既然不存在发生决裂的客观原因，那么为了避免同武汉国民党集团和同政府决裂，当时能采取某些措施吗？

**沃林同志：**我想请罗易同志谈谈革命前途问题，以及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苏维埃问题、国民党左派和纯革命党存在的可能性问题<sup>①</sup>。

**赖特同志<sup>②</sup>：**在中国共产党所犯的错误中鲍罗廷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出席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的代表团是由哪些人组成的？考虑到国民党内存在一些倾向，我们是否可以这样来看待中国目前的形势，即现在在那里出现的反动派，不纯粹是资产阶级的，而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

**法因贝格同志：**请设想一下第五次代表大会期间曾经出现的那种形势。如果共产党在当时提出一些更加革命的口号，您是否认为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

**纳佐夫同志：**中央委员会和代表大会主席团不想让代表们辩

<sup>①</sup> 在俄文速记记录中删掉了下面一段。

<sup>②</sup> B. И. 索洛维约夫。

论，是出于什么样的想法？是不是他们害怕批评？或许他们不同意共产国际代表团的意见？

**维经斯基**同志：罗易同志对现在的领导怎么看？它能否采取正确的方针？

**季维尔**同志：在形成反对派的问题上，共青团起了什么作用？

**彼得拉舍夫斯基**<sup>①</sup>同志：在武汉集团和南京集团之间存在着什么大的区别吗？如果存在，那么他们和解的困难是什么？

**波利亚克**同志：既然您注意到，在长沙存在着强大的反对派运动这种情况，那么您如何解释反革命能在长沙如此轻易地取得胜利呢？是否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当地共产党组织的消极性和无所作为来解释这一点呢？

**舒宾**同志：有哪些由代表团提出并遭中央委员会拒绝的组织措施在第五次代表大会上又重新提出来了并被大会采纳？也就是说，有哪些可以防止党在国民党进攻情况下遭到必然失败的措施？

### 罗易的回答

关于沃林同志提出的问题，为什么我没有谈最近的事件，即夏斗寅和许克祥<sup>②</sup>的起义，我是有意不讲这些事件的，因为这些事件发生在我离开中国之后。关于这些事件我所能通报的消息，想必在座的同志都已经知道了。至于我能否对这些事件作出政治评价，这是另一个问题，但是我的这个关于中国形势的报告带有通报性质，而不是政治性质。因此，我不认为有必要在这个会议上阐述自己的意见。

接下来是沃林同志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同国民党的未来关系，等等。将来国民党是否会成为革命的政党？我们对它将持什么态度？回答这些问题应该着眼于小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是否已经

① 伍朝高（音）。

② 原文如此。这里指的应是贺龙和叶挺。

发挥了自已的作用。我认为，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在革命中还没有发挥自已的作用。

只要小资产阶级依然是一个政治因素，总会有一个政党来代表它的利益。小资产阶级作为一个阶级还没有背叛革命，只有几个被我们看作是小资产阶级的代表的领导人成了叛徒。我们不能因为社会民主党背叛了革命，就认为处于社会民主党领导下的整个工人阶级也背叛了革命，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小资产阶级群众的领导人背叛了革命，就说这些群众都成了叛徒。所以我认为，国民党还是有前途的，共产国际第八次全会及其后来的指示已经指出了这一点。该党实行民主化，就会有前途。

至于苏维埃，我认为，现在这是一个宣传口号。苏维埃的口号不可能马上实现。如果革命运动在无产阶级领导下发展起来，而小资产阶级又坚决反对革命，那么建立苏维埃的必要性就会出现，为了做好这方面的准备需要经过一个宣传的时期。据我所知，正是出于这一点，才提出苏维埃口号的<sup>①</sup>，它不是根据实际需要提出的（格列尔：尽管您打算作一个通报性的报告，但是我看，您还是在阐述自己的意见）。是的，但我是在回答问题（格列尔：您还没有回答另一个问题）。那样一来，我就得讲很长时间。

我认为，对这个问题我已经发表了意见，尽管可能还不够清楚。我可以简要地重复一下我所讲的东西。这里又是谈小资产阶级的几个领导人和〔小〕资产阶级这个阶级。这些小资产阶级领导人背叛了革命，不只是由于这种纯客观的原因。但基本上是由于一些客观的原因，因为他们只有拥护土地革命，才能成为革命的领袖。既然他们反对土地革命，那么他们就必然反对一般的革命<sup>②</sup>。

至于对格列尔同志提问的回答，这又牵涉到我报告的性质。我

<sup>①</sup> 在俄文速记，记录中删掉了此段的结尾部分。

<sup>②</sup> 在俄文速记，记录中删掉了下面一段。

不想作政治报告，因为这样我又得讲半个小时。格列尔同志是请我改变我的报告的性质。我只想向你们通报一下情况。

至于法因贝格同志提出的关于长沙反对派等问题，我已经提到，中央委员会内的反对派在紧急关头停止了一切批评，然而地方组织并不是总按中央的指示办事。这有两个原因：首先由于地理位置，地方委员会不能与中央保持经常联系。因此，长沙的共产党员可能在客观上处于反对中央的立场上，因为他们不知道中央指示的内容。可是大家知道，当中央与长沙联系上的时候，地方同志就不再反对中央的指示了。

关于这个问题我再讲几句。确实，全党在政治上是同意中央政策的。但是不能认为中央的错误就是全党的错误。这是绝对正确的，然而，正如我在前面已经指出的，由于党缺乏经验，它没有足够的政治力量来采取措施，反对党的机会主义弱点，改变党的领导 and 成功地推举出好的政治领导。

下一个问题是如何将小资产阶级拉进革命。(法因贝格：为了把小资产阶级吸引到革命运动方面来，当时应该提出一些什么样的口号?)我们认为，小资产阶级不想反对革命。它在同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小资产阶级一方面受大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压迫，而另一方面受封建地主阶级的压迫。小资产阶级要摆脱压迫，如果无产阶级能够带领它去同这些压迫者进行斗争，那么它就会参加革命运动。小资产阶级应该同这些东西作斗争，但只有在无产阶级能够领导这种斗争的条件下它才能这样做。这就是小资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的立场。

至于避免同武汉决裂的客观可能性问题，现在没有这种可能性，过去也不曾有过。同武汉决裂是不可避免的。我已经说过，在阶级分化发展过程中决裂是不可避免的，唯一的一点是，由于发动进攻，这种决裂可能发生得早一些，但是，我们不可能防止这

种决裂<sup>①</sup>。

关于鲍罗廷的作用。我不想在这里回答这个问题。（座位上有人喊道：为什么？）噢，很简单，因为我不愿回答。

共产国际代表团由三位同志组成：维经斯基、多里奥和罗易。

接下来，我们是否可以说，资产阶级已经反对革命，或者说，封建资产阶级反对革命？我认为，资产阶级已经反对革命了。

法因贝格的下一个问题，涉及到五大期间的形势，也就是说，若是共产党提出更激进的口号，形势就会是另一种样子。当然，形势会是另一种样子。但是不能由此得出，似乎失败仅仅是共产党的错误和策略所致。失败是无法控制的阶级力量对比所致，而主观上也与之有关。这同样也适合于<sup>②</sup>……问题。也可能是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遭到了失败。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知道可能遭到失败，我们就不要再做什么事情了。若是党提出一些正确的口号，那么，即便没有肯定成功的机会，但成功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现在回答纳佐夫的提问。是的，总的原因是，中央不希望在代表大会上受到公开批评。此外还有另一个原因：党的一些领导人不同意共产国际的提纲。但是，他们又不想公开反对共产国际。所以他们只想表面上赞成提纲，尔后是否贯彻执行，那就取决于他们了。

回答维经斯基的问题，我应该承认，我对一些问题不很了解，因为我不确切知道，中央委员会是如何组成的。我只知道，对党的错误负有直接责任的几个同志已经离开党的领导岗位。例如，陈独秀，大概什么职务都没有担任。所以很自然，现在的领导看上去要比以前的领导好一些。其次，我们可以根据〔最近的事件〕作出判断。这几次武装起义是由我们党发动和组织的，这证明党的领导已经改善。但是在这里我想说，我并不赞同一些人的幻想，似

<sup>①</sup> 在俄文速记记录中删去了以下两段。

<sup>②</sup> 此处及以下删节号是原有的。



乎由瞿秋白领导党要好一些<sup>①</sup>。(座位上有人喊道：谁抱有这种幻想?) 我在我们党的刊物上读过几篇文章：谁是有前途的，等等。

至于共青团的作用，直到最近共青团一直都是跟着党走的。团中央和党中央之间没有任何分歧。就在党中央集体拒绝共产国际一切指示的最后时刻，团中央通过了一项支持共产国际提纲的决议。但这纯粹是表面上的步骤，不能说它的政治意义是巨大的。(座位上有人喊道：这是发生在最近那次全会上吗?) 这是发生在6月底。

至于武汉和南京之间的分歧，我不认为，提这个问题的同志想听听这种分歧的由来。如果是这样，那我不准备回答这个问题，因为这将占去太多的时间，何况，现在武汉和南京之间不存在实质性的分歧，而现有的一切困难都是由于想“挽回”他们领导人的“面子”和试图找到一种不损害彼此威信的联合公式造成的。但是起初他们之间是存在一些根本分歧的。

谈到在武汉的失败，我认为，我们党在这里所犯的错误比在任何别的地方都更严重。毫无疑问，在起义开始时反革命力量要弱得多，如果我们党采取进攻策略，那么，反革命可能会遭到失败。但是也完全有可能，如果我们采取进攻策略，反革命会得到汉口的支援，事件就会早一个月爆发。然而事实是，我们的同志对湖南的政策是最应受到谴责的，它带有不折不扣的失败主义性质。

最后一个问题是，共产国际代表团提出了哪些组织措施。在代表大会上，除了通过关于组织问题的决议（在这个决议中就党的基本组织问题作了具体指示）外，没有提出任何组织措施。代表大会之后提出过许多建议，其中有一些被党采纳，但没有贯彻执行。例如，多次决定建立党的地下机关，但一次也没有执行。党

<sup>①</sup> 在俄文速记记录中删掉了此段的结尾部分。

曾采纳过通过把各种武装队伍集中到一个地方，由武装的农民组建军队的建议，但遭到了中央的拒绝。后来我们曾建议在……和使……中立化方面采取组织措施。这个建议被采纳了，但没有实行。这就是没有贯彻执行三个最重要的建议，我们还提出了许多别的建议，在实践中也没有实行，但是我手头没有材料，我现在无法列举所有建议。

会议于4时30分结束。

全宗495，目录154，卷宗290，第1—26页。  
未经校对的英文速记记录。

全宗495，目录44，卷宗3，第221—242页。  
经过校对的俄文速记记录。

267

## 拉宾给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 和联共（布）中央的书面报告

1927年10月10日于莫斯科

绝密

共产国际东方部，联共（布）中央：

鉴于冯<sup>①</sup>已向右转，我前往汉口请求指示。我于1927年6月17日抵达汉口。我（代表北方教官组）提出了以下主要问题：

---

<sup>①</sup> 冯玉祥。

1. 中国西北部共产党人对冯所采取的立场的策略。
2. 共产党人在农民运动问题上的策略。
3. 俄国顾问对冯的策略(见我1927年6月18日发给莫斯科的电报稿,该文件将由侦察局补寄<sup>①</sup>)。

鲍罗廷在1927年6月17日接见我时声称:“湖南的农民问题不是什么大问题。那里发生的是流氓无产阶级、土匪之类的运动。为了解决主要问题——讨伐南京,应该平息湖南。”接着鲍罗廷说,过几天,由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共中央委员组成的专门委员会讨论这些问题后,再对北方组作出具体指示(见我从汉口寄给乌斯曼诺夫的第一封信,如果还保存着的话)。

在汉口的时候,我就收到过电报,建议我紧急返回前线,因为即将采取军事行动。我动身的日期定在1927年7月4日,而7月3日鲍罗廷给我作了以下指示(根据笔记本上的札记想起的):

“我不能给您确切的指示,我不知道莫斯科怎样对待这些问题。根据最近一些消息判断,莫斯科好像准备反对冯。我曾建议莫斯科等一等再说。教官组应该耐心地等待最后的决定。

中共在西北不要进攻冯。不要号召农民开展积极的土地运动。”

我问是否需要向冯及其将领声明,我们谴责他们的新方针,鲍罗廷回答说:“你们可以说,你们不同意,但是你们是军事专家,可以请求指示,谁是敌人,你们就帮助打击他。”(我要指出,我们没有作出关于军事专家的这种声明)

后来我得知,鲍罗廷6月17日给我们作指示的时候,他已经得到了最高领导机构关于开展土地运动的指示,而在7月3日他已经得到关于同冯决裂的确切指示。

这样,鲍罗廷一方面向我们隐瞒了党的指示,另一方面又向

---

<sup>①</sup> 文件没有找到。

我们下达了与这些指示相反的他自己的指示。至于说到鲍罗廷表面上违反党的纪律问题，我发现，他这样做给我们在中国的革命工作带来了很大的损害。

我听我们在中国的一些工作人员说，鲍罗廷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有过类似违反党纪的现象。征询这些同志的意见，就可以得到一些新的材料。

拉宾（谢福林）

本报告只一份，送共产国际执委会东方部赖特同志<sup>①</sup>。请将此件副本送联共（布）中央。

A. 拉<sup>②</sup>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40，第 132—133 页。

亲笔签名。

---

① В. И. 索洛维约夫。

② 指 А. Я. 拉宾。

268

## 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 大会上所作的《当前中国政治 经济形势》的报告

1927年10月23日于莫斯科

秘密

### 当前中国政治经济形势

(鲍罗廷在老布尔什维克协会会员大会上所作的报告<sup>①</sup>)

同志们：

要在一个报告里叙述我在中国4年多来所做的大量工作是不可能的。昨天和今天我整理了我手头上有的关于中国革命的材料，目的是想从中选出一些主要方面，并向您们讲讲这些方面。但是，我发现这也是一项无法完成的任务，因为没有任何主要方面不是与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整个形势和整个历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所以，我决定首先粗略地介绍一下重大事件，并以这些事件为背景，讲一讲那些揭示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失败的主要方面。

同志们！我们大约是在1923年9月抵达中国的。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国的事情并没有特别大的兴趣，至少不比对其他国家事

---

<sup>①</sup> 1927年11月18日该报告的副本曾送И.В. 斯大林、Н.И. 布哈林、В.М. 莫洛托夫、Г.В. 契切林、Л.М. 加拉罕和Я.К. 别尔津。

情的兴趣大。当时我们还没有关于中国的任何像样点儿的书籍；现在我们已拥有数量可观的汉学家。的确，在我们关于中国的知识中还有许多空白，但是已经有了关于中国的大量书籍，这个事实说明，我们迟早会了解中国的。但在那个时候，我们对中国了解甚少。我们毕竟还是着手做工作了，并在工作过程中了解了中国。

对欧洲国家不能这样说，我们有关于这些国家的大量书籍和这些国家革命运动的丰富经验。

在我们到达中国之前发生过哪些主要的历史性的重大事件呢？

首先是19世纪初的南京时期<sup>①</sup>。这个时期帝国主义通过签订一些不平等条约控制了中国。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满清王朝必须在是发动人民起来反抗入侵的帝国主义还是害怕人民这两者之间作出选择，结果它选择了让帝国主义掠夺和剥削这个国家。以中世纪的、封建的和半封建的土地关系为支柱的满清王朝，不可能迎合那些准备与入侵的帝国主义进行斗争的人士。它害怕发动人民群众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所以就向帝国主义让了步。有人辩护说，中国当时在技术上如此落后，根本没有能力阻止帝国主义的入侵。这种说法是不对的。

我们在中国期间确信这样一点：中国（我不是说租界）在这一百年间在技术方面很少有什么进步，而这个时期英帝国主义的技术却取得了巨大的进步，然而在广州和汉口却有大量群众投入同英帝国主义的斗争，使英帝国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

统治阶级当时怕发动民众，因为民众会从同帝国主义的斗争转入同封建土地关系的斗争，统治阶级宁愿让帝国主义掠夺也不让群众起来造反。

第二个时期是太平天国起义（农民革命）时期，这次起义的

---

<sup>①</sup> 原文如此，似应为满清时期——译者。

一个矛头是指向满清王朝所代表的土地关系，而它的另一个矛头必然是指向帝国主义。这个时期满清王朝和帝国主义联合起来镇压这场大规模的农民起义。

然而，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不仅仅在于此，还在于当时新兴的商业资产阶级（三合会<sup>①</sup>）害怕农民起义，因为他们一方面与剥削农民的行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另一方面与帝国主义也有着密切的联系。至今这仍然是这个阶级的一个特点。这个资产阶级害怕农民起义，因而加入了满清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联盟，目的就是要一起把太平天国起义镇压下去。

第三个时期——这是推翻满清王朝的时期。这个时期的突出特点是，从（以前曾与反动派和帝国主义一起镇压太平天国起义的）三合会中分化出来的国民党（当时它还不叫国民党），在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后，向帝国主义承担了满清王朝的义务。从国民党于1912年初在南京发表的著名宣言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国民党是怎样向帝国主义承担义务的<sup>②</sup>。同时它也向明朝皇陵鞠躬膜拜，好像以此来强调，它不会同旧制度即封建的土地关系决裂。这里又一次说明了资产阶级对国民革命的态度。

### 国民党对世界民主国家的幻想

除了资产阶级完全没有能力和不愿意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的斗争之外，以孙逸仙为代表的国民党对世界民主国家抱有幻想。由于他本人曾受过欧洲民主主义的教育，他认为，民主国家一定会为推翻满清王朝而高兴，一定会为革命成功而高兴，一定会为中国的进步而高兴，因此民主国家必定会来帮助中国。

但是，很快接踵而来的是失望。民主国家不但没有来帮助中

<sup>①</sup> 三合会是18世纪至20世纪初中国各种反满清秘密社团的名称之一。

<sup>②</sup> 可能指的是1912年1月5日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告一切友好国家书（见《辛亥革命（1911—1913）》（文献资料集），莫斯科1968年第139—144页）。

国复兴，反而给袁世凯提供贷款，而这笔贷款应用来镇压革命，甚至镇压资产阶级革命，袁世凯确实也这样做了，目的就是要保存满清反动势力赖以生存的一切基础，而有这些基础就可以保留中国这个世界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由于这种失望，在小资产阶级人士当中、在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等人士当中开始出现反对帝国主义的运动，但是这种运动还不够强大，所以不必详细地来谈论它。

此后不久爆发了世界大战，这时对世界民主国家的幻想又复活了。这场战争是打着民主和民族自决的旗号进行的，上述那些中国人士曾指望，这种情况也会影响到他们的国家。但是不久，威尔逊式的民主被日本改变成了二十一条要求<sup>①</sup>。在凡尔赛会议<sup>②</sup>上就已经看得很清楚，那里所说的并不是民主，而是帝国主义者的掠夺政策，中国从这场战争中没有赢得任何东西。后来中国看到了，什么是帝国主义民主的很具体的很明显的体现。在华盛顿会议<sup>③</sup>上，对这种民主会帮助中国复兴的期望竟成了笑柄。

在历史舞台上出现了一种新型的、真正的民主国家——苏维埃共和国，它真正实行了民族自决。苏维埃政府关于废除沙皇政府强加于中国的不平等条约的声明<sup>④</sup>，表达了与中国签订平等条约的愿望，在中国开辟了一个新的纪元、新的方向。

从那时起，开始了反帝运动，这场运动曾以不同方式寻求新的民主国家和工农政府的支持。但是，这场运动暂时还只包括小资产阶级和知识分子的上层集团，主要是大学生。他们的口号可

<sup>①</sup> 这里指的是1915年1月18日日本向中国提出的二十一条要求，目的是要在中国建立自己的经济和政治统治，大部分要求在1915年5月被中国政府接受。

<sup>②</sup> 凡尔赛（巴黎）和会于1919年1月18日至1920年1月21日举行。这次会议是由战胜国为拟定与战败国的和约而召开的。

<sup>③</sup> 华盛顿会议是根据美国的倡议于1921年11月12日至1922年2月6日召开的一次关于限制海上武装问题和太平洋及远东问题的会议。

<sup>④</sup> 可能是指1919年7月25日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发表的告中国人民和中国南北政府呼吁书（见《苏中关系（1917—1957）》（文件集）俄文版第43—45页）。



以归结为：“打倒面向世界民主国家和帝国主义的方针，面向苏维埃国家的方针万岁！”

### 中国共产党诞生和中国 无产阶级走上政治舞台

随着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入侵，中国在一定程度上开始了工业化。1914至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把帝国主义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前线上去了，这场战争加强了工业化进程。然而，这种工业化进程是极其独特的。首先，它主要是在租界地进行，这样一来，这些租界地将会成为经济、金融中心，而且也会成为控制全国的政治中心，这样这个国家仍然是个封建和半封建土地关系的国家。

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的这种工业化进程的一个最突出的特点是：三亿农民在遭受剥削，他们的劳动产品有50%以上通过以下三个主要渠道被掠夺走了：(1)一部分被商业资产阶级、豪绅、军阀等用去购买土地所有权，农民或作为雇农或作为佃农耕种他们的土地，条件是交出一半的收成，并受到前所未闻的政治压迫。(2)一部分进入租界，主要纳入与帝国主义分子合办的企业。(3)一部分被帝国主义分子掠夺，他们借助于被他们控制将近一百年的经济和金融命脉来进行这种掠夺。

由此产生了帝国主义分子与中国落后制度的一切剥削者及其封建和半封建土地关系的利益的共同性。因此，帝国主义者所推行的中国工业化进程并不带有进步性质，而带有掠夺性质，并且丝毫不会破坏落后的、古老的中国社会根基。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中，也就是在租界地工业化进程中诞生的无产阶级，必然会感受到双重的压迫：第一，它是被剥削的阶级；第二，它遭受外国资本及其在华国家机关的压迫。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斗争带有无产者和被压迫的中国人的斗争性质。

另一方面，随着中国资产阶级同帝国主义合作（或作为中间

人，即买办分子，或作为与帝国主义合资企业的参加者）而发财致富，也产生了所谓的民族资产阶级，虽然目前还不能把它看作是纯粹的民族资产阶级，可是它已经在剥削当地的无产阶级（一方面，它本身作为土地的占有者，与保存现有的土地关系有着利害关系，另一方面，它还没有彻底摆脱买办的性质，因此还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能够同帝国主义进行坚决斗争的力量，甚至在诸如海关自治这样的问题上它也不能与帝国主义进行斗争）。

领导着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政党，必然要率领无产阶级去同外国压迫和本国民族资产阶级进行斗争。这样的队伍不能不与所有关心自己国家能否摆脱外国压迫的其他集团和居民阶层联合起来。

在这种情况下，党很难做到随机应变，既要保持自己的阶级纯洁性，又要与非无产阶级人士一起反对外国压迫。为了能这样随机应变，党应该是一个有经验的党，也就是成熟的、经过无数次战斗锻炼的党。事实上，由于进行这种随机应变，任何一个理论家都会摔跤的，任何一个党都会犯许多错误的。这种经验要经过多年的实际工作，要付出犯许多令人极不愉快的错误的代价才能取得。

中国共产党是在1920年组建的，我已经提到，我们是在1923年9月到达中国的。因此，共产党已经存在三年了。在这三年间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工作就是领导知识分子同帝国主义作斗争。如果不算1922年的香港经济大罢工<sup>①</sup>和京汉铁路大罢工<sup>②</sup>，那么，还不能说，中国共产党在这三年内参加过群众运动。所以，在广东，其中包括广州，1923年9月，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只有35

<sup>①</sup> 1922年1月12日至3月8日在香港举行的海员大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和工会参与招募海员的工作。

<sup>②</sup> 1923年2月京汉铁路干线工人举行一次大罢工，遭到吴佩孚军队的残酷镇压。

到 50 名共产党员就不足为怪了。而在全国，如果我也没有记错的话（我强调说“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是因为很难确定当时的准确数字），根据一些材料的说法，共有 950 名党员，而根据另一些材料则不超过 2000 名党员。

如果就我在广州所遇到的一些共产党员来说，共产党员对于他们为什么要当共产党员，认识是模糊不清的。我不是说普通党员（在这 35 到 50 名党员中有几名工人），我是说上层领导。在我所遇到的落后共产党员当中有些最落后的党员。谈不上有什么中文马克思主义著作。关于列宁主义，他们只知道，列宁创建了工农政府。他们几乎不了解我们的革命历史，不了解为建立工农政府而斗争的历史。即便那些读过一点马克思主义和列宁主义书籍的人，也不能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来解释在中国发生的事情。

正如你们知道的，中国人民的大多数是由农民构成的，但是如果你们听说中国连一本关于土地问题的书籍都没有，你们一定会感到惊讶。你们可以翻阅一下那个时期的所有书籍，你们在那里可以找到许多关于阿伯拉罕·林肯和华盛顿的材料，他们什么时候出生，什么时候结婚以及他们都做了什么事，但是你们却找不到描述中国农民如何生活的一行字。

对工人阶级的认识也是一样。中国无产阶级是什么样子，他们的概念是很模糊的。

在世界革命的时期，在为保卫苏维埃政府而进行巨大斗争的时期，从知识分子的队伍中出现了一些对自己的处境、群众的处境和国家的处境不满的群体。我记得，在一次关于中国共产党人是些什么人的争论中，一些人说，他们是国民党左派，是国民党的反对派，而国民党在我们到达中国前就已经苟延残喘了。共产党就是从那些没有在国民党内找到什么革命工作的最年轻的分子中孵化出来的。

## 主要问题

同志们，当时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共产党。这是主要任务。我们可以走组成小组的道路，也就是把这些共产党人团体集合在一些小组里，并给他们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等等，或者，把一个年轻的党放到群众中去，在群众斗争的过程中将其锻炼成真正的党。我们选择了第二条道路。

由于在群众中和大规模群众运动中做工作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已经拥有约5万名党员，共青团员不算在内，并且它已成为在工农群众中具有很大影响的党（如果说不是唯一具有影响的党）。但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一个能够站在广大群众的前列并带领这些群众去夺取政权的党。今天还不能从这个角度看中国共产党，它还应该经受大的试验<sup>①</sup>，首先要善于真正带领群众去实现专政。它正在通过犯一系列的错误做着这种试验，但是它在非常迅速地做着这种试验。

在解决如何在中国建立一个真正的群众性的政党的问题过程中，我们自然面临着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问题。

我已经指出，国民党当时正在苟延残喘。1911年满清王朝被推翻后，大约到1924年初，这个党已经失去了自己的面貌。孙逸仙从（广州附近的）海南岛宣传自己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及五权宪法。但是他没有政党，他只有一些信徒，分散在各地的信徒。然而，孙在中国享有极高的威望，人们认为他是中国革命之父，是推翻满清王朝的人，是与袁世凯反动势力和其他军阀作斗争的人。

我们需要确定对待这样一些力量的态度，这些力量虽然还不拥有真正意义上的政党，但却代表着现实的力量，这就是小资产

<sup>①</sup> 原文如此。

阶级、非阶级化的知识分子等等。所有这些群体构成一支巨大的现实力量，孙逸仙博士在它们当中享有极高的威望。

首先，需要创造能够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

同志们，请你们把拥有四千万人口的广东省地图铺在自己面前，你们的手指不论指向地图上的任何地方，你们都会碰到某一个军阀的司令部。军阀与豪绅勾结在一起。豪绅是中国封建和半封建制度的最好体现。在这种条件下谈论任何广泛的运动都是不可能的。

35到50名共产党员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打败压迫广东省4000万人民的整个反对派，或者说1000名共产党员也不可能打败布满士兵的整个中国领土上的反动派。首先，需要肃清统治广东的反动势力。对于整个中国来说，也需要做同样的工作。

你们只要注意一下京汉铁路大罢工的后果，你们就会相信，工人们的经济斗争遇到了何等巨大的困难。与任何其他现代国家机器不同，军阀直接驻扎在各地；他们直接控制着某一个地区，而整个这个地区布满了士兵。要肃清广东省的这些势力并在那里建立开展群众运动的某种根据地，然后再在其他省份做同样的工作——这就是当时第一位的和最主要的任务。若是我们没有做到这一点，若是我们没有创造出可以谈论群众运动的条件，那么现在也就不存在像今天这样尖锐和明确的中国问题了。

在中国即使有一些共产党员在各地的小组中耐心地做工作；在莫斯科这里即使有一些受到我们良好马克思列宁主义训练的中国人，有一些优秀的、纯粹的、坚定的共产党员，至今也不会有任何群众运动。中国仍然会处于以前的状态。也不会有真正特别的中国问题。中国问题在我们这里也就会与印度问题一样了。

为了创造条件开展群众运动，使中国共产党在群众运动中锻炼成为一个真正的共产主义政党，需要与孙逸仙领导的国民党结成联盟，共同打击中世纪残余，打击中国反动势力。此外，还需

要帮助国民党成为一支多少有组织的力量，否则国民党绝对没有能力帮助人民群众从军阀手中解放广东地区和尔后解放几乎半个中国。

但是，广东自身可以依靠的那些力量，并不是能够组建一个有能力同强大的反动势力进行斗争的政党的力量。诸如小资产阶级、非阶级化的知识分子等等这样一些阶层，没有而且也不可能从自己的群体中推举出这样一些人士，他们能够真正组建政党并真正通过政党来同那些阻挡我们前进的势力作斗争。

共产党人应该担负起这项任务，共产党员应该加入国民党，并在这个国民党内成为团结和组织一切可以被我们用来为群众运动铺平道路的力量力量的主要杠杆。

但是，共产党人进入国民党后，就向国民党提出了保证开展群众运动的条件，提出了保证共产党人能够在群众运动中成为领导力量的条件。共产党人对国民党说：“为了使你们能够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一定作用，为了使你们能够实现你们的领袖多年来宣传的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为了这一切你们必须有一个符合广大民众需要的纲领。除了纲领还必须有相应的策略，以及能够同反动势力作斗争的一支属于党的军队。”

根据这些建议，1924年1月开始了国民党的改组时期。国民党一大（共产党人已作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通过的纲领重申了孙逸仙的三民主义，同时说，只有在满足工农群众的日常的以及一般的经济和政治要求的基础上把他们吸引到革命运动中来，才有助于实现三民主义，因此，国民党首先应该面向工农大众。这样就仿佛打开了通向无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领导权的大门<sup>①</sup>。

至于实现三民主义的方法，在这里清楚地阐述了所谓的三大政策或三项策略，即（1）联共；（2）扶助农工；（3）联俄。

<sup>①</sup> 关于国民党的改组情况，见《联共（布）、共产国际与中国国民革命运动（1920—1925）》文件集第1卷。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根据这种纲领和这种策略，我们立即着手组建以黄埔名字而著称的革命军队<sup>①</sup>。

### 国民党与买办资产阶级进行武装斗争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呢？

在国民党改组之后，受英帝国主义影响和领导的买办资产阶级在广州立即开始反对我们。当时这个资产阶级已经武装到足以向国民党和共产党的联盟，向无产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革命知识分子的联盟发起公开挑战的地步。当时，好像一个决定性的时刻来到了：要么经过改组的国民党同这个武装的资产阶级妥协，要么粉碎这个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并以此来证明它没有辜负人民对它的期望。

若是当时国民党动摇，若是当时它同这个资产阶级妥协，那我们就会清楚，不应指望在这种条件下利用国民党来开展群众运动和发展中国共产党。因此，很可能就在这个时候（这是在1924年年中），国共联盟就被废除了。但是，国民党当时毫不动摇：它勇敢地与这个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展开了斗争，派炮兵去攻打这个资产阶级，没有在这个阶级的商业堡垒（韶关）面前怯步，这对中国来说完全是空前的壮举。

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被国民党击溃，这个事实证明，我们与它结盟并没有错。在解除广州资产阶级武装之后，广州和其他城市的群众性工人运动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随后在整个广东省农民运动也出现了空前的大发展。

到1924年底，我们已经能够向该省其他地区资产阶级的主要力量，向广东地主的主要武装力量，即向陈炯明发动进攻了。陈炯明也被击溃了，这就为该省仍处在陈炯明统治之下的其他地区

<sup>①</sup> 原文如此。

开展群众运动提供了很大的可能性。

### 孙逸仙之死和国民党内的派别

就在对陈炯明——这个地主资产阶级的武装力量进行讨伐的时候，孙逸仙去了北方，不久在那里病逝。孙逸仙之死带来的后果是，国民党开始暴露出它作为小资产阶级政党所固有的那些矛盾。

国民党右派明显地暴露出来，他们在北京成立了自己的宗派，即自己的俱乐部<sup>①</sup>。这个俱乐部的纲领更像政党的纲领，而不是俱乐部的纲领。国民党右派的活动以1926年初召开的上海代表会议而告结束，他们成立了自己的中央委员会<sup>②</sup>。

另一方面，在孙死后不久就出现了著名的戴季陶理论，该理论为在国民党内出现有组织的中派奠定了基础，并且代表中等资产阶级的利益。该理论提出，在中国不应有阶级斗争，孙文主义否认阶级斗争，孙文主义教导说：“行易知难”，应该让群众有知。稍晚些时候就一清二楚了，戴季陶主义在这方面就意味着：让群众坐在学校的板凳上，说你们去学习吧，而我们资产阶级去争取中国的独立。

最后，汪精卫之类的左派否定戴季陶理论，并倾向于接受我们的以下看法：中国能够摆脱帝国主义而取得独立，中国只有使农民摆脱封建和半封建制度残余的情况下才能争脱中世纪的羁绊，而这只有在农民非常积极地参加自己的解放事业时才能实现，中国解放运动的主要动力之一恰恰就是阶级斗争。

很自然，我们在国民党内正是试图同这些左派联合并同他们

---

<sup>①</sup> 指1925年3月8日在北京成立的以冯自由、马素及国民党右翼其他代表为首的国民党员同志俱乐部。

<sup>②</sup> 这里指的是1926年3月29日至4月10日在上海举行的所谓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



一起与右派和中派进行斗争。我们还同左派一起在群众中作了大量的工作。

当我说同他们一起的时候，这并不意味着，左派也到工农群众中去并在实践中证明自己同意对中国国民革命的某些看法。不是的，他们没有到群众中去，但是他们也没有妨碍我们这样做。他们不但没有妨碍我们，而且当他们在国民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中居多数的时候，还完成了好像是中共通过群众向他们提出的一些任务。

在孙逸仙去世之后，早在他去世之前就开始的对陈炯明的讨伐胜利结束了，随后又开始了对广东军阀残余、对云南和广西军阀的讨伐。1925年6月12日云南和广西军阀被击溃。因此广东省才得以统一并成立了国民政府。国民党中央领导下的国民政府丝毫没有妨碍工农群众的开展。

1925年6月21日在广州街头发生了英国人枪杀中国人的事件，这表明，从1924年初改组国民党时起，群众运动已经发展到这种程度，以至在拥有四千万人口的英帝国主义的腹地（广东），英帝国主义的利益已受触动，它再不能容忍中共所领导的群众运动的发展。

你们知道，在这之后爆发的省港大罢工起了何等巨大的作用。省港十万工人宣布对香港实行真正的封锁。所有交通干线都被切断，过去通过这些交通干线不仅从拥有四千万人口的广东送来了财富，而且从拥有约八千万中国人的整个香港势力范围送来了财富。国民党给十万工人提供了一个地区，从那里可以与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同志们，若是广州当时处在军阀的统治之下，而且这些军阀是在国民党以同共产党联合为基础进行改组以前的那个样子，那么在当时就不会发生工人与英帝国主义的这场斗争。

十万人转移到广东的土地上，在那里他们好歹有国民党政府提供食宿并获得了在与帝国主义的斗争中开展对十万人进行共产

主义教育的一切条件。

情况就是这样，下述事实可以证明：1925年5月底，上海发生了枪杀中国人的事件，当时香港和广州的工人并没有能够开展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因为广州处在云南和广西军阀的统治之下。当6月12日云南和广西军阀被击溃之后，他们就被清除出广州，我们才有了同帝国主义作斗争的根据地。

在持续16个月的时间内，香港和广州的无产阶级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大规模的斗争。他们不仅切断了从香港通向八千万中国人地区的所有交通干线，而且还成立了极其庞大的组织，实际上控制了广东的经济生活，控制了金融生活并指导了国民政府的对外政策，行使了司法和行政职能。罢工委员会成了政府。

在持续16个月的时间内，数万工人真正获得了学习的机会，罢工者成立了大量学校。一切有助于对工人群众进行革命教育的工作都做了。数万名工人分赴广东、广西及其他省份，在农村传播革命思想，在农民中间进行宣传，组织他们参加农会。

国民党中央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变成了罢工委员会下面的书记处。我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里当顾问，我知道（根据记录可以想起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实际上已变成了罢工委员会下面的书记处，共产党员利用了这个情况，广大民众也利用了这个情况。数万名中国工人以前从来没有机会像当时在广州那样受到良好的革命教育，不仅在学校的课堂上，而且还在实际的斗争中。

当外交部长叶夫根尼·陈<sup>①</sup>需要同帝国主义的代表进行谈判时，他首先就得征求罢工委员会的意见。罢工委员会不表态，就不能把问题提交工人代表会议讨论。600到800名工人代表经常举行会议，每一个问题（是否涉及，比如说需不需要封锁台湾）都提交代表会议讨论，工人们发表意见，指出在这种情况下该怎么

<sup>①</sup> 陈友仁。

办。

任何一个工人都不会忘记这一堂课。中国工人在自己的斗争历史上一下子有了政权，他们知道，他们有了政权，他们懂得它的意义<sup>①</sup>。

### 廖仲恺被杀害和同反革命的进一步斗争

同志们，不言而喻，这种运动不能不引起英帝国主义和那些把群众运动的这种高涨看作是对自己的致命威胁的阶级的反击。

这种情况也引起了国民党内业已存在的派别组合和重新组合的深化。昨天的中派分子胡汉民今天却在暗地里支持右派反对群众运动。以许崇智为首的粤军昨天还同我们一起跟地主和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作战，而今天却被群众运动的高涨和它的性质吓破了胆，或明或暗地支持群众运动的敌人，包括帝国主义者在内。

但是，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还很强大，而中派更怕反动派，而不是群众运动和共产党人。他们本身还没有力量来发挥独立的作用。他们只是在1926年3月20日试图发挥这种作用。现在我们还可以一起打击反动派和帝国主义。

1925年8月20日，英帝国主义和广东买办地主阶级的代理人雇用的杀手杀害了廖仲恺，这位军队的政治委员、财政部长和国民党工农部部长倒下了（这里应该说明，他这样兼职是因为缺少可靠的有经验的人才）。

恰恰是国民革命军的政委被害，这不是偶然的，因为正是他任政委的这支军队曾与广东的反动军队进行过主要斗争。财政部长被害，这也不是偶然的，因为封锁英帝国主义在太平洋的堡垒

---

<sup>①</sup> 当时，我们能否把工人代表会议变成苏维埃呢？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做到这一点。全国到处都笼罩着前所未有的反动气焰，而在广东，虽然我们击溃了反动军队，但当地的运动还没有充分开展起来，我们还不能与封建势力展开坚决的斗争，还不能与豪绅和当地的政权展开坚决的斗争。我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这样做（鲍罗廷注）。

(香港)期间,广东的财政第一次摆脱了对英帝国主义的依赖。在封锁香港之前根本谈不上什么中国的财政:整个财政全受英帝国主义控制。在封锁香港期间,广东的财政从孙逸仙时期的每月30万元增加到1200万元。国民党的农民部部长被害,这也不是偶然的。子弹是射向工农运动的。

在廖仲恺被害后,我们立即又使广东的反动势力遭到一次惨重的失败。我们打着与日益逼近的反革命作斗争的旗号,同中派一起向粤军和右派发动了一次总攻。

如果说以前我们只是打击了广东反动军队中的陈炯明,如果说以前我们只是摆脱了桂军和滇军,那么在廖仲恺死后,我们也打击了昨天还跟我们一起行动的粤军。粤军的首领许崇智,是豪绅和买办资产阶级武装的代表,为对杀害廖仲恺的事件作出反应,我们同这些军队进行了斗争,并于1925年8月24日夜里在广州解除了他们的武装。胡汉民被驱逐,许多右派分子被逮捕。

### 中派准备向群众运动和共产党反击

此后群众运动的力量有更大的发展,这里大家看得很清楚,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国民运动中的领导权已开始显现出来。

当我谈到,工人们进行英勇的反帝斗争的时候,你们应当清楚,工人们并没有停留在反帝斗争上,工人群众不可能在为民族的解放而进行反帝斗争的同时忘记自己的日常要求。这一点的明显而具体的体现是:爆发了反对资产阶级,甚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巨大罢工浪潮。

除了省港大罢工以外,还爆发了争取缩短工作日和提高工资的罢工浪潮。工人们走得更远,他们为争取参与企业管理或者所谓的工人监督进行了斗争。由于进行了香港大罢工,工人们感觉到了自己的巨大力量。他们就把这种力量变成了争取改善自己经济状况的斗争。工人们的这种斗争被戴季陶的中派理论说成是破

坏虚弱的、尚未壮大起来的资产阶级基础的斗争。

根据戴季陶的意见,工人们还没有充分做好采取行动的准备。他又谈到,孙逸仙的那句名言:“行易知难”。应该让工人们有教养并懂得,到那时才能采取行动。实际上这是否定阶级斗争。此外,中派的理论把孙逸仙同儒家思想联系起来。实际上这种理论就是像1911年国民党的领袖们祭拜明陵那样,不能与过去决裂,而过去是建立在中世纪制度基础之上的,是建立在封建和半封建土地关系基础之上的。实际上,这一方面是谴责农民运动,另一方面是谴责工人运动。

基于这种理论产生了孙文主义学会,该学会实际上抱定的目的是打击无产阶级和农民在国民革命运动中日益增大的领导权和在这种运动中的中国共产党。

随着群众运动的高涨,中国共产党也在成长壮大。这时中国共产党已经有了自己相当有影响的报刊:为工人办的报纸,专为农民办的机关刊物,并且不止一种,而有几种,用各种名称:《农民》、《犁头》<sup>①</sup>,月刊、周报,所有这一切都表明了他们觉悟的提高和他们的力量。

正如右派在孙逸仙去世后不久在北京成立俱乐部一样,孙文主义学会也不得不成立一个宗派,因为他们在国民党内已失去了生存的土壤。他们到处碰到共产党人:这些共产党人或者以共产党员身分公开工作,或者按照党指派的任务在秘密地工作(要知道,即使在最好的形势下,我们在国民党内工作也总是既公开又秘密的;这就证明,我们对于国民党的未来并不抱有更多的幻想,我们在国民党内一直有秘密工作的同志)。

孙文主义学会在自己周围聚集了所有反对他们所说的过分发展群众运动,过分发展中国共产党及其在国民党内的影响的分子。

<sup>①</sup> 这里指的刊物是:《中国农民》(1926至1927年在广州和武汉出版)和《犁头》(1926至1927年在广州出版)。

蒋介石是孙文主义学会的支持者之一，起初是秘密的，而后就公开了，他虽然满口革命词藻，但从1924年他活动一开始，他就捍卫资产阶级在国民革命中的领导权。他现在仍然是这样的人。对于这一点，我们不曾抱有任何幻想。我们要求他做的一切，都是让他把自己的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而我们知道，在中国要把资产阶级革命进行到底就意味着要完成这样一种变革，即把政权交到无产阶级和农民手中。

正是这一点，即资产阶级对日益临近的无产阶级和农民领导权的恐惧，可以说明为什么中派试图在1926年3月20日发动政变。

### 1926年3月20日中派试图夺权

对3月20日事件有几种解释。请允许我谈谈这些解释。

(1)以蒋介石为首的新军指挥人员企图摆脱党的日常监督，摆脱政治委员和政治指导员的管束。

与此相联系还需要讲讲军事因素和政治因素。在改组国民党的同时，组建了新式的（黄埔）军队。这支军队在数量上和质量上都在日益增长和提高，但同时工农群众运动也在迅速高涨。国民党也在成长壮大，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内起着主要作用。对群众运动的影响全部控制在共产党人的手中。甚至在黄埔军队中也聚集了许多共产党人（我们当时把可以从其他省调来的共产党员都派到黄埔军队中去了。凡能找到10、15到20名共产党员的地方，如果可以让他们脱离群众工作，我们就把他们派到黄埔去。他们在这支军队中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因此，在对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中哪种因素在中国起主导作用的不断争论中，党变得越来越成熟了，以致它通过政治指导员和政治委员开始对军队实行了有力的监督。于是为了使军队摆脱国民党的监督，摆脱群众运动和共产党人的监督，军队必须发动

哗变，以使自己不受政党的全面监督。

(2) 共产党人在军队中的影响日益增强，他们企图搞掉蒋介石、逮捕他并将他遣送到海参崴。

这里谈到的阴谋，似乎俄国同志也参与了。这次阴谋应以逮捕蒋介石而告结束。好像打算把蒋介石押上巡洋舰，送往海参崴。这就给蒋介石突然对阴谋分子采取行动提供了口实。

(3) 资产阶级起初通过戴季陶和孙文主义<sup>①</sup>，而3月20日通过在蒋介石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向无产阶级和农民发起反击，因为后者企图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夺取国民革命领导权。资产阶级本身企图夺取这种领导权，企图使工农运动服从自己的领导并把中国共产党排挤出工农运动之外。

(4) 中派分子戴季陶和蒋介石以及资产阶级思想家们，企图打破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联盟，也就是打破无产阶级、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和非阶级化的知识分子(汪精卫和中国共产党)的联盟，这个联盟实际上是在1926年1月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形成的。

(5) 纯中国中世纪式的解释。中国对于它的两个伟大的儿子蒋介石和汪精卫来说是不够大的。因此，总有一个儿子必须出走。汪精卫出走了。实际上这就表明，在政治因素和军事因素的冲突中军事因素取得了胜利。

(6) 某些共产党人，其中包括维经斯基、拉菲斯等同志所作的解释<sup>②</sup>，有点儿像中世纪的解释。共产党人追求国民党内的职位，突出自己而不是把国民党左派推举到负责职位上去。他们不懂得，3月20日事件并不是争夺职位的斗争，而是对城乡群众运动高涨的反击。3月事件制造者的得逞，意味着群众运动实际上已收缩。

<sup>①</sup> 原文如此。

<sup>②</sup> 见第94号文件。

同志们，3月事件发生时我不在广州，我在北京，我当时试图把冯玉祥争取到我们方面来。张作霖和其他北方〔军阀〕正向北京施加压力。如果冯玉祥接受抛弃段祺瑞并建立临时政府的建议，他是可以打退北方军阀进攻的。我们对他说，这个临时政府将会得到我们南方的支持和中国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冯玉祥当时没有接受这个建议。他认为，他最好去莫斯科，“当一名工人”。他说，“在我们这里，不是靠说教，而是靠个人榜样来教育人。如果我去莫斯科，并在那里当一名工人，那么大家就会说，工人的手艺也不错啊。”

3月20日过后我立即前往广州，为的是就地弄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和今后该怎么办。

对于3月20日事件的起因，蒋介石除了说有人要逮捕他，没有提出任何别的理由。而要把他送到海参崴去的那艘巡洋舰的共产党人政委已转到他的一边并似乎已承认，他应成为实施这次阴谋所借助的工具。汪精卫似乎也参与了这起阴谋。

我认真地听取了他的讲述，当然，我很清楚，这里说的不是反对他的阴谋，这里说的是这样一个时刻来到了，即在群众运动日益高涨和中国共产党日益发展壮大的情况下，我们之间以前存在的团结一致，以及同阻挡他现在所代表的资产阶级前进的反动势力的斗争，要被我们之间的斗争所取代。

3月20日政变实际上说明了什么，这次政变与华中的政变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在这里作出的回答是“不决裂”，而在长江上我们却与蒋介石决裂了？

3月20日政变与长江上政变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根本没有触及我们开展工农运动的可能性。这次政变的矛头不是直接指向掌握大权的罢工委员会。这次政变的矛头不是直接指向群众运动。当然，客观上它是针对工农运动的，但是实际上它根本没有使我们失去继续进行我们以前那种规模的工作的可能性。



具体地说，它触及到这样一个问题，即共产党人是否应该在国民党里继续掌权。共产党人从一开始加入国民党时就有明确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在发展群众运动的过程中利用一切可能来发展自己。既然还存在这些可能性，共产党人就可以在国民党内的职位问题上作出让步。

曾经有一个时期，对我们来说，谁当国民党组织部部长是极其重要的，因为在国民党组织部的帮助下，可以找到到农村中去、到群众中去的途径。而现在，组织部对于我们来说已经不再那么重要了。没有它我们也可行，因为我们在群众中已经拥有牢固的基础，可以从国民党的某一职位上退下来并对他们说：“请上任吧。”撤掉共产党员担任的职位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困难，因为这种职位对我们来说已经没有从前那种价值了。

我们可以撤出一些共产党员，这对我们的主要工作不会有什么损害。因此，在3月20日和5月15日全会<sup>①</sup>之间，我们准备在国民党内的职位问题上作出让步，而在这次全会上我们作出了让步，从而赢得了机会去坚持由省港工人掀起的反帝斗争，去坚持当时已经席卷全省的罢工浪潮和去继续组织农民协会。我们决没有因为撤掉某一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内担任的领导职务而失去发展和深化革命运动的任何机会。

如果当时我们不作出这些让步，那就意味着，3月20日是我们同国民党合作的结束。那时我们就会滞留在一个省内，我们就会得不到我们在进行北伐后所赢得的那种发展群众运动的机会而被击溃。（省港）罢工就会以惨败而告终。罢工运动的浪潮就必然会退落下来。在广东省就会发生一场大内战，在这场斗争中我们会遭到反动派和帝国主义的镇压。

帝国主义分子正是期待我们不对中派作出任何让步，甚至在

---

<sup>①</sup> 指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二届二中全会。

诸如占据国民党内某些职位的这种并不重要的问题上也不作让步,以便破坏我们与帝国主义的斗争并为入侵广东省找到借口,从而使我们丢掉经过如此艰难才取得的所有成就。

我们需要在其他省为自己争得像我们在广东省所拥有的这种工作条件。在中国的一个角落,虽然是很重要的一个角落,我们也不可能站住脚,我们会遭到灭亡。在迎战三月分子之前,无论如何要进入其他省份,并在那里依靠更广泛的群众运动。

现在,当我回顾当时的整个情况并问自己:当时我们是否犯了一个错误,或许当时需要对中派说:“我们靠与国民党的联盟赢得了那么多东西,以后我们就不同路了”,当时我得出结论:我们做得是对的。我当时本能地感觉到这样做是对的。一开始就应该去摇动、推醒广东省以外的广大工农群众,使他们从沉睡状态中清醒过来。如果3月20日过后立即同中派进行斗争,那我们就会遭到失败。那我们就会对广东也有对巴伐利亚共和国<sup>①</sup>那样的回忆,也许还少一些。在广东的某个地方群众曾作过奋起,力图使自己的国家摆脱中世纪的束缚,并把它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的大胆尝试。这次尝试没有成功,此举暂时也就这样结束了。

当时向三月分子所作的非本质性的让步被后来的事态发展证明完全是正确的。未能击溃我们的三月分子也必须退却。同我们决裂对他们来说也是不利的,他们也明白,那样做的话,不仅我们会被毁灭,而且他们也会被毁灭。因此,我们似乎达成了一种保存统一战线的默契:三月分子急于投奔自己的天然基地,投奔华中的资产阶级,我们共产党人所追求的则是在华中开展大规模的工人运动。到华中去,到工业中心去,这对双方都有利。因此进行北伐可以从两个方面作解释:一个方面是急于接近其他省份的广大工农群众,而另一个方面是急于投奔自己的资产阶级基地。

<sup>①</sup> 指1919年4月13日至5月3日一度存在的巴伐利亚苏维埃共和国。

## 关于北伐

北伐的目的是什么呢？

在广东，革命与反革命之间在革命的一些基本问题上的决斗已不可避免，从这个角度来说，广东的群众运动已达到顶点。与三月分子一起进行这场决斗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力量，即便与左派联合，也是不够的。需要吸引其他省份的群众参与这场斗争。由此就想起了对我们自己当年经华沙讨伐欧洲的议论。

当时曾把事情想象成这样：如果讨伐成功，欧洲将会出现无产阶级革命，那时我们就完全不必为未来担心了。如果讨伐失败，就要实行新经济政策。而如果这种新经济政策被用来作为在苏维埃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杠杆，那么这主要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强大的无产阶级政党，并且这个党在实行新经济政策以前，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灭了反革命。

我不想把当时我们在广东的那些议论同这种情况作对比，但是外在的相似之处是存在的。在广东，问题是这样摆着的：或者是向长江进行胜利的讨伐，并发动最广大的民众，从下面消灭三月分子，或者是我们留在广东，在英帝国主义和国内反革命的双重压迫下苟延残喘。

不管怎样，我们都应该选择中国群众运动的宽阔大道。一旦向长江的讨伐不成功，或者说我们根本不进行这次讨伐，那么我们在广东就站不住脚，因为在广东没有我们在俄国所拥有的那种基础和那样的党。我们的灭亡是不可避免的。同英帝国主义在广东的斗争已使敌人受到重伤，但还没有打败它。要么向它投降，要么同它战斗。这意味着什么呢？

数十万省港工人同英帝国主义进行了长达数月的大规模斗争。这场斗争大大动摇了英帝国主义在太平洋地区的基础，但是，英帝国主义在中国本土，主要在华中，还拥有足够的力量来坚持

在华南进行的这场斗争，因此，无论如何都必须扩大同英帝国主义进行的这场斗争，也就是说，必须把这场斗争转移到对英帝国主义来说最薄弱的地方，即长江流域。

我们觉得只在华南，特别是只在广州，同英帝国主义继续进行斗争，是极其困难的，投降是必不可免的<sup>①</sup>。

北伐的总方针是什么呢？

当时还没有谈到无产阶级、农民和城市民主派的民主专政。我们当时还坚持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的提纲和 1926 年 3 月召开的共产国际扩大全会的决议<sup>②</sup>。至于第一次把我们在中国的斗争具体化的决议，即 1926 年 12 月召开的第七次全会的决议<sup>③</sup>，那么，很遗憾，12 月在莫斯科通过的这些决议，到达我们长江地区那里大约是在 3 月(?)<sup>④</sup>。这是因为我们正在从广州前往汉口的路上。而我们到汉口不久，帝国主义者和北方军阀，实际上就向我们宣布了封锁。无论从中国还是从这里发出的消息都糟糕透了。所有线路和所有交通工具都掌握在敌人手里，要打破这种封锁是极其困难的。

在北伐过程中我们拟定了以下任务：

1. 以农民争取政权和土地的斗争和以城市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为基础开展群众运动。

2. 此外，同帝国主义作斗争是主要任务之一，为此需要在反帝的旗帜下聚集一切可能聚集的力量。

<sup>①</sup> 我个人的意见是：应该设法坚持这次罢工，直到我们抵达长江地区的时候。在那里我们与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就能赢得广东的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斗争。然而我们中止了这场罢工，仿佛作了妥协：好像只要我们到达长江地区，斗争就会展开，而这时广东的工人将得到休息，而后能重新采取行动（鲍罗廷注）。

<sup>②</sup> 指的是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提纲、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补充提纲以及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六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案和关于中国问题的提纲（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俄文版第 6—14、58—63、67—83 页）。

<sup>③</sup> 见《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集）》第 89—105 页。

<sup>④</sup> 原文如此。

3. 利用军事集团间的矛盾来削弱三月分子的军事力量。我们一刻也没有忽视这项任务。这样做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我们在这之前，也没有放弃利用一切彼此对抗的军事集团。当时放弃这种做法的时刻还没有到来。

4. 加强和组建共产党的部队。例如，叶挺是带领一个团从广州出发进行北伐的，他的团在北伐期间应扩编成一个师，如果可能的话，也可以扩编成一个军。不管在哪里都有处在我们影响之下的部队，都需要给以加强，凡有条件的地方，都应组建新的部队。

这就是北伐时拟定的四项基本任务。

第一项任务——开展群众运动——做得还不错。至于第二项任务，即同帝国主义的斗争，已发展成很大规模。到1927年1月，我们已能收回在长江中游的英租界<sup>①</sup>。

至于第三项任务——为削弱三月分子，在不同军事集团之间进行周旋——也可以认为是成功的，因为我们曾利用保定派来反对蒋介石。我们十分清楚，蒋介石是什么人，我们凭经验也知道，在与唐生智的联系中可以指望得到什么。

至于第四项任务——扩充我们的部队，这里的情况并不妙。叶挺走的时候带领一个团，到达华中时还是一个团。这项任务没有完成。本来是可以完成这项任务的，因为在打败吴佩孚、孙传芳及其他任何军阀情况下，是有机会扩充武装的。每一个军阀，无论他属于保定派还是黄埔集团，即蒋介石集团，都在力求尽可能多地招募人员，情况就是这样，当时我们也可以组建自己的部队。

我们再来谈北伐。国民革命军打败了吴佩孚和孙传芳，向亿万人民表明了旧制度的注定灭亡和革命的威力。从而不管军队领导人的意愿如何，唤起和组织广大民众同中国殖民主义军阀制度

<sup>①</sup> 指1927年1月3日和6日分别占领汉口和九江的英租界。

赖以生存的那些基础作斗争的信号已经发出。

在摆脱了吴佩孚和孙传芳部队的所有省份，民众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开始组织起来，随之而来的便是阶级斗争的加剧。湖南省的农民协会把120万人组织起来了。湖北省有30万人，江西省有20万人。在城市里，工人和小手工业者都组建了工会。例如，在武汉地区出现了350个工会，会员总数达34万人。小商、小贩、大学生、妇女，即所有居民阶层都组织起来了。广东本省的运动已发展到一个新的更高的阶段。

洪流很容易冲毁3月20日为它筑起的人造堤坝。我们也正是指望这样。运动的矛头是针对敌视它的一切基础：既反对外国帝国主义，也反对无法忍受的劳动条件，反对农村经济上和政治上的农奴制。广州和（武汉）三镇的工人罢工浪潮，引发了其他城市类似的运动，广东和湖南的农民斗争，实际上已从下面取消了3月20日的政策。民众为国民革命军的胜利增添了与该军许多领袖所希望有的内容所不同的内容。

依靠这种民众运动，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可以为自己夺回3月20日曾被夺走的那些阵地，而且还可以大大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为他们能够在重新归附的省份中领导群众性的社会组织、工会组织和党的组织。

然而，民众的这种“左倾化”，不仅发生在重新攻占的省份，而且在广东也有表现。秋天时广泛展开的让汪精卫回国的运动，反映了国民党内的这种普遍的“左倾化”，因为大家都把让汪精卫回国理解为恢复3月以前时期的政策。因此，3月20日的政策作为旨在反对共产党人和左派的政策遭到了失败。与此同时，3月20日事件的代表者——蒋介石将军及其整个集团的权力也在削弱。北伐并没有导致“为完成民族任务而忘记阶级利益”，就像蒋介石所宣扬的那样，而相反，它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加剧，从而也导致了日益高涨的民众运动与那些企图阻止这种运动的人（即3月20

日事件的制造者和代表者)的更大对抗。

然而,等待蒋介石这位三月派领袖的还有一个方面的打击,即北伐削弱了他的军事领导权。在北伐过程中许多新的军事集团,都聚集在革命军的旗帜下,这些新的军事集团决不想扮演由这位三月分子领袖所领导的国民革命军主要核心的从属角色。如果蒋介石真的善于驾驭不断高涨的社会舆论,那么这些新的军事集团也决不敢公开与他相对抗。

但是,面对三月分子在政治上的孤立,这些新的军事集团,轻而易举地利用中国出现的局势,从总司令那里争得了某种独立性。要把赌注押在不断高涨的社会舆论上,并用这种代价来为自己的“独立性”作辩护,并不需要成为特别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如果说,在北伐过程中军队的数量增加了,那么它在政治上的分崩离析还是削弱了它,特别是削弱了三月分子的领导。因此,对这个时期的总结可以归纳为这样几点:第一,在军队中三月分子已不再起决定一切的作用,所以军队在政治上是一盘散沙;第二,群众运动高涨和壮大起来,因而,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翼民主派的作用增大了;第三,因此革命民主有可能取代军事独裁而居主导地位,也就是说将会彻底消除3月20日事件的后果。蒋介石本人实际上也已由独裁者变成了“将领之一”。由此看来,北伐使3月20日事件受到了三方面的谴责:它是一次反对民众的政变,是一次反共的政变,还是一次为军事独裁者夺权的政变。

如果说在北伐期间,由于军事形势复杂和民众压力还不太大,国民党军事领导人、国民革命所有将领,而特别是三月分子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扩大纯军事任务上面,即在打击吴佩孚、孙传芳方面和各自加强自己军事集团(如“保定府”集团、“黄埔”集团)的力量方面(因为战时最便于“招募士兵”和“走向民众”),那么随着江西战役的结束和在福建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在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封建资产阶级一派的面前又出现了8个月前摆在蒋

介石面前的那些问题。

更何况，如果说在北伐期间，反民众行动，即与中国共产党人决裂和削弱与俄国人的友谊，是极其有害的，因为靠国民党的威信，靠民众的支持，靠中国共产党人的宣传、战斗支援和在军队中的工作，才保持了军队的威力，那么随着北伐的结束，就不再需要共产党人了，就可以开始用另一种语言同他们讲话了。北伐结束后，积极的作战行动已不仅仅在浙江进行，但是3月20日的问题却又在与北伐前有所不同的形势中出现了。

首先群众运动本身，已变得更强大了，因而也更危险。在国民政府所辖地区，有250万到300万农民已经组织起来，集聚在农民协会的旗帜下。虽然农村的运动还是以“降低要求的口号”（也就是说根本的土地问题还没有公开提出）为基础开展起来的，但是农民的要求到处都在提高。民团和农民队伍之间的斗争的主动权已转到农民队伍手中。农民要求自治，要从农村赶走豪绅，他们把一个基本政治问题——政权问题提上了日程。反对苛刻租赁条件和高利贷的斗争已席卷越来越广泛的农民阶层，当我们允许剥削者剥夺的数额比以前减少三分之一时，那些吓得要死的地主和高利贷者就号叫有人要剥夺他们的财产了。

然而，不是农民运动成了再次试图倒转历史车轮的主要理由。在整个局势中，特别新鲜的和更能触及统治集团利益的是城市运动的规模。

11月和12月上半月，在广州，工人和企业主之间发生一些大的冲突。在许多生产和商业部门发生了罢工。这些罢工大部分都带有经济性质，但是它们对政治局势的影响还是很大的，因为它们触及到城市生活的一切神经。在这个时期发生的冲突中应该指出的是：印刷工人的成功罢工、经政府仲裁取消的银行职员罢工；圣西尔公司和赛恩公司的罢工；由于与政府汽车司机的冲突而激化的为期两周的司机罢工；导致毁坏公共汽车的汕头人力车



夫风潮。

在武汉，国民革命军占领该城后，那里的罢工运动也十分活跃。1926年10月、11月和12月期间，举行了150多次罢工，还不算一些企业中发生的小冲突。罢工不仅蔓延到外国的企业，而且在不小程度上还蔓延到英国的<sup>①</sup>企业，并且一半以上发生在小型半手工业企业和商店。举行罢工的有：烟草工人、电气工人、纺织工人、邮电工人、棉纺厂工人、皮革工人、铁路职工、裁缝、肉店职工、电话局职员、商店职员、面粉厂工人、粮库工人等等。提出的要求都围绕着增加工资、减少工作日、改变企业主对工人的态度等问题。还到处提出了招收和解雇工人只能通过工会的要求。

无论在广州还是在武汉，工人们都拥有实际的力量，即有组织的工人纠察队，这种工人纠察队保证了同工贼行为作斗争的可能性。

如果说在广州，工人运动面对的是一个因从封锁香港中得到了好处而在政治上分化成一些阶层的软弱的资产阶级，那么在长江流域，工人运动则遇到了中国主要商业动脉上的一个比较强大的资产阶级。这个资产阶级为了反击工人，迅速地组织起来了，其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汉口商会为反对工人提出的过分要求而作出的有名的十一月决议<sup>②</sup>。长江流域资产阶级的强硬态度不能不对执政的蒋介石集团产生影响。

这样一来，我们看到，农村中和特别是城市中的阶级矛盾在迅速增大，如果统治集团仍然坚持三月的立场，那就势必导致与统治集团政策的冲突。要么三月的政策将从内部被粉碎，要么三月分子再次为群众斗争设置障碍。

可见，客观局势就这样形成了：剑拔弩张地保卫三月旗帜的

<sup>①</sup> 原文如此。根据意思看应为“中国的”。

<sup>②</sup> 可能指的是1926年12月3日汉口商会作出的决议（见A. B. 巴库林《中国武汉革命时期札记》，俄文版第14页。）

任务又落到了3月20日骑士们的肩上。对此蒋介石比其他任何人都做好了更加充分的准备，因为恢复3月20日的局面对他来说不仅是一般的政治问题，而且还是个人问题。蒋介石需要在军队、党和政府中恢复自己的独裁者角色，需要将自己强化到如此程度，以致在汪精卫回来的情况下汪不得不进入蒋介石为他划定的框框，而最好是他根本不回来。

蒋介石只能在解决一般政治问题的过程中，来解决自己的个人问题，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走出他所领导的在人数上和内部团结上都很弱的黄埔集团的圈子，确保自己得到一些加入保定府集团的人的支持。

12月初，蒋介石和李济深就镇压广东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必要性问题交换的电报就是极好的证明。

可见不论在客观上还是在主观上，蒋介石集团都做好了再次尝试将运动转入另一种轨道的准备。但是使这种转变成为可能的决定性因素是部分所谓“左派”的新的态度。

我刚才描述的情况引自一些同志们于1927年1月送给我的一个报告<sup>①</sup>。

不言而喻，我在上面所指出的群众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不能不加强和加深左派国民党队伍中业已存在的那种不满情绪。

我们一直在说，我们没有与左派结成联盟<sup>②</sup>。3月20日以前我们与左派一起掌握着政权。我们说，在北伐期间，我们曾想消灭三月分子并回到三月以前时期。这些都是对的。但是说在我们与左派结成联盟的整个历史中没有哪一刻左派不对群众运动和中国共产党的发展感到害怕，这也是对的。我曾用“他们心里不舒服”这句话指出了这一点。为了开展国民革命运动，他们想利用共产党人，利用群众运动，“然后看看再说”。但是，他们未能把

<sup>①</sup> 文件没有找到。

<sup>②</sup> 原文如此。

这种“然后看看再说”束之高阁，因为群众从四面八方压过来，共产党人变得更强大了，因此，“然后看看再说”不可能被他们推迟很久。

后来左派队伍开始出现分化，至少分化为两个集团。一个积极争取掌握对无产阶级和农民的领导权。这个集团说：“中派一直抱怨共产党人掌握着对群众的独有影响。”中派对共产党人说：“请你们自愿放弃对民众的独有影响吧！”

确实有过这样的例子。戴季陶本人就曾来到我这里说：“共产党人到处都妨碍我们做群众工作。”对此我回答说，革命运动尚未触及亿万极端贫困的群众。如果你们带着相应的纲领到群众中去，你们就会受到热烈欢迎。为什么你们光抱怨共产党人对群众有巨大的影响呢？

但是，这个回答对大家来说是很清楚的，但对他来说并不清楚。当时他就想迫使我们自愿放弃我们对无产阶级和农民运动的影响。

相反，上面提到的那个左派集团则说：“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共产党人不让我们到群众中去，我们应该自己把共产党人从他们在群众中的阵地上赶走。”

这个左派集团与中派的逐渐接近已成事实，蒋介石在南昌正是想依靠这个集团，来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蒋介石本应使这个集团相信，他不仅不打算反对我们，甚至还同意让汪精卫恢复职位。而我所说的这个小资产阶级的、松散的、没有骨气的国民党左派，很容易上蒋介石的圈套。蒋介石几乎许诺要当国民党左派的领袖。实际上，他们的共同愿望就是清除共产党人的影响。蒋介石为了证明自己的真诚意图，公开声明，他主张让汪精卫回来，以此来把左派全部收买过来。

蒋介石赢得了这个左派集团的好感和支持之后，就准备完成3月20日的计谋。

我们同中央和国民政府的一小批人于1926年底从广州出发，前往汉口，以便为中央和国民政府迁往汉口做准备。路过南昌时，我们会见了蒋介石。当时我们在牯岭召开一次会议，蒋介石在这次会议上表示同意政府和中央设在汉口，就像当年决定设在广州一样。之后我们就前往汉口了，在等待中央和国民政府其他成员到来时成立了临时中央。1月3日，中央和国民政府其余一批人路过南昌。蒋介石利用这个情况，主要是利用在中央和国民政府的这一部分人当中恰恰有一些上了他的圈套的左派分子（政府首脑和中央临时主席也在其中）<sup>①</sup>，在南昌举行一次会议，虽然他还没有掌握多数人。此举事先没有向汉口作出任何报告。

在这次会议上作出决定：中央和国民政府暂时应设在南昌，而不是汉口。

次日，即1月4日，当我们得知这一决定时，我们都明白这是怎么回事。蒋介石争取作出这个决定的目的是：第一，让中央和国民政府远离武汉这个革命中心。南昌是一个小资产阶级城市，那里没有或者几乎没有什么无产阶级，而武汉（三镇）那里却是一股由数十万工人和组织起来的乡村农民汇集而成的汹涌澎湃的革命洪流。让中央和国民政府远离武汉这个中心——这就是他的第一个目标。第二个目标是争取设在南昌的中央和国民政府同意他向南京和上海进军。第三，利用中央和国民政府设在南昌的机会改组国民党，他在南昌已经开始这样做了，而且在李济深的帮助下在广东也这样做了。第四，由于以他的对手唐生智为首的保定府军事集团驻在湖南和湖北，所以中央和国民政府设在武汉，就可能加强这个军事集团来与他对抗。

在南昌作出的这个决定中使我们感到惊恐的主要一点是，蒋介石会利用国民政府和中央来向上海和南京进军。在整个北伐期

<sup>①</sup> 指谭延闿和张静江。

间，我们的意图是消灭三月分子，取消买办资产阶级和军阀在国民革命中可能拥有的领导权。而蒋介石试图投向上海资产阶级基地，而这个基地定会使他的力量得到加强来与我们对抗。向南京和上海进军会过早地破坏国民革命战线，这对我们是不利的，我们还没有做好充分准备在国民革命运动中发挥独立的作用。如果中央和国民政府留在南昌，那么这次进军及其后果（体现在蒋介石在上海发动的政变上）就会把整个中央和国民政府吸引过去，这样一来，武汉时期就会被彻底排除，就不会有这个时期。一切都会在上海结束。

革命只有在有能力对付以下三种基本力量的时候，它才能向上海发展，这三种力量是：（1）帝国主义；（2）军阀；（3）不止一次地背叛过国民革命运动的资产阶级。否则，就应该是二者必具其一：或者革命被打败，就像恰恰也是与这三种反革命力量进行斗争的太平天国起义被打败一样，或者革命被分成几个组成部分，而以三月分子著称的那一部分，必然会像国民党在1911年那样采取行动，也就是说，一方面向过去顶礼膜拜，而另一方面，则向帝国主义承担起公开的或隐蔽的义务，并以此来出卖无产阶级和革命。

早在北伐之前，我就讲过这种前景<sup>①</sup>。我说过：“只有在我们确信能够战胜三种反革命力量的情况下，我们才能进军上海。不然，我们的策略就应该是绕过上海。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北方和西方，不要重犯太平天国起义的错误，不要急于闯入上海，而是一开始攻占北京，然后再用封锁包围的办法来夺取上海，就像我们曾经用封锁的办法夺取香港那样。到那时，我们依靠全国广大工农民众，就可以用封锁的办法困死上海，而不是同数万名装备精良的外国士兵、巡洋舰、航空母舰等直接交战。

<sup>①</sup> 见第78号文件。

要用封锁的办法攻占上海，在目前这个时期只能用这种办法同帝国主义作斗争。要消灭通向中国内地的所有门户——香港、上海、天津等的经济力量。”

如果蒋介石坚持要呆在南昌，把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留在那里，那么这恰恰是为了去上海。不是为了在那里同三种主要反革命力量作斗争，而是为了与自己的天然基础，也就是与自己的资产阶级建立联系，勾结帝国主义，打击工农运动。蒋介石去上海就是为了叛变。

因此，关于政府驻地问题并不像蒋介石企图论证的那样只是一个技术性问题。他说，汉口处在张作霖的威胁之下，南昌靠近前线，因为总司令应该靠近前线，所以最好是让国民政府和中央设在南昌。这是我们在当时碰到的一个最严重的问题。

因此，与三月分子的斗争已不可避免。

如果有人问我：“同志，你们不认为与蒋介石决裂为时过早吗？也许还可以同他走一小段路吧？”对此我会回答说：“不，我们同蒋介石决裂正是时候。既然1927年1月3日的决裂已不可避免，那就不能让人在七八月份像托洛茨基那样责怪我们，说我们抓住蒋介石那根腐烂的绳子不放<sup>①</sup>，因为1月3日我们已经同蒋介石决裂了。”

我们在与蒋介石决裂时寄希望于什么呢？首先，我们寄希望于群众运动，这是显而易见的。那时我们大力开展了群众运动。这里根本谈不上我们是否充分大力地开展了群众运动的问题。我们掌握的数字就可以证明，群众运动以何等迅猛的速度开展起来了。但这还不够，因为群众运动还没有做好同三月分子发生冲突的准备。此外，群众还没有武装起来。

有人会问：“那你们为什么不把他们武装起来呢？”对此我回

---

<sup>①</sup> 看来，这里指的是1927年9月27日托洛茨基在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和共产国际监察委员会联席会议上所作的发言。

答说：“当你们一方面处在张作霖的包围之中，另一方面处在沙漠的包围之中（而通过冯玉祥占领的沙漠地区连一支步枪也弄不到），而第三方面，虽然拥有上海，但那里每一段河道都处在日本人、英国人或法国人的封锁和守护之下；当你们没有任何可能从任何地方弄到一支步枪的时候，根本就谈不上武装真正能够同正规军作战的群众问题。关于我们的错误，我已经提到了，我说过在北伐时期本来应该而且也能够把自己武装起来，但是很遗憾，这项任务没有完成。请你们相信，我们尽了一切努力，到处去搞武器装备，但是搞到的实在太少太少。”

除了发动群众运动同三月分子作斗争外，我们必须把没有跟蒋介石走的那一部分国民党人，即城市民主派争取到我们方面来。用什么样的口号我们才能建立起反对蒋介石的这种联盟呢？首先用这样一个口号：“使党摆脱军事独裁。”

中国有人数众多的民主派。它由贫穷的小资产阶级阶层，或者像我所说的“流氓资产阶级”组成，由城市贫民、各种非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大学生等组成。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将试图对这个民主派作个分析。从这种分析中你们可以看到，这个民主派是一支可观的力量，用“党反对军事独裁”的口号可以把这个民主派吸引到斗争中来。在广东和在北伐时期曾通过工人、农民、学生、商人、教师等组织把这个民主派吸引到运动中来。这些组织自1925年就存在了。

请回顾一下共和国近15年的历史吧。军事独裁把人民引到了何处？引到了空前的贫穷和破产。铁路和河道不能发挥作用，到处都是兵匪。财政处于灾难的状态，货币变成了一堆废纸。如果人民忍受军事独裁，那么这种独裁就会使国家变得更加混乱和受到更大的破坏。因此，可以把民主派和国民党左派吸引到我们方面来，并对他们说：“反对军事独裁吧，群众和中国共产党将会积极支持你们。”

我们就用这个口号把以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民主派吸引到我们方面来了。

同志们，不可能在一个晚上就讲完这个时期所发生的一切事件的细节。蒋介石本人是怎样逐渐在国民党左派面前暴露自己的真实面目的呢？国民党左派如何确信，蒋介石同意召回汪精卫是虚假的行为呢？蒋介石无法掩饰自己的真实意图，他的真实意图逐渐地暴露在国民党左派面前。那些曾跟他一起走的国民党左派很快就离开了他，并且如此迅速地转到武汉方面来，以致到召开三月全会<sup>①</sup>时，即在作出1月3日那个不幸的决定之后两个月，蒋介石就成为孤家寡人了，中央里几乎没有人支持他。他完全孤立了。

为什么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央三月全会以前没有被消灭呢？

从上述情况中可以清楚看到，1926年3月20日以后，同三月分子（中派）进行公开的坚决的斗争已是不可避免的了。问题仅仅在于，什么时候和在什么情况下应该爆发这场斗争。换句话说，什么时候这一方或者另一方找到对自己有利的时机发动或迎接这场斗争。毫无疑问，这场斗争将会在长江流域爆发。因此我们就应该在长江流域做好斗争的准备，或者我们主动去进攻三月分子，或者有能力在任何时候反击三月分子的进攻。

但是，到1月3日在南昌作出决定（这个决定意味着三月分子开始进攻我们）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做好反击他们的准备。但是，我们为在武汉建立自己的中央、自己的军事基地充分做好了准备，我们可以从那里打退三月分子的袭击，也可以在那里准备向三月分子发动攻势。三月分子并没有把我们搞得措手不及。这就是我们党取得的很大成绩和功劳。

如果在1926年3月20日之后我们对中派（蒋介石）抱有幻

<sup>①</sup> 指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想，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当时同他们达成的协议不看作是必然要转入公开斗争的暂时休战，而看作是某种别的什么东西，那么1927年1月3日的南昌决定就会使我们感到措手不及。我们就不会有什么武汉中央，也不会有同三月分子开展斗争的军事基地。

为什么我们在南昌决定之后没有立即做好坚决打击三月分子和以此来防止我们与武汉中央的分裂的准备呢？正是因为我们没有及时消灭三月分子，过了几个月之后，这种分裂才成为不可避免。（如果我们通过及时消灭三月分子的办法来使城市民主派摆脱武汉因三月分子利用长江下游地区实行封锁所陷入的那种严重的军事、经济和财政状况的话。我们和武汉中央即国民党左派之间形成的裂痕，未来随着城市阶级斗争和农民运动，特别是湖南的农民运动的高涨本来是很容易填补的。）

我们对此没有做准备有以下几个原因：

1. 在整整一年的时间里，我们知道，同三月分子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而群众，以至中国共产党整整一年来对这种斗争都没有做准备。借口是共产国际没有这样的方针，因此也就没有作出准备同三月分子作斗争的指示，这种借口是没有用的，或者只适用于同共产国际进行派别斗争。共产国际在1924年没有下达，也不可能下达反对买办资产阶级的武装部队并用火炮轰击买办资产阶级的指示。共产国际在1924年底没有下达，也不可能下达准备采取行动反对陈炯明的指示，也不可能于1925年8月下达反对许崇智、胡汉民等人的指示，在广州街头发生枪杀中国人事件后下达反对英帝国主义的指示（关于枪杀事件及其详细情况的消息传到共产国际之前，就发生了反对英帝国主义的行动）以及在1925年底下达反对陈炯明（第二次）和熊克武的指示。那为什么在需要不需要准备同三月分子进行斗争的问题上，要等待共产国际的指示呢？更何况共产国际1926年3月全会的提纲，共产国际1926年12月全会的决议（这个决议只是在1927年3月才传达到我们

汉口那里，而传达到中共中央是及时的)，更不用说共产国际第二代表大会的提纲都十分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在中国的整个方针。根据这个方针很容易得出：需要还是不需要准备同走上背叛道路的资产阶级作斗争。

此外，为了帮助尚无经验的政党在每一个具体情况下运用共产国际的提纲和决议，在当地还驻有共产国际的代表。

为了使党和群众做好迎接与三月分子在长江流域发生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准备，设在上海的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驻中央的代表们做了什么工作呢？1927年1月3日，三月分子挑起冲突，上海的中共中央赞成我们对三月分子进行反击，赞成我们立即予以反击，而在4月上海手持武器的群众还在为蒋介石即三月分子清理通往上海的道路。难道需要下达指示才明白不能向武汉拍发赞成反击三月分子的电报吗？因为这种反击不可避免地要变成同他们的公开搏斗，同时有助于三月分子攻占上海，进而加强他们反对我们的力量。这里需要的不是指示，而是起码的革命逻辑学的常识。

中央委员们“以为”，蒋介石将会沉没在上海资产阶级（一些中央委员认为是所有资产阶级，而另一些中央委员认为是小资产阶级）所支持的群众运动之中。张国焘、张太雷和我曾警告他们不要抱这种幻想，为此有人称我们是“赤贫分子”（失败主义者）。

早在1月我从汉口给中共中央寄去一份建议，让他们着手召开包括湖南省在内的各省会议<sup>①</sup>，虽然他们接受了，但到5月还没有执行。

直到1月中共也没有做好，也没有让群众做好迎接与三月分子发生冲突的准备，而在上海甚至到3月，即在汉口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的时候，还没有做好这种准备。中央没有同三月分子作

<sup>①</sup> 该文件没有找到。

斗争的坚定决心。

2. 从南昌决定起到三月全会止，本来应当做好以下几项工作：

①在群众中进行旨在反对三月分子及其领袖蒋介石的广泛宣传鼓动工作。

②把国民党左派（领袖人物）集中到武汉，让他们做好在中央全会上坚决反对三月分子的准备。

③加强武汉的军事基地。第11军驻扎在武汉。指挥人员都听从军长陈铭枢的指挥。但陈铭枢起了两面派的作用，应该撤掉他。后来这样做了。陈铭枢逃走了，而第11军进行了改编。叶挺当时被任命为师长。汉口的军校被争取过来反对三月分子，与我们合在一起。在军队中开展了反对三月分子的大规模运动。到4月份，第4军和第11军都明白了，为什么要打击南京和蒋介石。

到国民党中央三月全会召开时，我们在武汉已做好了各方面的充分准备。而全会作出了一切必要的决定，根据这些决定可以开始同三月分子进行积极的斗争。全会巩固了共产党人与国民党左派的联盟。共产党人可以参加武汉政府，以便利用一些最重要的部（农民部、内务部、劳工部）来发展和深化革命。从全会的结果看，的确可以说，我们利用了蒋介石，并准备抛弃他，就像抛弃一个挤干了的柠檬一样<sup>①</sup>。

南京主要是由第2军和第6军攻占的，这两个军都是靠近我们的，并且同意国民党中央全会的决定。这样我们甚至在三月分子的营垒中也拥有可观的力量。后来弄清了，我们在那里拥有决定性的力量。蒋介石的第1师也是会靠近我们的。根据几位军事顾问的说法，我们当时是可以夺取南京的，这样做就会给我们提供一个迅速除掉蒋介石的机会。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这是我们

<sup>①</sup> 鲍罗廷引用了斯大林对蒋介石的说法，引自斯大林没有发表的1927年4月5日在工会圆柱大厅所作的一次讲话。

所犯的第一个大错误。

### 致命的错误

在占领南京后，除掉蒋介石的时机，由于我们的过错，错过了。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政变，当时除掉蒋介石的问题十分尖锐地摆在武汉中央的面前。我们在国民党领导人当中还享有从前那样的威信。国民党领导人等待着我们的意见：如何除掉蒋介石。但是那个时候，在我们自己人中间没有统一的意见。一些人主张退回广东根据地，并以此来打击蒋介石的后方，另一些人，其中包括我，则主张继续北伐。这个方案，即不是退回南方，在我们中央<sup>①</sup>通过了。这个方案是完全正确的。

但是，在执行这个方案的过程中，我们没有统一的意见。一些人，其中包括布留赫尔，主张经河南向北方挺进，这样一箭双雕：打败张作霖，让冯<sup>②</sup>进入河南，把反张作霖的前线让给他，而我们自己则沿陇海铁路转为东进，去袭击南京。另一些人，其中包括我，则主张先消灭南京，再渡江北上，从那里进攻北方军阀。但是我屈从了第一个方案，因此酿成了当时我们在中国所犯的最致命的一个大错误。

这个错误错在什么地方呢？它错就错在我们追赶着两只兔子。如果我们暂时放下张作霖，派遣我们的力量去攻打南京，那么，想必我们会打败南京，从而解决一系列的重大疏漏。甚至在我们与国民党左派之间出现的裂痕，由于群众运动的高涨，由于湖南的农民起义和由于武汉三镇空前尖锐的阶级斗争，也丝毫不会和不可能使我们感到恐惧。因为战胜了蒋介石，战胜了三月分子，我们就可以牵着国民党左派的鼻子走，可以无所顾忌。那时谁还敢反对我们呢？国民党左派就不得不对自己说：“我们现在是在同这

① 指联共（布）中央。

② 冯玉祥。

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曾在广东消灭了资产阶级和豪绅的军事力量，而不惜炮轰城市中心和烧毁广州最富有的城区。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曾消灭了大小陈炯明分子，并打败了吴佩孚和陈传芳。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始终成功地给了反革命以致命的打击。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们不惧怕英帝国主义并一直在反对它，在连续 16 个月的时间里使它受到了一次又一次的打击。而当这种力量到达长江流域时，它在帝国主义炮舰的眼皮底下夺回了租界地。我们是在同这样一种力量打交道，它消灭了曾企图动用跟随其一起走的力量来反对党和革命的蒋介石。”而小资产阶级就会跟着我们走。

然而，我们并没有消灭蒋介石，我们容忍了自己，同时也容忍了同我们争夺对小资产阶级的影响的另一种力量。而这种力量本来是应该予以消灭的。但是，我们却对自己说，此事并不特别困难。应该先去北方消灭张作霖，尔后再去东方消灭反革命巢穴——南京。我们的致命错误就在这里。

在采纳了讨伐张作霖的方案而不是首先讨伐南京的方案时，形势怎样呢？

各方面的形势都是极其严峻的。武汉三镇在经济上依赖于：(1) 湖南，从那里获得主要食品——大米；(2) 四川，从那里获得原料；(3) 河南，也是在原料方面。最后，从武汉三镇运出的产品，主要是经过上海，而在上海有资产阶级和依附于外国银行的中国银行，在南京我们受到了封锁。

因此，失业人数急剧增加，一个时期光是在汉口就超过 10 万人。小资产阶级几乎丢掉了商业。大资产阶级早已携带白银逃离武汉三镇。国民政府的财政状况极其悲惨。一个月内通过各种途径才能勉强收集到 100 万元，可是一个月的支出却超过 1500 万元。不可能没收什么有用的东西，也没有什么可没收的。我们到达汉口三四天后就颁布了没收反革命分子所有财产的法令。我们

有了房屋和城市土地，但是谁也不想购买这些房屋或土地。有钱的人都跑光了，因此反革命分子的财产，虽然被没收了，并交给了财政部门，但是根本无法变卖。

若是攻占了南京，我们就能在很大程度上改善财政状况。若是打破了封锁，我们也能缓解商业形势。这以后我们也就没有什么必要去消灭杨森和西部的其他将军，这样我们就可以打通西部的经商之路。总之，如果攻占了南京，我们就能解决一些最迫切的问题，而我们能否使城市民主派和国民党左派跟我们走，就取决于这些问题的解决。

所有这些想法都告诉我们，有必要进攻南京，但是我们不顾这一切，还是倾向于采纳经河南讨伐张作霖的方案。

我本应把一切力量都动员起来，实行第一个方案。我本应尽一切努力抵制第二个方案。我不该听信我们能够同时消灭河南的张作霖和蒋介石这种美好的前景。我本应向莫斯科说明，各方面情况都要求我们经南京而不是经河南北上。我本应使莫斯科相信，第一个方案是最佳方案，必须实行这个方案。

### 通讯状况

在这里，必须讲几句当时我们与莫斯科及莫斯科与我们的通讯状况。我这样做并不是为我们的错误作辩解，而是为了使同志们知道，我们是在何种空前困难的条件下在被军阀和帝国主义分子包围的汉口工作的。经常是在决定性的关头你们<sup>①</sup>不能商量或得到指示。有时需要在几小时内作出或改变决定，而由于通讯状况不佳你们无法做到这一点。需要就地作出决定，但是为此就应该使工作人员完全服从你们。

在广州，我们距离莫斯科有 15000 俄里，而在汉口，要近一

<sup>①</sup> 原文如此，似应为“我们”（下同）——译者。

两千俄里，但是在汉口，获取消息方面的情况比广州差，之所以差就是因为完全依赖于帝国主义分子掌握的通讯线路，而在北京大使馆遭到袭击之后，我们甚至很怕派人去送信，因为在那里对所有人都进行搜查。如要派遣信使，途经沙漠、内外蒙古则需要几个月时间。我尝试过这条路，结果用去我两个多月的时间，而且我从汉口出发是乘坐火车和汽车。但此时还要困难得多，因为乘坐火车已不可能，铁路都被张作霖占领了。

至于谈到电报，事情常常糟糕到这种地步：莫斯科完全收不到我们的电报，或者只收到结尾部分，而开头部分不知在什么地方被截住了，被弄乱了，因为电报都是通过帝国主义的线路拍发的。反过来，从莫斯科向汉口拍发的电报，也经常只收到结尾部分，没有开头部分。过去几个星期，我们什么消息都得不到，特别是在我们驻北京大使馆和驻上海领事馆遭到袭击之后，更是如此。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在莫斯科发生了许多令人无法理解的事情，比如说，几天来人们都不知道，蒋介石准备向工人开枪。这里说的不是那种可以整包整包从广州寄来并可以在这里进行研究的材料。这里说的是每天的信息，有时是每小时的信息。这就是说，缺少通讯联系对我们是有害的。

我给你们讲一讲决定两个方案的命运，并且同莫斯科几个小时都联系不上的那一天的情况。

早晨，中国国民党政治委员会在我的住宅里开会。会上决定进攻南京。参加这次会议的军长们，当即得到了相应的命令。这一天军队都在做进军南京的准备。

就在这一天，也在进行着取消这一决定的工作。主张实行第二个方案并且也参加了这次会议的那些人，看来没有丧失争取改变这一决定的希望。邓演达同志也在这里，这一天他在这方面做了相当多的工作。他被布留赫尔说服了，认为第二个方案是最佳方案，他一个一个将军、一个一个政治委员会委员地做工作，使

他们相信第二个方案最好。所以，晚上又召开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另行决定选择第二个方案。我曾试图通过电话说服可以说服的人，可是到晚上的会议上，还是采纳了第二个方案。

从这时起，我在国民党领导人中的威信被动摇了。

### 我们错误的后果

河南的战斗带有顽强不屈的性质。我们第一次与张作霖的模范军队遭遇，这支军队有很好的指挥和火炮、弹药补给。我们却什么都缺乏，而且臭名昭著的“红枪队”切断了我们与后方之间的交通线，即前线的补给线。

在几天的战斗中，我们在河南伤亡数千人。其中牺牲的是（第4军和第11军中的）共产主义青年的精华。你们可以想象，用每支只配50发子弹的步枪去夺取坦克意味着什么。

我们付出了巨大损失才打败和击退了张作霖，使冯玉祥得以进入河南，我们希望他在那里承担起对张作霖的正面作战任务，而我们自己应沿陇海铁路向南京推进。然而，我们的打算完全错了。这时蒋介石也已沿陇海线向苏州<sup>①</sup>进军。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冯了。他应该在武汉和蒋介石之间作出选择。正如他自己所说，他不得不反对我们所实行的方案的后半部分，即反对进攻南京，他之所以这样做的理由现在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打乱了我们的所有计划，我们无法实现这些计划。

为了不彻底丢掉后方，我们不得不退回湖北而不去进攻南京。这是我们的错误带来的第一个结果。

就在我们在河南忙于战事时，轻而易举地攻占了苏州<sup>②</sup>并处于极其有利的财政条件下的蒋介石，就可以在我们的后方做文章了。为了收买夏斗寅、杨森及其他军阀来反对我们，他利用了上

---

①② 原文如此，似应为“徐州”——译者。



海的巨大财源。他还得以使冯玉祥归顺于他，哪怕是暂时的。他在汉口日本租界建立了自己的司令部，并从这里瓦解我们的后方。

因此，如果我们不把我们的部队从河南撤回湖北，那么我们会陷入无法突破的军事包围之中。但是特别严重的是，武汉的经济形势一天天恶化，财政状况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困难，随着蒋介石在上海和南京力量的加强，对我们的封锁也加强了，现在只有少数人相信，我们确实能够进攻南京，确实能够摧毁它。

由于出现这些情况，在国民党左派中人心开始涣散。当一切都顺利时，他们听我们的话，而现在，当他们感到自己的处境没有出路时，先是惶恐不安，尔后为了拯救自己，逐步摆脱群众运动和共产党人的影响。他们对我们的建议总是好的这种信念发生了动摇。如汪精卫就抱怨我们建议他们进入河南，结果我们损失数千人，只不过是给冯提供进入河南和背叛我们的机会。

说国民党左派在这个时期想掌握整个政权，甚至想同共产党人决裂，从客观上看这是对的。有一些事情是显而易见的，无需加以说明，这就是国民党左派被土地革命和城市阶级斗争的空前高涨吓坏了，他们必然会脱离革命，由此，似乎应该得出相应的结论。这一点在很多年以前就是正确的，现在也是正确的。这一点始终是清楚的。

但是，不清楚的是他们脱离革命的速度。国民党左派迟早会脱离革命。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在这个时期我们还是能够带领这个民主派前进一段时间，至少可以到我们可以直截了当地提出苏维埃问题，即无产阶级和农民民主专政问题的时候。但是，我们失去了以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这个民主派，因为它对我们的力量失去了信心。当时这个民主派惊恐万分，在这种情绪影响下，它分化瓦解了。

从这时起，国民党左派的小资产阶级本性开始从各方面凸现出来。从这时起，他们开始构筑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来为与共

产党人的决裂作辩解。国民党左派认为，这样可以使自己摆脱绝境。

恰恰是在革命最困难的时刻，小资产阶级的国民党人无耻地逃跑了。从这时起，他们开始发表文章论证，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走的不是一条路。《孙文主义和虚无主义》——这就是这个小资产阶级的鼓舞者之一——顾孟余的一篇纲领性文章的标题<sup>①</sup>，此人被我们当时的处境吓得要死。他在这篇文章中说，孙文主义，这是进行创造的革命，而虚无主义（所谓虚无主义是指共产主义，共产党所做的一切就是虚无主义）是在进行破坏，什么都不创造。

就在一些人发表文章论证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走的不是一条路的时候，另一些人，如汪精卫，还在革命与反革命之间摇摆不定。

我们不适时地失去以国民党左派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过早地与它决裂——这就是我们的错误带来的第二个结果。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只能把第4军、第11军和第20军的部队撤出河南，以便借助于这些部队首先消灭后方的敌人并试图再次挽救局势。

特别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国民党左派即便已经开始瓦解，但它也还没有放弃讨伐南京的念头，直到最后的时刻，即到叶挺和贺龙起义<sup>②</sup>之时，也没有放弃这个念头。尽管他们提出一种看法，认为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走的不是一条路，但是他们还没有准备投入南京反动派的怀抱。他们还抱有幻想，或许通过与共产党人的决裂，能在将领们那里找到一支可以向南京发起进攻的力量（因为与共产党人分手就意味着与群众运动告别）。这时我们本来应该或者完全摆脱国民党左派独立地行动，或者再次尝试从国民党左派中分裂出一些人，可以同这些人一起去做我们以前未做的

<sup>①</sup> 刊登该文的刊物的名称和该文的确切发表时间不详。

<sup>②</sup> 指1927年8月1日的南昌起义。

事情，也就是还是要进攻南京。

事实是，部队还是向南京推进了，为第4条、第11军、第20军开赴九江——南昌一线提供了可能性，这个形势对于叶挺和贺龙的起义是有利的。

如果群众采取行动去夺取武汉三镇或国民政府所辖地区内某个地方的政权，那么这种行动必定会遭到彻底的失败。这种行动会是英勇的行动，但它会被击溃。

凡谴责群众起义的人，都是庸俗之徒，但也不能把起义当儿戏。如果没有一定成功的希望，那就不能把起义当儿戏。这里所说的不是那种在湖南一个省发动的起义，当时在那里的某些地方农民夺取了政权，并且分了田地，这里所说的是这样一种起义，其结果是国民政府的武汉中央被推翻，而政权转入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邓演达、宋庆龄以及其他主张与共产党人继续保持联盟的人手里。

实际上，这只能是共产党人同时针对南京中央和武汉中央发动的一次起义。这就是为争取无产阶级和农民专政而进行的直接斗争，不管我们怎样用“民主专政”等词句来加以掩饰也是这种斗争。我们没有准备进行这种斗争。当时，我们也还没有这种打算。

考虑到当时的种种情况和整个形势，就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种起义是不可能成功的。我们犯了一个主要错误。现在我们只好吞食这个错误的苦果。

### 关于中共在最后的武汉时期的领导工作

中共中央只是在1927年3、4月间，才从上海迁到汉口。因为在5月要召开中共第五次代表大会，而随着中央的到来就开始了无休止的争论。在4、5月间根本谈不上中央的什么领导。在中央委员会内对每一个问题都有分歧。在有国民党人参加的会议上，

共产党员中央委员，彼此进行争论，并且预先不在自己的中央委员会内达成共识就发表不负责任的声明。

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共中央一直设在上海的法租界。在这个租界里，中央在很大程度上脱离了中国的实际生活。我多次建议把中央迁往广州，但都没有得到著名的中央委员陈独秀等人的响应。因此，运动向全国发展的主要根据地——广州没有得到来自中共中央方面的应有指导。

我在广州的一次会议，即中央局会议上说过，我觉得中共中央像一个图书评论员：他等待着书籍的出版，然后阅读，写书评——加以赞扬或指责。中共中央先了解广州做了什么事情，尔后或证明其正确，或给以批评。

在整个武汉时期也是如此，从1926年5月底到1927年底，中央没有置身于运动的中心。它呆在上海（到1927年4月），几乎把两个月时间都耗费在代表大会以前和代表大会期间的争论上，而在代表大会之后分歧依然没有消除。这个时候，陈独秀仍在对这个或那个国民党员所发表的看法进行没完没了的答辩，闹得中央惴惴不安。

有些同志指责我说，我在中央没有促进贯彻执行共产国际的指示。这种指责是没有根据的。我曾反对过早地与武汉中央决裂，并担心发生无政府主义叛乱。共产国际的指示不在于此，〔而在于〕发展群众运动，实行土地革命，使国民党无产阶级化和农民化，武装工农。**这些我是始终坚持的。**我也这样做了。后来国民党左派所揭露的恰恰是我的这种活动。

## 结 论

7月初，我向中共中央作了一个关于当前形势的报告。我简要地重述一下这个报告的内容，因为这个报告就是现在也能回答关于中国革命前途的问题。

我说，在中国共产党内不能有取消派，并且我建议有取消主义思想的中央委员立即到莫斯科去。我说，革命正在走向高潮，正因为如此，在党内不能有取消派。我说，在长江地区国民革命运动分裂成两个主要阵营。一方面是封建资产阶级集团，在该集团周围有形形色色的军阀。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农民以及动摇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城市民主派。不能说，我们已经永远失去了这个城市民主派。随着无产阶级和农民力量的增长，还可能把这个民主派争取过来。

如果说在民族阵线破裂的情况下，我们不能宣布实行无产阶级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话，那么资产阶级也没有强大到足以夺取政权的程度。资产阶级不能夺取政权、稳定政权、统一中国和解决所有迫切的问题，而不解决这些问题就不会有任何安宁。中国既不可能出现凯末尔，也不可能出现墨索里尼。在南京，由于不可调和的矛盾，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不仅在南京，而且在武汉也是如此——分崩离析是不可避免的。

有多少个帝国主义国家，中国资产阶级就会分成多少个派别。一部分资产阶级依靠日本，一部分依靠英国，一部分依靠美国，等等。中国资产阶级不是一个能够产生一支有能力统一中国的力量的统一的基础。

至于军阀（新老军阀有成百上千），他们不可能联合起来解决国家所面临的某个重要问题。自1914年起，帝国主义者开始忙于自己的事情。后来，即在战后，他们又忙于掠夺德国，忙于研究自身的稳定问题，因此，几年过去了；他们都未能对中国事务表现出特别的兴趣。现在情况不同了。

现在，帝国主义者不会像在帝国主义战争期间和自身稳定时期那样容忍由于在南京、武汉和北方存在一些矛盾而必然出现的整个混乱状态，因此，来自帝国主义者方面的侵略行径是不可避免的。当我们在长江地区显得很强大的时候，他们装作对国民运

动友好。但现在他们去掉了伪装，英国人不想离开上海，日本人已进入山东，帝国主义者的侵略行动必然会比以前更加猖狂，这必然会激起新的民族反击浪潮。即便国民党左派的上层人物叛变，那么由此也还不能得出不会反击帝国主义者的新的侵略行径。

我当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得出结论，中国革命正在走向高潮，我们应该在这种新的高潮中准备夺取政权，并应该根据这一点来安排我们的整个宣传鼓动工作和我们的整个组织工作。

全宗 514，目录 1，卷宗 267，第 113—173 页。

打字稿，经过修改的速记记录，无签字。



## 人名索引\*

### A

**阿布戈夫, M. 3.** (1901—1938?)  
——1923至1924年任突厥斯坦共和国政治部指导员。1924至1925年任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指导员。1925至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部长,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至1928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后从事党的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阿布拉姆松, M. M.** (化名:马祖林、马荪), (1898—1941) ——1920年8月至1921年3月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中国科科长、东方民族处主席团委员。1921年春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书记兼联络组组长。1925至1927年在远东共和国外交部和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从事外交工作,曾任加伦的翻译。其后数年在东方劳

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和东方学研究所从事教学科研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阿布拉莫维奇, A. E.** (化名:阿尔布列赫特、阿尔诺) (1888—?) ——1926至1930年间(断续)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国际联络部驻中国代表。后从事科研、教学和经济工作。

**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 见: 越飞, A. A.。

**阿尔布列赫特, A.**, 见: 阿布拉莫维奇, A. E.。

**阿尔诺**, 见阿布拉莫维奇, A. E.。

**阿尔秋欣娜, A. B.** (1889—1969) ——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至1930年为中央委员。1930至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至1931年任俄共(布)中央女工农部副部长、《女工》杂志编

\* 按汉语拼音字母顺序排列。含本系列丛书第一卷人名。



辑。

**阿尔斯基**, M., 见施泰因, B. M.

**阿加列夫**, A. Ф. (生卒年不详)——1920至1922年为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成员。1921至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团团长。

**阿拉洛夫**, С. И. (1880—1969)——1918至1920年先后任莫斯科军区作战部部长、陆海军人民委员、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从事外交工作,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7年起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

**阿马加耶夫**, М. И. (1897—?)——1925至192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东方部工作人员。

**阿马努拉汗** (1892—1960)——1919至1929年任阿富汗埃米尔。

**阿姆特**, I. (1881—1954)——1921年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至1924年任美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

**阿莫索夫**, 见张国焘。

**阿塔图克, 基马尔·穆斯塔法·加吉** (1881—1938)——1918至1923年为土耳其民族解放革命领导人。1923至1938年任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

**埃尔杰列夫斯基** (生卒年不

详)——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工作人员。

**埃韦特**, A. (1890—1959)——1923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

**艾伯莱因**, G. (1887—1944)——1919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1922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艾杜斯**, X. Г. (化名:哈雅马) (1896—1972)——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日本领事。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艾列杰尔**, P. O. (1888—?)——1923至1924年任苏联驻上海全权代表处编外全权代表。1924至1925年任苏联驻上海副领事、苏联志愿船队驻上海代表。

**安贝尔-德罗** (1891—1971)——1920至1928年任瑞士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1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主席团委员。1943年被开除出党。

**安德烈**, 见谢苗诺夫, Г. И.

**安德烈耶夫**, A. A. (1885—

1971)——1920至1921年,1922至1961年任俄共(布)[联共(布)、苏共]中央委员,1924至1925年任中央书记。

**安德烈契克, A. C. (1895—?)**

——1926至1927年为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1927年6月起到中国出差。

**安多格斯基, A. H. (1876—?)**

——1925至1926年任《满洲通报》杂志编辑委员会委员(哈尔滨)。

**安加雷蒂斯, З. И. (1882—1940)**

——1920至1921年任立陶宛共产党外国局书记。1921年起任立陶宛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6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书记。

**安采洛维奇, H. M. (1888—1952)**

——1927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9年起任中央委员。1919年起从事工会和苏维埃工作。1921年为工会国际中欧局委员,参加了工会国际第二、四次代表大会。1928年起为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1年开始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

**安季波夫, H. K. (1894—1941)**

——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以来担任过党的许多省委、地委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奥尔忠尼启泽, Г. К. (1886—1937)** ——1921至1926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30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工农检查人民委员、苏联人民委员会议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4至1927年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奥拉赫拉什维利, И. Д. (1881—1937)**

——1923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6至1934年为中央委员。193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任联共(布)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外高加索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1932年起任联共(布)中央马恩列研究院副院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奥尔洛夫, H. Л. (1865—?)**

——1926至1927年为农民国际主席团委员。

**奥尔金, 见拉兹贡, И. Я. .**

**奥利舍夫斯基, Ф. И. (1890—1938)**

——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奥斯特罗乌莫夫, B. B. (生卒年不详)**

——1921至1924年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

**奥沙宁, И. М. (1900—1982)**

——1924至1927年为苏联驻华商务代表处工作人员、苏联驻上海总领事。后来从事外交和科研教学工作。

**奥希罗夫 (生卒年不详)** ——1925年任共产国际驻内蒙代表、内蒙人民革命军组织者之一。

## B

**巴津纳乌, O. K. (1899—?)**

——1925至1927年在中国任空中军事观察员。后在工农红军空军中任职。

**巴库林, A. B. (化名: 布罗夫) (1899—1940)** ——1925年在中国北方当顾问。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馆副领事。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巴拉诺夫斯基, M. И. (1898—?)** ——1922至1923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出版部秘书。1923至1928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部翻译。

**白崇禧 (1893—1966)** ——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参谋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副参谋长。1927年任淞沪警备司令、南京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白利安, J. (1883—1953)** ——

1926至1929年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白云梯 (1894—1980)** ——1924年1月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10月至1945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至1927年任内蒙国民党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内蒙革命军总司令, 后从事党政工作。

**鲍里索夫, C. C. (1889—?)** ——

1925至192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顾问、司长助理。后从事外交工作。

**鲍罗廷, M. M. (原姓: 格鲁森贝格, 化名: 英国人、银行家、布朗, M.、尼基福罗夫) (1884—1951)** ——1919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干部。1923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总政治顾问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1927年起从事经济和新闻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鲍曼, K. Я. (1892—1937)** ——

1925至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9至1930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8至1932年为中央组织部委员。1928至1929年任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1929至1932年任中央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鲍普 (秦涤清) (生卒年不**

详)——20年代初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员、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因学习成绩差被除名。1923年返回中国,发表一系列批评苏联政策的文章。

**鲍罗金娜**, Ф. С. (1892—1967)

——M. M. 鲍罗廷之妻。1923至1926年任国际妇女书记处驻中国代表。

**鲍世泽**(生卒年不详)——1926年任国民军外事全权代表。

**巴拉诺夫**, В. И. (1892—1933)

——1925至1931年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工农红军空军参谋长。死于空难。

**鲍耶**, А. (1869—1934) ——

1922年起在华从事外交工作。

**贝尔曼**, В. З. (1897—?) ——

1925至192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任教。1927年为联共(布)驻中国指导员代表团团员。

**贝拉米**, E. (1850—1898) ——

美国作家。

**贝利**, В. А. (1887—1981) ——

1922至1923年任苏联驻华使团海军武官。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贝索**, 见罗明纳兹, В. В.。

**俾斯麦**, О. (1815—1898) ——

1871至1890年任德意志帝国宰相。

**彼得拉舍夫斯基**, 见吴兆高。

**彼得罗夫**, 见彭述之。

**彼得罗夫**, Ф. 见拉斯科尔尼科夫, Ф. Ф.。

**彼得罗夫斯基**, Г. И. (1878—

1958) ——1918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39年为中央委员。1926至1939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19至1938年任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

**彼得罗相**(生卒年不详) ——

1927年为联共(布)驻华指导员代表团成员。

**毕庶澄**(1894—1927) ——直鲁

联军第八军军长。1927年春领导了上海保卫战。国民革命军部队占领城市后被张宗昌处决。

**别尔津**, Я. К. (1889—1938)

——1924至1935年,1937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局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别林斯基**, С. Н. (化名:沃林,

M.) (1896—?) ——1925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秘书。1926至1927年为鲍罗廷驻华机构工作人员、塔斯社驻广州记者。1927至1929年任中国研究所所长。

**波多利斯基**(生卒年不详) ——

1926年任苏联驻奉天领事。

**波戈金**, В. Л. (1870—?) ——

1915年起为沙皇军队少将军官,十

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1920至1922年在远东共和国担任政府职务。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团团长。

**波格丹诺夫**, A. A. (原姓: 马利诺夫斯基) (1873—1928) ——俄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医生。1926年起任输血研究所所长。拿自己作实验时牺牲。

**波克罗夫斯基**, M. H. (1868—1932) ——1930年起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8年起任副教育人民委员、共产主义学院和红色教授学院院长。

**波利瓦诺夫**, E. Д. (1891—1938) ——1917至1921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2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工作人员。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波利亚克**, B. E. (化名: 波尔拉克) (1890—?) ——1923至1924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1924至1927年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秘书处、工农红军参谋部管理局工作。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波塔波夫**, A. C. (生卒年不详) ——1912年起为沙皇军队将军。十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1920年底起从事教学工作。

**柏烈伟**, C. A. (生卒年不详) ——俄国东方学家。1920至1921年参与了中国共产主义组织的组建工作。后来不再从事政治活动。50年代死于美国。

**柏文蔚** (1876—1947) ——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 指挥过各种部队。1924年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身份赴东北从事党的工作和同冯玉祥取得联系。北伐初期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三师师长。后从事军事工作和党的工作。

**博戈莫洛夫**, Д. В. (1890—1937) ——1924至1927年任苏联驻奥地利和英国全权代表。1927至1929年任驻波兰全权代表。1933至1937年任驻华全权代表。

**博尔特诺夫斯基**, B. B. (1894—1937) ——1925至1929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局长助理、副局长。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秘书。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博扬楚尔汗·布尔金** (1885—1937) ——1925至1928年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全权代表。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卜道明** (卜士琦、普罗列塔里耶夫) (1902—1964) ——1921至1922年在莫斯科学习。1924至1925年在黄埔军校当翻译。1926年任国民党

驻苏代表邵力子的翻译。1926至1933年在莫斯科学习和从事科研教学工作。1933年在中国被捕后脱离中国共产党。

**布勃诺夫**, A. C. (化名: 伊万诺夫斯基) (1884—1938) ——1919至1920年, 1922至1924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1925年任中央书记。1922至1924年任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1924至1929年任工农红军政治部主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尔特曼**, H. F. (1900—1921) ——1920年起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主席。死于不幸事件(手枪走火)。

**布哈林**, H. И. (1888—1938) ——1917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 1924至1929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哈罗夫**, 见罗亦农。

**布拉戈达托夫**, A. B. (化名: 罗兰) (1893—?) ——1923至1925年为工农红军军事学院学员。1925至1927年为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处工作人员、国民军第二军河南顾问组副组长、国民革命军华南顾问团参

谋长。后来在工农红军和苏军中任职。

**布拉科娃**, M. H. (1892—1970) ——1920至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技术秘书。后从事经济、科研和教学工作。

**布兰德勒**, G. (1881—1967) ——1919至1923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1至1923年、1925至1926年任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年被开除出党。

**布朗**, M., 见鲍罗廷, M. M.。

**布劳恩**, E. (1892—1960) ——1924至1926年任英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5至1928年在英国共产党中央机关工作, 任政治局委员。

**布劳恩**, O. (原姓: 埃韦特·阿尔图尔) (1890—1959) ——1925至1929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至1927年任德国共产党中央书记。1926至1929年(断续)任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布里克**, C. K. (1898—1937) ——1921至20年代中期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宣传局局长、东方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布里斯托尔**, M. (1868—1939)

——美国海军军官、外交官。1919至1927年任美国驻土耳其高级专员。

**布林斯基**，见任弼时。

**布罗夫**，见巴库林，A. B.。

**布罗伊多**，Г. И. (1885—1956)

——1921至1923年任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1921至1926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1926至1933年任俄罗斯联邦国家出版社管委会主席，1934至1941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教育人民委员、党的出版社社长。

**布留汉诺夫**，H. П. (1878—1942) ——1927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4年任粮食人民委员。1926至1930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布留赫尔**，B. K. (化名：加伦、乌拉尔斯基) (1890—1938) ——1934至1938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5至1927年在华南任苏联军事顾问团团团长。1929至1938年任特别远东军司令。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布尤施泰因**，M. H. (? —1921) ——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主席团委员、俄共(布)中央远东局秘书。

**布伦纳达**，见布伦南，J.。

**布伦南**，J. (1883—1953) ——1926至1929年任英国驻广州总领事。

## C

**蔡和森** (1895—1931) ——1919至1921年留学法国。1922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向导》周报总编辑。1926年曾率领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至1930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1931年遭国民党杀害。

**蔡特金**，K. (1857—1933)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主席团主席和国际妇女书记处主席。

**蔡特林**，E. B. (1898—1937) ——1919年任俄罗斯共青团中央主席，1922年为书记。1922至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蔡元培** (1868—1940) ——1924年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起为委员。1917至1927

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蔡志华**(生卒年不详)——中共党员。20年代留学苏联。1925年起在中国从事党的工作。

**曹锟**(1862—1938)——直系军阀首领之一。1922年,1923至1924年任中华民国总统。

**查理**,见纳索诺夫,H.M.。

**陈独秀**(化名:老头子)(1880—1942)——1920至1921年为中国共产党的组织者之一。1921至1922年任中共中央局书记。1922至1925年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5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929年被开除出党。

**陈公博**(1890—1946)——1921年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1925年起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工人部部长。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教育处处长、湖北省财政委员会主席、外事全权代表。1927年任江西省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1938年投靠日本。被判处死刑。

**陈果夫**(1892—1951)——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

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陈济棠**(1890—1954)——1925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一师师长。1927年春率领国民政府代表团访问苏联。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陈炯明**(1878—1933)——1920年任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1921至1922年任孙中山政府军事部长、外交部长。1922年6月发动反孙中山叛乱,把孙赶出广东。1923年被排挤出广州。1925年在国民政府军两次东征中被打败。

**陈可钰**(?—1944)——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

**陈廉伯**(1884—1945)——1924年为反对孙中山政府的商团叛乱领导人之一。1926年任广东省总商会会长。1945年乘船出走澳门,被美机炸沉身亡。

**陈铭枢**(1890—1965)——1925至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十师师长。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兼武汉卫戍司令。1927年任南京政府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军职务。

**陈启修**(1886—1960)——1919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1924至1925



年留学莫斯科。1925至1926年在黄埔军校和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任教，任《武汉民国日报》编辑。1926年12月至1927年7月任《中央日报》编辑。1927年3至7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1927至1930年旅居日本。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陈乔年**（化名：克拉辛）（1902—1928）——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19至1923年留学法国。1923至1925年留学苏联。1925至1927年任中共北方区委组织部部长。1927至1928年历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中共湖北省委书记、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部长。遭国民党杀害。

**陈森**（生卒年不详）——广东工会联合会主席。

**陈绍禹**（化名：王明、戈卢别夫）（1904—1974）——1931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至194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至1929年留学苏联。1927年为联共(布)驻中国指导员代表团成员。1931至1937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职务。

**陈树人**（1883—1948）——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

行委员会工人部部长。后来从事党的工作。

**陈望道**（1891—1977）——1920至1921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脱离共产主义运动。后来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

**陈延年**（1899—1927）——陈独秀之子。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政治局候补委员。1920至1923年留学法国。1923至1924年留学苏联。1924至1927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秘书长、组织部长、书记。1927年任中共江苏省、浙江省省委书记。遭国民党杀害。

**陈友仁**（1875—1944）——1922年任孙中山国际问题顾问。1924年任孙中山秘书。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先后任广州政府代理外交部长、武汉政府外交部长。1927至1931年出使苏联和西欧国家。后来参与了党内政治斗争，死于日本狱中。

**程潜**（1882—1968）——1924年任广东大本营军政部部长。1925年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1927年为武汉政府成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军职务。

**出渊胜治**（生卒年不详）——20年代任日本外务省亚洲局局长。

**茨哈卡娅**，M. Γ.（1865—1950）——1923至1930年为外高加索苏

维埃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之一、格鲁吉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主席。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 D

**达夫谦**, Я. X. (化名: 达维多夫) (1888—1938) —— 1921至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波罗的海国家司司长。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驻立陶宛全权代表。1922至1924年任苏联驻华代表处参赞。1924至1937年从事外交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达林**, C. A. (1902—1985) —— 1921至1924年为青年共产国际工作人员。1921至1922年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1922至1924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6至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驻中国代表。后从事新闻和科研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达什凯维奇**, И. В. (1888—1942) —— 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戴季陶** (1891—1949) —— 1911年参加革命运动。1924年起任国民

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参加了北京西山会议。1927至1948年任考试院院长。1949年自杀身亡。

**丹科**, 见福京, H. A.。

**德本科**, П. E. (1889—1938)

——1918年起任海军人民委员、克里米亚军队司令、师长。1925年起任工农红军参谋部炮兵部部长、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历任一些军区的司令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德田球一** (1894—1953) ——

1922至1927年为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书记。1925至1927年为日本共产党出席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八次全会代表。1928至1945年在日本被监禁。后来出狱从事党的工作。

**邓本殷** (生卒年不详) —— 1919至1925年为陈炯明军队的指挥官之一。

**邓尼金**, A. И. (1872—1947) —— 1919至1920年任“俄罗斯南方武装力量”总司令。1920年起侨居国外。

**邓演达** (1895—1931) —— 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至1925年在黄埔军校担任领导职务。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部主任。1927至1930年旅居苏联、德国

和欧洲其他国家。1930至1931年任与蒋介石相对抗的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中央干事会总干事。后被蒋介石杀害。

**邓颖超**(1904—1992)——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任中共中央妇女委员会书记。1924至1925年在天津从事妇女运动工作。1925年底至1927年初任中共广东省委妇女部部长。后来担任党政职务。周恩来的妻子。

**邓泽如**(1869—1934)——1923年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

**邓中夏**(1894—1933)——1922至1923年,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至1925年,1928至1933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5至1927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宣传部部长。1925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期间任罢工委员会顾问、共产党党团书记。1928至1930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中华全国总工会驻红色工会国际代表。后来在中国从事工会工作和党的工作。遭国民党杀害。

**东坎**, 见米诺尔, R.。

**董亦湘**(1896—1939)——1925

至1933年先后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学习和从事教学翻译工作。后在苏联远东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杜成志**(生卒年不详)——1925年10月至1926年4月为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成员。

**杜霍夫斯基, С. И.**(1887—1963)——1920至1929年从事外交工作。1920至1924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

**杜克鲁, J.**(化名:杜邦、法国人)(1904—?)——1926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驻上海法国水兵工作指导员。

**杜锡珪**(1875—1943)——1921至1927年(断续)任南京海军部总长。

**渡边政之辅**(1898—1928)——1922年加入日本共产党。1927至1928年任日本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被警察杀害。

**段祺瑞**(1865—1936)——皖系军阀首领。1924至1926年为中华民国临时统治者。

**多比索夫, M. E.**(1902—?)——1921至1922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情报科科长。1922至1924年在莫斯科东方学院学习。192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工作人员。

**多布罗谢利斯卡娅**, M. B. (1901—?) ——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远东局技术秘书。

**多尔森**, J. (化名: 美国人) (1884—?) ——1926至1927年任(旧金山)《劳工新闻报》驻华记者、(北京)《人民论坛》报编辑。后从事新闻工作。

**多夫加列夫斯基**, B. C. (1885—1934) ——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瑞典全权代表。1927年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1927年起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

**多戈马罗夫**(生卒年不详) ——1927年为联共(布)驻中国指导员代表团成员。

**多加多夫**, A. И. (1888—1937) ——1924至1930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1921至1929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1930年起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多列茨基**, Я. Г. (原姓: 菲格坦施泰因) (1888—1937) ——1921至1925年任俄罗斯通讯社责任领导人。1925年起任塔斯社责任领导人。

**多里奥**, J. (1898—1945) ——1922年起为青年共产国际机关工作

人员。1923年任法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总书记。1924年起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2至4月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成员。1934年被开除出党。

**多林**, 见多比索夫, M. E.。

**多谢尔**, З. H. (生卒年不详) ——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石油辛迪加代表。

## F

**法国人**, 见杜克鲁, J.。

**法因贝格**, И. И. (1886—1957) ——1919至192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部工作人员。1923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海参崴代表。1924至192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顾问。1925至1926年任塔斯社驻华记者。1926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1935年起从事翻译工作。

**樊钟秀**(樊醒民)(1888—1930) ——1924年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三军、第四十五军军长, 为南京政府成员。后来从事军事工作。

**方本仁**(1880—1953) ——1924至1926年任江西省督军。1926年转

到国民政府方面，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冯玉祥**(1882—1947)——1924年以前加入奉系军阀集团。1924年10月为北京政变领导人，任国民军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1926年赴苏联考察。回国后加入中国国民党，后来担任一些军事职务和党内职务。1947年遇难身亡。

**冯自由**(1882—1958)——国民党活动家。1923年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被开除出党。1925年为国民党党员同志俱乐部创始人。1935年恢复国民党党籍。后来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弗赖耶尔**, B. C. (化名:因杜斯、塞格尔)(1897—?)——1924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印度问题顾问。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和中共中央土地问题顾问。1927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弗列塔斯**, B. (1867—?)——1913至1925年任葡萄牙驻华公使。

**弗鲁姆京**, M. H. (1878—1939)——1922至1929年任苏联副外贸人民委员。1924年任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伏龙芝**, M. B. (1885—1925)

——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至1925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4至1925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主席、副陆海军人民委员、陆海军人民委员、工农红军参谋长、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伏罗希洛夫**, K. E. (1881—1969)

——1921至1961年为俄共(布)[联共(布)、苏共]中央委员。1926至1960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25年起任苏联陆海军人民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至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主席。

**福尔图纳托夫**, E. (生卒年不详)——1925年任苏联驻北京使团医生。

**福格尔**，见刘国璋。

**福京**, H. A. (化名:年轻人、济梅廖夫) (1899—?)——1924至1926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1926至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1927至1930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委员东方部部长。1930至1933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富明泰** (生卒年不详) —— 1925至1926年任内蒙人民革命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傅秉常** (1896—1965) —— 1925至1926年任广州国民政府外交部特派交涉员兼财政部粤海关监督。后来历任党内和外交职务。

## G

**甘乃光** (1897—1956) —— 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农民部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冈察洛夫**, H. K. (1886—1970) —— 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工作全权代表、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1921年为第五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任西伯利亚红军政治部主任。1931至1934年任苏联驻日本神户市总领事。1945至1953年为全苏商会工作人员。

**高尔察克**, A. B. (1874—1920) —— 海军上将，国内战争时期反苏维埃运动组织者之一。1918至1919为“俄罗斯国家最高统治者”。根据伊尔库茨克革命军事委员会决定被处决。

**高君宇** (高尚德) (1896—1925)

—— 1922年出席了第一次远东人民代表大会。1922至1923年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起任孙逸仙的秘书。

**高雄长男** (生卒年不详) —— 1926至1927年任日本驻汉口总领事。

**戈尔布诺夫**, H. II. (1892—1938) —— 1920年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办公厅主任。1922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办公厅主任。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戈菲**, G. (1870—1939) —— 1920至1927年任英国驻汉口总领事。

**戈劳包夫**, G. (1901—1957) —— 1924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

**戈列夫**, B. E. (化名：尼基京) (1900—1938) —— 1925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后在工农红军中任职。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戈洛谢金**, Ф. И. (1876—1941) —— 192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至1934年为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联共(布)哈萨克边区委员会书记。1933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国家审判总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戈卢别夫**，见陈绍禹。

**格尔舍维奇**，M. H. (1889—?) ——1920至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朝鲜科科长，后任该处政治事务全权代表。1921至1922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出版科科长、日本科俄籍书记。

**格克尔**，A. H. (1888—1938) ——1920至1922年任(巴库)第十一军和(第比利斯)高加索独立军军长。1922年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院长。1922至1925年任苏联驻中国全权代表处武官。后从事军事、外交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格列尔**，Л. H. (1875—?) ——1920年任塔什干国际宣传委员会主席。1922至1930年任红色工会国际东方部部长，同时从1926年6月到7月底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局委员、红色工会国际驻远东局代表。1930年起在国际列宁学校从事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格里鲍夫**，C. E. (1895—1938) ——1924至1925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指挥干部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格里亚兹诺夫**，И. K. (1897—1938) ——曾任苏联一些军区的司令员，为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格罗莫夫**，Д. M. (原姓：格尔斯特尔) (1892—?) ——1920至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秘书。1921年为远东共和国驻莫斯科使团成员，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

**格什克**，O. (1882—1957) ——1924至1933年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主席。1924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

**格伊**，K. B. (1896—1939) ——1924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至192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组织部部长。后从事党的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葛兰西**，A. (1891—1937) ——1922至1923年任意大利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3至1924年任意大利共产党中央书记。1926年被逮捕，死于狱中。

**古比雪夫**，B. B. (1888—1935) ——1921至1922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至1923年，1927至1936年为中央委员。1922至1923年任中央书记。1927至193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3至1926年任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议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6至1930年任苏联最高国民

经济委员会主席。1930年起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人民委员会议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古比雪夫**, H. B. (化名: 季山嘉) (1893—1938) —— 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广州华南军事顾问团团团长。后来在工农红军中担任指挥职务。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古尔曼**, M. J. (生卒年不详) —— 1920至1922年任《上海生活》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古谢夫**, C. И. (原姓: 德拉布金, Я. Д.) (1874—1933) —— 1920至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书记。1929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古应芬** (1873—1931) —— 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至1926年任广州国民政府财政部长。1927年4月为广州政变策划者之一。1927至1930年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顾孟余** (化名: 学者) (1888—1972) —— 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部长。1922年起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教学部主任。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顾维钧** (惠灵顿·顾) (1888—1985) —— 1922至1926年(断续)任北京政府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后从事外交工作。

**关守森** (音) (生卒年不详) —— 1926年任中共广东区委组织部部长。

**郭松龄** (1883—1925) —— 张作霖军队的一名将领。1925年11月公开反对张作霖, 宣布成立东北国民军。后被张作霖杀害。

## H

**哈肯**, H. (1880—1949) —— 1925年起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25至1934年(断续)任捷共驻共产国际代表。1926至1927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6年起不再从事政治活动。

**哈里托诺夫**, M. M. (1887—1938) —— 1923至1925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20、30年代历任俄共(布)中央乌拉尔局书记、萨拉托夫省委书记、中央监察委员会和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负责的工作人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海默**, M. A. (1894—1937) —— 1922至1931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秘书局局长主任。遭非法镇压, 死后



恢复名誉。

**哈塔耶维奇**, M. M. (1893—1937) —— 1925 至 1927 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 至 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0 至 1937 年为中央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哈西斯**, A. H. (? —1927) —— 1925 至 1926 年任苏联驻上海和汉口总领事馆秘书。1926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广州总领事馆副领事。遭国民党枪杀。

**憨玉琨** (1888—1925) —— 1923 年任中央陆军第三十五师师长。1924 年转到国民军方面。后自杀身亡。

**赫梅廖夫**, A. П. (原姓: 阿片) (生卒年不详) —— 1925 至 1927 年任中共中央军事部顾问。

**赫韦辛**, T. C. (1894—1940) —— 1922 年 4 月起任工农红军军事学院事务部部长。1926 年 9 月起归工农红军总部调遣。后来长时间休假。再后在国家机关担任领导职务, 还担任过民警总局局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何东** (1862—1956) —— 香港企业家。

**何键** (1897—1956) —— 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八军第一师师长。1926 至 1927 年任国民军第三十五

军军长。后来从事党政工作。

**何今亮**, 见汪寿华。

**何香凝** (1879—1972) —— 1926 至 1927 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妇女部部长。后来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何应钦** (1890—1987) —— 1925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26 至 1927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贺昌** (1906—1935) —— 1927 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 年为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共上海市委宣传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湖北省委书记。后来从事党的工作, 在战斗中牺牲。

**贺龙** (1896—1969) —— 1926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26 至 1927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独立师师长。1927 年 6 月起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来在中国红军和中国人民解放军中从事军事工作。

**贺耀祖** (1890—1961) —— 1923 至 1926 年任湘军第一师师长、前敌总指挥。1926 年夏加入国民革命军, 任第二独立师师长。1927 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十军军长。后来从事军事、外交和行政工作。

**贺衷寒** (1899—1972) —— 1925

年为孙文主义学会组织者之一。1925至1928年留学苏联。后来在国民党中从事军事政治工作和党的工作。

**洪秀全** (1814—1864) —— 1850至1864年太平天国起义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后来自杀身亡。

**胡公冕** (1888—1979) —— 1921至1923年留学苏联。1924年先后任黄埔军校教导二团一营党代表、二营营长。1925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政治宣传大队大队长、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五师第六十七团团长。后来从事军事工作。

**胡汉民** (1879—1936) —— 国民党活动家。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任广东省省长。1925年任国民政府外交部长。1925至1926年任国民党访苏代表团团长。1927年任南京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领导职务。

**胡景翼** (1892—1925) —— 1924至1925年任国民军副总司令、国民军第二军军长。1925年任河南省督军。

**胡适** (1891—1962) —— 学者、哲学家、社会活动家、外交家。

**胡宗铎** (1892—1962) —— 1926年先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旅旅长、第七军第二师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路军第三纵队指挥官。

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华盛顿, 乔治** (1732—1799)

—— 1789至1797年任美国第一任总统。

**黄爱** (1897—1922) —— 1920至1922年为湖南省工人运动领袖之一。1921年以前是无政府主义者。1922年为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团团员。湖南省督军赵恒惕下令镇压长沙市工人罢工时遭杀害。

**黄郛** (1880—1936) —— 1924年任中华民国代总理。1927年任上海市市长。后来还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黄志强**, 见黄兴。

**黄平** (化名: 沃罗夫斯基) (1901—1981) —— 1921至1923年为中共北京组织成员。1923至1924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至1926年任中共香港区委书记。1926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工人部部长。1927年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军事委员会委员、广州起义领导人之一。1928年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1932年以前担任党和工会的一些领导工作。1932年被捕后退出中国共产党。

**黄绍竑** (1895—1966) —— 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4至1925年任广西省省长。1925至1927年任广西省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

些军政职务。

**黄兴(黄志强)**(1874—1916)

——兴中会和同盟会的创始人之一。1905至1911年为反清政府起义领导人,1911年任革命军总司令、讨袁武装斗争领导人之一。

**霍尔维茨, M. Г.** (化名:瓦列茨基) ——1921年起任波兰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5年任《共产国际》杂志编辑。后来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中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霍赫洛夫金, B. Я.** (生卒年不详) ——1920年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中国科书记。1921年为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中国科工作人员。

**霍登, 罗伯特**, 见何东。

**霍多罗夫, A. E.** (1886--1949)

——1919至1922年任俄罗斯通讯社、远东通讯社驻北京分社社长。1923年起任东方商会副会长。1924年起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霍季姆斯基, B. H.** (1892--1939)

——1920至1921年在西伯利亚和远东从事党的工作,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远东局委员。1921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起从事科研、教学和出版工

作。

**霍拉, 布列季斯拉夫**(1894—?)

——1920至1925年代表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被开除出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 J

**基赫坚科** (生卒年不详) ——

1926至1927年为苏联在华航空机械师。

**基洛夫, C. M.** (原姓:科斯特里

科夫)(1886—1934) ——1923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3至1930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0年起为政治局委员。1926年起任列宁格勒省委(州委)和联共(布)中央西北局第一书记。1934年起任联共(布)中央书记。遇刺身亡。

**基谢廖夫, A. C.** (1879—1937)

——1917至1919年,1921至1923年,1925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24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1至1923年任小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24年任全苏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季诺维也夫, Г. E.** (原姓:拉多

梅斯利斯基), (1883--1936) ——

1907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至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季山嘉**, 见古比雪夫, H. B.。

**季特里赫斯**, M. K. (1874—1937) —— 远东反苏维埃运动组织者之一。1922年底侨居国外。

**季维尔**, A. Ю. (1899—?) —— 1921至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秘书。1922至1923年任季诺维也夫秘书处处长。1923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部书记。1924至192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书记。1926至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外国部部长。

**济梅廖夫**, 见福京, H. A.。

**加拉罕**, Л. М. (原姓: 加拉罕尼扬, 化名: 米哈伊洛夫) (1889—1937) —— 1918至1920年, 1927至1934年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23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加里宁**, M. И. (1875—1946) —— 1919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 1926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年起任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22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1938年起任苏联最高苏维

埃主席团主席。

**加伦**, 见布留赫尔, B. K.。

**加米涅夫**, Л. Б. (原姓: 罗森菲尔德) (1883—1936) —— 1917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至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至1926年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1923至1926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1922至1924年任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24至1926年任主席。1923至1926年任列宁研究所所长。后来从事外交和行政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加米涅夫**, С. С. (1881—1936) —— 1919至1924年任共和国武装力量总司令。1927至1934年任苏联陆海军副人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4年起任工农红军防空局局长。

**加米涅娃**, О. Д. (1883—1941) —— 20年代任全苏对外文化联络协会主席。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加蓬**, Ф. И. (1891—1982) —— 1919至1921年先后任俄罗斯联邦驻西伯利亚和远东外交事务副全权代表和全权代表、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西伯利亚委员会东方局局长, 同时从1920年起先后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主

席团委员、主席助理、主席。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远东副全权代表。1921至1924年在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起从事党的工作和科研教学工作。

**简琴石**(1888—1950)——广州烟草公司经理。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商人工作部部长、广东省工农商学联合委员会副主席。

**蒋介石**(蒋中正)(1887—1975)——国民党活动家。1923年率领国民党代表团访问苏联。1924年任黄埔军校校长。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后来担任国民党和中华民国领导人。

**捷尔任斯基, Ф. З.**(1887—1926)——1917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2至1924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4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17年起任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1919至1923年任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内务人民委员,同时从1921年起兼任交通人民委员。1924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

**捷列沙托夫, Н. И.**(生卒年不详)——1924至1926年任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金佛庄**(1897—1926)——1923年出席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1924至1926年任黄埔军校教导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处副处长、警卫团团长。被孙传芳杀害。

**金成树**(生卒年不详)——1926至1927年任朝鲜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

**靳云鹗**(1881—1935)——1926至1927年历任吴佩孚军队司令部副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河南省省长、陕西省督办、武汉警备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军人**, 见钮永建。

## K

**卡巴科夫, И. Д.**(1891—1937)——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5年起为中央委员。1922至1928年先后任雅罗斯拉夫、图拉省委书记。1929年起任乌拉尔州委第一书记。1934年起任斯维尔德洛夫州委第一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卡冈诺维奇, Л. М.**(1893—1991)——1923至1924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4至1957年为中央委员。1924至1926年, 1928至1946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6至1929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0至1957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卡明斯基**, Г. H. (1895—1938)

——1925至1927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至1929年任全苏农林工作者工会中央主席、全苏集体农庄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卡斯帕罗娃**, В. П. (1888—

1941)——1923至1927年任国际妇女书记处东方部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卡佐夫**, Л. B. (化名:列昂尼多夫、施密特·约冈)(1895—1937?)——1919至1924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人员。1925至1926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26年起从事外交工作和党的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凯尔逊**, J. (1859—1925) ——

1919至1924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康德**, 伊马努伊尔(1724—

1804)——德国哲学家。

**坎格拉里**, В. А. (生卒年不详)——1925至1927年任蒙古人民军参谋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考夫曼**, Л. Г. (1892—1935(?)) ——1920年任上海“劳工局”俄侨革命民主小组书记。1920至1921年为

俄文《上海生活》报秘书,同时为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工作人员。1921年3至12月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伊尔库茨克)编辑出版科秘书。1922至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工作人员。1924年起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

**柯立芝**, К. (1872—1933) ——

1923至1929年任美国第三十任总统。

**科博泽夫**, И. А. (1876—1941)

——1922至1923年任远东革命委员会主席、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1923年起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科多维利亚**, 维克托里奥(1894

—1970)——1921至1970年为阿根廷共产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1924年起任阿根廷驻共产国际执委会和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代表。

**科夫里日尼科夫**, В. Г. (1897—

?) ——1925至1927年为苏联在华航空机械师。后来在工农红军空军中任职。

**科拉罗夫**, 瓦西尔(1877—1950)

——1919年起为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委员。1919至1923年任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书记。1923至1944年为保加利亚共产党外国局委员。1921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

会主席团委员。1922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总书记。

**科马罗夫**, H. П. (1886—1937)

——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2年, 1923至1934年为中央委员。1925年任俄共(布)中央西北局书记。1926至1929年任列宁格勒市委和省委执行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科普**, B. Л. (1880—1930) ——

1919至1922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驻德国代表。1923至1925年为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日本全权代表。1927至1930年任苏联驻瑞典全权代表。

**科托夫**, B. A. (1885—1937)

——1925至1930年为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联共(布)中央组织局候补委员。1925至1928年任党中央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科西奇**, Д. И. (1886—1937)

——1923至1925年任蒙古人民军参谋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科肖尔**, И. В. (1893—1937)

——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7年起为中央委员。1923年起任“格罗兹尼油田”和“南部地区制钢工业”托拉斯领导人。1927年

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副重工业人民委员。1933年起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处理远东边区委员会事务全权代表。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科肖尔**, С. В. (1889—1939)

——1923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1927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 1930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2至1926年任中央西伯利亚局书记。1928年起任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总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科兹洛夫斯基**, В. И. (生卒年不详) ——1927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

**克拉夫佐夫**, А. М. (1897—?)

——1925至1927年为苏联在华空军飞行员。后来在工农红军空军中任职。

**克拉科韦茨基**, А. А. (1884—

?) ——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奉天领事。

**克拉斯诺晓科夫**, А. М. (1880—1937) ——1918年起任远东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20至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远东共和国政府主席和外交部长。1921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副财政人民委员。1922至1926年任苏联工业银行理事会

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克拉辛**，见陈乔年。

**克拉辛**，Л. В. (1870—1926)

——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1918年起为苏联国民经济最高委员会主席团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克莱门蒂**，S. (1875—1947)

——1925至1930年任香港总督。

**克里莫夫**，А. Я. (1898—1970)

——1925至1927年任苏联驻开封军事顾问组组长政治助理、苏联驻张家口领事。后来从事外交和科研教学工作。

**克里尼茨基**，А. И. (1894—1937) ——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后来任外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1935年起任萨拉托夫边区委员会和州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克里诺夫斯基**，М. П. (生卒年不详) ——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克留切斯基**，见潘家宸。

**克伦斯基**，А. Ф. (1881—1970)

——1917年3至10月任俄国临时政府首脑。后旅居国外。

**克诺林**，В. Г. (1890—1938)

——1926至1927年为联共(布)中

央委员。1927至1928年任白俄罗斯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7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至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克日扎诺夫斯基**，Г. М. (1872—1959) ——1924至1939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至1923年，1925至1930年任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1930年起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

**克维林**，Э. И. (1888—1937)

——1920至1922年相继任党的几个省委书记。1922至1934年为中央委员。1918年，1923至1925年任乌克兰共产党(布)第一书记。1925年起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孔德**，奥克斯特(1798—1857)

——法国哲学家。

**库比雅克**，Н. А. (1881—1937)

——1923至1934年为中央委员。1922至1924年任中央远东局书记。1927至1930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7至1928年任中央书记。后来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库切克汗·米尔扎**(1880(81)—1921) ——1921年任(伊朗)吉梁共和国临时政府主席。

**库达舍夫**，Н. А. (? —1921)



——1916至1917年任俄国驻华公使。1917年12月被苏维埃政府剥夺全权。1920年9月以前，中国政府承认他为俄国正式代表。

**库列拉**, A. (1895—1975) ——1920至1924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库恩, 贝拉** (1886—1939) ——匈牙利共产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21年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库丘莫夫**, B. H. (1900—?) ——1922至1926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外国班主任。1927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驻华代表。1928至1929年任中国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副校长。1929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工作人员。1931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杂志编辑。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库西宁**, O. B. (1881—1964) ——芬兰共产党组织者之一。1921至193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书记。1941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57年起为苏共中央书记。1952至1953年，1957至1964年为中央主席团委员。

**库兹涅佐夫**, C. M. (1891—?) ——1926至1930年任苏联副财政人民委员、新西伯利亚边区委员会

主席。

**库兹涅佐娃**, M. Ф. (生卒年不详) ——维经斯基的妻子、国际妇女书记处驻华代表。

## L

**拉宾**, A. Я. (化名：谢福林) (1899—1937) ——20年代初历任几个军区司令员。1925年任驻华北军事顾问。1926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拉齐斯**, M. И. (原姓：苏德拉布斯, Я. Ф.) (1888—1938) ——1923年起任采矿工业总局局长、农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任联共(布)中央责任指导员、农村工作部副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拉狄克**, K. B. (原姓：索贝尔森) (1885—1939) ——1919至1924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0至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0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3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25至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拉法伊尔**, 见任卓宣。

**拉菲斯**, M. Г. (化名：马克斯)

(1883—1942)——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委会宣传鼓动部工作人员。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书记。后来任塔斯社外国新闻部主任。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拉科夫斯基**, X. Г. (1873—1941) ——1919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至1927年任苏联驻法国全权代表。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拉科西**, M. (1892—1971) ——1921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后来担任匈牙利共产党领导职务。

**拉舍维奇**, M. M. (1884—1928) ——1918年起在红军中担任领导工作。1918至1919年，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2至1925年任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1925年起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拉斯科尔尼科夫**, Ф. Ф. (化名：彼得罗夫) (1892—1939) ——1921至1924年从事外交工作。1924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书记处)部长(主任)。后从事外交工作。

**拉兹贡**, И. Я. (化名：奥尔金)(生卒年不详) ——1925至1926年任华南苏联军事顾问团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后来在工农红军中

任职。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拉祖莫夫**, С. П., 见塔尔哈诺夫, О. С.。

**莱茵斯坦**, Б. И. (原姓：达维德森) (1866—1947) ——1918年起为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宣传司工作人员。代表美国社会党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后来为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的工作人员。

**赖特**, 见索洛维约夫, В. И.。

**兰普森**, M. (1880—1964) ——1926至1934年任英国驻华公使。

**老头子**, 见陈独秀。

**雷斯库洛夫**, Г. Р. (1894—1938) ——1923至1924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副民族事务人民委员。后来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蒙古代表。1926至1937年任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议副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雷因格尔特**, И. И. (1887—1936) ——20年代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司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黎元洪** (1864—1928) ——1916至1917年，1922至1923年任中华民国总统。

**李宝璋** (生卒年不详) ——1926

至1927年任孙传芳军队第七十六旅旅长、上海警备区司令。

**李贝尔, M. H.** (原姓:戈德曼) (1880—1937) ——崩得首领之一。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李卜克内西, 卡尔** (1871—1919) ——德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

**李大钊** (1889—1927) ——中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2至1923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 1923年起为中央委员。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委员。1924年率中共代表团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后被张作霖杀害。

**李德曼, Ф. М.** (1896—1937) ——1924至1927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预算局副局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李福林** (1874—1952) ——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2年起任广东省警务处处长。1926至1928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五军军长。1928年退伍。

**李汉俊** (1890—1927) ——1920至1921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劳动界》周刊编辑。1921年出席了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年起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后来从事教学工作和在国民党机关中任职。被桂系军阀胡宗铎杀害。

**李厚基** (1870—1942) ——1916至1922年任福建省督军。1924年引退。

**李济深** (1886—1959) ——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常务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至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国民革命军总参谋长、广东省政府军事厅厅长。1927年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李景林** (1885—1932) ——1924年12月至1925年12月任直隶保安司令、直隶省省长。1926年1至6月与张宗昌组成直鲁联军, 任讨贼联军直军总司令。

**李可夫, A. И.** (1881—1938) ——1907至1912年, 1934至193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05至1907年, 1917至1934年为中央委员。1924至1930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议主席。1926至1930年任苏联劳动与国防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李老春** (音) (?—1925) ——广东省农民运动领导人之一。

**李立三** (1899—1967) ——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30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至1921年留学法国。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书记。1924至1925年任中共

上海区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5至1926年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26至1927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委会委员。后来在中共、红色工会国际、中华全国总工会中担任领导职务。1938年在苏联遭非法迫害，后恢复名誉。“文化大革命”期间去世。

**李鸣钟** (1886—?) ——1924年任冯玉祥国民军第一军第六师师长。1925年任西北国民军西路总指挥。1926年任京师警备代理总司令兼警察总监。1927年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李启汉** (1898—1927) ——1920至1921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至1925年为中华全国总工会秘书处成员。1925年起为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工人运动委员会委员、省港罢工委员会委员和干事局局长。1927年在广州被广东军阀李济深杀害。

**李守常**，见李大钊。

**李维汉** (1896—1984) ——1925至196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19至1922年留学法国。1923至1927年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后来还从事一些党政工作。

**李维诺夫**，M. M. (1876—1951)

——1918年起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21年起任副外交人民委员。1930至1939年任外交人民委员。

**李文范** (1884—1953) ——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秘书。1925至1926年为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成员。1926至1927年出使美国。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委员会主席、广东省政府成员。后来还从事一些党政工作。

**李章达** (1890—1953) ——国民党活动家。1920年奉孙逸仙之命访问了远东共和国。1921至1922年任孙逸仙警卫团团长。1924年为廖仲恺的助手，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部长。1925至1926年任广州市公安局局长。后来在国民党、国民革命军、中国民主同盟、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中历任各种职务。

**李之龙** (1897—1928) ——1925年为加伦的翻译之一、黄埔军校学员、政治部工作人员、广州青年军人联合会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国民政府海军局政治部主任。1926年任国民政府代理海军局局长、“中山舰”舰长。1926年6月起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宣传处处长。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中央人民俱乐部主任、《血花日报》社社长。遭国民党杀害。

**李宗仁**(1891—1969)——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至1927年任广西省督办兼广西陆军第一军军长、国民革命军第七军军长、武汉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利金**, B. B. (原姓: 赫尔扎诺夫斯基)(1895—?)——1921至1922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1923年起从事外交工作。

**利马诺夫**, E. F. (化名: 马卡尔)(?—1938)——1926至1927年任《满洲通报》杂志编辑。1927至1928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连斯贝里**, J. (1859—1940)——1925至1927年任《连斯贝里劳工周报》编辑。

**梁鸿楷**(生卒年不详)——1925年任粤军第四军军长。

**梁启超**(1873—1929)——学者、社会和政治活动家。

**梁士诒**(1869—1933)——1921年12月至1922年1月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1922至1925年侨居日本。1925至1926年任段祺瑞执政府财政善后委员会委员长、交通银行总理。1926至1927年任张作霖政治研讨会会长。1927年任北京政府税务处督办。

**梁赞诺夫**, Л. В. (1870—1938)

——1921至1931年任马恩学院院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廖行超**(1890— )——1923年7月被广州大元帅任命为中央直辖滇军第二师师长、滇军总参谋长。

**廖仲恺**(1877—1925)——国民党活动家。1903年参加革命运动。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历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部长、农民部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广东省省长、广州政府财政部长。后遇刺身亡。

**列昂尼多夫**, 见卡佐夫, Л. В.。

**列格兰**(生卒年不详)——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列梅勒**, G. (1886—1939)——1923年起为德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委员。1924至1933年任德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8至1933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后来从事科研和宣传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列佩申斯基**, П. Н. (1868—1944)——1921至1924年为党史研究所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1925年起任国际革命战士救济会中央委员会主席。

**列普谢**, И. И. (1889—1929)——192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

员、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

**林长民** (1876—1925) —— 1923年为国宪起草委员会委员，参加了上海反直运动。1925年在东北参加了同张作霖军队的战斗，死于战场。

**林德**, Ph. B. (生卒年不详) —— 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

**林虎** (1887—1960) —— 1918年任广东护法军政府陆军部次长。1923年指挥陈炯明部队。1925年被东征军打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委员会委员。

**林肯**, A. (1809—1865) —— 1861至1865年任美国第十六任总统。

**林钦**, E. (1885—1937) —— 1920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和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蒙藏科工作人员。1921至1924年任蒙古政府顾问、蒙古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林森** (1867—1943) —— 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为北京西山会议策划者之一。1928年起在南京政府和国民党中担任领导职务。死于车祸。

**林祖涵** (林伯渠) (1885—1960) —— 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活

动家。1924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民部部长。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军事委员会秘书长。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1928至1932年在苏联学习和从事党的工作。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刘伯坚** (化名: 谢尔斯特斯基) (1895—1935) —— 1920至1923年留学比利时和法国。1923至1926年留学苏联。1926至1927年任冯玉祥国民军联军政治部副主任。1928至1930年留学苏联。后来在中国红军中从事军政工作。遭国民党杀害。

**刘成勋** (1883—1944) —— 四川军阀。1922至1923年任四川省省长兼川军总司令。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三军军长。

**刘成禺** (1876—1953) —— 国民党活动家。1925年为国民党党员同志俱乐部组织者之一。

**刘存厚** (1884—1960) —— 1916年起为四川军阀。1927年投靠蒋介石。1933年引退。

**刘国璋** (化名: 福格尔) (1905—1987) —— 1925至1927年留学苏联。1927年任联共(布)驻中国指导员代表团翻译。1927至1929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处翻译。后来从

事军事和侦察工作。

**刘骥**(1887—1964)——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参谋长。1925至1927年在华北担任军政职务。1927年任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陆军处处长。1927年12月起为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刘江**(化名:费奥多尔、费奥多罗夫)(?—1920)——1920年任俄共(布)阿穆尔州委中国部书记。在越过俄中边界后在中国领土上遭杀害。

**刘铭勋**(生卒年不详)——1925至1927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1927至1930年为工农红军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员。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中从事军事工作。

**刘仁静**(1902—1987)——1921年为代表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代表。1922年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1923年起担任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领导职务。1926年起在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29年因从事托派活动被开除出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出版工作。死于车祸。

**刘荣简**(生卒年不详)——1927年3月为上海临时政府成员。

**刘少奇**(1898—1969)——1921

至1922年留学苏联。1925至1927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副主席。1927至196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31至1945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43至1956年任中共中央书记。1945至196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至1968年任中共中央副主席。1959至1968年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后在“文化大革命”期间遭迫害,死后恢复名誉。

**刘绍周**,见刘泽荣。

**刘守中**(1882—1936)——1909年起为中国同盟会会员。1924年参与冯玉祥发动的北京政变。后在国民党内任职。

**刘郁芬**(1886—1943)——1924至1926年任国民军第一军第二师师长。1926年任甘肃代理督办,驻甘肃国民军总司令。后来历任各种指挥职务。1940年投靠日本。

**刘泽荣**(刘绍周)(1892—1970)——1920年任旅俄华工联合会主席。1920年底回国后从事翻译和外交工作。

**刘震寰**(1890—1972)——1924年起为国民党候补中央监察委员。1924至1925年任广西省省长。1925年5月发动反对广州政府的叛乱。失败后逃亡香港。

**刘镇华**(1883—1952)——1918年起任陕西省省长。1922至1925年

任陕西省督军。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刘佐龙** (1875—1934) ——1924至1926年任湖北第一师第四混成旅旅长。1926年任湖北省省长、武汉卫戍司令。1926年9月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5月参与夏斗寅叛变。1927年底引退。

**柳比莫夫**, M. E. (1882—1937) ——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起为中央委员。1926至1930年任全苏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管委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柳克斯**, 见普利切, O. Ю.。

**隆格瓦**, P. B. (1891—1938) ——1920年任红军波兰第一军军长。1920至1921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侦察局处长。1921至1923年任乌克兰和克里米亚武装力量侦察局局长。1925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书记。1926年任赴华伊万诺夫斯基(布勃诺夫)使团书记。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武官。后来在工农红军中担任指挥职务。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卢果夫斯基**, B. A. (1901—1957) ——1921至1923年任军事学校管理局指导员、政治工作者,军事学校管理总局俱乐部处处长。

**卢金**, H. M. (1885—1940) ——

20、30年代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社会主义学院、红色教授学院任教。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卢卡申**, C. Л. (1887—1937)

——1925至1927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至1928年任南高加索联邦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

**卢那察尔斯基**, A. B. (1875—1933) ——1917年起任苏俄(苏联)教育人民委员。1929年起任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学术委员会主席。1933年任苏联驻西班牙全权代表。

**卢森堡**, 罗莎 (1871—1919)

——德国社会民主运动活动家、德国共产党奠基人之一。

**卢永祥** (1867—1933) ——1919

至1924年任浙江省督军。1925年任江苏省军务督办。1925年8月引退。

**鲁希莫维奇**, M. Л. (1889—1938) ——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7至1930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鲁祖塔克**, Я. Э. (1882—1938)

——1920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3至1926年,1934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至1932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伦普森**, M. (1880—1964) ——

1926至1934年任英国驻华公使。



**罗加乔夫**, B. И. (生卒年不详)——1925至1926年任华南苏联军事顾问团副团长。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助理。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罗兰**, 见布拉戈达托夫, A. B.。

**罗米纳兹**, B. B. (化名: 贝索) (1897—1935) ——1925至1926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6年4月至1926年12月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7至11月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30年被开除出联共(布)。后来从事经济工作。自杀身亡。

**罗森贝格**, M. И. (1896—1939) ——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罗特施泰因**, Ф. А. (1871—1953) ——1920年为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起在苏联从事外交和科研工作。

**罗亦农** (化名: 布哈罗夫) (1902—1928) ——1921至1925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年起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江浙区委书记。1927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共中央组织局局长。遭国民党杀害。

**罗易**, M. (1892—1948) ——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

责工作人员。1927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1928年被开除出印度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

**罗章龙** (1896—1995) ——1923至1925年, 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5至1927年, 1928至1931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25年为中共中央执行局委员。1931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从事教学工作。

**洛博夫**, C. C. (1888—1937) ——1922至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起为中央委员。1930至1934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6至1930年任俄罗斯联邦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和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洛莫夫**, Г. И. (1888—1938) ——1917至1919年, 1925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至1934年为中央委员。1927至1930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洛佐夫斯基**, C. A. (原姓: 德里兹多) (1878—1952) ——1927至1929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9年起为中央委员。1921至192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总书记、共产国

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7年起从事出版和外交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 M

**马伯援** (1884—1939) —— 1914至1937年任中国旅日基督教学生青年会总干事。1924至1925年在冯玉祥军队中任职。

**马超俊** (1885—1977) —— 国民党和国民党工会运动活动家。1924至1927年为国民党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劳工部部长。

**马吉, J.** (1876—1942) —— 1921年起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至1924年和1934至1937年为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1年起为意共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1至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执委会主席团委员。192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中国委员会候补委员。

**马季亚尔, Л. И.** (原姓: 米尔高夫) (1891—1940) —— 1922至1926年为苏联塔斯社工作人员。1929至1934年任共产国际东方书记处副主任。1926至1928年在中国从事外交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马骏** (1895—1928) —— 1919至

1921年为京津学生运动组织者之一，天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组织奠基人之一。1922至1925年为东北地区中共组织领导人之一。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遭国民党杀害。

**马卡尔**, 见利马诺夫, E. Г.。

**马克·梅里, J.** (1881—1960) —— 1925至1929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马克斯**, 见拉菲斯, M. Г.。

**马克西莫夫**, 见穆辛, И. М.。

**马克西莫夫, К. Г.** (1894—1939) —— 1920至1921年任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乌拉尔工业局主席、劳动与国防委员会恢复乌拉尔工业全权代表。后来从事经济工作。

**马拉卡, Г.** (1897—1949) —— 印度尼西亚共产党领导人之一。1922年出席共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3至1924年任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

**马林, Г.** (原姓: 斯内夫利特, X.) (1883—1942) —— 1920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负责工作人员。1921至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1928年被开除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后遭希特勒分子杀害。

**马马耶夫, И. К.** (1894—1937)

——1920至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驻中国代表。1921年6月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朝鲜科俄籍书记,后任中国科书记。1922至1924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工农红军参谋部军事学院东方部从事教学工作。1924至1927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37年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马素**(1883—1931)——1916至1924年任国民党旅美组织领导人。1925年为国民党党员同志俱乐部组织者之一,后被开除出党。1926至1927年任北京政府外交部顾问。1928年引退。

**马祖林**,见阿布拉姆松, M. M.。

**迈斯基**, И. М. (1884—1975) ——1941至1947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20至40年代从事外交工作,后来从事科研工作。

**麦克马努斯**, A. (1889—1927) ——1920年为英国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1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麦克唐纳**, R. (1866—1937) ——1924年和1929至1931年任英国首相。

**曼达良**, Г. Г. (化名:专业工作者、切尔尼亚克) (1901—?) ——1923年起在红色工会国际工作。1926至1927年任红色工会国际驻

中国代表。

**曼努伊尔斯基**, И. З. (1883—1959) ——1923至1952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至1928年为中央主席团委员。1928至194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

**毛泽东**(1893—1976) ——1921年出席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1923至1925年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3至1924年任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1924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7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8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30至1934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政治局常委。1943年起任中共中央主席。

**茅祖权**(生卒年不详) ——国民党活动家。1924至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

**梅尔菲**, J. (1888—1966) ——1921年起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22年起为英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24年为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英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6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和书记处委员。1932年被开除出英国共产党。

**梅津采夫**, 见伏罗希洛夫, К. Е.。

**梅利尼科夫**, Б. Н. (化名: 谢苗诺夫, Б.) (1895—1937) ——1923至1924年任苏联驻哈尔滨领事馆秘书。1925至1928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远东司司长。1928至1929年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1933至1934年任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副局长和外交人民委员部驻远东代表。1935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联络部部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梅利尼昌斯基**, Г. Н. (1886—1937) ——1918年起为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委员、红色工会国际主席团委员。1925至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9年起先后在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国家计划委员会、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部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美国人**, 见多尔森, J.。

**蒙罗**, J. (1758—1831) ——1817至1825年任美国第五任总统。

**米夫**, П. А. (原姓: 福尔图斯, М.) (1901—1939) ——1921至1923年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教员、科研工作人员。1926年任该校副校长。1927至1929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1928年起为中国劳动者共产

主义大学)校长。1928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米高扬**, А. И. (1895—1978)

——1922至1923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76年为中央委员。1926至1935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至1966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

**米哈伊尔**, 见皮亚特尼茨基, И. А.。

**米哈伊洛夫**, 见加拉罕, Л. М.。

**米哈伊洛夫**, В. М. (1894—1937) ——1922至1923年和1930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2年, 1923至1930年为中央委员。1925至1929年任莫斯科市委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米赫尔曼**(生卒年不详) ——1926年任蒙古银行理事会主席、冯玉祥财政顾问。

**米涅尔**, 见斯托扬诺维奇, К. А.。

**米宁**, С. К. (1882—1962) ——1920至1921年为第一骑兵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23年起从事科研工作和党的工作, 任共产主义大学和列宁格勒国立大学校长。

**米诺尔**, 见斯托扬诺维奇, К. А.。

**米诺尔, R.** (化名:东坎)(1884—1953)——1921至1922年为美国劳工党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至1929年为美国共产党中央委员。1941年任美国共产党书记。1926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密勒德, Г.** (1868—1942)——美国新闻记者、出版商。上海出版的《中国新闻》报和《密勒氏评论》周报创始人。

**缅任斯基, B. P.** (1874—1934)——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年起任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6年起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主席。

**缪斌**(1895—1946)——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至1926年为广州孙中山主义学会发起人和领导人之一。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师党代表、第一军副军党代表、国民党江苏省党部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组织部部长。后来从事军事、党务和行政工作。1937年投靠日本。抗战胜利后被逮捕处决。

**莫里**, 见德田球一。

**莫洛托夫, B. M.** (1890—1986)——1920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

央候补委员。1921至1957年为中央委员。1921至1930年任中央书记。1921至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6至1957年为中央政治局(主席团)委员。1930至1941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主席。1939至1949年,1953至1956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外交部长。

**莫斯克文, И. М.** (1890—1937)——1927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局委员。1927至1932年为中央书记处候补委员。1924至1926年任中央西北部部长、书记,党中央部长。1927年任中央组织分配部部长。1930年起在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墨索里尼, B.** (1883—1945)——1922至1943年为意大利法西斯独裁者。

**木兰**(生卒年不详)——1925年10月至1926年4月为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成员。胡汉民的女儿,胡木兰。

**穆拉洛夫, Н. И.** (1877—1937)——1919至1920年先后为几个方面军和集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后来任莫斯科军区和北高加索军区司令。1927年被开除出党。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穆萨别科夫, Г. М.** (1888—1938)

——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至1929年任阿塞拜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人民委员会议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穆辛**, H. M. (原姓: 约赫利, 化名: 马克西莫夫) (1894—1927) ——1920至1922年任外交人民委员契切林的秘书、驻雷瓦尔使团秘书和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工作人员。1922至192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政治顾问和秘书。1925至1927年任塔斯社驻华记者。后自杀身亡。

## N

**拿破仑·波拿巴** (1769—1821) ——1804至1814年和1815年3至6月任法国皇帝。

**纳索诺夫**, H. M. (化名: 查理、小青年) (1902—?) ——1922至1923年为俄国共青团中央远东局委员。1923至1924年任俄国共青团海参崴省委书记。1924至1925年任共青团中央中亚局书记。1925至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7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2至193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黑人部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纳佐夫**, C. A. (原姓: 绍伊热洛夫) (1898—1937(?)) ——1923至1925年在中国西部从事地下工作。1926至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蒙古代表。1927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唐努图瓦代表。后来任《走向社会主义之路》报、蒙古《真理报》编辑。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那彦图** (生卒年不详) ——蒙古王公。

**尼基京**, 见戈列夫, B. E.。

**尼柯尔斯基** (原姓: 贝尔格, 化名: 瓦西里、瓦西里耶夫) (1898—1943) ——1920至1921年为共产国际行政部工作人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驻中国代表。1921至1925年在中国东北从事外交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尼洛夫**, 见萨赫诺夫斯基, Ф.。

**年轻人**, 见福京, H. A.。

**涅恰耶夫** (生卒年不详) ——1925至1926年任张宗昌军队中俄雇佣军司令。

**牛曼**, G. (1902—1937) ——1927至1929年为德国共产党中央候补委员。1929至1932年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委员。1927年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钮惕生**，见**钮永建**。

**钮永建**（**钮惕生**，化名：军人）（1870—1965）——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秘书长。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驻上海代表。1927年任南京政府秘书长、江苏省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诺维茨基**（生卒年不详）——1920至1922年为俄文《上海生活》报编辑委员会委员。

## O

**欧登泰克**，B.（1874—1953）——1919至1931年任荷兰驻华公使。1923年为驻华外交使团首席使节。

## P

**帕夫洛夫**（生卒年不详）——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顾问。

**帕夫洛维奇**，M. П.（原姓：韦尔特曼）（1871—1927）——1921至1923年为民族事务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21年任莫斯科东方学院院长、东方学家协会主席。

**帕洛**，H. П.（1891—？）——1925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后

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派克斯**，A. K.（1873—1958）

——1921至1922年任俄罗斯联邦驻华特命全权代表和使团长。1923年起从事经济工作。

**潘家宸**（化名：克留切斯基）（1904—？）——1923至1925年为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生、教员。1926至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翻译。1927年为联共（布）驻华指导员代表团成员。

**斐迪**，B.（1890—？）——1925至1927年任土耳其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土耳其共产党中央外国部领导人。

**佩京**，H. H.（1876—1937）——1925至1928年任苏联西伯利亚军区司令。后来在工农红军中担任指挥职务。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彭湃**（1896—1929）——1927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7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2年起在广东省领导农民运动。1923年在海丰县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1925年任中共广东省委农民委员会书记、国民党广东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农民部部长。1926年为广东省农民协会常

委、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委员兼秘书长。后来从事党的工作。遭国民党杀害。

**彭述之**(化名:彼得罗夫)(1895—1983)——1920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至1924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5至1927年为中共中央执行局委员。1921至1924年留学苏联。1924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1925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1927年为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1928年被清除出中共中央。1929年被开除出党。后来从事托派活动。

**皮达可夫**, Г. Л. (1890—1937)——1923至1927年, 1930至1936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0年起任俄罗斯联邦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席、租让企业总委员会主席。1923年起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副主席。1927年起从事外交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皮亚特尼茨基**, Н. А. (1882—1938)——1920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至1927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为中央委员。1921至1935年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1923年

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片山潜**(1859—1933)——日本共产党创始人之一。192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

**朴爰**, М. А. (1896—?)——1919至1920年任朝鲜社会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0至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远东局朝鲜科科长。1923年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全朝鲜民族代表大会。1923年起在滨海地区从事党的工作。

**朴镇淳**, (1898—?)——1917至1918年为朝鲜社会党组织者之一。1919至1920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外交人民委员部工作人员。1920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二次代表大会。1921至1922年任朝鲜共产党中央书记。1922至1925年在莫斯科大学学习。1925至1926年在中国东北工作。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情报部朝鲜问题顾问。后来从事出版和科研工作。

**普拉格尔**, П. А. (1901—?)——米夫的妻子。1925至1927年, 1929至1930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任教。

**普里戈任**, А. Г. (1896—?)——1926至1927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教员。



**普里马科夫, B. M.** (化名: 林) (1897—1937) —— 1925 至 1926 年任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1927 至 1930 任苏联驻阿富汗和日本大使馆武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普利切, O. Ю.** (化名: 柳克斯) (生卒年不详) —— 1926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汉口总领事。

**普罗列塔里耶夫**, 见卜道明。

**普特纳, B. K.** (1893—1937) —— 内战期间历任红军团政委、团长、师长。1920 至 1930 年从事军事指挥和军事外交工作。1925 年 4 至 7 月任苏联驻华北军事顾问组组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 Q

**齐燮元** (1885—1946) —— 1920 至 1924 年任江苏省督军。抗日战争时期在汪精卫傀儡政府中担任高级职务。后因同日本人串通一气被判处死刑。

**契切林, Г. В.** (化名: 瓦西里耶, M.) (1872—1936) —— 1925 至 1930 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18 至 1930 年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1925 至 1928 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

**乔治, 亨利** (1839—1897) —— 美国经济学家。

**切尔内赫, A. C.** (1892—1941) —— 1926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临时代办。后来从事外交工作。

**切尔尼亚克**, 见曼达良, T. Г.。

**切列潘诺夫, A. И.** (1895—1984) —— 1923 至 1927 年任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和苏军中任职。

**切丘林, С.** (生卒年不详) —— 1925 年曾任俄共(布)中央政治局值班秘书。

**琴布罗夫斯基, A. И.** (1896—?) —— 1925 年在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处执行特殊任务。

**覃理鸣**, 见覃振。

**覃振(覃理鸣)** (1885—1947) —— 国民党活动家。1924 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 年参加了北京西山会议。1927 年起历任一些政府领导职务。

**琼森**, 见罗易, M. H.。

**琼森, 查尔斯** (原姓: 扬松, K. Э.) (1882—1939) —— 1923 年起任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1924 年任红色工会国际联络部部长。1925 至 1927 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出版新闻部顾问、红色工会国际驻中国代表。后担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总书记、红色工会国际东方殖民地部部长、国际列宁学校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研究所教员

等职。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丘巴尔**, В. Я. (1891—1939)

——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35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5年起为政治局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丘茨卡耶夫**, С. Е. (1876—1944

(46)) ——1927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3至1927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党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7至1929年任远东边区执行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丘多夫**, М. С. (1893—1937)

——1923至1924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5至1937年为中央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丘古诺夫**，见周达文。

**霍鲁巴**, А. Д. (1870—1928)

——1923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起任人民委员会议和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22至1923年任苏联工农检查人民委员。1923至1925年任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主席。后来从事经济工作。

**瞿秋白**(化名:斯特拉霍夫)(1899—1935) ——1920至1922年任《晨报》驻俄罗斯联邦记者。1923年起任中共中央铅印机关刊物《新青年》和《前锋》主编。1925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31年为中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至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1928至1930年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委员和政治书记处成员、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1931至1935年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遭国民党杀害。

**犬养毅**(1855—1932) ——同情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著名日本政治活动家。1931至1932年任首相。遇刺身亡。

## R

**任弼时**(1904—1950) ——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委员。1921至1924年留学苏联。1925至1928年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组织部部长。1926至1928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书记。后来担任党的职务。

**任卓宣**(化名:叶青、拉法伊尔)(1896—1990) ——1920至1925年留学法国。1925至1926年留学苏联。1926至1927年先后任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部长、中共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被捕后退出中国共产党。后在国民党中从事宣传工作。

**日本人**，见虞洽卿。

**日丹诺夫, A. A. (1869—1948)**  
——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 1930年起为中央委员。1934年起为组织局委员。1935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39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年起先后任下格罗德省委书记、高尔基边区委书记。1934至1948年任中央书记。1934至1944年任列宁格勒州委和市委书记。

**茹可夫, И. П. (1889—1937)**  
——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5至1928年任列宁格勒电力托拉斯主席。后来从事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芮恩施, P. (1869—1923)** ——  
1913至1919年任美国驻华公使。1919年起任北京政府顾问。

## S

**萨发罗夫, Г. И. (1891—1936)**  
——1921至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部长。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一等秘书。1929至1934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副主任。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萨夫拉索夫(生卒年不详)** ——  
1926年任中东铁路管理委员会副主

席。

**萨戈莫尼扬(生卒年不详)** ——  
1927年为苏联驻华指导员代表团成员。

**萨哈罗夫(生卒年不详)** ——  
1925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促进会会员。

**萨赫诺夫斯基, P. H. (1898—?)** ——  
1924至1926年任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萨宗诺夫, С. Д. (1860—1927)**  
——1918至1919年为高尔察克和邓尼金政府成员。

**塞格尔, 见弗赖耶尔, B. C.。**

**塞姆, 见斯列帕克, С. И.。**

**塞博特, А. Я. (化名: 格兰特) (1894—?)** ——  
1921年4月起任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野战参谋部注册局代局长, 后来任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局长和军事指挥官。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哈尔滨总领事。

**桑古尔斯基, M. B. (1894—1937)**  
——1926至1927年任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瑟尔佐夫, С. И. (1893—1937)**  
——1924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至1930年为中央委员。1929至1939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遭非法

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沙茨金**, Л. А. (1902—1937)

——1927至1930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8至1922年,1926至1928年为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全苏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1920至1922年任俄罗斯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1919至1921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机关工作人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沙赫**，见加拉罕，Л. М。

**沙因曼**, А. Л. (生卒年不详)

——1926至1927年任苏联国家银行理事会主席。

**山川均**(1880—1958)——日本社会主义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1928年退出日本共产党。

**邵力子**(1882—1967)——国共两党活动家。1921至1926年为中共党员。1926年根据党中央决定退出中国共产党。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8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6年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长。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驻苏联代表。这期间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后来还担任一些党的工作和外交工作。1949年后担任一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职务。

**邵元冲**(1888—1936)——1923至1924年任国民党驻欧洲代表。1923年为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成员。1924至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年参加了北京西山会议。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青年部部长。1927年任杭州市市长、浙江省政府成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领导工作。西安事变时为乱兵枪杀。

**舍瓦尔金**, Н. А. (生卒年不详)

——1925至1926年任驻华军事顾问。

**沈定一**，见沈玄庐。

**沈鸿英**(1871—1938)——广西军阀。1921至1923年进行了争夺广东省的战争。1923年被孙逸仙军队打败。1925年被军阀白崇禧驱逐出广西。

**沈玄庐**(沈定一)(1892—1928)

——1920至1921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星期评论》周刊主编。1923年为国民党访问苏联代表团成员。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5年被开除出党。参加了北京西山会议。后遇刺身亡。

**施密特**, В. В. (1886—1940)

——1919至1925年,1930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8至1919年,1925至

1930年为中央委员。1918年起任劳动人民委员、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施泰因**, B. M. (化名:阿尔斯基, M.) (1890—1964) ——1926至1927年任中国国民政府财政顾问。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遭非法迫害,后恢复名誉。

**施蒂纳**, A. (1898—1973) ——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施瓦茨**, И. И. (1879—1951) ——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1年起从事工会工作。1930年起从事经济工作。

**石青阳** (1879—1935) ——1922年起在川军中担任一些指挥职务。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在中国西部担任政府工作。

**石瑛** (1879—1943) ——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参加了北京西山会议。后来担任一些政府领导职务。

**什基里亚托夫**, M. Ф. (1883—1954) ——1923至1934年为俄共(布) [联共(布)] 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30年起任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会书记。

**什麦拉里**, B. (1880—1941)

——1921至1929年和1936年后为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委员。1922至193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

**什维尔尼克**, H. M. (1888—1970) ——1923年起为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为中央委员。1926至1927年, 1930至1946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39年起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52至1953年, 1957年后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委员。1925至1927年任列宁格勒州委书记。1927至1928年任乌拉尔州委书记。

**舒宾**, П. A. (原姓: 维连斯基) (1878—1937) ——1925至193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工作人员。1936至1937年任季米特洛夫政治助理。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舒尔曼**, J. (1854—1942) ——1921至1925年任美国驻华公使。

**舒米亚茨基**, B. З. (1886—1938) ——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远东全权代表。1922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26至1928年任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校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斯达尔克**, Г. K. (1878—1950) ——1921至1924年任西伯利亚舰队司令。

**斯大林**, И. В. (原姓: 朱加什维利) (1875—1953) —— 1921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2年起任党中央总书记。1920至192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委员。

**斯捷潘诺夫**, В. А. (1886—1936) —— 1925至1926年任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斯捷潘诺夫—斯克沃尔佐夫**, 见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И. И.。

**斯卡洛夫**, Г. В. (化名: 西纳尼) (1896—1935(?)) —— 1922至1923年任莫斯科东方学院院长。1923至1924年任第五维捷布步兵师师长、土耳其斯坦方面军政治部主任。1925至1927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27至1928年为伏龙芝军事学院东方系学员。后来先后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机关、苏联科学院世界经济与世界政治研究所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斯克雷普尼克**, Н. А. (1872—1933) —— 1917年, 1923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为中央委员。

**斯克良斯基**, Э. М. (1892—1925) —— 1918至1924年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

**斯克沃尔佐夫—斯捷潘诺夫**, И. И. (1870—1928) —— 1921年起

为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起为中央委员。1925年起历任《消息报》编辑、《真理报》副编辑、《列宁格勒真理报》编辑。

**斯列帕克**, С. И. (化名: 塞姆) (1892—?) —— 1921年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情报部主任。1922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1923年任俄罗斯通讯社驻华记者。后来从事新闻工作。

**斯米尔加**, И. Т. (1892—1938) —— 1920至1925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17至1920年, 1925至1927年为中央委员。1927年起从事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斯米尔诺夫**, А. П. (1877—1938) —— 1922至1933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至1930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1923年起历任农民国际书记、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会议副主席、党中央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斯米尔诺夫**, И. Н. (1881—1936) —— 1919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委员、西伯利亚革命委员会主席。后来从事党的工作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斯莫利亚尼诺夫**, В. А. (1890—1962) —— 1921年起先后任俄罗斯

联邦劳动与国防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人民委员会议办公室主任。1924年起从事经济工作。

**斯莫连采夫, П. И. (1896—?)**

——1923至1924年任驻华军事顾问。1925至1928年在工农红军参谋部侦察局工作。

**斯蓬德, А. П. (1892—1962)**

——1926至1936年先后为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交通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

**斯皮尔瓦涅克, И. И. (生卒年不详)**

——1927至1928年任苏联驻北京代理领事。

**斯藤, Я. Э. (1899—1938)**

——1924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宣传鼓动部部长。1927至1928年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1928年起从事科研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斯托雷平, П. А. (1862—1911)**

——1906年起任俄国内政部部长和部长会议主席。

**斯托莫尼亚科夫, Б. С. (1882—**

1941) ——1921至1925年任俄罗斯联邦(从1923年起为苏联)驻德国商务代表。同时在1924至1925年间兼任苏联副外贸人民委员。1923至1926年为苏联外贸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1926至1934年为苏联外交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

员。1934至1938年任苏联副外交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斯托扬诺维奇, К. А. (原姓:米**

亚钦,化名:米涅尔、米诺尔、雅科夫列夫)(1886—1938) ——1917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委员。1920至1927年历任俄罗斯通讯社和塔斯社驻广州记者、苏联驻上海各外贸机构工作人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斯图尔特, R. (1877—1973)**

——1920年起为英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2至1929年,1935至1936年为中央委员。1925至1926年任英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1923年起任英国共产党驻共产国际代表。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宋教仁(1882—1913)** ——中国同盟会领导人之一。辛亥革命的积极参加者。1912年为国民党的组织者和领导人之一。被袁世凯下令杀害。

**宋庆龄(1891—1981)** ——国民党活动家。1915年与孙逸仙结婚。1949年起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领导职务。

**宋子文(1894—1971)** ——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至1926年任广州国民政府

财政部部长。1928年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后来还担任一些政府职务。

**苏利莫夫, Д. Е.** (1890—1937) ——1923至1930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7至1930年为中央组织局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苏兆征**(1885—1929) ——1927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2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28至1929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5至1926年省港大罢工时任罢工委员会委员长。1925至1928年任中华全国总工会执行委员会委员, 1926至1928年为执行委员会主席。1927年任武汉政府劳工部部长。1928年参加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和红色工会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1928至1929年为共产国际和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孙传芳**(1885—1935) ——1923至1924年任福建省督军。到1925年部分或全部地控制了浙江、福建、江苏、安徽和江西省。1926至1927年被国民革命军部队打败。1929年引退。后遇刺身亡。

**孙丹林**(生卒年不详) ——1922年任北京政府内务部总长。

**孙洪伊**(1870—1936) ——1916年任中华民国教育总长, 后任内务总长。1920年任广州军政府顾问。

**孙科**(1891—1973) ——孙中山之子。国民党活动家。1923年起为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和政治委员会委员。后来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孙逸仙**(孙中山、孙文)(1866—1925) ——中国同盟会、中国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创始人和领导人, 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1917年, 1920至1922年和1923至1925年为广州政府首脑。

**孙岳**(1878—1928) ——1924年起任国民军第三军军长。

**索尔茨, А. А.** (1872—1945) ——1920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3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共产国际国际监察委员会委员。

**索柯里尼柯夫, Г. Я.** (原姓: 布里利安特)(1888—1939) ——1917至1919年, 1922至1930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30至1936年为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9年任苏联财政人民委员部部务委员会委员、副人民委员、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索科洛夫—斯特拉霍夫, К. Н.**



(1896—1937(?))——1919至1921年(断续)在中国从事地下工作。1921年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部书记。后来从事军事外交工作。

**索洛维约夫**, В. И. (原姓:赖特, В.) (生卒年不详)——1926至1928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副部长。

## T

**塔尔贝格**, Д. И. (1900—?)——1925至1927年为在华空中观察员。后来在工农红军空军中任职。

**塔尔哈诺夫**, О. С. (拉祖莫夫, С. И., 化名:塔宁, О.、塔乌别, О.、艾尔贝格, О.、杨祖来) (1901—1944)——1925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政治顾问。后来从事科研工作和在工农红军中任职。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塔拉索夫**, 见维经斯基, Г. И.。

**塔罗**(生卒年不详)——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日本科工作人员。

**塔伊罗夫**, Р. А. (化名:捷尔、捷鲁尼) (生卒年不详)——1925至1927年任华南苏联军事顾问团参谋部政委、负责政治工作的副团长。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太洪**(1897—?)——1920年为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

处工作人员。1921至1922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远东书记处成员。1922至1923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1924至1927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

**谭平山**(1886—1956)——1923至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1924至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1926年出席了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七次全会。1927年任武汉政府农民部部长。1927年秋退出中国共产党。1948年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创始人之一。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谭延闿**(1880—1930)——1924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长。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武汉政府代理主席。1928至1930年任国民政府主席。

**谭植棠**(?—1952)——1921至1926年为中共广东省组织领导人之一。1926年底不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1944年恢复党籍,在华南完成许

多重要任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从事经济领导工作。

**唐继尧** (1883—1927) —— 1911至1920年, 1922至1927年任云南省督军。1927年引退。

**唐绍仪** (1861—1938) —— 1912年任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北南斗争参加者, 站在南方人一边。1920年引退。因拒绝领导傀儡政府被日本人杀害。

**唐生智** (1889—1970) —— 国民革命军第八军军长。湖南省省长、省政府主席。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国民革命军第四方面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和行政职务。

**唐悦良** (1890—?) —— 1925至1926年任冯玉祥的国民军第一军参谋部外交全权代表。后来担任外交职务。

**陶里亚蒂, P.** (化名: 艾尔科里) (1893—1964) —— 1922年起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23年起为意大利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起任意大利共产党总书记。1924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主席团委员。1926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处成员。

**特里福诺夫, B. A.** (1888—1938) —— 1923至1925年任苏联最高法

院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助理。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特里利塞尔, M. A.** (化名: 莫斯克文) (1883—1940) —— 1921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远东部部长。1921年起在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工作。1926至1929年任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外国处处长。1935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田维勤** (?—1927) —— 1925年任国民军第二军第三混成旅旅长。1925年底投靠吴佩孚。1926年任吴佩孚部第二十师师长。1927年任张作霖部第二十七军军长。后被冯玉祥处决。

**田中义一** (1863—1929) —— 1918至1921年, 1923至1924年任日本陆军大臣。1927至1929年历任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和殖民地大臣。

**托夫斯图哈, И. П.** (1889—1935) —— 1934年起为联共(布)候补党员。1921至1924年, 1926至1930年为党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托洛茨基, Л. Д.** (原姓: 布龙施泰因) (1879—1940) —— 1917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19至1926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至1924年任陆海军人

民委员、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25至1926年为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17至1927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9年被驱逐出苏联。后来遇刺身亡。

**托洛孔采夫**, A. Ф. (1889—1937) ——1925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托姆斯基**, M. П. (1880—1936) ——1919至1934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2至1930年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18至1929年任全俄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后自杀身亡。

**图赛褒达瓦**(生卒年不详) ——1922至1924年任蒙古驻苏联大使。

## W

**瓦格纳**, Я. Д. (1900—?) ——1920至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驻中国使团秘书。1922至1925年为红军政治工作人员。1925至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书记处)责任书记。

**瓦列伊斯基**, И. М. (1894—1939) ——1923年起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1924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

誉。

**瓦西里**, 见尼科尔斯基, B. A.。

**瓦西里耶夫**, 见尼科尔斯基, B. A.。

**瓦西里耶夫**, 见契切林, Г. B.。

**瓦西里耶夫**, A. H. (1878—?) ——1924至1925年任苏联驻蒙古人民共和国全权代表。1926年起在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机关工作和从事外交工作。

**瓦西里耶夫**, B. A. (1889—?) ——1925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政治书记。1926年任东方部副部长。1929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部长。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瓦西里耶夫斯基**, B. H. (生卒年不详) ——1926至1927年任联共(布)中央出版部副部长。

**汪精卫**(汪兆铭)(1883—1944) ——1904年参加革命运动。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任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军事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委员会主席。1926年3月离开中国。1927年4月起任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 后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1938年投靠日本, 领导傀儡政府。

**汪寿华**(化名: 何今亮、何松林)(1901—1927) ——1920至1925

年在苏联学习和工作。1925至1927年任中共上海区委工农部部长、工会委员会书记、上海总工会委员长。1927年3月为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领导人之一。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政变时遭杀害。

**王柏龄**（王茂如）（1889—1942）——1924至1926年先后任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筹备委员会委员、入学试验委员、教授部主任，孙中山主义学会组织者之一。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师师长、第一军副军长。后来从事军事教学、行政工作和党的工作。

**王承伟**（生卒年不详）——1927年3月为上海临时政府成员。

**王宠惠**（1881—1958）——1921至1922年，1924年任北京政府司法总长。1922年任国务总理。1927年任南京政府司法部部长。后从事外交和国务工作。

**王登云**（1897—1977）——1922至1925年为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成员。1925至1926年在黄埔军校工作。

**王荷波**（1882—1927）——1923至1925年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年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五次代表大会代表，1925年任中华全国铁路总工会委员长。1925至1927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

年5月起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被奉系军阀杀害。

**王茂如**，见王柏龄。

**王若飞**（1896—1946）——1922至1925年先后留学法国和苏联。1925年任中共河南、陕西省委书记。1926年任中共上海区委书记。1927年任中共江苏省委书记。1928至1931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后从事党的工作。死于空难。

**王晓籁**（1886—1967）——1927年3月为上海临时政府成员、市商业金融界代表。后从事行政、经济和财政工作。

**王一飞**（1899—1928）——1921至1925年留学苏联。1925年起先后任中共江苏、浙江省委书记、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书记、中共湖南省委书记。遭国民党杀害。

**王正廷**（1882—1961）——1917年，1922至1925年任孙逸仙政府外交总长。1927年任陇海铁路督办。1928至1931年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部长兼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委员，后从事外交和国务工作。

**韦杰尔尼科夫**（生卒年不详）——1926至1927年先后为苏联驻北京大使馆和驻汉口总领事工作人员。

**维尔德**，C. J.（1892—1967）

——1918至1921年任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哈尔滨办事处助理会计。1921年3至9月任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办公室主任。1921年9月至1924年3月任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上海办事处主任会计。1924至1927年任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副领事。1927至1928年为苏联驻汉口外交代表处工作人员。

**维经斯基**, Г. Н. (原姓: 扎尔欣, 化名: 格里高里耶夫、格里高里、塔拉索夫), (1893—1953) ——1920至1921年任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外国处和俄共(布)中央西伯利亚局东方民族处驻中国代表、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主席团委员。1922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处处长。1923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部远东局局长, 1924至1927年几次担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中国代表。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驻上海远东局主席。1927至1929年从事经济工作。1932至1934年任红色工会国际太平洋书记处书记。1934年起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 В. Д. (1888—1942) ——1920年任俄罗斯联邦驻远东全权代表、工农红军总参谋部学院政治委员。1921年参加了同日本在大连的谈判。

1922年为俄罗斯联邦驻中国外交使团成员。1922年秋天起从事新闻工作。1927年被开除出联共(布)。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维纳格拉多娃**, О. (生卒年不详) ——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魏益三** (1884—?) ——1924年任满洲张作霖第二炮兵旅旅长。1925年任郭松龄之东北国民军参谋长。1926年投靠吴佩孚, 任十四省讨贼联军第四军总司令。1927年转到国民革命军方面, 任第三十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温格尔**, О. И. (1893—1938) ——1921至1924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4至1925年在共产主义学院学习。1925至1926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组织部顾问。后来在德国从事党的工作和在苏联从事出版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温格恩**, 见温琴。

**温琴** (温格恩·冯·施特尔贝格, Р. Ф.) (1886—1921) ——外贝加尔地区反苏维埃运动领导人之一。后被革命法庭判处死刑。

**温施利赫特**, И. С. (1879—1938) ——1925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3年历任全俄肃反委员会、国家政治保安局副局长、苏联

内务人民委员。1923至1930年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苏联副陆海军人民委员。1925至1926年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文学家**, 见瞿秋白。

**沃林**, 见别林尼基, C. H.。

**沃罗夫斯基**, 见黄平。

**沃罗夫斯基**, B. B. (1871—1923) ——1917年11月起任俄罗斯联邦驻斯堪的那维亚国家代表。1921至1923年任驻意大利全权代表。后遇刺身亡。

**沃罗宁**, H. M. (1885—?) ——1925年任华北苏联军事顾问组组长。

**沃兹涅先斯基**, A. H. (生卒年不详) ——1918至1920年任俄罗斯联邦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1925至1927年为“不许干涉中国”协会主席团委员。1925至1926年为农民国际主席团委员。

**乌博烈维奇**, И. П. (1896—1937) ——1930至1937年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2年任远东共和国军事部长兼人民革命军总司令。1925年起历任一些军区的司令员。1926年起为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0至1931年任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31至1937年任白俄罗斯军区司令。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

名誉。

**乌格拉诺夫**, H. A. (1886—1940) ——1923至1930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1926至1929年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书记。1921至1928年历任一些省委书记。1928年起从事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乌拉尔斯基**, 见布留赫尔, B. K.。

**乌里扬诺娃**, M. И. (1878—1937) ——列宁的姐姐。1925至1934年为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17至1929年为《真理报》编辑委员会委员、责任书记。后来担任苏维埃和党的工作。

**乌斯曼诺夫**, И. X. (1898—?) ——1926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军事顾问。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乌斯特里亚洛夫**, H. B. (1890—1938) ——政治活动家、政论家。1920年起旅居国外(哈尔滨)。1935年返回苏联。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吴佩孚** (1874—1939) ——直系军阀首领。1926年被国民革命军打败。后来可能被日本人毒死。

**吴铁城** (1888—1953) ——1917年任广东大元帅府参议。1926至1929年为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候补委员。1923至1926年任广州公安局局

长兼警务处处长。1926年3至10月被蒋介石逮捕。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吴兆高**(音)(化名:彼得拉舍夫斯基)(1899—?)——1926至1927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东方书记处情报部顾问。

**武约维奇**, В. Д. (1897—1936)——1921至1927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青年共产国际书记、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和主席团委员。1927年被开除出联共(布)。1930年恢复党籍,任国防农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1931至1935年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巴尔干地区书记处顾问。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伍朝枢**(1887—1934)——1918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次长。1923年任广东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秘书、广州市市长。1926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南京政府外交部长。后历任政府领导职务。

**伍廷芳**(1842—1922)——1917年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外交部总长。1921年任广东军政府外交部部长兼财政部部长。1922年任广东省省长。

**吴稚晖**(1865—1933)——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

员。1925年参加了西山会议。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 X

**西比里亚科夫**, 见维连斯基—西比里亚科夫, В. Д. .

**西纳尼**, 见斯卡洛夫, Г. Б. .

**西尼扬科**, Л. (生卒年不详)——1926年为联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希夫**, Ф. П. (1899—?)——1926年4月起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出版部翻译。1929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编辑出版部工作人员。

**希塔罗夫**, Р. М. (1900—1939)——1920年起任俄罗斯共产主义青年团驻共产国际代表。1927年任青年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1928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候补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夏超**(1882—1926)——1924至1926年任浙江省省长。1926年10月公开反对孙传芳,宣布浙江省独立。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军军长。后被孙传芳杀害。

**夏斗寅**(1884—1951)——1926年任鄂军第一师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独立师师长。1927

年5月发动反武汉政府叛乱。后来历任军事、行政和党的职务。

**向警予** (1895—1928) —— 1919至1921年留学法国。1922年起为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妇女部部长。1925至1927年在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6年为中共参加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全会代表团成员。遭国民党杀害。

**萧三** (原名萧子暲) (1896—1983) —— 1920至1923年留学法国。1923至1924年留学苏联。1925年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北方区委员会书记。1926年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并代理书记。1927年历任中共上海区委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常务委员会委员、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部长。后来从事文学工作。

**萧耀南** (1875—1926) —— 1921至1926年任湖北省督军。

**小青年**, 见纳索诺夫, H. M.。

**谢持** (1876—1939) —— 国民党活动家。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为国民党西山会议策划者之一。后来在国民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

**谢尔盖**, 见维经斯基, Г. H.。

**谢尔盖耶夫**, B. И. (1903—?) —— 1925至1927年任驻华军事飞行教练组组长。后来在工农红军空军中任职。

**谢尔林娜** (生卒年不详) —— 俄共(布)中央机关工作人员。

**谢尔斯廷斯基**, 见刘伯坚。

**谢福林**, 见拉宾, A. Я.。

**谢列布里亚科夫**, B. И. (原姓: 基姆) (1905—?) —— 1920至1926年(断续)在上海做地下工作。1926至1933年在远东国立大学学习和任教。1933年起从事科研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谢列布里亚科夫**, Л. П. (1890—1937) —— 1919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委员、中央组织部委员。1920至1921年任中央书记。1922年起任副交通人民委员。1924至1931年任中东铁路管理委员会副主席。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谢列布罗夫斯基**, A. П. (1884—1938) —— 1926年起任金矿开采工业总局局长, 同时从1931年起兼任副重工业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谢廖金**, 见维经斯基, Г. H.。

**谢马尔**, P. (1887—1939) —— 1924年起为法国共产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1924至1930年任法国共产党总书记。1924至1925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39年遭法西斯杀害。

**谢马温**, K. (1899—1971) —— 1924至1927年任印度尼西亚共产



党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代表。1924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至1928年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4至1928年为红色工会国际执行局委员。

**谢米切夫** (生卒年不详) —— 1920年任上海《太阳》杂志编辑。

**谢苗诺夫** (生卒年不详) —— 1926年任共产国际驻上海远东局顾问。

**谢苗诺夫**, Г. И. (化名: 安德烈) (生卒年不详) —— 1927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后来从事侦察工作。1937年遭非法镇压, 后恢复名誉。

**谢苗诺夫**, Г. М. (1896—1946) —— 1919至1921年为外贝加尔反苏维埃运动的领导人之一。1921年起旅居中国。1945年在中国东北被苏军抓获。后被苏联最高法院判处死刑。

**欣丘克**, Л. М. (1868—1944) —— 1921年起任全俄消费合作社中央联社主席。1926年起从事外交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辛普森**, L. (1877—1930) —— 英国新闻记者。1916年起任黎元洪总统顾问。1922至1925年任张作霖顾问。后遇刺身亡。

**熊克武** (1885—1970) —— 1918至1919年任四川省督军。1920至1921年任四川省省长。1923年, 1925年任川军司令。1924至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引退。

**徐福** (1882—1958) —— 1926至1927年任广东省东江各属行政委员。后来从事行政、财政工作。

**徐谦** (徐季龙、乔治·徐) (1872—1940) —— 1916至1917年任中国民国司法部副部长。1920年任广州政府司法部部长。1921至1922年任广州最高法院院长。1924年起任国民党北京市党部领导人。1925年任冯玉祥国民党第一军政治部主任。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12月至1927年3月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武汉国民政府联席会议主席。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武汉政府司法部部长。1927年秋不再积极从事政治活动。

**徐世昌** (1855—1939) —— 1918至1922年任中华民国总统。

**徐树铮** (1880—1925) —— 1918年为安福系军阀首领之一。被冯玉祥下令杀害。

**徐玮** (1903—1928) —— 1927年为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

共青团上海市委书记、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领导人之一、中共浙江省委委员、共青团浙江省委书记。遭国民党杀害。

**许崇智** (1887—1965) —— 1921至1922年任广州政府武装力量第二军军长。1922至1923年任广东省武装力量总司令。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候补委员、国民党中央军事部部长。1925年任国民政府军事部长、广东省政府主席。1925年8月因与蒋介石发生意见分歧离开广州。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许克祥** (1890—1967) —— 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第三十三团团团长。1927年5月为长沙军事政变领导人。后来从事军事工作。

**许勒尔, R.** (1901—1957) —— 1921至1928年任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书记。1922年起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8至1933年为奥地利共产党中央委员。1929至1933年为政治局委员。

**薛岳** (1896—?) —— 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副军长。后来担任军政职务。

**学者**, 见顾孟余。

## Y

**亚戈达, Г. Г.** (1891—1938)

—— 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0年为全俄肃反委员会主席团委员。1924年任苏联人民委员会会议国家政治保安总局副局长。1925至1926年为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委员。1935年任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1936至1937年任苏联邮电人民委员。遭镇压。

**亚基尔, И. Э.** (1896—1937)

—— 1934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委员。1924至1925年任军事学校管理总局局长。1925至1937年历任一些军区的司令员。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亚沃尔斯基**, 见温施利赫特, И. С.。

**雅布丹增** (1875—1932) ——

1922至1923年任蒙古人民党中央委员会副主席。1923至1924年任主席。1924至1925年任蒙古人民共和国驻苏联全权代表。后从事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 死于审讯期间。

**雅罗斯拉夫斯基, E. M.** (1878—1943) —— 1919至1921年为俄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1至1922年, 1939至1943年为中央委员。1921年任中央书记。1923至1934

年为中央监察委员会主席团委员、书记。1934至1939年任党中央党的监察委员会委员。

**阎锡山**(1883—1960)——1916至1949年任山西省省长。

**颜惠庆**(1877—1950)——1912至1926年(断续)任中华民国外交总长、内务总长。1926年任中华民国国务总理。后来从事外交和国务工作。

**扬松**, H. M. (1882—1938)  
——1923年任俄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秘书。1927至1930年任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党委会委员。1925至1928年任苏联副工农检查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扬松**, Я. Д. (1886—1939)  
——1920年任外交人民委员部东方司司长。1921至1922年为俄共(布)中央远东局委员、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杨明斋**(1882—1938)——1917年以前在海参崴东方学院任中文教员。1919年返回中国。1920至1921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1921年为中共出席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代表团成员。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工作。1927至1930年在华北从事党的工作。后来在苏

联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杨森**(1884—1977)——1924至1925年任四川省省长。1926年任四川省督军。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军军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杨希闵**(1886—1967)——1922年任滇军总司令。1923年任粤赣湘边防督办。1926年与刘震寰发动反对孙逸仙的叛乱。被国民革命军部队打败。

**杨杏佛**(1893—1933)——1924至1925年任孙逸仙的秘书。1926至1927年为国民党上海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1927年为上海临时政府成员。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姚作宾**(生卒年不详)——1920年任中华全国学生联合会驻海参崴代表。

**叶楚伦**(1887—1946)——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16至1926年任《民国日报》主编。1925年参加了国民党右派举行的西山会议。1926年任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1926至1927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武汉国民政府临时联席会议秘书长。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

会政治委员会上海临时政治分会政务委员会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工人部代部长。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叶夫多基莫夫**, E. Г. (1884—1937(?)) ——1919至1927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叶夫列莫夫**, M. Г. (化名:阿布诺尔德)(1897—1942) ——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顾问、苏联驻广州军事顾问组组长。后来在工农红军中任职。在战斗中牺牲。

**叶戈罗夫**, A. И. (1883—1939) ——1934至1938年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24至1925年为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处工作人员。1925至1926年任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后来担任苏联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军事工业总局副局长、工农红军参谋长、副国防人民委员。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叶恭绰**(1880—1965) ——1912至1926年(断续)任交通总长。

**叶姆萨诺夫**, A. И. (1891—1940) ——1920至1921年任交通人民委员。1926至1931年任中东铁路管理局局长、管委会副主席。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叶挺**(1896—1946) ——1924至

1925年在苏联留学。1925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独立团团团长。1926至1927年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副师长。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师长、武昌卫戍司令。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的组织者之一。1928至1932年旅居欧洲。1937至1941年任国民革命军新四军军长。1941至1946年被监禁。死于空难。

**叶俊中**(音)(化名:尤尔托夫)(1903—?) ——1925至1927年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学生、研究生、翻译。1927年为联共(布)驻中国指导员代表团成员。

**伊克拉莫夫**, A. И. (1898—1938) ——1925年起为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中央委员。1925年起任乌兹别克斯坦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9年起任中央第一书记、党中央中亚局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伊万诺夫**, A. И. (1878—?) ——俄国和苏维埃汉学家。1922至1927年任苏联驻华全权代表处秘书、参赞。后从事科研教学工作。

**伊万诺夫**, A. H. (生卒年不详) ——1924至1926年任中东铁路管理局苏方第一任局长。

**伊万诺夫**, B. И. (1893—1938) ——1924年起为俄共(布)[联共(布)]中央候补委员。1934年起为中

央委员。1924年起任乌兹别克共产党(布)中央书记。1927至1936年任党的北高加索边区委员会书记。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伊万诺夫斯基**, 见布勃诺夫, A. C.。

**伊文**, A. A. (原姓:伊万诺夫)(1885—1942)——1917年起为俄国驻北京外交使团工作人员。十月革命后转到苏维埃政权方面,为《北京报》工作人员、北京大学教授。1927至1930年任《真理报》驻中国记者。后来从事新闻和科研教学工作。

**银行家**, 见鲍罗廷, M. M.。

**印度人**, 见弗雷耶夫, B. C.。

**英国人**, 见鲍罗廷, M. M.。

**优林**, И. Л. (原姓:金托夫—泽瓦尔托夫斯基)(生卒年不详)——1920至1921年任远东共和国驻华使团团团长、远东共和国外交部长。后来从事经济工作。

**尤尔托夫**, 见叶俊中。

**俞秀松**(1899—1938)——1920至1921年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成员、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第一任书记。1922至1925年为中国社会主义(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至1933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和国际列宁学校学习。1933至1935年在苏联远东从事党的工作。

1935至1937年在新疆从事党的工作。在苏联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喻育之**(生卒年不详)——1923至1925年任孙逸仙的副官。

**于右任**(1879—1964)——1918至1922年任(陕西)靖国军总司令。1922年任上海大学校长。1924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7年任国民党联军驻陕总司令。后来担任政府领导工作。

**于树德**(1894—1982)——1921年起为中共北京组织成员。1922年出席了第一次远东人民代表大会。1924至1927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从事教学、科研和经济工作。

**虞洽卿**(虞和德,化名:日本人)(1867—1945)——1923至1925年任上海总商会主席。1925至1927年任上海商人协会主席。1927年为上海临时政府成员。后来从事行政、经济和财政工作。

**虞和德**, 见虞洽卿。

**袁庆云**(1899—1926)——1925年任中共旅莫支部书记。1926年任布留赫尔(加伦)的翻译。

**袁世凯**(1859—1916)——1905年起任北洋军阀集团首领。1912至1916年任中华民国临时总统。

**袁祖铭**(1889—1927)——1925

至1926年任川黔联军总司令。1926年5月退入湖南。1926年10月起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二军军长。被唐生智杀害。

**约尔克, E. C.** (化名: 约甘、约甘森、姚凯) (1900—1942) —— 1926至1927年为鲍罗廷驻华机构工作人员。后来从事科研教学工作。1932至1942年在工农红军中任职。

**越飞, A. A.** (1883—1927) —— 1917年起从事外交工作。1922至1923年任驻华全权代表。自杀身亡。

**岳维峻** (1883—1932) —— 1925至1926年任国民军第二军军长, 兼任河南省省长。1926年任国民联军南路军总司令。1927年为陕西省政府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 Z

**泽连斯基, M. A.** (1890—1938) —— 1922年起为俄共(布)中央委员。1924至1926年任中央书记。遭非法镇压, 死后恢复名誉。

**詹姆森, J.** (1867—1946) —— 1926至1929年任英国驻沙面总领事。

**张伯伦, O.** (1863—1937) —— 1924至1929年任英国外交大臣。

**张发奎** (1896—1980) —— 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

二十师师长、第二方面军司令。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张继** (1882—1947) —— 国民党活动家。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5年参加了北京西山会议。1927年为南京政府成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张静江** (1877—1950) —— 1924至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6年起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26年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1927年任浙江省政府主席。1929年引退。

**张国焘** (张特立、阿莫索夫) (1897—1979) —— 1921至1923年, 1925至1938年为中共中央委员。1927至1938年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4至1926年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候补委员。1928至1930年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后来担任党的职务。1938年退出中国共产党。

**张秋白** (生卒年不详) —— 国民党活动家。1922年为国民党出席第一次远东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

**张绍曾** (1880—1928) —— 1923年任北京政府总理。后遇刺身亡。

**张曙时** (1884—1971) —— 1924至1927年任国民党江苏省党部常委、秘书长。1927年3月为国民党内

央执委会政治委员会上海分会委员、上海临时政府成员。后来在中国共产党中从事党的工作和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从事政府工作。

**张太雷**(1899—1927)——1925至1927年为中共中央候补委员。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1921年任共产国际驻伊尔库茨克远东书记处中国科书记，出席了共产国际第三次代表大会。1921至1922年任马林的翻译。1922至1924年为青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至1926年任鲍罗廷的翻译。1927年任广州苏维埃政府主席。广州起义时牺牲。

**张翼鹏**(1882—1944)——1926至1927年任湖南省政府主席、国民党湖南省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张之江**(1882—1966)——1924至1926年任察哈尔督统、冯玉祥的副手。1926年任西北边防督办。后来还担任一些军事领导职务。1946年引退。

**张宗昌**(1881—1932)——1925至1928年任山东省省长。1926至1927年任直鲁联军总司令。1928年引退。后遇刺身亡。

**张作霖**(1875—1928)——奉系军阀首领。1920至1922年，1924至1928年控制了北京政府。1928年被

国民革命军部队打败。后遇刺身亡。

**章炳麟**(章太炎)(1868—1936)——反清革命运动参加者、作家、学者、社会活动家。

**章郁庵**(生卒年不详)——1927年3月为上海临时政府成员。

**赵恒惕**(1880—1971)——1921至1926年任湖南省省长、督军。1926年被唐生智部队打败。后来担任一些军事职务。

**赵世炎**(1901—1927)——1920至1923年留学法国、任中共旅法支部书记。1923至1924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4年任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北方局宣传部部长。1926年任中共江苏和浙江省委组织部部长。1927年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遭国民党杀害。

**郑润琦**(生卒年不详)——1925年任粤军第四军第三师师长。

**郑延禧**(1878—?)——1925至1927年任中国驻苏联临时代办。后来从事外交工作。

**周达文**(化名：丘古诺夫)(1903—1938)——1924至1925年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1925至1927年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翻译。1927至1932年为国际列宁学校学生、研究生、教员。1932至1938年任伯力《工人之路》报责任编辑。

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周恩来** (1898—1976) —— 1927年起为中共中央委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1928年起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1920至1924年留学法国。1924至1926年任中共两广区委常委兼军事部部长。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1925至1926年任广东东江各属行政委员。1926至1927年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1927年3月为上海工人第三次起义领导人之一。1928年出席了共产国际第六次代表大会。后来担任党和国家领导职务。

**周凤岐** (1879—1938) —— 1926至1927年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十六军军长。1927年任上海戒严副司令、浙江省政府主席。1927年9月引退。后遇刺身亡。

**周孝公** (生卒年不详) —— 1927年3月为上海临时政府成员。

**朱和中** (1881—1940) —— 1921至1922年任孙逸仙驻德国代表。1925年10月至1926年4月为国民党访苏代表团成员、胡汉民的秘书。1923至1925年，1926至1930年任广东兵工厂厂长。后来担任政府职务。

**朱培德** (1889—1937) —— 1926

年起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1925至1926年为广州政府成员。1926至1927年历任国民革命军第三军军长、武汉政府成员、江西省政府主席。后来还担任一些军政职务。

**朱务善** (化名：奥希波夫) (1897—1971) —— 1920至1925年为中共北京组织成员。1925至1927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1927至1930年在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学习。后来在苏联从事科研和教学工作。30年代末遭到非法迫害，后恢复名誉。1949年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从事科研工作。

**朱执信** (朱大符) (1885—1920) —— 国民党活动家。遭广西军阀杀害。

**兹纳缅斯基**, A. A. (1887—1939(?)) —— 1920年为俄共(布)远东局委员、远东共和国政府成员。1922年起从事外交和经济工作。遭非法镇压，死后恢复名誉。

**邹鲁** (1885—1954) —— 1924年起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1925年为北京西山会议发起人之一。1926年被开除出国民党。1927年恢复党籍，后担任一些党政职务。



封面  
前言  
目录  
正文